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朱元鴻博士

消費、身體、生命政治：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

Consumption, Body, and Biopolitics:  
Opium and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China

研究生 黃宏昭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七月



博士論文題目

消費.身體.生命政治：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

研究生：黃宏昭

論文考試委員：

黃金麟

黃金麟

劉紀蕙

劉紀蕙

王鴻泰

王鴻泰

黃崇憲

黃崇憲

朱元鴻

朱元鴻

(論文指導教授)

蔡瑞明

系主任：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6 日



##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開展的關係，思考中國從鴉片化到去鴉片化救亡過程的現代性轉型，這一問題意識是既有鴉片相關研究較缺乏的面向。整個研究涉及鴉片在中國兩百餘年所引發的癮、商品消費和習性控制的國家管治關係，以及去除鴉片造成身體、生命、人口素質和國家政經秩序危害，所引發的國族救亡的現代性工程。所延伸的既是控制消費，也是控制身體和生命的政治過程，同時也是現代性開展的過程。在鴉片禍害脈絡下，整個中國的現代性進程則環繞在鴉片這種社會病態/疾病衍生的問題，以及如何去除病態以恢復正常秩序所建立起來。本文的主要分析面向：消費、身體和生命政治。重點：(一)、鴉片的消費與政治關係。從鴉片物質生活、消費景觀到如何建立官方反鴉片消費論述和羞恥政治以管治鴉片；(二)、鴉片身體與視覺遭遇的效應，如何形成恥感意識的自我建構以及身體視覺管治；(三)、亡國滅種如何成爲生命政治根源，身體、生命、人口健康等生命政治作爲如何促成中國救亡現代性開展。簡言之，本論文認爲：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開展，就是鴉片化到去鴉片的救亡過程，透過消費政治、視覺/身體政治和生命政治的救亡方式進入現代性議程，亡國滅種、恥感意識是促動救亡現代性的內在動力。這些要素構成本論文討論的主軸。

論文章節結構計分五章，除導論、結論，主體討論分三章。根據論文研究旨趣、問題意識和分析面向的提出及回應，討論安排如下：

(一)、第二章討論面向，管治鴉片：鴉片的消費/政治。分析重點包括，(1).鴉片的消費景觀。瞭解鴉片的社會生命和日常化現象；鴉片的消費人口；鴉片的供銷體系運作；鴉片消費者的需求如何以及鴉片的日常功能，說明鴉片何以成爲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2).食妖亡國：鴉片的消費政治。探討鴉片如食妖亡國，導致消費政治介入；官方如何建立反鴉片消費論述，形成官方定義鴉片的品味標準，對鴉片進行罪責和禁制；最後如何形成一套以國族救亡導向的品味政體；(3).社會品味：鴉片時尚流風。探討鴉片做爲一種社會時尚，成爲大眾追慕仿效的對象。這股鴉片是尚風潮由上而下傳染，促成鴉片消費的普及；再者，深入鴉片如何成爲一種品味，鴉片吸食如何構作出精緻的物質文化和儀式；此外鴉片煙館也成爲一種複合式的休閒社交空間；以煙宴友更是當時社會風尚，成爲一種獨特的鴉片吸食的社會互動行爲；(4).從時尚到羞恥政治。探討鴉片品味的轉折；如何透過鴉片詬病化和罪責化，形成羞恥策略，改變人民以吸鴉片爲恥，而非時尚體面之舉；這種品味風尚轉變，正是恥感意識社會化的作用。(二)、第三章討論面向，恥感建構：視覺化的鴉片/身體與救亡。分析重點包括，(1).身體的視覺建構。

東西方視覺遭遇，相互醜化、妖魔化現象；如何建構病態鴉片鬼身體為恥感的身體；(2).視覺現代性下的啓蒙與恥感。探討在看、被看與自我觀看間，如何形成啓蒙和恥感意識；同時探討觀看政體下身體的理論概念；(3).展覽會：從視覺化恥辱到象徵性救亡。探討清末中國進入萬國博覽會，如何在全球視線下成為現代性它者；鴉片出展，如同在全球視線下建構出恥感國體；重商主義的清末中國，如何重視賽會興商功能，其目的在國富民裕，賽會也成為視覺化的國富之道；愛用國貨，國貨展出，如同象徵性的視覺救亡行動；(4).視覺管治：抓出鴉片身體。首先探討常態視覺秩序運作；再尋找是否有不受管治的鴉片身體的可能；最後，人人皆可做視覺警察，對周遭的身體/鴉片進行視覺管治和裁絕。強化了視覺政治的控制力量。(三)、第四章討論面向，救亡現代性：強國保種下的生命政治。分析重點包括，(1).亡國滅種：生命政治根源。分析鴉片造成兵弱銀荒、種族滅絕威脅、成為革命建國障礙，這些因素構成了亡國滅種的隱憂，也成為中國救亡的歷史因素，導致現代性生命政治的開展；(2).從生命鴉片化到生命政治化。從個人到國家，中國歷經兩百餘年鴉片化過程，最後進入去鴉片化的救亡過程，透過健康、醫療、人口品質管理、公共衛生體制建立等現代性生命政治技術，進行強國保種的中國救亡工程。然而，在救亡框架下，個人身體、整體人口生命也納入國家管理，也就是生命的政治化和國家化；(3).去鴉片化社會：尋找不正常人。探討鴉片與不正常人口關係。鴉片生理危害擴及下一代人口數量和品質，引起滅種之憂，優生保種、控制生育觀念作法乃隨之而起，納入了生命政治治理範疇；人口—政治經濟構想的提出，以救中國之弊。歷代知識份子針對積弱中國，提出人口管理、政治經濟治理的藍圖，以解決中國問題；尋找非我族類，排除種族優生下的不正常人。西方演化論、優生學、遺傳學說的介入，以實踐中國保種強種目標。而極端的種族衛生思想也在此時出現；去鴉片化，就是去除不正常狀態的生命政治，也是中國救亡，國族強盛的根本之法；(4).健康的必要：保衛身體，保衛國族。探討健康政治，讓煙民、廢民都成為健康公民；尚武體育，以改造病夫，這是健康的開始；保衛健康，保衛國家，既是健康啓蒙，也透過健康救亡中國；至於公共衛生的推廣和體制建立，無疑構成救種、救國、救亡的現代性工程。公共衛生的社會化和國家化，讓國家得以透過醫療體制進行個別身體、集體生命的干預，這些作為體現在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構成了日常生活的衛生政治；最後則是保衛母體最後保衛母體，從強國保種的觀點，母體及下一代是國家的根基，強調育種救國的健康技術是救亡框架下必然之舉，其作法諸如產婦孕育、生產、育嬰的醫療衛生和家庭照養環境。

## Abstract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China. Opium was a special material in the early modern China. It was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habitu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harmful to body and life, and leading to social and economy problems, and even wars. Opium contributed to the negative images of Chinese as weak and dangerous people, and equaled to let the state perish as we knew. In other words, opium was portrayed as a danger to the heal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Although opium smoking had been prohibited, but it still remained legal trade unde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for years, because opium was an excellent source of revenue. So that, it was a threat to the state-building and the national survival. It is the problematique of this dissertation how to develop from opiumization to de-opiumization and how to develop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China. The issues involved are including addiction, commodity consumption, state control, and national salvation. Furthermore, it is not only national salvation but also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Several studies have been made on finance, economic benefits, global trade, foreign relations or state-making.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has never been studied so far. After studied a lo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se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as surrounded by opium as the social pathologies, and moreover, how to remove the pathological situation restore to order of normal. Further, this dissertation is concerned how to control opium consumption, how to police opium body, how to govern life,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e may consider the subject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s: (A) how to get a gr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consumption and politic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ing opium; (B) how the visual effects of opium body formed the sense of shame and the policing vision on the body; (C) how biopolitics constructed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China. In summary, the process of opium and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was the process from opiumization to de-opiumization. Through opium we understan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as built of salvation in consumption politics, visual / body politics, and biopolitics. Furthermore, the sense of crisis of 'ruin the state and destroy the race' and the sense of shame constituted the inner motivation of modernity in China.





# 目 錄

第一章	導 論：問題鴉片，問題中國 .....	1
第一節	物質事件：鴉片的中國效應 .....	1
第二節	研究旨趣、問題意識、分析面向 .....	5
第三節	鴉片研究的幾個面向 .....	15
第四節	論文結構、預期和侷限 .....	25
第二章	管治鴉片：鴉片的消費/政治 .....	29
第一節	鴉片的消費景觀 .....	32
一	鴉片的社會生命和日常化	
二	多少煙民：鴉片消費人口	
三	鴉片怎麼到手：鴉片的供銷體系	
四	為什麼吸鴉片：鴉片的消費需求	
五	鴉片之用：日常生活經驗	
第二節	食妖亡國：鴉片的消費政治 .....	59
一	鴉片食妖：消費政治的介入	
二	官方品味生產：反鴉片消費論述建立	
三	國族救亡導向的品味政體	
第三節	一種社會品味：鴉片時尚流風 .....	84
一	流風所及：由上而下的時尚感染	
二	鴉片品味：精緻物質文化和儀式	
三	鴉片煙館：複合式的休閒社交空間	
四	以煙宴友：鴉片吸食的社會互動	
第四節	從時尚到羞恥政治 .....	100
一	品味的轉折：從時尚到羞恥	
二	羞恥策略：鴉片的詬病化和恥辱化	
三	厲之以恥：恥感意識的社會化	
第三章	恥感建構：視覺化的鴉片/身體與救亡 .....	113
第一節	身體的視覺建構 .....	118
一	東西方視覺遭遇：番鬼、鴉片鬼的妖魔化和醜化	
二	病態鴉片鬼：恥感身體的視覺建構	
第二節	視覺現代性下的恥感與啟蒙 .....	136
一	看、被看、自我觀看：恥感與啟蒙的誕生	
二	觀看政體下的身體	

<b>第三節</b>	<b>展覽會：從視覺化恥辱到象徵性救亡 .....</b>	<b>147</b>
一	進入博覽會之外：全球視線下的現代性它者	
二	鴉片出展：全球視線下的恥感國體	
三	賽會興商：開明耳目的富國之道	
四	國貨展出：象徵性的視覺救亡	
<b>第四節</b>	<b>視覺管治：抓出鴉片身體 .....</b>	<b>173</b>
一	進入常態視覺秩序	
二	出神於社會內/外：鴉片身體的另一種可能或不可管治	
三	人人皆視覺警察：鴉片身體的管治與裁決	
<b>第四章</b>	<b>救亡現代性：強國保種下的生命政治 .....</b>	<b>191</b>
<b>第一節</b>	<b>亡國滅種：生命政治根源 .....</b>	<b>193</b>
一	鴉片造成兵弱銀荒危機	
二	鴉片造成種族滅絕威脅	
三	鴉片是革命建國障礙	
<b>第二節</b>	<b>從生命鴉片化到生命政治化 .....</b>	<b>218</b>
一	生命鴉片化	
二	生命政治化	
<b>第三節</b>	<b>去鴉片化社會：尋找不正常人 .....</b>	<b>221</b>
一	鴉片與不正常人口	
二	人口—政治經濟的治理構想	
三	非我族類：種族優生下的不正常人	
四	去鴉片化：去不正常的生命政治	
<b>第四節</b>	<b>健康的必要：保衛身體、保衛國族 .....</b>	<b>248</b>
一	健康政治：從煙民、廢民到健康公民	
二	尚武/體育：改造病夫，健康身體的開始	
三	保衛健康，保衛國家：健康的啟蒙與救亡	
四	不潔的恥辱：日常生活的衛生政治	
五	保衛母體：育種救國的健康技術	
<b>第五章</b>	<b>結論 .....</b>	<b>281</b>
	<b>參考書目 .....</b>	<b>289</b>

# 第一章 導論：問題鴉片，問題中國

## 第一節 物質事件：鴉片的中國效應

「要是沒有鴉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也許就會與現在大不相同」。<sup>1</sup> 摘述這句話，討論重點不在議評事後歷史的推論臆測可否或如何，而在指出鴉片在某一時段的中國歷史舞台扮演至關重要物質的角色，它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帶著毀敗效應的物質事件。人類學家西敏司(Sidney W. Mintz)在研究糖的物質社會生活及其對英國飲食習慣、社會變遷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影響時講了一句話，「英國工人第一次喝下一杯帶甜味的熱茶，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因為它預示著整個社會的轉型，預示著經濟和社會基礎的重塑」。<sup>2</sup> 同樣鴉片在十九世紀中國的作為和影響，確實可視為是歷史性的物質事件。這事件帶來的中國效應，就是侵蝕這個國家。如同英國知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說，「這個偉大的國家深陷毒品的災難之中，她的徹底毀滅僅僅是一個時間的問題」。<sup>3</sup> 鴉片物質事件的終局效應，正好跟糖對英國社會經濟的影響相悖，雖然相似的是這過程也徹底改變了這國家的一切。而國家所立基的制度、價值、信仰基礎也翻轉重塑。這物質事件背後所呈現的是：鴉片仿佛成為歷史觸媒，牽動國家、種族、個體、典章制度、文化信仰、價值秩序、自我認同、國民習性、生活型態、慾望構成、感官嗜好、身體實踐的型轉質變。正如鴉片戰爭做為引發中國面對現代，涉入世界，重新看待過去，改造自身體質的歷史事件，鴉片也演作一起深遠悠長貼隨中國人身心和社會機體二百餘年（自雍正七年(1729)發佈第一道鴉片禁令至1949年），進而透過一場戰爭逼使帝制中國不得不在封閉/開放，傳統/現代，文明/落後的交界上跨出一步的物質事件。這一物質事件仿佛讓時空休止，發揮斷裂效果，其後的一切，中華帝國的一切完全不一樣，而新的物事也自此創生。

---

<sup>1</sup> 卜正民、若林丈，〈前言：中國的鴉片史〉，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0: 1)。

<sup>2</sup>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2010: 210)。

<sup>3</sup>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札記》，收錄於《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1911) (2011: 303~304)。

確實很少有物質像鴉片在中國產生從生活、文化到體制劇烈的翻轉效應，承載複雜龐大的象徵意義和愛恨交織，矛盾難言的獨特意指。鴉片既做為社會邪惡的病徵，卻又是官紳庶民休閒逸樂的消費品；吸食鴉片曾經是爭相競逐的時尚和體面之舉，最後反成為致差的屈辱和國恥；鴉片的進口一方面是國家銀漏財耗的根源，而鴉片稅的開徵卻又構成國家財政稅收的基礎；鴉片造成舊文化崩解，同時也確立新文明的未來進程，而這一切最後都化約為「鴉片中國」或「鴉片帝國」這一既具識別性也具特定性的專有指稱。既是西方哥德式(gothic)敘述下病態的中國意象或異國風情筆調下浪漫的東方遐想，同時也讓帝制中國進入了十九世紀西方現代性議程，想像自我之外的世界觀形成，啓蒙意識的覺醒，器物技術的趕進，病態身體的改造，種族命脈的振起，新公民的養成，公共領域的展現，現代化國家的建立，鴉片毒品化、罪責化背後的現代性醫療建構和淨化人民的社會控制機制，以及西方觀看政體下鴉片身體的視覺現代性構作。也因此鴉片流毒無窮，竭財無盡的病國之憂反構成強種保本，富國裕民，改革進步的「現代中國」問題意識。

因此，做為世界貿易體系下的商品，引入外來經驗視野的舶來品，遭受全球勒禁控管的毒品，以及促動中國翻身改造的刺激品，鴉片仿佛成為譯介或橋接西方現代性的媒介物質。而在這種舊中國與現代西方遭遇（貿易、外交、戰爭、文化想像）的脈絡下，鴉片也因此較其它麻醉性藥品更具歷史獨特性和多義性，既是中國的鴉片化，也是鴉片的中國化，鴉片成為很獨特的「中國問題」，不只是中國內在的問題，一個關乎民族續絕、國家存亡的問題，也構成西方的中國問題：中國的落後、封閉、不文明，華人煙鬼像瘟疫污染西方，中國在二十世紀成為鴉片主要輸出國。亦即，中國做為鴉片使用大國對西方構成毒化威脅，即使鴉片在十九世紀早已廣為歐、美和其它東方國家所使用，成為一種普遍可見的國際現象，鴉片中國仍是世界害怕、關注的焦點。

再者，包安廉(Allan Baumler)指出，鴉片並不是一種毫無生命的物體，它有不少來自中國和西方所賦予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sup>4</sup>確實，鴉片除有它自己的物質生命，商品生命，更有其政治、社會和文化生命，它牽動也伴隨著近代中國的發展，共構出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二百餘年中國人的哀樂生死，悲喜榮辱，鴉片的社會生命已結構化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它不只是個人的癮或癖，而是一個國家國民的生活習性。鴉片中國在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崛起，西方帝國尋求國際市場的經貿、外交和殖民擴張的背景下，建構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意義層疊交錯的物質生命，中國被迫必須面對鴉片這一物質帶來諸多難題。美國傳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在 1895 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國佬》(The

---

<sup>4</sup> Alan Baumler, *The Chinese and Opium Under the Republic: Worse Than Floods and Wild Beasts* (2007: 2).

Real Chinaman) 一書中即指出，正是鴉片「讓中國從它的閉關狀態中被拖了出來，去正視近代的西方世界，並被迫與建立新的、它根本不情願接受的關係」。<sup>5</sup> 這一不情願接受的新關係，讓中國必須面對西方做為異己（外夷）的窘迫無對，面對門戶洞開的挫敗不甘，面對船堅砲利的駭異無措，面對政體鉅變的惶惑不安，面對國族凌夷的憂憤難遣，最後形成一套以創傷恥辱為基調，在禁煙反毒框架下的國族論述、革命論述、建國論述、帝國殖民論述、身體改造論述和現代化論述，這一基調成為近代中國命運的主流敘述，在鴉片造成亡國滅種的憂慮下，中國如何擺脫鴉片禍害，如何進行改革，以救亡中國，成為帝制到共和時期的主要議題。

在中國救亡框架下，鴉片亡國滅種論成為鴉片生命史的主要修辭，鴉片的物質功能最終被定調為毒品，也有了亡國滅種的象徵意義。在這脈絡下，鴉片不斷歷經「消費的政治重界定」(political redefinition of opium consumption)，<sup>6</sup> 成為一種國族化的政治物質，也形成「鴉片禁制的政治」(politics of opium suppression)，<sup>7</sup> 造就出從帝制直到共和二百多年以禁政為要的「鴉片政體」(opium regime)結構。這政體是一種權威當局可宣告其權利去控制某種特定行為，同時制定政策，建立機制以執行這些權利的體系；<sup>8</sup> 它也常意味著一套國家的建制化治理，國家可以委派特定的行政機構執行其管理權。<sup>9</sup> 這種政體使得鴉片的生產、流通、消費、品味嗜癖，享樂方式、感官經驗全在國家或其代理機構、民間組織、公民群體的監控管治之下，形成癮、商品交易和國家干預緊密交織，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安排的鴉片政體。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的管理有時不止於禁制，更在於控制人民不得不去生產。<sup>10</sup> 也就是，國家不只宣告鴉片的非法性，更在治理能力不足及經濟理性計算等因素下容許其合法存在。1858年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及幾次寓

---

<sup>5</sup>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國佬》(The Real Chinaman)(1895)(2006: 10)。

<sup>6</sup> 鄭揚文(Zheng Yangwen)將鴉片吸食歷史分期五階段中的第三階段，分別為：一、神話形成(myth-making)階段：明中葉到晚明；二、品味形成(taste-making)階段：清初到清中葉；三、政治重界定階段：1830年代末；四、擴張化(extensification)階段：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五、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階段：晚清到民國時期。見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2005: 206)。

<sup>7</sup>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1992: 101)。

<sup>8</sup> 這體系可以是一些正式組織，如當時的國際聯盟或一些反毒禁煙協會；或一些從事政治目的以達成正面社會成果的個別網絡，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獲取經濟利益從事政治行動以確保國會支持其繼續保有壟斷權。見卜正民、若林丈，〈前言：中國的鴉片史〉，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0: 5)。

<sup>9</sup> 見卜正民、若林丈，〈前言：中國的鴉片史〉，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0: 5)。

<sup>10</sup> 較著名的是軍閥時期為籌餉源，購買軍械，擴充軍力，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以徵煙稅，不種者則徵「懶捐」，如《英文中華年鑑》(1926)記載，「1925軍閥下令種鴉片，每甲的甲長都拒種，結果都納了懶捐」，見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二)(1957: 624)；除了懶捐或以繳納「白地款」為懲，見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 187)。

禁於徵時期，雖然貿易、興販、開館、吸食得以公開進行，不受取締懲處，但諸多禁令卻仍未廢止，形成法律懸置，非法/合法並行運作，禁之不絕，越禁越多，最後反被指為毒品輸出國的弔詭結構。

由於鴉片對個人身體、勞動生產、社會治安、道德風俗、國家財政、國防軍備，甚至種族繁衍的影響，鴉片成為問題的鴉片，問題鴉片造成問題的中國。中國的價值體系、社會秩序、政治制度，國家的權力基礎面臨崩潰瓦解的危機。鴉片讓中國遭遇到秩序和體系全面崩解的威脅。我們不難從連篇累牘的官方文書、議論文章、報紙輿論看到從清帝國到民國時代，君臣、官紳、知識份子，無不費盡心思解決鴉片帶來內政敗壞、外患凌夷、觀念制度、生活習俗頻遭挑戰的危機。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對外戰役的敗戰，割地賠款、門戶開放、洋鬼子、洋玩意、西醫、手術刀、上帝深入內地，造成視覺經驗、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的衝擊震撼。正如一位學者指出西方物質的影響，「正是西方的商品改變著中國社會的面貌。它沒有大炮那麼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麼感染人心，但卻比思想更廣泛地走到每一個人的生活裡去。當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之後，它同時成了人們生活的一個部份了。舊與新，中與西，於是乎難分難捨」。<sup>11</sup>這種改變是潛移默化且深入日常生活。

面對這種內部改變和外交挫敗，不僅天朝制度、威信逐漸蕩然，中國人的自信心和尊嚴也隨之瓦解。羞恥/國恥打擊的和亡國滅種的隱憂，成為清末民初最常出現的修辭或話語。而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的國族救亡工程，更成為清末以降朝野共識，國家改革主軸。自此，中國在西方專業知識、科學思想的借助下投入中國救亡大業，也進入現代性議程，亦即以現代性為改革核心的中國救亡工程。不只救國，更是救種；不只是器物、制度、觀念的現代化，中國人的身體、生命型態也進入現代性的轉型。在強國保種的意識型態下，國家對人民身體、生命負起更多保護責任，同時也愈益介入人民身體、生命的干預調控。而其目標就在讓鴉片化下病態、不正常中國，進入正常、健康狀態。去除問題鴉片，讓問題中國，成為正常、健康的中國。當我們在談中國救亡時，其最根本問題可能就是救病態、救不正常之將亡，讓中國能正常發展。

---

<sup>11</sup>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1992: 217~218)。

## 第二節 研究旨趣、問題意識、分析面向

上面討論引發這篇論文的研究興趣，問題意識和分析面向：

- 一、研究旨趣：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的開展；
- 二、問題意識：從鴉片化到去鴉片化救亡的現代性轉型；
- 三、分析面向：消費、身體、生命政治。

這篇論文認為：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開展，就是鴉片化到去鴉片的救亡過程，透過消費政治、視覺/身體政治和生命政治的救亡方式進入現代性議程。詳細討論如下。

### 一、研究旨趣：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開展

從上面鴉片對中國全面的影響效應，鴉片問題構成中國兩百多年問題，如何管治鴉片(policing opium)，解決鴉片問題，自是當時國家關懷所在，也向來是鴉片研究重點。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起於鴉片管治，然而更感興趣的是鴉片對中國的影響除了負面評價外，是否還有其它影響效應？鴉片除了敗壞中國體制、侵蝕中國根基，成為帝國侵略、殖民工具外，是否對中國體制、秩序全面轉型有潛在的助益。也就是鴉片影響的兩面效應，就像現代性具有雙重曖昧矛盾性一樣，<sup>12</sup>既是正面的自由、進步、理性、文明、向前進展，也可藉著這種力量帶來摧毀、戰爭、屠殺和自由的限制。鴉片的兩面性，從它的物質特性就可看出。鴉片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藥物，治療百病的萬靈丹，具有「自我醫療」(self-medicine)功能；然而它也是不折不扣戕害身心的毒品、癮品。<sup>13</sup>藥與毒是一體兩面存在，似乎徵示著鴉片不止於危害，也可能有正面良效。一樁弔詭現象，鴉片戰爭後導致中國開始「師夷長技」的自強運動，以及清末新政的推動，然而大部份練兵、興學、警政、興建海軍等改革建設所需的經費卻出自於鴉片稅捐。<sup>14</sup>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開徵土膏統捐，對於稅收分配特別提到要做練兵經費之用，「專做練兵經費」，「惟統捐創始於湖北，該省攤認賠款及兵工廠經費多由此取給」，<sup>15</sup>亦

<sup>12</sup> 可見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2002)；《現代性與矛盾性》(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2003)。

<sup>13</sup> 相關討論可見邱德亮，〈亦毒亦藥與鴉片政權〉，《新史學》，20卷，3期，(2009: 127~155)。

<sup>14</sup> 相關研究見劉增合，《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2005)。

<sup>15</sup> 〈財政處戶部會奏遵旨籌議八省土膏統捐請派大員管理摺〉，《東方雜誌》，2卷，7期，1905年8月25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1998: 377)。

即，鴉片稅收也包括償付外債和賠款，「國家既得此大宗款項，舉新政、償債金……」，而自強事業和新政改革推動也都要靠鴉片稅，「近可以抽大宗之膏捐，遠可以為自強之基礎」。<sup>16</sup>從上面討論看出，如果沒有鴉片稅做為國家主要財務來源，中國現代化改革的初步，在晚清財政困窘，其它稅收難以因應情況下，可能要捉襟見肘，困難重重。就此而言，鴉片仿佛成為現代化有力推手。鴉片在這面向成為禁政與新政的交集，禁政成效越佳，可能妨礙新政發展。已有研究指出，<sup>17</sup>清末禁政成功，造成清廷財政短收，反而加速清王朝的滅亡。因為，「自各省實行禁煙，稅收銳減」，<sup>18</sup>禁煙致使清廷喪失支持新政改革和支付皇朝官僚系統運作的經濟能力，禁煙更讓清廷無力償付龐大的外債和賠款，此外禁煙也造成各省財政困難，地方歲入短缺，中央又無力給款，當時地方官員抱怨，「復值各省實行禁煙，土商停運，不獨溢收全無，即應撥各省額款已難依期應付」，<sup>19</sup>這種緊張關係更加劇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當然禁政推行成功，不能說是清王朝覆亡要因，但它讓王朝財政困窮，經濟瀕於崩盤，權力機制運作困難也是事實。廣西巡撫張鳴岐即指出，「鴉片稅釐從前本屬寓徵於禁，積久轉成歲入大宗，當此國帑空虛之際，驟復失茲鉅款，未嘗不增財政之困難」。<sup>20</sup>這一方面突顯鴉片造成的道德與經濟的兩難，另一方也體現鴉片「亦毒亦藥」既是毒物也是良方的兩面性。

不管諸多討論如何賦予鴉片負面評價，然而從中國歷史發展的最終事實來看，鴉片雖然麻木了一個國家，讓國家機體失能、治理失靈，但在回應鴉片問題試圖重生的救亡努力下，最後也讓這個滿是鴉片鬼行屍的國家，逐漸改變身型面貌，緩步型轉過來，雖然轉型不夠徹底、快速，猶有未盡之處，但已讓中國逐步進入另一前所未有的創局，即現代化國家的局面。這種受到鴉片毒癮麻醉到全面甦醒，而後漸次改變的過程，正是兩百多年鴉片中國的進程。馬克思敏銳的看到這一點，講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歷史的發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史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sup>21</sup>鴉片統治中國，國家失能凋敗，先有這段麻醉過程，才能重新喚醒中國，進入一個新國家，這是中國覺醒論(awakening china)的論調。<sup>22</sup>從事實來看，喚醒或覺醒

---

<sup>16</sup> 〈戶部奏洋藥土藥害人耗財擬嚴定分年禁法畫一辦法摺〉，《東方雜誌》，2卷，2期，1905年3月30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1998: 376)。

<sup>17</sup> 田海林、張志勇，〈禁煙新政與清王朝的覆亡〉，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2002: 1300~1301)。

<sup>18</sup>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1958: 6018)。

<sup>19</sup>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1958: 5734)。

<sup>20</sup> 〈廣西巡撫張鳴岐奏詳陳禁煙辦法摺〉，《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三月二十日，第548號。

<sup>21</sup>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972: 2)。

<sup>22</sup> 參見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Awakening China)(2004: 3~99)。



過程，就像是啓蒙過程。顯然鴉片毒化國族造成的傷害和危機，迫使中國不得不覺醒，進而走向一個不同於已往制度、秩序的現代性路徑，以之應對。1909年萬國禁煙大會中國代表唐國安在會中演說，特別提到鴉片不除，有礙中國進入現代化之列，「我們祈求擺脫這種禍害，因為我們不但把這種禍害視為阻礙我們進入現代化進步國家行列的障礙」。<sup>23</sup>鴉片弱化中國，對照出西方現代性強盛，富強中國，唯現代化一途。鴉片既是妨礙力量，但也正因為要解決鴉片問題，才讓中國走入現代化之列。

簡言之，鴉片可能是中國進入現代性的促動因子，更貼切的說它將中國無情的打進了現代性的門檻裡。鴉片做為衝擊中國的物質事件，在背負龐大歷史污名和做為中國挫敗歸咎對象背後，或許我們轉換個角度尋思，它可能埋下日後中國現代性轉型的因子。或許這是事後之論，不過歷史就是如此弔詭發展，鴉片摧毀舊中國，也創生現代新中國。正是為了解決鴉片帶來的身體、生命、國家、種族危機等問題，才提供了現代性生命政治技術開展的環境。胡適曾經分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幾個階段，首先是鴉片戰爭之後的技術引進階段，其次是甲午戰爭之後的政治改革階段，最後以文學革命為開端的文化復興階段。<sup>24</sup>胡適的說法，顯然鴉片戰爭開啓中國現代化進程。胡適的幾個階段，從本論文即將討論的架構來談，甲午戰後的政治改革階段，其實也萌生了兩種相當關鍵的意識，一是恥感意識，另一是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這兩種意識直接或間接來自鴉片的負面效應（見本論文三、四章的討論）。鴉片的落後不文成爲全球恥笑對象，特別是鴉片鬼身體以及鴉片等醜陋惡俗參加萬國博覽會展出，如同展出國恥，在全球視線下建構自我恥感化的國體。亦即鴉片的視覺化建構出恥感意識的身體和國體，而恥感意識則相當程度促成中國的自覺和啓蒙（本論文第三章討論魯迅的例子），也進入胡適所說的文學革命階段，也就是思想啓蒙階段。除了恥感意識，另一個知識份子的負擔就是亡國滅種的隱憂，而滅種的嚴重性更甚亡國，國亡可建，種滅不復存。亡國滅種根源來自鴉片造禍，萌起於清末，主要受西方民族主義、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優生學等現代性知識影響。林滿紅即指出，「遵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西方邏輯，中國人建構強健種族的使命與鴉片毒害觀，互相牽連而對中國未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sup>25</sup>確實強種與鴉片之間關係的消長，牽動了中國未來命運發展。在嚴復、康有爲、梁啓超等有識之士的眼中，全球成爲一個種戰的世界，國與國爭，種與種戰。殘敗萎弱的中國如不能消滅鴉片，極有可能在

---

<sup>23</sup> 1909年3月1日，《字林西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109）。

<sup>24</sup> 見胡適1926年11月9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演講，刊於*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p.265~279, 1926, Vol 6, No6；以及1927年2月26日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刊在*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 pp.5~12，轉引自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1998: 266）。

<sup>25</sup> 林滿紅，〈晚清的土產鴉片觀念〉，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2010: 64）。

全球競爭法則下慘遭淘汰，國亡而種滅。

於是亡國滅種之憂，開啓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的思想和作為，也展開了近代中國的救亡工程。透過現代性知識和技術進行中國救亡，也形成了中國救亡的現代性。一位鴉片戰爭史研究者即指出，鴉片戰爭是中國救亡圖存以及現代化開展的肇端，「這種救亡圖強的探索，是緊接著鴉片戰爭開始的，它是中華民族開始覺醒的重要標誌，也是中國邁向近代化的第一步」。<sup>26</sup>另一位研究者也提出同樣看法，「正像中國近代史開始於鴉片戰爭一樣，中國近代化問題的提出也開始於鴉片戰爭」，在自強維新時期「中國需要近代化的問題」，就是「師夷長技」的問題。<sup>27</sup>外夷之長技到清末以降就是西方現代化問題。因此，中國現代性轉型肇端於鴉片事件，歷經調整、適應、接受等諸多曲折和轉折，雖然最後未見轉型徹底，但已確定告別舊體制。鴉片如果引起一樁影響深遠的事件，這起物質事件，既是打開和敗壞中國的摧毀事件，也是一樁必將來臨的現代性事件。

鴉片跟現代性有關的事件，還不止於它讓中國不得不師夷長技到進入現代性門檻。事實上，鴉片在幾個面向上，就將中國帶進國際舞台，不自主的捲入當時全球現代性過程。與本論文相關的有三：

(一) 鴉片是當時全球經貿和商品體系的一環，透過茶葉、鴉片和白銀流動，形成中印英三角貿易，也構連了全球經貿體系。<sup>28</sup>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也指出鴉片貿易將中國與世界經濟連結的關係，「鴉片不只將中國、印度、英格蘭、美國牢牢結合在四邊的貿易關係裡，還在維持英國工業化的持續向前和十九世紀世界經濟前所未有的不斷擴張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sup>29</sup>另一名研究者也提到鴉片促進中國經濟現代化和全球化，不僅讓中國與全球市場接軌，同時也促成國內新型商業構誕生，「毒品也對中國經濟現代化和全球化發揮了促進作用。這裡的現代化不能被理解為工業化，而是指商業化，即建立越來越密集和流通越來越廣泛的市場關係。鴉片貿易的增加不僅促進了中國融入世界市場，也導致國內新型商業結構的形成」。<sup>30</sup>至於鴉片導致中國白銀外流引發財政危機，而白銀短缺除鴉片因素外，背後還有國際貨幣因素，國際金銀產量多寡和流通狀

---

<sup>26</sup> 蕭致治，〈鴉片戰爭與中華民族的覺醒〉，收錄於阮芳紀、沈永興編，《屈辱與抗爭：鴉片戰爭 150 週年文集》(1990: 78)。

<sup>27</sup> 牟安世，〈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收錄於阮芳紀、沈永興編，《屈辱與抗爭：鴉片戰爭 150 週年文集》(1990: 61)。

<sup>28</sup>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1978).

<sup>29</sup>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托皮克(Steven Topik)，〈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 1400 年到現在〉(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2007: 151)。

<sup>30</sup> 達素彬(Sabine Dabringhaus)，〈從鴉片貿易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問題的國際性及其應對之道的國際化〉，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五輯)(2006: 66)。

況，對中國銀荒問題有所影響。<sup>31</sup>濱下武志指出了中國與全球金融連動的關係，「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波動也會直接影響到中國金融市場。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著手打開，從而控制中國市場時候，由於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它們進入貨幣和銀行領域都變得非常容易」。<sup>32</sup>可見中國金融早已納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一環，西方藉著貨幣制度、白銀流動敲開中國大門，而世界金銀的減產、景氣蕭條與否也牽動中國漏卮銀荒的財政問題（相關討論見論文第四章）。

（二）萬國博覽會的鴉片出展事件，讓鴉片鬼、鴉片煙具進入國際舞臺，成為全球視線的焦點，鴉片成為國際公認的中國象徵。而萬國博覽會做為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現代性商品展示空間如班雅明所說，「世界博覽會建立了商品的天下……將商品特性傳播到世界……使全世界現代化」。<sup>33</sup>因此，在這讓世界變得更現代化的商品展示空間裡，中國參展物件鴉片煙具、纏足弓鞋等陋俗之物，隨同西方國家參展的各項工業發明和商品，成為現代化和世界化的一環。只是對西方人而言，中國參展物件猶如「現代性它者」。<sup>34</sup>雖然對大部份中國人而言，鴉片出展如同國恥的全球展示，雖搭上現代性列車，卻以它者的角色被凝視和觀看，然而對內部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凝聚顯然有所幫助。再者，幾次的萬國博覽會出展，也讓中國在豐富、新奇的商品世界裡，經歷現代性體驗和世界感，同時也逐培養出現代性的視線，這些歷程和經驗最後反映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蓬勃發展的國貨展、商品展等現代性商品展示行動上。此外，十九世紀中葉西方興起的現代性視覺技術，如攝影、照相等，也讓中國鴉片身體進入國際視野，成為具東方情調的全球意象。透過大量照片、明信片、攝影集中國鴉片身體快速傳播全世界，中國就在現代視覺科技再現下與全球連結（相關討論見本論文第三章）；

（三）、在醫學界定鴉片為有害身體毒品脈絡下，鴉片已成為現代性意義下勒禁的毒品，<sup>35</sup>也成為全球禁毒對象。第一次國際性禁毒會議「萬國禁煙會」，

---

<sup>31</sup> 國際經貿討論見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1978)；Carl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 Opium Trade 1750-1950*(1999)；白銀外流討論見濱下武志，〈中國的外貿金融：白銀、鴉片及世界市場整合，19世紀20~50年代〉，收錄於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2009: 138~182)；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2011)，以及林滿紅其它相關論文。

<sup>32</sup> 〈中國的外貿金融：白銀、鴉片及世界市場整合，19世紀20~50年代〉，收錄於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2009: 139)。

<sup>33</sup>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2002: 271)。

<sup>34</sup> 見高彥頤，《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2007: 60)。

<sup>35</sup> 鴉片做為毒品跟現代性關聯可見邱德亮，〈從局限經濟到普遍經濟：鴉片消費的東方語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六十九期(2008: 8~9)。

1909 年在上海舉行，中國首次參與國際性活動，成為國際社會一份子。<sup>36</sup> 其後幾次的國際性禁煙會議中國也都參與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國際性禁煙合作不只讓中國在國際舞臺有正面角色和功能，同時也有助於中國內部禁煙行動。上海萬國禁煙會的中國代表唐國安，特別指出國際合作對中國禁煙的重要，「毫無疑問，國際合作與行動對於成功解決這個問題（鴉片）是十分重要的……對中國而言，要取得完全的成功還須有其它國家的合作」。<sup>37</sup> 再者，國際禁煙會議舉行，一來說明鴉片不再是國際經貿體系下的流通商品，而是全球禁毒公約下的毒品；二來顯示鴉片問題的國際化，也就是毒品成為國際社會關注事務。<sup>38</sup> 中國禁煙問題不再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國際禁煙委員會隨時派員調查中國禁煙情形，國內禁煙團體也在意中國是否執行不力，在國際會議上受到譴責，違背公約，失去國際信用，貽笑世界。鴉片強迫中國接觸國際社會，也讓中國主動加入國際社會，鴉片不意間成為中國世界觀形成和現代化的介面。

上面討論構成本論文思考旨趣和發問基礎，主要關懷在於：怎麼看待鴉片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亦即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開展如何建立關聯。過往的鴉片研究幾乎未見這一議題討論，鴉片與現代性仿佛互斥體，連不在一起。至於提到鴉片與現代化關係，論調大抵如前文討論所引段落，尙未見直接處理這一議題。本文認為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關係建立在救亡上。鴉片，更精確的說，為了解決鴉片對身體、生命、人口品質和國族的傷害，促成中國救亡工程往現代性方向開展。探討中國現代性發生當然有許多面向，如著重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走向以科學、技術為主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現代化歷程；<sup>39</sup> 強調上海資本化、商業化、休閒化的都市現代性，<sup>40</sup> 西方物質滲透下的日常生活現代性，<sup>41</sup> 西方衛生體制引進的

---

<sup>36</sup> 第一次全球性的反毒會議由美國倡議，中國主辦於 1909 年在上海外灘匯中飯店召開萬國禁煙會，總計 13 個國家出席。這次歷史上第一次確認鴉片為毒品的多邊性國際性會議，反毒禁煙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以及努力的目標，會議決議也成為 1912 年海牙國際禁煙會議《海牙禁煙公約》的內容。其後幾次國際聯盟召開的日內瓦禁煙會議，中國都積極派員參與，在全球反毒禁煙合作上扮演重要角色。關於中國參與幾次國際會議的詳細資料見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蘇智良，〈一九〇九年上海萬國禁煙會研究〉，《歷史研究》，2009 年，1 期(2009: 85~95)；蘇智良、劉效紅，《全球禁毒的開端：1909 年上海萬國禁煙會》(2009)。

<sup>37</sup> 1909 年 3 月 1 日，《字林西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103)。

<sup>38</sup> 相關討論可見達素彬(Sabine Dabringhaus)，〈從鴉片貿易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問題的國際性及其應對之道的國際化〉，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五輯)(2006: 61~83)。

<sup>39</sup> 羅茲曼(Gilbert Rozman)編，《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2003)。

<sup>40</sup> 如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2001)；葉文心(Wen-Hsin Yeh)，《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2010)；Yeh, Wen-Hsin, "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 *China Quarterly* 150(1997: 375~394)。

<sup>41</sup> 如盧漢超(Hanchao Lu)，《覓紅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2004)；Madeleine Yue Dong and Joshua L. Goldstein,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2006)。

衛生現代性，<sup>42</sup>還有以文學現代主義為中心的現代性討論。<sup>43</sup>然而與鴉片最相關不脫中國的救亡。1904年革命黨人陳天華在〈警世鐘〉一文指出，鴉片戰爭讓「一切利權都任洋人奪去，亡國滅種的禍根，早已埋伏在這個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裡了」。<sup>44</sup>顯然，中國救亡肇始於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06年《申報》一篇文章也指出鴉片問題與中國救亡關係。當時中國內政外交困境，正在於鴉片導致的財政貧困，軍力萎弱，唯有禁煙救亡才是中國出路，「夫是以財政之貧，貧於鴉片，軍政之弱，弱於鴉片，且財政貧而內治因之腐敗，軍政弱而外交因以困難。識時之彥，莫不曰救亡，救亡。救亡之道何在，莫不曰禁煙，禁煙」。<sup>45</sup>到了1924年鴉片煙害仍未盡除，中華國民拒毒會回顧鴉片煙禍史，同樣強調鴉片亡國並促成中國救亡的覺悟之心，「自鴉片流毒中國，而主權喪失，人種衰弱，久有鴉片亡國之懼。勝清之季，國人漸有救亡之覺悟」。<sup>46</sup>確實，從實施鴉片禁政以來，官方文書，士紳、知識份子的議論文章，論及鴉片問題無不流露對國家頹敝凋敝的憂心。從道光時期君臣操憂道德崩解、兵弱銀荒，國家將無可用之兵、無可充餉之銀，到甲午戰敗知識份子深懷亡國滅種隱憂和國族恥辱。這種憂患意識和恥感意識一直延續到抗戰建國時期，仍未稍歇，成為國家集體焦慮和自卑情結。救亡圖存乃伴隨亡國滅種之憂而來，富國強兵，強國保種成為救亡的目標。

在上述脈絡下，中國救亡圖存的努力可視之為在回應和處理鴉片引發的傷害和危機。革鴉片惡習，救鴉片之弊，讓國家免於敗亡，種族免於滅絕。而其所需的改革、救弊之知識和技術，在西方相關知識的引進下，正好讓中國藉以進入現代性議程。一位德國學者指出，「中國改革者將鴉片視為造成國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和民族恥辱的根源……鴉片成了中國非現代性的象徵。新的和現代的中國應該是一個沒有鴉片的中國」。<sup>47</sup>這段話將鴉片、民族恥辱、國家救亡和現代性建立起關係。一個沒有鴉片的中國，也就是去鴉片化的中國，才構得上是現代中國。因此，在思考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關係時，基本上是立基在鴉片引發的中國效應，以及如何解決這一效應上。簡言之，就是鴉片化與去鴉片化的拉鋸。如何將鴉片化下的病態、不健康、不正常，恢復到健康、正常的常態秩序。去除中國是病夫、病國的不正常狀態。現代性的開展也正建立在這一恢復、重建的過程中。確實這種恢復正常化、追尋常態秩序的企圖，無疑是進入現代秩序的必然。柯拉

---

<sup>42</sup> 如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7)。

<sup>43</sup> 如史書美，《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2007)。

<sup>44</sup> 見陳天華，〈警世鐘〉，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 176)。

<sup>45</sup> 〈論禁煙機會不可失〉，《申報》，1906年6月11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1998: 387)。

<sup>46</sup> 民國十三年八月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致各省區軍民長官電文，引自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161)。

<sup>47</sup> 達素彬(Sabine Dabringhaus)，〈從鴉片貿易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問題的國際性及其應對之道的國際化〉，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五輯)(2006: 70)。

瑞(Jonathan Crary) 透過岡居朗(Georges Canguilhem)的觀點指出，在十九世紀期間正常化(normalization)與現代化的過程是相互重疊的。<sup>48</sup>因此中國進入現代性以救亡圖存，也必然伴隨著對身體、視覺意象、人口生命、國家機體正常化的要求。

## 二、問題意識：從鴉片化到去鴉片化救亡的現代轉型

從鴉片到中國救亡現代性的開展，是鴉片化到去鴉片化的過程，沿著這一問題旨趣往下思考，構成本文的問題意識：(一)、鴉片化過程。包括兩個面向，一是鴉片消費如何擴散、普及，最後成爲日常生活消費行動，構作出鴉片中國；二是鴉片的危害和威脅如何。正是這種危及國族生機，讓國家機體失能，治理失靈，種姓淪喪的禍害，鴉片才構成中國問題；(二)去鴉片化。一是如何進行鴉片管治，透過什麼樣的策略和方式。在這裡並不特意處理歷年來官方查禁鴉片行動，也就是禁煙史過程。因爲從歷史事實來看，中國歷來禁煙行動，除了少數時期，或某些執行者認真將事、嚴於查禁，有所成效外，大抵是失敗不果的，或者根本處於法令懸置的弛禁狀態，更不用說鴉片貿易合法時期的放任無爲。這裡提出討論的管治方式，主要有：(1).建構反鴉片消費論述；(2).羞恥政治；(3).鴉片身體的視覺管治和恥感建構；(4).生命政治。之所以討論這幾個議題，主要是這些管治方式，不只對反鴉片消費觀念的深化有所幫助，對其後的國家認同、民族意識凝聚更起著關鍵性作用。同時，這些管治的控制力量，已不只針對鴉片，更可擴及到其它領域，身體、生命、人口品質、內在意識全在管治範圍。正因這種配合國族生存需要，衍生出無所不及的管治效應，成爲可討論的焦點；二是該如何救亡？引進了構成生命政治條件的西方知識和技術，開啓中國救亡的現代性工程，以實踐強國保種的國族發展目標。這些問題意識，更清楚的說明如下：

(一)、鴉片化效應。鴉片的大眾消費化和日常生活化，造成身體、社會、國家、種族的危機和威脅；中國呈現病夫病國的病態、不正常、不健康狀態，也引發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和恥感意識萌生。正是亡國滅種的威脅和恥感意識的形成，成爲知識份子自醒、啓蒙的契機和國族救亡的內在動力。救亡圖存成爲國族發展目標。

(二)、救亡圖存。主軸在富國強兵、強國保種，源於亡國滅種的隱憂。唯有去鴉片化才是救亡的根本，鴉片是革命建國，民族重振的障礙。救亡圖存的作爲，讓中國進入現代性的轉型。

(三)去鴉片化行動。亦即去病態、恢復個人健康和國族健康，讓一切回歸

---

<sup>48</sup> 柯拉瑞(Jonathan Crary)，《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07: 16)。

正常秩序。其作為，(1).透過管治鴉片，進行消費控制，國家介入個人癮、習性、品味的管制，形成鴉片的消費政治。鴉片成為物質政治化的對象，在反鴉片消費論述的國家品味標準下，鴉片被界定為國族大敵，同時透過這一套論述對消費大眾進行品味教導，以凝聚去鴉片救亡的共識。再者，也可透過對鴉片詬病化和恥辱化的羞恥策略改變大眾視鴉片消費為時尚的風潮。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不同時期的反鴉片消費論述看到國族在鴉片效應下的困頓和危機；(2).管治身體、生命。由於鴉片帶來身體、生命和種族延續的威脅，國族救亡工程更在意保衛人口生命品質、個人身體健康、民族衛生，尋找有礙國族命脈的不正常人口。由於個人身體良窳和整體人口品質攸關國家力量和生存發展，身體、人口生命成為國家必須保護的對象，以因應內部和外部敵人威脅，避免種族滅絕。這構成生命政治開展，國家在西方政治經濟學、優生學、遺傳學、演化論、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等生命政治相關知識、技術的引進下，開始進行健康、醫療、優生和公共衛生的現代性改革。而強調健康的必要、優生善種、控制生育、保衛母體、去除不正常人口成為清末以降強國保種的救亡工程之一。這些現代性生命政治技術的引進和開展，無非為了強國保種，避免鴉片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和風險，在這脈絡下，亡國滅種可視為是生命政治的根源。中國救亡工程正是在強國保種目標下與現代性生命政治接軌。也因此個人健康、婚配生育的選擇、日常衛生習慣，在生命政治範疇下必須配合國族發展需要而調整；(3).透過視覺進行鴉片身體管治，也透過視覺建構恥感意識，並形成自覺啓蒙意識，推動中國救亡。不可否認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已進入視覺觀看和展覽會時代，現代性視覺技術的崛起，以及各地頻繁出現的展覽會，更加速全球視線的普及和可能性。鴉片身體或鴉片器具無疑是那個時代的視覺奇觀和視線焦點。由於鴉片物件的參展萬國博覽會，如同國恥出展，形成中國恥辱的國際化，有人謂之公恥。因此，鴉片出展事件，形同全球視線建構自我恥感化國體，就像病奄如鬼的鴉片身體，成為恥笑對象，透過他人觀看建構出自我恥感化身體。正因透過這種觀看他人對自己觀看，所形成的恥感意識和啓蒙自醒，產生道德自我克制，行為自我約束，對鴉片禁制行動達到一定成效，同時也成為中國救亡的內在動力。這是透過視覺恥感化的建構，構作羞恥政治的鴉片管制策略。再者，在視覺中心主義主宰下，直接透過視線檢查身體，看是否出現鴉片吸食者犯癮的生理反應，據以判斷是否為鴉片癮者，俾以進行拘禁勒戒。這套方式使得人人都可以是視覺警察，隨時對他人身體進行視覺的裁決、管制。

### 三、分析面向：消費、身體、生命政治

本論文討論涉及鴉片在中國兩百餘年所引發的癮、商品消費和國家控制的生活史，習性管制和現代政權建立的關係，及其所延伸的既是控制消費，也是控制身體和生命的政治過程，同時也是現代性開展的過程。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則環繞在鴉片這種社會病態/疾病，以及如何去除病態恢復到正常秩序，所建立起

來。本文的主要分析面向：消費、身體和生命政治化以及現代性開展過程。重點：  
（一）、鴉片的消費與政治關係，如何管治鴉片；（二）、鴉片身體與視覺遭遇的效應，如何形成恥感意識建構和身體視覺管治；（三）、亡國滅種做為生命政治根源，生命政治如何成為中國救亡現代性。

（一）、從消費政治面思考是因為很少有一項物品/商品像鴉片一樣跟國家與政治如此既深遠且久長的糾纏不清，成為社會罪惡和國族尋狩的公敵。管治鴉片，首先管制消費，進行消費控制。這也使得鴉片消費歷經了符號化過程的轉義，亦即重新再定義，消費不再攸關個人需求和選擇，而是國家的需要和必要。因此鴉片如何被政治重新定義，消費政治化背後的民族主義操作、國家建立的社會控制，國家如何透過消費/反消費論述和消費品味的篩選，試圖革除鴉片惡習和壞品味，進行國族改造大業，為新國家定出新公民/消費公民的標準，進而進入去鴉片化過程。

（二）、再就身體面而言，亦無任何朝代像鴉片中國時期的身體這般變化鉅大。鴉片身體構成相當獨特的歷史經驗和視覺意像，特別是在現代性視覺技術興起和展覽會世紀，身體或鴉片身體與視覺遭遇會產生什麼效應？而這種視覺性又如何構作鴉片身體進入現代性及全球的視野；同時在外人觀看與自我觀看之間，又如何形成恥感意識，建構出恥感身體和國體。再者，我們的視覺習性和品味如何據以裁決所謂的病態身體，甚至延伸成為視覺的社會裁決，進行恥辱化和罪責化，形成人人皆可作為的身體視覺管治。其重點不是身體如何被再現，而是身體如何被觀看，進行視覺性的社會標記，讓任何人皆可指認和裁決。因此，這部分處理的是在視覺遭遇下（外人視線、自我視線），從鴉片病態身體到恥感身體的處境、轉變和反應過程。

（三）、最後則是生命政治，亦如同上面的發問，再無任何一個朝代的國家對個人和集體生命如此的看重，如此渴望生命好好活著。導源於鴉片亡國滅種之憂，在保護生命的責任下，使得個人、國家和民族生命成為當時的主要關懷，而國家與社會一連串的改革因應或調適作為，構成生命政治。國家承擔生命責任，生命的政治化涉及到國家對身體和生命無所不在的干預，提供無風險、良好的生物環境，提倡健康和衛生，以進入一個去鴉片化社會，不再有不正常或病態的人，即便這些對個人有好處的作為，也潛藏著深層複雜的干預和牽制，亦即個人身體、生命國家化，需對國族負責盡義務。即便倡導婦女解放自主，面對國族依舊自願納入規範，婚配、育種的選擇，以國族發展為依歸。在這脈絡下，現代性生命政治做為強國保種，救亡中國的技術，開展了現代性的可能。

這是一篇關於鴉片、救亡與現代性開展的論文，鴉片/去鴉片是問題的核心，消費、身體、生命政治是分析的關鍵，亡國滅種、恥感意識是促動救亡現代性的



內在動力。這些要素構成本論文討論的主軸。

### 第三節 鴉片研究的幾個面向

檢視鴉片中國的問題以回答本論文的研究關懷，有必要先回顧現有的鴉片研究，俾以進入本論文的研究旨趣和問題意識。關於鴉片的中外研究龐大而自成一類，總歸其方向大概可分，(一)、反毒禁煙論述；(二)、外交戰爭論述；(三)、革命建國論述；(四)、財政貿易論述；(五)、消費/文化論述。這些研究其間或多或少涉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崛起，帝國殖民侵略，國家的社會控制，身體/病體改造或現代化國家建設等討論。而這幾個面向的研究，從筆者自身研究興趣與議題關懷角度出發，基本上有以下特色：

(一)、偏重鴉片戰爭，略於鴉片物質性的探討。亦即以鴉片戰爭為框架，形成外交戰爭論述，探討兩次鴉片戰爭的關鍵因素、戰事始末、群眾抗英行動、戰爭性質的解釋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的衝擊；清代海禁政策、朝貢制度的挑戰，並思考在帝國主義秩序下遭逢國族挫敗受辱的中國，其做為一個國家、民族的地位和定義如何。這類外交戰爭論述的研究繁多，較具代表性如張馨保(Chang Hsin-Pao)的《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1989)，利用多種史料包括之前尚未使用過的鴉片戰爭檔案資料，除詳究戰爭前的貿易制度，中英之間的爭執以及戰端開啓始末外，更提出引發這場戰爭的答案。這答案自來爭論不休，有些認為是中西文化衝突所引起；有些認為是中外貿易受限於廣州一地所致；有的則否認戰爭是因英國販賣鴉片而引發，認為戰爭的原因在於磕頭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妄自尊大；甚而有人認為不該在戰爭前綴上鴉片兩字，因為《南京條約》上並沒有提到鴉片。張馨保則認為這場戰爭並非單一因素造成，它有各式各樣的原因，但考慮各種因素後他認為鴉片貿易才是戰爭主因，鴉片貿易和英國執意要求在華治外法權，是導致 1840 年衝突的直接根源。

另外一本，Tan Chung(譚中)的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1978)，開宗明義即延續鴉片戰爭緣由的討論，他根據各種說法整理出文化戰爭論(cultural war theory)、貿易戰爭觀(trade-war perspective)、鴉片戰爭觀(opium-war perspective)三種解釋，同時也提出三角貿易的論點，亦即英國工業製造品輸入印度，印度透過走私向中國輸入鴉片，同時將中國茶葉、生絲等商品大量運往英國的三角貿易循環。三角貿易準確的說明了當時中、英、印之間的貿易往來關係，譚中並據以支持鴉片貿易導致戰爭的說法。這兩本書都試圖在複雜的中英外交和經貿關係中，為鴉片戰爭找其定位，是早期

鴉片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它鴉片戰史研究可見Fay，<sup>49</sup>蕭致治等人，<sup>50</sup>不另贅述。

不過這些研究往往疏於從鴉片做為物質來看問題。儘管鴉片點燃鴉片戰爭，但鴉片總像是鴉片戰爭的影子，伴隨著鴉片戰爭的國家民族的敘述被討論，成為創傷恥辱的標誌，鴉片的使用文化和生活方式似乎成為無足輕重的邊緣敘述。鴉片戰爭的歷史效應取代了鴉片的物質效應，致使鴉片在病態的修辭下構造出一套自己無法訴說的敘事，鴉片乃成為一種病態的修辭，與不正常、邪惡、衰亡、怯弱相連。鴉片做為一種物，其使用價值在歷史流變，文明進程中，不斷遭到改寫定義，不斷在社會文化和政經網絡的交織中，編造出各式複雜的價值意義和道德評判，特別反映在反毒禁煙論述上。

(二)、側重鴉片的生產/供給面，消費/需求面探討較少。這方面主要著重鴉片輸入/輸出財政貿易探討以及清代廣州貿易制度的檢討；鴉片的貨幣角色；白銀外流和金融體系、國家財政關係；國內鴉片生產、鴉片配銷管道、課稅方式種類和鴉片稅收對新政推動、軍閥力量維持、國家統治權的影響。鴉片既做為全球商品貿易體系的一環，也成為煙農的經濟來源和國家歲收的主要構成。這方面研究主要以財政貿易論述為主，如格林堡(Greenberg)，《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1961)，此書為中英貿易史較早的經典作，對廣州貿易制度和港腳貿易(country trade)、英國散商的發展以及鴉片走私形成的伶仃制度有詳實完整的探討，為瞭解鴉片戰爭前中國與英屬東印度公司經貿往來不可或缺的著作；而在格林堡此書影響下寫作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24~1854 一書(1953)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在是書第五章除了討論鴉片戰爭的性質，廣州貿易制度的影響外，更對鴉片貿易是造成白銀外流唯一因素的主流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造成當時白銀稀少銀貴現象的因素複雜，例如銅幣成色低，銀幣屯積，物價上升，銀銅折換率提高以及對外貿易中使用進口墨西哥銀元代替銀錠日增等現象都可能導致銀稀而貴。

嘉慶、道光年間白銀外流是否嚴重，確實鴉片財政研究一大問題。嘉道年間官員紛紛指陳鴉片輸入造成漏卮嚴重，財政幾乎崩盤，恐有「無可充餉之銀」虞慮。然而不少學者指出，白銀外流並沒有那麼嚴重，造成當時錢賤銀貴現象因素有許多，很難都算在鴉片走私頭上。出版不久的吳義雄《條約口岸體制的蘊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係研究》(2009)一書，則使用罕見的資料<sup>51</sup>，除詳探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往來、粵海關稅體制、行商制度演變外，更對鴉片輸入數量和價

---

<sup>49</sup> Peter.Ward Fay, The Opium War(1975).

<sup>50</sup> 蕭致治，《鴉片戰爭史》(上、下卷)(1996)。

<sup>51</sup> 即The Canton Register, 1827~1834.(《廣州紀事報》)；The Canton press, 1835~1843.(《廣州週報》)；The Chinese Courier, 1832~1833.(《中國信使報》)。

格的統計提出新的數據，對於白銀外流問題，他則根據當時的白銀進出口統計認為清朝官員和社會輿論都過度誇大了銀漏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並不如這些官員所說白銀外流嚴重。著名的中國經濟史家吳承明在其〈十八與十九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一文也認為，嘉道的銀貴和市場不景氣，鴉片走私造成白銀外流雖是重要原因，但也往往被誇大，他指出 1818~1827 年十年間，除了 1824 年有小量流出外，仍以白銀流入為主。1827 年後，白銀流出明顯，1833 年到了一個高峰，到了 1855 年後白銀又顯著的流入中國。<sup>52</sup>

濱下武志的〈中國的外貿金融：白銀、鴉片及世界市場整合，19 世紀 20~50 年代〉一文，也不認為白銀外流嚴重，當時官員會這麼認為主要問題在於，在計算白銀流入、流出時只單純計算中印之間的鴉片貿易數字，忽略總體貿易結構。根據他的研究中國的貿易是在多國之間進行結算，中國流出的白銀並非全部用在購買鴉片所造成，而是與多國之間貿易的最終結果。如果將鴉片之外的商品，印度之外的貿易國家納入計算，從多邊貿易的總體結構來看，鴉片造成白銀外流嚴重的說法，必須重新檢討。此外，濱下武志還提出一個論點，他認為一般研究都忽略了匯兌在當時貿易結算的角色，匯兌是一種不需要白銀交易的結算方式，在當時已普遍使用。印度賣鴉片給中國所獲得的白銀，有時會再用於投資匯票，並做為其它交易的支付工具。因此白銀流出問題，如果考慮匯票結算，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嚴重。<sup>53</sup>濱下武志論文強調應該從多邊貿易總體結構來計算鴉片走私與白銀流動的關係，而他提出的匯票使用，是相當引人注意的說法，不過濱下武志並沒有列出匯票使用導致白銀不外流之間的數字關係，因此不清楚匯票是否真具關鍵作用，這有待相關研究者繼續追蹤。

至於彭澤益，〈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一文，<sup>54</sup>則深入探討鴉片戰爭後十年間因戰敗賠款以及五口通商開放，加劇鴉片輸入造成對外貿易逆差擴大，白銀外流更形嚴重。所導致的銀貴錢賤現象也加速清政府財政危機和社會危機。如造成農工業產品價格下降，引發商業和信用危機，而銀貴則使中國對貿易處於不利地位，同時也加劇了清政府的稅收財政困難。除了財政問題，銀貴錢賤也促成中國社會內部矛盾，如社會分化和土地集中急劇發展、城鄉失業人口增加以及抗租抗糧鬥爭的高漲。彭澤益的論文除了交待白銀外流的因果，更透過銀貴錢賤現象深入分析其經濟和社會效應，藉此暴露清政府財政和社會內部問題，埋下日後亡國滅種隱憂。

---

<sup>52</sup> 吳承明，〈十八與十九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收錄於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2001: 287)。

<sup>53</sup> 濱下武志，〈中國的外貿金融：白銀、鴉片及世界市場整合，19 世紀 20~50 年代〉，收錄於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2009: 146~151)。

<sup>54</sup> 彭澤益，〈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收錄於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2010: 17~52)

關於中英、中印鴉片貿易關係和政策研究，除了前述譚中經典著作，另可見 David Edward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1968[1934])、Hunt Janin, *The India-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99)、Glenn McInco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2003)等人著作。至於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 Opium Trade 1750-1950*(1999)一書則將鴉片放在帝國秩序與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脈絡，探討鴉片在亞洲的經貿歷程，也透過鴉片貿易將中國納入世界市場，成爲中國與國際接觸的開端，是鴉片全球貿易化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外，郝延平(Hao Yen-P'ing)的《中國近代商業革命》(*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1991)，其中一章指出鴉片在清代貨幣體系中具有貨幣形式的功能，它除了是商品外，還成爲支付工具和交換工具，讓我們看到鴉片在民間的普遍使用程度以及鴉片經濟的活絡，此外也點出鴉片貿易是廣州制度之外進行的非法貿易，這種私人貿易促使西方商人在中國崛起。讓我們看到了鴉片的貨幣角色以及深入民間經濟生活的力量。至於林滿紅的〈清末本國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1856-1906)——近代中國「進人替代」個案研究之一〉、〈晚清的鴉片稅，1858-1906〉、《清末社會流行吸食鴉片之研究：供給面之分析》、〈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2012)，等一系列關於鴉片貿易財稅的研究，分析白銀外流情勢，鴉片稅收始末以及如何成爲清政府重要的歲入來源，是這方面先驅性的經典研究。

劉增合的《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則更進一步論證鴉片稅收的種類、來源、政策形成過程以及如何成爲新政推動的動力基礎，鴉片在此弔詭的反成爲正面的改革助力。而新政基礎就是鴉片，正說明了國家與毒品經濟曖昧複雜的關係。何漢威的〈清季國產鴉片的統捐與統稅〉一文，亦指出土產鴉片稅收爲清朝解決財政危機的紓困之道，並詳析課稅的種類及其演變，中央與地方的爭奪稅權，政府收稅能力的不足，最後則根據統計數字說明，國產鴉片稅雖對政府財政困難的緩解不無幫助，但它在政府稅收結構中扮演的角色並不出色，這一說法一反過去習見鴉片稅收有助清政府財政的論調。而最新的一本鴉片貿易專書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國》(2010)。則將鴉片貿易擺在全球經濟化過程脈絡，探討中國鴉片貿易跟全球經濟的連結關係，同時也立基在前人研究上對中國鴉片貿易和生產消費的爬梳整理詳實而完盡。

至於鴉片如何消費，消費型態、消費的階層差異、品味區辨、消費者的需求動機、娛樂方式、愉悅經驗如何，鴉片消費主體的消極性或能動性爲何，鴉片消費的文化社會脈絡，鴉片消費的日常生活方式或現代性經驗的遭遇，這些議題都甚少涉及，致使鴉片的社會生活面模糊了一半，無法得窺全貌。包安廉(Baumler)

在回顧中外鴉片的研究中即指出，中國的鴉片研究側重於國家建立、革命敘事、帝國殖民、禁煙反毒運動，反倒在西方還有一些關於鴉片社會生活、鴉片消費的研究。<sup>55</sup>這些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鴉片〉一文，<sup>56</sup>其最重要的是涉及鴉片吸食動機、鴉片消費和交易網絡的運作情形的探討，同時也論及鴉片代替現金，做為貨幣使用的現象，是鴉片禁制和財政貿易研究外一篇早期的重要論文，讓我們知道鴉片消費的經銷體系如何運作，以及不分階層的中國人為什麼要吸鴉片。戴沙迪(Des Forges)，〈鴉片、消閒、上海：城市消費經濟〉(Opium/Leisure/Shanghai: Urban Economies of Consumption)一文開宗明義指出，他不想從國家災禍和國家財稅收入來看待鴉片問題，其切入點是視鴉片為一種休閒娛樂品，特別是都市高度商品化和休閒化下的消費經濟活動，鴉片成爲一種新的娛樂品甚至是精緻的休閒時尚。儘管吸食鴉片本身是優雅的休閒活動，但作者也指出鴉片做為危險致命物質的本質，作者以同音異字的消—休閒，銷—銷蝕(危害)，指涉鴉片這種正反兩面的雙重特質。<sup>57</sup>戴沙迪引人注意的是，將鴉片從害國害民的毒品脈絡重新置換於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活動，特別是都市精英階層精緻時尚活動；視鴉片使用為都市化的消費經濟活動，一種娛樂經濟；視其為都市的商業活動，商品化的消費行爲，包括時尚的追求仿倣，走出過往一片鴉片禁毒、戰爭外交、貿易財政的老舊論調。

2005年鄭揚文(Zheng Yangwen)的*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專書出版，更爲鴉片研究開闢一條新的進路。鄭揚文從物質文化理論和消費理論切入鴉片研究，特別引用Appadur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一書中的觀點，視鴉片為物品，追蹤鴉片在不同歷史時段，不同社會情境，不同文化脈絡下做為物品的使用意義和價值，捕捉鴉片的社會生活史，並建立五階段的歷史分期。同時也透過法國歷史學者Danial Roche消費史研究的五條分析軸線，即需要(demand)、需求(need)結構，消費者分類、供給的空間組織和配銷通路的分析，以進入鴉片消費史研究。作者也帶進Bourdieu的品味區辨的理論，指出鴉片的故事既是品味和區劃的故事，也是政治和階級形成的故事。這本專書將鴉片帶入消費相關議題，鴉片階級品味的形成和劃異，鴉片從炫耀性消費到大眾消費，從奢侈品到日常生活用必需品，鴉片做為跨階級、跨性別、跨年齡的娛樂品。最後，鴉片透過政治的再界定鴉片背負國家目標、承擔政治功能，成爲國族政治符號。鄭揚文的研究走出過去框架，令人一新耳目，更重要的是賦予鴉片歷史上的新定位和意義，補繪了過去模糊的消費和物質面貌，也部分回應前文所列關於鴉片消費研究面的一

---

<sup>55</sup> Alan Baumler "Opium and History in and out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y in Multi-Perspectives, Quihau University, August, 21-24(2004).

<sup>56</sup>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鴉片〉(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收錄於史景遷，《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Chinese Roundabout)(2005: 278~322)。原文最早收錄Frederic Jr. Wakeman, & Carolyn Grant(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5: 143~173)。

<sup>57</sup> 戴沙迪(Des Forges)，〈鴉片、消閒、上海：城市消費經濟〉，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0: 187)。

些問題。雖然鄭揚文此書有上述價值，將鴉片放在物質文化、消費脈絡觀察，不過並沒有特別新的材料發現和創見，基本上是將涉及到鴉片消費面向的相關資料框在一起，給它一個問題意識和發展架構，重建了長期受到忽略的鴉片消費史。不過這種重建之功，卻是為後來研究立下基礎。

至於鴉片究竟屬於什麼樣性質的消費，邱德亮的〈從局限經濟到普遍經濟：鴉片消費的東方語藝？〉一文，則試圖做出解釋。邱文援引 Bataille 的普遍經濟學理論，認為鴉片不管是炫耀性消費或是大眾消費，其本質都是一種非生產性消費費，一種沒有目的，沒有算計結局如何，純粹為了耗費(expenditure)而非佔有和獲利，其原則就是耗損(loss)，這種無用的浪費如誇富宴、奢華、戰爭、獻祭、遊戲、節慶或不以生殖為目的異常性行為。這有別於為了生產目的或為了更大的佔有和積累所進行的生產性消費。後一種 Bataille 認為是局限的經濟學(restricted economy)，侷限在財經、生產積累、資源有限、理性需求、效用和自利原則；前一種則是普遍經濟學(general economy)，強調資源過剩、無限制的毀棄、耗費、耗損的原則。鴉片吸食者的閒怠無為，不事生產，終至身死，正好對反於政治經濟學的生產效用原則，貼切的符應普遍經濟學所強調無為、無用、無盡耗費的原則，為鴉片消費屬性另闢新解，提供鴉片消費研究不同的理論視角和歷史詮釋。

(三)、著重鴉片禁制面，忽略鴉片文化面。鴉片禁毒論述在戰爭框架下做為一種病態的修辭。正是這種病態修辭成為鴉片的主流論述，既界定了鴉片發問走向，也壓制了鴉片多重可能和幽微細緻的生活歷程。例如鴉片消費構成的文化生活經驗或器物精緻，儀式化的物質文明。簡言之，在現有鴉片研究中往往忽略了鴉片曾經是中國普遍的日常生活經驗，涉及飲食習慣、醫藥治療、器物開發、消費文化、社交往來等現代性經驗的關切性。反毒禁煙是目前產量最多的研究主題，環繞著禁煙政策的形成，法令的制定，施行成效的檢討以及禁煙與國家建立、社會控制的關係；同時也觸及反毒宣傳運動、禁煙組織行動的宣教過程，傳教士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或這些運動和公共領域形成之關係。這類研究包括鴉片毒害中國及相關問題研究，如較早的羅運炎，<sup>58</sup>朱慶葆、蔣秋明和張士杰以及蘇智良，王宏斌<sup>59</sup>等的禁毒與中國影響的研究。禁毒歷程史，如于恩德，蔣智明、朱慶葆，王金香，馬模貞，洗波，朱慶葆、劉霆等人。<sup>60</sup>通常還針對某一地區或某一時期的禁煙活動和成效進行研究，如Madancy的福建，<sup>61</sup>Bello的中國內陸新疆，<sup>62</sup>Li

---

<sup>58</sup> 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毒品問題》(1936)

<sup>59</sup> 朱慶葆、蔣秋明和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蘇智良，《中國毒品史》(1997)；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sup>60</sup> 于恩德編著，《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初版 1934)(1973)；蔣智明、朱慶葆，《中國禁毒歷程》(1996)；王金香，《中國禁毒史》(2005)；馬模貞，《毒品在中國》(1994)；洗波，《煙毒的歷史》(2005)；朱慶葆、劉霆，《黑色的瘟疫：插圖本中國毒品史》(2012)。

<sup>61</sup> Joyce A.Madancy, *The Troublesome Legacy of Commissioner Lin: The Opium Trade and Opium Suppression in Fujian Province, 1820s to 1920s*(2003).

Xiaoxiong的四川，<sup>63</sup>秦和平的雲南、四川，<sup>64</sup>尙季芳的甘肅，<sup>65</sup>蘇智良等人的上海。<sup>66</sup>Zhou將時間拉到民國到中華人共和國時期，<sup>67</sup>Baulmer則聚焦於民國時期，<sup>68</sup>特別是Slack以國民黨南京政府時期的禁煙政策為研究對象，<sup>69</sup>探討鴉片做為一種毒品經濟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矛盾角色。這些屬於傳統的鴉片禁制研究，對禁煙手段、執行成效、國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立場態度如何，有詳實的討論，但並沒有更多不一樣的事實或看法出現。

至於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sup>70</sup>則別出蹊徑，深入探尋道光禁煙時期官紳士大夫群體如何透過清議輿論影響朝廷禁煙政策，形成鞏固自身群體權力基礎的內部政治鬥爭。其重點在於，這些幕後鬥爭如何影響鴉片戰爭時期清廷的對外政策，這是諸多鴉片研究中頗見新意的著作。Lodwick的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 一書則著眼於在華傳教士在反毒禁煙組織設立及大眾宣教上的作為及禁煙成效，<sup>71</sup>我們也看到了傳教士的雙重意象，既具有以鴉片毒化中國的西方人意象，也具有將中國從毒化狀態中解救出來的醫生意象。而傳教士一度以海洛因勒戒煙癮的作法，這種戒煙藥品更被說是「耶穌鴉片」。這字眼相當傳神的展現出西方和傳教士消滅中國和拯救的兩面角色和意象。黃智奇的《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2004)，則是除了林治平，〈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禁煙運動〉一文外，<sup>72</sup>中文第一本完整探討西方傳教士如扮演反毒急先鋒角色的專書。書中闡述這些傳教士如雜魏林(William Lockhart)、顧維廉(W.H.Collins)、麥都思(W.H.Medhurst)、丹拿(F.Storrs Turner)、楊格非(Griffith John)、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德貞(John Dudgeon)等人的反鴉片立論、在英國和中國組織反毒社團、設立戒煙所診治煙癮患者等過程。在這理我們除了看到這些傳教士如何駁斥英國鴉片貿易支持的言論，以及游說英國國會議員推動反鴉片貿易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提出鴉片影響身體健

---

<sup>62</sup> David Anthony Bello,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2005).

<sup>63</sup> Li, Xiaoxiong, *Poppies and Politics in China: Sichuan Province, 1840s to 1940s*(2009).

<sup>64</sup> 秦和平,《雲南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 1840-1940》(1998);《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2001)。

<sup>65</sup> 尙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sup>66</sup> 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sup>67</sup> Zhou, Yongming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9).

<sup>68</sup> Alan Baulmer, *The Chinese and Opium Under the Republic: Worse Than Floods and Wild Beasts*(2007).

<sup>69</sup> Edward, R. Jr. Slack, *Opium, State, and Society: China's Narco-Economy Guomindang, 1924-1937*(2001).

<sup>70</sup>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1992).

<sup>71</sup> Kathleen L 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1996)

<sup>72</sup> 林治平,〈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禁煙運動〉,收錄於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1993: 367~387)。其它相關研究可見王海鵬,〈近代早期來華傳教士與鴉片陋俗的糾葛與分離〉,《天府新論》,2008年,4期(2008: 125~129);王海鵬、劉天路,〈來華傳教士與晚清反鴉片運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卷,5期(2009: 138~142);盧在軾,〈內地會傳教士與反鴉片運動:以《中國億兆》一文為中心〉,《宗教學研究》,2007年,2期(2007: 121~127)。



康的現代醫療概念以及勒戒煙癮作法，讓鴉片的毒害成爲現代意義的毒品，身體健康也在現代醫療的理解下成爲國家改革目標之一。林滿紅即指出了傳教士對中國鴉片危害觀的影響，「中國人的鴉片毒害觀，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西方關於鴉片的新醫學觀點影響」，「在 1874 年之後清廷的討論中無論是弛禁派還是嚴禁派，都轉而更關注國民健康，這是受到西方影響.....特別是英國戒煙會影響」。<sup>73</sup>其中貢獻較大的如英國醫療傳教士德貞，德貞幾篇鴉片對身體健康影響的文章，提醒鴉片可能危害下一代人口的呼籲，就本論文來看無疑爲中國現代性開展起了頭。高晰《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2009)，受到黃智奇啓發而關注德貞在鴉片鬥爭上受到忽略的貢獻，特別闢了一章〈鏗而不捨的反鴉片鬥士〉討論德貞在反鴉片言論和行動上的成果，特別是德貞在鴉片醫療和健康危害研究的努力。而德貞對中國醫療現代化和公共衛生、健康觀念的推動，也是他反鴉片之外最大的成就，這些都爲中國現代性之路鋪了底。<sup>74</sup>

至於鴉片物質文化研究雖不多，近年也有幾本值得注意之作，如馬克夢(Keith McMahon)，*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Opium 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2)，以晚清小說爲研究文本，從文化角度分析中國遭遇鴉片/西方的經驗，鴉片吸食的中國情境、物質環境、日常生活性、獨特意義和感官經驗，鴉片吸食的階級、性別差異以及中國人爲什麼吸食鴉片的疑問。而更具意義的是作者挖出張昌甲〈煙話〉一文，透過這位可能是中國唯一一位吸煙者的自述，作者細膩深入的解讀，試著找出上列問題的解答。馬克夢之書有其對鴉片文化的識見，也指出一些有趣的觀察面向和思考點，但因分析對象侷限於晚清小說和〈煙話〉一文，其推論和見解是否能說明歷史事實，仍有待商榷。不過脫離這層考量，這是本文化取向鴉片研究的刺激性之作。另外，Dikotter等人則視鴉片文化爲麻醉性文化(narcotic culture)，<sup>75</sup>試圖破除中國做爲鴉片受害者角色，以及破除那些將鴉片與中國結合，視鴉片爲中國問題的觀點和視鴉片爲毒品等神話。他認爲這些論調都排除了鴉片有其複雜社會意含和社會儀式的一面，作者也特別強調鴉片做爲自我治療的行爲。Dikotter的論點相當突出，是過去鴉片研究所罕見，也遭來一番批評。<sup>76</sup>至於Lee和Martin著作則側重於鴉片吸食的技藝、儀式化行爲和鴉片器物精緻的藝術美，論述不多，大抵是器物的概說。<sup>77</sup>

---

<sup>73</sup> 林滿紅，〈晚清的土產鴉片觀念〉，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2010: 64)

<sup>74</sup> 中文的德貞研究不多，除了高晞詳實的專書討論外，另可見李尙仁有關德貞中國衛生觀的專論。李尙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三份(2005: 467~509)。

<sup>75</sup> 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sup>76</sup> 如黃宇和的批評，見〈讀史札記—論馮客的鴉片讚歌及其他〉(2005)。

<sup>77</sup> Peter Lee, *Opium Culture: The Art &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2006)；Steven Martin, *The Art of Opium Antiques*(2007).

(四)、禁煙禁毒史料彙編。幾本比較重要的禁煙史料彙編，對鴉片研究的史料查考幫助頗大。齊思和等人合編的六冊《鴉片戰爭》(2000)，是這類資料型書籍的首部，蒐集鴉片戰爭前後的奏摺上諭、西人著述、筆記文集、戰爭記事等史料。因其時間的侷限，對鴉片整體發展狀況的瞭解，仍有所不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七冊)(1997)，則蒐集清朝君臣之間關於鴉片問題第一手的奏摺上諭，透過這批龐大的官方資料，大抵可以看到鴉片和鴉片引起的外交戰爭問題如何困擾著幾代的皇帝和眾多朝臣，以及他們究竟如何處理鴉片問題，祭出什麼政策，他們的治理能力到底如何？馬模貞主編，《中國禁煙史資料，1729-1949》(1998)，廣蒐各類資料，宮廷檔案、官方文書、史傳政書、地方志、筆記文集、報刊雜誌等，依時間排列，查考方便，取材豐富，可補《鴉片戰爭》之不足，對鴉片研究幫助甚大。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蒐集鴉片戰爭前到民國初期(1838~1926)上海一地包括租界區的禁煙活動資料，主要來源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報、《申報》和英文《字林西報》。其價值在於對公共租界鴉片活動狀況的瞭解，這部分是其它史料選集較缺乏的。

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1997)，蒐集 1920~1940 年代各地方煙禍為害的口述見聞。這部書完全是反毒政策下的宣傳，主要控訴軍閥時代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如何透過專賣政策，逼迫人民種煙，強徵各式煙稅的惡狀，以及鴉片吸食者的悲劇下場。雖然警世教誨意味濃厚，但我們還是可從中瞭解鴉片在民國時期各地生產消費狀況，以及吸煙者的眾生相。其中較有價值的是好幾篇見聞描述鴉片收割販賣的市集節慶文化，也就是趕煙會活動，對鴉片生產消費如何成為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經驗的瞭解有所助益。另一本馬維綱編，《禁娼禁毒：建國初期的歷史回顧》(1993)。立意取材性質同《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也是口述見聞，雖也有批評國府時期放縱煙毒蔓延的聲音，但較具價值的是中共建國後的禁煙處理狀況，為什麼兩百多年禁不了的鴉片煙禍，到中共建國初期就大抵剷除，或許這部書可找到一些答案，雖然其中仍脫不了教條式的說辭。

(五)、其它相關研究。在此舉出跟本論文探討主題相關的兩本著作，分別涉及本論文第二、三、四章部份章節的概念借助和材料引用。第一本是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此書提供本論文第二章鴉片消費政治的理論來源。作者提出消費主義跟民族國家建立的關係，透過消費主義研究民族國家的形成。他認為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存在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是影響中國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重要因素。就近代中國而言消費主義的崛起並不代表大眾具有消費自主性和愉悅感，消費反而成為塑造民族意識，建立國家認同的機制。是以，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正在興起的消費文化既界定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又幫助散播這種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這形成消費民族主義的類型，一切購物、消費、品

味以民族大義為依歸。愛用國貨、舉辦國貨展正是消費民族主義的實踐。從識別國貨與洋貨，再到消費國貨，完成了愛國公民的資格。而國貨展，一種民族商品展覽，也是民族國家的形象化和視覺化，在展示空間進行雪恥復國的民族競爭。其間最重要的是訓練大眾具有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強化民族主義的視覺想像，俾能透過眼睛視線進行愛國識別工作，分辨外國與本國之間的不同，進而形成消費民族意識，做為一切購物的準繩。葛凱的研究無疑是消費政治的示範，書中提出的消費民族主義觀、民族主義視覺認知成為本論文討論鴉片消費政治的分析概念。

第二本是周春燕的《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2010)一書。探討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強國強種聲浪四起，在國族救亡框架下，婦女身體的角色和功能重新被看待。作者以婦女月經、懷孕、生產的生命孕育歷程為切入點，從過去的穩婆接生到現代醫療體制下的助產士接生，看到國家介入婦嬰衛生的照護。這種轉變正在於強國強種的救亡意識下，婦女的角色成為「國民之母」，孕育下一代，不再只是家族的傳宗接代，更是國家的戰力資源。婦女不只要為家庭，更要為國家生產國家所需要的下一代。在這過程，原本私密的孕產過程，進入公開化的現代醫療制度和國家照護過程。這是一個強國強種意識下，婦女身體以及育種國家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作者研究的論點和取材，對本論文而言無疑是生命政治的體現。規訓身體、控制生育、調節人口生命，正是國家面對外部種族威脅、避免風險，同時提昇國家力量所必需採取的生命政治作為，它以國家關懷、照護的角色保衛它人民身體、生命。本書研究取向正好構成本論文第四章，保衛母體：育種救國的健康技術這一議題的討論重點。此書是生命政治在中國施作的極佳說明，只是作者沒從這一觀點解讀。本論文則借助這一研究的材料進行生命政治的討論。

## 第四節 論文結構、預期、侷限

論文章節結構計分五章，除導論、結論，主體討論分三章。根據論文研究旨趣、問題意識和分析面向的提出及回應，討論安排如下：

(一)、第二章討論面向，管治鴉片：鴉片的消費/政治。分析重點包括，(1). 鴉片的消費景觀。瞭解鴉片的社會生命和日常化現象；鴉片的消費人口；鴉片的供銷體系運作；鴉片消費者的需求如何以及鴉片的日常功能，說明鴉片何以成爲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2). 食妖亡國：鴉片的消費政治。探討鴉片如食妖亡國，導致消費政治介入；官方如何建立反鴉片消費論述，形成官方定義鴉片的品味標準，對鴉片進行罪責和禁制；最後如何形成一套以國族救亡導向的品味政體；(3). 社會品味：鴉片時尚流風。探討鴉片做爲一種社會時尚，成爲大眾追慕仿效的對象。這股鴉片是尚風潮由上而下傳染，促成鴉片消費的普及；再者，深入鴉片如何成爲一種品味，鴉片吸食如何構作出精緻的物質文化和儀式；此外鴉片煙館也成爲一種複合式的休閒社交空間；以煙宴友更是當時社會風尚，成爲一種獨特的鴉片吸食的社會互動行爲；(4). 從時尚到羞恥政治。探討鴉片品味的轉折；如何透過鴉片詬病化和罪責化，形成羞恥策略，改變人民以吸鴉片爲恥，而非時尚體面之舉；這種品味風尚轉變，正是恥感意識社會化的作用。

(二)、第三章討論面向，恥感建構：視覺化的鴉片/身體與救亡。分析重點包括，(1). 身體的視覺建構。東西方視覺遭遇，相互醜化、妖魔化現象；如何建構病態鴉片鬼身體爲恥感的身體；(2). 視覺現代性下的啓蒙與恥感。探討在看、被看與自我觀看間，如何形成啓蒙和恥感意識；同時探討觀看政體下身體的理論概念；(3). 展覽會：從視覺化恥辱到象徵性救亡。探討清末中國進入萬國博覽會，如何在全球視線下成爲現代性它者；鴉片出展，如同在全球視線下建構出恥感國體；重商主義的清末中國，如何重視賽會興商功能，其目的在國富民裕，賽會也成爲視覺化的國富之道；愛用國貨，國貨展出，如同象徵性的視覺救亡行動；(4). 視覺管治：抓出鴉片身體。首先探討常態視覺秩序運作；再尋找是否有不受管治的鴉片身體的可能；最後，人人皆可做視覺警察，對周遭的身體/鴉片進行視覺管治和裁絕。強化了視覺政治的控制力量。

(三)、第四章討論面向，救亡現代性：強國保種下的生命政治。分析重點包括，(1). 亡國滅種：生命政治根源。分析鴉片造成兵弱銀荒、種族滅絕威脅、成爲革命建國障礙，這些因素構成了亡國滅種的隱憂，也成爲中國救亡的歷史因素，導致現代性生命政治的開展；(2). 從生命鴉片化到生命政治化。從個人到國

家，中國歷經兩百餘年鴉片化過程，最後進入去鴉片化的救亡過程，透過健康、醫療、人口品質管理、公共衛生體制建立等現代性生命政治技術，進行強國保種的中國救亡工程。然而，在救亡框架下，個人身體、整體人口生命也納入國家管理，也就是生命的政治化和國家化；(3).去鴉片化社會：尋找不正常人。探討鴉片與不正常人口關係。鴉片生理危害擴及下一代人口數量和品質，引起滅種之憂，優生保種、控制生育觀念作法乃隨之而起，納入了生命政治治理範疇；人口—政治經濟構想的提出，以救中國之弊。歷代知識份子針對積弱中國，提出人口管理、政治經濟治理的藍圖，以解決中國問題；尋找非我族類，排除種族優生下的不正常人。西方演化論、優生學、遺傳學說的介入，以實踐中國保種強種目標。而極端的種族衛生思想也在此時出現；去鴉片化，就是去除不正常狀態的生命政治，也是中國救亡，國族強盛的根本之法；(4).健康的必要：保衛身體，保衛國族。探討健康政治，讓煙民、廢民都成爲健康公民；尙武體育，以改造病夫，這是健康的開始；保衛健康，保衛國家，既是健康啓蒙，也透過健康救亡中國；最後保衛母體，從強國保種的觀點，母體及下一代是國家的根基，強調育種救國的健康技術是救亡框架下必然之舉，其作法諸如產婦孕育、生產、育嬰的醫療衛生和家庭照養環境。

本論文將透過上述三個問題分析面向，深入鴉片中國的消費、身體、生命與國家控制之關係以及伴隨而來的各項現代性現象，包括消費現代性；鴉片身體進入視覺現代性；生命政治帶來的治理技術、衛生/健康現代性。其間涉及理論包括消費文化、消費政治(politics of consumption)理論，觀看政體(scopic regime)、視覺現代性(visual modernity)以及傅柯的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生命政治(biopolitics)以及相關的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和健康政治(politics of health)等概念、理論的討論。

最後，本論文研究的時間斷限，從 1729 年雍正發佈第一道禁煙令起到 1949 年的國民黨政府遷離大陸爲止，但以鴉片戰爭前後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煙」，也就是「新生活運動」推行期間爲主要討論時期。抗戰期間雖然標榜一面抗戰，一面禁煙的政策，但除了宣稱鴉片有礙抗戰建國大業，譴責日軍在佔領區販賣海洛因、嗎啡的毒化政策外，其實施範圍和成效有限，較無涉於本文之討論，到了 1952 年中國共產黨則宣稱煙毒已肅清殆盡，<sup>78</sup>但這已不是本論文探討的範圍了。

本論文預期價值：試圖在既有的鴉片研究之外，開闢過往未曾嘗試的新路徑，從消費政治、身體政治、生命政治切入兩百年餘年鴉片中國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變化，並提出鴉片促動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可能以及古

---

<sup>78</sup> 鄧小平說：「吸鴉片煙、吃白麵，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消滅醜惡的東西」，「新中國成立以後，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79，見王金香，《中國禁毒史》2005: 317)。

老中國如何進入全球性視野和國際舞臺的因素。同時也檢證上述理論運用於相異於西方經驗的中國社會環境的可能。這是值得深入嘗試的進路，特別是以生命政治連結中國救亡現代性的討論，更是一全新的嘗試和挑戰，希望不致流於西方概念移植而已。本論文初心希望從當代觀點切入歷史，重新理解過去，賦予歷史新的觀看角度，尋繹新的意義。這也正是研究背後的動機，希望透過消費、身體和生命政治等當代問題意識或現代性意識切入鴉片做為一種物質政治，包括消費、身體、生命政治以及如何促動中國現代性開展。同時也希望開啓後續鴉片與現代性以及生命政治在中國相關研究。

本論文侷限：由於本論文試圖連結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關係，因缺少直接相關研究，特別是生命政治的帶入中國情境討論，使得論文缺少可資對話、質疑的基礎，而這方面史料亦有所匱乏，僅能從薄弱、間接資料討論，致使論文的討論面向、引證、推論有所疏漏或斷然，這是可預期的侷限之處，也是未來可以再多方廣蒐旁證，深究的方向。

## 第二章 管治鴉片：鴉片的消費/政治

「鴉片之害，食貨之妖也」，<sup>1</sup>食妖如同歷代的服妖論<sup>2</sup>一樣，傷德敗俗，變亂秩序，隱指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的衰世惡兆。亦即，鴉片食妖，必招徠國殃。道光十八年，龔定盦也提出鴉片食妖之論，「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sup>3</sup>龔定盦的食妖還指吸食者生活坐息顛倒，身體病奄如鬼，也就是俗稱的鴉片鬼。確實，鴉片顯然構成中國的問題，一個食妖亡國的問題。鴉片做為消費的物品，顯然已進入政治領域裡。在消費政治脈絡裡，鴉片的物質角色和消費功能也因之轉變。做為一種物，鴉片的使用價值在歷史流變，文明進程中，不斷遭到改寫定義，不斷在社會文化和政經網絡的交織中，編造出各式複雜的價值意義和道德評判。從純粹觀賞的罌粟花卉，到淬取成為鴉片做為食用的料理、醫療的藥品以至令人沉醉狂喜的毒品。鴉片特殊的物質性和社會生命歷程，透露不斷遭到排除、壓抑、禁制、邪惡化的政治定義過程，由此也幽微的嗅到鴉片在文化或文明進程中獨特的曖昧矛盾性，特別是鴉片的中國經驗和歷史命運，它既是一世紀日常生活的普遍經驗，也是一世紀屈辱的民族創傷經驗；它既從未撕下身上非法的標籤，遭禁懲治，也未曾止息的根生蔓延，構築出鴉片帝國的形象；它既將西方現代性轉譯到中國，也透過與西方的遭遇加速中國文明崩解。歷史上可能很少有一項物質像鴉片一樣讓一個國家、民族陷入全面的危機，也很少有一種消費行為消耗掉國家、民族生機命脈。中國的鴉片消費史，也是反消費運動史，管治鴉片成為國家治理的主題。

從國家角色，政權維續觀點來看，鴉片消費導致人民身體敗壞、經濟衰頹、國力萎頓，國家更在兩次鴉片戰爭後，被迫全面對外開放，西方觀念、文明、洋

---

<sup>1</sup> 徐繼畲〈禁鴉片論〉，《退密齋文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89）。

<sup>2</sup> 服妖之說歷代正史〈五行志〉常有記載，最早語出《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漢書·五行志》據《尚書》之說論及「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服妖意味穿著奇裝異服，將會遭來惡運。如穿著胡服或流行服飾，小則個人遭身家之禍，大則導致社會動亂，國家衰亡。服妖出現成為敗家亡國的徵兆。晚明士大夫常引據服妖的歷史典故，在維續社會秩序，穩定國家局勢的說辭下，嚴禁流行服飾，奇裝異服的穿戴，以合理化其服制禁令。特別是在國勢頹圯不振，社會變亂不定的局勢下，服妖之論經常伴隨而出。見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2007: 160~165）；另可參見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10卷，3期（1999: 111~157）。

<sup>3</sup> 龔定盦，〈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定盦全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二）（2000: 591）。

鬼子、洋玩意自此深入中國內陸，逐步顛覆中國的意義體系、政治秩序和價值文明。如何禁制鴉片消費，革除民眾染上有礙國家發展的壞習性和壞品味自是施政重點。從雍正二年發佈第一道鴉片禁令以來，國家從沒在鴉片管理上缺席過，即便是弛禁論、鴉片貿易合法化期間，鴉片也以寓禁於徵的方式被管理，透過鴉片增加國家稅收，用以支付戰爭軍需、自強運動改革經費，而軍閥也以鴉片養軍，擴大勢力。然而，從消費觀點來看，消費是個人選擇行為，自由意志的遂行，它是日常生活的經濟行動，特別是鴉片的使用，不單是個人品味習性、休閒享樂，它還具金融貨幣、社會互動、身份象徵等功能。這些功能使得為數不算少的中國人，不分階層、年齡、性別的投入鴉片消費，可見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

因此，鴉片如何成為熱門消費品，如何供應全國無數鴉片吸食者需求，如何成為社會時尚風潮，如何成為日常生活經驗，亦即鴉片消費機制如何運作，以至造成中國的鴉片化，則是值得深究的課題。因為，正是中國的鴉片化，使得消費政治成為必然的應對措施。鴉片的消費與政治，無疑就是鴉片化和去鴉片化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首先就是從鴉片中國進入一個去鴉片的中國。國家透過政治力量進行鴉片消費管制，無非就是要去鴉片以達到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的發展目標。鴉片成為革命建國、現代化進程的阻礙力量。也因此，我們看到鴉片背負越來越重的罪名和承受的污名，鴉片不斷被政治界定為國族公敵。

在進入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關係之前，有必要先瞭解鴉片消費的運作概況，中國何以成為鴉片帝國，而鴉片消費越盛，也預示著國家敗亡不遠，反鴉片消費，亦即禁煙的消費政治如何介入個人的消費選擇、品味習性和癮，以實踐中國救亡運動。消費政治無疑是中國救亡的第一步。這一章，要處理鴉片的消費與政治：

一、中國如何成為鴉片帝國的鴉片消費景觀。鴉片做為一種物質其社會生命歷程和不同階段的物之用，產生什麼物的意義和社會效應；同時也透過鴉片消費的人口、需求動機以及鴉片的供銷體系運作，理解鴉片消費如何進行，在需求和供銷體系配合下鴉片如何成為日常化生活經驗。

二、管治鴉片，鴉片的消費政治。鴉片做為一種物質如何被政治化、國族化。在國族框架下，鴉片消費進入消費民族主義的範疇，在中國救亡基調下，成為高度爭議的政治性物品；再者，國家又如何透過法令和反鴉片消費論述形成官方的消費品味，透過這些論述進行品味教導，試圖改變鴉片消費做為時尚潮流的社會觀點。此外，反鴉片消費論述的建構，涉及論述建構的背景，誕生的條件，其相應的國族威脅、政經發展階段和鴉片消費的程度，最後形成國族救亡導向的反鴉片品味政體，並將鴉片界定為國族公敵，建國大礙；而這些論述又如何構成身體與生命政治開展的基礎，促成中國進入現代性議程（第三、四章的討論）。



三、鴉片時尚的社會品味。鴉片如何成為社會追慕仿效的時尚潮流，正是由上而下的時尚傳染模式，讓鴉片從精英消費到大眾消費，吸食鴉片具有體面、時髦的社會高評價，讓上流階層得以炫耀身份，下層人士得以學樣模仿，鴉片吸食之風乃相染成習，成為追逐時尚的社會品味。在此將追蹤這一段鴉片成為社會時尚品味的過程。再者，鴉片消費之所以成為品味，必有其構成品味的物質文化和儀式，品味擁有者必有一套對器物出身的知識和鑑別能力，同時也有財力享有這些器物。這裡，我們將展現鴉片文化的精緻和豐富面。至於鴉片煙館，更是鴉片煙客不可或缺的消費空間。大形複合功能的鴉片煙館，集煙、賭、娼於一身，具休閒逸樂和社交活動功能，不只鴉片吸食者上門，即便沒有吸食習慣的也會慕名而來，在不自覺中染上鴉片煙癮。我們將一窺這種複合功能煙館如何成為都市地景和令人趨之若鶩的時尚空間，而煙館的經營手法又如何吸引更多癮者和非癮者上門，造成鴉片之風蔓延。更重要的是鴉片吸食如何成為一種社會連帶和社會互動，而非去社會化、脫離社會的出神沉醉行爲。

四、從時尚到鴉片的羞恥政治。官方品味已取代鴉片做為時尚的社會品味，在國族救亡品味政體下，鴉片消費被界定為既是個人恥辱也是國族恥辱，正是扣連國族興亡的恥辱感，讓禁煙運動得以成為社會共識，並凝聚為國族認同意識，同時也取得一定成效。在這裡，將探討鴉片消費從追求時尚到恥感形成的過程。同時，如何利用鴉片的詬病化和恥辱化建立羞恥政治，以進行鴉片的禁制。亦即如何透過法律刑罰的入罪化成為外部的社會控制手段，又將國家民族創傷轉化成個人恥辱，形成一種社會監視和道德自我控制的羞恥政治。最後，這套羞恥政治策略，如何深化恥感意識，形成恥感意識的社會化，也帶動社會公共力量崛起，對禁煙運動的推展、認同意識的凝聚、國族救亡的推動，具關鍵性作用。

## 第一節 鴉片中國：鴉片的消費景觀

### 一、鴉片的社會生命和日常化

人類學西敏司(Sidney W. Mintz)在其《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一書分析糖引入英國後，如何從王公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到一般大眾消費品或日用必需品的過程，以及糖對英國飲食習慣與消費結構造成的改變，特別是糖成爲勞動階級飲食熱量來源，促使勞工有充足營養和體力投入工作，同時也爲了獲得這項物資而努力工作賺錢，帶動勤勉革命，而蔗糖消費的增長擴大市場供給，成爲政府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政府爲了獲取蔗糖不得不向外擴張，影響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形成。因此，糖不僅是經濟物品，更形成消費文化，改變社會習慣和經濟結構。<sup>4</sup>西敏司的研究追蹤糖的社會生活史，探討物質在歷史流變中的社會之用及其引發的社會意義和變遷要素，研究顯示物質不單是使用的物件或消費的商品，它更可以是改變歷史發展軌跡，促動社會經濟型變的關鍵力量。西敏司的研究呼應了人類學對物的使用意義、文化創造和物的生命史的關注。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物品，在獲得、使用和交換的過程中，才逐漸有它自己的生命形式和社會生活方式，而所有社會也都是通過使用物品才變得有意義。人類學家Mary Douglas建立物品的世界(world of goods)，物品應跳脫經濟範疇以及維持生活的角度，物品是有生命的訊息系統，所有物品都有意義，任何品的選擇和使用都是一種文化結果，也創造了文化，同時也是社會關係的標誌，我們應當視物品爲體現人類創造力的非語言媒介，而物的日常生活實踐體現了社會關係、社會秩序的維持和文化再生產。<sup>5</sup>另一位人類學家Appadurai則提出物的社會生活(social life of things)概念，物品是活動的客體，也是過著社會生活的生命體，它有兩種軌跡，一是特定物體的生命歷史，亦即它經歷不同人之手，經歷不同環境和用途導致該物體具獨特文化傳承；另一是特定物類的社會歷史，亦即物類經歷長期的歷史變遷和劇烈演變的過程。因此要研究物質文化就需從這兩方面切入，瞭解物品的生產來源、被接受的生命歷程和被使用後的意義變化，再者可以透過物品的社會故事或物的生命傳記的書寫方式，呈現物的社會生涯和生命履歷。<sup>6</sup>

---

<sup>4</sup>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2010)。

<sup>5</sup> Ma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1996).

<sup>6</sup> 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1986).

西敏司的糖與英國社會經濟變遷的研究成功操作上述這一研究途徑。西敏司關注的問題意識，「一種被稱為蔗糖的物質，以及該物質在歷史上的遭遇」。<sup>7</sup>他追蹤糖的歷史遭遇，西元 1000 年很少有歐洲人知道糖的存在，1650 年左右英格蘭貴族和富人變得嗜糖成癖，而糖也成為他們的藥品，以及社會炫耀的物品。到了 1800 年，糖已成為每一個英格蘭人日常必需品。1900 年糖提供英國人日常生活飲食五分之一的熱量。這是糖從少數人奢侈品到大眾必需品的普及化過程，同時也在英國飲食扮演重要角色。西敏司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這樣？是什麼使得一種異國舶來品的昂貴物質到頭來變成尋常物品？即便最困窮的人也能享用？它是何以迅速地變得如此重要？對英國統治者，它意味著什麼？而對於成為它的消費者的普羅大眾，它又意味著什麼」。<sup>8</sup>最後，他更關懷「我們所探究的問題不再只是關於英格蘭人究竟如何成為嗜糖者，同時還涉及這一轉變對於英國社會隨之而來的變遷究竟意味著什麼」。<sup>9</sup>西敏司，不只關懷物品的消費發展，更在乎物品消費的普及化、日常生活化對社會變遷有何影響。簡言之，物品如何成為改變歷史的動力，如何製造一樁歷史事件？

西敏司的研究一方面演繹蔗糖的社會生活史，另一方面說明蔗糖改變社會的變遷軌跡。這一研究旨趣和上述問題發問，放在鴉片做為物質生活史的研究，幾乎適用。雖然糖和鴉片最後的歷史命運和評價完全不同，但從社會生命史來看，其發展過程有諸多相似之處。且不說英國蔗糖消費增長，帶動喝茶風氣盛行，成為新的飲食文化和生活習慣，造成對茶葉的龐大需求，進而轉向中國購買，形成中—英—印三角貿易，促成了鴉片的大量輸入中國。就此而言糖在英國的崛起，竟成為鴉片禍害中國的遠因。鴉片歷史遭遇和社會歷程亦與糖類似，都歷經從奢侈品到大眾消費品，從貴族精英使用到普羅大眾消費過程。鴉片影響性和重要性，對統治者或國族而言又構成什麼挑戰？我們也不只要瞭解為什麼中國人嗜吸鴉片，更要知道這種大眾嗜好對中國造成什麼變化和影響。亦即，追蹤鴉片做為物的生命史的轉變過程。鴉片經歷不同使用階段，不同社會結構和文化型態，會創造出什麼不同的使用價值和社會意義。從花卉、食品、藥品到毒品；<sup>10</sup>或從藥品、奢侈品到大眾消費品，鴉片進入社會對日常生活、文化、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又如何被對待和處理，對待的方式造成什麼效應。同樣的，當鴉片使用價值改變

---

<sup>7</sup>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2010: 17)。

<sup>8</sup>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2010: 17)。

<sup>9</sup>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2010: 25)。

<sup>10</sup> 另可參見劉志琴，〈從藥品、食品到毒品：鴉片的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論壇》，2010 年卷，19 期(2010: 4~13)；劉紹華，〈從珍品到毒品：鴉片類物質的道德經濟學〉，《中國飲食文化》，6 卷，1 期(2010: 27~61)。

成爲日常消費品時，卻成爲爲害甚深的毒品，也背上禍國殃民的罪名。這樣的轉變還觸及吸食方式的改變，西方人服食鴉片，中國則是吸食，由於吸食方式的引入致使鴉片在中國由藥品一變而成休閒娛樂品，最後成爲毒品。這一使用方式的關鍵性改變重新定義了鴉片的社會意義與生活行爲，以及它如何被對待和處理，也就是如何遭到壓制和排除。再者，鴉片吸法的引入，雖只是一個器物用法的改變，除了重新界定鴉片的使用功能和社會身份外，它還可能造成吸食/服食之間感官經驗的差異，以及中西使用行爲的不同。例如西方透過服食，因此只能是個人行爲，獨自爲之；中國的透過吸食，除了可以獨享外，更普遍的是「橫臥煙榻，傳筒對吹」，鴉片乃構成社交行爲。

透過上面的發問，回顧鴉片的物質生命歷程，確實在不同的使用方式下，有其不同的社會對待方式和評價。我們接下來看這段物質的轉換史，盛唐時期，罌粟透過阿拉伯人的貿易移植進中國，剛開始純然做爲花卉欣賞，唐詩人雍陶〈西歸出斜谷〉詩，「行過險棧出褒斜，歷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罌粟花，可見唐四川一地已有罌粟種植。成爲觀賞的花卉。到了宋朝，蘇軾亦有詩〈歸宜興留題竹西寺〉提及，「道人勸飲鶴蘇水，童子能煎罌粟湯」，這時的罌粟成爲熬湯的食材，也用罌粟煮粥，做爲補品，謂之「御米」。<sup>11</sup>可見宋人以罌粟爲食用物品。而罌粟做爲藥材，宋王朔《易簡方》即提到罌粟可治痢疾，「罌粟治痢如神」。到明代罌粟主要做爲藥用，王璽《醫林集要》，李梴《醫學入門》，龔雲林《醫鑒》，李時珍《本草綱目》，都提到罌粟的製法和藥效，主要用在治療痢疾、瘡疾、咳嗽、腹瀉、偏頭風、關節痛，甚至壯陽等方面。罌粟成爲一種應用廣泛，治療百病的萬靈丹。<sup>12</sup>罌粟的社會生命，從唐代到明朝，歷經花卉、食材、藥材的使用，不曾構成問題，它用途廣泛的療效，雖然有點誇張，但可知當時常做爲萬靈藥使用，鴉片在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也以藥材納稅。

罌粟之成爲問題物品，在於它之後的用途和使用方式改變，進入另一階段的社會生命。如同西敏司所說，當蔗糖的「用途發生了變化，或是有了增加，意義同樣也發生了改變」。<sup>13</sup>鴉片的社會生命就是一段隨著歷史發展，其物質功能和使用意義不斷發生變化的歷程。檢視這段歷程，罌粟從藥用轉爲休閒娛樂功能，而其使用方式則是將罌粟熬制成鴉片膏吸食。鴉片在中國用做吸食，這與西方的

---

<sup>11</sup> 宋《開寶本草》記載，「罌粟子，一名米囊子，又名御米」，并言提到，「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粥食，極美」。見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中國史學史概要》(2007: 10)。

<sup>12</sup> 上述鴉片史資料可見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中國史學史概要》(2007: 8~11)；龔纓晏，《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1999: 100~118)；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9~15)。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初版1918)(2006: 192~194)。

<sup>13</sup>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2010: 19)。

吞食鴉片完全不同。吸食方式的誕生主要受到明末吸煙（煙草）風氣影響，<sup>14</sup>剛開始是鴉片混合煙草吸食，這一方法最早由爪哇發明，傳到荷蘭，荷蘭殖民台灣時，帶進台灣，又由台灣傳到廈門，最後流傳於中國沿海地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記載這段鴉片吸食演進史，「在 1624~1662 年，荷蘭人盤踞台灣時，他們從爪哇把那裡所盛行的煙草與鴉片拌合的方法介紹到台灣，這種習慣又經由殖民者的首府，廈門傳播到中國大陸」。<sup>15</sup>明末清初鴉片吸食法就傳到中國，李圭，〈鴉片事略〉，也有相同記載，並解釋製法和吸食方式，「蘇門答臘人變生食而吸食，其法先取漿蒸熟，濾去渣滓，復煮煙草葉為丸，置竹管就火吸之」。<sup>16</sup>雍正初年，巡台御史黃叔瓚，就他在台灣的觀察，說明鴉片和煙草如何混合使用和吸食，「鴉片煙，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鑊內，煮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筒，實以棕絲，群聚吸之，所值常倍於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煙館」。<sup>17</sup>由此亦知，鴉片煙館雍正時期即已出現。

估計混合吸食鴉片方式從 1624 年到十八世紀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乾隆中期左右，之後單純吸食鴉片的方式開始流行。<sup>18</sup>如成書於 1800 年（嘉慶五年）的俞蛟，《夢庵雜著》，記錄鴉片如何製成膏，如何直接置於竹管吸食的方式，鴉片「以水浸之，凡三宿三易水，去渣存汁……微火煉之成膏……分之丸如粟粒，置燈於床，持竹筒如洞簫者，橫臥而吸」。<sup>19</sup>道光人士蕭令裕的記載更詳細，「其吸食也，鑲竹為管，或磁、或銀，挑煙於盒，就燈而吸，倚枕側眠，蓋自乾隆末年始，嘉慶初吸食者漸多，至今日而家喻戶曉，俗不可挽」。<sup>20</sup>這段話除了說明單純吸食鴉片法的流傳時間和人盡皆知鴉片的盛況，也知道當時對鴉片煙具已極盡講究。鴉片吸食成爲一種精緻的物質文化。

鴉片使用功能和方式的改變，也改變了它的歷史命運。使用方式改變，讓鴉片得以從單純藥品轉化爲休閒娛樂品，鴉片從此展開消費商品的社會生命歷程。從最早少數人享用的稀有奢侈品，到人人可得的大眾消費品，正是這種轉變使得單純做爲個人消費品，甚至還兼具醫藥用品的鴉片，最後演變爲國家界定和控制下戕害人心，有危風俗，進而亡國滅種的毒品。由於鴉片的上癮行爲，久吸鴉片

---

<sup>14</sup> 明崇禎、清太宗皇太極、康熙，都曾下令禁吸煙草。崇禎禁煙，主要是煙與燕音同，吃煙猶如吃燕，意謂燕京陷落。皇太極則禁民不禁官，因爲擔心百姓花錢在吸煙上，導致家貧。至於康熙，一來他本身厭惡吸煙，二來吸煙容易引起火災，「火燭之起，多由於此」，而下令天下禁煙。禁煙還有一原因，由於吸煙風盛，種煙有厚利，使得許多良田改種煙草，有礙民生發展。見川床邦夫，《中國煙草的世界》(2011: 21~26)；袁庭棟，《中國吸煙史話》(2007: 127~134)。

<sup>15</sup>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初版 1918))(2006: 193)。

<sup>16</sup> 李圭，〈鴉片事略〉，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六)(2000: 139)。

<sup>17</sup> 黃叔瓚，〈台海使槎錄〉(1736 年，乾隆元年)(1984: 43)。

<sup>18</sup> 史景遷亦認爲單純吸食法始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Chinese Roundabout)(2005: 284)。

<sup>19</sup> 見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6)。

<sup>20</sup>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收錄於《海國圖志》，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26)。

的身體敗壞，構成社會運作、國家治理的危機。1729 年第一道鴉片禁令頒布，鴉片就納入國家管治(policing)範圍，鴉片也背負罪名，成爲影響個人身體健康和國家正常發展的毒物、毒品，也開啓兩百餘年鴉片消費與政治糾纏難解的爭戰史。鴉片吸食原本是一種新的休閒方式和享樂技術，卻招來毒品污名，當然是它的成癮性和引發的負面效應，足以動搖國家根基和統治基礎。而鴉片消費卻逐漸從精英消費大眾消費，這些消費者吸食後有什麼樣的傷害，他們又如何接觸鴉片以至上癮？

我們從英國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的實際面訪調查或可窺知一二。施美夫在 1847 年出版的中國見聞著作中描述鴉片帶來的廣泛危害，他訪問廈門一位開鴉片煙館，本身也染上鴉片癮的患者，這位患者細述鴉片帶來的害處，如失去食欲；失去體力；失去錢財；失去時間；失去壽命；失去德性，導致淫亂與賭博等。也就是這個人不再具有勞動生產力，同時還會引發治安問題。他更提及鴉片對人不知不覺的誘惑，就像人們變成酒鬼一樣。很多人都是這樣染上鴉片上癮的，例如有人病了或著了涼，朋有就建議抽抽鴉片或許有所幫助，於是就這樣吸了幾口，自此落入了圈套。又或許遇見某個熟人，百般懇求陪他去鴉片館。最初，他可能拒絕抽鴉片，但後來看到朋友精神漸漸煥發起來，他們那群人看上去挺順眼的，而自己的顧忌又遭到人們嘲笑。就這樣他的堅持很快就瓦解了，開始享受起這種奢侈。抽鴉片不久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終於無法再抵禦它的誘惑。<sup>21</sup>

從上述，大抵可以看出鴉片消費已逐漸日常生活化，不再專屬少數上流階層的奢侈享樂。許多接觸鴉片的人，大都是在這種社交應酬，日常生活互動中不經意的接觸而成癮，或許會有道德感作祟，但很快就陷進去，特別是在鴉片普及化和日常化下，更容易鬆懈自己的防線。這首詩貼切的點明這種現象，「只說偶爾怡情，聊作逢場之戲；豈意居然成癮，竟爲貼骨之瘡」。<sup>22</sup>許多煙癮大都在逢場作戲，社會互動中染上。我們也可以從晚清小說鴉片情節的描繪中隱約的捕捉這一現象，如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五十七回有一段沖天礮對余小琴述說黃貴敏請他吸鴉片的經過：

沖天礮道：「前兩天……我身子有些支持不住，黃貴敏勸我吸兩筒，我起初正言厲色的對他說道：『這是亡國的材料、弱種的器械，足下不可以自誤誤人』，黃貴敏只是嘻嘻的笑，說：『少大人不妨事的。這樣的物件，在外國原是藥品。現在看你疲乏了，所以勸你吸兩筒……』我聽了他這兩句話，心裡忐忑了半響，又想敷衍他的面子，說：『老夫子別動氣，我是說著玩兒。既如此，我就試試看』。

<sup>21</sup> 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游記》(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初版 1847)(2007: 344~345)。

<sup>22</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 356)。

黃貴敏這才歡喜，連忙裝好一口，遞將過來。我躺下去抽得一兩口，覺得異香蓬勃，到後來竟是精神百倍，毫無倦容。你想這東西奇不奇怪。余小琴道：『可是你今也相信了』，接著沖天礮躺在煙榻上又抽起來。<sup>23</sup>

晚清時代，1858 年的鴉片貿易合法化，使得洋藥、土藥無所不在，鴉片遍存於日常生活，幾乎隨手可得，已是事實。在這段描述裡，鴉片並非敘述主題，不是情節焦點，而是背景，場景，以讓人看到卻不特別意識到它的方式存在。一旦讓人有所意識，也正是鴉片在正常的判準下被提醒時。上面的對話，我們看到一些現象，(一)、鴉片就像喝茶、飲酒一樣成爲日常生活行爲，不需要特地對待，隨時可進行，也隨時見人可拿出招待。然而，總有人會提醒鴉片亡國弱種，害人不淺。抽的人雖自我說解一番，但未反駁鴉片這一有害的界定，勸的人最後也接受鴉片抽將起來；(二)、鴉片等同於亡國弱種的論調，已成爲晚清社會普遍的意識，但也成爲沒什麼特別重要的說辭，它是一個時代人人都可上口標語，彼此都可接受禁制的提醒，也都可藉著包容於禁制而脫離。正如規勸者正言厲色，但輕易的就可試試看，最後陶醉其中，欣然就範。或許鴉片之所以深化爲國民日常生活意識，正因爲正言厲色猶如輕煙，邊講，邊講，邊嚐試、接受；(三)、鴉片做爲藥物治療經常被認爲是吸食鴉片的要因，1894 年（光緒二十三年），一份針對在華百餘位教會醫生所做關於鴉片的問卷調查顯示，這些醫生認爲有 61% 的人是因病而吸煙。<sup>24</sup>另外明治二十九日本總督府的《鴉片事項調查書》也指出吸煙之誘因出於疾病，爲避免苦痛而使用。<sup>25</sup>然而，從上述的對話裡，我們看到的可能是藥物治病，讓身體神清氣爽成爲吸鴉片的藉口，以自我醫療論述掩飾鴉片的有害或病態論述，至於在當時看來鴉片的療效幾乎無所不能。

最後要指出，在這場景裡透露出鴉片的主要意象可能是吸食的日常化、自然化，自然而然的請吸，自然而然的接受，看不到太多的道德罪惡衝突。亡國弱種的說辭則做爲一種提醒和劃界，提醒禁制的存在、劃出常/病態的界線，雖然它只有這個標示的作用，試圖在包含中排除它所包含的，形成排除式包含的現象，亦即儘管鴉片自然化、日常化、普遍化，禁制仍在左右，起著排除它所包含（鴉片）的提示作用。鴉片既遭禁制排除（亡國弱種、自誤誤人）也排除禁制（試試看、抽了一兩口）；既被禁制包含（藥物使用），也包含禁制（精神百倍、你今也信了）。這種排除/包含的雙重交錯，互爲作用交待出鴉片禁與不禁的曖昧空間。也正因在這法令懸置的空間，促成鴉片消費成爲大眾消費，鴉片吸食做爲一種社會時尚，到最後也不再新奇、時髦，時尚已死，因爲它已內化爲大眾日常生活消費意識，煙民隨處可見。

<sup>23</sup> 李伯元，《文明小史》(1988)

<sup>24</sup> 王樹槐，〈鴉片毒害——光緒二十三年問卷調查分析〉，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1980: 189)。

<sup>25</sup> 程大學、許錫專，《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1978: 129~132)。

## 二、多少煙民：鴉片消費人口

在上述背景下，「十室九邑，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者」、<sup>26</sup>「十人九癮」，<sup>27</sup>這些話語裡的數字或許誇張，但鴉片吸食者在中國確是龐大的人口群，西方認知的中國就是眾多鴉片鬼居住的國度。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有多少鴉片吸食者，很難有精確的統計數字，<sup>28</sup>特別是什麼樣程度的吸食者才列算，偶而吸(occasional)、斷續吸(intermittent)、輕度煙癮(light)和重度煙癮(heavy)有所差別，如何界定，這都是估算時的問題。中國煙民的現行統計數字並沒有特別區分這幾種不同程度吸食者的比例。<sup>29</sup>真正構成社會問題的重度煙癮者佔多少比例，並不清楚。就一些外國人的觀察，顯然比例最多的是偶而吸食者，如英國領事在商務報告中，中國鴉片吸食者以偶而吸食為多，經常吸食較少。長沙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也指出，長沙鴉片吸食者偶而吸食佔 40~50%，真正上癮，吸食量大者並不多。<sup>30</sup>1880 年代一位外國醫生 Robert Coltman 進入鴉片氾濫之地山西，據他說他所熟識的一些鴉片吸食者大部分都只是適量的使用鴉片，而且經常在宴客招待中才用。英國駐海南領事在他的報告中也說，雖然這裡幾乎每個人都抽鴉片，但並有看到一些道德勸世著作中所描繪的鴉片鬼形象的吸食者，看到的反而是一群健康、強壯、有活力的農民。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94 年記載他到重慶的鴉片見聞提到類似的看法，「我在中國的九個月裡，見到上千個癮君子，但從未見到一個.....典型的中國鴉片鬼，『骨瘦如柴，步履蹣跚，面黃肌瘦，聲音低弱，目光呆滯，一如行屍走肉』」。<sup>31</sup>有些外國人的觀察和報告，會認為只有少數人吸食鴉片才會過量成癮，特別是那些有閒有錢的上流階層，大部份人都只是習慣性、有限量的吸食，不致產生太大的效應。<sup>32</sup>這類鴉片危害有限的說法值得保留，因為有可能為了幫自己國家輸入鴉片脫罪，降低罪惡感而淡化事態的嚴重性，或只挑輕微問題講述。「鴉片無害論」，<sup>33</sup>一直是

<sup>26</sup> 謝藻生，〈憶四川煙禍〉，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8）。

<sup>27</sup> 朱慶葆、蔣秋明和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193）。

<sup>28</sup> 服務於海關的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即指出，「關於在中國的鴉片消費數量的每項數字都是彼此不同的。一部份是由於鴉片貿易保守極大秘密所造成，但更多的是由於各項統計引用不同的根據的混亂情況所造成.....要想把這些不同的數字協調起來，是一件不可能的繁雜工作」。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8) (2006: 235)。

<sup>29</sup> 見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52).

<sup>30</sup> 朱慶葆、劉霆，《黑色的瘟疫：插圖本中國毒品史》（2012：69）。

<sup>31</sup>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個澳大利亞人在國：1894 年穿越西南，1910 年穿越西北》(A Australian in China) (2007: 32)。

<sup>32</sup> 見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54~56).

<sup>33</sup> 例如，內地會傳教士Benjamin Broomhall於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1882)一書，列出英國國內人士扞衛鴉片貿易的理由，一、吸食鴉片無甚傷害；二、英國政府從未向中國人強行銷售過鴉



英國當局和鴉片貿易支持者為傳教士眼中所謂的邪惡鴉片貿易開罪的論調，1892年成立英國皇家委員會鴉片調查報告，就是最好的說明。報告指出英國支持印度的鴉片貿易，鴉片在印度使用並未導致任何嚴重的道德和身體敗壞，而且印度也不願意承擔任何禁止鴉片輸出導致的財稅損失。<sup>34</sup>再者，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不願意輸入鴉片。<sup>35</sup>不少西方傳教士反對這樣的說法。德貞即在 1882 年《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撰文反駁鴉片貿易支持者認為中國不願禁鴉片，中國早就種罌粟這種合理化鴉片輸入的脫罪說法。德貞沉痛的指出這類說法猶如對對中國的雙重傷害，既輸入鴉片敗壞這個國家，又譴責這國家治理鴉片失能，「鴉片戰爭先在中國人心中留下可怕的陰影，然後是破壞這個國家的經濟、君王的聲望，刺激中國官員貪污。當麻醉了這個國家後，我們又指控他們管理無能」。<sup>36</sup>德貞的指責也貼切的道出了中國感染鴉片癮後的真實狀況，國家被麻醉，以致管理麻痺失能，無所作為。

再說回來，沒有精確統計數字，確實有礙禁煙工作，因為無法掌握全貌，提出有效作法。1908 年已有輿論注意統計調查之重要，它有助於正在推展的十年禁煙計劃，「至進而求其禁煙之根本政策，則尤在統計吸食人數、洋土藥銷數，以踐十年之約」。<sup>37</sup>到了 1925 年問題依然存在，亟力在全國推行禁煙的中華民國拒毒會仍提到，拒毒會推動困難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煙毒無實在統計」。<sup>38</sup>不管如何，這裡還是用一些數字，勾勒中國煙民概況。中國鴉片戰爭前全國煙民人數，依據范文瀾的估計 1835 年，全國約有 200 萬人。若根據林則徐在湖北禁煙所收繳煙槍數推估，全國約 100 萬人。若從煙館開設數推算，約 400 萬人。從白銀外流量計算，約 1000 萬人。再者，根據服務於海關稅務司的馬士統計鴉片進口量，1838 年全國約 400 萬人吸食，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sup>39</sup>曾住廣州的英國醫師唐寧根據 1836 年的鴉片煙膏量，約可供 1250 萬吸食者使用。另一名英國煙片販子，在致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公開信中認為，從 1838~1839 年間的煙片煙量，可推知中國吸食人口約 210 萬人左右。<sup>40</sup>在鴉片戰爭前後，吸食人口數目差異極大，難

---

片；三、鴉片罌粟的種植，證明中國人對他們禁煙的宣告並無誠意；四、即使英國不運鴉片到中國，其它國家也照樣會運去；五、即使英國曾向中國強行銷售鴉片，她現在也不必為多年以前的人所造成的後果負責；六、鴉片有害於中國，也比不上酒精對英國人的傷害；七、如果沒有來自鴉片貿易的收入，印度的經營將無以為繼。轉引自林治平，〈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禁煙運動〉，收錄於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1993: 374)。

<sup>34</sup> 見 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101~104).

<sup>35</sup> 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2004: 124)。

<sup>36</sup> 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2004:99)。

<sup>37</sup> 〈租界禁煙議案之感言〉，1908 年 3 月 22 日，《申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301)。

<sup>38</sup> 〈國民拒毒會歡迎顧子仁〉，1925 年 9 月 7 日，《申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508)。

<sup>39</sup> 參見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國》(1995: 195)。

<sup>40</sup> 張馨保(Chang Hsin-Pao)，《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1989:

有定論，200~400 萬人是比較多人推算出的數字。到了 1850 年代，鄭觀應則從洋、土藥數量以及每人每年吸食量推算約 4400 萬人，<sup>41</sup>這是所有估算中最高的數字。同一時期，有外國人依同樣方式估 1855 年中國吸食人口約 300 萬左右。

42

到了 1890 年，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根據傳教士魏林(William Lockhart)的估算約有 1500 萬人，當時全國人數 4.5 億，約佔成年男性百分之十，其中有 3%~5%是過量吸食者。<sup>43</sup>1931 年，根據報上記載吸食人口則到 1000 萬人之多(含吸食毒品)。<sup>44</sup>清末中國曾做過一次鴉片人口調查，當時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轄下的中國海關負責調查統計任務。1881 年，赫德向國內二十個港口發放調查問卷，調查結果吸煙人數約為 200 萬人，以赫德當時估中國總人口數 3 億人來算，約佔 0.65%。<sup>45</sup>這一吸煙人口數字跟其它比起來顯然偏低。這也成為赫德支持鴉片貿易的論據，他認為鴉片不會損害國家和個人的經濟利益，不會妨礙人口的增長。英國傳教士德貞(John Dudgeon)，則不認同赫德的 200 萬人口結果，他懷疑海關負責人提供資料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德貞推測海關人員調查的對象，是他們聘請的中國雇員、認識的中國熟人或鴉片經銷商。不難想像他們問出來的結果可能錯誤不實，致使調查結果不準確。從德貞調查治療鴉片癮者的數字來看，他認為中國吸煙群應分上、中、下三層進行調查。目前得到較多數據的是中層吸煙人數，因為這群人較願意接受煙癮治療，其它如下層人口根本沒錢、沒能力進行治療，最上層的那群則根本沒想過，也沒意願出面治療。他們沒有金錢問題，也不擔心政府的禁煙措施有礙他們。這兩群人基本上都不容易被調查到。德貞也提到透過海關鴉片進口量的統計推算中國吸煙人口數，並不準確。因為大量的走私鴉片和國內土產鴉片，很難有真實的統計數字。最後，德貞根據自己治療鴉片煙患的調查，推估 1882 年中國吸煙人口數應有 1200 萬。<sup>46</sup>德貞的 1200 萬跟史景遷的 1500 萬人接近，應該是比較中肯的數字。1909 年，萬國禁煙大會中國代表唐國安在大會演說中報告中國煙害情形，全國有 2500 萬人染上煙癮，每年在煙土上的耗銀約 2.5 億兩，導致農作損失約 1.5 億兩，勞動生產損失約 4.5 億兩，中國因吸食鴉片全年總損失約 8.5 億兩。<sup>47</sup>綜合上面各家數字，採取較多人數值接近的結果，鴉片戰爭前後約 200~400 萬人，十九世紀八〇年代約 1200~1500 萬人左

37)。

<sup>41</sup> 鄭觀應，〈禁煙〉(上)，《盛世危言》(2002: 228)。

<sup>42</sup> 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1842~1856，引自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962: 861)。

<sup>43</sup>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鴉片〉，《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Chinese Roundabout)(2005: 289)。

<sup>44</sup> 《申報》，1931 年 7 月 2 日，引自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國》(1995: 197)。

<sup>45</sup> 費正清和劉廣京編(John K.Fairbank and Liu Kwang-Ching)，《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上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1985: 171)。

<sup>46</sup> 見高希，《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2009: 437~440)。

<sup>47</sup> 〈中國代表唐國安的演說〉，1909 年 3 月 1 日，《字林西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106)。

右。

不管數字是否精確，吸煙人口群不算少，曾在甘肅居住三十年的某位主教，就他親身觀察，甘肅每八個人就有六個人染上煙癮。<sup>48</sup>鴉片消費人口群的上昇和消費地區的擴散，日益嚴重，吸煙地區從都會城鎮之區傳染到鄉間僻壤之地。而「鴉片之傳染，咸同以來日盛一日」，<sup>49</sup>確實，從道光到咸同，再到光緒，吸煙人口節節上昇。如下面各鄉鎮的記載，道光到同治年間，「鴉片流毒無窮，三四十年来，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鄉僻亦然，計邑城每日所進煙土，其費倍於米糧」。<sup>50</sup>上海一鎮從道光到咸豐，吸食人口從數人到數百人，「鴉片流毒為禍烈矣，道光初年，里中吸食者不過數人，至咸豐間，漸染尤多……吸食者不下數百人，藏垢納污，釀成巨害」。<sup>51</sup>吸食人口多，土店更盛米店，即便不成聚落之地，也設煙館，煙館則無虛榻，滿是吸煙過癮之人，「鴉片煙館隨地皆是，錯雜居民，核而計之，約得十與一之比例。無論山鄉僻壤，甚至不成聚落之地，操此業者必有數家。入其室橫陳其間者，曾無虛榻」。<sup>52</sup>1930年初，一位美國人到四川，作了這樣記載，「無論城市或鄉村之人，凡被余詢問者，均稱吸煙人數，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此等吸煙者中，百分之七十為成年人」。<sup>53</sup>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的觀察，鴉片氾濫，幾乎無處不在，無人不吸，已成為既定印象，落實中國鴉片帝國之名。

想像鴉片帝國，黑霧瀰漫，究竟中國鴉片吸食者煙癮有多大，一天要吸多少煙才過癮？通常每人每日平均吸食量，也用來推估中國吸煙人口數。不過吸食量的統計也不甚精確，綜合幾種數字，或可求得較接近的數值。鄭觀應估計，「每人日食四錢七分零」，<sup>54</sup>1錢3.75公克，每人每日17.6公克。美國傳教士盧公明在福州的觀察，「到了成癮之後，一個吸食者每天的消耗量在一克到十克之間」。<sup>55</sup>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廈門煙館調查十名鴉片吸食者，除了瞭解吸食動機，也問他們每天吸食量，十人中吸超過1錢，1人；抽1錢，5人；7分~1錢，1人；抽2分~3分，3人。<sup>56</sup>這些人大部份在4公克之下，用量不算多，有可能施

<sup>48</sup> 〈中國代表唐國安的演說〉，1909年3月1日，《字林西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106）。

<sup>49</sup> 《重輯張堰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五冊）（2005: 25），轉引自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39）。

<sup>50</sup> 金福曾等修，張文虎等纂，光緒《南匯縣志》，卷20，轉引自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38）。

<sup>51</sup> 《羅店鎮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十一冊）（2006: 11），轉引自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39）。

<sup>52</sup> 《東方雜誌》，第1卷，第12號（1905）。

<sup>53</sup> 《四川月報》，第3卷，5期

<sup>54</sup> 鄭觀應，〈禁煙〉（上），《盛世危言》（2002: 228）。

<sup>55</sup>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otting About Chinese)（1865）（2009: 412）。

<sup>56</sup> 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游記》(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美夫調查對象大都是較窮煙民，沒有過多金錢消費。一位僑居廣州的鴉片販子，在給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公開信中推算 1838~1839 年間中國吸食人口數時，即以鴉片吸食量估算，「雖然很多人可能抽得少些，但估計一般抽煙者每天總得抽 5 分的鴉片煙膏。不少人每天要抽 1 錢鴉片膏，吸 3~4 錢鴉片膏就算量大的了，很少有人能抽這麼多」。1879 年，人們估計，一般抽鴉片者每天抽 2~5 錢鴉片膏，煙量大者，一天抽 5~20 錢。<sup>57</sup>此外，根據另一位英國人麥都思 1855 年的訪問報告，「近日向上海中國人調查一下……中等煙癮的鴉片吸食者每天吸食一錢，但補充說，只吸食這樣數量的人為數不多，大多數人是每日二錢、三錢或五錢，這樣才能維持最初由於一錢而引起的煙癮……，商人、士大夫階級更能買得多些……有人甚至要一兩才過癮」。<sup>58</sup>麥都思的說法，1 錢（4 公克），可能是最基本的量，大都在 2~5 錢（7.5~19 公克）之間，有錢階級更多到 1 兩（37.5 公克）。史景遷的估計則是每人每天吸「1/3 盎司或每年七磅鴉片」，<sup>59</sup>亦即每日約 8.7 克。上面的數字從每日不到 4 公克到 37.5 公克，相距極大，或許麥都思的 2~5 錢可能較接近事實。

### 三、鴉片怎麼到手：鴉片的供銷體系

中國有遍及各地的龐大鴉片消費人口，每人每日吸食量又不算少，要供應如此龐大消費群的鴉片需求量，必定要有完備健全的經銷網絡和銷售點，構築出嚴整的鴉片消費體系，才能充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張嚴密且四通八達的經銷網絡在鴉片走私時代就已運作純熟，透過綿密流暢的供銷/供給體系，讓鴉片吸食者過足癮，也讓更多人掉入煙癮陷阱。這是佈建完整的毒品經濟體系，它既是全球經貿體系的一環，也操控著百餘年中國的鴉片生活。因此消費者如何能輕易買到手上鴉片，就是個重要問題，也就是這張鴉片銷售網如何運作，以成就鴉片帝國盛景？簡單說，在鴉片走私時代，鴉片的販運銷售體系，透過下面方式進行：

（一）、英國東印度公司收購製造鴉片，再批售給投機商人，或港腳(country)走私商。<sup>60</sup>這些商人再船運到廣州各地，由於禁令限制，無法直接進港，商船只能停在外海，先在廣州，再移到澳門、黃埔，最後落腳伶仃洋。從印度運來的鴉

---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初版 1847)(2007: 347~350)。

<sup>57</sup> 張馨保(Chang Hsin-Pao)，《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1989: 37)。

<sup>58</sup> 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1842~1856；引自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1962: 860)。

<sup>59</sup> 史景遷，〈鴉片〉，《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2005: 290)。

<sup>60</sup> 港腳即country的譯音。英國通稱往來廣州、印度和東南亞沿海的商船叫Country Ships。中國行商誤以為是港腳國的船。後來稱Country Ships進行的貿易，叫港腳貿易，其商人稱做港腳商人。港腳商在中英貿易間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港腳貿易的擴大，改變了貿易差額和白銀的流動方向」，見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1961: 196)。

片先在大型的作業船躉船上卸貨，成為鴉片的儲存地，再利用「快蟹」、「扒龍」武裝快艇，將躉船上的鴉片載運到陸地交貨。這是外海運到陸地過程，伶仃洋由於水路四通，船蹤難覓，構築了儲存、販運鴉片的極佳走私網。而快蟹的速度和武裝設備也足以躲過清水師巡船的追捕。英商查頓·馬地臣行(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 (怡和洋行)，更在加爾各答和伶仃洋之間闢一條飛剪快船行走的快速航線，讓印度鴉片運到中國只需 17 天時間。<sup>61</sup>極盛時期，伶仃洋有躉船二、三十艘，快蟹、扒龍更在海面川流不息，來回運貨。

(二)、窯口包售。進入陸地後就由十三行商以及以錢店為名的包買商，負責包售煙土，這些商行叫做大窯口。大窯口資金雄厚，遍佈廣州附近各地。在大窯口下還有一些分銷商，負責將煙土再轉賣下去叫小窯口。它們資本較小，負責一個地區、一個縣市的鴉片分銷，轉賣給煙店、挑膏店或煙館。小窯口遍佈全國城市鄉鎮，是鴉片得以滲透到中國各地，造成走私氾濫的主要經銷機制。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從廣州轉移到上海。從事鴉片貿易的洋行也分兩類，即大同行和小同行。大同行是指經營印度煙土進口的英國洋行，其中最重要的如怡和洋行(當時中國最大的鴉片貿易商)、沙遜洋行(十九世紀七〇年代取代怡和洋行成為最大洋商)、哈同洋行等；小同行是指中國鴉片商人開設的鴉片批發、零售商行。通常由小同行向大同行購進大量煙土，再批發給下游經銷商或零售商。<sup>62</sup>鴉片之所以快速蔓延中國各地，大小窯口是主要關鍵機制。這些商人被稱為奸商，道光時期有些官員還以漢奸看待和論處。再者，這些從事鴉片貿易者大抵以廣州人、閩南人、潮州人居多。職業包括：行商、小商人、下層官吏、漁民，還有海運、水運相關人員，如船戶、舵手、水手等，以及手工業者。貿易形態，通常以合資、小規模貿易為主，各自以其能力，利用人際關係抓住機會進行交易，相當機動而靈活。<sup>63</sup>

(三)、各地煙土行、煙土店。鴉片貿易合法化後，販賣鴉片在各地成為正常的交易行為，再加上土產鴉片量增，使得鴉片消費體系更加綿密而完整，以供應更多鴉片消費人口。煙土的收購、批發、製作、零售各有專門經營者，例如：(1).滾子商。負責收購農民拿到市場或煙會上販賣的鴉片，再轉售給批發商、零售商。滾子商是四處收購煙土的煙販子；(2).批發商。從滾子商手上買進煙土再轉銷給零售商；(3).零售商，將購進的生膏煮製成熟膏，再賣給煙店或吸食者。(4).熬膏商。將煙土煮成熟膏，直接供人吸食或零售出去，這些人也兼開設煙館；(5).運商。煙土完納通關稅後，即可銷往外地，這些商人負責運送收購的鴉片再

<sup>61</sup> 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1961: 127)。

<sup>62</sup> 見洗波，《煙毒的歷史》(2005: 90~91, 97)。

<sup>63</sup> 參見村上衛，〈閩粵沿海居民的活動與清朝：以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貿易為中心〉，收錄於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2008: 376~379)。

賣到外地，以牟取不同地區間的差價。<sup>64</sup>

(四)、煙館。既是整個運銷體系的末端，也是一種新的休閒娛樂以及社交活動空間，雍正年間就已出現。十九到二十世紀，煙館幾乎是城市到鄉村重要的空間建築，大煙館、小煙間隨處可見。在土產鴉片盛行時代，「雖窮鄉僻壤，亦有茅蓬草屋以供吸食」。<sup>65</sup>可見煙館成爲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煙館有等級之分，在各地、或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稱呼。通常分大煙館、小煙館。大煙館在溫州稱大土館，在漢口、南通等地又叫售吸所；小煙館則有煎煙館、燕子窠（窩）、花煙間、售吸棚戶等稱號。至於四川西康、邛崃，煙館通稱紅燈館。除了大小煙館外還有流動煙館，由專人提供煙膏、煙具到府服務，或沿街叫賣，隨時提供煙民吸食，前者如西康雅屬的私煙館，後者如四川成都、宜賓的兜兜煙館。由於鴉片消費氾濫，不只煙館可吸煙，其它如旅館、茶鋪、酒店、妓院、公共浴室，甚至渡輪，如重慶到宜昌的輪船，<sup>66</sup>等公共休憩場所也都附設煙室或提供煙具，供來客過癮。

在上海則煙館之盛，有「土店多於米店，煙館多於飯館」之說；而煙館之精美，「所有煙間皆高大其室宇，精潔其器具」。<sup>67</sup>煙館仿佛成爲上海城市重要地景，其最著名如法租界的眠雲閣和南誠信。其陳設佈置往往規模宏敞，裝潢富麗，煙具則考究精美，窮極工巧，服侍煙客更是周到體貼。眠雲閣更是最早設有女堂倌的煙館，開啓煙館女侍招待風氣。大煙館通常陳設富麗堂皇，潔淨精雅，消費對象大都是官紳富商，如溫州大煙館又叫大土館，除經營煙土買賣之外，並開燈供應地方士紳、殷商富戶吸食。其門首高懸「公班水籠，大土拆兌」或「燒焙大土，鹹塘原煎」等招牌（公班水籠、鹹塘原煎是指煙的質量好，煎法考究）。這些大土館都以方間雅潔，煙具考究，招呼周到以招徠顧客。一些上流煙客趨之若鶩。「房間內懸有名人書畫，陳設古雅。金漆坑床上，冬天加蓋皮套或鋪以棉墊棉靠背，並添置火爐；夏天換上蘆花墊或龍鬚蓆。煙客進門，香茶、水煙、熱毛巾源源送來。並雇有佣人代客燒煙、裝煙」。<sup>68</sup>有些大煙館功能更多，除了「備有專門的扞手，侍候顧客吸煙，有男有女」，更有「供人狎玩娛樂的女娼、男妓，賣唱的等等應有盡有」。<sup>69</sup>

---

<sup>64</sup> 見洗波，《煙毒的歷史》(2005: 109~111)。

<sup>65</sup> 《中央日報》，1932年8月11日。

<sup>66</sup> 吳雨、梁立成、王道智，〈舊中國煙毒概述〉，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35)。

<sup>67</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 10)。

<sup>68</sup> 戴文席，〈解放前溫州的鴉片流毒〉，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422)。

<sup>69</sup> 楊國治，〈西康省雅屬的煙禍〉，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 58)。

小煙館則陳設簡陋、污穢髒亂，提供貧窮勞動階級過癮空間。溫州小煙館又叫煎煙館，俗稱鴉煙館，專門開燈供應窮煙客吸食，如僧道尼姑，慣竊小偷，破落戶子弟，以及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煎煙館通常「房屋狹小，設備簡陋，大都是一副床板兩條木凳，床上草蓆一張，枕頭兩個，此外別無陳設。板條桌上一小缸粗茶，任客自喝，所用煙具全是最普遍的」。這種低廉小煙館不只吸煙，一些「門客、狗腿子、訟棍、衙役、流氓等社會的渣滓，常在這裡碰頭、接線……進行種種罪惡活動……是藏垢納污的罪惡淵藪」。<sup>70</sup>在西康，小煙館大都聚在背街小巷裡，顧客多半是推車、抬轎、販夫、走卒等勞苦大眾，「下等煙館招來顧客比較直爽，用一張布簾遮掛門口，上寫『一到（道）清煙』四個大字。表示該館賣的鴉片是熬的頭道『清水煙』，不是摻過煙灰的二道、三道煙」，而其「煙室床舖骯髒，用硬木筒做頭枕，煙具簡陋，有孤魂燈一盞，鐵絲煙杆一個，竹竿土陶煙斗的煙槍一支，竹節根的絲煙棒一根」。<sup>71</sup>

另一種小煙館是上海著名的花煙間，這是複合功能的休閒空間，是妓院與煙館的結合，裡面有妓女侍奉煙客過癮，這種煙妓通常是較下等的娼妓，廣東人稱這類妓女為「煙花」。這裡的煙也不是什麼好煙，多是價格低廉，其臭難聞的蹩腳貨。到這裡的煙客大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狎妓多於抽煙。<sup>72</sup>因此染上煙癮者不少，設娼成為吸引煙民消費的促銷手法。至於上海在禁煙期間私設的小煙館叫燕子窠。法租界則是燕子窠的天下，1927年燕子窠有6000餘家。<sup>73</sup>為什麼稱之燕子窠，有人寫詩說明，「燕子窠，孵燕多，數榻橫臥如燕窩，煙泡敷在煙槍上，狀如燕子銜泥做燕窠（煙槍煙斗狀如燕窠）」。<sup>74</sup>

此外，漢口有所謂售吸所，是供人吸鴉片的場所，算是較大的煙館。大街里巷的門樓上，掛有某某商號的招牌，知情人士就知道是售吸鴉片的所在。售吸所遍設漢口各個地區。售吸所分甲乙兩級，甲級房間都是雅座，鋪設講究，雇有專人伺候燒煙，煙客多是商場大老板。乙級是普通座位，來的通常是店員、管事、來往客商，約聚談生意。<sup>75</sup>漢口另有小煙館叫售吸棚戶，一般位於背街和小巷等偏僻之處，門口掛一盞小壁燈，標名某某記。在漢口約700百多家。設備簡陋，

---

<sup>70</sup> 戴文席，〈解放前溫州的鴉片流毒〉，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423）。

<sup>71</sup> 楊國治，〈西康省雅屬的煙禍〉，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58）。

<sup>72</sup> 高洪興，〈抗戰前的上海鴉片業〉，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88）。

<sup>73</sup> 高洪興，〈抗戰前的上海鴉片業〉，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89）。

<sup>74</sup> 丁紹林，〈昆山舊時鴉片之害〉，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359）。s

<sup>75</sup> 田梅村，〈舊社會鴉片煙業在漢口〉，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505~506）。

煙客多半是勞苦大眾。售吸所價格較高，錢少的就上售吸棚戶。但這也是流氓煙痞經常鬧事的是非之地。<sup>76</sup>

至於流動煙館，是以個人流動串門方式賣煙，在西康就是私煙館。有專人身上帶著鴉片煙、煙燈、煙具，供應某家人吸煙，燒好了煙，又馬上趕到別家，兼做扞手。其對象是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或病人，或是因人手少，離不開店的小商店商人，有些則是不能公開到煙館的婦女。由於送貨上門吸食方便很容易製造出新癮客。<sup>77</sup>在四川成都，又叫做兜兜煙館，賣煙之人手提兜兜，內裝煙具、煙膏，沿街叫賣，隨時供應需要者吸食。四川宜賓，將煙具放在竹兜，走街串巷，挨戶推銷。他們多半活動於小客棧、賭場、茶館、碼頭等地，向那些不能進煙館的癮客和賣氣力的人進行兜售。其特色是價格低廉，送貨上門，在當時很盛行。<sup>78</sup>流動煙館也出現在山巔水湄，四川的嘉陵江、沱江、岷江兩岸，岸上常擺著煙膏煙具，一等繃夫上灘即可吸上幾口，以提振精神。峨嵋山上，也常有和尚手提小箱，裝著煙膏煙具，賣給背人遊山的苦力。所以有人說，「四川山之崖，水之濱，都有煙館」。<sup>79</sup>流動煙館雖然簡陋，卻是相當便民的經營模式，適時滿足鴉片吸食者突破空間限制的需求，這也說明了鴉片消費的普及和供給鏈的完善。

中國煙館，種類繁多，功能多元，相當程度滿足煙客甚至非煙客的各種需求，不只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空間場域，更成為十九到二十世紀全球視線下的中國象徵，西方書寫中的獨特中國情調。煙館在中國已有兩百餘年，它的功能不只是提供吸煙的場所，更隨著消費者和社會互動的需要演化出各項功能。首先，它是煙客吸煙過癮的場所，也是民眾消遣娛樂的空間，後來演變為抽煙、喝酒、飲茶、狎妓的複合式休閒空間，規模較大煙館還提供賭具，成為聚賭場所；另外還有說書、唱曲餘興節目，以資娛樂。再者，大煙館也成為上流人士擺闊、講排場、展現風雅的場域，如前述上海眠雲閣、南誠信等上等煙館，豪華雅致、陳設不俗，「不但便行人之癮，實乃備文人巨賈之清玩」。因此出入其間，吸煙過癮，論詩品畫，適足以彰顯有錢、有閒、有品味的身份地位，正是「煙雖食，人之不鄙」。<sup>80</sup>此外，煙館也是宴客、談生意、交際應酬、信息交換和流通的地方。既是休閒空間，也是社交空間，即便沒有吸食習慣，也會到煙館宴客會友，談心遣懷，或議事商談，交換意見，「這吃鴉片，在煙館裡有幾種好處：第一是散心，第二是

---

<sup>76</sup> 田梅村，〈舊社會鴉片煙業在漢口〉，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507）。

<sup>77</sup> 楊國治，〈西康省雅屬的煙禍〉，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 59）。

<sup>78</sup> 宜昌市政協文史辦公室，〈宜賓煙貨紀要〉，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 156）。

<sup>79</sup> 吳雨、梁立成、王道智，〈舊中國煙毒概述〉，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35）。

<sup>80</sup> 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191）。



可以聽得新聞，第三是吃煙的伴侶多，不愁寂寞。若有了什麼疑難之事，到煙館裡訪問幾個老者，可以商量出個計策……你看那麼多訟師，經手詞訟事件，不多是在煙館裡面會話的嗎」。<sup>81</sup>可見煙館的社會互動和社會溝通功能，它不是特定使用者的特殊空間，而是社會一般對象的日常生活空間，任何人都有進入煙館的機會。由於這種跨越吸煙功能的複合式空間，使得不少人在交遊酬酢之際，不經意沾染了煙癮，這是中國鴉片吸食者不斷遍及的原因之一。最後，煙館尚可做旅館之用，四川煙館林立，任何偏遠角落，即便沒有旅館、飯店，也有煙館座落。找不到旅館、飯店住宿、吃飯，可找煙館解決食宿問題，<sup>82</sup>順便抽煙過癮。

（五）、鴉片運銷網絡。中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鴉片要能無所不遺的深入內陸，必然要有完整暢達的運銷網絡和轉銷機制，才能迅速將鴉片運往各地銷售。從道光到 1930 年代，鴉片運銷路線包括洋鴉片和土產鴉片，不同時期有不同網絡，主要有下幾種運銷網絡：

(1).鴉片運銷通路在道光年代，從廣州到其它省份有三條鴉片路線：(a).向西通過肇慶由水路運往廣西和貴州；(b).向東通過潮州和惠州運往福建；(c).向北則先集中在航運中心的曲江和毛婺源，然後通過樂昌轉入湖南，通過南雄轉入江西。<sup>83</sup>這三條通路是進口鴉片進入中國內陸的路線。

(2).到了土產鴉片量產時代，鴉片運銷路徑有三條：(a).西北（甘肅、寧夏、山西、陝西）鴉片東運，在華北、京津一帶大量銷售；(b).西南地區（雲貴川）鴉片經長江順流而下，匯總於武漢上海，分銷於華中、華東各地；(c).雲貴川的鴉片，經湖南進入華中地區。這三條路線則是土產鴉片的運銷路線，形成西北、西南地區鴉片往內輸送的局面，有別於過往鴉片進口時代，由東南沿海進入中國，再轉往中部、西部和北部。<sup>84</sup>

(3).1920 年代羅運炎則歸結出五條鴉片運銷路線：(a).長江道。雲、貴、川三省之鴉片以漢口為集中點，轉運其它口岸銷售；(b).津浦道。由安徽及鄰境運往寧夏、上海；(c).京漢道。由西北各省運往天津、漢口等地；(d).海洋道。由香港、廣州、福州運往江浙各省；(e).貴黔道。由雲、貴運往兩廣。<sup>85</sup>

(4).到了 1933 年國民政府推動「兩年禁毒、六年禁煙」運動期間，鴉片只許

---

<sup>81</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1984: 58)。

<sup>82</sup> 吳雨、梁立成、王道智，〈舊中國煙毒概述〉，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7~8)。

<sup>83</sup> 張馨保(Chang Hsin-Pao)，《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1989: 35)。

<sup>84</sup> 洗波，《煙毒的歷史》(2005: 111~112)。

<sup>85</sup> 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 91)。

公運，不許私運，當時的公運路線有四：(a).川貨鄂運。大部分集中於萬縣，經宜昌到漢口。間有少數由宜漢、開縣等處達老河口。川貨公運入鄂，只以宜昌、老河口兩地為限；(b).滇貨在滇集中於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經重慶轉鄂，一路由貴陽經洪江轉鄂。黔貨則集中於安順、貴陽兩處，一路由赤水經重慶轉鄂，一路由下司經洪江轉鄂；(c).陝甘西貨產於甘肅者，集中於蘭州、平涼；產於陝西者，集中於西安、潼關。這裡的西貨北出晉綏、南出豫鄂皖。實行陝甘聯運，以蘭州到西安公路，及西安到潼關鐵路為公運路線；(d).西陝口設收稅機關，一由四川宜漢、開縣等地經萬源、大竹河入陝之安康、商州、商南以運西陝口；一由四川之宜漢等地，東行入鄂，經鄂之王家河、羊尾山，以轉西陝口。<sup>86</sup>不管是進口鴉片還是土產鴉片，鴉片經銷網絡相當密集而完整，源源不絕的供應龐大消費者鴉片需求，這也是為什麼道光時期，鴉片已深入中國內地各處。

(六)、趕煙會。煙會，又叫煙場或煙集，是每年定時出現，鴉片收割後買賣交易的市集。這是鴉片貿易中相當獨特的活動，盛行西北、西南罌粟種植地區。每年罌粟收割季節，農村開始活絡，大量農民、割煙工人和臨時勞工投入罌粟收割工作，農村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各地商販、說書唱戲娛樂團體也聚集到罌粟產區，呈現短暫的繁忙農村景象，並形成熱鬧的鴉片交易活動，煙會，煙集。例如1930年代河套地區，「每年收穫季節（農曆七八月間），在整個種煙的河套農村，如同趕廟會一般熱鬧非凡。在煙地周圍，有打玩藝兒賣唱的，有賣瓜果吃喝的。在較大的村落鄉鎮，還有搭台唱戲的。民間藝人趕煙市，為賺錢，圖吸煙」。<sup>87</sup>煙會雖然是鴉片交易活動，但顯然在貿易之外，更令人雀躍、難忘的是伴隨買賣交易而來的大眾娛樂活動，成為一場民間的節日慶典。甘肅天水煙會也是這般情形，每年五六月間罌粟陸續開刀割漿，拉開煙會序幕，「這時城市大量無業貧民和勞力勞動者，都到農村趕煙場打短工。小商小販也備齊農村所需各樣貨物，到鄉下煙場換煙土。城裡說書的、唱戲的、算卦的、裝水煙的，也都紛紛下鄉趕煙場……縣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鄉，勒收畝捐藉機發財，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sup>88</sup>

在這煙會裡，我們仿佛看到一幅民間百工圖，各式各樣的團體匯聚一起，透過煙會大賺一筆，短暫的移工、遠來的煙販，趁機撈錢的娛樂團體，還有藉勢打秋風的官吏，展現活絡的市場交易和底層社會強韌的謀生景象。蒙古五原縣，「在種煙的年代裡，農村的商品需求量和購買力在割煙季節要出現一年的最高峰。那時鴉片的豐歉決定農民一年的命運。所以農民為了迎接和祝賀這個決定命運的季

<sup>86</sup> 蕭覺天，〈蔣介石禁煙的內幕〉，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257~258）。

<sup>87</sup> 李希賢，〈舊社會河套地區鴉片煙害〉，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202）。

<sup>88</sup> 竇建孝，〈天水鴉片流毒見聞〉，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565）。

節.....自己家內也要改善生活，有的還給兒女添購一些入時的衣著..... 爲了表示祝賀，二人台班子表趕赴農村演出.....輕歌曼舞，笙蕭伴奏，人笑人語，看起來也是賞心樂意，喜氣洋洋」。<sup>89</sup>煙會可以讓各方人馬趁機賺一筆，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些人對煙會的期待，期待有所收獲進而從事平日不可能的消費活動。透過消費購物，犒賞辛勞、慶祝豐收，煙會成爲購買力最旺盛的時節，伴隨著餘興節目，每個人臉上漾出滿足笑容。而甘肅靖遠的煙會就像是一個商品百貨展，到煙會除了買賣鴉片外，大部份人可能是看五光十色、眼花撩亂的各式商品貨物，趁著節慶氣氛，在商品世界裡，放肆消費，解放自己，「當時最時興的日用品，例如化妝品、生髮油、花露水絲織襪子，天津禮服呢的婦女尖腳鞋等都是普通貨。城鎮街道上，京貨攤子排比擁擠，五光十色」。<sup>90</sup>就在這時機才有機會觀覽和消費這些平日難得一見的時髦商品。

煙會也帶動周遭經濟活動，活絡當地商業機能，諸如旅館、飯店、百貨行號等相關行業都跟著起動，人們置身其中瘋狂消費和享樂。不過錢財的流動，也招來宵小覬覦，劫盜之事層出。四川宜賓煙會景況，「旅館食店，生意也特別興隆，各種日用品、食品應有盡有.....隨著生意而來，便是吃喝玩樂，煙酒娼賭混跡其中.....煙販們這種瘋狂和享樂，往往伴隨另一種樂極生悲。那就是煙會期間，搶劫與暗殺不斷發生」。<sup>91</sup>而在物價上漲，幣值貶低時候，煙農不要政府發行的紙幣，而要煙販帶去的金、銀、鹽、布及其它百貨或日用品，形成以物易煙方式進行交易。<sup>92</sup>至於煙會裡的鴉片怎麼交易買賣，在蒙古赤峰縣，買煙的人擺攤收購，賣煙的沿街兜售，透過視覺、嗅覺、觸覺的驗貨過程，視品質議價、成交。並就地處理生鴉片，然後再運走，「集市路邊擺著一排排收煙攤.....他們坐地擺設短腿桌子，上面旋轉大煙燈.....以招徠賣煙的農民.....一到集日，賣大煙奶子（生鴉片）的人很多。他們拎著罐子、缸子，也有牽著毛驢馱著裝有剛曬成的稀煙土，到處求售，也有給本地主顧，東家送貨上門的。收售鴉片必須用煙燈、扦子等工具把煙奶子或煙土經燒烤後冒出煙霧，再加吸嗅捻看，以鑑別品質優劣高低，最後議價成交，過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鴉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時運走，而本地戶則加工後儲藏起來，相機高價出售或轉運外地」。<sup>93</sup>四川西昌，「煙會長短不一，一般延續一個月左右.....街沿坎上滿是大缸小鉢的生煙.....每會交易量都在300萬兩以上」。賣煙的除西昌本地農民外，還有外地來的。買煙的多數來自四

---

<sup>89</sup> 李子英，〈五原煙毒史話〉，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210~211）。

<sup>90</sup> 張慎微，〈靖遠的煙場〉，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574）。

<sup>91</sup> 宜昌市政協文史辦公室，〈宜賓煙貨紀要〉，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139）。

<sup>92</sup> 宜昌市政協文史辦公室，〈宜賓煙貨紀要〉，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139）。

<sup>93</sup> 李心平、王洪武，〈鴉片煙毒在赤峰〉，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220~221）。

川內地，「其中又以軍政要員的代理人為多，西昌軍政人員則親自上市收購。這些當官作吏的不僅自己需要，而且發家致富」。<sup>94</sup>會期不算短，交易量不算少，可見鴉片買賣是相當有活力的經貿活動，暢旺的毒品經濟。而這毒品經濟連政府，也就是禁煙當局，都堂而皇之涉足其中，私用、謀利毫不掩飾，無怪禁煙無了時。上述這些煙會地區，也是鴉片氾濫成災，地方政府打著禁煙名號，強徵五花八門煙稅最嚴重的地區。例如四川宜賓軍閥劉文彩當權時代，以川南稅捐總局名義徵收特稅，特稅即包括鴉片種運售吸等稅的總稱，名目繁多，每年收入超過其它稅的總和。在寓禁於徵政策下，劉氏打著禁煙旗號，大肆刮削民財，納為私產，又肆無忌憚大做鴉片生意。<sup>95</sup>這種現象在二、三十年代普遍出現於其它各地，這也說明為什麼煙會盛行，鴉片交易如此熱絡。

趕煙會是鴉片生產地區年度盛事，它已成為農村例行節慶活動，這是結合買賣與娛樂，貿易與慶典的農村活動。農民、煙販、官員、說書、戲子、盜匪、娼妓，乞丐，社會各式各樣的人在鴉片收割販賣期間全匯聚在這一活動場域裡，進行各式買賣交易、休閒娛樂、購物消費或不法勾當。這雖是個可讓大家大賺一筆的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更是年度消費的好日子。煙會就像商品展覽會，各式日用百货盡在眼前，呈現一時繁華，逛展購物成為一年辛苦的解放。在生活貧困、單調的西北、西南農村地區，煙會意外的創造了鴉片貿易之外的休閒、消費的繁榮盛景。一方面展現鴉片交易的活絡，另一方面在這場域裡也看到亂世浮生中庶民生活的一片生機，帶著歡欣、滿足的笑容。

從外海儲貨的躉船，到大小窯口進貨，轉銷批發、零售商，再到各地煙土店、挑膏店，最後到煙館或吸食者手上，鴉片運銷體系嚴密，供應鏈完整，讓中國成為鴉片帝國，既創造也滿足千百萬人的鴉片消費需求，讓更多人既享受也依賴這種商品。它也形成以鴉片銷售為中心的經濟生活，這種經濟生活深植民間，如煙會活動，有其活力和庶民特性，跟人民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因此，從鴉片經銷網絡和交易方式，所形成的經濟行動和生活方式，已是民間日常生活實踐的一部份，它既呈現豐富的行動生活，也不容易被拔除根絕。杜絕鴉片無疑是要將這部分生活經驗和生命情感從中挖除。這是反鴉片消費運動困難之處。

#### 四、為什麼吸鴉片：鴉片的消費需求

中國有龐大的鴉片消費人口群，究竟為什麼要吸鴉片，也就是消費動機為何，這是許多人感到有趣或不解的課題。盧公明在福州傳教時很不解，中國人不

---

<sup>94</sup> 林如淵，〈西昌鴉片禍害一瞥〉，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99~100）。

<sup>95</sup> 宜昌市政協文史辦公室，〈宜賓煙貨紀要〉，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151）。

是不知道鴉片的毒害性，他們對鴉片深惡痛絕，但爲什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使用這種他們打從心底痛恨的毒品？後來他遇到一位中國讀書人，給他這樣一個答案，「這肯定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摧毀這個民族。除此之外無法解釋中國人爲什麼這麼喜歡鴉片」。<sup>96</sup>這當然是一個中國讀書人對鴉片無能爲力時的宿命式吶喊，也暗暗指控西方人帶進福音外，也帶進鴉片毒害中國。中國人爲什麼要吸鴉片，或許鴉片有它的魅力和功能，剛好契合中國的需要，使得中國人明知其害，卻得以從中各取所需，找到出路。我們先看史景遷的說法，<sup>97</sup>史景遷細分不同身份人口群的吸食動機，最早接觸鴉片的群體就是皇室宗親、太監，他們之所以吸食在於權力失落感，亦即他們不再像前朝一樣，握有大權。既無權力操弄，生活悠閒卻又乏味，很容易就掉入鴉片這新鮮事物的誘惑，做爲新的休閒逸樂。文人、幕府、官僚，是宮廷之外最早接觸鴉片的群體，這些人吸食鴉片主要是想從仕途挫折和家庭壓力中解放出來。而一些身處滿清異族，身感屈辱的漢人，則是透過鴉片暫時逃避不滿的現實。至於軍中士兵，因爲生活枯燥，無所事事，或爲了不被派往戰場而吸食鴉片。商人希望借助吸食鴉片讓頭腦變聰明靈活，俾益商場競爭，同時鴉片也是招待賓客，社交應酬的潤滑劑。對考生而言，有助考場應試。對富人而言，爲了杜絕孩子在外放蕩、鬼混、賭博，成爲敗家子，所以讓孩子在家吸食，上癮後就不會往外揮霍。至於窮人吸食鴉片，主要是爲了消除疲勞，提振元氣體力，以便再投入工作。

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est Faber)在 1884 年的著作中指出中國人吸食鴉片原因，「或因案牘勞形，藉以爲提神之具；或因身體羸弱，藉以爲調補之劑；或因名場利，藉此消愁；或因工作苦辛，聊思活絡」，「尤可恨者，浮蕩少年，煙花娼妓，或金樽倒罷，假爲解酒之媒；或錦帳低垂，恃作探陰之戰」。<sup>98</sup>也就藉鴉片提振精神、藥補身體、逸樂解愁，或做爲壯陽春藥之用。英國傳教士德貞(John Dudgeon)在 1869 年《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爲文分析中國人吸食鴉片的原因：借鴉片去除病痛；生活庸懶；借鴉片驅逐心靈空虛；打發時間；政府無能管制；官員貪污。<sup>99</sup>美國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對中國人吸食鴉片的見解，他認爲中國人嗜煙主要原因是生活缺乏情趣所致。所以中國人往往沉溺於吸鴉片和賭博中，藉此調劑單調沉悶的生活。羅斯更進一步指出，中國人的生活沉悶而單調是因爲在最少的土地上養活最大數量的人口造成的。<sup>100</sup>羅斯這一地小人稠，以至生活單調無情趣，最後靠鴉片解悶的說法，相當特殊。他指出了生活條件，決定生活方式和休閒餘樂方式的現象。此外，菲律賓鴉片調查委員會曾在其報告中指出，中國人的娛樂活動匱乏，人們沒有戶外活動習慣，整個國家

---

<sup>96</sup>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otting About Chinese) (1865) (2009: 416)。

<sup>97</sup> 史景遷，〈鴉片〉，《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2005: 279~280)。

<sup>98</sup> 花之安(Ernest Faber)，《自西徂東》(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 (2002: 67)。

<sup>99</sup> 轉引自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2004: 30)。

<sup>100</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85)。

處於單調和沉悶狀態中。單調和沉悶逼得高加索人酗酒，在中國則迫使人們吸食鴉片。所以中國人所剩下的願望，就是在溫和和平靜中消磨時光。至於那些沒有閒暇的窮人為什麼吸食鴉片？主要是他們經常處於饑餓狀態中，而鴉片能消除饑餓或強烈食欲所帶來的痛苦。加上吸食鴉片時人們所產生的平靜舒適感覺，也就不難發現貧窮的中國人為什麼會吸食鴉片。從這些現象來看，煙鬼應是人們憐憫的對象而不是被鄙視的怪物，正因為處境困難，才不得不吸。因此，中國若比其它民族更容易染上鴉片惡習，而且處於這種惡習中不能自拔的話，就是因為富人生活單調和窮人生活悲慘所造成的。<sup>101</sup>

上述是從中國的休閒娛樂環境和經濟條件來解釋富人、窮人吸食鴉片原因。事實上，中國的休閒娛樂方式相當多，<sup>102</sup>生活不怕單調無聊。應該說鴉片吸食是一種全新的休閒逸樂形式或自我享樂方式，它不同於以往既有的感官享受和身體經驗。或許正是鴉片吸食這種享樂經驗，契合當時中國的社會情境和氛圍，亦即在戰亂頻仍和動盪不安中，透過鴉片尋求身心的暫時平靜。使得鴉片成為多數人的消遣方式。因此，富裕有錢人為了享受和消遣而吸鴉片，至於貧窮的下層勞動者，則是為了紓解疲勞，提振精神，逃避壓力而吸鴉片。1866年一位在台灣的外國人記述中下階層吸煙情形，「他們似乎多半是把吸食鴉片當成能使他們能夠支持一天工作疲勞的一種刺激品，而不是把鴉片當做享受品。在通往台灣府的道路上的各個休息地點，都可以看到轎夫、挑夫和勞動者在繼續挑抬之前，都要抽鴉片」。羅斯也記載苦力以鴉片消除身心疲累苦痛的情形，「飯後，這些可憐人（苦力）便蜷縮在爛蓆上，依偎在小煙燈旁，一邊滾動著黑黑的煙團，一邊吞吐著濃濃的煙，漸漸地便消除了冰冷、痛苦、勞累的感覺。他們就是這樣用鴉片解除自己的痛苦」。<sup>103</sup>事實上，這些苦力靠吸鴉片來重振體力精神，俾以再度投入工作的方式，經常出現在鴉片描述中。

1938年顧頡剛到西北考察，在甘肅漳縣見到「滑杆夫皆黑籍中人」，而其所雇輿夫病不能行，問明原因是乃無鴉片可抽，軟弱無力，無法肩輿。<sup>104</sup>有人對蘭州人力車夫做調查，由於他們終年勞累，「以故藉以興奮精神者甚多。據聞嗜大煙者，約佔全數三分之二」。<sup>105</sup>就此而言，鴉片成為苦力的活力來源和生計依靠。鴉片對富裕人家是揮霍無盡時間和無窮金錢的炫耀消費，或高雅品味展現，在自家建置精美雅潔的煙室消磨時光。對貧窮勞動階層而言，吸鴉片是困窮勞頓

---

<sup>101</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86-87)。

<sup>102</sup> 有關清朝休閒娛樂形式的研究可見，林永匡、袁立澤，《中國風俗通史：清代卷》(2001: 440-501)；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2008: 16-49)；李長莉，《晚清上海》(2010: 173-232)。

<sup>103</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87)。

<sup>104</sup>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2002: 209, 231)。

<sup>105</sup> 〈蘭州人力車之調查〉，《西北日報》，1934年3月29日。轉引自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46)。

的唯一慰藉，是勞動生產的資源，特別是沒錢看病拿藥時，它可以是治百病的萬靈丹，吸一口煙有數舉之得，對這些人而言，廉價土產鴉片，甚至是回收的煙渣、煙灰，並非爲了單純的消遣逸樂，而是工作生存之所必須。困頓生活和卑微生存成爲他們不得不染癮的原因。特別是海外華工，鴉片更是他們必要的工作麻醉藥，除了尋求心靈慰藉，消除疲勞和疼痛外，還可用來預防痢疾、寄生蟲感染，減少瘧疾、傷寒等疾病上身，在沒有任何醫療保健的地方，鴉片解決了這些迫切的問題。對華工的雇主而言，讓苦力吸鴉片，才能榨出更多勞動力，收回更多勞動成本，對苦力而言鴉片是艱難生活中唯一樂趣，但也讓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長期依賴鴉片，吸食成癮，又負債累累，無法脫離這種束縛，也無法脫離雇主，終其一生如此。<sup>106</sup>同樣吸食鴉片，富人和窮人展現不同的鴉片生命情境，一是透過鴉片在享樂中耗掉生命，一是借助鴉片在勞動中磨損生命。

郭嵩燾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吸食之風盛行，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不事生產，苟且偷惰的閒民太多。閒民終日無所事事，只有吸煙度日，最後民窮國弱，「中國重士而輕農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職業者不逮百分之一，閒民居其九而又過之，民安得不窮，國安得不弱？所以盡人吸食鴉片，始由閒民之多，而終一出於懶惰苟偷」。<sup>107</sup>這種閒怠吸食致癮的看法，不只郭嵩燾，也是當時社會輿論，「夫原煙之所以有癮，大抵由於空閒無事，藉此爲消遣之資」，若想要戒煙，「莫如使其身少閒暇之時」。<sup>108</sup>事實上，閒民有兩類，有錢有地位的閒民和沒錢又不事生產的閒民。前者吸鴉片炫耀有閒有錢，成爲高雅品味，形成社會風尚；後者跟著風尚走，雖也吸食，卻成爲民窮國弱的主要歸咎對象，這適足以反映消費的階層差異。到了1928年，馬寅初的演講認爲，「吸煙的原因，有的是爲著消遣，有的是爲著療病，有的是當做普通吸煙，有的是當初毫不爲意隨便玩吸，因而日久成癮欲斷不能的」。<sup>109</sup>消遣、療病、不經意的吸食，這些都是相當普遍的原因，在日常活動中隨時可遭遇到，要不沾染鴉片，顯然很難。即便守禮儒士，也避不掉。王韜就說，「片介（鴉片）之毒，靡人不嗜。雖有一二守禮之儒，亦難救正」。<sup>110</sup>王韜身爲開明知識份子，自己就逃不掉。正因如此，鴉片消費構成國家治理問題，龐大的鴉片消費群和廣泛的地理區域，不分身份地位、階層屬性、年齡性別完全投入黑霧漫天的鴉片世界裡，結果招來，「壞身體」、「敗子弟」、「喪

---

<sup>106</sup> 卡爾·特羅齊，〈東南亞的毒品、稅收及中國的資本主義〉，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0: 99~104)。

<sup>107</sup> 郭嵩燾，《郭嵩燾記禁煙公社活動》(四)，《郭嵩燾日記》(第四卷)(1982)，轉引自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12)。

<sup>108</sup> 〈戒煙說〉，《申報》，1906年3月23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84)。

<sup>109</sup> 馬寅初，〈談禁煙〉，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 35)，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53)。

<sup>110</sup> 王韜，《瀛海雜誌》(1969: 9)。

品行」、「傾家產」、「誨淫盜」、「絕後嗣」六害。<sup>111</sup>鴉片成爲「病國害民之巨患」，<sup>112</sup>不得不成爲國家管治、禁制對象。鴉片消費進入政治領域，糾纏於個人享樂和國族命運之間，形成拉鋸最久的消費戰爭。

## 五、鴉片之用：日常生活的經驗

在消費政治脈絡下，鴉片雖被界定爲毒品，成爲國族發展大敵。然而在社會，它的物質生命卻非常多姿多樣。它不只是消閒娛樂商品，更與人民生活緊密結合。這也說明爲什麼鴉片消費普及於社會各階層，鴉片成爲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即便不接觸者也不能忽視它的存在。鴉片的物之用，已成爲相當廣泛的日常生活現象，其用途有下：

(一)、在鴉片還是稀有奢侈品時，它成爲官紳富豪的炫耀品，展示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對物的品味，形成有閒階層的炫耀性消費。這種炫耀性消費構成社會追逐的時尚風潮，特別是官紳文士自來皆是地方意見領袖，具有引導社會風氣的作用，其身教言教自爲社會效法指標。當鴉片消費成爲上層人士風雅之事，這種尚雅之風自然風行草風偃，由上而下傳染到各階層。鴉片流風所及，「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sup>113</sup>鴉片做爲炫耀性商品掀起時尚仿效之風，對鴉片消費普及起著關鍵作用。

(二)、做爲交際應酬招待品。鴉片既是時尚商品，用來做爲交游宴客招待品，成爲光彩、體面之事。美國傳教士盧公明在福州時觀察到這一現象，「朋友間經常在談論正事之前先吸上一兩鍋，或在聊天時抽幾口做爲調劑。在社會上層人士中，請客人抽鴉片已成爲流行的款待方式。就像三四十年前美國紳士招呼客人來一杯白蘭地活蘭姆酒一樣，儘管還不是那樣普遍，但至少是同樣的時尚」。<sup>114</sup>確實，以鴉片招待朋友賓客已成爲一種時尚，一種時下流行的款待方式，不只讓自己有面子，也讓對方備感尊重。因此，「中等以上住戶，每以鴉片款客爲榮」，<sup>115</sup>鴉片甚至連嗎啡、海洛因都是「最時髦的應酬品，爲款待上賓不可缺少之物」。<sup>116</sup>不少家庭，不管有沒有吸食習慣，都須備妥煙膏、煙具，用以招待來客。否則可能惹來招待不恭之譏。至於商務應酬、朋友往返，鴉片也成爲人際關係潤滑劑，在煙霧迷濛中，彼此放鬆戒心，讓生意談得更順利，情懷更易抒解。煙館不只吸煙，更是社交商談空間。而幾乎各類型的公共休閒場所都得備上鴉片，供來

<sup>111</sup> 〈鴉片說〉，《申報》，1872年5月16日。

<sup>112</sup> 《萬國公報》，1877年，轉引自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28)。

<sup>113</sup> 1838年(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54~255)。

<sup>114</sup>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otting About Chinese)(1865)(2009: 413)。

<sup>115</sup> 羅運炎，《中國禁煙問題》(1934: 68)。

<sup>116</sup> 羅運炎，《中國禁煙問題》(1934: 68)。



客享用。正因為鴉片成為社交商品，吸食鴉片也成為社會互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更加促成鴉片的日常化和自然化。不管有沒有吸食習慣，都可能或多或少接觸鴉片，甚至逐漸染上煙癮。中國鴉片普及，日常生活互動中形成的吸煙習慣，扮演重要角色。

(三)、鴉片做為嫁妝/聘禮/饋贈品。擁有鴉片多寡，往往成為家境富有與否的象徵。羅斯記載了在雲南看到的現象，在那裡人們商定婚姻問題時，所要瞭解的就是「這個家庭有幾桿鴉片煙槍」。鴉片煙槍的多少成為衡量某一家庭經濟狀況好壞標準。<sup>117</sup>鴉片因此經常做為男女婚嫁的聘禮或嫁妝。彭養鷗《黑籍冤魂》即描述一位富家千金，本身就是煙鬼，出嫁時，妝奩還要備妥上好的煙具、煙膏陪嫁夫家。<sup>118</sup>這也說明吸鴉片對婦女而言已屬家常便飯。至於以鴉片做為饋贈品，經常出現於官場、上層社會間。到了1925年前後的北京，「官僚吸煙之盛，又為他省所不及。往來饋贈，視為無上禮品」。<sup>119</sup>這可見之1925年湖北某官員五十壽辰，各地官員送的賀禮就有不少是鴉片。此外，鄉紳富豪送禮應酬，打通關節，饋送鴉片亦屬常見之舉。<sup>120</sup>

(四)、具有保值、儲蓄，做為財產功能。鴉片具有保值功能，特別是在幣值浮動年代，保有鴉片如同保有黃金，故而鴉片有烏金之稱。更有投機者囤積鴉片，等價高時再拋售。因此有「商業金融資本，也視煙為利藪，趨之若鶩」之說。民間也常以鴉片做為價值標準來折算，如某商品值多少兩煙土。<sup>121</sup>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濫發貨幣，物價暴漲，貨幣貶值，在四川宜賓，「不少銀行、商號以及殷實人家，多以鴉片做為『保險儲蓄』，囤積居奇」。<sup>122</sup>這裡也見鴉片直到抗戰之後仍是社會的重要物資，並不因長年的禁煙政策有所影響。鴉片強韌的社會生命力可見一般。

(五)、鴉片具貨幣功能。鴉片做為一種商品卻具有貨幣功能，它成為支付手段和交換手段，受到廣泛使用。商人旅行或進京應考士子攜帶鴉片，做為白銀的替代，取其輕便又安全。此外鴉片也常用來交換或購買茶葉、生絲；鴉片訂單也可以當做貨幣使用，外國人常在上海用白皮土訂單償付他們向中國人購買絲茶的欠款。1850年代前後，上海中外商人發展出「蘇州制度」，中國商人從上海帶

---

<sup>117</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85)。

<sup>118</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1984: 37~38)。

<sup>119</sup> 中華民國拒毒會編，《中國煙禍年鑑》(1925秋~1926秋)，轉引自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354)。

<sup>120</sup> 朱慶葆、蔣秋明和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180)。

<sup>121</sup> 朱慶葆、蔣秋明和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177~179)。

<sup>122</sup> 宜昌市協文史辦公室，〈宜賓煙貨紀要〉，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 132)。

鴉片到蘇州產絲區換取生絲。<sup>123</sup>「鴉片提貨單已成為一種臨時的紙幣，可以代表一定數量的貨幣，最後交付的不是現金而是鴉片」。<sup>124</sup>

(六)、藥品。鴉片就像萬靈丹，用來治百病，常見如治療瘧疾、腹瀉、咳嗽、疫疾、咯血、壯陽等。這是鴉片用途最廣，也最深入民間的止痛藥品。中國醫療衛生環境不佳，看病對有些人並非易事，特別是在農村偏遠地區，農民生活水準低，衛生條件又不佳，患病人口必多，卻又無妥善醫療機構。鴉片在這時候無疑扮演日常生活中「自我治療」(self-medication)的角色。<sup>125</sup>它仿佛成為最方便、最貼近、最有效率的家庭醫師。特別是土產鴉片盛行，鴉片價格低廉，對貧窮者而言更是照顧身體、預防疾病、提振精神的良方。這種情形在英國也一樣，鴉片對勞工階級而言，就像是隨手可得的萬靈丹。<sup>126</sup>在中國由於它的便宜、便利和一時的止痛緩解功效，擴大了鴉片的普及性，使得治病變成染癮，許多沒有吸食習慣的人，就因這樣成為鴉片癮者。「有人最初是因為牙疼、頭痛或胃病，在朋友建議下試吸鴉片對付疼痛。疼痛確實緩解了，但卻付出鴉片成癮代價。當成癮之後原先鎮痛效果也越來越微弱，只能一再加大吸食量」。<sup>127</sup>

有人遊歷甘肅時，見煙災漫天遂問農民，「三餐尚不飽，何苦吸煙。十之八九，皆答以養病時養成」。<sup>128</sup>當時報上有文章提出檢討，由於「農村人民為吸煙治病而成癮的為數眾多，這都是農村醫療機構的缺乏造成的」。<sup>129</sup>蘭州最早的西醫醫院基督教博德恩醫院，積極投入鴉片煙癮患者治療工作，該院 1916 年的年度報告就指出患者因治病吸鴉片染癮的普通現象，「許多鴉片吸食者都是因為得病，被他的朋友介紹才吸煙的，這裡沒有別的方便的治療條件，只有吸一口煙才能使痛苦減輕許多」。<sup>130</sup>這段報告精準的說出煙癮普及原因和染癮一般過程：醫療條件不足，在朋友介紹下吸煙自療，煙可療痛，最後上癮。也就是前面討論鴉片做為「自我治療」角色引發的後遺症。治病成癮已成普遍現象，是不少人的日常經驗，嚴復、唐紹儀都曾因病痛而藉助鴉片。鴉片由萬靈丹變成慢性毒品，英國傳教士德貞特別提出警告，他指出鴉片做為治病之藥，除了暫時消除疼痛外，沒有什麼療效，更不可能預防疫疾感染。因此不要再拿鴉片當藥用，以免上癮反

<sup>123</sup> 郝延平，《中國近代商業革命》(1991: 60~67)。

<sup>124</sup>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962: 406)。

<sup>125</sup> 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74).

<sup>126</sup> Berridge, Virginia, *Opium and the People: Opiate Use and Drug Control Polic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1999: 35~38).

<sup>127</sup>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otting About Chinese)(1865)(2009: 412~413)。

<sup>128</sup> 見林鵬俠，《西北行》，(2002: 198)。

<sup>129</sup> 王鏡銘，〈中國農村毒品蔓延原因的探討〉，《大公報》，1930年11月29日。轉引自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51)。

<sup>130</sup> Dr. Parry,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Report of the Work for the Year 1916*. 轉引自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125)。

而殘害身體健康，同時也駁斥西方以中國有醫療需求才輸入鴉片的藉口。<sup>131</sup>

(七) 自殺毒物。鴉片做為自殺的毒藥，經常見之於西方的中國遊歷見聞錄和中國的小說中。可見中國人自殺的頻繁成為注目焦點，鴉片則是隨手可得的毒藥，也知其時鴉片之普及和氾濫。羅斯提到中國婦女自殺率高的現象，「當我們在陝西省武功縣，佈道團的婦女幾乎每天都被請去搶救這些不幸的人。她們結束自己痛苦生活的唯一辦法就是食用鴉片，因為除此之外根本找不到其它毒藥」，<sup>132</sup>這是因為中國婦女「自我壓抑的不斷努力和殘忍的情感壓抑代價太大」，因此「有無數年輕妻子輕生。鴉片收割季節，就是年輕妻子大量自殺時節」。<sup>133</sup>1894年莫理循在雲南昭通被請去醫治一位吞鴉片自殺者。他指出，在中國鴉片幾乎是自殺的唯一選擇，因為用刀等方式殘害身體就是毀掉祖先給他的完整身體，將來必遭嚴厲懲罰。根據他的觀察，中國是個自殺國度。中國自殺比例高於其它國家。因為生存艱辛，人們渴望擺脫這種負擔。另外，有多婦女自殺是為名譽；有些是為復仇，死後陰靈纏繞報復對象，或讓報復對象因你的自殺而獲罪，或導致名譽掃地。發誓自殺是讓對手最感恐懼的威脅。<sup>134</sup>

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案例，如婦女丈夫長年在外，難以自持與人幽會，「密事敗露，羞愧難當，遂於黎明吞煙自盡」；<sup>135</sup>某婦人下嫁非人，怨嘆命薄，「以自己紅顏薄命，配此醜夫，有負平生，遂一時心窄，暗吞鴉片，欲了殘生」；<sup>136</sup>還有婦女毫無家庭地位，不堪家人長期虐待，「又感身世淒涼，覺人生乏味，遂萌厭世之心，乘家人少妨之際，吞服鴉片」。<sup>137</sup>我們看到吞鴉片自殺的眾生相，也看到中國婦女社會地位和生存處境的卑微多艱。廉價鴉片成為悲苦女性解脫良方，不是透過吸食出神入醉，而是透過吞食厭生棄世。至於吞鴉片自殺比例有多高，1899年William H.Park醫師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一年可能有80萬人試圖自殺，其中12萬人會成功。<sup>138</sup>德貞也從醫院的資料中看到中國人因吞服鴉片導致高比例的自殺率，這讓他感到悲憤與震驚。也更積極投入鴉片勸戒和治療的工

---

<sup>131</sup> 高唏，《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2009: 420)。

<sup>132</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90)。

<sup>133</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122)。

<sup>134</sup>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個澳大利亞人在國：1894年穿越西南，1910年穿越西北》(A Australian in China) (2007: 76~77)。

<sup>135</sup> 《西北日報》，1934年1月6日。引自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100)。

<sup>136</sup> 《西北日報》，1933年12月5日。引自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100)。

<sup>137</sup> 《甘肅民國日報》，1948年8月31日。引自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2010: 101)。

<sup>138</sup> Kathleen L.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 (1996: 43-46).

作。<sup>139</sup>鴉片成爲毒品，就染上死亡陰影，一爲享樂，精神解脫，吸食慢死；一爲自盡，身體解脫，吞食速死。鴉片毒化，如同預示死神召喚，它是對最基本的生命秩序的挑戰。就這一點即足以發動一場消滅鴉片戰爭，對抗讓人、讓國家、讓種族滅亡的鴉片毒物。

由上可知，鴉片做爲消費商品開展出豐富的社會生命，鴉片具有休閒、社交、饋贈、資產、貨幣、醫療等功能，說明它深入社會各領域的力量，它盤根錯節於日常生活行動中，成爲流通最廣，感染尤深的商品。任何常人在這社會脈絡裡，很難不接觸鴉片，或受它影響，不管它是奢侈品或是日常生活用品。我們也看到中國人吸食鴉片之多，消費之盛，構築出繁華又凋敝的矛盾消費景觀。而在消費鼎盛背後更有其結構複雜，密如蜘蛛網的銷售網絡和經銷站支撐這鴉片消費體系，其中涉及到社會龐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單單以毒品定義鴉片，難以盡括它充沛的物之用及其意義，以及讓鴉片流通的經銷體系的運作。正因鴉片的使用經驗結構化爲日常生活經驗，與生活各層面息息相關。在利害與共，休戚相關下，使得反鴉片消費運動困難重重。我們會歸諸煙癮難除，成癮行爲不是法令禁制得了。這雖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徹底拔除日常生活中必然經常遭遇的行動、經歷和記憶。鴉片是中國兩百餘年從宮廷到民間的生活重點，獨特的消費和感官經驗，從外來移植到深耕發展，呈現其強大的社會生命力和韌性，它已成爲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活方式。也正是如此，一旦鴉片消費與國家目標牴觸，就成爲恐怖難纏的致命之物。對國家而言它造成社會崩解，文化崩解，國家機體的失能。

鴉片被總體化(totalized)對社會秩序穩定有所威脅，<sup>140</sup>成爲國家集體的敵人，鴉片是中國問題的總體化象徵。它反映在這類經常出現的反鴉片修辭，「我們中國百年來的衰弱根源，可以說十分之八九是鴉片之害，我們的精神，已被鴉片征服」。<sup>141</sup>正是鴉片這國族大敵，讓帝國走入黃昏，也讓國家透過消滅這敵人重新凝聚群眾認同和民族情緒。禁止鴉片消費是一場艱困漫長的戰鬥，它既糾結著國家命運發展，也糾結了大眾生活經驗和方式。國家要改變的不只是個人的習癖、品味、感官享受或消費習慣，而是改變一代代人不分階層、性別、年齡，自上而下依附於鴉片所型構出的生活習慣和實踐模式。這也不只是個人除癮的問題，而是除去整個國家成癮於鴉片生活方式的問題。隨著鴉片消費遍及，禁制鴉片的消費政治作爲也隨之而起。鴉片消費從來沒有離開過國家法令的管治範圍。

---

<sup>139</sup> 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2009: 427)。

<sup>140</sup> Keith McMahon, *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Opium 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2: 10).

<sup>141</sup> 戴傳賢，〈禁煙與國家興亡〉(十七年十一月在全國禁煙會議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 18)，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36)。

## 第二節 食妖亡國：鴉片的消費政治

### 一、鴉片食妖：消費政治的介入

「鴉片之害，食貨之妖」。當鴉片視之為食妖，就像服妖亡國一樣，顯然鴉片已不單是個人消費或休閒逸樂的問題，鴉片已跟國祚有關。消費鴉片，如同消耗國家元氣和民族生機。問題中國正出在問題鴉片，中國問題單純化為解決鴉片的問題，消滅食妖成爲中國救亡的根本之道。在這一脈絡下，鴉片消費進入政治領域，管治鴉片和消費成爲國家的治理重心。自此鴉片使用不再是個人消費抉擇而是國家的政治考量，不再攸關個人品味習性而是政體的存續，國家有必要提供一套鴉片消費論述或準確的說反鴉片消費論述，並扮演塑造「民族品味」(national taste)的「品味教導」(teaching of taste)角色。<sup>142</sup>這種民族品味教導消費大眾要成爲一個新國民應該消費什麼，承擔什麼消費任務，才符合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目標。鴉片的消費與禁制大概是中國史上歷時最長，拉鋸最烈，投入最多議論，影響最具關鍵的一場消費戰爭。從中國或西方的歷史事實來看，消費自來就是爭議的對象，引起關注的道德議題，不管奢侈浪費是一種社會惡德或美德，或在崇奢論與禁奢令間拉鋸，背後都指向消費牽涉社會秩序威脅，道德風俗危害，身份等級僭越等問題，成爲國家管理的一道課題。

儘管在尚儉爲美的主流政策下，奢靡論者試圖說明奢侈浪費未嘗不是一種經濟美德或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消費的確有助經濟生產和促進社會之利，不必然危及國本，然而這種「去道德化」、「去政治化」的論調不管是否能持論經久，或獲得普遍社會共識和權威當局支持，<sup>143</sup>仍無法完全迴避消費攸關政治、經濟、道德命題的現象。更進一步說，其所展現的是一種Hilton and Daunton所指出的國家、商品和集體消費大眾互爲交織的消費政治關係，其所涉及的問題如，消費究竟可顛覆社會秩序，還是可透過消費將各階級或社群整合進一國家；什麼樣的物品會引發特定的道德批評（如酒、煙和毒品可能因造成自我控制的瓦解而受到批評），或因那些特定群體的使用致使某些物品遭到批評；消費者可做爲表達自身利益的主體還是受操控的客體？以及國家、消費者和公民權建立之間的關係，不止國家如何透過公民權的概念界定消費者應享什麼樣的權利，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更在於這種公民權和消費關係如何在國家需要下不斷的重新界定，同時也透

---

<sup>142</sup> Leora Auslander, " National Taste? Citizenship Law, State Form, and Everyday Aesthetics in Modern France and Germany, 1920~1940 ", in Daunton, and Matthew Hilton(eds),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Material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America*(2001: 109~110).

<sup>143</sup>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2007: 314~315)。

過一套國家界定的消費修辭製造出新的消費公民。<sup>144</sup>

它表現為兩類功能，一是物質文化的政治(politics of material culture)，亦即為達成共同目標，賦予消費某一特定意義或承擔某種意識形態，就像崇奢/禁奢這類我們常見的道德論調，以及構成消費的理性/非理性、正當使用/不當濫用、真實需求/虛假需求、必需品/奢侈品、追求富裕或制慾等何是何非之辨，或對低俗、不文明的娛樂形式和通俗文化的界定和禁止，同時也涉及上述物質文化政治或消費政治和公民權的關係；另一則是政治的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 of politics)，這是一種特定的消費行動，其所消費的商品構連了某種政治意義，也就是所有的政治訴求都可透過商品和購買行為進行，因此它可以是一種政治宣傳鬥爭，如消費者的杯葛行動，而國家也可以利用消費做為宣傳的形式。再者，國家經常透過日常物品風格模塑其公民忠誠度和認同感，形成日常生活美學的政治化，也就是透過日常生活的物品形式表達公民權和國家統一、族群認同的概念，因此消費既是美學的鑑賞行動，也是一種公民對國家責任的政治行動。

消費政治更廣泛的提供立基於階級、性別、種族、國家的政治認同意識，消費政治成為認同政治、族群政治、階級政治、性別政治、風格政治的場域。至於物質文化的政治和政治的物質文化兩者關係則緊密結合，前者在後者助力下得以強化和活絡，兩者共同運作成為物質政治。當然消費政治不總是受國家支配，我們不時看到消費者站在國家對立面進行消費鬥爭，不僅在國家內部爭奪消費權利，保護自身利益，同時也反抗和超越國家所給定的公民權意義。戰後歐洲的消費者運動就促使消費者思考自身成為一種個別、私己的經濟能動者，而不是完全受國家控制的消費客體。這種消費抗拒行動，普遍存在於階級、性別、年齡的文化政治鬥爭上。

上面的理論我們可以先借用葛凱(Karl Gerth)的一項研究說明消費政治在中國的一段過程。葛凱在針對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抵制洋貨，推廣國貨運動時期所做的關於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創建之間關係的研究中指出，在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存在一種普遍而深入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是影響中國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主要因素。亦即，產品具有民族性(product-nationality)，對消費者產生約束作用(中國人應該消費國貨)，形成消費的民族主義類型(nationalistic categories of consumption)，只有透過消費國貨才能形成一個定義為公民或國民的新政治集合體，以進入一個稱作中國人的國家。在此，消費主義成為創建近代中國的關鍵。<sup>145</sup>葛凱點出了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互為滲透，公民身份的構成，族群共同體的參與，消費在民族主義下肩負國族任務的性格，在這物質政治化的過程裡，個

---

<sup>144</sup> Martin Daunton and Matthew Hilton, "Materi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Martin Daunton and Matthew Hilton(eds), (2001: 1~32)

<sup>145</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13)。

人對物品的喜好、鑑識和嗜癖已不再重要，遵循國家和社會立下的選擇標準，建立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分辨本國與外國的差異，才得以納入國族共同體。特別在歷經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外交、軍事的節節挫敗，通商口岸洞開的難堪，主權不完整的羞辱，透過政府和民間組織一連串有計劃的宣傳展示活動，消費無疑被注入愛國意識形態以凝聚民族意識，抵制洋貨愛用國貨的消費之爭，轉化成另一種以貨物為場域的國家間的象徵性戰爭。

國貨洋貨之爭的消費民族化事例，還可以在鴉片禁制史上看到類似現象。亦即李鴻章提出「以土抵洋」，以土煙替代進口洋藥的議論就是一例。<sup>146</sup>儘管李鴻章讓土產罌粟種植的合法化乃出於「土煙之毒，究比洋藥為輕，而民財亦不外耗」的禁煙策略，然而據王金香的看法「對罌粟不主張禁止，不主張加重稅厘，這是李鴻章的一貫以土抵洋思想的反映，也是他在辦洋務企業中收回利權，以國貨與洋貨競爭思想的體現」。<sup>147</sup>這種奪回利權的想法，不只李鴻章，王韜也這麼認為，「鴉片之為中國漏卮，人人知之，補種罌粟以奪西人利藪，亦人人知之」，<sup>148</sup>由此可知種植鴉片以奪外國人利權成為十九世紀九〇代有識之士的信念。李鴻章的禁政是否真有以國貨抵制洋貨的想法，我們難以得知，然而兩者都是傷民耗財的毒品，論述土煙之毒較洋藥為輕，在看重稅收之餘，卻不免透露出國貨好，多用愛用國貨的言外之意。但不管真實意圖如何，都無法忽略洋貨背後糾纏著民族主義和殖民帝國主義的複雜情結，洋貨一方面象徵西方勢力、意識形態和現代經驗，透過物質對中國價值秩序和生活方式的入侵和殖民，特別是鴉片一直被視為帝國主義為擴張勢力用來毒害中國，弱化中國的物品；另一方面洋貨也是當時國人眼中深具吸引力的新奇時髦物件和昂貴奢侈品，成為上流階層到一般人消費和使用的對象。<sup>149</sup>

而對於洋貨的崇拜無疑徵示著中國透過舶來品/貿易品的使用納入世界秩序，同時也透露出中國面對外來力量衰頹無力的窘態。因此在這種脈絡下以土抵洋的策略，一方面不失抗拒外物入侵，以保國家主權；同時也利用廉價國產品替代舶來品，避免財漏之餘，也降低洋藥的稀有性和崇拜性，以逐步杜絕洋藥輸入，並構成一場土洋品味競爭，一場鴉片消費的民族抗爭。當然，這場土洋之戰的最終結局則是煙災氾濫，煙價降低，享用門檻容易，形成跨階層、跨地域、跨性別、

---

<sup>146</sup> 清代官方文件以洋藥稱外國鴉片，大抵在 1858 年中英上海通商善後條約簽訂之後。為什麼如此稱呼，有說比照過去藥材上稅之事實，另一說則是鴉片早已成為社會流毒，國家禁品。咸豐開放鴉片貿易合法化，有違國家長期禁煙政策，為掩飾不堪，只有諱其名，謂之洋藥。見王宏斌，《禁煙史話》(2000: 102)。

<sup>147</sup> 王金香，《中國禁毒史》(2005: 68)。

<sup>148</sup> 王韜，《格致書院課藝》(1891: 35)。

<sup>149</sup> Zheng Yangwen(2005: 71~73)亦指出，洋貨在十八世紀皇室、文人和高級官員間已普遍流行，道光年間不只上流階層，一般人也加入洋貨的品鑑和消，崇洋乃成為當時時尚潮流。洋藥在崇洋潮流下成為炫耀身份，標新劃異的時尚消費品。

跨年齡，無所不及，無所不在的大眾消費。這反成爲一種促進（鴉片）消費的消費民族化論述，有趣的是中國禁政就在禁制和促進消費這兩條線上平行運作，共構出禁之不絕，越禁越多的後果。

從上述的理論脈絡和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物質的政治化現象，亦即做爲物質的鴉片被賦予國族意識形態和特定政治意涵，鴉片的社會之用或文化之用特殊化爲政治之用，承擔國家命脈大計；而在這種國族化的過程中，我們同時也看到政治的物質化現象，亦即所有攸關政治的，都物質化或對象化爲鴉片，國族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都可化約爲鴉片問題。鴉片問題自來都是政治問題，國家問題，如何管治鴉片，採取反鴉片消費行動，從帝制到民國也從來不斷過，即便是弛禁、鴉片合法化、寓禁於徵的專賣時代，鴉片禁令從未廢止過。兩百多年反鴉片歷史，形成了國家對鴉片消費的意見和看法，也建立起反鴉片消費論述，這些論述充斥於官方文書和地方士紳、民間知識份子的文章中，一方面表達了他們反鴉片的識見和禁煙的作法；另一方，更重要的是從不同時期的論述中看到了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遭遇的困境和面臨的問題主軸。

因此，反鴉片消費論述的建構、發展，其實反映了鴉片帶來不同階段國族的危機和挑戰。再者，這些論述也形成國族救亡的共識，並成爲社會共識。對國家認同，民族意識，發揮凝聚作用。從消費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這些論述是國家試圖建立反鴉片、敵鴉片、去鴉片的消費品味，讓人民不再以消費鴉片爲品味，不再視鴉片消費爲社會時尚，將出神沉醉的逸樂方式摒除於外，並灌輸鴉片是亡國滅種的消費意識型態。這是一場品味政治和品味鬥爭，官方的反鴉片消費品味和以鴉片消費爲時尚的社會品味的長期鬥爭。最後，在建構鴉片爲個人恥辱和國家恥辱的操作下，在中國救亡的大敘述下，讓官方反鴉片的品味成爲社會接受的品味，或意識型態，並成爲全民共識。自此消費鴉片不再是時尚、體面之舉，而是國族的敵人。

## 二、官方品味生產：反鴉片消費論述建立

從鴉片消費的歷史命運來看，這是一段漫長的鴉片壓制史，我們所能看到最多的史料就是如何禁制鴉片，反對鴉片消費，視鴉片爲敗國亡種的國族大敵。鴉片從 1729 年（雍正七年）第一道禁令開始，就背負著污名，展開漫長的毒品生涯，儘管剛開始這「毒」並不具西方醫學毒品的藥學定義，可能只是一種毒害、流毒之意。不管是藥物之毒或社會之毒，它對中國的危害和吞蝕有甚於外敵入侵。爲了遏止鴉片蠹國會禍民，貽害永世，官僚縉紳、地方精英、開明知識份子共同建立一套維護社會風俗，國家秩序的反鴉片消費論述，既形諸法令規章，也成爲道德氛圍，社會氣候，企圖定位鴉片做爲衰弱、敗壞國家民族的眾病之源，解決鴉片問題等同解決了中國問題。在物質政治化操縱下，形成鴉片使用地位的



轉變，有了不同的社會生活命運，因此鴉片不管是做爲「消」耗時間精神的休閒品或危害財富健康的「銷」金品，<sup>150</sup>「消」的產品娛樂性格最後在國族論述下逐漸轉而爲「銷」（國本、財產、身體、精神的銷蝕）的罪責性格。

消費國族主義主要透過反鴉片消費論述的建構，形成以鴉片爲罪惡的國家或官方的消費品味，進行鴉片消費管治和品味控制，使人民的消費契合國家需要。透過這些論述，國家扮演品味教導角色，教育全民應革除什麼樣的壞品味，而國家品味的生產創造、品味的篩選排除，構成一種合法的品味政體，進行品味界定和分類排除。因此，在官方品味生產，亦即各式反鴉片消費論述下，鴉片消費成爲病態、不潔、對社會污染的惡習和壞品味，而其背後又指向更高的國族發展目標，鴉片如何成爲國族公敵。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幾個方向：（一）、鴉片與道德風俗和社會秩序；（二）、鴉片與國家財政秩序；（三）、鴉片癮和身體戕害；（四）、鴉片與立憲和新公民權之關係；（五）、鴉片與羞恥和亡國滅種意識；（六）、鴉片與國族救亡。

#### （一）、鴉片與道德風俗和社會秩序

我們從較早的論述，1728年（雍正六年）廣東總兵蘇明良上的第一份查緝鴉片奏摺來看，當時查緝鴉片重點主要著眼於「緝盜安民，淳厚風俗」的社會和道德秩序考量。蘇明良這份奏摺大概是最早說明鴉片如何吸食，如何造成身體和社會、風俗弊害的文獻。吸食鴉片會形成結黨聚眾的現象，再加上群聚吸食，往往天亮才散，從治安角度來看，勢必威脅社會秩序，國家更要防的是會不會聚眾成盜匪，甚至造成政權受挑戰。蘇明良寫道，「乃私設館舍，聚集數人，成群結黨，相依枕席，循環遞吸，夜聚曉散，夜夜如是，從無間斷」，這些吸食者日久成癮，結果傾家蕩產，相率爲盜，而這正是國家所擔心，它對地方政治秩序構成挑戰。廈門、台灣盜匪出沒頻頻就是一例，「及至家業蕩盡，稱貸無門，即相率爲盜。是廈門、台灣盜賊之盛者，皆由於鴉片之根源，是鴉片之貽害地方匪淺矣」。因此建議，「嚴禁販賣鴉片，以拯民生，以息盜源」，以及在福建省添設觀風整俗吏一員，「以厚風俗，以正人心」。<sup>151</sup>希望透過道德強化和良善風俗遏止鴉片歪風。其後鴉片一直跟這些控訴連結，如「最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sup>152</sup>「鴉片煙淫蕩人心，最爲地方之害」。<sup>153</sup>1729年（雍正八年），中國第一道鴉片禁令頒

---

<sup>150</sup> 戴沙迪(Des Forges)，〈鴉片、消閒、上海：城市消費經濟〉，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0: 187)。

<sup>151</sup> 1728年（雍正六年），〈廣東碭石總兵蘇明良奏陳嚴禁販賣鴉片以拯民生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4)。

<sup>152</sup> 1729年（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治國查禁鴉片錯混施行故入人罪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5)。

<sup>153</sup> 1730年（雍正八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覆遲延呈報查禁鴉片一事緣由摺〉，收錄於馬模貞

布，其中特別規定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以「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顯然，這規定仍著眼於道德社會秩序。「最為風俗之害，久干例禁」，<sup>154</sup>成爲這一時期反鴉片論述的關鍵修辭。「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戕軀，大爲風俗人心之害」，<sup>155</sup>「人吸之精神頗長，無惡不作，甚至吸慣欲戒不能，因而敗家戕生者甚眾」。<sup>156</sup>這兩句話，除了罪責鴉片傷風敗俗，更交待了鴉片吸食的生理反應，吸後精神暢旺，之後行爲就會失控，恣其所欲，無惡不作，久之成癮，難以戒斷，最後家毀人亡。鴉片危害正在此，行爲失序導致社會和道德秩序的破壞，吸食之後不可能是常人，更不會是君子，一旦家財散盡，就可能賣妻鬻女，或淪爲強盜、小偷、乞丐，製造社會問題，正是「本富者蕩盡家資，本貧者流爲匪類」。<sup>157</sup>到了 1813 年（嘉慶十八年）刑部議奏仍提及，「蠱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禍與鴆毒無異」。<sup>158</sup>其禍與鴆毒無異，大概就是當時視鴉片爲毒物的意思。這些論調重點不外是，「淫蕩人心」、「風俗之害」，主要在強調鴉片消費影響治安和民風良窳，造成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緊張，影響統治基礎，因此不得不予以嚴禁。

## （二）、鴉片與國家財政秩序

鴉片消費之初，雖然著眼於道德和社會秩序維護，才頒布禁令，予以嚴禁。然而，隨著鴉片走私猖獗，鴉片進口量連年增加，吸食風氣昌盛，到了道光年間，造成白銀大量外流現象，國家財政根基遭到嚴重腐蝕。1828（道光九年），監察御史章沅指出，鴉片走私夾帶進來，造成漏銀數百萬兩現象，這已非尋常之事，「至鴉片煙一物，流毒滋甚，該夷僞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此豈尋常偷漏可比」。<sup>159</sup>道光十五年漏銀更嚴重，黃爵滋認爲已二三萬兩之多，「臣查粵海關之稅，所入者不過百萬，而鴉片煙之銀，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萬」。<sup>160</sup>1838 年（道光十八年），山東巡撫經額布更指出，漏銀造成銀價高漲，影響國計民生，惟有禁煙，才能遏止，「自鴉片煙之風日熾，銀價亦因

---

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6）。

<sup>154</sup> 1807 年（嘉慶十二年），〈著刑部嚴加訊究在京售賣鴉犯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9）。

<sup>155</sup> 1810 年（嘉慶十五年），〈著步軍統領等於京城各門嚴查鴉片煙物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9）。

<sup>156</sup> 1811 年（嘉慶十六年），〈兩廣總督松筠奏報澳門夷情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9）。

<sup>157</sup> 周石蕃，〈嚴禁吸食鴉片煙示〉，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587）。

<sup>158</sup> 1813 年（嘉慶十八年），〈嚴禁侍衛官員太監買食鴉片並嚴查鴉片煙販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11）。

<sup>159</sup> 〈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奏爲請禁外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54, 55）。

<sup>160</sup> 黃爵滋〈敬陳六事疏〉，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62）。

之日昂，國計民生，動形支絀。紋銀出洋之多寡，臣雖未能確知，惟漏卮之在鴉片……是欲絕漏銀之路，必善籌禁煙之方」。<sup>161</sup>徐繼畲則進一步指出，不僅影響國計民生，更造成邊境之患，「鴉片之害，切於國計民生，近且釀為邊患」。<sup>162</sup>在一片漏銀嚴重，財政危機的憂慮聲中，朱錦琮看的更遠，他認為這是外人圖謀中國詭計，雖然鴉片造成國家財源枯竭，但更要注意，當國人嗜癮甚深，沒有鴉片不行時，一旦外人斷絕鴉片進口，嗜吸者豈非癮發不得解而亡，「言者謂其以土易銀，竭我財源，為國隱憂，似矣。又豈知彼之注意，實欲竭中國人之精神命脈，俾人無不嗜，然後鴉片截然不至，俾其引發無解，重者斃，輕者病」。<sup>163</sup>而林則徐則在道光十八年發出沉重呼籲，鴉片氾濫將導致兵弱銀荒，國將不國的慘況，「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sup>164</sup>道光年間禁鴉片的急迫性，有人認為主要出於財政的考量，鴉片輸入越多，白銀流出就越多，也造成銀貴錢賤的現象，影響國家貨幣制度和國計民生。《癮君子告白》作者德·昆西，就認為中英衝突真正問題不在鴉片，一方面，鴉片在中國並沒有氾濫的問題，這只是上流社會一小部份人的奢侈享受；再者，中國皇帝禁煙真正動機並不是道德，而是經濟，就是要制止帝國的白銀外流。所以這場戰爭根本與鴉片無關。北京政府禁煙以政治、軍事手段干預貿易，是對自由貿易的侵犯，是對大英帝國的侵犯。<sup>165</sup>

德·昆西的說法代表了鴉片戰爭期間不少外國人的意見，主要為販賣鴉片脫罪，並強調英國作為只是為了貿易交流，反而是中國阻礙自由貿易的發展。不管德·昆西認為鴉片戰爭禍首不是鴉片的說法如何，但認為中國政府為解決財政問題而禁鴉片，卻是事實。我們不難發現道光年間君臣討論鴉片問題，經常涉及漏卮的嚴重，已傷國家元氣甚深。正是出於無可禦敵之兵，無可充餉之銀的兵弱銀荒危機，促成道光的禁煙決心和行動。吸食鴉片問題，已從危害風俗人心、社會秩序層次，提昇到國家財政和國防兵備的層次。也就是鴉片消費之害已從個人、社會，升高到國家。正如林則徐指出，鴉片已從害其自身，到流毒天下，也因此其危害層面則更大、更嚴重。「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sup>166</sup>杜絕兵弱銀荒，維持政權穩定的反鴉片消費論述，成為建立國家或官方品味的有力支柱。而這時期鴉片消費造成國家

---

<sup>161</sup> 〈山東巡撫經額布奏為塞漏培本必先嚴懲興販及賄縱人犯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63）。

<sup>162</sup> 徐繼畲，〈禁鴉片論〉，《退密齋文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91）。

<sup>163</sup> 朱錦琮，〈禁鴉片議〉，《治經堂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97）。

<sup>164</sup> 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端片〉，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二）（2000: 142）。

<sup>165</sup> 德·昆西，〈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見周寧，《鴉片帝國》（2004: 105~106）。

<sup>166</sup> 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端片〉，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二）（2000: 142）。

問題的關鍵字眼，除了「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最多的就是，「漏卮」。反鴉片防漏卮，掀起了中國禁煙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鴉片行動。1838年（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為防漏卮，主張嚴禁鴉片，重治吸食；湖廣總督林則徐上奏〈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呼應黃爵滋嚴禁主張，並奉令展開查禁鴉片行動，也掀起了影響中國未來發展深遠的鴉片戰爭。這兩份文件成為反鴉片消費的力作，開啓了1939年〈欽定查禁鴉片章程〉的頒布。為官方反鴉片消費確立基調，日後各項鴉片禁令大抵不脫這次禁令的框架。

### （三）、鴉片癮與身體戕害

鴉片對身體危害至為明顯，不像鴉片對道德、社會秩序的威脅，或對國家財政的掏空，這些涉及國家統治基礎的高層次問題，大概只有政府官員和士大夫會關心，對一般民眾未必有感，用這些理由勸戒禁煙未必有效。然而鴉片造成身體的不良反應卻是任何人都有所感受。1728年（雍正六年），總兵蘇明良奏陳鴉片煙害時，就指出吸食鴉片的生理效應，「初吸之時，暈迷似醉，身體頗健，淫蕩非為，更難枚舉，是以少年子弟易墜其術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脫，縱自知鴉片所害，急欲止之則百病叢生，或腹痛而脫肛，或頭暈而迷亂，或咳嗽而嘔吐。一吸此煙則諸病立愈，精神百倍，雖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sup>167</sup>在這段描述裡顯而易見的鴉片最嚴重的生理反應就是產生上癮現象。蘇明良雖沒有用到癮這字眼，但卻很清楚的提到上癮的過程和癮候，一開始吸食時似醉非醉，卻又精神暢旺，在藥效刺激下，這時很容易放鬆自己的言行，造成行為失常、脫序現象。這段沉醉出神，放蕩身心的狀態，最容易讓人上癮不可自拔，吸食久了身體羸弱，形銷骨立，即便要終止不吸卻又發生戒斷後的身體不適效應，反而更形痛苦。於是，只有繼續吸食下去才能活著，最終靠著鴉片苟延殘喘的等死。雍正初年，巡台御史黃叔璥，在巡視台灣時見到吸鴉片的情況也指出，「吸一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肺腑潰出，不殺身不止」。<sup>168</sup>鴉片的藥性反映，顯然一開始，讓人精神奕奕，通身舒暢，因此容易上癮陷身其身，初期的愉快反應，讓一些人將鴉片當春藥用，長時期吸食，則必然造成身體敗壞，唯死方休。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朱景英在其書中，也同樣描寫鴉片的身體反應，「鴉片初服數月，猶可中止；迨服久偶輟，則困憊欲死，卒至破家喪身。凡吸者面黑肩聳，兩眼淚流，腸脫不收而死」。<sup>169</sup>

鴉片之傷身殘體，一開始流傳時即知，政府也注意到吸食鴉片的上癮反應及

<sup>167</sup> 廣東碭石總兵蘇明良奏陳嚴禁販賣鴉片以拯民生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1998：4）。

<sup>168</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1736年，乾隆元年）（1984：43）。

<sup>169</sup> 朱景英，《海東札記》（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1996：29）。

其所害之深。癮到，如不過癮，則生不如死，猶如廢人。雷瑑記載癮發的情況，「凡吸煙者，每日必有一定之時刻，過時不吸則血脈停滯，四肢疲軟，甚者鼻涕眼淚，續續而下，呵欠亦大作，俗謂之癮發」。<sup>170</sup>朱錦琮也描述，「鴉片有引，引為蠹蟲，生聚於肺，及時不食，蟲發肺脹，嗜者固倚此為命，不嗜者實視之以為讎」。<sup>171</sup>朱錦琮的癮為蠹蟲的說法，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雖然不準確，但卻可透過蟲生內臟的恐怖意象狀繪癮的禍害。侍郎黃鉞也以癮為蟲，說了一則鴉片為害之烈的故事，即便不吸鴉片者，在旁聞煙久了，也難逃噩運。某人養了一隻猴子，吸食鴉片時猴子在旁。他死時猴子也跟著一起死。於是解剖其心，查明死因，發現百蟲咬噬其心，才知癮就是蟲，蟲噬心而死，「又聞在官奴，蓄一胡孫狻，吸食常在旁，愛弄不離抱。奴死猴亦死，莫知其萌兆，怪而剖其心，蠕蠕百蟲齧，乃知癮即蠹，醫巫不能禱」。<sup>172</sup>這個解剖的故事強化了鴉片癮發的可怕，透過蟲噬心的意象，具象化癮的症狀和恐怖，將癮，抽象莫名的感官經驗，化為百蟲蠕噬的驚悚意象。現在看來這故事不免有藉機教化訓誡，令人生懼戒煙之意。這一警戒的意圖也出現在另一則類似故事。道光年間一旗員有家奴酷嗜鴉片，履懲不懼，後死於鴉片。這一旗員發現軍中仍有不少人嗜吸，理論或法禁，皆無人理會。於是想了一個法子，將死去家奴剖腹，結果「其肺作青黑色……須臾有蟲無數自肺內鑽頭向外，肺僅如依膜然，其青黑皆蟲也。呼食鴉片者，以煙噴之，蟲稍縮，連噴七八口，肺即如故，始悟每日上癮之故。漸遵其禁」。<sup>173</sup>這一故事的敘事，更加戲劇化的以視覺意象呈現癮的生成和禍害，剖腹蟲出的驚悚畫面，果然收到「漸遵其禁」的嚇阻效果。

雖然有點誇張荒誕，但當時傳統醫學知識，卻可能認為癮發跟蟲生有關。咸豐年間，陳恭敏輯《戒煙全法》，書末附有校刊者程履豐的小識，即特別提出癮與蟲的關係，「又聞吸煙者腹內多蟲，癮之發，蟲為之也。嘗見人患蟲症者，垂涕眩暈，躁擾不寧，其形症正與發癮相似，而知有蟲之說非屬無稽」。<sup>174</sup>顯然，這跟上例一樣，吸鴉片腹內會生蟲，癮發就是蟲在作祟，唯有透過吸食鴉片，才能讓蟲暫時不作祟，不會有頭暈淚流，焦躁不安的生理反應。因此，越吸蟲越多，越是不能不吸，謂之上癮。到了 1935 年蔡鎮醫師的《戒煙全書》，對癮的生成和反應就有較現代的醫學解釋，「鴉片本為一種劇毒藥，在誤投大量時，本可使生體中毒致死，在連續不斷應用鴉片之人，雖係小量，不致中毒而死，而生體亦受有刺戟，可知此種慢性刺戟，亦必惹起生體之防禦機能由鴉片所生之防禦表現，

<sup>170</sup> 雷瑑，〈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300）。

<sup>171</sup> 朱錦琮〈禁鴉片議〉，《治經堂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97）。

<sup>172</sup> 〈鴉片煙古風〉，雷瑑，〈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5）。

<sup>173</sup> 雷瑑，〈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305）。

<sup>174</sup> 陳恭敏輯，《戒煙全法》（光緒年間出版）（1997: 19）。

即是癮。至成癮之後，即再用致死量之鴉片，亦不致使生體致死矣」。<sup>175</sup>亦即，毒品少量、慢性使用，會緩慢的刺激身體，身體會起適當反應以為調適，這種現象久之就成癮。不管當時對癮的病因解釋如何，至少可以看到癮的難以戒除，及其造成的危害。鴉片之害，正在於上癮難戒，日陷一日。最後使得整個人民和國家都沉溺在毒癮中，無法自拔，走向自我毀滅。也無力回應任何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踵繼而來的迫切問題。

從鴉片第一道禁令至民國時代歷經兩百餘年，鴉片癮害已成為廣佈社會的流毒，由於它的依賴性、不易戒斷性，使它不只傷身，更擴及到個人身家財產、勞動生產、甚至傳宗接代。1828（道光九年），監察御史章沅指出，鴉片令人精神振奮，有治病功效，容易讓人上癮，無法停止，一般家庭必然走上破產一途，到最後身體衰亡，無可救治，「且一經嗜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而此煙能提攝百脈，癒人小疾，久之精神大耗，無可救治，為害尤烈」。<sup>176</sup>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也提到鴉片癮的為害，剛開始可能當藥使用，為了提神、療病因而接觸，「鴉片煙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謂之阿芙蓉」，一旦接觸，無法擺脫，癮到就得吸食，「惟吸食既久，則食必應時，謂之上癮。廢時失業，相依為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癮就是讓人陷入「雖明知其害而不能已」的地步，正是如此，不得不嚴禁。

1838年（道光十八年），山西巡撫申啓賢也奏陳鴉片吸食得癮之害，更進一步提醒鴉片是外人滅中國的工具，漏銀事小，但鴉片暗地裡戕害身體，製造無用、待斃之人，事態才嚴重。他說，「蓋鴉片煙迷人之物也，害人之具也。吸食得癮，遂為無用之人，日復一日，終至奄奄以待斃。今外夷以此迷人害人之藥，輾轉傳染，毒我生靈，是其巧取中國之銀者，為罪尚小，而其隱戕中國之人者，為罪甚巨」。<sup>177</sup>申啓賢提出了外人以鴉片滅我的陰謀論，這也是後來帝國主義以鴉片滅我民族、滅我種說法的延續，1931年這樣的論調仍普遍存在，「鴉片之流入，乃帝國主義者以武力迫我服毒，為和平消滅我民族之一種陰險工具」，「東亞殖民地內鴉片專賣，原係帝國主義者用以先吸異族之血汗，後滅其種。故對白人吸煙，則處以嚴刑，而對於異種，則特別允許，用意何在，不言可知」。這一論調也是當時國族救亡論述的主要基調，以此激發民族愛國情緒，「在二十世紀國際上留污點，受輕蔑……若論其實禍，留此魔物，則我民族將根本不能保存，尚何刷新政治，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足云」。<sup>178</sup>1839年（道光十九年），大學士敬敏上禁鴉

<sup>175</sup> 蔡鎮，《戒煙全書》（1935），轉引自羅運炎，《毒品問題》（上）（1936: 14）。

<sup>176</sup> 〈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奏為請禁外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55）。

<sup>177</sup> 〈山西巡撫申啓賢奏復塞漏培本應嚴懲販煙開館人犯四條章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60）。

<sup>178</sup> 1931年，〈海外拒毒後援會反對鴉片公賣代電〉，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片摺，繼續提醒鴉片令人沉溺不返，導致身殘形毀的慘狀，「錮習益深，日甚一日。受其害者類皆沉溺不返，幾同毒藥迷人，迨至骨立形銷，等於殘廢而執迷不悟，莫可挽回」，更嚴重的是，剛開始陷入鴉片泥淖的只是一般無識小民，到後來吸食成爲平常無奇的公開現象，「至於吸食鴉片者，初則被人引誘，半屬愚民，近則視泛常，明目張膽」。<sup>179</sup>當鴉片吸食成爲日常生活場景，也就表示形銷骨立，殘身敗軀的意象，也成爲這場景的一部分。

吸食鴉片確實可帶來短暫的好處，如提振精神、治療疾病，或做爲社交應酬、商討事情的潤滑劑等，也因此容易勾人上癮。1840年（道光二十二年）周樂記載，有人勸他吸鴉片，並說明鴉片諸多好處，「吸此則精神可增，疾病可卻，且藉以廣交游，謀機事，子蓋不知此趣矣」，雖有這些好處，引人接觸上癮，但最後換來害家、害國的更大災害。周樂感嘆的說，「嗜此者，悖天時，廢人倫，召窮阨，輕性命，國有此人，而害於國，家有此人而害家，乃今天地間一大劫也」。<sup>180</sup>而鴉片成癮之害，也讓吸食者因身體的銷蝕和生活坐息不正常，而有鴉片鬼之稱。鴉片鬼不止影響工作生產，最後也構成國家民族大患。徐珂寫下鴉片鬼之所由，「吸者久服成癮，爲近百年民族之大患也……嗜好太深者……俾晝作夜，失業廢時。且其告人，必飾多爲少，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俗稱之曰鴉片鬼，以此故也」。<sup>181</sup>鴉片鬼也成爲西方眼中的主要中國意象，它代表著身體敗壞，失能無爲，宛若死屍的活死人。鴉片對身體的銷磨、吞蝕，最後一步就是製造出鴉片鬼。

1906年新政推動，立憲在即，全國率皆鴉片鬼，枯骨之民，豈能自強立憲，一新國度，報上一篇文章作此評論，「夫委於溝壑，奄奄無生人氣。刺之，不知痛；蹴之，不能起者，枯骨也。同胞中之大多數，既日以吸煙爲事，甘爲枯骨，以代表吾四萬萬人，是四萬萬人皆枯骨也。夫以立憲之國，而聚枯骨之民，此豈能自強與否」，<sup>182</sup>因爲，枯骨之民，「筋骨衰」、「志氣墮」、「神經敗」，身體失能和精神喪氣，必然造成各行各業的荒怠無爲，導致社會運作失靈，國家機能停滯，「爲官者吸煙，則不能勗勉從公；爲士者吸煙，則不能講求學問；軍人吸煙，則無殺敵致果之望；工商吸煙，則無興弊除利之時」。<sup>183</sup>正是鴉片導致身體、社會、國家運作失靈、機體失能，乃成爲政府必須管治、壓抑的對象。由於身體敗壞不

---

975)。

<sup>179</sup> 〈大學士敬敏等奏爲遵旨會議具奏嚴禁鴉片章程折〉，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141）。

<sup>180</sup> 周樂，〈鴉片煙說〉，《二南文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85）。

<sup>181</sup> 徐珂，〈吸鴉片〉，《清稗類鈔》（第十三冊）（1986: 6359）。

<sup>182</sup> 〈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1906年10月6日，《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96）。

<sup>183</sup> 〈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1906年10月6日，《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95）。

止攸關社會正常運作，更涉及種族的繁衍和下一代良窳。於是禁絕鴉片，強化身體，改造病夫之軀成爲武化或軍國民的身體，更是強國保種首要作爲，「立于兵力爭存之天下，固非通國民爲軍國民不可，而爲軍國民非先強種不可，欲強種不首禁鴉片更不可」。<sup>184</sup>可見鴉片危害已深，病國之憂，首在身體的孱弱無能，滅種成爲普遍的危機意識，身體武化、軍事化是所強調。到了 1928 年，禁煙以強健身體，使中國走出病夫之國，成爲一個健康、正常國家，仍成爲國家強調重點。強種、強民族，強中國，首在強身，強身之道正是禁絕鴉片，「故欲強中國，必先強中國民族，欲強民族，一定要取銷吸鴉片」，因爲鴉片不只影響身體健康，更影響國計民生和種族繁衍，「吸鴉片之人……身體孱弱，幾成廢物……因其不治生產，則家族生計，亦受影響。因其身體孱弱，則嗣續子孫，亦難強壯，此影響民族經濟，民族健全甚鉅，亟應禁止也」。<sup>185</sup>到了抗戰時期的 1940 年，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演說特別提到要掃除煙毒，促進民族健康，同時還要積極推動國民體育，「協助肅清煙毒，增進國民健康。要增進民族健康，消極的要剷除煙毒，積極的要提倡國民體育」。<sup>186</sup>事實上，在這一時期，鴉片真正問題在於妨礙民族健康，也就是整體國家民族的健康，因爲它關乎中國是否會亡國滅種，特別是在對外戰爭狀況下。而亡國滅種從來都是中國揮之不去的隱憂，也是國家必須迫切處理的問題。

鴉片對身體的傷害直接而明顯，既是自己可輕易感受，別人也可透過視覺明顯察知，而其對各個層面直接或間接的危害更是遍佈而深入。鴉片成爲國家社會最顯著的罪惡，也是涉及統治政權穩固與否必須解決的問題。從上面我們大抵可以看到歷來對鴉片身體危害的討論，也反映出每一階段國家遭遇不同問題時對鴉片禁制的相應言論。亦即，從國家反鴉片消費論述，可以知道國家面臨的問題。健康的國民身體，是國家之本，國力的來源，長年以來，鴉片讓中國變成病態、不正常國家，內政、外交、國防、經濟幾乎崩盤。而一項物質可以至關國運如此，不得不成爲政治領域議論的一環，鴉片消費從私事提昇爲國事。人民的感官享受，成爲國家管治項目，因此，我們看到一場國家長期對抗癮的戰爭，對癮的入罪，對品味、習性、嗜癖的干預和控制。形成一場癮與法的拉鋸對抗，從中國經驗來看，除了少數時刻，大都是癮讓法失效，似乎在說明個人感官享受、品味、嗜癖不是國家權力所能干預。中國推動的去鴉片、戒癮行動，顯得困難重重，也暴露出國家治理的左支右絀。林則徐則認爲要革癮並不難，難在於革心，要革心就要立令人心生畏懼的法令以爲箝制。他說，「夫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忧心之法」。<sup>187</sup>就林則徐看來，鴉片之難禁止，癮不是

<sup>184</sup> 〈自禁鴉片振武宗社簡章〉，1905 年 10 月 28 日，《申報》。

<sup>185</sup> 馬寅初，〈關於禁煙問題幾個要點〉，收錄於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218）。

<sup>186</sup>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八日，新生活運動六週年紀念廣播演辭，〈澈底掃除煙毒增進民族健康〉，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22），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90）。

<sup>187</sup> 林則徐，〈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二）



大問題，而是大家無視法令存在，官員受賄玩法，懸法不行，人民自視法為無物，觸法無懼。

林則徐點出了鴉片禁制時期的普遍現狀，就是法令懸置不行，這也是鴉片在兩百餘年法令規章伺候下，依舊得以生存原因之一。例如，1838年（道光十八年）上諭指出，官兵收賄私放鴉片，致鴉片吸食風氣傳染到內地，「鴉片煙流毒內地，傳染漸深，總由各該省地方官因循懈忽，以至貽患養奸，實堪痛恨……但恐該省文武員弁，或搜查偶懈，或兵役等得賄賣放，包庇諱匿，勢所難免」。<sup>188</sup>1839年（道光十九年），大學士敬敏的奏摺也指陳官兵賄縱鴉片，導致鴉片風盛，弊害無窮，「……兵弁縱容受財護送，以致毫無顧忌，肆意暢行，錮習益深，日甚一日」，「鴉片之禁，載在爰書，果能及早查拿，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總緣各省大小臣工視為具文，不肯認真查辦，遂致澆風日熾，幾成習慣自然」。<sup>189</sup>就因為官兵收賄私縱嚴重，甚至參與鴉片護送，讓林則徐認為只要嚴刑峻法，起嚇阻作用，就可禁絕鴉片。黃爵滋也提出重治吸食之說，吸食者一年期到未戒，罪以死論，林則徐贊同此議。1839年頒布的〈欽定查禁鴉片章程〉，立法已從嚴，然而事後證明，徒有嚴法亦無法遏止鴉片氾濫，也不能革除民眾的鴉片煙癮、品味和習性。林則徐雖強調嚴法禁煙，但這時他也有治療煙癮的概念，他廣收民間戒煙藥方，甚至趁著向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索取治療疝氣的藥和疝帶時，也向他尋求治療鴉片患者的藥方。<sup>190</sup>希望「禁戒吸煙之時，即施藥以療之」。<sup>191</sup>

顯然，革癮難於革心，更非法所能控制，為了吸煙，就算不吃不喝，蕩盡家財也要過癮，「可知食之愛，不如錢之愛；錢之愛，不如煙之愛。是故煙鬼興而錢神就此無權矣」。<sup>192</sup>既然身為煙鬼，連錢都不愛，又何懼乎法？真要戒掉很難，張昌甲現身說指出，「煙至成癮後欲求其戒，難矣」，為什麼？因為要耗費的心力甚深，時時刻刻不可懈怠，但多數人往往未竟全功，「然則何以能戒之，遠之也？曰：時時刻刻用強遏工夫耳。然即此工夫已萬萬不可及。故世間履吃履戒者有之，

---

(2000: 134)。

<sup>188</sup> 〈著閩浙總督鍾祥嚴查海口販煙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93)。

<sup>189</sup> 〈大學士敬敏等奏為遵旨會議具奏嚴禁鴉片章程折〉，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141)。

<sup>190</sup> 1839年伯駕在《中國叢報》上記述這段過程，「他（林則徐）渴望得到我對有關鴉片的看法及治療那些鴉片癮毒者的一般性藥方。我用漢文寫了答覆……指出鴉片吸食者恢復健康的方法因人而異，要根據吸食的數量，成癮時間長短及病人的年齡、體質狀況等來決定，沒有特效藥；每個病例要根據其本人的特殊症狀來治療」。見譚樹林，《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1834~1857)》(2010: 125)。

<sup>191</sup> 林則徐提供忌酸丸、補正丸兩種丸方、四物飲、瓜汁飲兩種飲方建議道光採行。其中忌酸丸和四物飲都含有鴉片煙灰，這與後來傳教士一度用嗎啡治療煙癮，透過用藥遞減方式戒除鴉片之理同。後來有人稱這治療用嗎啡為「耶穌鴉片」。道光十八年，林則徐，〈湖廣總督林則徐奏復黃爵滋塞漏培本之摺並酌議禁煙章程六條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69~71)。

<sup>192</sup> 張昌甲，〈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 1222)。

一戒而終其身不復蹈者未之有也」。<sup>193</sup>要想戒掉當在未成癮時，「故戒煙當在未入之時」。<sup>194</sup>問題是思戒之時，總是已入之後了。戒癮是複雜的問題，癮是什麼樣的疾病？在中國，根據《集韻》：癮是「疹皮外小起」，《說文》：癮「癩也廣韻引杖痕腫處」。這些意思都與吸煙之義無涉，亦於吸煙失時之情形不相關涉，「要之煙癮為近今發現之事，故不能定為何字，不得以借病字之義以形容之，然亦均未能適合其真相也」。<sup>195</sup>癮在中國是一種病，但跟現在成癮的概念和症狀，顯有不同。在十九世紀末西方，癮曾經被認為不單是身體上的病，也是一種「意志的疾病」(disease of the will)，它既是疾病也是罪惡，一種道德敗壞(moral bankruptcy)的疾病，或道德不正常(moral insanity)。它原源於對病態式渴望的控制失能。因此，癮屬於個人責任問題，也就要強調自我控制和自我規訓，如果治療失敗，個人要負責任。儘管這種觀點仍視之為病，但仍有不少道德判斷在其中，跟後來視癮為神經性(neurotic)問題的現代醫療觀點有所不同。<sup>196</sup>由於視癮為個人責任、自我意志控制問題，成癮行為受到道德審判和罪責化，成為理所當然之事。但即便接受法律懲罰，可能仍無法矯治意志控制失能的問題。該怎麼看待癮的現象，正確處理癮的問題，涉及到為什麼中國禁煙，越禁越多，禁之不絕的原因之一。或許，除癮不是法律問題，不是心理問題，更不是道德問題，而是醫療問題，應該透過現代醫療方式勒戒，積極治癒成癮行為，可能更為有效。<sup>197</sup>

最後，過癮本來是個人之事，然而鴉片癮卻又攸關國族存亡，這形成個人與國族衝突，究竟該如何選擇，該尊重個人選擇自由還是遵從國家的責任和任務，從來就是處理癮的兩難。對於癮的兩難，美國著名的精神病理醫師Szasz曾說，我們可以選擇犧牲個人代價，以極大化國家行動領域；也可以選擇付出國家代價，來極大化個人行動領域。也就是在對整個團體有益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支持國家有權利和責任規範個人生活；我們也可以堅持個人自由是最高原則，國家有責任提倡和保護它。Szasz本身主張尊重個人選擇自由勝於一切，除非這種選擇傷害到他人。<sup>198</sup>Szasz說法也可用來明個人消費自由和國家權利責任兩造之間平衡的問題。鴉片消費和煙癮正好是這兩造的交叉點，該尊重個人消費鴉片的自由還是遵循國家設定的目標使命，盡臣民/國民責任，顯然在中國歷史給了答案。

---

<sup>193</sup> 張昌甲，〈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 1228)。

<sup>194</sup> 張昌甲，〈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 1227)。

<sup>195</sup> 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300)。

<sup>196</sup> Virginia Berridge, *Opium and the People: Opiate Use and Drug Control Polic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1999: 155-157)。相關討論亦可見Stacey Margolis, "Addiction and the Ends of Desire" in Janet Farrell Brodie and Marc Redfield(eds), *High Anxieties: Cultural Studies in Addiction*(2002: 19-37)。

<sup>197</sup> 例如，日治台灣禁制鴉片成效良好，杜聰明以現代醫療方式勒戒治療鴉片癮，無疑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見許宏彬，《台灣的阿片想像：從舊慣的阿片君子到更生院的矯正樣本》(2002)；劉明修(伊藤潔)，《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2008)。

<sup>198</sup> Thomas Szasz, "The Ethics of Addiction" in R·Coomber (ed), *Drugs and Drug Use in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1994: 373-382), cited in Louise Foxcroft, *The Making of Addic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Opiu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2007: 124)。

正因鴉片消費和成癮行為不只傷害自己，更傷害到國家民族命脈，所以只能犧牲個人消費選擇和品味享受自由，服從國家規範，對國家盡一份責任。這也是官方建立反鴉片消費論述的目的，透過法令禁制讓人民知道個人的消費和享樂，危害社會國家，牴觸國族生存發展目標。形成鴉片是社會罪惡的合法官方品味。從上面對癮的討論，癮的難以遏制、戒斷和癮發對身體、社會和國家秩序造成的嚴重威脅，形成癮的國族危機，說明了鴉片罪惡論官方品味的形成，也構成癮的入罪化和政治化，整個中國的反鴉片消費運動，就是除癮的運動，一場法令與癮的拉鋸戰。中國無法立即、有效的去除鴉片、革除煙癮，終成爲一個成癮的病態國度，黑暗的鴉片帝國，也埋下亡國滅種的危機。

#### (四)、鴉片與立憲和新公民權

晚清末年積極推動新政，新政成爲改革派和開明知識份子的建立富強國家的希望。這時候反鴉片消費幾乎成爲社會共識，在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的目標下，清政府於 1906 年 9 月 20 日頒布禁煙上諭，限十年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盡除。慈禧太后也在 1906 年 9 月 1 日，下詔預備立憲。在禁煙和立憲政體的新政策下，這時反鴉片論述，已從過去對身體、勞動生產、國家財政、社會風俗秩序的罪責面向，提昇到新政體、新國家擘建面向。官方建立的反鴉片消費品味，此時已跟社會意圖建立國家新氣象的民氣結合，形成官方品味和社會品味的一致，鴉片消費已不再是人人豔羨、追慕的社會時尚，而成爲亡國滅種，恥辱臨身的國族之惡，幾乎已成爲社會共識。在官方和社會氛圍結合下，走向現代化的反鴉片論述形成，報紙開始討論禁煙與立憲的關係，雖然立論仍不免迂陳，但已將鴉片消費跟國家未來發展構連一起，鴉片不除，無以立憲，無以救中國，爲反鴉片提出新的切入點。1906 年 10 月 6 日，報上一篇文章〈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今者立憲之詔頒矣，朝廷勵精圖治與天下更始，而所謂由貧而富，由弱而強者，皆將於是乎賴……鴉片一日不絕，則立憲一日不成，而中國亦一日不可救。蓋禁煙與立憲有至密之關係，尙非他政所能比」。<sup>199</sup>中國由貧弱走向富強，在於天下更始，而其關鍵就在禁煙。作者繼續闡述，因爲鴉片讓國家財政困難，人民生計出問題，復以鴉片讓人體魄日弱，更有滅種之憂，救亡都不可能，何能立憲創新局，「夫吾國國民，所以仰望立憲，要求立憲者，何哉？亦不過以憲法既立，則弱者可強，貧者可富耳。然鴉片之毒，則適與此相反比例。體魄日弱，則有滅種之憂；漏卮日深，則有無食之懼……一日有事，則在外無可用之兵，而在內無可發之餉，救亡之不暇，何立憲焉」。<sup>200</sup>這個階段，反鴉片消費論述直接涉及國家新制度的建立，鴉片戒除與否攸關國家改革是否成功。1909 年，唯有禁煙才能立憲的觀

---

<sup>199</sup> 〈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1906 年 10 月 6 日，《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95)。

<sup>200</sup> 〈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續)，1906 年 10 月 6 日，《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96)。

點再度重申，「禁煙為立憲之入手，煙毒不絕，憲政可知」。<sup>201</sup>

〈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這篇文章的立論，基本上是這時期反鴉片論述的主要基調。將鴉片與強國強種，救亡圖存，開創國家未來新局結合。在這國族救亡和肇建計劃的大框架下，官方和社會品味乃合流為一，共同支撐之後十年的禁煙工程。而鴉片消費者即便戒不了癮，此時也不免心懷罪惡感、羞恥心。同一年的9月24日，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和禁煙沒多久，就有人呼應提出鴉片導致危亡，如不禁除不可能有立憲國民之資格，更不可能與列強競爭，「然則吾國民數雖眾，苟長此沉淪痼疾，勢必至由貧弱而即危亡，與所謂圖自強謀獨立者，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更安望有立憲國民之資格，而與列強競爭於世界哉」，惟有能在十年內禁除鴉片，才可以算是立憲後新國民，「於此十年中，必時時存一祛痼疾，復富強之心，而不可稍有懈怠。果如是，則吾中國四萬萬同胞，真不愧為立憲後之新國民」<sup>202</sup>

這篇文章提出一個觀念，鴉片與立憲國民之資格。顯然，不能戒除鴉片，就不能成為立憲國度的公民，立憲新國的公民資格與鴉片吸食者相悖離。1909年（宣統元年），禁煙大臣恭親王溥偉在擬訂禁煙辦法時，這一說法成為法令，鴉片吸食者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憲政編查館諮議局章程議員條內，吸食鴉片者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sup>203</sup> 革命成功，民國肇立，禁煙成為共和之民的公民權要件，國家統一的基礎。1912年3月2日孫中山發佈〈大總統令禁煙文〉特別指出，「其有飲鴆自安，沉湎忘返主，不可為共和之民。當諮行參議院，於立法時剝奪其選舉，被選一切公權，示不與齊民齒……屏絕惡習，共作新民，永雪東亞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sup>204</sup> 在這裡，新國家新公民的條件就是戒絕鴉片，因為新公民有義務洗刷帝制時期留下的東亞病夫的國族恥辱，沾染惡習者則剝奪部份公民權，讓人引以為恥，這是類似前清法律某些犯罪者施以黥面之罰的恥辱刑概念。建造新國家、成為新公民，是改變中國的起點，也是有識之士的期待，因此鴉片絕對不能成為阻礙新國家發展的致命因子。這種期待和排除障礙的決心也反映在1912年一份政府的文書中，「當此共和初建，百度聿新，斷不使墨吏黑魂，燃既死之灰而熾萬張之燄。庶足以喚新國民，以光大我新國家」。<sup>205</sup> 然而民國成立後，各地軍閥紛起，為了籌措財源，鞏固權力基礎，不惜帶頭

---

<sup>201</sup> 〈福州各社會上中國禁煙會代表書〉，1909年，2月10日，《申報》，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469）。

<sup>202</sup> 〈敬書初三日戒煙〉，1906年9月24日，《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94, 395）。

<sup>203</sup> 〈禁煙大臣恭親王溥偉續擬禁煙辦法十條〉，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472）。

<sup>204</sup> 〈大總統令禁煙文〉，《臨時政府公報》第27號，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567）。

<sup>205</sup> 12年5月15日，〈順直禁煙會揭前禁煙局總辦呈及都督批〉，天津《大公報》，收錄於馬模貞

違反禁令，鼓勵甚或強迫民眾種植鴉片，煙災瀰漫全國。1924 年孫中山特別重申唯有反對鴉片才是真正的民意，如果爲了利源對鴉片降服，即使是一時權宜之計，也是民意的公敵，國民政府與之不兩立。更進一步說，國家要統一，鴉片要消滅，就要先消滅軍閥。「鴉片營業，絕對不能與人民所賦予權力之國民政府兩立」，「中國之民意……苟有主張法律准許鴉片營業，或對鴉片之惡勢力表示屈服者，即使爲一時權宜之計，均爲民意之公敵」。<sup>206</sup>一直到 1947 年國大及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仍規定，「此次舉行大選，在國大代表選舉罷免法第五條第六項，及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第六款規定，凡吸食鴉片及其它代用品，均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sup>207</sup>

自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頒布鴉片吸食者不可爲共和之民的禁令後，無論何項選舉法規，對於吸食鴉片者均不許其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而近頒縣各級組織綱要，更明定吸食鴉片者，無公民之資格。<sup>208</sup>例如，1911 年頒行《新刑律》，第二十章〈鴉片煙治罪條例〉，有剝奪公民權（選舉、被選舉權、參加考試、出任公職等）的特別規定。<sup>209</sup>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大總統宣佈參議院法，「凡吸食鴉片者，不得爲參議員」，民國元年五月頒布眾議院選舉法，九月頒布省議會選舉法，「凡吸煙者不得爲眾議院和省議會議員」。<sup>210</sup>1925 年中華國民拒毒會年會報告中仍強調吸煙與公民權關係，「造成輿論，褫奪煙徒公民權利，不許煙徒任社會職務及被選舉爲議員」。<sup>211</sup>雖然制定這些法律，但究竟執行成效如何，有沒有人因吸食鴉片而遭剝奪公民權，從現有資料很難得知，有人認爲根本沒有嚴格的執行查驗工作。<sup>212</sup>此外，鴉片消費已具有現代的意涵，透過對鴉片消費者部份公民權的剝奪，界定了什麼是共和公民的身份和享有的條件。鴉片消費者既不具完整公民身份，在罪責化過程，也不具消費者主權，無法伸張自己消費權益。這形成消費者主權和國家公民權間的矛盾關係，鴉片消費者由於消費國家禁制物品，與國家賦予國民的權利責任相違，故而喪失公民權。因此，當鴉片吸食者進入國族共同體時，其做爲自主消費者和國家定義的消費公民間產生矛盾關係，鴉片消費者主權和國家公民權是互斥對立，所以被摒除於國族共同體外。消費公民在國族生存發展框架下，不能踰越國家設定的消費界線，只能限縮自身權力，這

---

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577)。

<sup>206</sup> 〈禁煙問題與政治建設〉，(民國十三年在廣州任大元帥時以英文發表)，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禁煙之理論與實施、禁煙手冊》(2009: 21~23)。

<sup>207</sup> 1947 年 11 月 14 日，《大光報》，〈粵省通飭各縣市吸食鴉片及代用品者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1418)。

<sup>208</sup> 內政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禁煙行政》，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95)。

<sup>209</sup> 見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337)。

<sup>210</sup> 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88~89)。

<sup>211</sup> 〈拒毒會今日舉行年會〉，1925 年，9 月 12 日，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511)。

<sup>212</sup> 見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351)。

也是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反鴉片消費論述，卻很少看到倡議鴉片消費論調的可能原因。

再者，鴉片消費進入新國家不止是選擇的問題，更成為身份資格的問題，也是一個認同的問題。認同新國家、新公民的身份，就不會選擇阻礙國家開創新局的鴉片。之所以一直強調無煙公民身份，在於如果不重做國民，重建新國，國家將因鴉片造成國民身體、精神、道德和國家經濟、生存發展的傷害，而無法立足於世。一份國家的宣導文件疾呼，「百年以來鴉片使我國社會風氣敗壞，國民道德墮落，國民精神萎靡，以及國民經濟凋敝。這種現象又造成整個國家的積弱……若不發奮重作國民，重建國家，則將來我們國家就無法在世界上立足」。<sup>213</sup>因此，新民/共和之民絕不是煙民、廢民，煙民必排除於新國家新公民的標準之外，因為沉溺鴉片，「必致全國之民盡變為煙籍之廢民而後已」，「倘人人嗜煙而成廢民，則國亦何所恃哉……苟不除此煙害，則萬事休矣，欲圖強而益弱，欲求富而益貧，五州雖大，恐亦不容此煙國煙民之優游自若也」。<sup>214</sup>也由此看出新國家首要達到的是一個去鴉片化社會、去病民狀態的正常/常態或健康的國家，因此與煙國廢民不可共存。

確實，追求正常、健康國家，無疑是富國強種的基礎，也是洗雪國恥的第一步。在這種信念下，民國肇興後，國家反鴉片消費論述導向現代化目標，建立去鴉片化的國家身份認同，也是現代性的身份認同，不吸煙的公民成為現代化公民，也是文明之士。早在 1909 年上海舉行的萬國禁煙大會，中國代表唐國安即指出，「我國政府不可不自立文明之法制，以為之應，冀漸得自儕於文明大國之列者也，所謂宜立文明法制以為之應者，即速行禁煙是已」。在這裡，鴉片不只成為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的障礙，同時提昇到文明層次，視消除鴉片禍害為是否夠格進入文明之列的標準。<sup>215</sup>在現代化文明國家和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反鴉片消費論述主軸轉為透過各種救亡現代性工程，強調人口品質、國民健康、公共衛生環境的改善，以掃除鴉片帶來的禍害。去鴉片化，走向正常，正是帶動現代性中國萌生的契機。

#### （五）、鴉片與羞恥和亡國滅種意識

鴉片對身體的戕害，對國家財政的掏空，兵弱銀荒的結果，造成內亂迭起，

---

<sup>213</sup> 行政院行聞局編，《肅清煙毒》，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51)。

<sup>214</sup> 〈論我國禁煙之弊及其補救之法〉，《申報》，1909 年 8 月 24 日、26 日、27 日、28 日、29 日，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53)。

<sup>215</sup> 〈論禁煙與外交之關係〉，《外交報》147 期，1906 年 7 月 6 日，引自劉增合，《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2005: 94~95)。

外患頻仍，國家治理機能幾盡失靈。幾次的對外戰役，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強盛的帝國，已成為任人欺凌的脆弱中國。到了清末，積累數十年的敗象，在甲午戰役後全然爆發。有識之士開始擔心，國勢頹唐，將有亡國滅種之虞。再加上西方進化論、遺傳學的引進，在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社會演化定理下，開始思考中國如何富強、種強，以因應國際競爭和種戰時代的來臨。強國保種成為清末民初最主要的國家意識形態和國族發展目標。而亡國滅種的憂懼和提醒也成為那個時代最主要的關鍵字眼。鴉片在這個時期扮演的正是亡國滅種的角色。反鴉片消費論述的主軸就是如何杜絕鴉片，以避免掉入亡國滅種的噩運。也在這種背景下，鴉片向來都是社會時尚，民風之所趨，如今卻轉換成羞辱的氛圍，既是個人恥辱，更是國家恥辱。吸食鴉片成為國恥，不再體面、時髦，帶動社會品味和風潮。亡國滅種和恥感意識的萌生，成為啓蒙自覺的契機和國家改革的內在動力。在這種氛圍下，禁煙運動取得有效成果，自 1917 年底起英國同意不再輸入鴉片。

從鴉片危害的措辭上看，最初人們描述鴉片危害僅限於症狀的分析和吸煙對個人和家庭的危害。如「鴉片煙之廢時、失事、蕩產、傾家，甚至癮深致病、促壽、戕生，種種有損無益者，華人皆知豈庸贅述乎」，<sup>216</sup>到了清末，反鴉片的修辭已從鴉片對吸食者自身的危害，轉向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危害，亡國滅種成為關切之所在。如「今日愛國愛時之士均大聲疾呼，云鴉片為亡國之具。鴉片為亡國之具，其言不可謂不警切，實足以喚醒我酣睡之同胞，雖然極鴉片之害，豈特亡國已哉？實欲亡種耳」。<sup>217</sup>在這裡，亡種更甚於亡國，國亡可重建，種亡民族不復存在。1912 年 3 月 9 日，〈大總統令內務部通飭禁煙文〉，也提到鴉片「小足以破業殞身，大足以亡國滅種……務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強國保種，有厚望焉」。<sup>218</sup>1915 年，一份政府文書更直指鴉片，「弱國弱種，貽害無窮」。<sup>219</sup>

從帝制跨到共和，亡國滅種構成國家和知識份子的集體焦慮，強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為往後幾十年國族發展的主軸。這種焦慮當然也反映出整個國家民族面臨到興亡續絕的迫切危機和龐大壓力。例如 1930 年代一篇討論鴉片與國族救亡的文章即提到執政當局的憂心和禁煙保種、拒毒保健的決心，「蔣委員長深慮中華民族的『心死』、『種滅』，不但目前難免滅亡，萬一不幸而遭受亡國的慘禍，恐永無復興的希望了。所以蔣委員長，為目前挽救危亡計，或萬一不幸而滅亡，為再求復興計，對於鴉片……毒禍，務要從嚴禁絕……用禁煙權拒毒保健，以免

---

<sup>216</sup> 1882 年 8 月 21 日，《申報》。

<sup>217</sup> 1906 年 1 月 1 日，《申報》。

<sup>218</sup> 1912 年 3 月 9 日，〈大總統令內務部通飭禁煙文〉，《臨時政府公報》第 27 號，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567）。

<sup>219</sup> 1915 年 1 月 27 日，〈陝西巡按使呂調元呈陳明陝省整頓煙禁擬設戒煙總局派委專員以重責成而期肅清並擬訂章程繕單請示文並批令〉，《政府公報》1915 年 1 月 30 日，第 980 號，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640）。

除滅種的慘禍」。<sup>220</sup>上面文字大抵可看出對國族可能衰亡的擔心和憂懼，為免於衰亡，或一旦衰亡之後的振興大業，都一定要剷除鴉片。

因此，吸食鴉片不止是道德、社會的邪惡，更是毀國滅族的罪人，帝國主義的幫兇。1924年八月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致各省區軍民長官電，再次重申鴉片導致種弱，主權淪喪，有亡國之虞，從而激起救亡的努力，「自鴉片流毒中國，而主權喪失，人種衰弱，久有鴉片亡國之懼。勝清之季，國人漸有救亡之覺悟」。<sup>221</sup>1928年王寵惠回顧百年中國之民生多艱，民族不競，其肇因全在鴉片，亡國滅種之論，並非空言，「百餘年間，吾國民生之多艱，民族之不競，原因雖多，而鴉片實為重要部份，昔人謂鴉片之毒，烈如茶鴆，過於酒色，充其量可以亡國滅種，非苛論也」。<sup>222</sup>同一年，〈中華國民拒毒會呈請國民政府禁煙文〉，提醒鴉片導致歷來國家大患，國將亡，種益弱，在物競天擇定理下，必遭淘汰，中國也無任何國際地位可言，「今日我國之大患，幾皆以鴉片為其主因，鴉片不禁，國亡無日，種族既日趨衰弱，必遭天然之淘汰，國際上又何有吾人之地位哉」。<sup>223</sup>1929年，〈第六屆拒毒運動周〉旨趣，又反覆申訴鴉片造成內政、外交、經濟、社會之害，如不及早消除，必然走上亡國滅種一途，「鴉片與一切麻醉毒品之禍害，為我國外交失敗，內政不修，土匪充斥，奸佞橫行之主因，結果使國體貧弱，社會混亂，實業凋零，民生窮困。長此不圖補救，必至亡國滅種」。<sup>224</sup>這些急切的言辭、話語看得出鴉片在這段時間仍然普遍存在，嚴重到影響國族救亡大業，政府和社會各界莫不視鴉片為救亡大敵。亡國滅種和雪洗國恥的反鴉片論述成為這時期國家禁制鴉片消費的主要意識型態，如此方能進入到救亡的進程。而這又是另一階段的反鴉片論述。

#### （六）、鴉片與國族救亡

國族救亡工程是清末以降國家的施政重點以及全國人民的共識。軍閥割據，列強入侵，使得中國雖進入新國家、新體制，準備擺脫鴉片中國和東亞病夫的恥名。卻因為國家未能完全統一，治權不及所有版圖，導致禁煙運動未能持續貫徹，鴉片吸食又再度蔓延，成為國家政權建立必須解決問題。此時國家的反鴉片消費政策重點放在鴉片如何成為革命建國障礙，軍閥和帝國主義亡中國的毒物，復興民族主義的禍患弊害。正如王正廷指出的，「因為軍閥專政，中央號令不能行於全國，對於禁煙不免廢弛了」。<sup>225</sup>其關鍵在於軍閥為籌餉源，擴大地盤，強迫或

<sup>220</sup> 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150）。

<sup>221</sup> 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161）。

<sup>222</sup> 王寵惠，〈司法與禁煙〉，收錄於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201~202）。

<sup>223</sup> 〈中華國民拒毒會呈請國民政府禁煙文〉，中華國民拒毒會編著，《反對鴉片公賣言論集》（1931），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897）。

<sup>224</sup> 廣州《國民日報》，1929年10月10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932）。

<sup>225</sup> 王正廷，〈鴉片與外交之關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



鼓勵民眾種植鴉片；甚至國民政府也為軍事和建所需之財政利源，幾度提出寓禁於徵的鴉片專賣政策。致使煙禍漫天，從鴉片帝國進入到鴉片共和國。這一官方和民間共譜出強徵鴉片稅和無所忌憚的吸煙盛景，1928年韓濟京的中國煙禍報告有如下記載，「各省政府爭相徵收鴉片捐稅……吸食鴉片，可以完全不受法律干涉；上自省長司令，下至縣長以及其他官員，公然在衙內吸煙，且持以獻客。大城中之旅館、飯店，竟公然設燈供客。在火車輪船上，吸煙更為自由。總言之，烏煙瘴氣，已瀰滿了全中國，欲求一片新鮮空氣，不可得也」。<sup>226</sup>事實上，早在1927年國民政府打算採三年分期禁絕的寓禁於徵政策時，中華國民拒毒會即發表反對公賣宣言，重申鴉片違背總理遺訓，公賣政策為民意之公敵，「鴉片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為軍閥官僚生存之命脈，實三民主義之勁敵，亡國滅種之禍根……此等設施，實正如總理拒毒遺訓所謂民意之公敵，賣國之行爲也」。<sup>227</sup>這一宣言，也正是這一時期反鴉片消費論述的重點，打倒妨礙國家建設發展的軍閥、帝國主義，推動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大業。到了1928年11月，國民政府召開全國禁煙會議，蔣介石發表演說，強調禁煙救國的必要性，並宣示政府日後不再拿鴉片的錢，「如果大家要救國，必自禁煙始。此後國民政府，絕不從鴉片得一文錢」。<sup>228</sup>

軍閥重啓的鴉片煙禍，使得新中國建設進程受阻，並再度埋下亡國滅種禍根。所以民國十三年上海第一次市民拒毒大會（註：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致各省區軍民長官）通電，揭露了軍閥如何埋下鴉片禍端，「民六年政變以來，軍閥割地爭雄，擁兵自衛。國庫既空，餉糈不繼，於是私開煙禁，莫不視毒物為餉源，私種私運，開燈吸食，莫不恃軍隊為護符……而所謂護法者，固不過各護其煙，所謂統一者，亦不過志在統一賣煙」。<sup>229</sup>軍閥為爭鴉片，而展開新的鴉片戰爭。1926年1月11日唐紹儀於上海中華國民拒毒會演講指出，「民國十四年來之數次戰爭，均為鴉片，故可稱為十四年之鴉片戰爭」。<sup>230</sup>另一位廣西省政府主席黃紹竑評述軍閥的鴉片戰爭，「所謂『禁煙罰金』也就成為軍閥內戰的經濟基礎。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國的國際戰爭，而中國數十年的軍閥混戰，也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在國內的繼續和擴大」。<sup>231</sup>軍閥爭戰，鴉片內戰興起，說明了為何剛爭取到的禁煙成果，轉瞬流失，煙禍滔天，成為這一時期最好寫照。這也反映在鴉片課稅，怪狀迭出，就連不種鴉片也要科罰金。1923年廣州一位傳教士曾寫道，「農民不

---

實施》(1935: 28)，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46)。

<sup>226</sup> 韓濟京中國煙禍報告，1928年，英文《中國年鑑》，轉引自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 92)。

<sup>227</sup> 收錄於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103)。

<sup>228</sup> 轉引自馬模貞，《毒品在中國》(1994: 117)。

<sup>229</sup> 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 41~42)

<sup>230</sup> 周憲文，〈中國之煙禍及其救濟政策〉，《東方雜誌》，23卷20號，(1926: 33~34)，收錄於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1957: 621)。

<sup>231</sup> 轉引自馬模貞，《毒品在中國》(1994: 11)。

僅受到免費供給鴉片種子的鼓勵來種鴉片，而且如果他們拒絕種鴉片，還要被科以罰金。原因就是打內仗需要錢」。<sup>232</sup>到了 1928 年，軍閥強迫人民種煙，抽收重稅，購買槍械，參養軍隊的後果是，「軍隊所至，煙苗遍地，糧食缺乏，生計困難，甚至饑餓迭至，百業停滯，老弱多填溝壑，少壯淪為盜匪」。<sup>233</sup>新國家建立沒有幾年，已弄到地瘠人窮，民生凋敝，餓殍滿街。軍閥與鴉片乃成為國民政府革命建國的障礙。由於鴉片與軍隊的密切結合，在軍閥統治時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人戲稱這些軍閥部隊為「鴉片軍隊」或「雙槍兵」。<sup>234</sup>

軍閥與鴉片共生關係，消滅鴉片與軍閥成為一體兩面之事。國民政府為求統一全國，實現民族主義的革命目標，雖有財稅考量，但為鞏固政權，不得不重拾禁煙政策，強化鴉片對國家的弊害。<sup>235</sup>這時期的反鴉片論述重心，強調禁煙才能拯救民族危亡，強化民族命脈，「非禁煙不足以挽救民族之危亡，非禁煙不足以實現民族主義，禁煙乃挽救我民族轉弱為強之最要關鍵，禁煙運動為實現民族主義之基本工作」；<sup>236</sup>肅清煙毒才能建國有成，救國有望，「首將建國大業的唯一障礙，鴉片煙毒，一鼓作氣的澈底消除，以便很順利的展開建國工作」，<sup>237</sup>「如果大家要救中國，必自禁煙始」。<sup>238</sup>鴉片是亡國滅種禍害，革命大敵，無法剷除就是恥辱，「鴉片……實是革命最大的對象……假如對於亡國滅種的煙禍不能禁絕，就是本黨最大的恥辱，同時革命也難望澈底成功。」，煙禍既然是革命大敵，就「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在最短期間內設法革除，為未來的國家民族保持健康，延續命脈，發展生存」。<sup>239</sup>軍閥肅清，中國統一後，鴉片成為國家建設絆腳石，「所有一切建設的事業，已積極進行，這弱國病民的鴉片，我們自然也應當用革命的手段來把它一律剷除」。<sup>240</sup>「中國如不能除毒禍，即永不能談建國。消極除

---

<sup>232</sup> 英文《中華年鑑》(1924: 560)，收錄於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1957: 623)。

<sup>233</sup> 〈中華民國拒毒會呈請國民政府禁煙文〉，中華民國拒毒會編著，《反對鴉片公賣言論集》，(1931)，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897)。

<sup>234</sup> 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207)。

<sup>235</sup> 有研究指出，蔣介石禁煙出於兩個重要政治目的：一、利用禁煙機會，加強對各地方軍閥的控制。各地方軍閥表面上雖歸順南京中央政府，實際仍各自為政，這些軍閥勢力很大程度是靠鴉片支撐和統治。蔣介石藉禁煙控制鴉片運銷，就可控制地方軍閥勢力的發展；二、藉禁煙壟斷全國鴉片利益，藉以籌集團剿紅軍的軍費。蔣介石決定，以禁煙為名，建立一套特殊化的經濟體系，把收繳、販賣鴉片的巨額款項，由「剿匪總司令部」直接支配。見馬模貞，《毒品在中國》(1994: 125~126)。

<sup>236</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禁煙運動宣傳綱要》，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236)。

<sup>237</sup> 王德溥〈禁煙工作總提示〉，《禁煙手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272~273)。

<sup>238</sup> 蔣中正〈禁煙的意義與方法〉(十七年十一月在全國禁煙會議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 15)，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33)。

<sup>239</sup> 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188)。

<sup>240</sup> 褚民誼〈以革命手段來剷除鴉片〉(十七年十一月在全國禁煙會議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 20)，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

害，尚且不能，更何論積極建設？死亡歧路上之國人，救身，救家，救鄉，救國，應斷然以拒毒自強為第一義也」。<sup>241</sup>

確實，救身，救家，救鄉，救國是當時國族環境的處境。內戰外患，戰亂迭起，百廢待舉，憲政建設不知何時可期，鴉片弱國病民，正是國家建設，政權穩固不得不掃除的障礙。而鴉片威脅國族興亡，從晚清延續到民國，狀況沒什麼改變，帝國主義依舊謀我日亟。1928年戴傳賢在〈禁煙與國家興亡〉演說中提醒，「禁煙問題和中國國家興亡問題，是時時刻刻成一平行線的……又有惡勢力的鴉片隨帝國主義而來，鴉片是假借帝國主義的武力廣銷在我們中華全國，所以我們民族一天衰弱一天，政治一天腐敗一天」。<sup>242</sup>到了1935年，鴉片問題仍是國家亟待解決問題，這一年國民政府配合新生活運動，開始實施「二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1936年，蔣介石在禁煙總會首次會議訓詞，提出禁煙是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的第一步，禁煙不成，其它一切建設都不用談，要完成革命，拯救國族危亡，得盡速禁煙。他說，「禁煙如果不能收效，其它一切政治建設的工作，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不收效，所以我們大家要看鴉片之危險，勝於外侮，要認定禁絕鴉片，為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的第一要務」，總之「現在我們為要完成革命的政治建設，為要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為要樹立國家民族高尚的人格，為要提高國家民族的地位，非儘速禁絕鴉片不可」。<sup>243</sup>

蔣介石的演說，可以看做是典型的民族主義消費論述，將鴉片消費與救國、救民族、革命建國、實現三民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結合，以進入現代化國家之列。這也民國肇建以來主要的反鴉片消費論調。即便政府本身曾透過專賣政策，利用鴉片籌措國家財源，但其基本論調，仍將鴉片消費放在國族救亡框架考量。消費在這裡，不再是個人自由選擇的問題，而是國家准不允許或國家授權准許（鴉片專賣）的問題。環顧國史發展，我們不難發現不只消費、感官品味、個人嗜好受到國家管治，甚至身體、婚配、生育也納入國族發展計劃，接受國家調動和控制。這是一個一切都屬於國家民族所有的時代，只有國族生存需要，而無個人嗜好和需求。消費，特別是逸樂消閒，無關宏旨的鴉片吸食，原本就是危機時代可犧牲對象，更何況它直接傷害國家發展和民族命脈。

---

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38)。

<sup>241</sup> 〈拒毒為救亡大計之一〉，《大公報》，1932年5月11日，轉引自馬模貞，《毒品在中國》(1994: 74)。

<sup>242</sup> 戴傳賢，〈禁煙與國家興亡〉(十七年十一月在全國禁煙會議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 18)，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36)。

<sup>243</sup> 蔣介石，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禁煙總會首次會議訓詞，〈禁絕鴉片為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第一要務〉，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6)，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71, 174)。

### 三、國族救亡導向的品味政體

從上面反鴉片消費論述的建立，我們可以看到論述內容，亦即限制的條件隨著國家社會的需要和發展逐步提昇，這不意味著後一階段出現，前一階段問題的消失，鴉片毒害問題仍層疊並生，只不過我們可以藉著反鴉片消費論述看到晚清到民國的政經發展輪廓，以及國家面臨的危機、風險和關切的問題主軸為何。從上述面向可以看到鴉片消費政治的運作，鴉片成為新政體成敗的關鍵，改造煙民—癮民—廢民成為新國家的新公民，是國家建立的基礎，消費鴉片也成為一種透過恥感運作的社會排除，劃異了誰是公民或非公民，什麼是民意或反民意。並豎立健全國家，健康公民的一套常態標準以及宣示公民應負的任務。亦唯有透過鴉片消費的戒除才能形成一個定義為公民或國民的新政治集合體，以進入一個統一的作為中國人的國家。革命建國，國家統一的成敗也繫於鴉片的存毀。在這過程國家無疑扮演品味教導者角色，透過官方的法令頒布和執行，以及地方士紳、知識份子、各地禁煙組織、報紙雜誌、演義小說和傳教士的教誨、宣導，隨著國家不同發展的需要，讓消費者建立起鴉片有礙社會風俗和秩序；鴉片侵蝕國家財政基礎；鴉片戕害身體，影響社會正常運作和生產力；鴉片帶來個人和國家恥辱，並成為亡國滅種根源；鴉片是建立新國家，成為新公民的障礙；鴉片是國族救亡的大敵等消費認知。

這是一段漫長的教化過程或官方品味社會化的過程，也是鴉片遭污名化和罪責化的過程。將鴉片時尚的社會品味，重新定義為令人羞愧的壞品味和問題習性；同時讓消費者有正確的健康身體認知、強國保種的國族興亡認知，以及強烈的恥感意識。藉此將個人的消費選擇、感官品味導向配合國族發展需要的國家品味。國家雖然在禁煙行動上有所落差，然而透過這些反應國家不同階段需求的反鴉片消費論述，最後排除/改變了鴉片時尚的社會品味觀，形成官方合法品味政體，這反映在後面要討論的從時尚到羞恥政治的轉變上。

鴉片最終構成身體、社會和國家秩序的危機，將消費納入政治範疇，進行鴉片的社會控制，這種鴉片消費禁制，正是消費民族主義的典型，消費政治的操作。管治鴉片與治理中國，成為一體兩面之事，鴉片存在，不斷挑戰中國治理能力，包括政府決心、官吏清廉、地方政府的治安力量、中央政府的統治效能，以及國家財政是否需要鴉片稅收的支持等。從帝制到共和中國都遭到鴉片檢驗，也決定了中國命運軌跡，解決鴉片問題，也解決大部份中國問題。鴉片做為消費品，自來就跟政治脫不了關係，是物質政治化的說明。在這樣情況下，消費者的主體性，選擇權，消費的愉悅、吸食的感官享受、個人的嗜癖習性，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下全遭到壓制或排除，成為沉默、無言的一群。鴉片的敘事，通常都不是鴉片消費者自身的發言，而是出於消費政治考量被僭位代言，述說符合官方基調的訓誨警世故事或國族修辭。儘管鴉片在社會受到歡迎，成為追逐效法的風尚，這種時尚

品味跟官方品味競爭長久，構成鴉片消費的品味之戰，最後在恥感建構和國族意識中，官方品味獲得社會支持。簡言之，鴉片從流行時尚到社會邪惡，從炫耀體面到民族恥辱的轉化，說明自近代中國以來某種消費品味的被支配性，一種感官品味的政治/社會/國家建構，建構出邁向現代化新中國過程中自我意識覺醒和自我轉化動力的羞恥論述以及救國保種的國富民強論述。消費乃構成了攸關道德、社會秩序、身份建構、國家認同、民族存亡、文明進步的消費政治議題。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改革主義、反帝國殖民主義等幾股勢力交纏下形成鴉片的消費政治，進而形成對個人生活、習性和癮的干預和控制。因此，鴉片吸食在中國，不只是消費選擇、口味感受的問題，它從來就是政治問題，不得不構成消費與政治錯綜難解的糾葛，落入治安/管治的範疇。

反鴉片消費是條漫長艱困的路，它伴隨中國一路崎嶇的走向現代化之路。中國的現代性過程，鴉片無疑扮演觸媒角色，以負面的摧毀促成正面的改革。反鴉片消費的論述和說辭，基本上多於實際的禁煙行動，反鴉片的道德論述和政治論述連篇累牘，建構出制式的官方消費品味，而其實際效用反在於主導或反映中國走向現代性的改革之路，從身體現代性轉型，以至現代性生命政治的誕生，這是國家建立起以國族救亡為導向的反鴉片品味政體，在此品味政體下，鴉片成爲帝國主義亡國工具，革命建國、富國強種的大礙。也就是上述六種反鴉片論述形成的品味政體，構成鴉片與救亡現代性關係的討論，形成本論文相關議題，如羞恥論述構成本章的從時尚到羞恥政治的討論，以及第四章鴉片的視覺化建構恥感身體意識和恥感視覺認知的討論；鴉片造成的兵弱銀荒、亡國滅種憂慮以及強國保種的國族救亡行動，適足以開展出生命政治的現代性，這是第五章的課題。亦即，從歷史事實來看，反鴉片消費行動真正發揮禁煙功能可能不大，除了羞恥政治策略在整個國家企圖改革和救亡氛圍下，有所奏效，大部份時期反而是禁之不絕。真正發揮效果的是，透過這些論述形成的反鴉片官方品味逐漸成爲社會普遍接受的品味，一種視鴉片爲壞習性、壞品味的品味，俾建立去鴉片以救亡的意識型態，匯聚爲國家共識和全民的認知，即便嗜吸成癮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中國的救亡工程和現代性事業，就在鴉片的蔓延和反鴉片的禁制行動和論述中開展。接著我們要看鴉片如何成爲一種社會追求仿效的時尚和品味，使得鴉片吸食者加速蔓延；同時又如何透過詬病化和恥辱化，形成消費政治策略，以壓制鴉片吸食者的蔓延。

### 第三節 一種社會品味：鴉片時尚流風

#### 一、流風所及：由上而下的時尚感染

1838年（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上了一道奏摺指出，鴉片吸食成風，已從官紳階層移轉到庶民大眾，「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為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盛京等處，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sup>244</sup>黃爵滋清楚的鋪陳鴉片做為一種消費品，存在階層消費的事實，以及如何從精英消費到大眾消費的過程。鴉片在十八世紀，由於進口尚未氾濫，數量有限，價格昂貴，對大部份人而言無疑是奢侈品，只有皇室貴族、官府縉紳、富家子弟才有能力享用。隨著進口量增加，鴉片消費門檻降低，以及「漸染成風」這種社會風尚作用，造成鴉片消費的大眾化和普及化，連婦女和僧尼道士這些方外之士都投入了鴉片的消費。我們一方面可看到鴉片這種消費品沒有性別、階級、職業等門檻限制，任何人都可輕易進入；另一方面看到吸食鴉片已經成為平常的物事，不再高不可攀。道光年間，鴉片消費既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上至官紳士大夫，下逮商賈工役，效尤吸食，相習成風」，<sup>245</sup>描素的也是這種消費普及和滲透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效尤吸食，相習成風」，更清楚的指出鴉片消費具有社會感染和仿倣作用。亦即，鴉片成為一種時髦的消閒品，成為大眾趨新驚奇，追逐潮流的對象，也構成一種民之所趨的鴉片消費的社會品味。

由於時尚具社會模倣作用，鴉片原先在宮中使用，後為官紳所習用，最後為庶民百姓所模倣。1884年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est Faber)對鴉片傳佈的觀察，「溯其入局之初，先由官員幕友，次及差役房科，推而至於武弁兵丁，文人商賈，與夫縉紳大夫，力役工作，婦人女子，莫不皆然」。<sup>246</sup>花之安沒提到宮廷皇室，他觀察到的風尚走向，由官府、軍中、紳商，再到勞動階層和婦女。形成由上而下的消費品味擴散模式。就像徐珂所說，「孝欽后以吸福壽膏著稱於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sup>247</sup>慈禧嗜好鴉片，必引起宮中、朝廷和民間的效法使用。慶親

<sup>244</sup>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254~255）。

<sup>245</sup> 轉引自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174）。

<sup>246</sup> 花之安(Ernest Faber)，《自西徂東》(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2002：67）。

<sup>247</sup> 徐珂，〈文人吸鴉片構腹稿〉，《清稗類鈔》（第四冊）（1984：1609）。

王奕勳，其子戴振等也都是鴉片吸食者。<sup>248</sup>至於慈禧的染嗜，則又來自咸豐皇帝，「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宵旰焦勞，恒以此自遣……故孝欽后亦沾染焉」。<sup>249</sup>再從咸豐帝往前推，他的父親道光帝早年也沉迷於鴉片，「有清諸帝，惟道光曾吸煙已成癮矣」，但最後悟到鴉片「不但亡家實可亡國」，乃將煙膏棄去。<sup>250</sup>可見宮中、皇室互相競爭模仿，相染嚴重。同樣的鴉片消費的品味，下放到民間，也必形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爭相模仿雅事。

從這些現象可以知道，鴉片吸食最早是宮廷和官方的風尚，因為明末鴉片已成進貢貢物，《大明會典》記載，暹羅、爪哇、榜葛刺三國，進貢烏香，即鴉片做為貢物，「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烏煙，就其本名還音曰鴉片，亦曰阿片，亦曰亞榮，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sup>251</sup>當時的鴉片主要做為藥材使用，由於它的醫療用途廣泛，使得鴉片成為進口商品，我們從當時鴉片訂定進口稅率可知。<sup>252</sup>明天順、成化年間的徐伯齡，記錄了明代輸入鴉片的事實，以及鴉片做為藥用的功效。鴉片「味辛、大熱、有毒，主興助陽事，狀精益氣，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又能治遠年久病，虛損元氣者……成化癸卯，嘗令中貴出海南、閩浙、川陝，近西域諸處收買之，其價與黃金等」。<sup>253</sup>從這裡可以看出，明廷當時已派人到近西域之處向外人收買鴉片，鴉片價昂如金，顯然只有宮中的皇室宗親、王公大臣才有能力消費。而用途可能做為春藥，以助房事。這形成早期吸鴉片的圈子和文化，由皇帝、皇室宗親，還有旁邊侍候的太監組成。太監為什麼會加入吸食行列，他們有可能要比一般人更早接觸到鴉片。因為他們要服侍皇帝或皇室吸食鴉片，他們得熟悉整套抽煙過程，在準備過程中他們可能要試抽，私底下也可能學樣吸食，太監成為最熟練的鴉片吸食者，同時也成為范伯倫(Veblen)所說「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和「代理有閒」(vicarious leisure)最好的例子。<sup>254</sup>也就是以他們自身的習來的品味、教養和消費能力，彰顯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財富。

而最早的鴉片之害，也從宮廷開始，相傳明神宗嗜食鴉片，<sup>255</sup>不理朝政三十年，「鴉片初入中國，宮禁先受其毒。相傳明神宗御極三十年，不召見群臣，

---

<sup>248</sup> 參見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書信集》(1986: 496~498)。

<sup>249</sup> 徐珂，〈孝欽后戒煙〉，《清稗類鈔》(第一冊)(1984: 383)。

<sup>250</sup> 雷瑄，〈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鴉片戰爭》(第一冊)(2000: 292)。

<sup>251</sup> 俞正燮，〈癸巳類稿〉，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鴉片戰爭》(第一冊)(2000: 287)。

<sup>252</sup> 1589年(萬曆17年)訂定，「每十斤稅銀兩錢」，1615年(萬曆43年)，稅率改為，「每十斤稅銀一錢七分三厘」。

<sup>253</sup> 徐伯齡，《蟬精集》，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鑑》(1997: 12)。

<sup>254</sup>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2005: 59).

<sup>255</sup> 1958年挖掘定陵地宮，以科學檢驗神宗骸骨，確實發現其屍骨中有較重的嗎啡成份。參見王宏斌，《禁毒史鑑》(1997: 15)。

即爲此物所累」。<sup>256</sup>上行下效，皇帝吸食成風，也促成日後太監、侍衛、官員的學樣吸食，氾濫成災，宮中一片黑霧。到了清乾、嘉年間，太監和宮廷侍衛吸食鴉片更形嚴重，形成宮中一大問題，使得皇帝必須下令禁止，遏止邪風。1813年（嘉慶十八年）一道要求對這些吸食者科罪的上諭可以看出，「乃今日侍衛官員等頗有食之者，甚屬可惡……不可不嚴行飭禁」。<sup>257</sup>因爲，「侍衛身列禁庭，官員名登仕版，迥非齊民可比，乃亦效尤買食，是其甘蹈邪僻……甚屬可惡」。<sup>258</sup>同年又一道上諭，「太監供役內廷，聞亦有買食者，其情節尤爲可惡……如有違禁故犯者，立行查拿」。<sup>259</sup>違犯禁令的太監、侍衛、官員在當時以革職、杖一百、枷號兩個月論處，嚴重者發配邊疆爲奴。爲什麼宮中會形成吸食鴉片的風氣，史景遷 (Jonathan D.Spence) 的認爲，清朝的皇室宗親和太監，都不像明朝那樣掌有大權，他們既無法展現政治權力，生活悠閒又十分無趣，不知該做什麼打發時間，這導致他們吸食鴉片以爲消遣。<sup>260</sup>除了政治挫折、生活無趣，鄭揚文 (Zheng Yangwen) 則認爲太監沉迷鴉片，可能還有性挫折的問題。不管動機如何，宮中這群人構成了中國最早的鴉片吸食圈子

上層階級的吸食文化相互傳染效法，以宮廷爲核心向外向下擴散，官場衙門成爲另一個鴉片癖好養成的場域，「嘉慶中葉，官場上下成嗜好矣。至道光一二十年間爲愈盛」。<sup>261</sup>煙雲盛況，有人以詩戲之，「鴉片盛行，官署上下幾於無人不吸，公門之中，幾成煙窟。有人仿唐詩一首曰：一進二三堂，牀鋪四五張，煙燈六七盞，八九十枝槍」。<sup>262</sup>這種現象並非誇張，1831年（道光十一年），有人統計直隸一省，吸煙最多者就是衙門，幾乎無人不吸，「現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鴉片煙之人，而各衙門爲尤甚，約計督撫以下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絕無食鴉片煙者，甚屬寥寥」。<sup>263</sup>到了咸同年間，官員吸食依然成風，某位王姓官員行李車內置放36枝煙槍，一問之下分屬全家每個人，包括幕友家丁在內。於是有人感嘆，「朝廷不用人而用鬼」，「咸同以降，煙鬼日多……王曾任京秩……令見坐車行李車之後別有一車，所置者皆煙具。詢其僕，曰：『中有煙槍三十六枝，蓋自王而外，若所謂太太、姨太太、少爺、少奶奶、孫少爺、孫少奶奶者，無不吸煙。益以幕

<sup>256</sup> 雷瑨，〈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鴉片戰爭》（第一冊）（2000：292）。

<sup>257</sup> 〈著刑部擬定販賣吸食者科條罪名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10）。

<sup>258</sup> 1818年（嘉慶十八年），〈管理刑部事務董誥等奏復酌議買食鴉片罪名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10）。

<sup>259</sup> 〈嚴禁侍衛官員太監買食鴉片並嚴查鴉片煙販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11）。

<sup>260</sup> Jonathan D.Spence,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 Carolyn Grant(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5: 144).

<sup>261</sup> 雷瑨，〈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鴉片戰爭》（第一冊）（2000：314）。

<sup>262</sup> 〈公門爲煙窟〉，徐珂，《清稗類鈔》（第四冊）（1986：1609）。

<sup>263</sup> 〈兵科給事中劉光三奏請酌加食鴉片煙罪名等刑責〉，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30）。



友家丁，適得《水滸》天罡之數』。令歸，與幕賓閒話，太息而語曰：『今時局如此，朝廷乃不用人而用鬼，宜世界之黑闇，至於此極也，又何言。』<sup>264</sup> 王姓官員全家，還有幕友家丁不分長幼男女，盡皆煙鬼，仿佛是一個鴉片中國的縮影，不分階層、不分職業、不分性別、不分地域都可名登黑籍。

地方官員和幕友的吸食鴉片，對地方鴉片消費風氣形成，起著示範作用。地方官和衙門扮演著政治、經濟、司法、道德秩序的中樞，也是人民日常生活接觸最直接、緊密的地方和人物。當官員和一竿幕友、胥吏在衙門這個道德、法律、社會秩序象徵的空間吸食鴉片，甚至買賣鴉片，不止說明鴉片禁令形同廢紙，更如同鼓動風潮，激勵人民，相率效尤，相習吸食。所以地方富賈、一般百姓上行下效，視鴉片消費為風尚，漸染成習。衙門仿佛成為地方的品味製造中心，時尚的播散機構。1838年(道光十八年)山西巡撫申啓賢，看到這問題嚴重性，衙門乃民眾觀感之所由，衙門內都在吸煙，如何查拿煙犯，特別上摺建議，「職官及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在衙署內買食鴉片煙，宜加重治罪」，他的理由，「職官為閭閻風化之原，衙署乃蒞政辦公之所，均為庶民觀感所由。且法繩自近，必須官署無買食鴉片煙之人，方能查拿販賣服食之犯，否則必被挾制」。<sup>265</sup>確實，中國鴉片無法徹底禁制原因之一就是官吏吸食成風，如何能帶頭查緝鴉片，甚而受賄私縱，或參與鴉片經營和護運。1839年(道光十九年)道光意識到這問題，諭示禁煙必自衙門始，禁衙門之煙，則必從幕友開始，否則無法帶頭矯正民間風氣，懲治違犯者，「外省大小衙門辦理公事，不能不延請幕友，而此輩習氣最深，吸食鴉片者十居六七……欲禁士民之煙，必自官署始；欲禁官署之煙，必自幕友始。倘竟畏首畏尾，於此種劣幕一味含容，則闔署以內皆無顧忌，而民間之興販吸食者，亦將有所借口，又安望其有犯即懲，同挽積習耶」。<sup>266</sup>彭養鷗，《黑籍冤魂》，也提到衙門如何成為勾引人上癮的地方，「這鴉片勾人上癮，第一是煙館，第二是衙門。那衙中幕友……大半是個煙鬼」，書中人物苗秀夫，沒事往這班幕友家煙榻坐，剛開始還戒心，怕自己也上癮，「無奈吃煙的朋友多，這裡請他吸一筒，那裡請他呼一筒……不知不覺，就會吃上了癮」。<sup>267</sup>從這裡殆可管窺衙門如何散播鴉片風氣，在社交應酬，人際互動中讓人不知不覺染上煙癮。

鴉片消費從宮廷到官場，原本只是少數上層精英的休閒文化，但因他們的品味文化和生活風格具社會示範作用，成為中下階層模仿效法對象，文人仕紳、商賈富豪以至一般平民，成為鴉片時尚的追逐者。1831年(道光十一年)，一道奏摺說明衙門幕友，販運煙商的吸煙習尚，在轉相煽誘，彼此襲仿的風氣下，擴及

<sup>264</sup> 〈朝廷不用人而用鬼〉，徐珂，《清稗類鈔》(第四冊)(1986: 1671)。

<sup>265</sup> 〈山西巡撫申啓賢奏復塞漏培本應嚴懲販煙開館人犯四條章程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65)。

<sup>266</sup> 〈著直省督撫查辦吸食鴉片之幕友不得瞻顧容隱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1998: 140)。

<sup>267</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1984: 104)。

世家子弟，城市富賈，甚至庶民百姓也染此風，「竊查鴉片煙來自外洋，其始間有劣幕、奸商私自買食，浸假而貴介子弟，城市富豪轉相煽誘，乃沿及於平民」。<sup>268</sup>此外，這些官員的調遷它處或回鄉歸隱，也不無帶有傳佈鴉片吸食風氣的作用，使得鴉片風尚不管在階層或地域上都迅速蔓延、擴張。1828年（道光九年），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就指出鴉片在階層和地域擴張的事實，如不及早禁制，勢將蠹國害民，「其始食此，僅系幫友長隨，今則官民士紳皆所不免。其始僅在海濱近地，今則漸染十數省之廣……以貨則蠹國若彼，以食則害民如此。若不設法禁制，弊將何所終極」。<sup>269</sup>如果我們注意道光朝君臣討論鴉片危害的奏摺上諭，不難發現宮中、官場、軍隊鴉片吸食惡習經常成為檢討的焦點。鴉片導致吏治不清，貪污腐敗，將領兵丁無作戰能力，嚴重侵蝕國家根基，國防力量。地方政治秩序和國家兵備潰散，幾乎無力撐起整個國家運作，埋下日後亡國滅種隱憂。也因此朝廷歷來禁令對宮中太監、官兵胥吏吸食鴉片，從無寬容緩衝期，違者立即論處。因為這批官吏是國家機器運轉的中間力量，他們的沉迷鴉片，不只逐步淘空國家，更造成「轉相煽誘」的效力，影響其它民眾效法，最後不分階層、屬性，整個國家沉溺在鴉片國度。吸食階層擴張如此，地域擴張也不例外，廣州是鴉片最大集散地，慢慢地鴉片販運吸食擴及到沿海港口，最後深達內陸。從嘉慶、道光年間君臣往來的上諭、奏摺，可以看到福建、浙江、雲南、貴州、安徽、湖南、河北、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甘肅、黑龍江、新疆等地，已出現吸食、販運、甚至種植、製造鴉片現象。整個中國大半已淪為黑霧迷濛的鴉片之鄉，鴉片消費不得不構成國家治理最嚴重的問題。

## 二、鴉片品味：精緻物質文化和儀式

從上述的討論，中國的鴉片消費模式，從消費理論來看這是很典型的范伯倫和齊美爾(Simmel)的階層消費和時尚仿倣模型。消費自來都視為階級身份的標示，時尚、品味和生活風格則是識別的標誌。齊美爾認為時尚同時具有獨特性/普遍性，均質化/差異化/，一致性/個體性，同化/分化以及模仿與劃異的雙重性。模仿與劃異則是階級分野的產物，具有下層階級模仿上層時尚，上層階級則不斷創新以示區別劃異的作用，時尚就在這種雙重作用中不斷循環更新。<sup>270</sup>時尚因此成為社會性的區別符號。范伯倫分析了新興中產階級的崛起如何透過炫耀式消費和代理有閒，來表達自己的有閒有錢的新社會身份，他們也需知道如何以得體的方式進行消費，以及消費屬於適合自己身份的物品，這是一套品味的學習和模

---

<sup>268</sup> 〈兵科給事中劉光三奏請酌加食鴉片煙罪名等刑責〉，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1998: 30)。

<sup>269</sup> 〈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奏為請禁外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55)。

<sup>270</sup>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eds), *Simmel on Culture*(1997: 187~191).

仿，要養成飲食、服飾和建築等物事的鑑賞能力。<sup>271</sup>金錢競爭和財物、時間揮霍打破傳統身份繼承的封閉等級秩序，成為社會向上流動的憑藉。從另一角度看，都市現代性形成，有機共同體瓦解，人際疏離冷漠使得時尚、炫耀成為茫茫人群中被察覺識別的身份標誌。布爾迪厄(Bourdieu)則指出品味是一種階級標誌，是歷史與社會的建構，既維持也複製社會秩序。品味進行分類作用，也將分類者分類。品味表現為一種區辨能力，亦即對事物使用、生活方式的選擇、區別和鑑識上，同時也表現在身體習癖和生活風格的形成上。這種區別、劃異的品味分類作用，成為一種象徵性鬥爭，一種品味合法性的競爭，一種生活風格的競爭，也是一種身份的競爭。因此歐洲消費誕生的條件在於社會的競爭和仿倣，中產階級為模倣富人階級打造新的身份，不惜進行炫耀式消費，而當時歐洲的時尚流行也驅動了消費的競爭，這種說法是消費由上而下的滲入(trickle-down)模型，強調精英文化的向下影響力以及下層階級的向上模倣力。

官紳士人做為社會精英階層，他們有一定文化修養和財富能力從事品味消費，這群人如同布爾迪厄所說具文化品味養成和區辨能力，他們是鴉片消費的品味制定者和傳播者。如果不從罪責化和污名化的角度看待，鴉片消費可以是精緻物質文化的展現，它表現在鴉片煙具的器物文明，以及一套繁複的抽煙過程和文化儀式。彭養鷗的《黑籍冤魂》，詳盡的描寫了一段富裕之家風雅精緻的吸煙場景，也是美學工藝品的展示，「他那一副煙具，尤極其精緻。一枝象牙的煙槍，配個碧綠的秋角咬嘴；一隻有名的廈門煙斗，上面彩畫著八駿圖；一盞雲白銅的煙燈；一個水晶似的玻璃燈罩；那煙盒都是玳瑁的，又有那京都四遠馳名的鋼絲煙杆，一隻一隻架在一個珊瑚架上；一個煙盤是紫檀花梨木雕成的，用銀絲嵌就一個個團球花紋。只他這副煙具，已足令人愛慕。更兼他那煙膏，又煎得極其講究，廣膏已自有名，他更用參湯收膏……清香撲鼻，不吃煙的人聞了，也要心醉」。<sup>272</sup>彭養鷗的描述並不誇張，上述宛如器物奇觀的煙具場景正是當時富貴之家普遍的吸煙配備。確實，鴉片煙具的精緻考究宛如藝術品，展現出高度物質文化和美學鑑賞。<sup>273</sup>如「煙槍如洞簫，煙燈以銅為蓋，玻璃為罩」，燈具製作最精的是山西太谷縣的太谷燈，山東膠州的膠州燈，「皆製作精巧而靈便。燈內之油雖傾倒之，亦不外溢」。<sup>274</sup>煙槍槍管以竹管製成，知名有湘妃竹，崖州竹或犀角管做成；煙斗亦相當精緻，有象牙嵌寶石、銀質描絲、白玉、翡翠、珍珠、紫砂等材質。<sup>275</sup>

<sup>271</sup> 見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2007: 66~88)。

<sup>272</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1984: 35~36)。

<sup>273</sup> 相關研究見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百年煙痕：鴉片煙具遺珍》(2004)；Peter Lee, *Opium Culture: The Art &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2006).；Steven Martin, *The Art of Opium Antiques*(2007).

<sup>274</sup> 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鴉片戰爭》(第一冊)(2000: 306)。

<sup>275</sup> 參考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百年煙痕：鴉片煙具遺珍》(2004)。

考究的煙管不只鑲金嵌銀，還精雕細鏤，刻以花紋圖式，或名人詩句，成爲供人品味玩賞的精美藝術品。<sup>276</sup>一些高級煙館對煙具也有許多考究，用以招徠顧客，如溫州的專門招待地方士紳、殷商富戶的上等煙館，館內煙具從煙盤、煙筒、煙嘴、煙斗、斗腳、煙盞、煙插、煙扒、煙燈、茶壺、茶盤，無一不講究，每件物品都有出處和來頭，進入煙館猷如參觀精美的工藝展，「煙盤有紅木的、白銅的；煙筒多以紫竹製成，更考究則用甘蔗或象牙爲筒，配以白玉或象牙煙嘴。煙斗也有妙斗、平斗之分，而以廣東梁有軒的朱砂斗爲最出名，斗腳配以銀質馬鞍橋。還有綿羊角煙盞、廣東煙插、白銅灰扒、吳興小茶壺。煙燈採用的路橋燈，配以白銅花腳盤」。<sup>277</sup>煙斗也有以安徽壽州斗爲精，陶土燒製，有八稜、六稜、四方、圓型，上面嵌有銀線紋飾。煙扞子，則以青島名匠張判製作的「張判扞子」出名，用 14 鋼絲，以一定火候淬煉而成，長 18 公分，尖端鋒利如錐，另一端爲鏟型，上刻張判二字，用於燒烤煙泡、上斗、通斗之用。時人稱膠州燈、壽州斗、張判煙扞、象牙槍爲煙具中的四大名件。<sup>278</sup>

至於鴉片煙膏，更是講究，最有名的如浙江的「台漿」、福建的「建漿」、四川的「夔漿」，<sup>279</sup>素爲癮君子所追求。在鴉片進口時代，上流人士所追求的當然是洋藥，而洋藥中最好的是英國進口的孟加拉鴉片（公班土），品質勝於葡萄牙人進口的馬拉瓦鴉片（白皮土）。公班土是煙膏的上品，價格昂貴，非一般人能享用，財力不足只能用價低質差的白皮土。土產煙土剛開始品質難跟洋藥相將，但過一段時間，生產、製造技術越趨精良講究，品質也有所提昇。上述幾中土產煙膏就是最爲人知的代表。光緒年間廣幫煙膏首推第一，各幫不能及，價格昂貴，老吸煙者非此煙膏不過癮，而其煙灰尚可換煙，這是別幫所不及。<sup>280</sup>而熬製煙膏更是一項專門技術，製程繁複多工，包括煮煙（煙土置裝水鍋中，大火煮沸，使煙水合一，呈糊狀汁液）、過籠（將汁液倒入竹籠，過濾渣滓，濾出純煙液）、收膏（將純煙液倒入銅鍋，以慢火徐徐收膏，蒸掉水分，呈半固體狀態）、儲存（煉成之煙膏裝於瓷器、銀器等器皿儲存，凝結如粥備用。粥狀之半固體即爲煙膏）。<sup>281</sup>

而在燒製過程，對火候、用水、次數都有講究，「掌握火候，火不能大，要用文火細熬」，除了火候要求，用來熬膏的水更要，「用官泉水或滴檐水，不用井水」，因爲水不好就會影響出煙率，至於次數，「一般煮煙需要三次，熬一次過慮一次，熬成糊狀後，再放在土坯上，讓其冷卻乾燥，然後用小木板搓成細棒，切

<sup>276</sup> 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162）。

<sup>277</sup> 戴文席，〈解放前溫州的鴉片流毒〉，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422）。

<sup>278</sup> 袁靜波，〈煙榻絮語〉，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292）。

<sup>279</sup> 雷瑄，〈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鴉片戰爭》（第一冊）（2000: 294）。

<sup>280</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 2）。

<sup>281</sup> 袁靜波，〈煙榻絮語〉，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290）。

成等分」。<sup>282</sup>另有熬膏者，獨具創意，熬製自己品牌特色的煙膏。如江蘇有些地方，熬煮煙膏更爲繁複細緻，號稱「三熬九煉」。湖北著名技師萬天寶，煮的煙膏叫「漂煙」，其作法是，三煮、三濾、三澄、三漂，用白炭煙細細熬煮成膏，通常耗時三天煮成，再經一段時間土中窖藏才能吸食。廣州三有公司，有一批精良製膏師，製作嚴格，熬煮必用銅鍋，講究放多少煙土，配多少水，煮成多少熟膏，都有定量。熬煮的燃料也用最好的木炭，京炭燒煮。<sup>283</sup>至於吸食方式也有講究，有些煙癮過大，一般煙膏已無法過癮，必須加入煙灰，混合燒成煙泡，叫「龍虎斗」；有些則鴉片已無法滿足，須沾上「白麵」（海洛因）上斗，稱「風捲雪」；更甚者，在煙榻上左吸三口，右吸三口，叫「兩面開弓」，然後再打上一針嗎啡才能過足癮頭。<sup>284</sup>

從煙膏的品質、燒工的講究、煙具的精緻、煙室的雅適，展現鴉片物質奇觀以及一套鴉片品味的知識系統。有品味的鴉片煙客，除了擁有財力取得外，還必須具備知識和能力去鑑別每一物件的精粗良窳，瞭解每一品項的來源出處，正是這種對物質身世的熟悉和掌握，以及一套延長審美時間，繁複講究的操弄過程和微小差異的區辨，養成一種獨特的鴉片嗜癖和品味化生活風格，形成鴉片吸食的風雅化和精緻化。在吸煙過癮時，品玩高雅名貴物件，炫耀身家財富外，也展現自身高雅不俗的獨到品味能力。這種風雅的吸煙格調，算得上是一種閒賞文化活動，在中國琴、棋、書、畫、金石、篆刻、賞花、品茶的閒賞活動史上，開啓不同以往全新的閒情逸趣方式，以及新物件的工藝美學。而這套鴉片習癖養成的品味、儀式和知識系統，正足以促成時尚誕生，成爲他人追慕模仿的對象，也進一步加速鴉片之風的流傳。

### 三、鴉片煙館：複合式的休閒社交空間

至於鴉片煙館更是講究，特別是都市煙館展現都市消費文化繁華貴氣的一面。這類煙館絕不是西方人筆下陰森、幽暗、骯髒、污穢，躺著幾具狀似殭屍的鴉片煙鬼的廉價低劣煙館。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的上海，大小煙館有 1700 多家，胡祥翰在《上海小志》一書中，記載六〇年代以後上海煙館之盛與煙館之美的情形，「昔日煙館之盛，尤過茶肆，計租界中所稱大煙館，鱗次櫛比，不勝枚舉。唯初以法租界之眠雲閣爲最，繼則互相爭賽，復以南誠信爲首屈一指。規模宏敞，裝潢富麗，大如一榻，小如一盒，無不刻意講求，窮極工巧，故一般無癮者亦樂於臥游。入夜，稚妓紛集，粥粥群雌，尤形熱鬧。男女相對，一榻橫陳，不以爲

---

<sup>282</sup> 竇建孝，〈天水鴉片流毒見聞〉，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566）。

<sup>283</sup> 洗波，《煙毒的歷史》（2005：159~160）。

<sup>284</sup> 袁靜波，〈煙榻絮語〉，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294）。

怪……以是賈大夫一流趨之若鶩」。<sup>285</sup>這裡道出上海都會繁華一面，單是煙館富麗工巧，且有聲妓隨侍，一榻對吹，男女之防不再，成為富賈文士流連之所。這一華麗場景說明了，上海煙館開啓新的休閒娛樂功能，亦即上海煙館兼具茶館、妓館複合式的消遣逸樂功能，同時也是當時男女重要的社交場所。在煙館，抽煙之餘，可以狎妓，可以喝酒飲茶，成為文人士紳，富商巨賈宴客交遊的最佳社交場所。知名文士王韜，就經常偕友逛妓館抽鴉片，「梁闔齋來舍，同往萬福樓小飲……又往勾欄訪豔，鴉母芷芳特設片介（鴉片）」（1858年11月8日），「飯罷，同往訪豔……鴉母供片介，坐良久而別」（1860年3月5日）。<sup>286</sup>從王韜清淡的記載，可以看出狎妓抽鴉片已是件尋常不過的事。

而上海這種複合式功能的煙館，在當時為數不少，成為一時流行。池志徵記載了幾家代表性的煙館，「有以煙間兼酒樓者，大馬路之最樂居是也；有以煙間兼茶室者，四馬路之一層樓、五層樓、青蓮閣是也；有以煙間兼書場者，華眾會、論交樓、皆宜樓是也……豈必有煙霞癖者始能消受哉！此煙間也，亦游滬者所必有事也」。<sup>287</sup>功能多元又方便，且成為外人到滬必游之地，即便不抽煙者，也可到煙館消遣流連，開開眼界。葛元煦在《滬游雜記》也描繪了十九世紀七〇年代上海煙館情景，「上海煙館甲於天下，鋪設雅潔，茗碗、燈盤無不精巧。眠雲閣其最著也，窗牖掛落，雕鏤極工。……館內桌椅多用紅木鑲嵌石面，飛去青一兩百片，既可邀朋，又能過癮」。<sup>288</sup>可見煙館的富麗堂皇，雅緻考究。眠雲閣顯然是當年上海煙館的地標，成為邀請朋友過癮的最佳去處。當時煙館陳設華麗，功能又多樣，不只可以吸煙過癮，也是詩酒酬唱、社交往來和談生意、謀事情的休閒場所，無癮之人亦可偕友到訪一敘。

1872年，《申報》報導一則上海鴉片煙館豪華以及成為上流社會社交場所的情景，「華其居，麗其設，精其器，工其煙，是以海內文人商賈，無不聞其名，仰其景……故是設不但便行人之癮，實乃備文人巨賈之清玩。是以文人巨賈或論詩文，或談交易，是借煙以暢敘幽情也……是以有癮無癮者，無不樂於斯設也」。<sup>289</sup>煙館，不只是抽煙過癮之地，更是文人巨賈交遊往來的必到之處，可見當年煙館繁華，成為引人入勝的休閒盛景，同時也扮演社會交往的重要活動空間。也因煙館的社交功能，淡化鴉片的罪責性，在交際應酬中，吸煙成為附帶行為，不需太多心理負擔，無煙癮者，卻有機會近煙，起初隨意一抽，久之也煙癮上身。這類功能多元煙館，反而製造更多吸食者。特別是新興的女堂倌煙館，更是如此。在新奇、時髦、誘人的情色氛圍下，讓志不在煙者，進入其中，也染上煙癮。

<sup>285</sup> 胡祥翰，《上海小志》（1989：41）。s

<sup>286</sup> 王韜，《王韜日記》，（1987：34；141）。

<sup>287</sup> 葛元煦/黃式權/池志徵，《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989：160）。

<sup>288</sup> 葛元煦/黃式權/池志徵，《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989：31）。

<sup>289</sup> 《申報》，1872年6月15日。

煙館除了具有複合式休閒功能，成為社交旅遊最佳去處外，七〇年代上海煙館還有一項新特色，即開始有女堂倌的設置。<sup>290</sup>原先男性擔任遞煙送茶的跑堂角色，如今由年輕女子擔任，以招攬生意。這項創舉最早由上海眠雲閣設立，「眠雲閣……嘗僱用小女子作堂倌以招攬生意，一時間各煙間女堂倌盛行」。<sup>291</sup>由於煙館增添女子服務，憑添幾分情色氛圍，頓時吸引不少人慕名前來，嗜煙者外，沒煙癮者也因貪戀女堂倌前來消遣，甚而染上煙癮。由於商業效果良好，促使上海煙館普設女堂倌以興生意，「設得迷人新局陣，煙樓添有女堂倌」，<sup>292</sup>正是此意。當時《申報》報導不少煙館女堂倌盛況以致遭議的新聞，其中一篇報導，充分說明了女堂倌如何成為煙館招攬生意的手法，也吸引那些原來沒煙癮，卻因貪慕女色而染上煙癮者，「更有一種煙館，修築輝煌，鋪張精潔，專僱少年婦女應酬諸客，名曰女堂倌。蓋以之為餌，而引人上勾也。於是有癮者固欣然願往，無癮者亦樂得而嘗試之，遂有因而上癮者。其實皆為貪婦女之色，初非必欲吸煙也」。<sup>293</sup>女堂倌成為煙館炙手可熱的人物，「儼然為座上客者」，乃因「其既可以呼吸煙霞，又可以評量風月，遂無不趨之若鶩。就中解事者，更於會鈔時多費小賬一二十文以結其歡心」，<sup>294</sup>女堂倌可以陪著吸煙取樂，可以陪著吟風弄月，或賣弄風月情懷，無異於才藝兼具的青樓女子翻版，而她們雜處於男煙客榻中，橫陳對抽，更是別具風情，引人遐思。即便這些女堂倌不主動賣弄風情，也會遭來男客調戲一番。一名慕名來訪游客看到女堂倌遭戲的情景，「吸煙諸君，戲語淫詞，多方調笑，甚至捉手摸腳，有甚於閨房中者」。<sup>295</sup>這種新型態的逸樂方式和感官享受，莫不叫人趨之若鶩，嗜不嗜煙，都要好奇嚐鮮。但也因此，女堂倌招來傷風敗俗、淫亂人心的批評。

1872年社會開始出現建議查禁女堂倌聲音。女堂倌成為貪人厚賞，賣弄淫邪，穢形穢狀，毫無廉恥之徒，「其婦女貪人厚賞，不顧廉恥，調謔無狀，或坐其膝上，或一榻橫陳，其穢褻有不堪言者，開店者因藉此獲利無算」。<sup>296</sup>之所以會有如此批評，可能出於煙館原非妓院，竟出現妓院才有的放浪形骸惡狀，等於宣告妓院穢褻情事透過林立的煙館散佈社會任一角落，所以女堂倌成為道德敗壞的箭靶，「自來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端，至今日煙館中之用女堂止矣」。<sup>297</sup>更有人指出煙館這種新型態、多功能娛樂場所，成為煙癮戒不掉，女色揮不去，邪淫避不了的眾惡之地，「世間最易動人者，女色也；最易犯者，邪淫也；最難戒

<sup>290</sup> 關於煙館女堂倌的詳細研究，請見李長莉，《晚清上海》(2010: 290~305)。

<sup>291</sup> 葛元煦/黃式權/池志徵，《滬游雜記/松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989: 160)。

<sup>292</sup> 鴛鴦隱名氏，《洋場竹枝詞》，1872年7月12日，《申報》。

<sup>293</sup> 〈傷風化論〉，1872年5月23日，《申報》。

<sup>294</sup> 〈論上海風俗之壞〉，1886年12月31日，《申報》。

<sup>295</sup> 滄州舊隱，〈禁煙館女堂倌說〉，1872年12月3日，《申報》。

<sup>296</sup> 〈傷風化論〉，1872年5月23日，《申報》。

<sup>297</sup> 〈擬請禁女堂倌議〉，1872年5月25日，《申報》。

者，鴉片也。今一煙館中而三者備焉……設法救其弊，俾不至男女混雜，淫風流行」。<sup>298</sup>顯然，這類煙館開闢新的休閒逸樂方式，給人新的消遣感官經驗，特別是男女混雜，一榻橫陳，傳筒對吹，更是嶄新的視覺奇觀和感官經驗。因為它嚴重破壞男女之防的道德界線，卻又不是在該出現的青樓場域發生，使得這場景成爲新人耳目的鴉片享樂奇觀，這也正是遭人詬病抨擊最多的地方，更何況還造成曠業廢時，敗名傷身的社會問題，「彼店鋪之學生，紳富之子弟，因此而失業，敗名者正復何限」。<sup>299</sup>由於它的新鮮感、方便性、多重感官享受，成爲一般人的致命誘惑；此外，煙館也有瓦解階級界線、道德界線的作用，任何進去的人，不管什麼身份，都能身心放鬆，放下矜持，沉浸在吸煙、買笑的逸樂世界。「男女從而混雜，品不分貴賤，主僕亦可盤桓」，<sup>300</sup>這是鴉片煙館創造的暫時沒有身份、道德界線的民主享樂空間。

再者，女堂倌煙館由於消費價格低廉，又沒有妓院惡名的道德顧忌，許多人在不設防下進入煙館，除了紳富之外，一般口袋不豐的中下階層也可輕易消費，既促成女堂倌煙館的興盛，更擴大消費群眾，「夫酒館、妓館、戲館等，雖所在皆有，而所費甚多……惟煙館之有女堂倌，人以爲不過吸煙耳，而所關則甚大。輿抬下賤，鄉曲愚民，持百十文，陽爲吸煙，陰爲買笑」。但正因爲人以爲不過吸煙耳，或根本意不在煙，結果造成「豈料日積月累而癮已成，志蕩魂銷而業必曠」。<sup>301</sup>當時遂有人批評，女堂倌煙館結合煙、色兩大巨患，造成無窮弊害，「貨莫重於洋煙，害莫甚於女色」，「良以消耗資財爲煙爲烈，戕伐性命惟色爲尤，乃如近日女堂倌之煙館，竟將兩端巨患合成爲一，其流毒之慘，豈有窮極哉」。<sup>302</sup>而流毒無窮之譏，正好說明當時這種新興煙館如何成爲人之所趨的休閒品味和享樂風尚。

不管是煙館與妓院功能結合的花煙間，或附設女堂倌的煙館，都說明了一種新的城市消費型態誕生和休閒享樂風格的成熟。這些上海新型態煙館的娛樂方式，無疑也創造一種前所未見的煙館休閒文化和新的吸煙享樂風潮，同時它也是一種高度商品化和消費化的新興娛樂產業，顯示城市經濟旺盛的另一面。女堂倌成爲商品一部份和消費的對象，不管是爲了買笑而吸煙，或爲了吸煙趁便買笑，或因好奇慕名、時勢所趨而買笑復買煙，都發揮了商品消費的綜效，「無貴無賤，若老若幼，爭趨如鶩」，<sup>303</sup>正是這效果的說明。因爲煙館的消費策略在於，價格便宜，功能多樣，又讓人沒有顧忌，而且又是社會享樂潮流所趨，往往讓人在不

---

<sup>298</sup> 〈傷風化論〉，1872年5月23日，《申報》。

<sup>299</sup> 〈論上海風俗之壞〉，1886年12月31日，《申報》。

<sup>300</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356）。

<sup>301</sup> 〈擬請禁女堂倌議〉，1872年5月25日，《申報》。

<sup>302</sup> 上海閩邑紳商公啓，〈論女堂煙館亟宜禁止事〉，1872年2月4日，《申報》。

<sup>303</sup> 上海閩邑紳商公啓，〈論女堂煙館亟宜禁止事〉，1872年2月4日，《申報》。



設防下染上煙癮，就算陽為吸煙，陰為買笑者，最後也都成為癮君子。「一入彀中，往往流連忘返……廢寢忘食，遂荒正事，無癮者漸成癮」，<sup>304</sup>說明了染癮於不意的過程。這種新型時尚煙館無疑製造更多煙客。而鴉片結合其它消遣娛樂型態，也開創複雜細緻的鴉片消費新品味。這種鴉片消費品味，即便衛道之士，嚴予抨擊，國家重申鴉片禁令，查禁女堂倌，仍無法排除這一社會所趨之品味。1885年一篇報導指出，「……莫不以女堂為招引之媒。漸推漸廣，幾與昔年未禁時無甚差別」。<sup>305</sup>十九世紀八〇年代，不止女堂倌依舊存在，當時婦女逛煙館也蔚為風尚，甚至有外地婦女慕名游觀，「更有甚者，別府州縣之人，揄揚海上煙茶館之盛……」，<sup>306</sup>所以特地到滬一游煙茶館，滿足好奇。婦女進煙館，交游應酬，男女雜坐，不以為意，「如著名之大煙館，兼賣茶之幾家，每日三四下鐘後，座客常滿，男女雜坐，嬉戲笑語，廣眾之間，手足勾引，毫不避忌」，<sup>307</sup>煙館功能不只吸煙，更是交際場所，婦女敢予踏入煙館，一方面顯示八〇年代婦女，已有進出公共休閒場所，從事社交往來，消遣娛樂的觀念和環境，甚至形成一股社會時尚。<sup>308</sup>七〇年代一首竹枝詞，早就道出女子休閒冶游要較男性熱衷的盛景，「幻出滄桑事更奇，冶游巾幗勝鬚眉」，<sup>309</sup>八〇年代報紙報導婦女呼朋引伴，同逛煙館茶坊的情事，更不以為怪，「茶坊煙館，鱗次櫛比……以致婦女引類呼朋，趨之若鶩。男女雜處，盡夜嬉遊……相習成風，毫不為怪」。<sup>310</sup>

從相習成風可知婦女進出煙館，甚至與男性並陳對吸的情景，已非殊異。剛開始可能是中下層婦女踏足這些場所，最後連體面的有錢婦女也進出高級娛樂場所。這種相習成風，促成了煙館的有增無減，茶樓翻陳出新。更因有婦女勾留煙館，讓人趨之若鶩，深陷其中，「所以舉國若狂，趨之如鶩者，正以有此等婦女勾留顧盼，而入其中者始迷而不得出也」的盛況。<sup>311</sup>可見婦女涉足煙館等娛樂休閒場所，既受時尚所趨，本身也構成引人注目的社會時尚。在煙館文化裡，有了女性的參與，說明鴉片消費的平民性和民主性，沒有性別、階級和道德界線，帝國時期嚴明的等級秩序、消費秩序，最後成為人人都進得了門檻的大眾消費，適足說明清末時期鴉片使用不分階層、不分地域的普及化和日常化現象，從鴉片常做為自殺藥物，就可知它的易得性。

精緻風雅的器物文明和講究煙館品味的消費文化，可以見識鴉片生命豐富的一面，也看到官紳文士獨特的品味和休閒文化。透過鴉片吸食過程的一套文化儀

<sup>304</sup> 上海閩邑紳商公啓，〈論女堂煙館亟宜禁止事〉，1872年2月4日，《申報》。

<sup>305</sup> 〈維持風化議〉，1885年7月13日，《申報》。

<sup>306</sup> 〈禁令宜相輔而行說〉，1885年9月23日，《申報》。

<sup>307</sup> 〈禁令宜相輔而行說〉，1885年9月23日，《申報》。

<sup>308</sup> 相關研究可見，李長莉，《晚清上海》(2010: 316~337)。

<sup>309</sup> 晟溪養浩主人，〈戲園竹枝詞〉，1872年7月9日，《申報》。

<sup>310</sup> 〈示禁澆風〉，1885年8月6日，《申報》。

<sup>311</sup> 〈煙館茶樓宜禁婦女說〉，1884年6月23日，《申報》。

式、精美的器具、講究的煙膏和華麗工巧的煙室、煙館，展現非凡的文化涵養和對物質的品味鑑識能力。例如要有「斗則壽州購辦，煙則冷籠清陳」，「煙槍必擇其老，扞必取夫鋼，盤必擇其潔」的識見，<sup>312</sup>方能顯示獨到的品味，進而彰顯自身出眾的身份地位和脫俗的生活風格。既炫耀身家財富，也炫耀消費品味，表現與眾不同的個體性、獨特性和差異性，並與其它消費階層劃異有別。例如，上述煙具名品的出處以及市場行情的掌握，就非一般平民消費者可得知和享有，而高雅潔淨、華麗精巧的煙館和昏暗污穢、陳設簡陋的煙窟，其雲壤之判，適足說明鴉片品味精疏雅俗之別。精英消費階層設定了品味美學的標準，構成一般人向上模仿追求時尚品味的風潮。鴉片為什麼會成為官紳文士風尚，或許與他們身份特質逐漸喪失有關。傳統士人的階級界線和社會身份標誌漸次泯除不見，鴉片的出現正好可以做為社會身份的表徵，透過炫耀有閒有錢和對鴉片使用的區辨和鑑賞能力，重新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

正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形成時尚，並帶動鴉片消費的擴張，改變了當時的從精英消費到大眾消費，鴉片也從奢侈品變為日常物品。當然，鴉片戰役之後，鴉片進口量大增，國內種植鴉片普及，法令懸而不施，造成鴉片吸食不再是高門檻的消費行為，也是原因。「鴉片之傳染，咸同以來日盛一日，至光緒間，列肆通衢，仿滬煙室，陳設精緻，紳士亦迹及，藉為消遣，可謂盛矣」。<sup>313</sup>而上海煙館之多，更有「土店多於米店，煙館多於飯館」之謂。<sup>314</sup>然而，其擴張的內在動力仍在趨新驚奇，競逐時尚，相互仿效。我們從當時官方文書描述鴉片氾濫的字眼可窺一二，「競相吸食」、「相率效尤」、「漸染成風」、「相習吸食」、「相染成習」、「傳染日深」、「轉相煽惑」等。要「倣」始能「染」，有「染」方成「習」。逐步道出從模仿到沾染，到成習性的成癮過程。也是一個由上而下，由中心到邊緣的滲入擴散過程。

#### 四、以煙宴友：鴉片吸食的社會互動

吸食鴉片不僅是時髦之舉，也是社交活動的潤滑劑。請吃鴉片仿佛成為一種社交禮儀，體面之事，否則視為怠慢。張昌甲提到抽鴉片的好處就是可以跟朋友並榻對吹，敘舊抒懷，「每逢嘉會，有室生蘭，幸有良朋，聯床話舊，此煙之利也」。<sup>315</sup>就此而言抽鴉片並不只是個人獨樂，自己過癮的行為，它也形成一個社群，在與他人的對吹中互動中，達到情意交流境地。抽鴉片成為一種社會互動，日常生活人際互動的鏈結。雖然有人批評抽鴉片是出神沉醉，脫離社會、去社會

<sup>312</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10）。

<sup>313</sup> 黃葦、戴安鋼，〈上海的鴉片貿易與流毒〉，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108）。

<sup>314</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10）。

<sup>315</sup> 〈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1982：1231）。

的行爲。然而在這裡，抽鴉片顯然是時尚風行的社交行爲，一種具某種凝聚力的社會連帶和集體經驗。這種以煙宴友的社會交往行動，還展現在炫富擺闊的儀式和形成獨特的嗜癖習性和品味文化上。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est Faber)觀察到這一現象，「有藉此以爲款客之禮，煙膏必醇舊，煙具必極華美，至令普天之下，遍地無不局設堂中，雖曰逢場作興似覺何妨，不知漸染既深，遂成痼疾」。<sup>316</sup> 煙膏、煙具的等級用來彰顯主人的誠意和財富，在不失禮，不居人後的競爭心態下，促成鴉片的時尚化。所以有能力的富裕之家，在自己家裡設置精緻雅潔的煙室，備上好煙膏、煙具招待賓客，以示自身的高雅、闊綽品味。張恨水，《春明外史》描素了某一凌姓之人，家中備置鴉片宴賓客的誇張景象。此人平日就在家中備好一百枝煙槍，每隻煙槍都預先裝好煙膏，要抽時就不用臨時燒煙，隨時可抽。而且每抽一口，就換一枝，沒有煙灰，手續方便。凡在他家中抽過煙的都讚不絕口，一時達官顯貴都趨之若鶩，競相來嗜。<sup>317</sup>凌姓之人也藉此結交不少權貴。

張恨水描寫這段場景，像是吸鴉片的「誇富宴」，類似的消費奇觀也出現在1931年杜月笙的「杜家祠堂」落成時的大擺鴉片宴上。杜月笙邀約中外來賓觀禮，約一萬餘人前來，席開兩千餘桌，然而最惹人注目的是會場中一字排開的幾十張煙榻，以及從煙館調來，專門服侍客人吸煙的28名扞子手。於是客人一排排躺滿煙榻，由扞子手侍候吸煙，過足了癮，起來，再換另一批躺下，如此輪番接替，第一天就吸掉5000餘兩煙膏，一連三天共計吸掉8000餘兩煙膏。<sup>318</sup>1930年代自貢有劉姓大戶，家中鴉片煙具豪華講究，遠近馳名，有煙王之稱。其煙室擺置當時流行的收音機和留聲機，煙斗有一千多個，都是珍品，有禮三、張六、吮香、定一、書畫、玉漿等等。煙槍有五十多隻，有象牙、犀角、湘妃、寶石頭底；煙盤、煙燈十多套；煙盒有金、銀、玉、珊瑚、犀角、水晶、紫銅，也有三四十個；煙扞則是特從成都錦華館整批買的鋼扞子，開煙除非用這煙扞，否則弄不出名堂。<sup>319</sup>

雖然類似的鴉片宴在擺闊炫富，家中煙具收藏之精博，在展示個人品味。但在誇示豪華之餘，某種程度也展現了一種特殊的嗜癖。張恨水的故事，以同時抽百枝煙的壯麗奇觀，以標新立異的怪癖，做爲消費鴉片品味，並創造惹人注目，引人前來一嗜的時尚風潮。富豪仕紳抽鴉片的怪癖時有所聞，徐珂就記載了一些煙癮的怪癖現象，有些煙客在煙館抽煙，一定要打開簾幕，躺破蓆子才能過癮，一旦換了高雅潔淨煙室，就不上癮；有些要脫衣脫襪吸食才過癮；有些要側躺一邊才能過癮；有些要左邊抽一口，右邊抽一口，如此交替才能過癮；更奇的是某名娼妓抽煙時，適人來狎，因而脫掉衣服，自此每次抽煙時都要脫掉衣服，與人

<sup>316</sup> 花之安(Ernest Faber)，《自西徂東》(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 (2002: 67)。

<sup>317</sup> 張恨水，《春明外史》(上) (2004: 15)。

<sup>318</sup> 洗波，《煙毒的歷史》(2005: 198)。

<sup>319</sup> 羅從修，〈自貢煙王〉，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 (1997: 165)。

淫之，才能過癮。徐珂寫道，「癮有絕奇者。初吸在煙館，必須做帷破席而始過癮，引至潔室，雖倍吸之，亦無益。他如解衣脫襪而成癮，或止臥一邊而成癮，或左一口右一口而成癮，千奇百態，必如其式，始克過癮。如欲改易，非竭力抑制不可。道光時，吉安有妓混名金字招牌者，狎之者，當其吸煙時，褪其裙服，自後淫之，遂成痼疾，自是非如此不能過癮。年漸老，無與往來者，則出資僱健男數人，每日三次過癮時，必竭其力以悅之而後已」。<sup>320</sup>上述嗜癖、怪癖可能傳為美談，或成為傳奇故事，或成為追慕仿效對象，這些都構成鴉片文化，或彰顯獨特癖味和鑑賞力的品味文化。

從張恨水的故事，我們知道，鴉片既做為宴客交游的招待品，也可以藉由這種交游互動傳染鴉片的嗜癖品味。可見以鴉片宴客交游成為當時普遍風尚，就算自己不抽，家裡也要備置一套煙具，擺一些煙膏，就如同必備茶具一樣，客人上門時可以端出招待。請客如果沒有鴉片就是怠慢失禮，「人家待客，不過水旱二煙，今則家喻戶曉，親友盤桓，倘無鴉片，以為簡慢」。<sup>321</sup>鴉片也成為婦女嫁妝和宴席招待必備物品，可見鴉片之風，無所不及。1905年有人記載北京鴉片氾濫情形，「男子不吸鴉片者似乎很少，婦女亦往往有吸者。婚禮陪嫁中必備有煙具。各家來客亦以鴉片招待，由此可知吸煙已成為一般風氣」。而在寶山縣鴉片成為宴客必備桌上物，有識之士也不敢反對，因為會招惹眾議，為什麼如此，因為從胥吏到苦力都是鴉片的使用者，反對鴉片如同全民公敵，「鴉片極盛時普及於胥吏，下逮於苦力，親朋宴集，幾視為必需之供應，士君子不敢訟言屏斥，以犯眾忌」。<sup>322</sup>美國傳教士盧公明也在1865年出版的中國見聞錄中，記載了他在福州傳教時看到這些現象，中國商行都備有鴉片招待客戶和來訪朋友。醫生探望病人家庭時也希望受到鴉片招待，否則就不高興。官府差役、捕快到居民家辦案，也等著事主提供鴉片招待，否則不論事情多嚴重，總是拖拖拉拉，不願認真辦事。<sup>323</sup>事實上，光緒一朝吸煙確實已成一般風氣，不管男女老少，日常生活各種場合，都少不了鴉片助興和增體面。

也因此，各種公共社交場所，店舖、茶樓、酒肆、旅館、賭場、妓院都需備妥煙膏煙具，以便客人之所需，甚至用以招來客人。在這種情況下，可想而知一般人要不接觸到鴉片真的很難，以致煙災瀰天，不可收拾。最後，「這吃鴉片也是當今個一種出色當行的嗜好，不為稀罕」。<sup>324</sup>出色當行到不為稀罕，正足以說明時尚已普及到不再是時尚。吸鴉片已內化為日常生活價值和經驗，它不再獨

<sup>320</sup> 〈鴉片成癮〉，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三冊）（1986: 6361）。

<sup>321</sup> 《重輯張堰志》，收錄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鎮縣志叢書》（第五冊）（2005: 25），轉引自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61）。

<sup>322</sup> 《楊行鄉志》，收錄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鎮縣志叢書》（第十冊）（2005: 87），轉引自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61）。

<sup>323</sup>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otting About Chinese)(1865)(2009: 413)。

<sup>324</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1984: 41）。

特、新奇、成爲炫耀身份的手段。特別是 1858 年規定洋藥「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正式開啓鴉片貿易合法年代，全國各地遍植罌粟，不管進口或國產鴉片，價格都較以往低廉，成爲任何人都可消費得起商品，降低了進入這品味的門檻。至於階層劃異/模仿的界線也不再明顯，各階層、各屬性的人，各取所需吸食鴉片，沉醉在鴉片的脫逸世界裡。

簡言之，時尚做爲推動社會變遷的機制，帶動鴉片消費潮流，改變休閒享樂方式，讓吸鴉片從少數人的時髦行爲，透過追慕仿倣和競逐潮流的心理，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成爲不分性別、年齡、職業、身份，打破等級界線的民主化消費模式，也因此促成鴉片消費的蔓延氾濫，不可遏止。而這正是時尚之惡的所在，時風所趨，上行下效，型塑出大眾口味的鴉片社會品味，這種品味有違國家禁令，成爲國家/官方品味排除的對象，國家透過各種反鴉片消費論述，建立符合國家需要的消費品味，這兩種品味拉鋸良久，從事實來看，官方品味的合法性不斷遭到挑戰和打擊，甚至其合法性還一度自我剝奪和懸置（鴉片貿易合法化），造成社會風尚普及，官方不僅禁不了社會吸食之風，甚至益形嚴重，不可控制。鴉片時尚品味突顯國家治理失靈，國族命脈，懸於一旦。如何重申官方品味，滿足國族發展需要，遏止鴉片消費之風，成爲晚清末年消費政治的思考點。在當時外交連番挫敗，國內改革正興的大環境下，透過當時社會已逐漸形成的恥感意識，進行品味鬥爭，鴉片消費品味被重新定義爲社會恥辱，國族恥辱，是迫在眉睫亡國滅種的根源，是國家民族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在這場品味戰中，鴉片消費暫時退潮，國家取得一定的勝利，清末禁煙成功說明一切。然而，官方品味雖然獲勝，主要原因還在於社會吸食鴉片之風的觀念已經有所轉變，鴉片做爲體面、時髦的消費品味已被詬病化和恥辱化，時尚成爲個人以至國家恥辱，已成爲清末民初社會主流風氣，它已跟官方品味契合，形成鴉片消費的羞恥政治，透過羞恥的烙印和名譽的剝奪，進行鴉片的管治。我們接下來討論這一過程。

## 第四節 從時尚到羞恥的政治

### 一、品味的轉折：從時尚到羞恥

吸鴉片、請吃鴉片、送禮送鴉片是時髦、體面之事，是社會追逐的風尚，也是一種炫耀身份，讓自己不丟臉失禮的品味消費。然而這種社會品味到了十九世紀末，有了明顯的轉變，吸食鴉片不再是時尚，反而成爲一種羞恥之事，小到個人恥辱，大到攸關國族恥辱。鴉片消費品味的轉變，全然繫於鴉片在消閒享樂過程，也銷毀個別身體和國家機體。白銀大量外流、國內連年征戰、對外戰敗的鉅額賠賞引發國家財政危機；軍隊長期沉迷鴉片，將士兵丁無力作戰，國家兵備廢弛，幾次對對外戰役，潰不成軍，割地賠款，訂定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成爲國家之「奇恥大辱」。而這句成語正出自程道一的《鴉片之戰演義》，「回憶當年的議和，不只喪權失利，實爲獨立國的奇恥大辱」。鴉片造成兵弱銀荒，社會危機和國家治理失靈，埋下改革派人士，知識份子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正是這種國恥意識和亡國滅種隱憂，促動晚清以現代化爲指標的救亡圖存運動。特別是自甲午戰敗後，敗給日本的羞恥，啓發更多有心份子的反思和覺醒意識。這兩種意識更加交織發酵，引發爲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運動。

鴉片原本就被國家界定爲違禁物，官方文書、民間議論視之爲破壞風俗人心、道德秩序、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邪惡物質。即便在鴉片貿易合法化時代，鴉片消費仍遭國家禁制。它的污名和罪責從未清除，到了國勢頹唐，鴉片迷漫，恥感意識逐漸深化和普遍化的清末，特別召喚出鴉片吸食成爲一種壞品味和惡習癖。唯有盡除，才能洗雪恥辱，富國強兵，建立新的國家民族。爲了「救護神州休陸沉」，<sup>325</sup>在新政改革氛圍下，清政府於 1906 年發佈命令限定十年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展開了反鴉片消費史上第二次大規模，也最具成效的禁煙運動。禁煙運動成功，誠如林滿紅指出建立在鴉片做爲醫學上的毒品和民族恥辱的基儲上，「直到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禁煙力量才凝聚起來。造成這種變化有兩個因素：其一是認爲鴉片是毒物的觀念越來越流行，另一個是認爲吸食鴉片是中國人的民族恥辱的看法更加普遍」。<sup>326</sup>前者，鴉片成爲現代意義的毒品，促使國際反毒運動崛起，迫使英國不敢背負國際毒販污名，乃放棄鴉片輸入中國的利益；後者，也是本節討論重點的民族恥辱的恥感意識，確實成爲中國禁煙和改革

<sup>325</sup> 徐勤，〈戒鴉片煙會序〉，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2000: 464）。

<sup>326</sup> 林滿紅，〈晚清的土產鴉片觀念〉，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2010: 46）。

救亡運動的內在動力來源。這兩項因素對中國鴉片消費品味的改變和禁煙運動成功起了關鍵作用。無論如何，鴉片問題的處理成爲中國是否富國強種，走向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消費和品味構成至關國族興亡的問題意識。

在上述的脈絡下，吸食鴉片做爲社會體面的時髦行爲，也逐漸改變。在更大的國族論述框架下，也就是在國家品味定義下，鴉片時尚和品味，構成問題時尚和壞品味，形成令人羞恥，須革新掃除的惡俗陋習。這種從社會時尚到攸關國族命脈的品味轉變，如同王國斌的分析，「鴉片消費量在城市地區成年男性中的增加與時尚有關，反對鴉片同樣也是品味轉變的宣言。這些消費選擇適合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觀點，這種觀點認爲根除鴉片是建造一個有競爭力的強大國家，這大工程的一部份」。<sup>327</sup>在國族建造工程下，羞恥論述逐漸成爲主流，消費鴉片乃亡國滅種的恥辱，成爲清末民初有識之士的共識。恥感意識取代時尚意識，打造洗刷恥辱的民族愛國情緒，進而推動國族救亡工程。儘管成癮的官紳士人仍在吸食，卻也成爲沉默的一群，靜默無言的吞雲吐霧，沉醉出神國度，被歷史埋沒。事實上，這是消費政治對物品重新再界定功能出現在時尚競爭上，形成品味區劃的政治作用，時尚被界定爲社會恥辱。但從時尚的特性來看，也可能因爲時尚在競爭仿效的運作邏輯下，普遍化到已不再新奇、時髦，構成時尚自身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上述提到反鴉片消費論述幾乎出自士大夫、知識份子之手，即便這群人中有些本身就是鴉片吸食者。<sup>328</sup>如果鴉片只是單純一群特定的有閒階級或士人階層使用，或許可能不會構成一個交雜各種論述的鴉片問題，成爲一種常態秩序下需被排除壓制的病態。它有可能只是有閒文人互相標榜的特殊癖好品味，一種獨特的生活風格和閒賞美學或病態美學。

但鴉片煙膏雖然有土洋之別，鴉片器具有精粗之分，品味養成（專業知識的教養、文化資本的擁有）有雅俗之辨，但畢竟吸食鴉片不是難學之事，雖然有錢階層可在精緻煙具上揮霍，有閒階層可在無限時間上浪費，但一般煙膏器物任何階層皆可取得，進入這項嗜好門檻不高，特別是土產鴉片盛行，形成消費的普及化、民主化，使得煙館林立，男女老幼幾無不吸，鴉片吸食乃成爲庶民大眾、勞動階層日常生活的普遍經驗和嗜好習慣。鴉片做爲一種具有模仿/劃異功能的時尚，即便初始起著模仿作用，但普及化後卻可能形成時尚停滯的現象，因爲鴉片癖好不再獨特，也不是特定階層所專屬，身份競爭、階層標識的重點應轉向鴉片如何成爲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涵納各種身份階層的感官結構和生活經驗。不再做爲中國文人專擅的生活美學癖好，而是淪爲無用的勞動身體和荒怠的社會身體。文人/士人因而可以群起撻伐鴉片的敗德邪惡，即便自身正是這邪惡之物

---

<sup>327</sup> 轉引自王國斌(R. Bin Wong)，〈鴉片和現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收錄於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2009: 216)。

<sup>328</sup> 如張之洞、王韜、嚴復、唐紹儀等開明知識份子。

的主要消費者。這是精英品味對大眾品味的鬥爭，並成為國家品味的一部分，貶抑其社會地位，罪責化其使用功能，成為國族衰敗的歸咎對象。

## 二、羞恥策略：鴉片的詬病化和恥辱化

鴉片做為社會風尚，十九世紀中葉就有人提出批評，認為應轉化這種觀念，視之為社會之恥。薛福成在 1867 年（同治六年）即提出對於鴉片吸食如果不相詬病，就會成為人民追求風尚，耳目慕效，適俗怡情的嗜好。他在〈答友人論禁洋煙書〉這篇文章中先駁斥，「洋煙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既成風俗，亦自不必禁」的議論，再譴責鴉片對經濟民生，社會風俗，上下階層身心的蝕壞，「蠹民生，敗風俗」，又「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萎頓，玩愒歲月」，「日夜銷鍊此心，心體因之以壞」，如果國家不嚴禁則必然導致，「民不以爲詬病，而轉爲適俗怡情之具」。他認為嗜煙並非本性，最大問題就在「不相詬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同時也由於「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煙之盛，風氣皆由此而來」的社會仿倣之風，他最後提出禁絕這種嗜好風氣的方法就是，「厲之以恥，止之以漸」。<sup>329</sup>

薛福成是較早提出以恥辱來杜絕鴉片流行者，他的厲之以恥，止之以漸，構成了恥感論述建構的羞恥政治，視鴉片爲個人和國族的羞恥之源，將鴉片詬病化，進而萌生羞恥意識，讓羞恥意識形成自我克制、自我反省、自我醒悟力量，進而杜絕鴉片消費，改造國家民族。薛福成的文章點到幾個重點與前面討論有關，（一）、鴉片吸食會成爲風氣，在於庶民階層對上流階層的仿倣，也就是耳目之慕效，形成一種向上模仿，向下滲透的時尚消費模式。當年洋煙之所以令人趨之若鶩，引人神往，無非視洋煙爲少數王公貴胄享用的貴重物品，乃成爲一般人追慕效法的消費品味。當然，這也表現出一種崇尚洋貨的時尚心態，有可能促成鴉片消費的增長；<sup>330</sup>（二）、既成爲風尚，彼此接受，互不以爲害，則普遍化、自然化爲大眾的休閒娛樂，說明了鴉片從精英消費到大眾消費，從奢侈品到日常用品的過程，<sup>331</sup>乃透過時尚，既成風尚的作用擴大消費基礎，同時也日常化鴉

<sup>329</sup> 薛福成，〈答友人論禁洋煙書〉，收錄於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1987: 30~32）。

<sup>330</sup> 關於崇尚洋煙刺激鴉片消費的討論見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2005: 65; 72~73).

<sup>331</sup> 我們或許可以從《雅觀樓》和《風月夢》這兩本描繪道光年間揚州市井娛樂，風月生活的狹邪小說略窺這種現象。前書作於道光元年，後者寫於道光二十八年，兩書都提到鴉片，在《雅觀樓》中，出現鴉片次數不多，它是招待嫖客，富人追隨潮流的奢侈品，到了《風月夢》則幾乎每回都提到鴉片，隨時使用，彷彿成爲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日用品，兩書相距短短二十幾年卻讓我們約略看到鴉片使用速度上的變化。見戴健的討論，《清初至中葉揚州娛樂文化與文學》（2008: 172~176）。當然這種變化，也可能只是兩書作者描繪重點的不同，難以據此比較推論。但不管如何鴉片進入日常生活場景成爲一種享樂方式卻是事實。到了宣統元年（1909）的《黑籍冤魂》（1984: 41），「這吃鴉片也是當今個一種出色當行的嗜好，不爲稀罕」，可見其不再新奇時髦，而成爲一種普遍嗜好。



片消費習慣；(三)、最重要的是如何「絕人之嗜」，其重點就在於讓吸食鴉片成爲可詬之病，成爲一種恥辱，也就是以國族化的視覺品味建構人民恥感的視覺認知，透過社會監視力量，將社會徵逐的時尚休閒，扭轉爲身心銷蝕之害。透過相互詬病和恥感意識的社會化，才能厲之以恥，絕人之嗜。也正因爲過去刑所不禁、俗所不恥，才造成鴉片風氣由上而下的蔓延、擴散，不可收拾，「鴉片之初來中土，嗜之者爲士夫，爲官吏，爲席豐履厚之人民，刑所不禁，俗所不恥……其後嗜之者漸下移，齊民日多，而官吏士夫漸轉少」，<sup>332</sup>嗜之者下移後，官吏士夫吸食是否變少，無法確知，但平民百姓增多確是屬實，因爲世俗不以鴉片爲恥，反視之爲時髦體面，正好讓鴉片消費品味取得優勢的社會地位。所以國家徒有禁令，也難遏止鴉片的風行。國家視吸煙爲惡事，社會視吸煙爲美事，這形成國家品味和社會品味的衝突和拉鉅。因此，如何扭轉社會一般人視鴉片爲風尚的看法，將其定義爲壞品味和問題習性，以及不良的消遣逸樂形式，則是國家長期反鴉片消費的工程。

詬病化和恥感化是薛福成提出的反鴉片消費的策略。這種想法到了後來的禁煙運動，越來越清楚浮現。整個清末民初幾乎籠罩在恥感意識和國恥的建構中。形成恥感的社會化和普及化，讓每個人都能敏銳意識到外界加諸於身的恥辱，進而有所自覺和反應，同時也借此禁絕鴉片消費。而早在道光年間，兩廣總督鄧廷楨、廣西巡撫梁章鉅、廣東巡撫怡良、閩浙總督鍾祥等人，就曾建議對煙犯施以墨刑，在其臉部刺字，讓他們產生羞辱感，無顏見人，促使他們「憚而悔禍」。<sup>333</sup>魏源對於鴉片禁制，也提出類似構想，他認爲應對違犯禁煙命令施行刺面之法，也就是大清律中的恥辱之刑。對吸食者限期戒煙，不戒者，黥面；再不戒，則殺之。通常那些紈袴子弟，溫飽煙民，必定怕黥面而不敢吸食違犯。黥面之法除可收嚇阻效果，還可有效管理煙民。黥面如同社會視覺標誌，亦列籍在案，可以迅速有效的稽查他們的吸食狀況。魏源說，「竊謂禁煙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型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煙，不戒者黥之。則紈袴溫飽之煙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癮可按期而驗」。<sup>334</sup>

魏源的恥辱刑是烙印在身體上，成爲一種恥辱的社會標誌，其它方法雖不是烙在身上，卻是用社會眼光烙在心底、意識裡，形成自我約束和監視作用。在身體烙上印記的類似做法，在抗戰前還出現過，北平政務委員會主任宋哲元在北平成立戒毒所，規定戒毒期 30 天，期滿在戒毒者左臂上用藍墨水鋼筆刺上一個十

<sup>332</sup> 江蘇省民政廳編印，《江蘇禁煙概況》（1936: 1），轉引自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鴉片與近代中國》（1995: 204）。

<sup>333</sup> 見王金香，《中國禁毒史》（2005: 43）。

<sup>334</sup> 〈軍儲篇一〉，《魏源集》（1978: 470）。

字，作為第一次戒毒標記；如果再吸被抓，再次戒毒 30 天，期滿在右臂上刺上另一個十字，以做識別。因為第三次再吸被抓，就要執行槍決。<sup>335</sup>在這裡刺字的作法，雖對戒毒者有自我提醒的作用，但主要目的是透過身體的社會識別標記，用以有效管理和監督。

1894 年（光緒二十年），鄭觀應透過羞恥策略，提出禁絕鴉片的方法。他認為只要有恥心，就可救亡於即倒，「苟能生其恥心，或可振於末路」。他建議將吸鴉片者編籍造冊，列為煙籍，成為煙民。有這種身份，如期限內未能戒斷，則不能應試、當兵、捐官、成為紳士，更嚴重的懲罰是不能通婚。既列煙籍，他就不再是一般平民看待，這在民國時期就是剝奪公民資格。他說，「編籍貫通飭天下。將所有煙癮人戶逐一查明，無論官商軍民，編成煙籍，謂之煙民，立限戒除，倘逾限未斷，則照差役例，不準應試，不准當兵，不准捐納職銜，不准充當紳士，平民不准通婚……一掛煙籍，即不得儕伍平民」。他在試擬〈上海戒煙會章程〉中更訂定，要建立自新、入污兩冊。凡已吸煙而能戒斷者為自新，未吸煙而忽吸者為入污。由會訪問登記冊內，半年或一季，榜之通衢，以示褒貶。惟有如此才能「早除煙障，與廢八股，戒纏足者同功。是為自強基礎，可免外人欺侮，大局幸甚，中國幸甚」。<sup>336</sup>鄭觀應運用這種名登煙籍，入污冊，隸屬煙民的方法，不只是讓吸食者蒙受榜上有名或公告周知的社會之恥，更剝奪平民/國民應享的權利，這是透過社會之恥的身份，懲罰其無恥之行，另一種形式的恥辱刑。梁啟超則在 1897 年發出沉痛呼籲，因為人民無恥才容許吸鴉片和纏足陋習的存在，這等無恥將招來身廢、家破、國亡之禍，不可不戒。他說，「民惟無恥……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視為虺命為鳩，乃遍國種之，遍國嗜之，男婦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纏足陋習，倡優之容，天刑之慘，習之若性。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于此罔不廢，家有一于此罔不破，國有一于此罔不亡」。<sup>337</sup>梁啟超在這裡透過鴉片、纏足將恥辱與亡國連結，這種恥辱和救亡相繫，也成為日後中國救亡圖存的基調之一。

1906 年《申報》的一篇文章提出禁煙方法，上流社會重名譽、愛面子，如有吸食公諸於世，受世人不齒之辱，如果大家視鴉片為有礙聲譽之事，那麼鴉片之風必然停止，至於下層社會則用刑罰規範，令其畏懼，方能收效，「竊謂此十年中，宜由寬而漸嚴，由疏而密。其辦法大要有二，上流社會中人，宜動之以名譽，下流社會中人，宜懼之以刑章」，上流社會中人「如有隱匿，一經查出，暴其名於國中，永不為人所齒……舉一國之人，而皆以吸煙為有損名譽之事，則此風或不難漸息乎」。<sup>338</sup>這也是媒體公開呼籲人民要建立恥感，要重視自身名譽，

<sup>335</sup> 陶廣仁，〈舊北京的煙害〉，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卷）（1997: 72）。

<sup>336</sup> 鄭觀應，〈致上海戒煙會鄭君蘇龔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1988: 1177~1178）。

<sup>337</sup> 梁啟超，〈知恥學會敘〉，《梁啟超全集》（1997: 140）。

<sup>338</sup> 1906 年 9 月 24 日，〈敬書初三日戒煙〉，《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 1729-1949》

鴉片有傷名譽。同年，駐英公使汪大燮亦上摺疾呼，「積貧在此，積弱在此，貽笑在此，受侮亦也在此。禁之一說，何待再議」。<sup>339</sup>鴉片造成國家弱貧，更遭外侮，唯有禁止，免受此辱。鄭觀應曾提出吸食之人入煙籍，列煙民，以示不齒的禁煙策略，1906年《申報》再度有人提出，「如逾期不能戒脫，則列入煙籍，名之曰廢民籍……且既立煙籍，人皆引以為恥，有志者，自必竭力斷絕」。<sup>340</sup>這一做法在政府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籌擬的禁煙章程，亦列入規章，其作法為：凡吸煙者需請領牌照，牌照分甲、乙兩種。六十歲以上請領甲種，六十歲以下領乙種。牌照內註明本人姓名、年歲、籍貫、每日吸煙數目及發給之年月。請領甲照之人，是否戒斷可從寬免議外，<sup>341</sup>六十歲以內請領乙照者，其吸煙數量限令每年遞減兩三成，幾年內戒斷，戒斷者經地方政府覆驗屬實，即註銷煙籍。如於期限內未能戒斷，即註明煙籍，同時在其所居之處，公告周知，並且不得參與任何跟名譽有關的社會活動，「平民均註明煙籍，由該州縣分別另立一冊，仍申報上司衙門存案，並將姓名年歲標示通衢及此項吸戶人等，所居之城鄉市鎮，俾眾周知，凡該處紳耆歲時會集暨一切名譽之事，均不准與，以示不齒於齊民之列」。

342

這套作法一方面透過登記管控吸食者數量、鴉片吸食量；另一方面以煙籍做為身份標誌，一種社會羞辱的識別標誌。既掌握鴉片吸食者狀況，也形成嚇阻力量，起一定程度的效果。只不過，法令規定要吸食者自行登記請領牌照，如果背後沒有強大的監控力量和督促機制，將會流於不切實際，究竟會有多少人自行登記？又如何抓出那些不登記的吸食者？這都考驗國家的治理能力。清末國家發起的大規模禁煙運動，衡諸最後結果，算是成功，十年後的1917年英國評估中國的禁煙決心和成效，最後實踐承諾，同意印度鴉片從此不再輸入中國。然而軍閥崛起，中國又進入鴉片大氾濫時期，不只消費也輸出鴉片。一來禁煙法令做法是否持續落實，二來中國陷入道德與經濟衝突中，鴉片視為國恥，幾乎是國人共識，然而政治領導者為了籌措財源，不得不鼓勵種植罌粟，鴉片課稅專賣，以此稅收穩固政權基礎，讓道德、羞恥意識暫埋於國家經濟考量之下。經濟理性壓過道德理性，一直是中國鴉片禁之不絕的原因之一，因為國家懸置法令，凍結執行，為籌謀財稅來源，讓鴉片消費開一條道路。

### 三、厲之以恥：恥感意識的社會化

不管最終結果如何，從上面可知，羞恥已用來做為禁吸鴉片的手段，構成一種羞恥政治。它可以收法令所不及之效，于恩德指出這種名譽懲法，是相當有效

---

(1998: 395)。

<sup>339</sup> 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275)。

<sup>340</sup> 1906年2月3日，〈札知議除煙毒〉，《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80)。

<sup>341</sup> 六十歲以上，是否戒斷不以論處。有一說這通融的規定是為當時慈禧太后設想，慈禧其時也沉溺於鴉片煙中，這規定為慈禧開了一條後路。

<sup>342</sup> 〈會議政務處大臣籌擬禁煙章程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99~340)。

的辦法，「苟用此種辦法，則法令所不能及之處，而補之以輿論之指摘，使吸煙者無所逃避，則禁煙收效必大。且此種名譽之懲罰辦法，已為歷代所公認之有效辦法」。<sup>343</sup>羞恥政治之所以能收實效，說明了恥感已內化為社會意識，逐漸發揮自我監視、自我約束的力量。1908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份給民政部、度支部請訂禁煙稽核章程的上諭提到，「近來官紳士庶，各知悔悟，爭相結社勸戒，即素嗜鴉片者，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自怨自艾」。<sup>344</sup>要注意的是，這份上諭的用語從上到下各階層都已知「悔悟」、「痛心疾首」、「自怨自艾」，雖然沒有提到恥感作用，但悔悟、痛心、自怨自艾，何嘗不是羞恥意識的反映。由此可知恥感意識社會化和深化展現的自我究責、自我醒悟、自我克制力量。

再者，根據當時一些報導記錄，可知吸食鴉片不再被視為是體面、時髦之事，而是一種恥辱。一份1905年出版有關亞洲鴉片吸食的調查報告即指出，在福州吸食鴉片「現在被認為是有失體統，明顯不受年輕人歡迎」。<sup>345</sup>1911年，美國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也發現這種氛圍的轉變，「人們逐漸認識到吸食鴉片是一種不良習慣，他們不再把聚會吸食鴉片作為一種時髦，青年也無需培養這種所謂的高雅技藝。人們已普遍意識到鴉片的危害，煙鬼們已處於一種極其難堪的境地，他們常常羞愧的無地自容。因此讓煙客當眾捧著花錢買來的鴉片，把貼著吸煙許可證的大木牌戴在自己身上，進行羞辱的做法是值得的。這種做法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中國人最怕『丟臉』。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人才有禁絕鴉片的希望」。<sup>346</sup>原先需學習培養的高雅技藝，可以彰顯身份品味的嗜癖，如今卻成為一張吸煙許可證掛在身上，招來別人羞辱的眼光。從羅斯的觀察中，我們確實看到鴉片消費品味的改變，在以雪恥救亡為基調的國家品味主導下，時尚高雅的品味，重新再定義為亡國滅種惡俗陋習，蠶食國族命脈的壞品味。吸鴉片要掛牌子取得許可，正是這種轉變的最好說明。而國家品味重新定義鴉片，取得合法支配力量，也可以從年輕人不再視鴉片為時髦之物，也不願幹掛牌子吸鴉片的丟臉之事。這就像上述入籍煙民的身份羞辱一樣，逐漸發揮反鴉片消費的功能。這種面對鴉片的恥感意識，已然在社會普遍發酵。

恥感意識社會化的效應，可從下面例證看到。在國家改革氛圍下，鴉片休閒逸樂功能的角色，已被禍國殃民角色取代。1906年報上一篇文章，疾呼鴉片就是亡國、亡種之具，「今日愛國愛時之士均大聲疾呼，云鴉片為亡中國之具……雖然極鴉片之害，豈特亡國已哉？實欲亡種耳」。<sup>347</sup>在過去是享受逸樂，現在是

<sup>343</sup> 于恩德編著，《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1973: 248）。

<sup>344</sup> 于恩德編著，《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1973: 128）。

<sup>345</sup> 即1905年出版，次年翻成中文的《菲律賓報告》，轉引自劉增合，《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2005: 89~90）。這份報告這麼快的在一年後以中文問世，或可見1906年禁煙諭令發佈，展開十年鴉片消弭計劃的決心。

<sup>346</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2006: 103）。

<sup>347</sup> 1906年1月1日，《申報》。

墮落腐敗，1911年一位在蕪湖的外國人談到他當時觀察到人們對吸煙觀念的轉變，「吸食逐年減少，最可喜的是，現在人們的觀念已發生轉變，過去認為吸食鴉片對於上層人士來說是一種享受，現在認為是一種墮落」。<sup>348</sup>我們也可以在其它各地發現鴉片消費風氣轉變之事。例如在上海，美國駐華公使謝立山(Alexander Hosie)指出，「吸食鴉片現在已成了一種令人羞恥的事，那裡的年輕人都不再去鴉片煙館了，而在過去，他們把茶餘飯後到這裡消遣當成一種時髦」。<sup>349</sup>在浙江嘉興，「據說在1906年之前，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到煙館裡談生意，但現在大家都不這麼幹了」；在福州，「吸食鴉片不再是一種時髦的消遣方式了，在過去年輕人必須要養成這種瀟灑習慣。但現在這被看做是一種惡行」，<sup>350</sup>在四川，英國議員馬勒(Max Muller)，指出，「舊社會認為一個年輕人吸食鴉片是件好事，但現在情況卻相反，沒有人再在飯後沉迷於鴉片煙霧中」。<sup>351</sup>

恥感意識社會化也反映在媒體輿論、禁煙宣傳、禁煙社團等公共力量的崛起，形成全民禁煙熱潮。這些現象一方面反映1906年禁煙運動的成功，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社會對鴉片的態度已然有所改變，這跟當時知識份子的大聲疾呼鴉片有亡國滅種之虞，傳教士苦口婆心的宣導鴉片戕害身體健康，各地紛設禁煙組織教育民眾鴉片之害，以及報章雜誌的倡議宣傳、口誅筆伐有關。羅斯即指出社會輿論發揮宣傳、警告、教導力量，改變了人們對鴉片的觀念，「中國的很多大城市中已形成一種禁煙的公共輿論，向社會展現了政府在禁煙問題上應盡的責任。這種輿論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四處張貼的禁煙廣告的影響、政府官員對鄉紳們的規勸、外國傳教士的警告、社會改革家的演說、官辦高校的普及以及國內報界的鼓吹等」。<sup>352</sup>羅斯的觀察很準確，也反映出當時反鴉片宣傳運動的全面和深入，成爲一種全民的社會運動。鴉片議題確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焦點，透過公共討論中國改變了過去一般人對公共事務冷漠、不介入的態度，猶如公共領域的形成。羅斯看到這種轉變，「通過禁煙這一共同的事業，他們已經團結和組織起來。一些人開始關注社會道德問題，公共輿論開始發揮越來越來重要的作用。數以百萬計的人平生第一次開始考慮『什麼是公共利益』」。<sup>353</sup>這時的中國基本上已進入一個運動時代，針對公共議題或國家議題，訴諸筆端，走上街頭，進行社會改革或國族救亡。其後各式各樣的愛國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國貨運動等，充分展現社會力量的充沛和活絡，清末反鴉片運動無疑爲日後這些運動鋪了

---

<sup>348</sup> 《中國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選譯—清末禁煙運動史料》(2005: 19)。

<sup>349</sup> 轉引自王國斌，〈鴉片和現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15)。

<sup>350</sup> 轉引自王國斌，〈鴉片和現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15)。

<sup>351</sup> 轉引自王國斌，〈鴉片和現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16)。

<sup>352</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2006: 103)。

<sup>353</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2006: 104)。

底，起了示範作用。

禁煙公共輿論的興起，代表國家之外的另一股社會力量，反對不良品味的鴉片消費。過去雖然也有士紳文人為文疾呼鴉片弊害，各地禁煙、禁毒社的成立正是這種地方士紳集結社會力量反鴉片的表現，<sup>354</sup>國家也透過這一管道做為政治力量的延伸，利用士紳力量扮演維繫地方社會秩序和道德價值的功能，<sup>355</sup>但也憂懼地方士紳利用這種力量，坐大自己勢力，成為政府不可收拾的難題。因此明文規定禁煙組織除了禁煙事務外，不能涉入其它政治議題，如法令所明，「但不得議論時政及干涉禁煙以外之事物」。這使得禁煙組織有時不免染上半官方色彩，成為「政府根除鴉片的能力和決心的延伸」。<sup>356</sup>亦如馬丹茜 (Joyce A. Madancy) 對福建「去毒社」的研究所指出，「這是一個由中央道德和法律權威的力量所開拓出來的空間，而不是由有影響力的精英們推動和領導的國家主義運動所創建的」，淪於「官僚機構之外的官僚機構」。<sup>357</sup>雖然，在這種情況下禁煙組織淪為政府執法代理人角色，很難完全體現純粹社會力量展現的公共領域精神，但由於獲得官方支持和授權，使得禁煙組織有相當力量查緝違犯鴉片禁令者，<sup>358</sup>同時也取得一定的執行成效。<sup>359</sup>1908年的一份奏摺，即稱讚地方士紳在禁煙運動的努力，「通過賦予地方士紳權力，在社會上看到、聽到的內容就會特別可靠。士紳比官員調查的更為仔細」。<sup>360</sup>確實禁煙組織在反鴉片消費運動中扮演積極又關鍵角色，1924年8月5日成立的「中華國民拒毒會」，規模龐大，影響力深遠，特別是長期對抗國民黨政府「寓禁於徵」的鴉片專賣政策。

從上面討論，禁煙組織的紛紛設立，代表著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的結合，雖然大部份禁煙組織都是自發性成立，但其宗旨無非執行國家的反鴉片禁令，以民

---

<sup>354</sup> 例如郭嵩燾 1879 年辦「禁煙公社」，維新派人士 1898 年組的「戒鴉片煙會」，1906 年福建「去毒社」，1910 年「中國國民禁煙會」，及 1924 年「中華國民拒毒會」。

<sup>355</sup> 例如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的〈籌擬禁煙章程〉第七條，「准設禁煙會以宏善舉也……應由將軍督撫飭令地方官督率該處公正紳商，廣為設立。以期……轉移習俗較為迅速。但此會只允許專辦戒煙一事，不准議論時政、地方治權及他項無關戒煙事務」。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正式頒布〈稽核禁煙章程〉第十四條，「各地方官應通飭境內公正紳商設立戒煙會社，刊布戒煙白話書報，廣為勸導，但不得議論時政及干涉禁煙以外之事物」。收錄於王金香，《中國禁毒史》（附錄）（2005: 338；342）。

<sup>356</sup> 王國斌，〈鴉片和現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16）。關於地方士紳推動禁煙運動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可見王國斌此文討論。

<sup>357</sup> 見馬丹茜，〈罌粟、愛國主義和公共領域〉，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52）。

<sup>358</sup> 1906 年的〈籌擬禁煙章程〉第八條，即規定「責成地方官督率紳董以期實行也」。也就是士紳可以參與公權力的實施。見王金香，《中國禁毒史》（附錄）（2005: 338）。

<sup>359</sup> 見馬丹茜，〈罌粟、愛國主義和公共領域〉，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55）。

<sup>360</sup> 見馬丹茜，〈罌粟、愛國主義和公共領域〉，收錄於卜正民、若正林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2009: 261）。

間力量補國家之力有未迨。除禁煙組織外，各種社會力量也大規模投入反鴉片消費運動裡，例如利用通俗淺白的竹枝詞，教導民眾鴉片敗害之處。如，「殺人無血一煙槍，煎海乾燈豆吐光。煉盡資財吸精髓，弱民貧國促華亡」。<sup>361</sup>大量歷史演義出現，內容大都不脫救亡圖存基調，也不乏以鴉片戰爭為題材之作，終局無非是鴉片戰爭招來國恥，勸戒鴉片，才能富國強兵。<sup>362</sup>如，「鴉片這種東西，不但不可嘗試沾染，還要將它看成仇敵一般，而且關係國恥，尤當為禁」。<sup>363</sup>特別是雨後春筍般的傳播媒體，<sup>364</sup>更是大量闡述、評論、勸導鴉片害人害國事實，也成為知識份子抒發亡國滅種憂慮，倡議富國強兵，強國保種，力圖國族救亡的場域。上述禁煙組織、民間通俗文學以及傳播媒體，甚至還有傳教士長期的宣導禁煙，這些自發力量都成為國家品味社會化和普及化的重要機制。在品味合法性競爭裡，國家品味取得社會力量普遍支持，獲得完全勝利，也讓清末禁煙運動有所成就。官方品味在此已徹底轉化為社會認同的品味，這也正是鴉片從消費時尚到消費之恥的轉變看出。

再者，羞恥不再是個人之事，鴉片恥辱已進入國際舞台，成為國際關注的目光，1913年的一篇禁煙宣言提醒國人這點，「且以友邦而注意於我國之禁煙，是猶我國民之公恥，亦我學界之公恥也」。<sup>365</sup>反鴉片運動已不只是中國問題，而是國際問題，二十世紀初國際性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全球反鴉片運動，中國也捲進這舞臺，坐上國際會議桌，成為協商反毒禁煙的一員。1909年（宣統元年），在上海舉辦萬國禁煙大會，這是世界首次國際禁煙會議。1912年第一屆海牙國際禁煙會議召開，其後又在日內瓦舉行幾次會議，中國都是主要成員。也因此，中國鴉片問題，就成為國際問題，特別是中國已有鴉片輸出國外，國內種植和吸食都盛行，甚至成為國際禁煙會議調查對象。這也為什麼，鴉片造成的恥感，在國際視線下成為公恥，這是恥感的國際化，1925年的一份禁煙提議，即指出，「上年日內瓦國際禁煙大會來友邦之責言，謀毒物之共管，外交如此，國恥難堪」。<sup>366</sup>

中國鴉片氾濫依舊，遭受國際責難，進而要求共同管理中國的鴉片問題。這種國恥已不只是外人干預內政的國格受損，更是源於鴉片帶來根深柢固的恥辱

---

<sup>361</sup> 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收錄於顧炳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2001: 223）。

<sup>362</sup> 例如程道一，《鴉片之戰演義》、《消閒演義》，以及《國恥演義》、《神州光復志演義》等作品。歷史演義與救亡圖存之關係，可見李瀟，〈清末民初的中國近代史演義初探〉，《宿州學院學報》，21卷，1期（2006：50~52）。

<sup>363</sup> 程道一，《消閒演義》，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51）。

<sup>364</sup> 據研究《申報》自創刊之日到隔年1873年6月，不到一年半時間，發表鴉片評論15篇，其它報導60多篇。《萬國公報》在1874~1883年十年間，登載與鴉片有關文章194篇。其它如《東方雜誌》、《時報》、《警鐘報》，以及圖像為主的《點石齋畫報》等，都是當時宣導鴉片危害社會國家的重要刊物。見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上海禁毒史》（2009: 64）。

<sup>365</sup> 〈學界實行禁煙會宣言書〉，天津《大公報》，1913年1月19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602）。

<sup>366</sup> 〈熊希齡等提議全國禁煙案〉，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818）。

感，在外人眼光的介入下更為敏感。在國際關注下，中國也背負破壞國際禁煙會議決議的龐大壓力，成爲一種外交問題。同年內務部與外交部共擬禁煙案，即提到禁煙是國際信用和承諾問題，「禁煙一事，不特爲民命所關，抑且爲國信所繫自非雷厲風行，內無以拾人民期望之心，外無以副友邦贊助之美意」。<sup>367</sup>禁煙不徹底就會丟臉於國際。1929年3月，中華國民拒毒會致財政部長的一份建言，也提到國際對中國禁煙成效的壓力，中國如不展開魄力，徹底禁煙，必然有損中國的國際地位，「昨接國際聯盟幹事夏奇峰來電，亦以國際輿論以我國禁煙廢弛，空氣至劣，非急請政府雷厲風行制止國內煙禍，取締外洋輸入，則不但國際地位每況愈下」。<sup>368</sup>

在外患進逼，國恥日深的災難年代，如何深化恥感，強化救國意識，消滅國族大敵的鴉片，則更是國家不斷強調的重點。胡漢民在1928年11月全國禁煙會議的講辭，〈禁煙與社會制裁〉，對如何透過鴉片恥辱化，進行社會制裁，以改造一般人視鴉片爲體面時髦行爲，提出對吸食者採不齒、不理會、不原諒、不承認的態度，以形成社會輿論的制裁。他認爲，要對鴉片吸食者進行改造，最重要的就是改造心理，要打破吸煙是貴人福人所做之事的崇尚心理。正因爲這種嚮往不已的心思，才讓煙毒擴散全國，「最初我國人都看吸煙是極體面極時髦的事，一人倡之，千人和之，後來也覺得吸煙終是貴人福人富翁所做的事，許多人不能吸煙的，每每嚮往不置，以自己的不能爲大憾。自來有了這樣的心理，然後煙毒才瀰漫了全國，直到現在，這種心理社會上依然還沒有完全打破」。那麼該如何做？他建議要宣傳吸煙是奇恥大辱之事，對吸煙者要唾棄不恥，即便親友也一樣，不原諒、不承認他的存在，這種輿論制裁力量要比法律有效。他說，「如果我們一面用法令禁煙，一面宣傳吸煙的醜惡，大家公認爲奇恥大辱，大家對於吃煙的人都不原諒，甚且不齒，雖至親好友，也弄到不理會不承認的地步，而毫無寬假的餘地，那麼純良的人自然憬悟的快，及早回頭。就是頑固的，一時雖不覺悟，而見法令所不到的地方，又受眾人的唾棄，輿論的指摘，甚且無可容身，自然也就帖然就範，不能不戒了……這種輿論制裁的力量，往往比法律還要大」。<sup>369</sup>

胡漢民的做法就是透過鴉片的詬病化和恥辱化，進行社會的輿論制裁，甚至剝除吸食者在親友間的地位，不齒與他爲列，讓他無地自容，形同對他孤立，以收禁煙效果。羞恥做爲社會制裁，確實發揮某種社會監視力量，利用在意別人眼光或社會評價的心理，自我約束。因此街坊鄰居的道德恥感之眼，不僅讓自己行爲有所顧忌，同時也激發恥感意識，形成自我克制作用。否則在社會輿論下聲名

<sup>367</sup> 〈內務部會同外交部擬具禁煙議案〉，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798）。

<sup>368</sup> 〈中華國民拒毒會致財政部長書——痛陳煙禍請決禁絕〉，中華國民拒毒會編，《反對鴉片公賣言論集》（1931），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913）。

<sup>369</sup> 胡漢民，〈禁煙與社會制裁〉，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拒毒運動叢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289~290）。



大敗，猶如天地不容。

1939年蔣介石在六三禁煙紀念訓詞，更將吸食鴉片者擺在全國位階譴責，這些人已非人樣，本身不只可恥，更是全國同胞的污點，特別是妨礙國家民族在世界競爭中的生存，因此要用抗戰殺敵精神，戒絕吸煙惡行。他說，「這一種人在他本身不但是可憐，而且更是可恥。在我們國家民族現在還有這種不成人樣的同胞，尤其是全民族莫大的恥辱，無上的污點，如果不趕緊澈底清除，在現代世界中，怎麼配和其它民族競爭生存……必須以抗戰殺寇的同樣精神，同心戮力協助政府實施禁煙政策」。<sup>370</sup>

吸食鴉片既是國家恥辱，更是國族生存最大障礙，正是羞恥政治的核心，也是國家操作反鴉片消費論述的主軸，進而達到肅清煙禍的目的。也就是要改變鴉片吸食是值得欽羨，備極尊榮的心態，「社會一般愚民視吸煙為富有者之唯一享樂，而心羨之。而吸煙者則以吸煙為尊榮之事，竟恬不知恥」，要革除這種弊病，有時非法令所能及，只有「造成社會輿論，改變吸煙之心理，認吸煙為奇恥大辱，使吸煙者不齒於社會。則吸煙者因覺不能容於社會，或能自動戒除」。<sup>371</sup>簡言之，這套策略運用鴉片的詬病化、罪責化，塑造出外部社會審查和內在自我警醒功能的「恥感導向的文化」(shame-oriented cultures)。<sup>372</sup>不僅於此，更透過恥感所伴隨的自我歸咎、自我批評、自我貶抑或自我負面化的表現作用，激發民族的集體受辱意識，形成一種集體責任感，進而帶動改革的熱情或做為正當化改革的論述策略。<sup>373</sup>馮客 (Dikotter) 指出這種恥辱感的形成及其效應，他表示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恥辱感不時做為一種自覺建構的情感，它歷經了漫長而複雜的內在化和習慣化的過程。恥辱也隱含一種集體責任感，即失敗的原因往往歸咎於人們努力不足或能力缺乏，自責成為追究原因的過程，集團內部透過自我控訴其失敗而深化恥辱感，恥辱感則轉化成一種催化劑，它可促動愛國熱情，提高集團內部團結，並引出集體責任感。<sup>374</sup>

---

<sup>370</sup> 〈以抗戰殺敵精神來根絕煙毒〉，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18)，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86)。

<sup>371</sup> 于恩德編著，《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1973: 248)。

<sup>372</sup>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2005: 63)。

<sup>373</sup>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帝國遭遇一連串外交、軍事、經濟、主權的挫敗，知識份子普遍瀰漫在國恥的氛圍中，其反應不是悲憤填膺，就是反過來自我貶抑，自我嘲弄或自我醜化，以一種負面書寫或受害者敘事方式激發民族情緒或改革熱情，如東亞病夫形象的自我建構(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2005))；或呈現中國人骯髒、不衛生的生活習慣以強化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的建立(見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2004)；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2007))；或透過對身體的醜化以合法化對身體的規訓和生活的控制(見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1998))。

<sup>374</sup> 馮客 (Frank Dikotter)，〈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1999:104)。

簡言之，中國歷經漫長的鴉片化過程，從一開始即埋下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從國家官僚到地方精英，無不困在這意識裡，到了十九世紀末，甲午戰敗，這種憂患之情逐漸成爲普遍意識，強國保種成爲國族發展終極目標。而恥感意識也隨著鴉片戕害國族命脈，以及國家不斷挫敗下，逐漸內化爲自省或自我屈辱的意識。在亡國滅種危機以及救亡圖存框架下，恥感意識即結構化爲日常生活意識，馴化出人民恥感的認知，對自身恥辱、對國家恥辱要有敏感的認知和反應，這成爲對國家的責任。恥感意識社會化，使得晚清反鴉片消費的羞恥政治成爲可行，透過詬病化，召喚出罪感和恥感，一方面在外部監看下形成自我約束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恥辱刑的懲罰方式，剝奪其聲名地位，公諸於世，達到禁制效果。如此作法可以成爲一種消費控制的策略和方式，而嗜癮者也似乎必須配合國家改革需要，不斷面對恥感的召喚以及遭遇自我克制、自我改造的戒癮道德生涯的要求，同時透過自我負面化的表現策略，亦即透過自我歸咎、自我貶抑、自我嘲弄的表現方式或敘述策略，凝聚成集體責任感，激發民族情緒，並成爲新文明建立，新國民身份打造和國家改革的動力機制。至此，消費主體性、享樂愉悅的自主性，成爲國家在國族消費主義框架下壓抑監管的對象，同時透過羞恥政治塑造出罪感和恥感的主體。鴉片化過程，乃促成恥感意識社會化過程，也是恥感主體建構過程，正是透過這種轉變和自省，進入到去鴉片化，去恥辱，也就是雪恥建國的階段。

### 第三章 恥感建構：視覺化的鴉片/身體與救亡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城市建築、遺跡、咖啡館、拱廊街、林蔭大道、商品展覽館以及像偵探般穿梭於城市迷宮和人群中的漫遊者(flaneur)，構作出十九世紀巴黎的現代性意象；帶出一種偶然、新奇、震驚、轉瞬即逝、斷裂不連續的現代性體驗。同樣是十九世紀，中國的意象卻可能是：鴉片鬼、煙館、煙榻、迷濛的煙霧所構築出鴉片帝國景象。就像馬克吐溫筆下美國西部小鎮唐人街的鴉片煙館，「在每個邇邊，像黑洞般的小破屋裡，燃香的味道淡淡飄出。屋裡黝暗一片，但仍可見二、三個面色蠟黃、拖著長辮的無賴，蜷曲在矮床上，一動不動的抽著鴉片。極度的滿足，兩眼無神」；<sup>1</sup>1866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主編的雜誌刊登一篇文章，對中國鴉片煙館有如此描繪，像吸血鬼、寄生蟲式的東方人，五六人橫躺在煙館床上，時睡時抽，像一窩睡鼠。這陰森、驚悚的意象成爲1870年狄更斯的小說《艾德溫·德魯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描寫中國鴉片鬼和鴉片煙館如何帶來小鎮禍害的靈感。<sup>2</sup>毛姆(Somerest Maugham)第一次進鴉片煙館的奇異體驗，「燈光昏暗，房間低矮又污濁。房間角落有一盞燈，光線暗淡，照得人影有些可怕。香氣瀰漫，使整個房間裡充滿了奇異的氣息。一個留著長辮的中國人蹣跚著步，冷漠而陰鬱，在破舊的床舖上，倚著幾個大煙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們中不時有人發出癡狂的胡言亂語……這樣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我只在小說中讀到過……我被……帶到鴉片煙館，走上狹窄、盤旋的樓梯，在他的安排下準備感受一次我所期待的毛骨悚然的體驗」。<sup>3</sup>

1888年澳大利亞作家，愛德華·迪生(Edward Dyson)，《辛范特夫婦》(Mr. and Mrs. Sin Fat)，也是同樣的敘述基調，「通過嗆人邪惡的氣味，好奇的歐洲人在范辛特先生的房間裡看到鴉片的煙霧和虛弱不堪的中國人。他們的臉就像那些已經墮入地獄卻自以爲身處天堂的野獸」。<sup>4</sup>Milligan亦指出，鴉片煙館在外人感覺中成了最引人注目，既陌生而又令人恐懼的中國象徵。沒有其它任何東西比它更負

---

<sup>1</sup> 引自周寧，《鴉片帝國》(2004: 205)。

<sup>2</sup> Milligan, *Pleasure and Pains: Opium and the Ori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 (1995: 87~88)。

<sup>3</sup> 毛姆，《在中國屏風上》(On a Chinese Screen)(2006: 36)。

<sup>4</sup> 轉引自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01~202)。

面的影響中國形象。<sup>5</sup>確實，馬克吐溫、狄更斯、毛姆等人筆下的中國煙館，典型是西方對中國的鴉片想像，其中夾雜著東方／中國的黑暗、野蠻、殘忍、墮落、病態、愚昧、麻木、懦弱、衰敗等構建。既是西方透過鴉片對中國的想像建構，也是西方在文明秩序上對中國的壓抑和排除，確立常態文明和病態文明的區劃。這種透過物質的想像和壓抑，還可以在留辮子、裹小腳的意象上看到，這三者成爲中國的文化壓抑上的象徵。

上面的描述構成了十九世紀巴黎與中國意象上有趣的視覺對比：閒蕩的漫遊者／斜躺煙榻的鴉片鬼；明亮的林蔭大道／陰沉的鴉片店街；窗明几淨的咖啡座／煙霧裊繞的鴉片館。當巴黎以班雅明筆下的現代性空間意象進入全球現代性議程，中國也以病態、詭魅的鴉片身體意象進入西方視覺現代性議程。我們並不是要以巴黎的現代性經驗爲尺度衡量中國，我們只是不免好奇，同樣都是具鮮明特性的人物形象和空間意象，同樣都是某種時代經驗的體現，鴉片的身體意象和鴉片煙館的空間意象卻有著與西方不同的現代性經歷和遭遇，同時也開展出不同的視覺經驗。其中關鍵在於身體型態的異變，以及所造成的視覺秩序衝擊。鴉片帶來的危害，我們最先感受到的無疑是視覺秩序的異常，進入視框的身體意象不再是正常狀態下的挺直、穩定而是歪斜、橫倒的不正常現象；甚至說看到的已不再是常人，而是一具活屍。確實，身體型態的改變無疑是舊中國變化最大的異象，鴉片煙鬼的出現更是獨特的歷史經驗和視覺奇觀，幾百萬甚至千萬條了無生氣，橫臥床榻，宛如活屍的鴉片身體，不僅徵示中國進入病態、不正常狀態，也帶來亡國滅種隱憂；同時更在西方技術性視覺的觀看下展現於國際舞臺，一方面落實了中國東亞病夫意象，另一方面也讓中國/身體進入西方視覺現代性的框架，詭異的鴉片身體成爲中國撕不去的標籤和恥辱，以及西方的中國認知框架。

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和好奇，除了小腳、長辮，鴉片身體的異常視覺意象無疑是主要因素。在現代性視覺技術再現下，這種西方對中國的視覺認知，正構成了東方化、它者化論述形成的基礎之一，但也回過頭來型構中國的自我認知，中國得以透過西方視覺技術的呈現，從另一個不同以往的視框/西方視框看到病奄如死鬼的身體（當然還有可笑的長辮和怪奇的小腳），震驚自省，從而銘刻爲個人身體恥辱以及國家民族恥辱，也進而引起後續一連串身體改造運動，身體乃成爲晚清和民國國族改造史的一部分，<sup>6</sup>訓練身體(training body)，<sup>7</sup>強調身體的軍事化、革命化，爰是成爲國家發展目標之一；身體也進入國家控管的領域，身體政治成爲中國面對國族危機所必然的權力措施。

---

<sup>5</sup> Barry Milligan, *Pleasure and Pains: Opium and the Ori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1995: 96~97).

<sup>6</sup> 相關討論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2000)；《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2005)。

<sup>7</sup> 可參考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1995)

換言之，視覺建構恥感的身體，中國愚昧、落後、病態、敗亡象徵的身體意象——長辮、小腳、鴉片身體，在西方觀看和現代性視覺科技聚焦、放大下，突顯出令人羞愧、自卑的恥感意識，這種恥感意識不止於身體，更連結國家民族。我們不難見清末民初這種恥感/國恥論述成爲亡國滅種修辭之外的常見話語，恥與亡成爲當時普遍的心理困境和問題意識。因此，要雪恥救亡，就要救身體，進行身體改革，矯正偏差的身體意象，克服恥感，走出受人恥笑，自我貶抑的心理情節。視覺讓身體的問題意象顯影，進而逼出差恥感，恥感意識成爲中國改革救亡的內在動力。恥感意識幾乎纏繞著當時的開明知識份子，魯迅是其中代表。研究魯迅作品的日本學者丸尾常喜即指出，恥感意識是魯迅作品的重要契機，「要從魯迅生命與文學中所不時表現出來的恥意識切入，探索『作爲民族的自我批評的文學』的內涵」，<sup>8</sup>所謂的自我批評，是受辱之後自我反省、自我究責，甚至自我貶抑的反向回應，先歸咎自身就是如此不堪，所以才蒙羞受辱。這種自我貶抑、自我醜化的心理情節，不難在清末民初知識份子身上看到，經常以一種自我挫敗的負面書寫形式出現。這種修辭策略，一方面嚴重化中國處境的愚弱不堪，逼使大家正視殘酷事實；另一方則藉此危如累卵局面，刺激群眾奮起改革的動力。這種挫敗感猶如恥感，可以轉換爲革命動力資源。

Jing Tsu的研究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指出文化的屈辱和挫敗(failure)，如何成爲一種力量，文化和民族認同如何成功建立在挫敗上；挫敗又如何引起 19 世紀晚期到 20 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種族和文學現代性誕生，特別是在謀求文化振興和文化生存鬥爭期間。<sup>9</sup>亦即，透過挫敗意識或挫敗書寫，凝聚認同感和愛國意識，而激越勃勃的民族意識也成爲淨化內在自卑和匱缺情意的力量，在淨化過程中轉化爲國族改革動力。再者，丸尾常喜也進一步引用日本另一位學者對中國恥感意識研究的話語，說明恥辱在中國文化根深蒂固，成爲道德原動力，「恥是名裡面的意識，不單儒教把恥當做道德的原動力，而且這是包含諸子百家在內的中國人所共有的思想。它由學習而植根於心底，成爲內在的道德意識」。<sup>10</sup>恥做爲道德原動力，在亡國滅種的憂患年代成爲啓蒙自覺的契機（如魯迅）和國族救亡的動力。因此，視覺建構愚弱、病態的身體，宛如上了解剖臺的軀體，遭視覺解剖的一覽無遺，反激起強烈恥感的自覺意識，而恥感意識和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則構成近代中國救亡現代性的主要動力來源。

上述是視覺觀看下身體改造，洗雪恥辱的歷史背景和論述。在此，我們已將

---

<sup>8</sup> 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2009: 7)。

<sup>9</sup>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2005: 1).

<sup>10</sup> 森三樹三郎，《名與恥的文化》(1971，日本講談社)，引自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2009: 10)。

身體轉向另一種身體政治，一種身體的視覺政治，亦即觀看政體(scopic regime)，從觀看的角度探討鴉片身體的視覺現代性意義，如何構作出病態、恥感的身體，視覺對身體裁決，以進入視覺化鴉片中國問題的核心。在這裡，主要關懷不在於「再現」這一問題，亦即不在於西方如何再現東方身體，鴉片身體如何被再現等相關問題層次上，而是試著在各種鴉片論述中，在鴉片如何構成中國問題的各式討論中，回到最根本的鴉片如何構成視覺問題的起點上，找出構成鴉片問題的視覺性因素。亦即，鴉片身體以什麼樣的方式被觀看和對待，而這一鴉片問題視覺化則聚焦於鴉片身體的病態和恥感的構作上，身體如何成爲常態秩序、視覺秩序和權力體制所形成的觀看政體（視覺政權）下亡國滅種和恥感的病態身體，一種違反正常身體秩序，需被管制排除或矯正的身體形態。這涉及感官的審查和裁決，透過觀看政體下的視覺習性察知病態身體與社會危險和邪惡的關係，並進行視覺的烙印和入罪化以捕捉驅除不正常身體。

簡言之，這裡有兩條討論軸線：一是身體—視覺現代性—觀看政體—病態/恥感身體的構作—視覺的裁判和管治；二是視覺化的身體/國族恥辱—透過視覺啓蒙覺醒—透過展示空間，建立民族主義視覺認知和恥感認知—透過商品國貨展建構雪恥愛國的視覺景觀，展開去恥辱，去鴉片化的視覺化民族行動。其間涉及：

一、視覺問題的誕生，身體如何成爲中國與西方視覺遭遇的問題焦點，彼此形成視覺歧視和偏見和醜化、污名化的身體烙印，特別是中國的鴉片身體、小腳和辮子意象，最後如何在西方視線下建構爲中國的恥辱，形成漫長的視覺恥辱歷程，以至在洗刷民族恥辱，建立富強國家的大旗下，進行中國身體改革。

二、另外從一則魯迅的視覺遭遇談起，帶入現代性視覺科技和視覺啓蒙的關係，在全球視線、外人凝視下，如何影響中國的自省、覺醒和恥感意識的建構；並由此帶入視覺中心主義和觀看政體形成的論述脈絡。

三、中國如何透過現代性視覺技術的展現及萬國博覽會的參展，讓鴉片/中國進入視覺的全球現代性議程，既經歷資本主義商品現代性經驗，同時國格、國體又在這過程中蒙受全球目光羞辱，特別是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事件，加深中國恥感的深化和普及化，也引起後續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熱，成爲救亡圖存的動力。我們將探討中國進入萬國博覽會，也就是進入現代性全球視覺空間的過程，以及如何造成鴉片、小腳等國恥物件登上國際舞台，既自我羞辱又遭世人恥笑。簡言之，中國進入萬國博覽會是現代性和恥辱兼具的過程，開啓商品現代性視野，也遭受全球視線羞辱，更加深自我的屈辱和挫敗感，進而對博覽會目的、功能建立應有的認知和作法。自此中國進入賽會興商階段，爲日後富國裕民的重商政策以及民族經濟發展提供另一種解決方式。形成一種以視覺凝聚全民共識、激發愛國情緒的富國救亡之道。

四、在這視覺受辱過程，中國開始利用視覺進行象徵性鬥爭，商品展、國貨展成爲民族主義展示空間，建構民族主義視覺認知和愛國雪恥景觀，去除羞辱的鴉片等國恥景觀，成爲另一種象徵性的視覺救亡行動。也就是從萬國博覽會的參與到賽會興商的體認，再到商品國貨展的舉辦，正是中國從受辱到覺醒，再到自救、救亡的過程。

五、最後，在禁煙運動雷厲風行時期，民族主義視覺認知和恥感認知主導下的觀看政體，如何進行鴉片身體的病態構作與演作、如何進行視覺的管治與裁決。亦即，建構鴉片身體的病態特徵，透過視覺標記，據以找出鴉片吸食者，同時也形成人人皆是視覺警察的社會監視力量；這是中國鴉片管治除了透過消費政治進行品味管治外，另一種視覺管治，對不正常身體進行視覺審判。中國的去鴉片化過程正透過管治鴉片消費和管治鴉片身體，讓不正常的品味和病態身體，恢復正常、健康。但另一方面病態/醜態的鴉片身體有無可能是對局勢不滿的逃逸或解脫，無可如何的困頓局面只有透過鴉片進入出神國度，以求自我安適。雖然資料難以證實，但我們仍提出一個可能思考。

這是一個以鴉片爲起點的視覺化恥辱歷程，也是視覺化的救亡歷程，更是恥辱與現代性並進的歷程；去鴉片化、去恥辱、去病態景觀成爲纏繞中國百餘年的國族存亡命題。國恥、救亡與視覺管治，共作出視覺化的中國改革進程。

## 第一節 身體的視覺建構

### 一、東西方的視覺遭遇：番鬼、鴉片鬼的妖魔化和醜化

西方人對中國鴉片吸食者的印象，帶著陰森、恐怖哥德式小說的筆調，鴉片中國宛如鬼魅國度，煙霧迷濛中躺著一具具活屍，成為世紀奇景，全球奇觀。十九世紀西方與中國的交會，雙方都經歷了一場視覺震撼，在溝通交往前，先進行的就是視覺的交換，特別是與自身差異極大的身體特徵成為視覺評判的焦點，而視覺的好惡則影響了對其它人種的看法，其背後隱含著對異己身體的歧視以及伴隨而生的文化偏見。中國人看到金髮、藍眼、白皮膚、高大多毛的西方人，稱之為番鬼、洋鬼子。林則徐在其日記中描述了令他印像深刻的洋人體態，也認可了鬼子的稱號，「其髮多捲，又剪去長者，僅留數寸；鬚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捲毛，驟見能令人駭。粵人呼為鬼子，良非醜詆」。<sup>11</sup>指稱西方人為番鬼、洋鬼在鴉片戰爭前後從廣東蔓延到內地，成為中國民眾對西方人的視覺印象和人種認知，如「白者乃真鬼，語音類禽鳥，脛長面多毛，眼綠疾顧瞭，脅從半丐流，肌肉黑如棗」，<sup>12</sup>因為他們的身形宛如禽獸，「黃髮捲毛眼珠兒綠，手拿著哭喪棒好似個猴精」，<sup>13</sup>似鬼不似人，「其形本如鬼，彼亦鬼自名」。<sup>14</sup>更有詩〈說鬼〉狀繪黑人、白人身形，「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醜惡如栗煤，髮卷批耳髭繞腮，羊睛睽睽秋香苔」。<sup>15</sup>

這些帶著污穢、譏諷的修辭，相當視覺化和形象化，既妖魔化也怪胎化西方人。西方人的身形在中國的視覺秩序裡，擺在非魔即獸的位置。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描述中國人如何看待洋鬼子，洋鬼子就像紅眼碧髮妖魔，姿態不端，鳥語鶯舌，怪異難解，小孩看了怕，馬看了不讓騎，狗兒見了亂叫，他說「我們可以從中國人的畫裡，輕易見到中國人所認知的外國人的主要特徵：無一例外的紅髮碧眼，短而且極端緊身的衣服，走路快速，動作搖擺，坐姿和站姿都不雅。還有一些藝術家描繪不出來的額外的特徵，像鳥叫那樣無法理解的語言。有些人感到好奇，小孩怎會對這種奇怪生物害怕，外國人經過時，孩

---

<sup>11</sup>轉引自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1999: 42)。

<sup>12</sup> 陸嵩，〈江州述感〉，《意苕山館詩稿》，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82: 190)。

<sup>13</sup> 佚名，〈外國洋人歎十聲〉，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82: 322)。

<sup>14</sup> 陸嵩，〈有問賊中事者詩以答之〉，《意苕山館詩稿》，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82: 189)。

<sup>15</sup> 金和，〈說鬼〉，《來雲閣詩》，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82: 53)。



子會衝入搭們自己的農舍尖叫。還有讓人費解事情，為什麼蒙古馬駒那麼害怕外國人.....一些小馬駒，除非蒙上眼罩，絕不願意被外國人騎。還有狗，每一個外國人經過，它們總會衝出來，沒有任何節奏和理性的吠叫」。<sup>16</sup>雖然誇張，卻相當貼切的指出洋人被妖魔化的普遍現象，特別是透過繪畫表現，洋人的鬼相被定格，更聚焦、放大這種妖魔意象，也更易於流傳散播並強化這意象。即便對洋人無好惡，鬼子仍是不變的符號，就像翟理斯說的，「中國人或許會愛你，但你始終是個鬼子」。<sup>17</sup>

因此東西交流的第一步就是視覺交流，以身體形態為焦點的視覺審度和感官裁判，雙方透過繪畫、照片、幻燈片等視覺媒介再現的意象，建構種族偏差認知。然而有趣的是，翟理斯尋找上述洋人如鬼，人畜走避的答案，答案竟不是視覺上的恐懼，而是嗅覺上的厭惡，「一個中國人給出了對這種謎團的答案.....，他解釋說：那些動物還有他的鄉人，當聞到外國人骯髒和可憎的氣味時，總要提起警惕。這是非常奇怪的，因為這也是外國人舉出的極端厭惡中國人的重要理由」。<sup>18</sup>嗅覺在這裡扮演社會區辨和劃異功能，透過氣味的屬性和好惡辨識彼此，識別身份，齊美爾(Simmel)即指出，日耳曼人和猶太人自來相互厭惡，氣味是一大問題，彼此嫌惡對方氣味，也用來區辨彼此，就像黑人身上體味，不易為北美上流圈子的白人接收，在白人社會裡容易被排除。<sup>19</sup>在這裡，種族歧視問題，成為鼻子問題，透過鼻子區別你我。中國與西方接觸，文化衝突、種族歧視問題，也反映在眼睛和鼻子問題上，只是嗅覺的歧視和排除，較少被提及，翟理斯在這裡卻為我們提供了這個中西嗅覺相互嫌惡例證。

西方人進到中國確實不免感受這種對身體形態的歧視，美國傳教士暨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提到中國人觀看西方人身體所形成的好惡，「他們不欣賞西方人頭髮的顏色.....他們異口同聲的說西方人的鼻子太難看，而他們蒼白的的面容也不美觀。還有中國人也不欣賞西方人那藍色的眼睛.....中國人還很不友好地將西方人的耳朵同他們國家的驢子的耳朵相提並論」。<sup>20</sup>這種以自身為標準，對異族身體產生視覺敵意，進而形成言語暴力，一方面出自於對西方人感到陌生、神祕、奇異、古怪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則隱含了對它者文化、異己文明的歧視和批判。中國人從西方人身體特徵聯結到他們野蠻、沒有文化，番鬼這個

---

<sup>16</sup>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的文明》(1911)，收錄於《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2011: 224~225)。

<sup>17</sup>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的文明》(1911)，收錄於《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2011: 224)。

<sup>18</sup>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的文明》(1911)，收錄於《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2011: 225)。

<sup>19</sup> Simmel, "Sociology of the Senses" 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1997: 118).

<sup>20</sup> 何天爵，《真正的中國佬》(Real Chinaman)(2006: 138)。

詞是最好的說明。1842年6月，《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洋人編輯反思番鬼這字眼加諸他們身上的義涵，寫了一篇文章討論這歧視性字眼，「番鬼，這個辱罵性的綽號已經在這個國家裡成為外國人的同義語.....有一天，我們請教一位當地的士紳，問他們用『番鬼』這個詞稱呼外國人的原因是什麼。他回答說：『我不認為鬼字是指魔鬼，它這裡的含義可能是異常、粗鄙或怪誕，總而言之，指的是非天朝的，或非支那人的。番則用於南洋一帶的卑賤野人.....當外國人最初來到支那海岸時，他們穿的緊身服裝、聲音刺耳的鞋子和雞冠似的帽子，藍眼睛紅頭髮.....以及他們戰艦上傳來的轟鳴的炮火，這一切都震驚了這裡的老百姓，於是他們稱呼：鬼！鬼！這個詞就一下流傳起來了.....現在成了對所有遠方來的陌生人的統稱』.....在我們看來，他的解釋恰好說明支那人如何蔑視別的國家.....」。<sup>21</sup>番鬼意思在這裡顯然指涉西方人在身體特徵和服飾裝扮上的奇特、怪誕，以及前所未見，令人震驚的槍炮船艦威力。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在其影響深遠的《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書中也有一段指出這種視覺異己的排斥和貶抑現象，中國人看到洋人第一眼，感到怪異的就是服裝打扮。洋人穿著短窄，像猴樣的衣服，暴露其身形，招搖過市，令人覺其醜陋。他說，「支那人對於外人，其第一起異樣之感者，則在其服裝」，因為中國人認為，「東洋之服裝，寬而掩其外形。西洋之服裝，窄而暴露其外形，甚可醜也。今若使支那之紳士，著短衣，則必厭醜陋，而不肯出至公眾之前。而西洋人者，乃著此猴樣之上服，而竟於租界上闊步」。<sup>22</sup>然而，這種中國對西方因視覺感官差異所生的蔑視，背後還夾雜著西方對中國生活習慣和民族性的貶抑。明恩溥比較兩者服裝，其解釋隱含著雙方衛生健康習慣的優劣，洋服短窄較輕便，身體動作自由活潑，中國服裝寬長拖疊，有礙身體自由。<sup>23</sup>顯然中國服飾不適合身體活動、運動，也意味著中國人身體較不健康。這也反映在中國人不好運動上，明恩溥即指出中國人往往不明白洋人為什麼愛運動，乃在於中國人不好動，沒有運動習慣，無法理解運動的好處，「支那人實如不知運動之有要者。如彼見西洋人之無富貴貧賤，皆好散步也，殆若不能解.....可見支那人決不能知運動之真意者，即說明之，而彼猶不解」。<sup>24</sup>

很明顯，中國人因視覺感官的看不慣、不能接受，而蔑視洋人短窄猴樣的衣服，明恩溥則從衛生健康角度反駁，指稱中國不尚運動、不健康。這一觀點很符合一般西方人對中國身體萎弱、頹廢的認知，典型西方觀看中國的視框。東西雙方從身體形貌意象到不衛生的相互貶抑，又可從翟理斯舉的一例看出。有位中國

---

<sup>21</sup> 1842年6月，《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No.6(1842: 325)，轉引自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 (2009: 136)。

<sup>22</sup> 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9)，(2006: 69)。

<sup>23</sup> 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9)，(2006: 69)。

<sup>24</sup> 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9)，(2006: 64)。

官員對洋人喜穿短窄衣服甚為不解，而他認為洋服不好的理由竟出於，「我想不出為何你們外國人把衣服穿得那麼緊，如果抓蝨子會非常困難的」。<sup>25</sup>嘲諷官員不文明、中國人不衛生，莫過於此。中國寬敞衣服功能只為抓蝨子方便。顯然，寬衣捫蝨的鮮明意象，讓猴樣意象，從洋人轉為中國人。

這是洋人從衛生角度看待中國服飾，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則從生產角度看待中國服飾的不具勞動效能。1875年駐華公使森有禮拜會李鴻章，雙方討論斷髮易服一事，李對日本改變舊有服制，不再仿中而仿歐，大為不滿，森有禮則對此回應，「我國舊有服制寬鬆而大，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極不合適，故而改變，對我國裨益不少」，至於「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適應我國人民。勤勞是富裕之本，怠慢是貧苦之源，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捨舊就新」。<sup>26</sup>西化後的日本從中國寬衣博帶的服飾，看到中國的安逸怠慢，疏於勞動，國家的生產經濟效能無法提昇，雖然服飾未必是主因，卻由此見微知著，看到中國改革的不徹底和失敗。從上而知，在中國醜詆洋人服裝的同時，洋人包括日人都已看到中國服裝背後身體康健和經濟生產的問題，而這也正是中國亡國滅種之憂的問題所在。森有禮的回答李鴻章不甚贊同，李說「衣服舊制體現祖宗遺志……我國決不進行這樣的變革」，<sup>27</sup>然而二十餘年後的康有為已看到長辮寬服對中國維新、進步的危害，不只基於視覺美醜，更撇開服飾倫理價值、等級秩序等功能考量，具體回應上述衛生健康、勞動生產等問題。1898年他上〈斷髮易服改元摺〉一奏，請求光緒帝採斷髮易服政策，因為，萬國趨於尚同，清朝服飾獨異它國，不利與它國往來交誼；辮髮長垂，行動搖擺，不利於操作機器；執刀跨馬，長辮纏身，不利作戰和軍事訓練；蓄辮污垢多，有礙衛生；長辮遺笑外國，譏為豚尾。斷髮易服成為維新份子和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sup>28</sup>

上述是透過外觀裝扮的異己，形成視覺排斥和人種歧視，我們還可以從餐飲習慣的殊異找到相同例子。美國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舉了一例，一個中國人看到洋人像野蠻人一樣大口生吃魚肉，而認定番鬼脾氣之所以粗暴凶惡全出於此，「……接著大嚼魚肉，這些魚肉是生吃的，生得幾乎跟活魚一樣。然後，桌子的各個角都放著一盤盤燒得半生不熟的肉……要用一把劍一樣形狀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來，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這一情景，才證實以前常聽人說的是對的：這些番鬼脾氣凶殘是因為他們吃這種粗鄙原始的食物。他們的境況多麼可

---

<sup>25</sup>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的文明》(1911)，收錄於《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2011: 225)。

<sup>26</sup> 〈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見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1987: 73)。

<sup>27</sup> 〈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見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1987: 73)。

<sup>28</sup>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1981: 368)。

悲」。<sup>29</sup>進入眼底大口生吃的圖景，又有刀叉在旁伺候，將洋人跟野蠻人聯結起來，即便出於文化、習俗的不同，這種偏見依然形成，甚至透過眼前圖像，更加強化腦中認知架構。亨特提到，「中國人不瞭解番鬼的禮節、習俗和社會關係。在他們眼裡，番鬼的一切，那怕是出自良好教養的基本禮貌，都是野蠻的、不完美的。跟他們自己彬彬有禮的舉止相比，番鬼的野蠻就顯得更突出了」。<sup>30</sup>

從上述衣著、餐飲文化差異到視覺排斥，以至人種間的相互貶抑。中國與西方交流過程，因視覺異己、感官排斥，構成強烈的種族敵意和文化歧視，也更反映在語言暴力和輕蔑上，番鬼一詞無非就是上述現象的匯流。法國人老尼克根據他的親身經歷，指出番鬼是對他們這些外國蠻人既好奇又抱著敵意的蔑視、仇恨的咒罵言語，而且從小就馴化出這套觀念，「番鬼這個詞出現在所有的咒罵中，在我耳邊響起無數次。就在這時，我恍然明白它的含義。番鬼，字面的意思，外國的魔鬼。當番鬼的船駛過中國人通常沒有設防的邊界時，好奇而且往往抱有敵意的人群立即跑向岸邊，跑上甲板，母親們指給孩子們看，告誡他們要蔑視、仇恨這些蠻人。我保證孩子們不會忘記這些過早就開始的教育」。<sup>31</sup>如何化解敵意，去除番鬼的歧視心態，《中國叢報》的編輯繼續指出，「要想根除這個綽號(番鬼)，這裡的民眾就必須多跟外國人往來，學會把他們當做同類人，拿他們當朋友，在視覺接觸上就要接受外國人是他們的同類和朋友」。<sup>32</sup>作者建議要在視覺接觸上接受，才能打開彼此，容納對方，引為同類和朋友。亦即將視覺上的敵意和偏見轉為視覺上的友好和包容。

然而中國對西方的番鬼稱呼，除了出之於上述提到的背景外，更重要的是根據劉禾研究，稱西方人為番鬼，可能還有一部分來自於鴉片戰爭期間西方人的武力侵略和暴力犯行，引起國人集體恐懼、憤恨、不滿的情緒，透過「番鬼」這一辭彙進行語言的反擊，這也是番鬼這詞在鴉片戰爭期間廣泛流傳的原因。劉禾進一步指出，從視覺上來說，在中國沿海周邊頻頻出現的英國戰艦和槍炮，只激起人們的恐懼、仇恨和抵抗，無法讓老百姓願意視外國人為自己的同類和朋友。<sup>33</sup>確實，十九世紀東西方交會時期，西方人奇異陌生的體型，前所未見怪物般的現代化武器設備，以及這兩者結合對中國的暴行、殺戮和侵略，對中國人而言視覺上難以抹滅的刻板印象。中國人經歷一場西方人導演的視覺震撼和暴力景觀，鴉片戰爭正是讓中國進入全新視覺經驗的開端，背後經歷到的正是西方工業文明、

---

<sup>29</sup> 亨特(William C. Hunter)，《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2009: 231)。

<sup>30</sup> 亨特(William C. Hunter)，《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2009: 228)。

<sup>31</sup> 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2004: 6)。

<sup>32</sup> 1842年6月，《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No.6(1842: 326)，轉引自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2009: 137)。

<sup>33</sup> 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2009: 135~137)

物質力量開展出的現代性視覺經驗。

中國人對陌生、不解的洋人懷著視覺敵意和文化偏見，同樣的西方人也從中國人的身體特徵看到中國人愚昧、病弱、沒有文明一面。特別是小腳、辮子和吸鴉片成為西方人接觸中國印象深刻的身體視覺奇觀。中國人身體的矮小、瘦弱、病懨一直是西方人進入中國第一眼的重點，病弱意象特別是在士紳階層，如下面這一段描述，「就我見到的中國士紳來看，他們幾乎都是一副令人厭惡的病態像。天朝居民的上層階級臉上顯露出來的不僅是一種女人氣味，許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見他們就會覺得惡心和討厭」。<sup>34</sup>四體不勤，手無幾分力的文士，成為洋人眼中既不健康，又帶有女性化姿態的醜惡對象。香港第二任總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在 1836 年的一篇敘述中，帶著偏見、扭曲眼光看待中國身體，老衰的身體也成為醜陋不堪，嘲笑的對象，「夏天時，男人們習慣赤裸上身，結果上半身的顏色經常與其它部份不同，以致於當他們脫光衣服時，看去好像把歐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亞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樣。20 歲以前，他們一般都很好看，過 20 後不久，青年人那種圓潤便逐漸消逝，顴骨向外凸出，使整個容貌顯得粗野和猙獰。隨著年紀增長，老年男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變得極其醜陋，而老年婦女則只能用朱維納里（羅馬法學家和諷刺詩人）的詩句來描述：如此的皺紋，好像在印度森林深處，一個衰老的猿人，在眾多幼仔中間摩挲」。<sup>35</sup>德庇時的偏見歧視在於任何人都迴避不掉的歲月烙痕，也可以拿來嘲諷一番，只因這不是西方人視覺框架下的身體型態，透過這一西方視框看到的中國身形，無論老少充滿著文化偏見和種族歧視。

這種西方對中國身體甚至背後文化風尚的偏歧視框，也反映在 1909 年英國傳教士麥高溫(John Macgowan)的視覺貶抑和排斥上，他以誇誕、怪物式的筆觸描繪中國人身體特徵的猥瑣，從五官、皮膚以至聲音，無不意象鮮明，令人發噱，「他們皮膚是黃色的，聲音是尖厲而不悅耳.....他們的顴骨突出，扁平的鼻子就像老祖宗在某次打鬥中受傷之後傳下來似的。他們的嘴唇很厚，嘴巴寬大無比，簡直就是一個被用筷子扒拉進去的米飯的墳墓。那雙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細小的眼珠在眼眶裡轉來轉去，就像是在與外面世界捉迷藏。除此之外，大部份中國人看上去都顯得遲鈍、無神，給人一種缺乏想像力的印象」。<sup>36</sup> 中國人的身體也跟骯髒、不衛生聯結一起，不講究頭髮的整理，沒有清洗身體習慣。麥高溫提到，

---

<sup>34</sup> 1838 年唐寧(C.Toogood Downing)，《番鬼在中國》(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收錄於羅伯茨(J.A.G Roberts)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06: 60)。

<sup>35</sup> 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中國人》(The Chinese)(1836: 254)，收錄羅伯茨(J.A.G Roberts)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06: 9)。

<sup>36</sup> 麥高溫(John Macgowan)，《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2006: 293~294)。

「中國農民遠遠談不上具有吸引人的外表，他們根本就沒有講究清潔的習慣。他們的頭髮要過相當長時間才剃一次，所以鎮上凡是給居民修剪頭髮的場所往往被一層厚厚的毛髮所覆蓋，那真是一幅髒亂、邋遢的場面。他們的辮子梳理的也不平順，任憑其隨意的生長，頭髮四處蔓延滋生，給人一種不潔、髒亂的印象」；麥高溫更進一步帶著偏見、扭曲筆法嘲諷中國勞動者身體膚色和清潔的關係，亦即西方人白皙皮膚，成為西方人潔淨、衛生的標記，而中國勞動者棕褐色的皮膚，黑頭髮正可以掩飾髒污之色，所以不須勤於更洗，久之習於髒亂而無感，「在工人中，尤其是在農民中，清洗似乎已成了一門失傳藝術……西方人那白皙的皮膚，藍色眼睛和金色頭髮顯然意味著他們相信水的價值。在棕褐色皮膚，黑眼睛和黑頭髮的掩飾下，這片土地的勞動者對清洗的厭惡之情也被隱匿起來，所以他們的骯髒也就顯得不那麼突出和令人生厭了」，麥高溫最後還補上一句，「以上這些對農民的描述是真誠的，絕沒有任何敵意」。<sup>37</sup> 如果這些描述誠真，不帶敵意嘲笑，那麼這種對中國身體的觀看角度和標準，顯然出於西方視覺秩序的判斷，在西方視框下中國人體型就是如此怪誕可笑，骯髒不潔，形成西方觀看政體對中國身體的裁判。

當然西方人這種視覺偏見，德庇時也意識到，他在 1836 年的文章中指出當時一些描繪中國風土人情、現世生活的畫片，主/誤導了西方人對中國身體形貌的看法，「生活在歐洲的人們對於中國人的體貌特徵的印象一直被奇怪地誤導著，這要歸咎於從廣州販運來的制品上的圖畫，這些圖畫通常用一種比較寫意的漫畫形式表現的」。<sup>38</sup> 德庇時提到很重要的一點，亦即上段所討論的，西方人對中國的理解、認知，大都是透過視覺接觸，而其媒介就是手繪圖片或是現代性視覺技術產物的照片/幻燈片。這些圖片/照片隨著商品或明信片播遷於全球，這是中國意象的全球化，中國人的身體形貌就是透過視覺媒介進入全世界的眼底。中國既被他人注意/注視，也自我意識到在世界地圖中佔了一個位置，中國中心的天下/世界觀自此不復再存。對西方人而言，最經典的中國意象無非是小腳、辮子和鴉片鬼，既富異國情調，也是西方視框中落後、愚昧、不文明的表徵。成為西方人嘲諷（小腳、辮子）、鬼魅化（鴉片鬼）的對象，構成西方敘述中國，東方化中國的基調。

中國妖魔化西方人的身體形態，西方人也極盡醜化中國人的身形樣貌，幾億中國人光溜頭上的一條辮子，更是譏笑、醜化的對象。辮子已不是身體醜陋的一部份，而是國家落後、退化的象徵，成為全球性的國家意象。何天爵戲謔的描繪中國人的辮子，「在搖籃時期和童年時代，中國人的頭不是被剃得一毛不剩，溜

---

<sup>37</sup> 麥高溫(John Macgowan)，《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2006: 293~294)。

<sup>38</sup> 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中國人》(The Chinese)(1836: 254)，收錄於羅伯茨(J.A.G Roberts 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06: 8)。

圓光亮，正如一個彈子球，便是這裡那裡留下圓圓的一圈，正像一塊又一塊的補丁。那點頭髮便像雜草一樣在那裡自由生長，然後每片頭髮被紮成一根一根的小辮。這樣看上去，就好像血液在頭部的供應特別充足。由於過剩後便崩根發芽，長出了五六根羊角辮子」。不只西方人以戲謔眼光看待中國長辮，隔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1871年頒布「斷髮脫刀令」，剪掉長髮，脫去腰刀，步隨西方文明。對中國仍蓄長辮，不免心生鄙夷，常以「豬尾巴」、「豚尾奴」戲呼之。1896年四名日本留學生，穿著日本校服制帽，垂著長辮，走於路上，卻遭到日本小孩取笑叫喊，「豬尾隨！豬尾巴」，尊嚴受損，乃憤而退學。<sup>39</sup>剃髮留辮，自滿清入關以來即成為漢人遭受異族統治的恥辱，到了清末歷經一連串國際外交和戰事的挫敗，蓄辮更成為落後、積弱、亡國滅種的象徵以及民族衰敗、任人欺凌的國際恥辱。1911年10月12日，武昌辛亥革命後兩天，湖北革命軍成立，隨即發布〈宣布滿洲政府罪狀檄〉聲討滿清罪狀，其中一罪即強迫漢人剃髮留辮，「垂狗尾以為飾，穿馬蹄以為服，衣冠禽獸，其滿清之謂。入關之初，強漢族蓄尾，不從，死者遍天下，至今受其束縛，貽九州萬國羞，使吾衣冠禮物，夷為牛馬，其罪八」。<sup>40</sup>狗尾馬蹄，衣冠禽獸，成為中國人在滿清一朝自我觀照的意象，這種醜陋意象又跟國族衰敗結合，只有貽羞萬國。

剃髮蓄辮確是外國人看了笑話，中國人看了自慚的恥辱。垂著長辮似乎成為醜惡、落後、不文明的印記，去除這印記則是清末到民初維新和革命份子改革目標之一，<sup>41</sup>因為「區區一髮辮去留而關係種族存亡之大如此。查當年輿論，以女子纏足及男子辮髮為兩大弊習，遺笑四鄰，同號國恥」。<sup>42</sup>這種騰笑四鄰的國恥，鄒容在《革命軍》也提到拖著長辮在世界其它地方遭受恥笑的不堪，「拖辮髮，著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 tail（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為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拖尾奴才者何為哉」，<sup>43</sup>其他人的遭遇也如此，「凡我國人所到之處，就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稱，或辱之，或侮之」。這是辮子意象在世界旅行，也是恥辱的強化，透過他人視覺的鄙夷到言語的侮辱，連自身都覺得形象醜陋，「頭剃其半，背洩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sup>44</sup>自慚形穢，羞愧無地，成為中國人面對外人眼光的內在感覺，這種西方視覺促成中國建構恥感身體，激發了

<sup>39</sup> 見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上），《渤海學刊》，1995年，3期（1995: 22）。

<sup>40</sup> 曹亞伯，〈武昌起義〉，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五冊）（1957: 149）。

<sup>41</sup> 相關研究見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上）、（下），《渤海學刊》，1995年，3期（1995: 20~26）、4期（1995: 64~72）；侯杰、胡偉，〈剃髮、蓄髮、剪髮：清代辮髮的身體政治史研究〉，《學術月刊》，2005年，10月（2005: 79~88）。

<sup>42</sup> 章士釗，〈疏黃帝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冊）（1961: 229）。

<sup>43</sup> 鄒容，《革命軍》，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 122）。

<sup>44</sup> 〈論髮辮原由〉，載《黃帝魂》，收錄於張栻、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下冊）（1960: ）。

強烈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緒。這也讓排滿革命份子以剪辮做爲投身革命的象徵，一種革命的視覺標記。而剪辮和穿洋服這兩項視覺標記，反過來成爲清廷抓革命黨人的依據。「剪辮易服」乃成爲變法維新，革命建國必進行的改革工程之一，「今日之中國，欲變法自強，其必自剪辮易服始矣」，<sup>45</sup>譚嗣同也提到，「若乃中國尤有不可不亟變者，剃髮而垂髮辮是也」。<sup>46</sup>

寬衣垂辮既成爲中國進步障礙，因此要從視覺形象上進行政治改革，透過改變身體的裝扮和形貌，改變政治意識和行爲，「面目形狀既變，衣服裝束不得不隨之而變，衣服裝束變，則行爲政治不得不變矣」，因此，「欲除滿清之藩籬，必先去滿洲之形狀，舉此累贅惡濁煩惱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後彼之政治乃可得而盡革也」。<sup>47</sup>葛凱(Karl Gerth)也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的領導人通過服裝和個人外表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視覺認知，來推進和強化他們的政治進程，命令中國男子剪辮是新政府首要措施之一」。<sup>48</sup>這時期民衆的視線被規訓爲民族主義的視線，也就是葛凱所說建立起「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因此形狀改革乃成爲政治改革前提，因爲過去的身體意象、型態並不符合當前打造民族主義所需的視覺認知，這也說明當時中國人身體的視覺形象如何構成一個攸關民族自尊和國家興亡的問題。因爲這不只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更是外人或全球如何觀看和評價自己的問題。這種問題形象的全球化和東方化，也更深化中國人自身的全球意識和世界觀。西方人觀看中國的態度或西方人的形象成爲中國人走向文明的改革動力和模仿範型。在剪辮易服的改革口號下，終於1912年3月5日頒布〈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規定「限二十日內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違法論」，讓長辮走入歷史。至於易服，被西方人嘲笑不衛生，既不適合勞動生產，又不利於體育鍛鍊的寬衣博帶裝束，也隨著革命成功，朝向「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sup>49</sup>的衣式原則發展。

1911年中國不只進行了政治革命，也歷經了視覺形象革命，中國人的身體形象，在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下轉型，同時也在現代性的視覺認知下改造自己。新的物事、商品逐漸成爲身體轉型的配件，現代性物品成爲裝扮身體的流行飾物，如手錶、眼鏡，手杖，牙刷、牙粉、香水、肥皂、化妝品等物品。不是美化身體型態，就是身體的衛生保健，同時也建立起現代性的視覺認知，穿戴使用這

---

<sup>45</sup> 1903年，〈剪辮易服說〉，《湖北學生界》，3期，轉引自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上)，《渤海學刊》，1995年，3期(1995: 23)。

<sup>46</sup> 譚嗣同，《仁學》(1998)。

<sup>47</sup> 〈論髮辮原由〉，載《黃帝魂》，收錄於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下冊)(1960: 748)。

<sup>48</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73)。

<sup>49</sup> 孫中山，〈復中華國貨維持會函〉，《孫中山全集》(第二卷)(1982: 62)。



些東西表示自己已經現代了，跟過去不一樣，中國也因此出現製造現代性物事的產業，生產這些與身體裝飾有關的消費品。如葛凱所說，「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人開始使用不同商品來改變他們的個人儀表，以此在視覺上表明他們的社會地位。因而出現一系列新的中國工業，它們致力於生產新的商品並服務於這些新的需要。越來越多中國人從頭（帽子）到腳（鞋子、襪子）改變他們的外表」，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的十年見證了中國國民在個人外表上的改變」。<sup>50</sup>確實，1911之後，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政治制度，也看到不同以往的中國樣子。

革命成功，新國家建立，斷髮易服成爲新公民的入門儀式和政治象徵。同樣成爲世界奇觀，並列國恥的纏足，也在頒布〈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的同時，公布〈禁纏足文〉，廢除纏足惡習。早在一年前，1911年11月，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除發布剪辮令外，亦發布禁纏足令，因爲「纏足惡習，有礙女界衛生，軀體受損尤小，關係種族匪輕，現值民國成立，理宜百廢維新，男子一律剪辮，女子亦宜振興。況爲國民之母，豈可玩乎因循。特此示放足，其各毋違稟遵」。<sup>51</sup>在這裡，禁纏足不再只是醜惡的視覺奇觀，不文明的民族恥辱，或對個人身體健康有所傷害，它更攸關種族的健全繁衍，是以女子乃國民之母，爲國家民族孕育健全的下一代，成爲女子對國族應盡的責任。纏足問題從視覺美醜、文明野蠻，提昇到國族興滅層次。女子地位也從，「中國婦女狀況是最慘的，受苦、受難、受歧視……她一降生就被公認是家庭的恥辱……如果她沒有立即被溺死……就被當做一個卑賤的動物，幾乎不被看作人」<sup>52</sup>的非人境地，升格到攸關種族存滅的國民之母的地位。婦女，國民之母，在強種脈絡下自此成爲育種救國的國族生產機器，進入母體國家化、生育國家化的生命政治範疇裡，也是下一章討論重點。

雖然，放足得以使婦女從男性眼光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但在清末民初亡國滅種論述中，卻也更令婦女掉入龐大的父權支配體系，亦即國族救亡的框架中。我們不斷看到國族將婦女納進救亡計劃，從放足到婚配以至育種，都脫離不了國族編派婦女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辮子和纏足做爲西方人認知中國的視覺奇觀，從帝制進入共和時代，已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只剩記憶留存和畫/照片定格的影像。至於，另一個視覺奇觀，綿亙百年的國恥標誌，鴉片鬼即便進入新國度，仍然存在其身影。辮子意象可笑、纏足意象野蠻，然而這兩者危害，終究有限。鴉片鬼

---

<sup>50</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47)。

<sup>51</sup> 載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下冊)(1948: 68)，轉引自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下)，《渤海學刊》，1995年，4期(1995: 65)。

<sup>52</sup> 古伯察(Huc, M.Evariste)，《中華帝國》(第一卷)(The Chinese Empire)(1855: 248)，收錄於收錄於羅伯茨(J.A.G Roberts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06: 70)。

意象則令人心驚，心驚的不只在奄奄似鬼魅，狀若活死人，更在於招致敗家、喪國、亡種之大害。鴉片鬼充斥讓中國從個別身體到國家機體長期處於病態、不正常狀態，既有病夫之軀，更有病國之憂，也開啓一個亡國滅種的憂患時代，如何強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爲一個時代的問題意識和國家發展目標。

## 二、病態鴉片鬼：恥感身體的視覺建構

無疑，西方人進到中國視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上述辮子、小腳外，恐怕就是千百萬中國人在黑霧迷濛中，橫塌吹煙的異景。辮子、小腳或許還有些異國奇趣情調，鴉片吸食者僵灰、羸弱身形則散發另一種鬼魅般幽黯氣息，就像馬克土溫、狄更斯、毛姆筆下陰森、詭異的鴉片吸食者。1865年美國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看到這種形象，說出這些嗜吸者爲什麼會被稱爲「鴉片鬼」，「他們的容貌也發生變化，臉色灰白無生氣，像個死人。雙肩聳起，耷拉著腦袋，目光呆滯無神。大多數鴉片吸食者身體消瘦，一則是由於鴉片對人體的直接損害；二則是他們失去食慾，飲食攝入量下降而且進食無規律。由於這樣的一副尊容，他們被人形象地稱作鴉片鬼」。<sup>53</sup>兩眼無神，面灰氣衰，宛若死人，正是嗜吸鴉片者的生理現象。乾嘉時人俞蛟，也對吸食者的生理狀態做過描述，「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sup>54</sup>當時中國還未被稱爲「東亞病夫」，而病夫意象，此時顯已浮現，到了清末這詞更成爲鴉片帝國的通稱。我們可推知鴉片吸食在此時氾濫普及，已構成嚴重問題。它對身體危害的病理知識，可能還無從確知，然而鴉片身體病奄若鬼的視覺意象，已構成一般人對它深具危害性的認知，也就是鴉片的影響和傷害，肉眼就可看出。我們再看一首〈罌粟瘴〉的勸誡詩，「久之顰黑聳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sup>55</sup>吸到面目焦黑，眼淚鼻涕齊出，一付去死不遠的模樣，鴉片殘身的意象至爲明顯，道光年間的一首詩，「涕泗立橫流，形容頓枯槁，厭厭陳死人，僵立但未倒」，<sup>56</sup>更直指鴉片久吸，活像一個死人，只是站著還沒倒下。

上述描繪都指向鴉片銷蝕身體，神形萎頓，狀若鬼魅。無法考究「鴉片鬼」一詞的最早來源，然而嘉慶期間舉人吳蘭雪，就曾在其〈詠吹煙〉詩中提到鴉片鬼，「其毒中人浹肌髓，雙枕對眠一燈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聳山鼻流水，

---

<sup>53</sup>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與生活》(2009: 414)

<sup>54</sup> 俞蛟，《夢厂雜著》，見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6)。

<sup>55</sup> 黃霽青，〈罌粟瘴〉，見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307)。

<sup>56</sup> 黃鉞，〈鴉片古風〉，見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5)。

見者咸呼鴉片鬼……呼吸苟延日餘幾，嗚呼生已無人理」。<sup>57</sup>鴉片鬼還未入鬼門，卻困在生死之間，人鬼之間，成爲活著也沒人理的活死人。道光二十二年，周樂〈鴉片煙說〉也說到，「況乎顏色日枯，肌膚日削，形容漸至尪癯，人見之呼爲煙鬼，世未有正人而嗜此煙者，人即不願爲正人，奈何不願爲生人，而急於登鬼錄也」。<sup>58</sup>爲什麼鴉片吸食成鬼？爲什麼不想活著當人，而急著就死做鬼？這是中國自己的疑問，也是他人的不解。祁寯藻，〈新樂府三章〉，約略說明一、二，「不知何物阿芙蓉，闌入包匭充藥材。蜃樓雲煙從此起，世上紛紛鴉片鬼。鴉片鬼，爾何愚！爾之金盡骨髓枯，旁人笑罵爾歡娛。豈不聞黑鬼白鬼販煙亞細亞，彼國食者殺無赦」。<sup>59</sup>這首詩交待了鴉片鬼的由來，鴉片早期以藥材名義輸入並課稅，沒有人知道它爲何物，吸食會產生什麼後果，在此掩護和未設防情況下造就不少散盡家財，形銷骨立的鴉片鬼。更見陰謀的是西方輸入的鴉片，在其本國禁止使用，卻銷到中國，可見西方帝國毒化中國意圖。這也反映了當時一些人對西方輸入鴉片目的的看法。不只在互市貿易，更在侵略中國野心。鴉片氾濫，形成人吃鴉片，鴉片吃人，造就一群氣血衰竭，病入膏肓的新鬼舊鬼，「人吃鴉片，鴉片吃人。銷膏血，耗精神，鴉片之癮入骨髓，未死先成鬼。新鬼癮小故鬼大，新鬼面焦黑，故鬼無人色」。<sup>60</sup>

此外，葛元煦於 1876（光緒二年）成書的《滬游雜記》中，不只描繪煙鬼形象如僵屍，更述說煙鬼日夜顛倒的不正常生活，就像僵屍在黑夜生活，「橫床八尺隱囊支，煙鬼橫臥如僵屍。……五更燈盡東方白，煙鬼面皮無血色。床頭斜抱煙筒眠，日高欲起起不得」。<sup>61</sup>1909 年《申報》的一篇文章，「食煙者，則稱之曰鬼，非真鬼也，瘠弱而類於鬼也，傷身而近於鬼也。煙之爲害遍及五臟，國民之弱胥由於此，是故煙禁而國民之體強也」。<sup>62</sup>當時有人作詩勸戒鴉片，其中提到，「迷煙不異死屍」、「精枯血盡，生前預現死形」、「無病而身不離床，未死而名先稱鬼」。<sup>63</sup>林紓的鴉片鬼就像是骷髏，人還活著未死盡，宛如骷髏尚存一絲氣，「生骷髏，生骷髏，眶陷頤縮如獼猴，痰聲來，嗽聲續，黔到指頭疲到足，汗漬眉心泪注目，逆氣輾轉心腹，溺泄便溇沾被褥，明明有鬼如鉗梏……」。

---

<sup>57</sup> 吳蘭雪，〈詠吹煙〉，見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9）。

<sup>58</sup> 周樂，〈鴉片煙說〉，《二南文集》，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485）。

<sup>59</sup> 祁寯藻，〈新樂府三章〉，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82: 224~225）。

<sup>60</sup> 見《泉州文史》，5 期，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鑑》（1997: 88）。

<sup>61</sup> 葛元煦/黃式權/池志徵，《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989: 48）。

<sup>62</sup> 1909 年 2 月 1 日，〈清談萬國禁煙大會〉，《申報》，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470）。

<sup>63</sup>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1997: 356）。

64 1934 年行政院代表褚民誼在六三禁煙節致詞，直指煙鬼是形骸枯槁的無恥醜類，「吸嗜之後，形骸於焉枯槁，道德繼之淪亡，世間最卑弱最無恥之醜類，誠莫煙鬼若也」。65 鴉片鬼的特徵正是形骸枯槁，瘠弱傷身，生前現死形，無異死屍。根據史景遷統計，1890 年前後全國約有 1500 萬人吸食鴉片，佔人口十分之一，66 在幾乎全國皆煙民/廢民下，導致國家兵弱民疲，無力禦侮抗敵，長期處於病態、不健康狀態，成爲卑弱鬼類，蒙受恥辱，坐實病夫病國之譏。要改善弱國弱民狀態，唯有禁煙，煙禁而國民之體強，也才能走出恥辱。

上述這些對鴉片鬼相當視覺化的敘述，不管是西方或中國的眼光，都不免帶著歌德式小說中慣有臘黃、黑暗、陰森、迷濛、僵滯、黯寂等色調。而畫片或照片中的鴉片身體不管是富人窮人，男人女人，獨抽、傳筒對吹或多人群吸，不外斜躺煙榻，僵臥吸食。這些更強化鴉片吸食者宛如活屍的意象，1921 年美國一位作家對鴉片煙館以及煙鬼的描寫，「靠牆有一排排的鋪位，每個鋪位上都有一具宛如死屍的全裸身影，而且全都處於毒品之神不同程度的影響下。有些人抽著長長的煙槍，有些人只是躺著……有些人看起來像是死人……鴉片館的地板上凌亂的棄置著難以形容的穢物，化糞池的惡臭與毀滅心靈的鴉片迷煙相互混合」。67 一具具像死人般的煙鬼，陳列在穢物夾雜排洩物氣味與煙味混合的空間，大概是鴉片煙館這類描素的極致。此外，1928 年美國一位虔誠、狂熱的禁酒黨人霍布森，在全國性的廣播宣傳中，就將此類吸毒者稱爲「邪惡的僵屍和活死人」。68 而「男女僵臥吸食」一語，則言簡意賅，意象鮮明的點出這一情景，這句話是郭嵩燾出使倫敦看到上議員阿什伯里拍下中國鴉片煙鬼的照片後所下的感言。他說，「其議政院阿什伯里遍游各國，所至風土人情，照相記之。而於中國，爲男女僵臥吸食鴉片煙，以取笑樂。臣甚愧之」。69 郭嵩燾經歷正好說明鴉片鬼意象透過現代性視覺技術，流傳世界，既成爲世界看待中國的認知框架，也成爲各國譏笑對象，同時回過頭來衝擊中國，烙印爲中國的恥辱。

郭嵩燾透過洋人看中國的眼光，看到自身的不堪和愚昧，這令他恥辱臨身，羞愧難當。鴉片鬼的身體當下被建構成令人感到羞恥的身體，也成爲國際視框下的中國恥辱。這促使他向朝廷奏報此事，建議嚴禁鴉片，「疾首蹙額，相爲禁戒，

---

64 林紓，〈閔中新樂府〉，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2000：369~370）。

65 〈民國二十三年六三禁煙紀念情形〉，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164），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188）。

66 Jonathan Spence,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 Carolyn Grant(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5: 154).

67 希爾達·格林-渥德(Hilda Glynn-Ward)，《牆上文字》(The Writing on the Wall)(1921)，轉引自霍奇森(Barbara Hodgson)，《鴉片：黑色迷霧中的極樂天堂》(Opium: A Portrait of the Heavenly Demon)(2005: 131)。

68 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30)。

69 郭嵩燾，〈郭嵩燾請禁鴉片煙第一疏〉，《郭嵩燾奏稿》（1983：368）。

以示無忘國恥」，<sup>70</sup>同時自身也投入禁煙宣導工作。<sup>71</sup>而郭嵩燾對照片中鴉片吸食者的描述，僵臥猶如死屍模樣，一位旅華洋人也提出類似的形容，「在睡夢中的鴉片煙客彷彿死屍，形容枯槁似鬼魂」。<sup>72</sup>所有照片中詭譎表現的正是這種一具具僵臥煙榻的死屍或活屍，眼神表情有滿足、有迷惘、有空洞、有失落、還有木然而不知所云，現代性視覺科技如實傳真的建構了令人驚懼又羞愧的活屍軀體。這也彷彿讓我們看到了曾在十九世紀八〇年代西方流行的死屍拍攝的習俗，剛開始的功能只在保存肖像，最後作用則是將死屍表現為沉睡中的身體。羅蘭·巴特指出這種屍體照片是讓屍體看起來像是活的，作為屍體它是死物的活的圖像，屍體在遭遇相機的那一刻看上去像是活的。<sup>73</sup>巧的是在差不多時間點的中國，活著的鴉片身體在遭遇相機的那一刻看上去卻像是死的，沉醉出神的身體在視覺捕捉時成為死亡，也成為中國的永恆，既烙印在歷史，也烙印在全球印象中。這是相對於死屍照片的活屍照，已不是一種習俗、流行或追念而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烙印和表徵。活屍彷彿成為鴉片帝國的主體。想像中國千百萬個橫陳的活屍構成一個黑霧迷濛，靜默黯寂的龐大帝國—活屍帝國，豈不鬼魅到詭譎。

鴉片帝國構成一個視覺奇觀，彷彿鬼魅的鴉片身體無疑是西方目光的焦點，識別中國的經典意象。這意象背後，除了有西方人奇異、不解、訕笑、異國情調等目光外，更對鴉片鬼有一份恐懼和厭惡。馬丁·布思(Martin Booth)指出鴉片在美國受排斥的情形，「鴉片被認為是一種罪惡的東西，它帶給人們是違禁的、危險的，然而又是傳奇式的、毛骨悚然的感覺。同時鴉片也被視為異己的，它與美國式的生活方式不符，是一種骯髒的東方習慣」。<sup>74</sup>這種視鴉片為恐懼、危險、異己、骯髒的態度，也直接反映在華人身上，形成一種透過鴉片，連結邪惡看待華人的種族歧視，亦即，鴉片讓視覺歧視和種族歧視重疊，邪惡鴉片等於危險華人，其必對世界造成禍害。他們擔心散佈世界各地的華工會將吸食鴉片惡習帶進自己國家，敗壞社會秩序、危害自己種族。十九世紀中期，由於中國長期處於戰亂、饑荒、社會不寧、民生貧困狀態，國際市場又對勞動力有所需求，這使得中國開始大量向世界移民，從東南亞、澳洲到美國、加拿大，都可看到華工影子。而有華工的地方就有煙館，就帶來鴉片吸食風氣。華工脫離原有家庭和社會聯結，棲居陌生國度，為解思鄉、苦悶、單調之情，也為提振工作精神和體力，鴉片成為他們日常生活必備休閒品，同時也是對抗當地各種疾病的隨身藥品。<sup>75</sup>

---

<sup>70</sup> 郭嵩燾，〈郭嵩燾請禁鴉片煙第一疏〉，《郭嵩燾奏稿》(1983: 368)。

<sup>71</sup> 郭嵩燾大部份的禁煙言論見《郭嵩燾奏稿》(1983)、《郭嵩燾日記》(1982)。

<sup>72</sup> 見霍奇森(Barbara Hodgson)，《鴉片：黑色迷霧中的極樂天堂》(Opium: A Portrait of the Heavenly Demon)(2005: 31)。

<sup>73</sup> 米歇爾·亨寧，〈做為客體的主體：攝影與人體〉，收錄於吳瓊、杜予編，《上帝的眼睛：攝影的哲學》(2005: 128)。

<sup>74</sup> 見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23)。

<sup>75</sup> 見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198~200)。

對西方人而言，鴉片則被視為邪惡的物質，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吸食鴉片人口普及，土產鴉片遍植，在印度鴉片禁售後，反而成為世界其它國家的主要輸出國，中國也成為世界眼光中的禍害，華人聚集地區的煙館成為危險、罪惡之所在。1864年英國《每日新聞》(Daily News)，如此描述倫敦一家煙館，「一個可怕的地方……我們推開半開的前門，立即發現置身自己置身於一個狹小、昏暗、破舊的房間中……三個中國人圍著一個小托盤懶散的躺著……躺在床尾的那個年老中國人似乎處於半睡狀態，儘管他在狠狠的吸著。從他死灰色的臉、深陷的雙頰、空洞的眼睛、茫然張開的嘴以及污濁腐朽、看上去像鬆動的響板的牙齒中，我們可以看到吸食鴉片的報應」。<sup>76</sup>空間昏暗、破舊，氣味刺鼻、噁心，人歪倒斜躺、兩眼無神、死氣沉沉，成為西方對中國鴉片煙館和鴉片鬼的刻板描述。而煙館在中國社區中，不僅僅是吸煙所在，還捲入罪惡勾當。煙館不只提供鴉片吸食的場所，同時還提供賭博、賣淫、放高利貸和兜售中式食品之用。簡言之，它成為腐朽社區的中心。<sup>77</sup>因此，英國一位傳教士Piercy擔心中國反將鴉片帶回英國，乃提醒大家，「鴉片就像瘟疫，在我們的社會中蔓延，侵害我們的生命……中國人正將邪惡帶入我們的社會」。<sup>78</sup>《癮君子自白》的作者德·昆西則輕蔑的表示，「寧願住在瘋人院，或者跟野獸待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國人中強」。<sup>79</sup>這時的中國被視為帶來「骯髒的東方習慣」，就像瘟疫一樣成為人人自危的禍害。這時的中國彷彿成為國際的恥辱，鴉片中國成為國際恥辱的視覺標記。

而中國反過來成為散播鴉片瘟疫的禍首，這是西方的報應嗎？西方以鴉片毒化中國，如今卻擔心受其害，英國傳教士Piercy在1883年痛心疾首的警告他的同胞，「英國向中國販運鴉片，如今中國人又將鴉片帶來英國，這對英國來說是自食惡果」。<sup>80</sup>這種惡果，帶來西方對黃種人可能危害白種人的恐懼，促使一些國家如美國開始制定種族歧視法案，也帶動排華浪潮。<sup>81</sup>美國一位牧師在1874年演講中提到，「他們（中國人）到來時都已虛弱不堪，鴉片使他們渾身無力……如果他們是鴉片吸食者，我們無法歡迎他們」。<sup>82</sup>西方人不只擔心中國帶來鴉片惡習，更擔心她們婦女受到迷惑，造成社會污染。1888年澳大利亞作家，愛德華·迪生的《辛范特夫婦》，其中一段提到歐洲少女受誘惑進入可怕煙館，下場悽

---

<sup>76</sup> 轉引自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39)。

<sup>77</sup> 轉引自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19)

<sup>78</sup> George Piercy, "Opium Smoking in London", Friend of China 6(1883: 239~240)，轉引自周寧，《鴉片帝國》(2004: 207)。

<sup>79</sup> 轉引自楊紅林，《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2011: 202)。

<sup>80</sup> George Piercy, "Opium Smoking in London", Friend of China 6(1883: 239~240)，轉引自周寧，《鴉片帝國》(2004: 207)。

<sup>81</sup> 參見Diana L Ahmad, The Opium Debate and China Exclusion Law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est(2007).

<sup>82</sup> 轉引自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19~220)。

慘，「通過嗆人邪惡的氣味，好奇的歐洲人在范辛特先生的房間裡看到鴉片的煙霧和虛弱不堪的中國人……最遭糕的是，歐洲少女……大約 16 歲左右……被誘惑，而落入圈套。她們留了下來，分布在這可怕的巢穴裡，最終帶著一身污穢和巷子裡的腐爛氣息被逐出門外」。<sup>83</sup>邪惡氣味、不堪的中國人、受誘少女最後的污穢腐敗，彰顯出對鴉片的厭惡、恐懼，以及對華人的種族歧視，最後形成強烈的排華浪潮。附著在鴉片底下的各種罪惡傳說不斷出現，如「有傳聞說，有受人尊敬的婦女光顧煙館，她們被鴉片激起了性慾，與可怕的中國人發生性關係」，馬丁·布思指出這是，把種族、毒品、性聯繫在一起。

儘管鴉片不像嗎啡注射那麼盛行，但公眾卻以恐懼心理看待它。這不是對吸毒的恐慌，而是出自於種族仇視：中國人是黃禍，應該躲避。<sup>84</sup>確實，對許多人來說，煙館是墮落的標誌，它與中國人或其它有色人種有關，是一種社會污染。在這樣氛圍下，新聞報導和電影、小說構成一種華人吸食鴉片的敘事典型，恐懼化、污名化、罪惡化鴉片吸食；邪惡的鴉片中國正誘惑、污染、侵蝕西方。例如鴉片散發迷人的誘惑，腐蝕著那些迷戀它的年輕人，造成社會的恐慌；記者寫出有關煙館悚人聽聞的文章：白人少女被奴役，或者中國犯罪份子陰謀致力於傳播惡習以腐蝕英國等。鴉片的危險、性和犯罪很快成為低級小說作家慣用手法。<sup>85</sup>也成為典型西方看待中國、述說中國的方式，既是視覺的觀看框架，也是文字的敘事模型。而這一切無非將中國顯影、定格為愚弱、邪惡、恐怖的中國。中國鴉片鬼在西方視覺化建構下，不是以類似吸血鬼，就是野獸動物這般非人的形象出現，另一個則是病菌的形象，就像瘟疫般快速蔓延，散佈感染文明歐洲。這般可恥、可懼、非人、病菌般的中國正是西方文明拯救、啓迪、教化、治療的對象，也合理化殖民帝國的強權侵略政策。

從以上分析，鴉片鬼的意象進入國際舞臺，成為世人觀看對象和關注事件。這種身體形象，透過現代視覺技術傳播，不在一般正常視覺秩序容許範圍，正常人不太可能接受活死人或活屍般的模樣，或瘟神般的病體，因此對此產生視覺恐懼和排斥，進而將鴉片視為製造怪物的邪惡之物，這是一般所不能接受的鴉片之害。被鴉片吞噬宛如活屍的身體，乃成為恐懼、厭惡、排斥的對象。它既是對視覺秩序，對身體秩序，也是對社會秩序的危害。西方人對鴉片煙鬼的邪惡化和禍害化無非在維持正常秩序，維護視界的良好、身體的健康、種族的純粹，避免被鴉片/華人/異己/邪惡的污染和破壞。而鴉片讓一切秩序失常，進入不正常狀態，視覺的不協調、身體的不健康、國家機能的失靈，這也正是鴉片中國的狀態，中國成為它人眼中不正常國家，「東亞病夫」的稱謂正是這現象的說明，鴉片鬼則

---

<sup>83</sup> 轉引自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01~202)。

<sup>84</sup> 轉引自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21)。

<sup>85</sup> 見馬丁·布思(Martin Booth)，《鴉片史》(Opium: A History)(1999: 243)。

是根源所在。就像掃除辮子和小腳惡習一樣，我們得以看到新的身體型態和視覺意象，去除鴉片鬼的意象，就是進行一場視覺革命和身體革命，也是恥感的洗淨。不僅是自己觀看，也是全球觀看，一場中國意象的改革。

因此，中國去鴉片化的救亡運動，除了透過消費政治做為管治鴉片的手段，視覺政治的管治也是重點所在。在視覺中心主宰下，中國試圖以剪辮、放足、禁煙的新身體形象進入全球體系，以替代既有舊帝國的刻板印象。這意味著中國努力走出病奄的活死人國度，建造健康、正常的新國家。清末民初一系列身體改造運動和衛生健康的強化，正出於強國保種的國族救亡大計。而在強國保種的諸多改革作為中，視覺革命總是被忽略的，我們看到身體革命，支配身體形態走向的視覺品味和審判，卻是隱而不談，雖然我們不時觸及視覺品味背後國族救亡大義的社會認知標準或共識，然而視覺的微觀政治作用，常被略過。例如，為了維護視覺秩序（歪斜、不正、不雅、醜陋的排除），不得不進行視覺裁判（辮子、小腳、鴉片身體的污名化、罪責化），以捍衛背後的社會秩序、道德準繩或國族大計（洗雪恥辱、提昇民族形象、健身強國）；或者透過視覺意象的自我觀照，形成視覺的啓蒙，透過他人的觀看中國、再現中國，進而觀看自己、撼醒自己，進入中國覺醒階段。

視覺啓蒙過程伴隨西方視覺現代性技術的崛起，讓中國置於全球的多重觀看下，透過不同視框的矛盾和緊張關係，看到不一樣自己，從而促成視覺的現代轉型，以現代性的眼光看待和要求事物的改革和型變，這種視覺意象的現代性，包括身體、都市、空間、器物等意象的現代轉型，如「……除了故宮之外的整個市容在變，街頭行人和店舖門面的樣子在變，人們說話的詞彙和語調也在變。變什麼？逐漸在變美，變向『現代化』」。86現代性成為這時期審美的標準，崇洋、洋化成為新的生活方式和時尚追求，婦女也透過廣告、月份牌、電影畫報，以西方女星為美感的範型，過去柔弱纖細的美感標準，已被健康活潑所取代，身體進入現代轉型階段。87而西方器物也以新鮮、驚奇的面目出現在中國人眼前，加速中國的現代性想像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88

事實上，處於工業革命時期的觀看者，基本上是置身於現代性的視覺環境中，新事物、新器物的出現不斷衝擊、挑戰人們的視野和想像。視覺本身也正歷

---

86 見徐城北，《梅蘭芳與二十世紀》(1990: 30)，轉引自劉豐祥，《身體的現代轉型：以近代中國城市休閒為中心(1840~1937)》(2009: 83)。

87 相關討論可參考劉豐祥，《身體的現代轉型：以近代中國城市休閒為中心(1840~1937)》(2009)。

88 見盧漢超(Hanchao Lu)，《覓紅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2004)；呂文翠，〈玻璃、燈與視覺現代性：情色敘事、傳統之「海派」變異〉，收錄於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94~1908》(2009: 511~560)。



經現代性過程，誠如柯拉瑞(Jonathan Crary)所說，「十九世紀發生在觀察者身上的正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他或她得以進入新事件、新動力和新體制的星聚之中，而所有這些新的事件、動力與體制，大致上，或許有點套套邏輯地說，可以定義為『現代性』」。<sup>89</sup>中國也正經歷著一段從蒙昧無知、麻木無感到恥辱加身、羞慚內疚以至自我意識全面覺醒的啓蒙過程，這也是一段置身於全球現代性觀看中，且視覺逐漸現代轉型的歷程。魯迅著名的幻燈片事件，以及中國參與萬國博覽會進入全球視覺空間，成爲很好的說明。

---

<sup>89</sup> 柯拉瑞(Jonathan Crary)，《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07: 10)。

## 第二節 視覺現代性下的恥感與啓蒙

### 一、看、被看、自我觀看：恥感與啓蒙的誕生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述說自己 1906 年在日本仙台習醫時，如何因為看到一部紀錄中國人遭日軍逮捕斬首示眾而周遭卻出現一群圍觀這場盛舉的麻木、冷漠群眾的幻燈片，因而決定棄醫從文，試圖以文學創作改造愚弱不堪的中國國民性。魯迅這場觀看經驗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事件，一個關於中國現代舉足輕重作家誕生，文學思想啓蒙根源的故事。儘管後世對這一事件的真偽及細節有所爭議，<sup>90</sup>但並不影響它做為一個關於中國現代這一意含開悟除魅的啓蒙故事或神話。然而，周蕾卻犀利的指出這一幻燈片事件，這個啓蒙敘述和根源誕生故事的背後根本是來自一場視覺性的遭遇，一種技術化視覺性(technologized visibility)話語的展示，透過現代電影媒體技術再現出的斬首示眾奇觀，造成觀看者震撼、驚奇和震盪，帶來一種視覺的現代性經驗，也就是魯迅透過電影經驗解釋他的創作生涯的開啓，而這故事則將觀看活動置入現代性事件和強化國家的第三世界文化中，也揭示了自我意識在後殖民第三世界如何生產的方式。<sup>91</sup>

魯迅正是透過觀看電影才發現在現代世界中作為一個「中國人」究竟意味什麼。中國人身份、國民性反思的自我意識以及日後的文學改造精神事業皆萌生於這場影像奇觀的震撼遭遇中。照周蕾分析魯迅的啓蒙故事，一種以寫作作為啓蒙工具的文學事業，全然是一種跟技術有關的視覺性啓迪，如果沒有電影，如果魯迅不是一個影片的觀看者，即便在現場看到殺人砍頭的景像會產生類似觀影帶來的強烈驚奇震撼感，進而萌生改造國民性而非醫治身體的覺醒意識嗎？周蕾認為

---

<sup>90</sup> 爭議在於，是否真的有這部幻燈片，還是魯迅虛構（如李歐梵指出(1995: 19)，找不到這張幻燈片，可能是虛構故事。劉禾則指出(2002: 90)，1983 年日本學者太田進發表了一張他找到的 1905 年照片，上面寫著「處決俄國間諜」。這張照片的時間和內容與魯迅所說情節很相近也很相似，但兩者是否有關亦未能論斷）；看到的是電影還是幻燈片；至於幻燈片有可能不是現場拍攝，而是時事的繪畫加工而成。相關討論見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1995: 15~19)；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收錄於《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2011: 25~32)；張歷君，〈時間的政治：論魯迅雜文中的「技術化觀視」及其「教導姿態」〉，收錄於羅崗、顧錚編，《視覺文化讀本》(2003: 279~311)；張慧瑜，〈「被看」的「看」與三種主體位置：魯迅「幻燈片事件」的後(半)殖民解讀〉，《文化研究》，第七期(2008: 105~148)；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2001: 80~83)；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2002: 88~92)。

<sup>91</sup> 周蕾，《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2001: 22~26)。

正是電影這種視覺性媒介擴張放大了震撼驚奇的效果。<sup>92</sup>透過這樣的說法中國現代啓蒙和自我意識與現代性的視覺技術串接起來，視覺性隱然佔據優勢位置，書寫文字在此反而不再是啓蒙論述的主導，甚而可能受到技術性視覺媒體的衝擊而遭取代。

魯迅的幻燈片事件，陷入一個多重觀看，多重視框矛盾、衝突的緊張關係中。幻燈片裡中國人冷漠的觀看日軍砍殺中國人，幻燈片外日本人跟魯迅看著這張幻燈片，魯迅既看，也觀看日人怎麼看幻燈片，甚至意識到日人怎麼看他在看幻燈片，魯迅和日人以幻燈片為焦點，構作出複雜的觀看者和被看者關係以及心理意識。魯迅看到幻燈片裡的中國人愚昧無知、麻木無感而覺得羞恥難堪，因為，「在魯迅看來，未能把異族斬首的屈辱當做自身屈辱的人們，實在是處於一種恥辱狀態之中，身為同胞的魯迅為此感到深深得恥辱」。<sup>93</sup>這種同為愚昧中國人的羞恥意識，讓他有所自覺和啓悟，然而這段羞恥以至覺醒過程，卻是以日人的觀看角度做為看待自己的視框，才得萌生羞恥/覺醒的自我意識。亦即，中國人愚昧醜陋是因為身旁日人的觀看而讓他有所自覺，魯迅也意識到日人看他的眼光，可能帶著嘲笑之意，雖然魯迅沒有交待這段心理過程，只說周遭日人看影片的拍手叫好聲，令他覺得刺耳。但在乎他人眼光，覺得刺耳，正是羞恥之所由來，因為被看的已不只是愚昧的中國，而像是自己也跟著出乖露醜，正被觀看、審度著。也正是出乖露醜的恥辱感，構成這起事件之所以成為一起有意義事件的核心。竹內好即指出，「這一事件給予魯迅的……屬於同樣性質的『屈辱感』，屈辱，首先是他自身的屈辱。與其說憐憫同胞，毋寧說憐憫應該憐憫同胞的他自身」。

竹內好把這種屈辱感，「做為魯迅之所以成為文學家的『回心』的重要之軸」。<sup>94</sup>確實，屈辱是魯迅從當醫生回心轉做文學家的轉折。影片裡被砍頭和觀看的中國身體，以及魯迅既看又被看的中國身體，在看與被看的視覺建構下落入前文所說的恥感身體的範疇，也讓魯迅產生強烈的恥感意識，更讓他體悟洗刷身體恥感，在於療治身體，身體療治，唯有透過思想改造、國家改造才能達成。亦即，中國病態的身體，只有先從國家的病根下手診治。正是這種視覺造成的恥感意識和覺醒，讓魯迅成為現代文學啓蒙宗師，以及意圖拯救愚昧中國國民性的思想醫生。丸尾常喜則一語中的點出「恥」對魯迅思想開展的重要性，「魯迅的文學生涯是把『恥』的意識作為一個重要契機而啓程的……作為『自我批評』的文學，就會以『恥』的意識作為出發的一個契機，同時總是通過其『恢復』的過程，或者說在『恢復』之後，呈現其整體姿態」。<sup>95</sup>魯迅作品中對中國人病弱、醜陋身

---

<sup>92</sup> 周蕾，《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2001: 24)。

<sup>93</sup> 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2009: 10)。

<sup>94</sup> 見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2009: 9)。

<sup>95</sup> 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2009: 7)。

體的詆譏、譏刺，構成自我貶損、自我屈辱的病態書寫風格，一種刻意呈現病重中國的負面書寫，<sup>96</sup>正是自我批評的策略。而從恥辱到恢復，無非就是透過改造國家，才能改造身體、改造國民性，也才能雪洗恥辱，回復到國家正常狀態，成為健康的常人。

再者，魯迅歷經觀看者與被看者角色重疊的矛盾，產生心理張力，可能讓他意識到現場的我，一個中國人，究竟在全球脈絡中是什麼位置，是什麼樣的國民性造就出這樣的國家和人民？如果沒有日人在旁看幻燈片，魯迅對這影像會有那麼強烈反應嗎？會覺得刺耳、羞恥？會有棄醫從文，醫心不醫身的覺悟嗎？或者，回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魯迅對日人的眼光怎麼敏感，立即形成自慚形穢，自卑羞恥的意識？恥感形成，不正是中國自身愚昧、貧弱，敗壞已極的處境早已內化為一套中國人的自我認知視框，並自我養成對羞恥的敏感度。如果中國夠強盛，外人怎麼觀看、譏笑砍頭事件，恐怕也很難激起羞恥意識。中國自身的愚弱狀態正是羞恥敏感度的根源，也自我規訓成一套恥感的視覺認知。這套恥感視覺認知在外人眼光、自我眼光的交錯作用下，不斷對可能的致羞物事保持高度警覺和敏感度。而這也是清末以降知識份子普遍的心理情境，或內化為自我結構。如同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bert Elias)所指出的社會生活影響行為情感，社會結構也造就相應的心理機制，中國蒙昧愚弱的社會處境正足以形成恥感的心理機制，這種自我結構與社會結構存在一致的衡定性。<sup>97</sup>

因此，魯迅和日人彼此眼光交流的緊張關係，其背後的視界則是中國的國際處境，外人觀看中國的認知圖像，以及自我恥感視覺認知的彼此作用。如同前文討論，在東西交流的視覺遭遇過程中，這些視線的交互作用必然衍生對內或對外矛盾衝突的緊張關係。在這裡，幻燈片像是一個隱喻，中國不管是在幻燈片內外，都涉及到多重觀看關係，<sup>98</sup>遭遇各種異樣觀看和異己眼光，既不斷被看，不斷看對方，也不斷看對方如何看自己，進而形成自我觀看、自我反思，同時也透過他人眼光中的中國，理解自身的處境。幻燈片事件似乎說明，透過現代性視覺技術，中國正快速處於全球的觀看中，不斷被觀看、也不斷被視覺定義。相對的，中國也在觀看，看到金髮藍眼的番鬼、看到驚奇駭人的船艦槍砲以及新鮮有趣的現代性物事，看到完全不同以往的熟悉影像。這時的中國已是充滿各式符號、意象流

---

<sup>96</sup> 魯迅作品經常表現病態中國的意象，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愚昧，就是有心理有病，身體殘缺，愚人、狂人、吃人諸多病徵隨處可見。從身體之病到國民性之病，再到國家機體之病，成為魯迅作品喻意。要醫治身體之病，先要醫治國家之病，身體改革是政治改革一環。相關討論見葛紅兵、郭玉紅，〈病重的中國：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的身體隱喻〉，《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4卷，2期(2007: 11~16)。

<sup>97</sup> 埃利亞斯(Nobert Elias)，《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1998: 295, 313)。

<sup>98</sup> 詳細的討論見張慧瑜，〈「被看」的「看」與三種主體位置：魯迅「幻燈片事件」的後（半）殖民解讀〉，《文化研究》，第七期(2008: 105~148)。

動的視覺化中國。類似幻燈片事件在其它地方一定不缺，也因置於被看的位置，才有機會看到別人如何觀看自己，透過這層視框，進而促使自身有所覺醒。在這裡，自我意識的覺醒來自恥辱，恥辱則來自不同位置和視框形成的多重觀看張力。而恥感意識和自我覺醒則構成啓蒙和改革的內在動力。這種功效或許可視為是一種救亡的心理機制作用，它促動了近代中國的啓蒙和改革進程。亦正如同埃利亞斯論述羞恥跟西方文明關係一樣，羞恥意識促成個人行為的自我約束和自我克制，也帶動了西方文明的進程。<sup>99</sup>羞恥意識對中國救亡的推動，就像對西方文明的型塑一樣，具起動的關鍵性作用。

或許，有人認為魯迅的幻燈片事件可能是虛構故事，因為找不到這張畫片，目的只是為了替中國現代文學的啓蒙找到它的根源，建立一個可傳說的典範。事件不論真假，都不影響魯迅做為中國思想啓蒙導師的位置。比較有趣的是，如果真是虛構故事，那麼魯迅為什麼要用幻燈片事件做為啓蒙根源？顯然，觀看在當時構成問題意識，中國與西方在互相觀看過程中，浮現不少問題，有震驚、有不悅、有歧視、有嘲弄、有詆毀，雙方透過觀看建立偏差認知。最直接的視覺感知就是相互醜化、妖魔化，從身體型態、風俗文化、民族性格，成為訕笑、批評重點。東西方衝突和偏見，視覺做為溝通接觸的第一步，其印象如何成為關鍵問題，它容易影響外人對這個國家的看法，同時也可能反饋為對自身的看法，形成自我意象。也就是他人的印象成為自我意象形成的依據和判準。也因此，當中國的國際處境不斷惡化，強權入侵，敗戰連連，國家尊嚴蕩然，西方人眼中可笑的中國意象，就成為中國人不得不在意，猶如芒刺在背的恥辱意象。辮子、小腳、鴉片鬼是國恥的印記，至於中國刑罰中殘忍、野蠻的砍頭、凌遲等酷刑也成為外人經常拍攝、獵奇的中國意象。<sup>100</sup>在 1898 年一份不纏足勸諭裡，黃遵憲提到當纏足成為被觀看、展示的客體時，這種視覺化過程必然遭來野蠻之譏的恥辱，對這種恥辱卻又無辭以對，「惟華人纏足萬國同譏，星軺貴人，聚觀而笑之；畫圖新報，描摹以形容，博物之院，陳列弓鞋；說法之場，指為蠻俗；欲辯不能，深以為辱」。

101

顯然，黃遵憲遭遇魯迅一樣的情境，透過觀看別人對自身的觀看，猶如遭到視覺裁判，而欲辯不能的無奈和挫敗，更深化恥感意識，因而有所自覺/勸戒纏足。這種深以為辱的恥感，最終換來覺醒和啓示，相對於幻燈片砍頭場面中麻木冷漠的觀看者，他們的無感只說明大家對這種殘忍、野蠻畫面已習以為常，它是中國日常生活景觀之一，就像其它構成恥辱的可笑、醜陋、愚昧的諸多景觀一樣，如無他人譏笑蔑視眼光的照射，仍自溺其中而不自覺。就此而言，觀看或視覺化，

---

<sup>99</sup> 見埃利亞斯(Nobert Elias)，《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1998)的討論。

<sup>100</sup> 如楊紅林，《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2011)；陳玲、王迦南、蔡小麗編著，《明信片清末中國》(2005)所蒐的圖片。

<sup>101</sup> 黃遵憲，〈湖南署臬司黃勸諭幼女不纏足示〉，收錄於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上冊)(1995: 507)。

成爲啓蒙中國，喚醒中國的介面。最後，這也回答了下面問題：故事如果虛構，魯迅又爲什麼舉一個這麼視覺化例子說明？或許視覺意象最能彰顯大清帝國的頹圯、衰敗、無能。辮子、小腳、鴉片鬼、砍頭酷刑等日常習尚成爲頹圯帝國的視覺標記，這些帶著國恥的強烈視覺奇觀，最容易被識別和列舉評述，也是用來建構啓蒙改革論述最好的題材。但一方面也可能說明，清末中國經常處於被觀看凝視的位置，不斷遭視覺評判、議論，這種被觀看和評頭論足，隨時暴露自身不堪的窘境，甚至有時要回身辯駁，卻又無辭以對的無奈，是當時大部份中國人的切身感受，特別是憂心之士，可能深化爲複雜的心理意識。所以視覺、觀看構成一個困擾中國的問題意識。

魯迅的幻燈片事件，建立一個啓蒙現代性論述，透過觀看，觀看他人到觀看自己，開啓重構中國自我，現代性救亡計劃的可能。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看成爲處理啓蒙、拯救國民等一系列現代性方案的核心」。<sup>102</sup>他人的觀看以至自我觀看，帶動一場視覺革命，一場充滿惡習、陋俗視覺意象的改革，其具體包括身體型態、風俗習尚、生活實踐的變革，最後以新生活運動做爲改革高潮。新生活運動以救亡救國的民族復興爲目的，體現在食、衣、住、行日常生活行動規範上，透過外在形象的訓練達到內在德性的養成，「我們要轉移人心，就要注重外形的訓練，來陶冶他們的好品性」。<sup>103</sup>簡單說，這是一個講究清潔、衛生、規矩、禮儀的文明化運動，也是形象整飭運動，因爲文明體現在形象外觀上。是否收到成效，視覺判斷是感受最強，也最直接方式。在這裡，視覺成爲管治和馴化有效工具，1934年5月5日到5月11日，南昌舉辦爲期一週的新生活運動展覽會，目的在於灌輸民眾新生活須知，內容涵蓋：革命紀念、生產、教育、衛生、兒童、體育、藝術、科學、國貨、自衛等類別，這是日常生活規範的視覺化。會場陳列考究，講求視覺效率，物件安排有一定關係和原則，由個人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層次分明，關係明確，「凡一畫之作，必費盡籌思，物之安置必事先計劃，蓋欲使參觀者一望瞭然，知新生活實行之趨向也」。<sup>104</sup>

上述這些討論，構成一個視覺啓蒙、視覺救亡的觀看政體，透過改變形象，納入視覺秩序，也是文明秩序和社會秩序，進而完成救亡圖存，民族復興大業。觀看成爲一種權力操作，觀看需被馴化，建立常態化標準，什麼視覺意象符合社會常態或審美標準，什麼需被矯正禁止，都與當時的社會秩序、國族需要相應合，形成以視覺裁決爲主導的觀看政體，以進行各類意象—身體、都市、空間等意象的監控、管治、規訓、治理。如有礙國族尊嚴和進步，不符合社會、政治、經濟

---

<sup>102</sup> 張慧瑜，〈「被看」的「看」與三種主體位置：魯迅「幻燈片事件」的後（半）殖民解讀〉，《文化研究》，第七期(2008: 108)。

<sup>103</sup> 楊璿熙編，《楊永泰先生言論集》(1966: 10)，台北：文海出版社。

<sup>104</sup> 見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293~295)。

需要的長辮、小腳、鴉片身體的意象以及新生活運動中不符合健康、衛生、秩序、文明需要的日常生活實踐或空間安排，透過視覺裁決，都成為阻礙強國保種計劃的公敵，需被罪責、矯正、規訓、排除，轉化為常態意象。視覺主宰一切，展現它的支配性和遍在性，它既內化為社會秩序，也繼續常態秩序，同時也強化身體政治效能。

## 二、觀看政體下的身體

上述分析點出視覺性不只在西方，顯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隱然成為一個切入社會文化內裡的重要問題。其論述背後則指向西方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或觀看政體的脈絡，我們回過頭來探討這一觀看政體的理論脈絡。Jay指出，現代時期受到視覺感官所支配，從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開使，現代性已被正常的視為是一種視覺中心。<sup>105</sup>追蹤視覺的歷史痕跡，不難發現光線、視覺、觀看在西方哲學、思想、文化傳統中具有強而有力的主導優位性，Hannah Arent認為西方哲學裡思維(thinking)被認為是一種觀看(seeing)的活動，而視覺的優位性早已深植於希臘語言中，且紮根於我們的概念語言中，以致我們很少考慮到視覺，視覺似乎太過明顯到無須關注。<sup>106</sup>Hans Jonas也指出在感官階序中「視覺高貴性」(the nobility of sight)的優位特徵，Hans Blumenberg則以光做為真理的隱喻(light as a metaphor for truth)，Derrida則認為視覺中心主義將自身隱藏於在場形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歷史中，<sup>107</sup>試圖建立起在場形上學。這一以視覺知識論(ocular epistemology)為中心的傳統構成了「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的典範，跟主體、理性、真理、真實、啟蒙一樣成為西方思想的主導秩序和支配體系，而啟蒙(en-light-ment)也正建立在光線的隱喻上，意指著為蒙昧無知的人類開光除魅，點亮智慧，同時導入新的主體型構、認知形式和看待客體的方式，也重新結構了不同歷史、社會條件下的觀看者和被觀看者、自我和他者，可見和不可見之間的特殊位置和權力支配、社會控制關係，構造出以視覺標準為主的價值判準、觀看秩序，形成各種不同時期的觀看政體和相對應的感覺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體制。

這種夾帶真理、理性的視覺力量最常作用於身體上，身體在當代的一項重要遭遇即視覺的凝視和觀看，身體成為「視覺霸權」(hegemony of vision)或「觀看政體」穿透、支配的客體。身體在光源可見性的保證下，成為視覺監看、窺視、掃描、品鑑、分析解剖的對象。這方面傅科則做了精彩的發揮，在《規訓與懲罰》一開始就展示懲罰做為一種視覺奇觀，一種君主主權凝視下的身體奇觀

---

<sup>105</sup> Martin Jay, "Sc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 in Hal Foster (ed), *Vision and Visuality* (1988: 3).

<sup>106</sup> David Michael Levin (ed),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1993: 2).

<sup>107</sup> David Michael Levin (ed),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1993: 7).

(spectacle)，之後透過全景敞視的光線/空間的運用技術，讓犯罪的身體暴露於光線底下造成一種具有被觀看卻無法觀看的「不可見的可見性」(invisible visibility)，任何人只要站在這一觀看位置，都足以使凝視成為高度有效的身體監視工具。眼睛至此不再只是身體器官，而是作用於身體的權力規訓工具，觀看也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政治/管治行動，形成無所不在的監控和凝視的監獄社會。這種對身體的全景式監視和解剖式的凝視，成為傅科身體解剖政治的建立基礎。不管是主權的凝視還是規訓權力的凝視，甚或生命政治的凝視（照管看顧），視覺(vision)都是一種監控(supervision)，不只具優位主導性，更具透視性、機警性、遍在性和捕捉能力，這構成了一種不同歷史和社會條件交織下，不同權力/知識體制生產下造就身體形式的視覺霸權。我們必須面對觀看做為現代性統治的遍存事實。從越來越趨細緻顯微的各種觀察、檢驗技術的開發到醫療凝視、性別凝視、種族凝視、它者凝視、帝國殖民凝視、常態判準凝視以至監控內化的自我凝視。視覺/凝視無疑已構成當代社會生活的統治政體，身體政體、權力政體和觀看政體構作出這現代性統治政體不可切分的整體。

透過上述理論的掌握，魯迅的遭遇已不再特殊，這種現代性透過各種視覺技術和視覺機制無所不在的滲入日常生活，發揮社會監視及自我監視力量，不只重新型塑我們的感官結構、身體秩序和自我意識，甚至做為社會治安、身份辨識的管治手段。上述魯迅的視覺啟蒙只是一例，其它視覺的社會文化效應如曾佩琳(Paola Zamperini)指出，晚清的肖像攝影不只做為一種時髦的消費商品和都市生活方式，照片也提供自我一套更具科技的方式或更客觀的角度來觀看自己的臉和身體，同時也可促成時髦的自覺，以肖像照做為身材外貌模仿比較的範本，<sup>108</sup>肖像照成為當時時尚身體的理想模型。這一現象在英國更是普遍，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表示在 1861~1867 年間攝影肖像就賣出三、四百萬張，彷彿這些影像可提供人體正確的解讀，只要根據這樣的解讀，任何身體都可分配到適當的範疇，這也構成新的認同科學，包括人類學、人相學、顱相學與犯罪學都透過攝影技術讓身體變得更具可讀性。<sup>109</sup>這些知識結合攝影成為社會控制的視覺技術，俾以辨識出具危險性和犯罪特徵的身體。

清末民初照相技術已廣泛運用在社會管理和日常生活上，例如緝拿逃犯、尋人啟事、死刑犯臨刑前的驗身、拍照驗屍辨認死因、意外亡故屍身存證、考生應試和員工招聘的身份確認等用途。照相技術已成為社會治安、身份管理工具，用

---

<sup>108</sup> 曾佩琳(Paola Zamperini)，〈完美圖像：晚清小說中的攝影、慾望與都市現代性〉，收錄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2005: 453；460)。關於近代中國肖像攝影研究另可見伍美華(Roberta Wue)，〈本質上中國：十九世紀攝影的中國肖像照主體〉，收錄於劉瑞琪編，《近代肖像意義的論辯》，(2012: 348~379)。

<sup>109</sup> 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何謂寫實主義中的真實？〉，收錄於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I：帝國—亞洲—主體性》(2006: 26)。



以辨識特徵，核實身份。<sup>110</sup>1886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開始對在押犯人拍照存檔，驗明身份，當時報紙刊載這樣一則新聞，「昨晨，虹口捕期應釋之犯三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檔」。<sup>111</sup>顯然照片用在犯罪管理，社會治安上，可能是這時期才引進的新法，所以引起媒體注意。宣統年間到民國初年，報紙刊載附照片的緝拿逃犯新聞和尋人啓事已屢見不鮮。1915年3月4日，《申報》刊登「捉拿王匯川，(小像)，賞洋四百元」啓事，懸賞在逃詐欺犯。1922年10月22日《申報》一則懸賞緝拿張夏生啓事，該男子「身長，面白，鼻高，身著華裝」，正文上方附有張夏生身著西裝頭像一幅，相片與賞格文字相符。至於照片用在法醫驗屍，主要爲了拍照存證以備日後查明死因，或者意外死亡屍體，爲了防止屍身腐爛，日後無法辨識身份，也留照驗身，以利家屬領取遺體。1890年12月，一艘太古公司上海輪在長江失火沉船，死難三百餘人，其時仁濟堂僱船打撈屍體二百餘具，分別將遺體拍照存證，以待日後親屬認領時，不致錯領。當時的《點石齋畫報》曾以〈波臣留影〉爲題，就這一事件提出看法，「其身無確認者，縱開具年貌籍貫，而領取者猶不免有謂他人父，他人兄之慮」。這種怕誤領遺體的疑慮，透過拍照驗身方式，可資解決。在這次船難事件出力甚多的仁濟堂慈善家施少卿，則在事後建議設置息影公所，專門負責對沿江無名浮屍拍照存證，以方便親屬日後認領。這種作法在而後船難事件中成爲慣例。此外，透過照片尋找失散親人，如走失、出走或被拐賣的人口，也成爲當時常見、有效的尋人方式，覓回親人比率還算可以。至於照片用於應試或招聘的身份辨識，也已流行。宣統年間，學部曾頒布命令，規定凡參加各類學校考試學生，須於報名投考時附上個人照片，否則取消應試資格。這一規定沿用到後來，例如1913年夏北京高校招生，即在招生一覽表上要求附上「四吋半身最近照片一紙」。除了便於尋人，清末新政期間，外務部、吏部首將照片用於人事管理，透過照片驗明正身，以杜絕冒名頂替之弊。<sup>112</sup>馮客(Frank Dikotter)也提到照片具認同作用，民初中國已有全家福照片掛客廳習慣，照片也用在祭祖儀式中，顯示照片開始運用在社會認同結構中。此外照片也成爲社會監控機制，如將通緝犯照片掛在公共場所，罪犯拍照建檔，俾利逮捕犯人，預防犯罪。<sup>113</sup>

上述說明可以知道，中國跟西方一樣很快的捲進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現代性視覺世界。視覺性的圖像、影像，如畫報、廣告、照片、影片等，在日常生活空間大量穿梭流動，視覺猶如時代的主要感官認知，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視線介入。攝影拍照成爲將個體建構爲社會對象的一種方式，一種可辨識、剖析、管理

---

<sup>110</sup> 葛濤、石冬旭，《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2011: 125~148)。

<sup>111</sup> 〈鏡中留影〉，《申報》，1886年1月11日，轉引自葛濤、石冬旭，《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2011: 129)。

<sup>112</sup> 參見葛濤、石冬旭，《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2011: 129~147)

<sup>113</sup> 馮客(Frank Dikotter)，〈民國時期的摩登完意、文化拼湊與日常生活〉，收錄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2005: 483~485)。

的對象，這也是對個別身體、病體甚至屍體，進行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現代性技術介入。照片運用從社會治安、身份管理到社會認同，無論其用何為，無非都是這種視線介入的反映，構成視覺化的社會控制和視覺管理的觀看權力體制。同時也顯示現代性視覺科技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它不僅影響或主導我們的行動方式和生活風格，也展現了觀看做為現代性統治的事實。

此外，高彥頤在纏足研究中也論及觀看或視覺凝視在中國的作用，她指出中國一些改革者總站在中國之外，向內望著中國。這種觀看政治是「國際的」，而視線則是一種必要配備，否則無以在全球脈絡下想像一個全新的中國認同或民族認同。現代中國的國族意識，在定義上已含攝一個跨國的座標，它的源頭來自一種由外向內望凝視。<sup>114</sup>簡言之，這是一種由外而內的國際性視線凝視著中國，一個被觀看，視覺化的中國。藉著由外向內凝視，到自我凝視，建構自我意象、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進而形成民族認同意識和愛國救亡意識。另一位纏足研究者苗延威也指出，「視覺科技的威力，不止在於讓西方公眾看到這些被建構的邪惡存在，更在於使中國人透過帝國主義的視線，看到『自身的邪惡』。有如鏡像自我般的觀照，嚮往現代性身份的新知識份子立刻承認了這個污名，或是必須洗刷的恥辱，並在清末民初的國族認同建構過程中，夾帶了這個恥辱感……」。<sup>115</sup>中國正是透過帝國主義現代性視覺科的凝視，反身看到自身的邪惡、感受到自身的恥辱，洗刷恥辱感以及背後涉及各種改造工程，成為國族認同和共同目標。

上述討論放在魯迅及其他啓蒙者身上都很適用，王韜、郭嵩燾、黎庶昌、薛福成、曾紀澤、李圭、康有為、梁啓超等西化知識份子，都曾開眼走向世界，觀覽各國物質文明、器物建設、城市街廓、建築風貌、風俗民情，並記下歷覽見聞，<sup>116</sup>文字猶如鏡頭，細膩呈現西方現代化進步圖景，同時也傳達身處異域，視覺遭遇的驚羨、震撼、神馳的現代性經驗，進而回身反觀中國的愚弱、落後，乃效西方，以自強維新救中國。觀看或視覺遭遇彷彿成了那個時代特殊的歷史經驗，在視線穿梭、交會中經歷現代性經驗，同時也不斷在國際秩序脈絡的觀看、被觀看和自我觀看中找尋中國的意象、自我定位和可能出路。視覺與鴉片中國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思想啓蒙到攝影的日常生活運用，從自我意識到身體實踐，我們一方面看到中國的視覺化，一種技術化視覺的普遍運用；另一方面更看到視覺化的中國，一種西方/帝國想像視框下的視覺化/再現中國。這既是西方/帝國的凝

---

<sup>114</sup> 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2007: 86)。

<sup>115</sup> 苗延威，〈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 40)。

<sup>116</sup> 如王韜，《漫遊隨錄》；郭嵩燾，《使西紀程》；黎庶昌，《西洋雜誌》；薛福成，《出使英法比義四國日記》；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李圭，《環游地球新錄》；康有為，《歐洲十一國游記》；梁啓超，《新大陸游記》等。相關研究見鍾叔河，《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2010)；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2009)。

視(帝國/觀看政體)，也構成中國/自我的凝視，魯迅看到的幻燈片是帝國的凝視，他棄醫從文的轉折是自我的凝視，其間的弔詭在於如果不透過帝國凝視，會造成魯迅的自我凝視嗎？這種自我觀照/自我反思顯然是某種觀看政體下構作出的自我凝視，一種自我做為它者的凝視，一種凝視它者的凝視。

觀看與視覺遭遇，讓中國產生自我凝視的啓蒙和覺醒作用，同時在視覺現代性遭遇過程中，開啓中國救亡現代性議程。從清末帝國到新制共和，富國強兵、強國強種的改革，無不朝著現代性道路行走，身體、器物、醫療、衛生、制度、思想、生活方式也進入現代性轉型階段。再者，從上述視覺中心主義、觀看政體論述，配合國族發展需要的視覺品味和判準也隨之形成，視覺發揮其主導力量，進行感官的審判與裁決，對不符合國家生存需要、妨礙社會秩序、違逆常態標準的醜陋、退化、病態的視覺意象進行罪責與排除，既是作用於身體規訓的身體政治，也是視覺管治、裁決的觀看政體。例如，前文討論的纏足，長期以來即是社會審美的標準，同時也內化為女性身體美的觀念，不只是風尚，更是社會地位象徵。然而，在強國保種，振興民族，洗雪國恥的論述下，纏足做為身體美的標準，一反而為醜陋、野蠻、惡習的表徵。這種社會風尚丕變，視覺審美標準逆轉，使得身體型態在社會觀看或國族凝視下，不得不隨之調整改變，於是「放足湔除千載毒，熱心喚起百花魂」，<sup>117</sup>放足是文明，纏足是野蠻的社會標準形成，俾能改變民風，改良社會。這時的國家社會需要的是這樣身體標準的女性，「(行路)艱難從不皺眉頭，身體運動多強壯，不似從前驕又柔，諸般事業皆可做，出外無須把男子求」，<sup>118</sup>一個身體強健、獨立自主、能自食其力從事百業的現代女性，如此才能成為國家有用的社會生產力。在這種風氣、標準下，放足不只攸關國家生產力，更攸關強種延嗣。

1895年在上海成立「天足會」的英國商人之妻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就說，「婦女不僅佔全國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親。肢體不全、愚昧、多病的母親生育和撫養的孩子會和他的母親一樣。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纏足在中國蔓延開來以後，中華帝國從沒誕生過一個贏得萬方景仰的男人」。<sup>119</sup>而這正是強國保種政治經濟學框架下的有用的社會身體，既具經濟作用，也具強種作用，構成了生命政治的誕生。纏足例子如此，同樣的危害中國根基甚深的鴉片身體更是視覺管治對象。視覺化的鴉片身體被建構為邪惡的客體，這種病態、活屍般的鴉片身體，既有傷個體，也戕害國族命脈；既不在常態秩序之內，更是視覺秩序所不容許的醜怪意象。它的嚴重性更甚纏足，從新中國建立，以至抗戰時期，鴉片吸食未曾斷淨，如鬼魅軀體仍不時出現，構成國族存亡關鍵。在持續禁毒禁煙

---

<sup>117</sup> 秋瑾，〈有懷〉，《秋瑾集》(1960: 89)。

<sup>118</sup> 秋瑾，〈精衛石〉，《秋瑾集》(1960: 125)。

<sup>119</sup> 引自楊紅林，《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2011: 195)。

政令下，鴉片身體依然是需被矯治、排除的不正常身體，視覺在鴉片管治過程扮演一定角色，它是第一線的裁決審判機制，在視覺中心主宰下，遂行國家權力，進行監控、罪責化作業。這正是後文討論的重點。

### 第三節 展覽會：從視覺化恥辱到象徵性救亡

#### 一、進入博覽會之外：全球視線下的現代性它者

順著周蕾對魯迅幻燈片事件的分析，帶入視覺中心和觀看政體做為現代統治的脈絡，再轉入一個透過技術化語言轉介拉出距離再聚焦切入的視覺化中國。晚清中國經常是被觀看和被視覺化的中國，我們不難在一些影像記錄書中看到典型的中國意象。如《明信片清末中國》<sup>120</sup>一書諸多當時洋人拍攝的照片展示了一八九八到一九〇四年的中國的市井小民、貧民乞丐、勞動階層、沒落王孫、消遣娛樂、城門街景、鴉片煙鬼以及校場砍頭、懸首示眾、立枷酷刑等景觀，彷彿像是另一種萬國博覽會的人種展，或獵奇展示會，展示異國情調、驚奇、殘忍、野蠻、落後、醜陋、可笑，更突顯觀看者的優越性和主宰性。以這類影像為主的視覺化中國，就是被貶抑化、野蠻化、邊緣化的中國。這一幅幅愚弱、頹敝意象，成為王朝衰敗的寫真，「中國形象，崛起於中國的衰敗時刻」，<sup>121</sup>確實如此。影像化或觀看的過程，正是西方以另一種權力—光學力量，對中國的視覺支配。如同一位研究者指出，這些西方新興的「霸權式觀看科技」(hegemonic technology of seeing)，如新聞報導、臨床醫學、攝影照相、X光掃描以及博覽會等，隨著帝國主義進入中國，肆意觀看、揭露中國。<sup>122</sup>如 1860 年代，上海商業攝影師以付費或逼迫方式，要求貧窮婦女卸除纏腳步，讓他們拍攝，由此產生了第一批纏足裸足的影像，而原本是視覺禁區的中國婦女身體，也被洋人科技攻破，影像化的纏足傳為奇觀。到了 1865 年，觀光客在各地購買的相片，其中至少會有一張跟中國的惡俗（吸鴉片、纏足、處決）有關。這些照片通常以呈現中國風俗之姿在市面流通。<sup>123</sup>而在放足運動期間，反纏足人士也運用X光掃描纏足，將恐怖病態的影像公開展示，透過這種真實又戲劇化的視覺展覽技術，發揮羞恥和驚駭效果，以實踐視覺管治策略。

---

<sup>120</sup> 陳玲、王迦南、蔡小麗編著，《明信片清末中國》(2005)。其它類似的書有楊紅林，《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2011)。張瑞德對清末民初西方明信片的分析，張瑞德，〈想像中國：倫敦所見古董明信片圖像分析〉，收錄於張啓雄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下冊)(2001: 807-830)；Regine Thiriez, *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1998)。

<sup>121</sup> 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2001: 301)。

<sup>122</sup> 見苗延威，〈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5 期(2007: 5)。

<sup>123</sup> 見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2007: 102)。

小腳影像化如此，更不用說鴉片吸食的圖片，在大多有關清末中國的畫冊、攝影寫真裡，成爲必備劇碼。中國風俗自影像化盛行後一直被界定爲跟這些惡俗恥辱相關。中國猶如染疾病體或怪異軀體，遭西方視覺掃描、診斷和解剖；而這些照片轉製成明信片，除了表示當下的趣味、顯著性和代表性，一種疏離的驚奇感和偏視之外；也構成一種知識分類，一種世界新知的介紹，介紹東方中國萎弱的人種體態、日常生活的惡習蠻風，並在萬國博覽會與野蠻民族同置人種館展示；而在明信片輾轉傳遞世界各地時，猶如中國意象的播遷旅行，介紹著什麼算是現代文明之外。<sup>124</sup>中國意象透過現代視覺科技，快速的進入全球舞臺，與世界連成一氣。透過這種展示和觀看，中國的孤立封閉，無形瓦解，而在觀看自身被觀看過程所形成的自我意象、自我定位和自我意識，更是與世界眼光交會下的產物，這時的中國不再是中國的中國，而是世界的中國。「蓋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sup>125</sup>全球來往，合爲一家，中國已進入全球體系，中國至少在視覺這層次已然國際化。

不管是攝影寫真或其它視覺性的敘述，思想愚昧、破落衰敗、身體病態，基本上是這（西方）視框下的主要意象。除上述纏足之外，鴉片更是這類敘述的代表意象，構成所謂的「鴉片帝國」。這種意象的建立，並不只是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化，中國也自我成就這種刻板意象。下面事實說明了這一切，鴉片做爲中國的視覺識別，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則是透過萬國博覽會的陳列展示。而中國參與萬國博覽會的歷史，說明了中國除了透過鴉片貿易被動的成爲全球經貿體系一環之外，參與具現代性指標的商品展，無疑讓中國主動進入了全球現代性商品體系，一個展示人類文明、工業產品；促進商品競爭、經貿交流；誇示國家富強、展現帝國殖民統治力的展覽會。在這種脈絡下，中國的參展，一方面進入商品競爭的全球經貿交流，另一方面也成爲帝國殖民展示力量的道具。更重要的是中國參展，等於公開向全球展示中國，在博覽會做爲現代性展示櫥窗時代，中國很快的置入全球現代性議程，透過有組織、有效率、有目的觀覽方式，展示中國的現代化和文明程度。

這是博覽會目的和理想，雖然，中國透過參展，參與了商品交流競爭、科技產品不斷進步的全球現代性議程，然而其效果卻是負面，因爲會場中國展館陳設、佈置粗糙、疏陋；空間規劃不當，視覺動線不佳；展品之間配置關係不適，更糟的是參展物件選擇不妥，竟出現鴉片煙具，纏足弓鞋、枷鎖刑具等落後、可恥之物，甚而有人種展出，既辱國格，徒招外人恥笑，也引來國內輿論撻伐，這

---

<sup>124</sup> 本書後記作者暨蒐藏者提到獲得這些明信片時的感歎，想像當年寄出這些明信片的漫長旅程和時間，可能從北京到天津再上船轉到上海，從上海到新加坡，經日本到義大利，從義大利再上火車發到歐洲各地，每轉一地加蓋一個戳章，慢的話可能三個月才收得到，百餘年後卻又回到中國人手裡。而中國意像不也就在這輾轉過程裡進行世界的展示。

<sup>125</sup> 王韜，〈擬上當事書〉，《弢園尺牘》（1959: 208）。

猶如向全世界展示國恥。中國雖然進入博覽會，但仍在博覽會之外，是博覽會的它者。這也說明，中國在全球博覽會這種現代性的展示舞台上，徒然暴露自身做為「現代性它者」的窘境。<sup>126</sup>展示國恥，正是展示自身的現代性不完全，展示中國在現代文明之外。這種全球視線它者化，正足以構作出恥感意識，也正是這種它者化下的恥感建構讓中國進入現代性啓蒙和改革議程。

中國早期參與萬國博覽會為什麼會成為現代性它者？這是因為清政府一開始並不明瞭博覽會作用為何，既不重視，也不知該如何經營籌備，主其事的總理事務衙門，將展覽事務委託海關洋員負責，即不再積極涉入督管，以致喪權辱國之事不斷發生，也無法達到促進工商交流，提振商務，富國裕民目的。一直到1905年後政府在各方批評、要求下，才收回海關博覽會承辦權，其觀念、作法也才有所改變。由於這些因素，使得中國原本可透過博覽會這現代性的展示櫥窗，展示「文明中國」意象，以掃鴉片中國落後、醜陋意象的機會，也因此錯失，反而讓世界在以視線目光為主導的場域，看到奇觀化的中國，中國的鴉片、纏足成為全球視線下的奇觀，更落實了西方/中國，文明/落後，進步/野蠻的認知框架。在國際場合，對中國而言，恥感身體已提昇為恥感的國體，博覽會視線促成中國自我建構出恥感國體，不只身體，國體也蒙羞。這也為什麼展覽會當地留學生以及國內輿論會有強烈反映，進而大聲疾呼，要求從海關手上收回辦會主導權。雖然，日後中國積極參與萬國博覽會，進入20世紀更在國內舉辦不少商品賽會、博覽會以及國貨展，對中國現代化和商品經濟的推動，著有貢獻，但鴉片進入萬國博覽會已成為國際性的視覺事件，中國的恥辱，也烙印為不可抹滅的世界印象。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中國介入萬國博覽會，接受全球視線觀視的這段歷史過程，這或許是視覺化中國的一樁重要事件。

不像隔鄰日本自1862年第一次直接接觸倫敦萬國博覽會，<sup>127</sup>到1867年德川幕府正式派遣代表，慎重選購物件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起，就很清楚博覽會的目的、功能，以及展品安排配置邏輯，如何吸引視線、推展商品。日本對博覽會的體認，「為求興盛貿易，獎勵製作，廣增眾見，乃應規劃此一重要會場以作為國民之治安，富強之媒助」。<sup>128</sup>追求現代化的日本，視博覽會為振興工業，富國強兵不可或缺的機制。在這種認知下，1873年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更費心

---

<sup>126</sup> 這是高彥頤(Dorothy Ko)在纏足研究中提到，「時刻銘記過去的纏足歷史，有助於展望一個現代的中國。纏足必須被呈現、展示和不斷述說為現代性他者」。見高彥頤，《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2007: 60)。

<sup>127</sup> 日本幕府派遣38人使節團前往參加，其中包括福澤諭吉。使節團抵達之日正是博覽會開幕日，一行人穿著「紋付羽織袴」出席開幕式，其特異服飾引起倫敦市民極大注目，再加上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熱心將其收集的日本漆、陶、瓷器、骨董、刀槍、燈籠、鞋靴等物件送展，其異國情調更吸引參觀人興趣。這股對日本服飾、工藝品的興趣，造成歐洲各地一度流行的日本主義。見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106~107)。

<sup>128</sup> 久米邦武，《米歐回覽實記》，見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114)。

打造國家館，慎選參展物品，展示日本傳統文化，極力吸收西方文明。同時也成功將博覽會運作方式移植國內。1877年日本國內首度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開啓往後一連串國內博覽會興辦的契機。透過萬國博覽會，日本成功的進入西方工業文明和現代化體系。日本成爲殖民帝國後，其運用博覽會展示殖民統治力量和炫耀帝國版圖用心，全然跟西方博覽會彰顯殖民權力、誇示富強沒有兩樣。

中國參與博覽會境遇不同於日本。自1851年英國舉辦第一次萬國博覽會，「水晶宮博覽會」，即展開十九世紀中到二次大戰前的博覽會世紀，大小展覽會不斷，<sup>129</sup>清政府自1866年首度受邀參加法國博覽會起，<sup>130</sup>到1911年覆亡，46年間收到80餘次的邀約，其中清廷組團參加13次，寄物參展6次，派員參觀11次，參與博覽會數次算是頻繁，參加萬國博覽會成爲清政府重要的外交活動。<sup>131</sup>然而，當時政府及一般人都認爲博覽會只不過是賽奇會、聚珍會之流，把博覽視爲「賽奇耀珍」，顯有娛樂和奇淫技巧的鄙視之意，儘管多次受邀參展，政府大多曉諭商民自行參加，並未積極看待此事。如1866年首度受邀參加次年的巴黎博覽會，政府只當例行公事辦理，並未特別重視，「行知三口及上海各通商大臣，並禮行總稅務司轉飭各商遵照」。<sup>132</sup>1873年清政府才正式派員參加奧地利維也納博覽會，剛開始也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推辭，最後同意民間商人組團前往，「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sup>133</sup>但因商人不踴躍，遂由海關總稅務司負責採辦商品前往奧國參展。政府同意參加理

---

<sup>129</sup> 這段期間大規模博覽會約80次，其它較小展覽會算入，則近300次之多。見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關於中國參與萬國博覽會的相關史料可見李宜龔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要覽（1914）；陳琪、陳輝德，《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1905）；屠坤華，《萬國博覽會游記》（1916）；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2002）；南京圖書館編，《中國早期博覽會資料匯編》（一~七冊）（200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晚清赴美參加聖路易斯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1987年，4期（1987: 22~33）；上海市檔案館編，〈近代上海參加世界博覽會史料選〉，《檔案與史學》，2003年，2期（200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晚清中國參加日本大阪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2005卷，4期（2005: 17~2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上），《歷史檔案》，2006卷，1期（2006: 37~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中），《歷史檔案》，2006卷，2期（2006: 17~2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下），《歷史檔案》，2006卷，4期（2006: 11~18）；陳占彪，《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2010）。

<sup>130</sup> 事實上，1851年第一次英國萬國博覽會就有中國商人徐榮村以個人身份參賽，他以榮記湖絲參賽，還獲得金、銀兩枚獎牌。見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47）。

<sup>131</sup> 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期（1997: 288）。

<sup>132</sup> 《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01-27-9-1，〈法英等國聚珍聚寶會〉（檔案現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轉引自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2006: 35）。

<sup>133</sup> 《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01-27-4-1，〈各國邀請參與有關商政公會〉，轉引自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期（1997: 299）。



由，主要基於外交邦誼考量，而非興盛工商業的目的，「特因兩國交誼，不肯膜視」<sup>134</sup>之故。同樣的，日本首次正式參加博覽會，也是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但日本對展覽會的功能和目的一開始即非常清楚。1872年負責博覽會事務實際執行的工部大臣佐野常民，即指出參展目的：「(1)收集及展示精良物品，以使日本國土之豐饒、人民之技巧為海外所周知；(2)觀摩各國之物產、學藝之精妙，並傳習其機械技術；(3)在日本籌備創建博物館，開辦博覽會之基礎；(4)整備日本製品成為各國之日常用品並增加輸出之途徑；(5)調查各國製品之原價、售價及供需狀況，以增加未來貿易之利益」。<sup>135</sup>中日兩國在現代化過程的差異從參與萬國博覽會的態度和認知可見一般，日本一心追趕、模仿西方，希望「脫亞入歐」，中國仍在現代化邊緣徘徊摸索，進退兩難。

爲了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清政府決定博覽會事務委由熟悉涉外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轄下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負責籌辦，這讓海關洋員得以控制博覽會發展，從1873年1905年的比利時列日博覽會，32年間，海關承辦了28次博覽會的參展業務。<sup>136</sup>故有「賽會乃赫德之賽會，非中國之賽會」之謂，<sup>137</sup>可見赫德對中國出洋賽會的影響。這也種下了日後中國參展準備疏陋、人員訓練不足、展品粗俗不佳、主權喪失、國家形象破壞的詬病。最早政府態度漠視，不當一回事，「平時既無預備，臨時又不研究，且必待該國照會到部，輾轉行文，始行出示曉諭，爲期本已甚迫，赴賽商家又不通西國語言，倉皇失措，何能遂其所求」。<sup>138</sup>這種輕忽將事，以至展品選擇不當，丟人現眼的辱國現象到了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以及1905年比利時列日博覽會，達到了臨界點。因爲海關洋員往往有意選購落後野蠻之物參展，如「窄小之弓鞋、黑獄之煙具」等，展品俗惡不堪，以至「外人過者無不嗤之以鼻」，丟人辱國現象引起國人抗議，「此次出品名曰陳賽，實無異於獻醜也」。<sup>139</sup>被譽爲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第一人的陳琪，<sup>140</sup>受湖南巡撫趙爾巽指派參加聖路易博覽會，看到展品陳列不當又醜陋粗俗，海關人

---

<sup>134</sup> 《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01-27-4-1，同治九年，〈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文〉，轉引自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2006: 35)。

<sup>135</sup> 見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113)。

<sup>136</sup> 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25)。

<sup>137</sup> 《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02-20-18-2，〈參加比國黎業斯萬國各種賽會〉，轉引自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期(1997: 319)。

<sup>138</sup> 〈前出使英國大臣汪咨農工商部論辦理賽會事〉，《東方雜誌》，第4年，9期，引自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2006: 47)。

<sup>139</sup>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2002: 71)。

<sup>140</sup> 陳琪(1878~1925)，除參與聖路易博覽會，並於會後寫下參訪見聞和改革建議的《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一書外，還成功的主辦了1910年南洋勸業會，以及籌備1915年美國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在推動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建樹良多。相關研究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林芳，《近代中國博覽會之第一人：陳琪傳》(2009)。

員中飽私囊等情形，因而建議博覽會收歸自辦，不假外人，才能收促進工商之效，並避免國醜外揚，「中國國家賽品，因托洋員購運，陳設諸多劣敗，故略為表出，以告國人，俾知所以求工商業之改良，且使它日與賽勿復假手外人以辱國」，<sup>141</sup>之所以不能聽令「滬關洋人司事等妄自為之」，主要是「洋人不愛中國，不恤商人，其無同胞之情，不謀華人之公益也」。<sup>142</sup>

1904年清政府受邀參加隔年舉辦的比利時列日博覽會，赫德派比籍稅務司負責會務，官方展品由聖路易斯會場直接送往列日，這些展品「竟有刑具、煙槍、纏足等物」，最後「留學生爭之公使，使撤去」。<sup>143</sup>因此，1905年駐比利時公使楊兆鏞即表示，「賽會關係商務，向由稅務司領辦，以西人置華貨，所擇已未必精，陳所不應陳，每貽笑柄」。<sup>144</sup>洋人既不在乎中國經貿發展，又無視中國主權，特意選擇洋人好奇的鴉片煙具、纏足弓鞋、刑具枷鎖等醜惡、國恥之物，讓人恥笑，好貶損中國。這類事件不斷在國際展場上演，在清末國族主義抬頭，洗雪國恥、振興民族意識昂揚的年代，促使駐外公使、留學生、商人上書，列數海外參展弊端，<sup>145</sup>要求將博覽會主導權從洋人控制下收回。最後，清政府接受楊兆鏞，「擬請妥定賽會章程，俾商業挽回利權」的建議，於1905年11月，頒布〈出洋賽會通行簡章〉二十條，對參展事宜做了統一規定，以改變商人，「不習外事，不黯會章，貨品不精，裝配不善，往往動多隔閡，獲益甚微，至難與外人角勝」的局面。<sup>146</sup>至此中國正式從海關洋員手中收回承辦權，不再受把持，同時博覽會的籌辦開始走向制度化，<sup>147</sup>也開啓中國日後競開商會、競逐商品的展覽會時代。在現代性展覽舞台上，中國從它者位置，走進主體位置。也正因為它者化的恥感建構，推促中國往現代性前進，國恥出展事件可說是一大關鍵和轉折。

## 二、鴉片出展：全球視線下的恥感國體

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海關洋員把持辦會時代，中國參與萬國博覽會歷

---

<sup>141</sup> 陳琪、陳輝德，《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轉引自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4)。

<sup>142</sup> 陳琪、陳輝德，《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轉引自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3)。

<sup>143</sup> 1910年，〈中國出洋賽會預備辦法議〉，《張元濟詩文》，收錄於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465)。

<sup>144</sup> 見李允俊編，《晚清經濟史事編年》(2000: 945)。

<sup>145</sup> 這些弊端：「一為失中國自主之權，二為耗國幣於無用之地而重困商人，三為失中國固有之利，四為敷衍將就而賽品愈劣，五為西人中飽款項，六為編譯賽貨冊誣蔑中國」。見《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收留歐學生商人稟〉，轉引自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思與言》，24卷，3期(1986: 265)。

<sup>146</sup> 章開沅等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1991: 461)。

<sup>147</sup> 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7)。

史中，引起極大爭議的 1904 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的辱國事件。<sup>148</sup>如前所述，聖路易博覽會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遣官方特使團參展，同時也正式走入博覽會的國際舞台。在博覽會代表巴禮德(John Barrett)赴京晉見慈禧太后極力敦請，以及美國駐華公使康格(E.H. Conger)多方鼓動下，清政府爲了表明重視邦交和商務，特別指派貝勒溥倫任參展籌備正監督和特使團團長，朝廷還特別在財政困難情況下，諭令各省籌措經費 75 萬兩做爲參展費用。而各地商人也反應熱烈，紛紛合資購物，赴美參賽。總計有 25 個省份和地區，47 個中外公司和個人參加，展品約 10758 件，有多項產品獲獎，參展規模較歷屆都大。<sup>149</sup>雖然這次參展盛大，政府也重視，然而如前述所論，負責籌辦的海關洋員和中國代表，不是專業不足，就是輕忽以對，無法達到博覽會應有的水準和效果。參與這次博覽會考察的湖南代表陳琪，於會後寫下《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一書，綜述博覽會的見聞及缺失。根據陳琪的第一手記錄，認爲中國問題，一是展品陳列不當，雜亂無章，缺乏有效安排，「致各物任意陳設，雜亂無章」，「故運來之件亦等閒置之雜藝院中國段內，無人過問。其知者轉嗤爲位置不宜，陳設不整，非來賽之旨也」，於是他感慨的說，「……似此不如不賽之爲愈。嗚呼東方病國秩序混亂，若不易輟改弦，恐無自立之日矣」。陳琪從展品陳列不當，看到中國是一秩序混亂的病國，難以立足，與世競爭。<sup>150</sup>二是展品粗俗低劣，鴉片煙具、纏足弓鞋、枷具、殺人刀等器具以及娼妓、乞丐、囚犯、苦力、小腳婦人、鴉片煙鬼等小木人數百個，這也惹得華商憤慨，「今海關舉腐朽之狀態，俾游人之見者，傳爲笑柄，視華商爲下等國民。誰實爲之而至於此」。<sup>151</sup>三是誰實爲之而至於此，答案是海關洋員，「皆任海關洋員採辦物品，陳列土木偶像，顯出工藝俗喪之鄙陋」。<sup>152</sup>

海關官員雖然掌控一切，致令展品俗喪鄙陋有辱國體。然而，鴉片參展辱國事件已非首次，參展的政府官員果真無感，反而落入洋人刻板化中國意象行列。或許之所以如此，顯示政府官員潛意識認爲這些鴉片煙具最能代表當時中國文

---

<sup>148</sup> 關於這場博覽會的研究除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外，另可參見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之研究〉，收錄於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2003: 421~475)；陳琪、陳輝德，《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晚清赴美參加聖路易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1987 年卷，4 期(1987: 22~33)；沈原，〈中西文化的交融與碰撞：記晚清政府派員參加美國聖路易博覽會〉，《歷史檔案》，2006 年卷，第 4 期(2006)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1984: 154~182)；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2005: 164~185)。

<sup>149</sup> 參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85~89)；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68~72)；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之研究〉，收錄於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2003: 421~423)。

<sup>150</sup> 參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1~94)。

<sup>151</sup> 參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3)。

<sup>152</sup> 參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4)。

化。<sup>153</sup>這說明了鴉片至少就某部分中國人而言彷彿內化為自我的意象，同時也意味著鴉片已成為日常生活經驗，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然而值得玩味的是，這是一次鴉片視覺化的國際事件，一次鴉片視覺化的現代性經驗。鴉片器具、身形及其背後的中國象徵成為展示，也就是被視解剖、視覺支配的對象，中國受挫於外侮武力，亦受制於外人的凝視。這種受制於外人眼光或凝視，同時也將自身呈現為西方的它者，一種自我的它者化。如同王正華研究指出，中國參與西方帝國主義博覽會，就等於進入西方安排好的秩序中呈現自己，此一自己也就是與主辦國美國和參展各國所形成之國際社會相對而生的「中國」。中國意象成為西方觀看秩序下的產物，這是有權觀看的人藉視覺宰制建構種族與文化的優越感，也就是美國或西方透過視覺宰制形成鴉片中國刻板印象。<sup>154</sup>

再者，博覽會做為現代性的展示場，同時也更是帝國主義權力的展示，象徵中國的物件擺在帝國與現代性的雙重觀看秩序中，一方面進入現代性視域，另一方面是在帝國秩序下進行自我定位的呈現，成為一種「現代性的它者」。基本上，博覽會就是一個分類秩序嚴明的空間，所有物件依知識分類體系，安置在相應的位置，物品的陳列安排、物與物的空間關係，構作出豐富的意義體系，同時也對照出物件背後的國家，在全球分類體系中的位置。中國透過鴉片煙具等物件已進入到愚弱、它者的位置，既可被別人識別，也自我意識到這種識別。正因這種定位，在他人觀看下乃引起強烈的羞恥感，進而引發輿論對展示鴉片等物件的批評。這種情形如同高彥頤所說，展示使得中國在全球脈絡裡發現了自我的國族定位，但也意味著，視覺性在國際交流裡變得重要。成為視線的對象，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換來的通常是屈辱的感受。而中國知識精英對於身處國際世界的體認，就是體認到自己成為被注視的對象。<sup>155</sup>

這些問題顯示當時中國對博覽會這種現代性展示機制不瞭解，也沒有展出產品即展出中國的強烈意識，以及什麼樣的物件足以象徵中國、做為中國標記的概念。於是上述鴉片、小腳等中國國恥正式登上國際舞臺，在西方視覺主宰下成為中國的身份標識，成為全球的笑柄，如同西方視線促成中國建構出恥感身體一樣，也建構出恥感的國體。人民對國家產生羞恥意識，從中國對抗列強節節敗退以來，就成為盤據內心的情意結，現在則是以國家之名放在現代性的展示空間，接受全球視線的掃描。中國國體、國格宛如赤裸裸、活生生的躺在展覽會這解剖檯上，受到視覺的凝視、解剖。西方文明/進步/現代性的視覺從對中國身體的宰制，更進一步宰制了國體。中國在這展示空間裡既是帝國視線下的它者，也是現

---

<sup>153</sup>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2005: 184~185).

<sup>154</sup>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錄於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2003: 432~440)。

<sup>155</sup> 高彥頤，〈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2007: 85~86)。

代性的它者。這是具羞恥感的中國人所不能忍受，於是聖路易博覽會的展示鴉片煙具等國恥之物，坐實中國的可笑、落後、愚昧，終於引爆了社會輿論和當地留學生的抗議。

當地留學生投書抗議聖路易博覽會的辱國，並呼籲奮起，湔雪恥辱，「若我中國，國雖弱，猶國也。而猶為世界上所不齒，夫故安在哉？記者僅就中國入賽情形及外人形容中國之利害，略陳於後，以徵我中國腐敗之實跡，有足以招外侮者，凡有血氣之人聞之當如何興起奮發，及時改良，以湔洗無窮之奇恥深恨……」，為什麼中國令世上之人不齒，因為中國參展賽品招來外侮，「賽品……其最可醜者：上海裝小腳婦人一，寧波裝小腳病婦一……老爺一（面黑黃，有問者，輒以吸鴉片煙答之，並云中國官員半吸鴉片煙）……」，其參展結果是花費鉅款讓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深印在全球人士腦海中，「不特虛糜巨款，又使我四萬萬人之奇辱永印入全球人士之腦中。嗟彼洋員彰吾國恥，言之痛心」。<sup>156</sup>鴉片煙具成為展覽會場裡，外人最好奇有趣的東西。陳琪發現在展場教育院中，竟擺出聖路易警察局繳獲的中國鴉片煙具，陳琪一問才知是從中國某華人街搜出，當場「令人愧汗雨集」，相較於西方國家在教育院都陳設「實學經濟賽品」，「我國獨無之」，最後慨嘆，「無以步文明之後塵也，可勝嘆哉」。<sup>157</sup>顯然，鴉片、小腳等惡習醜物對當時大部份中國人的自尊而言是敏感的議題，特別是透過他人眼光，一種博覽會的全球視框來看，更放大中國的腐敗，深化國人的恥感意識。羞恥已普遍化為社會情緒和國家體面的重要問題，這是恥感的社會化和國家化。正因如此，十九世紀末的改革運動在亡國滅種憂患意識主導下，以及視覺突顯的恥感意識下，帶動民族主義熱潮，促成國家的改革、救亡行動。

上述現象可說是聖路易博覽會帶來的效應。長期待在中國，從事海關工作的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也寫下類似的觀察，他認為中國參加聖路易博覽會引發留學生激憤和強烈抗議行動，形成「一種新國家意識的群眾表現」，這種表現「就是遏止鴉片吸食的惡習」。他認為過去中國的禁煙運動，都是起於皇帝意志，由少數官員所支持，難以獲得廣大民眾熱情支持，如今「學生們覺得這種惡習，乃是使自己國家在國際間落入低等地位的一種惡習」，亦即鴉片讓中國在國際間出乖露醜，步入羞恥難堪的處境，因此「現在學生開始處理這個問題，青年中國要將它的意志強加在老朽中國身上」。這形成由下發起，具普遍社會共識和認同基礎的反鴉片運動，也讓國家政策獲得強烈民意支持，得以在廣大群眾基礎上推行禁煙運動，「學生運動遍及全國，於是政府在人民前所未有擁護的展望下，採取

---

<sup>156</sup> 張繼業，〈記散魯伊斯博覽會中國入賽情形〉，《東方雜誌》，2卷，9期(1905)。

<sup>157</sup> 陳琪、陳輝德，《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轉引自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91)。

了行動」。<sup>158</sup>這也是本論文第二章處理的羞恥意識的社會化，讓官方的反鴉片消費品味取得主導權，原先視鴉片為時尚體面的社會品味，也轉為視鴉片為羞恥/國恥的社會品味，官方品味與社會品味合一，共同視鴉片為國族公敵，中國救亡之路的障礙。

鴉片成為外人觀視的焦點，小腳也不例外，成為獵奇窺視對象。聖路易博覽會 專門為參觀者準備的遊戲園中，出現一名侍茶的中國小腳婦女。這位中國婦女與來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亞巨人，非洲侏儒以及愛斯基摩人安排在一處，供遊客觀賞獵奇。在隨後展覽中，主辦方又在中國館展出一組人物雕像，這組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鴉片煙鬼、小腳女人等，似乎成為中國文化象徵，激起與會國人強烈不滿，消息傳回國內，也引起軒然大波。<sup>159</sup>在當地留學生多方向美方交涉下，最後迫使美商撤去這一陋俗展覽。<sup>160</sup>鴉片、小腳顯然在西方異國情調或獵奇蒐趣的視線下，成為觀視、把玩的對象，也是一種殖民帝國以優位姿態，觀看野蠻、落後人種的人類學視線，這反映在萬國博覽會出現的人種展或殖民地展。博覽會世紀正是帝國主義擴張與現代化技術起飛的世紀，在這此脈絡下博覽會成為帝國主義展示殖民地建設成就，彰顯帝國擴張力量，誇示帝國治理能力的舞臺。將殖民地人種或其它落後種族拉到會場展示，或建造一個殖民村落將其圈置於內，供人品頭論足的觀賞。這些人種的體型特徵和生活習慣、服飾穿著成為視覺解剖的對象，一種是人類學、博物學式的眼光；一種是帶著觀看奇禽異獸、觀看馬戲表演的眼光。這時的中國像是櫥窗裡的商品、知識研究的客體、醫療診治的病體，成為視線掃瞄、分析、歸類、評斷的對象，正好見證帝國強權下，中國國勢的頹圯萎弱，聽任各式視線宰割。

事實上，這種人種展示在博覽會之前就出現在歐洲，最著名的就是「何騰托人(the Hottentot Venus)的維納斯」。何騰托人，非洲的黑色民族。由於何騰托女性特異的性器官結構—肥大的性器官和臀部，引起白人男性的奇想。他們認為這類黑人女性的性器官比白種女人發達，表示她們擁有原始的性慾、淫蕩的身體、像是低級的娼妓、低等的動物，如同猩猩猿類一樣，甚至說這些黑女人與猿交媾。這些說法有醫學上的背書，當時的醫師維瑞(J.J. Virey)和庫維爾(Georges Cuvier)提出了黑人女性性器發達與性慾強烈相關的醫學論述，也坐實了黑人女性低賤淫蕩，對白人具威脅性的說法。1810 年一位何騰托婦女薩特杰·巴特曼(Saartjie Bارتمان)，也就是人人稱之的「何騰托人的維納斯」被帶往倫敦、巴黎展覽，引

---

<sup>158</sup>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2006: 467~468) (初版 1918)。

<sup>159</sup> 見楊紅林，《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2011: 192)。

<sup>160</sup> 〈留學美國學生力爭國體〉，《東方雜誌》，1 卷，8 期(1904)。

起騷動爭議。五年後，1815年，25歲的巴特曼死於巴黎。<sup>161</sup>她的屍體被檢驗，庫維爾寫成報告，重點仍在強調她特異的性器官和臀部，與一般正常人不同。薩特杰·巴特曼的性器官和臀部成爲十九世紀黑人女性的主要形象。而黑人女性的性徵也成爲十九世紀醫學對黑人描述的主導論述，設定常態標準（白種女人），將之建構爲病態的客體。於是透過醫學知識的權力，區劃病態/正常標準，對病態對象進行視覺和醫學的解剖。透過身體展覽見證什麼是病態，也就是展示病態和差異，並確認自身的正常，但這過程還帶著看馬戲表演的隱晦視線，就像看侏儒或巨人一樣，獵奇蒐趣。而她死了，屍體透過醫學凝視，化成報告，成爲醫學標本和被討論研究的客體。<sup>162</sup>

「何騰托人的維納斯」，充分反映出當時歐洲人出於對異己、奇特人種的人類學好奇和滿足視覺奇觀樂趣，所進行的人種表演。當時法國這種類似動物園或馬戲團式的人種展演層出不窮，最著名的如德國人Carl Hagenbeck企業化經營的人種秀，結合異國動物和人種展演。他在1907年建立自己的動物園，並置土著村，進行長期的土著表演。他以人種的奇特性和畸怪程度，做爲展出標準，<sup>163</sup>1875年到1932年間，計推出70次以上的人種秀。Hagenbeck的人種秀基本上是娛樂與學術的結合，許多人類學者會到展場觀看和研究這些奇特的展示對象，並做成相關研究報告發表，同時這些學者也會給Hagenbeck人種展示的專業意見。另一個重要的展示場域則是出於學術考量，巴黎近郊的「動物馴化園」。1860年創辦，目的在觀察異土動物對歐洲風土的適應情況，同時園方也將這些動物相關知識推廣到社會大眾。1870年代馴化園出現虧損，園方從當時流行的人種展找到靈感，開始引進土著部落出展。1877年到1893年間引進20種部落人種展示，一直到1912年才停止演出。「動物馴化園」成爲當時法國有關殖民、異土動物和土著人種最主要的展示中心，民眾在這裡可以活生生看到「各式人種標本」，而這裡也成爲相關研究者，研究不同人種的實驗室。<sup>164</sup>

---

<sup>161</sup> 巴特曼遺骸分割成腦、性器官、頭骨、身軀骨架。這些遺骸標本起初置於法國「自然史博物館」，1937年移到改建後的「人類博物館」展示。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於批評聲浪大起，館方決定封存不再公開展示。1994年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後，南非人民要求政府向法國索回巴特曼遺骸，好讓她歸鄉安葬。兩國爭議許久，直到2002年夏天，法國政府以巴特曼遺骸已無科學研究價值爲由，立法將其遺骸歸還南非政府安葬，結束兩國多年來的爭議。見戴麗娟，〈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收錄於李尙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2008：196）。

<sup>162</sup> Sander L. Gilman, "Black Bodies, White Bodies: Toward an Icono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rt,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in Amelia Jones(ed),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er*(2003: 139~140).另可參考戴麗娟，〈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收錄於李尙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2008：191~221）。

<sup>163</sup> Hagenbeck選擇展出人種的標準有三，一是必須有明顯奇特性，可吸引觀眾目光，但又不能怪到觀眾難以接受，不敢觀看；二是外型必須讓西方觀眾感到某種美感和特質；三是人種的畸怪程度。見戴麗娟，〈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收錄於李尙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2008：211）。

<sup>164</sup> 參考戴麗娟，〈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收錄於李尙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2008：211~214）。

上述這些展示機制，不管是出於娛樂或學術考量，都說明了西方人對東方民族或黑色民族的身體既存在一份好奇和異想，也視為一種異己、畸怪、落後和病態的身體，因為與西方身體的視覺美感標準不一樣，往往被視為異常。萬國博覽會的人種展，無非就是另一種「何騰托人的維納斯」的表現，在這人種展示空間，白人用高尚、文明、優雅、常態、獵奇、的視線掃瞄這些低劣、野蠻、粗鄙、病態的其它人種。透過這種西方/帝國的視覺霸權，正好合理化侵略性的帝國殖民事業，這些正是白種人要去拯救、教導、啓蒙的對象，是白種人的負擔，也是義務。萬國博覽會首次出現人種展示，是 1867 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中展示中國的巨人與侏儒。<sup>165</sup>最後又發展為以殖民地為專題的展覽會，最早是 1886 年英國舉辦的印度殖民地博覽會、1906 和 1922 年法國馬賽殖民地博覽會、1914 年荷蘭舉辦的爪哇殖民地博覽會，規模最大的 1931 年法國巴黎國際殖民地博覽會。日本也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後，一躍而為殖民帝國，開始在其國內博覽會展示殖民地風情與人種特色，多次舉辦拓殖博覽會，1912 年東京拓殖博覽會、1913 大阪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1930 年名古屋拓殖博覽會以及 1936 年樺太拓殖博覽會。<sup>166</sup>頻繁的人種展，在在顯示帝國強權透過展示人種，展示帝國的用心，這些人種成為帝國視覺暴力的受害者，殖民征服者勝利的印記。

中國被視為像野蠻民族一樣的被置於白人/帝國主義凝視下展示，聖路易博覽會不是首次，早在前一年 1903 年日本舉辦的第五屆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就傳出展場將由東京大學人類學家坪井正五郎策劃設置人類館，預定將展出支那人和北海道愛努人、台灣生番、琉球、印度、爪哇、朝鮮等七種人種，鴉片吸食者也是人種展示項目。這是日本第一次舉辦人種展，甲午戰爭後日本仍籠罩在勝利的榮光中，為了誇示富強進步，<sup>167</sup>將台灣納入殖民版圖的新帝國主義力量，<sup>168</sup>特別仿效 1867 年法國巴黎博覽會的作法，蒐集落後野蠻民族，將其置於公共展示空間接受帝國主義的視線暴力。<sup>169</sup>吉見俊哉認為這次人種展的設計，「與巴黎萬博或美國各博覽會中的原住民聚落一樣，是歧視主義視線的機制」。<sup>170</sup>松田京子

---

<sup>165</sup> 從 1867 年到 1986 年止，在 57 次的萬國博覽會中，共有 67 處殖民地人民被安置在博覽會中供人觀賞。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2005: 115)。

<sup>166</sup> 見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49~51)。

<sup>167</sup> 博覽會的主旨提到，「帝國已以其英武震驚世界，居五強之列，占高等地位，軍事上已無遜於一等之國，生產亦足可與世界競爭」，見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209)。

<sup>168</sup> 展示台灣的用意，「風俗文化產業之真實相貌展示於內外人，以圖謀所轄地區之各種發展」，見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209)。

<sup>169</sup> 關於這次博覽會的史料可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晚清中國參加日本大阪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2005 卷，4 期(2005: 17~29)；相關研究可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2005: 113~151)；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07~161)。

<sup>170</sup> 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209)。



則認為以人類學研究的名義進行人種展示是，「展現對於它國人種歧視的一種知識暴力行爲」。<sup>171</sup>人種展就是人種差別歧視的展現，既是視覺暴力也是知識暴力。這次事件讓留學生強烈感受到遭收羞辱和歧視，他們認為人種展就是要將支那人打入野蠻人行列，與那些野蠻民族並列，這是對文化大國的莫大羞辱。特別是甲午一役中國敗戰，舉國上下仍無法接受敗給茸爾小國的恥辱，日人此舉無異是對中國極盡羞辱，吸食鴉片的真人秀更是讓中國顏面掃地，任人踐踏。

留學生乃透過當地商人以及外交管道向日方抗議，要求停止展出支那人的計劃。國內報紙輿論也聲援學生，憤慨聲浪四起。1903年2月11日，《國民新聞》，「發起設立人類館於會場正門外……雇蝦夷、台灣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種人於館內，演固有特性及生息之雇度階（生活階段），並其惡風蠻習等，以供觀覽」。<sup>172</sup>中國除了與其它蠻族並列，還要表演惡風蠻習，供人觀賞。如此令人憤怒之事，同日刊出的《新聞叢報》有所反應，一篇評論〈日人欺我太甚〉提到，日人以中國的惡俗，冠我野蠻之名，真是辱我太甚，「乃將地球上各野蠻人種，各雇一人，置會場中，以備觀覽云……乃日人竟擬於其中置一中國人，撫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以代表我全國。嗚呼，其辱我實甚矣……日人以野蠻之名加我，不足責也，顧我遂甘受此野蠻之徽號乎」。<sup>173</sup>留日學生發表的一篇文章，〈嗚呼支那人！嗚呼支那人〉，更激烈抗議與世界最卑之人種同列，「若爪哇、蝦夷、台灣之生番，世界最卑之人種……吾支那人雖賤，何至與此六種人駢首並足耶……是明明生番我而野蠻我也。抑吾觀日本各處遍設動物水產各館。今又有人類館之設，是明明以動物目我水族目我也」。<sup>174</sup>中國像是被豢養在水族箱供觀賞的魚，降為非人位階，所以是生番、蠻族。雖然抗議日人歧視我，野蠻我，然而從上面的話語，顯然中國也帶著強烈的歧視眼光看待其它民族，正因中國也有帝國歧視，所以才更不能接受與這些最卑之人種同列。

從上述報導，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有著被野蠻化、被蠻夷化、大國崩潰的焦慮，特別是中國的惡風蠻習在1903年3月9日《大公報》的報導中，我們知道指的正是鴉片和小腳，「而中國之吃洋煙、裹雙足種種苦狀，亦與於野蠻之列」，<sup>175</sup>隔天大公報對此事的評論，矛頭不再指向日本而是中國本身，「吾不禁為中國人羞、

---

<sup>171</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13)。

<sup>172</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18)。

<sup>173</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21)。

<sup>174</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23)。

<sup>175</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28)。

爲中國人憐，爲中國人嘆惜痛恨而不能自己……此事吾不敢爲日本咎，而亦不必爲日本咎。人必自侮，然而人侮，我中國人先自有取侮之道，而後人乃從而侮之……夫吸食鴉片爲中國人之一大病，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然決意痛戒者，曾有幾人」。<sup>176</sup>同樣的基調 3 月 20 日《大公報》，「然約計我通國中人不知羞不知痛而猶安之若素者，殆不啻十之八九……日本雖將此舉廢止，而中國人野蠻之名已早飛騰於大地之上，固不必俟萬國得見其刻畫情狀，始足爲中國人羞也，即其既舉而復廢，我中國人即已掛名於野蠻之簿刻，銜於野蠻之班」。<sup>177</sup>從憤慨的指責日本作爲不當，到反身自我譴責，自我坐實野蠻之名，這樣的轉折正好反映中國在清末時期普遍存在的自我屈辱、自我貶抑的情結。

中國的野蠻情結，更準確的說是自我野蠻化的情結，在此顯露無疑。爲什麼遭羞辱，是因爲我們不知羞，所以更讓我們羞愧，這是魯迅遭遇的心理情境，也成爲當時國人的心境。留日學生反應激烈，正跟當時的魯迅一樣，觀看他人觀看自己的恥辱，而更覺恥辱。也因此恥感深化爲社會內在意識，成爲社會敏感神經，動輒引爆，隨時撩起，自責、自咎成爲情緒的可能出路。事件之後兩年，1905 年，這兩樁視覺的恥辱，成爲禁纏足的事例，提醒國人戒除國恥之物，不要成爲令人髮指的展示品，「去年日本(大阪)博覽會中，以中國小腳女子當爐，又以小腳女子列入人類館，今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又以中國小腳鞋列入陳設品，於各國眾目昭彰之地，而顯此奇醜，實堪髮指」。<sup>178</sup>

事實上，這起人類館展示事件的原始計劃書，並沒有像中國報紙刊登的出現「惡風蠻習」、「摭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等字眼，也未提要展示中國的鴉片鬼和小腳婦人，原文只說，「將最近的異種人即北海道愛奴……等七種土人聘僱到內地，以展示他們固有生活的階級、程度、人情、風俗等爲目的，令大眾觀覽各國相異的居住模型、裝扮、器具、動作、游藝及人類等等」。<sup>179</sup>爲什麼會有上述字眼產生，進而引發強烈不滿情緒發酵？楊瑞松的研究指出，就是因爲中國有「野蠻情結」，既鄙夷野蠻人，卻又懷疑自己成爲他人眼中野蠻人的恐慌心態。<sup>180</sup>這導致當日人將中國與其它人種擺在一起，就引起中國被野蠻化、被羞辱的焦慮，於是理所當然的將中國曾經遭受過的歧視或羞辱經驗拉回當下，覺

---

<sup>176</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爲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33~134)。

<sup>177</sup> 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爲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35)。

<sup>178</sup> 1905 年 1 月 14 日，《警鐘日報》。

<sup>179</sup> 1903 年 1 月 14 日，大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意趣書》，中文翻譯楊瑞松，轉引自轉引自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爲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20)。

<sup>180</sup>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爲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2010: 114)。

得這回也一樣，必然會遭到日人不公平的待遇。楊瑞松認為這事件新聞報導不盡忠實，過度渲染，導致中國反應激烈，問題在於中國怕被視為野蠻的「野蠻情結」所致。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人種展出本身已建立起一套既定的視框—帝國殖民/人類學式/獵奇窺視，觀看者已被訓練用什麼視線對待他的客體，被看者也知道自已會暴露在什麼目光下，甚至配合演出，如吉見俊哉指出，「這些被展示者……逐漸察知博覽會觀眾期待自己表演什麼，因而學習到配合這種期待的演技」。<sup>181</sup>一旦進入展示框架，一方面啓動帝國殖民的視覺認知，另一方面也將相應啓動恥感的視覺認知，也就形成遭受帝國殖民觀看的恥感。

中國對這次事件的過度反應或許源於此，兩種視覺認知的對峙，帝國殖民長期對中國鴉片身體、小腳等進行身體恥辱化的視覺建構，使得中國的恥感視覺認知意識到這次人種展也必然落入國體的恥辱化建構，因此不需明言，即掉入這一對峙框架裡。這種對峙已結構化爲日常生活行動和社會深層意識，亦即羞恥意識的社會化，恥感的高度敏銳化。這或許是「野蠻情結」的根源，一觸即發的社會敏感神經，大阪人類館、聖路易博覽會事件，輿論強烈反應，民族情緒高張，就是最好的說明，同時更顯現在自我屈辱、自我貶抑、自我野蠻化、自我病夫化、<sup>182</sup>自我東方化的負面式反挫行動。這也爲什麼人類館事件的輿論，最後導向自身的不知恥才讓人羞辱的自我歸咎上。清末以降的國恥論述、國恥歷史書寫，<sup>183</sup>也充分說明恥辱如何成爲國族重大問題和救亡的內在動力之一。

人類館事件最後在中國抗議下，雖然取消展出支那人的計劃，但如同所說「中國野蠻之名早已飛騰於大地之上」，「已掛名於野蠻之簿刻」。確實，中國面臨大阪人類館事件自我野蠻化的強烈反應，其來有自，它是長期恥感結構的後果，因爲中國的鴉片、小腳在萬國博覽會展示，不是從此開始，它早已行之有年，成爲外人辦展必備的戲碼，只是以往國人的反應未若大阪博覽會和聖路易博覽會這般強烈。例如，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就已出現鴉片吸食和小腳婦女的意象，《紐約時報》記者曾報導「中國館」中的抽鴉片的纏足婦女，「其中一個是瘦瘦的年婦人，厚厚的脂粉掩不住臉上的皺紋；另外兩個是年輕女孩，渾圓而白晰，彷彿上了一層釉彩。她們留著長長的指甲，有著小而拱起的腳，不時對著參觀人群品頭論足，並抽著香煙或鴉片來打發時間」。<sup>184</sup>中國自己也送這些國恥之物參展，

---

<sup>181</sup> 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184)。

<sup>182</sup> 東亞病夫之稱，原是中國的恥辱，然而清末人士往往將病夫一詞冠在自己上，經常以病夫自我嘲諷，自我批判，就像自我屈辱一樣，是一種自我病夫化的負面表述。東亞病夫與民族恥辱建構研究，可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3期(2005: 1~44)。

<sup>183</sup> 如孫鑫源，《國恥鑑》(1915)(上海：文明書局)；殷汝驪，《亡國鑑》(1915)(上海：泰東書局)；公民救國團編，《國恥痛史》(1919)；黃毅，《中國恥辱記》(1917)(國民書社)；沈文濬，《增訂國恥小史》(1925)(上海：中國圖書公司)；蔣恭晟，《國恥史》(1929)(中華書局)等書

<sup>184</sup> “The Paris Exhibition”, The New York Times, 20 June, 1867, 轉引自苗延威，〈從視覺科技看

1873 年維也納博覽會，津海關就送出一套代表中國國民特徵和風俗的陶塑，內有戲班、乞丐、送殯人、婦女玩牌、吸食鴉片者等十三尊。這種形象一直在海關經辦的各屆博覽會出現，成為「中國展區的腫瘤」。<sup>185</sup>1880 年，東京博物院的中国展覽廳陳列的都是華人吸食鴉片及破舊篾紙燈籠等生活用品「俱極骯髒」，且俱標識曰「中國物」，致使李筱圃觀後寫下「雖鬼域之見不足較，而其居心已顯然可見，尙足與之論邦交哉」。<sup>186</sup>指出日本透過骯髒破舊、不堪入目的中國物件展示，將中國醜化、污名化，可見其心不良。然而，與其說居心不良，不如說這些物件的意象，早已成為外人對病弱中國的視覺感知。此外，由於纏足婦女在展場被展示，使得中國婦女走在街上成為外人觀覽對象，並遭半開化民族之譏，「猶憶前年(1902)，某國之開博覽會也，以我國纏足女與環球奇形怪狀之野蠻，同列一院，縱人觀覽，見者無不詬病。某使之攜眷出洋也，異族環觀，指為半化」。<sup>187</sup>

1904 年設立香山女學校的〈學約〉特別提到「大阪人類館事件」之恥，強調纏足陋習不可不戒，不僅弱種，也成為騰笑五洲的蠻種，既弱種又蠻種，實令人痛心可恥，「弱種害身，禍難枚舉。野蠻人類，館列大館。騰笑五洲，我寔痛之，我實恥之」。<sup>188</sup>雖然歷經 1903 年、1905 年的輿論沸騰的強力抗議事件，清政府也要求中國參展物品不得出現鴉片煙具等醜陋惡俗之物，然而 1915 年美國舊金山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據屠坤華參觀遊記，<sup>189</sup>仍發現博覽會被外人擺上鴉片吸食者等意象物，「樓下左側為中國地獄，內設香港以前時代華人情形，不外吸鴉片，嗜賭博，役女奴，好私鬥諸種辱國之事」，經干涉，勉強改稱「中國地獄」為「下流社會」，內容還是與前無異，並用電光照射吸食鴉片之蠟製人，以娛觀眾，「這真可謂辱沒國體淨盡矣」。<sup>190</sup>雖然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仍發生這類外人以鴉片展出辱我之事，然而這次博覽會在陳琪籌劃下，卻是歷來最成功的一次，它改變過去參展展品愚昧、落後、令人恥笑的一面，也展現建立新中國後的企圖，「陳列競獎成績，忝列第一，一洗以前賽會外人代辦之恥，在美國亦留一絕好印象」。<sup>191</sup>由於這次送選展品精良，獲獎無數，湔雪過去由洋人代辦展覽所蒙受的恥辱，也提昇中國國際形象。<sup>192</sup>充分說明辦會自主以及妥善規

---

清末纏足〉(2007: 30)。

<sup>185</sup> 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84)。

<sup>186</sup> 李筱圃，《日本紀游》，收錄於羅森等，《早期日本游記五種》(1983: 100)。

<sup>187</sup> 〈廈門天足會約章敘論〉，《萬國公報》，光緒三十年十月號，收錄於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下冊)(1995: 881)。

<sup>188</sup> 〈香山女學校學約〉，《女子世界》，7 期(1904: 72)。

<sup>189</sup> 屠坤華，《萬國博覽會游記》(1916)。

<sup>190</sup> 武育幹，〈近代博覽會事業與中國〉，《東方雜誌》，26 卷，10 號(1929)。

<sup>191</sup> 惲震，《費城賽會觀感錄》(1927)，收錄於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2002: 192)。

<sup>192</sup> 關於這次博覽會的記錄可見陳琪，《中國參與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紀實》(1916)；馮自由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大賽會游記》(1915)。

劃，慎選展品的重要。藉這次機會中國得以在國際舞臺展現視覺性的勝利，而雪恥意識也突顯了民族主義視覺認知，為日後的國內外參展建立起必備的感官認知，形成展覽空間的象徵鬥爭，一場從視覺恥辱到象徵救亡的鬥爭。

中國參與萬國博覽會的歷史，確實是一部辱沒國體的歷史，在全球性、現代性和帝國殖民視線下建構出以鴉片、小腳為主要意象的恥感國體。儘管博覽會的展品不乏中國出色的陶器、瓷器、玉器、木器、石器、漆器、古玩以及茶葉、絲綢、刺繡、傢俱等精品，不少產品參賽還屢獲獎項，或博得讚譽，但仍不如鴉片、小腳更具話題性、爭議性，更吸引外人興趣。而在外交戰事節節敗退，帝國力量分裂國土脈絡下，國恥意識抬頭，個人到國家長期遭受視覺羞辱，也因此訓練出國恥感的視覺認知，對有辱國體之事，特別敏感在意，進而帶動二十世紀初激越昂揚的愛國運動和高漲的民族熱情，也為日後反鴉片運動和蓬勃的國貨展打下心理基儲。而在海關洋員交出辦會權後，國貨展盛行之前，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中國對參與博覽會應有的態度和認識，特別是建立在晚清改革重商主義抬頭的意識形態下，其目的則在建立富裕強盛國家，參展辦展這種視覺行動轉而跟國家建設、民族復興工程結合，成為中國救亡運動的一環，一種視覺化的民族救亡。

### 三、賽會興商：開明耳目的國富之道

從海關洋員把持博覽會，污辱國格，未能達到參展經貿交流目的，到各方反應、抗議，收回承辦權，這過程不只反映國恥在當時已成為有識之士，甚至一般大眾深銘不滅的烙印，所以對海關將鴉片煙具、纏足弓鞋展示於國際，憤慨不已，激起輿論強列撻伐。同時，也看到清末官、紳、商對博覽會勸工興商之功能、目的已有深刻認知，如清政府商部首任部長戴振（1903年日本大阪勸業博覽會代表）、第二任部長溥倫（1904年聖路易博覽會代表）、端方、張之洞、袁世凱、鄭觀應、陳熾、張騫、陳琪等人不只重視，大部人士都參與推動。特別是在甲午戰敗後，提振工商業為清末新政重點，光緒諭旨：「通商惠工，為古今經國之要政。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亟應變通盡利，加意講求……」。<sup>193</sup>重商成為國家政策，商戰更成為富國強兵的必要之道，博覽會也成為振興實業的重要途徑。1903年報紙一篇文章即指出，「以商戰勝他國全在此舉」。<sup>194</sup>中國參與博覽會的歷程，已從賽珍、炫奇階段，走到交流、商戰階段。<sup>195</sup>如當時吉林將軍長順即上書視博覽會為「商戰」要地，只有開門應戰，參與博覽會，才有勝算，他說，「今與列國開門通市競爭雄富，號為商戰

---

<sup>193</sup> 《清朝續文獻通考》（301卷），轉引自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155）。

<sup>194</sup> 〈記大阪博覽會事〉，《中外日報》，1903年4月25日，轉引自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159）。

<sup>195</sup>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思與言》，24卷，3期（1986: 249~266）。

之時，人皆開通，我獨自守，斷無能勝之理，今日舉辦賽會實為當務之急」。<sup>196</sup>戴振從日本大阪勸業博覽會參訪回來後，鼓勵商人多參加博覽會，因為「賽會意在萃全球之產物，權百貨之盈虛，因以聯絡邦交，擴充商務，其意至為深遠」。<sup>197</sup>過去政府較強調外交邦誼功能，這時候已是邦交和商務並列。劉楨麟則提出博覽會的八大功能，「聯交誼、擴物產、獎人才、察商情、廣貿易、增關稅、興商地、除積習」，他還特別提出，「中國不興商務則已，中國而興商務必自賽會始」。<sup>198</sup>最後商務目的已成為首要考量，鄭觀應則提道，中國商務不振，致民力竭、國帑空，要富強就要辦會才能興商務，「比年以來，中國之商務衰矣，民力竭矣，國帑空矣，事事不如人，事事受制於人……本有致富致強之道，而自暴自棄，不見不聞……故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sup>199</sup>

而當清末，進化論之說傳入，競爭才能進化，進化才能生存的觀念已植人心，1904年一篇文章提出，「競爭者進化之母。我國工商業無競爭故無進化也」。<sup>200</sup>博覽會正是萬國商品、技藝競進改良之地。1905年清商部頒布〈出洋賽會通行簡章〉，並下旨要求各省赴會參賽，以收薈萃觀摩，改良競進之效：「振興實業為國家富強要政，迭經諭令各直省督撫實力提倡，並簡派大臣前赴各國賽會，藉以開通商智，為改良競進之圖。我國地大物博，誠非薈萃觀摩，不足以造精進」。<sup>201</sup>1910年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投資創辦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也呼籲中國要立足於世界，參與萬國博覽會是可行的第一步，「處此時世，吾中國欲廁足於世界，不可不以賽會為之先導」，因為賽會有助於促銷商品，促進經貿交流，同時有助軍事、交通、教育的提振，是中國富強之道，「今日為商戰世界，夫人知之，吾國商民徒為本國之貿易，而不知為外國之貿易，故商業日漸其衰，正宜因勢趁便，羅列百產，以與各國相見，苟有一物為西人所樂購，則銷路既闢……富國之道宜莫若此事之為亟矣。且賽會不僅為振興商務已也，若武備、若交通、若教育、凡有關係之物，無不可以與會」。<sup>202</sup>

---

<sup>196</sup> 《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02-20-1-1，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收吉林將軍長順文，轉引自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轉引自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2006：37）。

<sup>197</sup> 《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02-20-1-1，〈日本公使照請中國赴大阪第五次勸業博覽會案〉，轉引自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期（1997：304）。

<sup>198</sup> 劉楨麟，〈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卷十三，轉引自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84）。

<sup>199</sup> 鄭觀應，〈賽會〉，夏東元編，《鄭觀應集》（1982）。

<sup>200</sup> 《東方雜誌》，11期，轉引自沈原，〈中西文化的交融與碰撞：記晚清政府派員參加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歷史檔案》，2006年，第4期（2006：76）。

<sup>201</sup> 〈諭旨〉，孫多森編，《南洋勸業會直隸出品類纂合編》（1911），轉引自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156）。

<sup>202</sup> 張元濟，〈中國出洋賽會預備辦法議〉，《張元濟詩文》，收錄於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附錄七）（2009：466）。

維新派人士陳熾特別指出日本仿倣西方博覽會，致國強民富，「泰西博覽之會，五載十載，輒一舉行，商務振興，不宜餘力。日本亦仿立農桑、工藝諸會，講明而切究之，國勢日強，民生日富」。<sup>203</sup>康有為也提到日本在國內舉辦勸業博覽會，是變法項目之一，有助於推出優良產品，「日本之變法也，開商法公議所，商法學校，帝國勸業博覽會，萃全國物產人工，比較而賞拔之」。<sup>204</sup>這時期已有人提出，參觀博覽會不是浮泛的看熱鬧、看表面，而要看到商展的實質，能比較、評鑑，才具參加的資格，「然亦有自該會參觀歸，惟侈談建築之宏麗，游覽之娛樂，而於陳賽品部，毫不加察者，此無他，無參觀之學識及資格故也」。<sup>205</sup>由此可知，當時參展可能已成普遍現象或風潮，許多人參加只是娛樂眼目或湊熱鬧而已，未有實際的體會和收獲。另一方面也說明有心之士對博覽會已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和掌握。其中的關鍵在於已掌握展覽會是以視覺為主導的活動，「以耳目代心思」、「開明耳目」，因此如何安排視線，透過視線睿發心思、開通智慧，促進商流成為展覽重點，「博覽云者，互徵參觀，以耳目代心思之用」，<sup>206</sup>「賽會一事，實擴充商務之本源，所以睿發心思，開明耳目，使商人之智慧日增，而商貨之流通必日廣者，胥是道也」。<sup>207</sup>這種對視線、觀看重要性的認知和理解，參與1873年維也納博覽會的日本即有深刻體認，當時負責博覽會事務執行作的工部大臣佐野常民就認為博覽會有「眼目之教」之功，許多人之所以會產生感動，大都是透過眼視而來，借重「眼視之力」可開啓民智，換句話說眼視跟啓智有關，觀看與視線具啓蒙之功。他說，「博覽會之宗旨，乃是透過眼目之教，開啓眾人之智巧技藝。凡觸動人心之事物，所能產生感動認識者，皆多從眼視之力所由來……開啓人智，推進工藝之最捷徑最便利之方，即在此眼目之教也」。<sup>208</sup>

佐野常民雖指涉觀看萬國博覽會可以打開全球視野和想像，但對中國而言，啓蒙進步與眼視之力確實關係密切，因此「眼目之教」不只對一心脫亞入歐，已逐步靠攏西方現代化的日本重要，對正要進入現代性以救亡圖存的中國更不可忽略。中國對展覽會有「開明耳目」的認識雖晚了日本「眼目之教」的體認一、二十年，但歷經萬國博覽會外人眼視的恥笑，如何強化眼視之力，以開啓現代性視野，有能力與他國進行眼視之戰，即象徵性的視覺戰爭，則成為日後辦會的重點。上述「互徵參觀，以耳目代心思」、「睿發心思，開明耳目」的說法，既是正確的

---

<sup>203</sup> 陳熾，〈賽會〉，趙樹貴、曹麗雅編，《陳熾集》(1997)。

<sup>204</sup> 張濤光編，《康南海經濟科技文選》(1994: 13)。

<sup>205</sup> 〈對於籌備巴拿馬賽會之意見〉，《東方雜誌》，10卷，1號，轉引自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2006: 58~59)。

<sup>206</sup> 陳熾，〈賽會〉，趙樹貴、曹麗雅編，《陳熾集》(1997)。

<sup>207</sup> 〈博物開會說〉，《皇朝經世文新編》，收錄於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附錄六)(2009: 463)。

<sup>208</sup> 佐野常民，1875年《奧國博覽會報告書》，見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2010: 115)。

認知也是行動的準則，中國正式進入展覽會時代，透過展覽會一方面促進商業發展，富國強民，「群知求國之富強必在工商之發達，而欲求工商之發達則必自設立賽會始」；<sup>209</sup>另一方面借展覽會展示國家富強，這是重商主義的視覺展現，也是清末以降富強運動的視覺化歷程，一種視覺化的國富之道。接下來蓬勃發展的國貨運動正在這樣的認知和基礎上，進行洗雪民族恥辱的視覺救亡運動。

#### 四、國貨展出：象徵性的視覺救亡

在清末重商新政引導下，中國參與博覽會促進工商繁盛意圖已相當明顯，進入 20 世紀，中國已像陳熾、康有為所說的日本一樣，國內商品博覽會興盛，各省競開賽會，賽會熱潮不退，到了推廣國貨運動期間，更是蓬勃發展，大會小會不斷，<sup>210</sup>對中國商品經濟和現代化推動更是一大助力。更重要的是，中國仿佛進入一個新的視覺奇觀時代，一個商品視覺化的展覽世紀，也是現代性視覺化的世紀，更是透過民族化的視線安排和呈現，展現洗雪國恥，重振民族尊嚴的決心。因此，這是一個以視線為中心/中介，將重商意識型態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的國族復興策略。相對於之前，西方以視覺建構中國恥感的身體，到透過萬國博覽會建構恥感的國體，二十世紀中國境內大小展覽會，則是建構一個去鴉片化、去國恥、自我重振的雪恥景觀。在這國貨建構的民族化展示空間裡，不再有任何跟鴉片、小腳等國恥象徵相關的物件，有的是最新製造出的各式工、商產品，說明著中國現代化的進步程度，以及民族經濟的活絡暢達。因此，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境內的商品展、國貨展與過去的參展萬國博覽會最大差別在於，一者是去鴉片化景觀，雪恥建國；另一者是建構鴉片化景觀，羞辱國體。前者有雪恥復國的強烈目的意識，並做為國家凝聚共識，塑造認同，激發愛國心，展現國家政治統一、經濟建設成就的手段；後者大部份被動參與，未能準確掌握博覽會特性效用，往往被用來醜陋化、污名化中國的愚弱，中國國體、國格受辱於世人眼前。

接著，我們進入這段從恥感的視覺認知轉到以民族主義視覺認知為主導，建構雪恥國貨景觀的象徵性視覺救亡歷程。自 1905 年開始，為了抗議美國「排華法案」發起的抵制美貨運動，到三十年代的積極推廣國貨運動，<sup>211</sup>一方面為了

---

<sup>209</sup> 〈論派員至美賽會之宜慎〉，《中外日報》1903 年 8 月 9 日，轉引自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149)。

<sup>210</sup> 據統計 1910~1930 間舉辦國貨展計：1914，8 次；1915，3 次；1917，3 次；1920，4 次；1921，1 次；1922，4 次；1923，1 次；1924，1 次；1925，1 次；1926，4 次；1928，4 次；1929，10 次；1930，11 次；1933，13 次；1934，14 次，總計 82 次。海外舉辦的國貨展計 10 次。見喬兆紅，《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2009: 383~384)。

<sup>211</sup> 一般認為國貨運動源於 1905 年的抵制美貨運動，當時中國政府為了抗議華人在美國受到歧視、虐待、限制、排擠等種種不平等待遇，特別是 1882 年通過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更成為抗議焦點。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總商會召開會議議決，美國政府如不在兩個月內改善對中國的移民政策，將發起抵制美國運動，7 月 20 日美國無回應，正式展開全面抵制運動，



振興民族工業，收回利權（採礦權、鐵路許可權、關稅自主權等），洗雪不平等條約恥辱；另一方面，透過限制外國商品入口，強化本國商品優勢，以提昇本國工商業的成長，特別是當時社會崇洋之心瀰漫，愛用洋貨成爲一時風尚，對本國產業不無影響。國貨運動將商品、消費與民族主義聯結起來，透過消費商品，實踐民族主義，這構成了消費的民族化，而國貨展無疑是以商品爲中介的民族意識視覺化，愛國心的奇觀化，葛凱(Karl Gerth)稱之爲「民族主義商品奇觀」(nationalistic commodity spectacles)，「民族主義的商品展覽會」。<sup>212</sup>透過民族化的展覽空間，展現抵抗帝國主義的決心和行動力，展覽會仿佛成爲愛(用)國(貨)意識的製造廠，參與國貨的展出和消費成爲一種擁有經濟自主權和抗拒帝國強權的表達。在這樣的視覺空間裡，讓「國貨運動參與者清楚看到自己捲入一場雪恥的運動中」。<sup>213</sup>中國百年屈辱，在琳琅滿目的國貨陳列中，仿佛消弭於無形。中國總算擁有屬於自己的產品，也擁有完整的自我和自信，過去一貫自我貶抑、自我屈辱的情節，在與國貨交會視線時，不復存在，仿佛進入一個自我神聖化的情境裡。

下面幾個展覽會的成功說明了上述現象。最重要的展覽如 1910 年 6 月 5 日南京舉辦爲期六個月的「南洋勸業會」。<sup>214</sup>這個由兩江總督端方主導，陳琪策劃經辦的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其規模之大，內容之豐，<sup>215</sup>謂爲前所未有，有人喻爲「誠足植中國博覽會之基礎」。<sup>216</sup>其重要性也引來日本實業團參觀，並於會後評說，「清國工業現已進入工業革命時期，由手工業、家庭工業逐漸向工廠機械工業發展」。<sup>217</sup>稱說這時期的中國已進入工業時期，未免過譽而不實，不

---

上海的「英美煙草公司」(The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成爲主要攻擊目標。當時喊出口號，「不使用美貨，不吸美煙」。抵制美貨運動逐漸向其它地區蔓延開來，也揭開日後一連串的抵抗運動。如 1919 年五四運動後的全民抵制日貨運動，以及爲抗議 1925 年五卅慘案的抵制英日貨運動。最後從抵制外國貨的運動轉而爲推廣國貨的運動。相關研究見黃賢強(Sin-Kiong Wong)，《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2010)；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葉文心(Wen-Hsin Yeh)，《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2010: 99~104)；高家龍(Sherman Cochran)，《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2001: 63~84)；潘君祥編，《中國近代國貨運動》(1996)。

<sup>212</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09)。

<sup>213</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16)。

<sup>214</sup> 以下相關討論參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103~129)。

<sup>215</sup> 開列展館 30 餘所；展品來廣泛，種類繁多，計分 24 部，420 類，10 餘萬件。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112~113)。

<sup>216</sup> 〈南洋勸業會開幕記〉，《申報》，1910 年 6 月 7 日。

<sup>217</sup> 見野澤豐，〈辛亥革命與產業問題：1910 年的南洋勸業會與日美實業團的訪華〉，收錄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1983)

過南洋勸業會確實展出不少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工業產品，既看到清末政府推動新政的努力，也初步見證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成果。正如一位歷史學者指出，南洋勸業會是「滿清皇室所做最後，也最大的努力，向外國列強和越來越多的國內批評者證明傳統的領導方式是有能力使國家實現現代化的」。<sup>218</sup>再者，勸業會另有目的在於，「振興實業，尤當以抵制洋貨為當務之急」，<sup>219</sup>呼應了當時「發揚國產，提倡國貨」的行動，並落實「實業救國」的想法。

再就展覽會最主要的商品陳列和展示功能而言，南洋勸業會無疑已做到對商品合理分類、有效安排，系統陳列、動線清楚，觀覽便捷等辦展的基本要求，也顯示對現代化展覽會目的、功能有清楚的瞭解和掌握。在這次展覽會編的《觀會指南》裡，即提到展場的陳列規劃原則，「世界愈進步，則出品之分類及陳列益趨於專門。每經過一次，則各商店、公司之陳列裝飾等法，亦必進步一次」，在商品分類上，「第一則宜便於觀者，其二則合於學理。至於櫥台裝飾，採光配色，均宜先加研究焉」。<sup>220</sup>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徵諸國外博覽會，如美國芝加哥博覽會、聖路易博覽會，「凡經博覽會閉會以後，該地方每因之發達」。南洋勸業會會後，南京城市基本建設如電燈、電話，旅館、鐵路等，也都有明顯的改善與提昇，「僅一周年，遂成繁盛之區，足徵進步之速」。<sup>221</sup>南洋勸業會奠立中國商品展覽會基礎，也為日後的國貨運動設下可資遵行的模式。

至於 1929 年 6 月 6 日舉辦的「西湖博覽會」，則是中國第一次以博覽會命名的展覽會，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賽會。<sup>222</sup>西湖博覽會誕生於振興實業以及國貨運動的熱潮中，同時也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的重要建設，浙江省府主席張靜江主辦這次展覽，視為浙江省的重大建設，張本人曾參加萬國博覽會對博覽會有深刻認知，視博覽會為中國農工商建設，也是實現總理實業計劃的重要推力，「博覽會是發展農工商業的推動機，是改進農工商業的踏足石。中國的農工商業，如果做到把總理的實業計劃全部實現，博覽會就非二次三次以至十百次的繼續開不可」。<sup>223</sup>因此在萬國博覽會深遠影響下，以及振興民族工業，推展國家經濟建設目的下，成就這次西湖博覽會。再者，這次博覽會還有個特色即是大量運用廣告

---

<sup>218</sup> Michael R. Godley, "Chinas' s World' s Fair of 1910: Lessons from a Forgotten Event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12, No.3(1978: 504).

<sup>219</sup> 景學鈴，〈上南洋第一次勸業會書〉，《東方雜誌》，第 7 年，9 期(1910)。

<sup>220</sup> 〈勸業會說略〉，南洋勸業會編，《觀會指南》(1910: 105)，轉引自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2006: 48)。

<sup>221</sup> 何葆鼎，《南洋勸業會展覽記》(1911: 1)，轉引自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123)。

<sup>222</sup> 歷時 128 天，8 館 2 所 3 個陳列室，展品 147604 件，參觀人次近 1800 萬，實際參觀人數約 200 萬人。資料來源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277)。

<sup>223</sup> 《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轉引自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185)。

做為宣傳，各式各樣的廣告技術，無不齊用。<sup>224</sup>這說明視覺意象和符號在當時已純熟的運用在日常物事的展現/宣傳上，成為生活不可或缺一部份。西湖博覽會的成功，說明現代性的視線已被訓練培養出，大眾視線有能力參與現代性商品制度。同時就像其它萬國博覽會展現強盛國家力量一樣，證明新中國正在起步中，正逐步實踐國家經濟建設計劃。這是省主席張靜江，也國民政府肇建新國家的企圖。透過最直接、最具穿透力、感染力的視覺型式，一方面展現新政府的績效和企圖心，另一方面宣揚實業救國，愛用國貨，以維護民族工業的意識型態。

早於西湖博覽會展出的前一年，做為「民族主義商品奇觀」(nationalistic commodity spectacles)<sup>225</sup>的國貨展，就曾成功的展出。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開幕，歷時64天的「中華國貨展覽會」，收集24省展品一萬多件，參觀人數約130萬人。<sup>226</sup>這一「國貨運動努力建立民族化空間和景觀的里程碑」<sup>227</sup>的展覽會，出席開幕包括新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財政部長宋子文和工商部長孔祥熙等要員。可以看出這場國貨展受到新政府重視，也負有它的使命，亦即透過國貨展宣示國家統一和經濟統一的目標，其時北伐成功在即，但國家仍處分裂狀態，不平等條約仍未廢除，中國各項利權操之在人，透過國貨展覽，激盪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操，以凝聚國家認同意識和抵抗帝國主義決心，成為當下的政治建設，國民革命的目標。因此，國貨展覽會自南京政府成立已來，即成為政府建設重點，1930年國民黨第二屆中常會正式決議將提倡國貨運動，做為基層黨部必須進行的項目之一，國民黨認為，「國貨運動是扶危救亡的唯一途徑」，「國貨運動為最明顯有力的抵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前鋒」，「國貨運動是打倒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最大武力」。<sup>228</sup>國貨運動和國貨展的目標和功能相當清楚，「中華國貨展覽會」無疑就是這一目標的實踐，蔣介石在展覽會開幕式的發言，也很清楚的指出辦會的最終目的，「上海工商部開了一個國貨展覽會，國民政府是要提倡國貨，要振興實業，要挽回利權，使外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大家都用國貨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要外國人不來欺侮，只有同心一致，共同來製國貨，買國貨，用國貨，這樣經濟才能獨立……這就是國民革命的目標」。<sup>229</sup>工商部長孔祥熙在開幕時也提到，「能用國貨卻是愛國心的一種表現」，而且愛國消費將減少對外貿

---

<sup>224</sup> 包括廣告塔、電燈牌子廣告、屋頂電燈廣告、廣告場柱之三角形廣告、傳燈片廣告、燈旗廣告、負販游傳游行廣告、日刊廣告、幻燈片廣告、影片廣告、廣播廣告舞台戲幕廣告、門票廣告等。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185~186)。

<sup>225</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09)。

<sup>226</sup> 見謝輝、林芳，《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2009: 276)。

<sup>227</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51)。

<sup>228</sup> 〈提倡國貨運動〉，1930年2月2日，《中央日報》，見付海晏，〈跑調的國貨展覽會：1935年無錫國貨流動展覽會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2008: 32)。

<sup>229</sup> 見《申報》，1928年11月2日。

易逆差，有助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sup>230</sup>

因此重振民族精神、尋回國家主權、恢復國格尊嚴，以及振興實業，挽回利權，這些目的結合，透過視覺化展示，構作出民族國家形象化的視覺認知，「這種形象化的中心內容是訓練眼睛來識別視覺線索，並且通過社會生活去分辨外國與本國之間的區別。試圖建構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則是整個運動的一部份」。<sup>231</sup>一旦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建立，即可形成「視覺邊界」，<sup>232</sup>用來區別並保持我族與他族之間的差異，同時也強化自身的民族意識。當參觀者進入到民族化的展示空間，即被規訓出民族化視覺認知，亦即被訓練以民族性的眼光看待物品，並啟動國、洋貨的區辨意識，知道通過消費那些國貨，來證明自己的民族意識，確認自身的認同位置，同時也可輕易透過視覺裁決，抓出誰不用國貨，誰不愛國。因此，展覽會被建構成爲一場盛大的民族景觀，所有的物品、物品陳列方式、物與物安排的規則，構成一套意義體系，觀看者和觀看者間，觀看者和物品間，彼此穿梭交會進行一場視線的象徵交換。

班雅明在討論世界博覽會時曾提到，「世界博覽會美化了商品的交換價值。他們創造了一個使商品的使用價值退居幕後的局面」。<sup>233</sup>也就是在展覽會上商品突出的是它的市場交換價值，或成爲一種價格交易，而不重視商品具體的實質效用如何。而在中國國貨展上，商品交換價值反而不是主要重點，商品背後的象徵價值，透過觀看者與代表中國的「國貨」進行視線的象徵交換，交換出民族自信心和愛國意識，才是重點。葛凱亦指出，「歐美的商品展覽會主要被看做是商品慶典，這種展覽會剝除了商品的個體特性，轉而提倡商品的普遍性的交換價值。與此相反的是，國貨展覽會是中國民族商品的慶典，它使民族主義視覺認知制度化」。<sup>234</sup>事實上，這種視覺認知正構成上述的象徵性行動。前段提到的「用國貨打倒帝國主義」，就像是一場象徵鬥爭，國貨成爲象徵物品，在展場的注視和購買的象徵行動中既確認中國的國際地位，也確認自身的認同，同時也獲得象徵性的勝利。

商業與救國、建國、民族復興結合，而其最好的宣導工具就是展覽會。在商品奇觀裡，激發愛國心，建立國族意識型態，視覺成爲國家治理工具，這也說明

---

<sup>230</sup> 見《申報》，1928年11月2日。

<sup>231</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9~10)。

<sup>232</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79)。

<sup>233</sup>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2002: 270)。

<sup>234</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12)。

爲什麼這段期間商品、國貨展層出不窮，一方面是促進商品經濟活絡，另一方面則是消費成爲民族主義實踐的場域。消費國貨既可促進實業，又可振興民族主義。國貨展做爲一種民族主義商品奇觀，成爲另一種以視覺爲主的中國救亡現代性。因爲國貨、洋貨之爭攸關中國經濟獨立和國家存亡，蔣介石指出，「就是外國人拿了經濟的力量來壓迫我們中國，來滅亡國，如果中國人大家再用洋貨，大家去提倡洋貨，我們中國人不用外國人拿槍炮來打我們，再十年後我們個人都要餓死的」。<sup>235</sup>南洋勸業會、中華國貨展、西湖博覽會的成功，看到了中國生機旺盛一面，視覺奇觀仿佛重振民族信心和國家尊嚴，過去西方人的視覺促成中國建構出恥感的身體，清末以國恥之物參加萬國博覽會，在全世界眼前則呈現恥感的國體。中國身體、國體在西方/全球的文明/進步的視覺秩序下，成爲病態、不正常狀態，這種觀視角度以及相應的污名、貶抑的話語、修辭，讓中國經受到強烈的恥辱感。

然而，二十世紀初中國國內的商品展、國貨展，卻透過視覺讓中國活起來，在民族化的視覺空間裡，讓國人都覺得中國統一、經濟獨立、帝國主義消滅在望。在國貨陳列中，建構出雪恥復國、榮耀民族的景觀。蔣介石在中華國貨展開幕詞講了這一段話，充分反映這樣的心境，「兄弟從生下來到現在四十二歲，從來沒有這樣光榮的一天，所以今天開國貨展覽會，如果是我們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最光榮的日子，各位應當曉得，今天到國貨展覽會來，不是來看好看的，也不是來趕熱鬧……我們今天來開會是一種很光榮的事」。<sup>236</sup>進入國貨展讓人覺得光榮，讓國家民族覺得光彩，這像是自我神聖化的殿堂，在視線的交會中，自我崇高、自我偉大。從鴉片、小腳到自製的國貨，從畫片/影片、萬國博覽會到國內商品展的視覺場域，這是一段從羞恥到雪恥，從自我屈辱到自我神聖化的視覺歷程，也是一段視覺化的國族榮衰史。展覽會已從商品展售提昇到救亡圖存層次，就像中華國貨展開幕前報上的評論，「這是商業和工業救亡圖存的一件要事」，<sup>237</sup>同時也是對抗帝國主義，整個國族救亡圖存的大事。

現代性的商品展覽形式已移植中國，視覺成爲推動現代化進步的工具，正如班雅明所說，「世界博覽會建立了商品的天下……將商品特性傳播到世界……使全世界現代化」。<sup>238</sup>商品博覽會讓世界現代化，中國進入博覽會這個視覺較量、競爭的空間，不管消極或積極，都被迫捲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商品體系，同時也在展覽會繽紛的世界各國意象中定了位。同樣的中國國內的商品展、國貨展，除了展現中國國力重振、民族認同、救亡圖存的決心，也讓整個中國進入一

---

<sup>235</sup> 見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256)。

<sup>236</sup> 見《申報》，1928年11月2日。

<sup>237</sup> 見《申報》，1928年8月5日。

<sup>238</sup>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2002: 271)。

個現代性商品和消費空間。透過不斷出新的工業產品、消費商品進入人們的視域，人們不斷在新事物、新意象的觀看中，經歷驚異新奇的現代性體驗和世界感。這是一個視覺民族化的空間，也是現代性視覺空間。參觀者被訓練出民族主義視線的同時，也具有現代性的視線；同時具有民族想像以及世界想像。當進入商品展示世界裡，不管是區辨國貨、洋貨，或觀覽世界各地商品，都存在民族以及現代性的雙重視線，這也正是中國在西方博覽會以及現代性視覺技術崛起世紀，所歷經的民族主義和視覺現代性救亡的歷程。透過視覺建構恥感，視覺啓蒙，進而訓練民族主義視覺認知，投入視覺化民族行動，成爲中國救亡圖存的另一種方式。

萬國博覽對中國而言仿佛具有恥感和現代性兼具的雙重作用，在現代性眼光下遭受羞辱，也在羞辱的視線下接受現代性的啓蒙。這是魯迅和萬國博覽會會場外留學生的例子，也是中國啓蒙覺醒的例子。這種恥辱與現代性兼具的特性，或者說是恥辱促動中國現代性發展，似乎已成爲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特色。這種現象，葉文心在上海現代性的研究中也指出，上海「既代表了中國的恥辱，又代表了中國的世界現代性」，<sup>239</sup>葛凱也認爲，「進口貨同時代表了恥辱感和現代性」，<sup>240</sup>而進口貨、洋貨不只是一種時尚，更是中國得以想像現代性，經歷現代性經驗的物質。事實上，在國貨展裡有許多是洋貨，只是出自於中國製造而已。

#### 第四節 視覺管治：抓出鴉片身體

##### 一、進入常態視覺秩序

---

<sup>239</sup> Yeh, Wen-Hsin, "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 *China Quarterly* 150(1997: 421).

<sup>240</sup> 葛凱(Karl Gerth),《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2007: 62)。

聖路易博覽會是鴉片進入全球和現代性的重要視覺事件，它引起的強烈恥感效應，正好與當時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熱潮匯流，強化了救亡圖存的意志和行動力，同時這事件之後也改變中國參展態度和籌辦方式，為日後商品國貨展等視覺化民族行動開啓契機。除了透過展覽會展現中國，或刻板化中國外，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以吸食鴉片為主體的手繪圖片、照片、影片，也可以從奏議、小說、新聞報導、洋人在華見聞、反毒文宣等資料中讀到關於鴉片身體的視覺性敘述。這些視覺性敘述的基調，一如前文討論的鴉片身體意象，不脫「活屍」、「活死人」等病態意象。然而弔詭的是當鴉片吸食或器物透過公開展覽成為一種觀看的對象，就不再是一種愉悅、幻覺、漂浮、時空感喪失等難以言喻的藥癮感官經驗，它將抽象的不可見性，轉化為一種視覺化奇觀，具體的可見性。亦即，鴉片吸食做為一種藥癮行為，可能是一種過度(excess)或極限(limit)的感官體驗，一種出神(ecstasy)或沉醉的美學(aesthetics of intoxication)感受。然而，這類感官經驗甚至在五感之外，其間（如人造天堂般）況味難以具像化，或許也可以說它很難是寫實主義得以捕捉的範圍，也就是難以視覺化這種複雜的品味感受。

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和布魯克斯(Peter Brooks)都指出攝影視覺和寫實主義的關係。<sup>241</sup>布魯克斯表示，主導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傳統堅持將視覺作為人與世界間的主要聯繫，因為寫實主義邏輯的前題就是：不可能在人們周圍的東西所構成的背景之外來理解它們，要認識這些東西就是要去觀察它們，詳述它們，在寫實主義裡認識就是觀看，表現就是描述。<sup>242</sup>Trocchi描繪鴉片是一種相當中性(netural)的藥物，它給予使用者的不是令人愉快的放鬆感，而是一種存有的強烈出神狀態，它可以讓任何事情暫時中止，但又可反覆不斷的插入，使人維持一種流動狀態。<sup>243</sup>雖盡其可能捕捉吸食的感覺，但其敘述基本上仍相當抽象，要觀看或視察出神沉醉狀態有其困難和不可能，即便癮君子的告白敘述再傳神也未必如攝像般寫真。其問題在於如果以身體的感官經驗而言，吸食鴉片的感官經驗如何得以品味/辨識，它不可能落在視覺感官品味裡，而最能讓我們覺察到的是吸食後的身體行為。也就是我們難以從鴉片吸食的抽象感覺察知，最直接方式就是觀看鴉片身體的表現如何。因此，判定鴉片吸食，是視覺行動。也正是這種侷限下的觀看行為，又落在特殊歷史時空脈絡下糾葛著國族命脈、常態秩序、醫療知識、現代化進程的觀看政體中，形成一種視覺習性，一種視覺的社會定義，定義這種身體病體又病國，破壞一切正常秩序，進而在寫實主義的筆觸下構作出醜態/病態的鴉片身體，進行視覺的管治(police)和裁判。

---

<sup>241</sup> 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何謂寫實主義中的真實？〉，收錄於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I：帝國—亞洲—主體性》(2006: 21~37)；布魯克斯(Peter Brooks)，《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慾望對象》(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2005)。

<sup>242</sup> 布魯克斯(Peter Brooks)，《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慾望對象》(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2005: 106)。

<sup>243</sup> Sadie Plant, *Writing on Drugs*(1999: 160).

每個時代、社會都有其常態化的視覺秩序，違犯視覺秩序的意象，必然受到污名、譴責，甚或入罪。觀察下面現象：穿洞帶環的身體，赤裸光溜的身體，醉酒歪斜的身體，甚至煙榻上橫陳如屍的鴉片鬼身體，我們的反應是什麼？正常的反應是視為一具具不道德、不健全、醜陋危險、令人羞恥、驚世駭俗、了無生氣的身體，需被矯正、監管和排除。這正是我們透過觀看將這類身體視為醜怪/病態/不正常/無秩序/反常規，一種反社會的邪惡它物，並進行視覺化的裁決或入罪。鴉片在歐洲和中國都構成一項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經濟問題、風俗問題，在中國還承擔遠較上面更複雜的國家命運、種族命脈、文明崩解、帝國殖民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各種圖像和敘述文類中都化約成醜怪病態的符號，如同前文提到的哥德式的陰森書寫，活死人般的意象展現。鴉片身體正是這種視覺的醜態構作，使得鴉片的吸食成爲一種可見性的問題，視覺化問題性，容易被識別、捕捉、定義和裁判。而西方又透過鴉片建構一個病態中國/東方，使中國/東方成爲可見的問題，成爲一個極需被西方開發、啓蒙、教導的落後、未開化國度。

確實，視覺召喚出的斜倒不正、頹靡萎弱的鴉片身體，基本上對反了以規則、穩定、平衡、明亮爲基準的常態視覺秩序和價值。例如敘述文字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骨瘦脂枯」、「四肢蜷縮，骨節皆僵」，<sup>244</sup>久食則「肩聳項縮，顏色枯羸」、癮至則「涕淚交橫，手足萎頓」、「呵欠大作」。<sup>245</sup>圖像效果如上所述。這些意象對反了做爲一個健康人、勞動人的正常意象，而成爲一種病態、病夫身體。個人之病則可能構成社會之病，成爲社會的不正常和偏差。再者不健康的身體表示無法勞動生產，不只資本主義生產經濟需要健康有效率的勞動身體，農業經濟的國家更需要強健有力的勞動身體。然而吸食鴉片不只是身體毀損，意志力消磨，也是時間的耗費，這種體衰閒怠違反了勞動生產的價值觀和人類的生存邏輯。張昌甲在〈煙話〉中指出爲了吸食鴉片可以連錢都不愛，「可知食之愛，不如錢之愛，錢之愛，不如煙之愛。是故煙鬼興而錢神就此無權矣」，<sup>246</sup>吸食鴉片讓一切都無所作為，破壞了正常運作秩序。1906年清政府推動新政特頒禁煙諭旨，其中提到鴉片流毒造成「廢時、失業、病身、敗家，數十年來日形貧弱」，<sup>247</sup>1908年重申禁煙上諭，「染斯疾者破其財產，夭其壽命，習爲偷惰，職業全廢……盜賊訟獄因此茲繁……神州古國種類日弱……」。<sup>248</sup>從廢時、偷惰、失業、病身、敗家這些字眼可看到背後一套關於健康、工作、家庭、社會、國家價值的運作，鴉片身體的病態和閒怠意象正是做爲這種常態價值的反價值，反世界/反社會的

---

<sup>244</sup> 張昌甲，〈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1224，1226）

<sup>245</sup> 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296）。

<sup>246</sup> 張昌甲，〈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1222）。

<sup>247</sup> 朱壽朋編，《光緒朝華錄》（第五冊）（1958：5570）。

<sup>248</sup> 1908年3月23日，《申報》。



邪惡它物，不健康的它者。法國詩人兼電影導演，也是鴉片吸食者的考克多(Jean Cocteau)指出，由於鴉片具去社會化，讓我們遠離社群的功能。社群乃對此展開報復，因此對鴉片癮者的迫害基本是一種社會對抗反社會姿態的本能防衛。<sup>249</sup>從社會聯帶的角度來看，鴉片吸食者進入沉醉境界，仿佛進入出神共同體，這一吸食者自成的共同體，脫離於真實的社會共同體，成爲一種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中的不真實，這種不真實的出神存在方式，顯然讓社會運作失效，社會聯帶斷裂。社會無法運作，有機聯帶斷裂，如同社會機體的崩解。正是如此，藥癮者的出神行爲成爲反社會行爲，這是常態社會所不允許，也內化爲視覺秩序，出神沉醉的身體行爲，首先遭到視覺的察知和裁判。

## 二、出神於社會內/外：鴉片身體的另一種可能或不可管治

確實，如果從上述所提的常態價值爲判準，鴉片身體呈顯病態的一面，它構成去社會、反社會、讓社會運作失靈、社會機體瓦解的負面效應，這也爲什麼鴉片讓中國國家機體失能、崩潰，宛如遭癌細胞侵蝕。然而，如果從魏晉名士的服用五石散文化來看，病態也可能是一種美學凝視。魏晉的五石散可能是中國最早「公開服用藥物」的文化。<sup>250</sup>做爲一種藥癮文化，鴉片的遭遇確實有別於魏晉的服藥文化。魏晉文士服用的五石散，亦名寒食散，<sup>251</sup>蔚爲當時文人時尚。<sup>252</sup>其藥性的發作也塑造出魏晉人士通脫瀟灑、俊逸風流的名士形象。五石散出於漢代，魏何晏開啓服藥風氣，造成流行，引來文士模仿效法，「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sup>253</sup>與同時期的王弼、夏侯玄成爲服藥的祖師。竹林七賢的稽康更是代表人物，「稽康……常修養性服食（服藥）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sup>254</sup>五石散在當時不僅未遭排斥還是文人名士稱頌仿效的時尚。這可從《世說新語》、《晉書》、《高士傳》、《太平廣記》等書的記載看到五石散的服用狀態和盛行。這裡引發一些問題，魏晉服藥曾是時代風尚，名士文化，可以頌揚，相互標榜。鴉片卻是另一番待遇，一種壓抑、不可歌頌、儘管可能形成一個時代的生活文化或物質文明，卻是抑鬱低迴，無法明言。這或許說明鴉片的病

---

<sup>249</sup> Sadie Plant, *Writing on Drugs*(1999: 164).

<sup>250</sup> Keith McMahon, *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Opium 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2: 114).

<sup>251</sup> 五石散由五種藥物，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所構成。傳出自漢代張仲景《侯氏黑散方》、《紫石寒食散方》，當世使用者少，直到何晏服用首獲神效，才大行於世。隋巢元方《詩病源候論》卷六〈寒食散發論候〉篇記載：「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言華佗，或曰仲景，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晏死之後，服者彌繁，于時不輟」。五石散主要用來去寒補虛、治傷寒虛勞之症。也有做春藥、壯陽藥使用。

<sup>252</sup> 五石散直到隋唐還存在，唐時還有所謂的解散方（《唐書，經籍誌》，〈解寒食散方〉；《新唐書，藝文誌》，〈解寒食方〉），表示仍有人食用。唐以後就少見人吃，或許毒性強，害處多之故。參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錄於《而已集》（1989: 130~132）。

<sup>253</sup> 《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秦丞相寒食論

<sup>254</sup> 見《晉書，稽康傳》。

態修辭和禁制論述的形成，如何構造服藥傳統的不同生活際遇和文化風格。亦即，鴉片身體既違逆視覺秩序，也違犯常態秩序，即便一度成為社會風尚，最後卻是恥辱的表徵，鴉片對國族興亡的威脅，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然而，回過頭來看看魏晉服藥型塑出什麼樣的文化景觀？或者問魏晉名士形象究竟跟服藥有何干係。我們對魏晉名士不脫輕裘緩帶，寬衣薄裳，不鞋而屐，不洗不浴，捫虱而談，甚至居喪無禮的高雅俊逸，通脫不羈的意象。有趣的是這些特殊的表現並非魏晉諸君才情性格的體現，而更可能是服藥後的藥性反應。魯迅的文章點出這一現象，因為服食五石散後身體發高熱，皮膚容易磨損，所以只能穿寬大衣服和散步藉以散熱，謂之「散發」和「行散」；為避免皮破，也只能著屐不著鞋；同時更不能常洗澡換衣，因此身上多長虱子，傳為美事的「捫虱而談」，<sup>255</sup>不過是不浴生虱，不耐發癢的反應，因此所謂名士風流卻可能是服藥後的生理現象。<sup>256</sup>

這是有趣的說法，如果屬實，在此也不是用來戳破一個時代的名士風範或文化景觀，而更想指出的是如果服食五石散可以建構出如許的魏晉文化風格，鴉片的吸食必然也能造就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生活，但我們面臨到的問題是不是鴉片構作出什麼文化或生活風格，而是這樣的文化或生活風格能以不經符碼化或烙印化的面貌浮現嗎？衡諸鴉片的遭遇，顯然不那麼單純。五石散和鴉片真正反映出的不是兩者因物質性或藥性之不同（如五石散燥熱亢進，鴉片沉鬱奄奄），各自開展出什麼文化，而是歷史和社會如何對待和處理這種服藥文化，正是這種對待和處理造就出相對應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樣態，以及服藥文化的為何可能、如何可能。五石散在魏晉特有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條件下，成為文士美談，鴉片吸食也有它一套儀式文化、器物文明，但卻有截然不同的對待方式。例如，我們看橫躺煙榻的照片，為什麼會解釋成像活屍一樣的「僵臥吸食」，而不是一種自足、靜默、沉醉的美，看到不是一種勃興而是荒怠，不是力量而是無能。

視覺中心支配顯然在此起了相當作用，由於照片中的鴉片吸食者大多是無個性、匿名的無權力者，鴉片更是沉默諳啞者，它們都需要代言，也就是社會定義。國族論述/殖民論述/醫療論述/常態論述構成觀看政體的一環，構成一種視框定義，乃以視覺意象奪取了代言權成為社會秩序的界定者。因此，視覺或攝影成為將個體建構為社會對象的方式，它不只是簡單關於身體的論述，而是有關特定身體與社會之間權力關係的論述。透過觀看將身體危機與社會危機聯結起來。事實上，如果不從視覺秩序和常態秩序觀點看待，鴉片吸食的感官經驗複雜，它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效應，「其氣芬芳，其味清甜」、「夢境迷離，神魂馳宕，真極樂世

---

<sup>255</sup> 這說的是王猛拜見桓溫時，邊談天下大事，邊抓虱子的故事，「桓溫入關，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見《晉書，王猛傳》。

<sup>256</sup> 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錄於《而已集》（1989）。

界也」，<sup>257</sup>既是嗅覺、味覺，也一種脫離現世出神忘我的感覺。這種忘我就像是傅科透過服用毒品追求快感和極限經驗時的效果，將主體從其自身中連根拔除，以致使他自己不再是他自身，並達到對他自身的自我虛無化和自我解體，這是一種徹底的去主體化的事業。透過沉醉出神抗拒身體、抗拒主體，以這種方式脫離社會體制力量的捕捉。吸食鴉片或許有這層作用，它可能構成一種力量、甚至是一種崇高的美感。

就此而言，我們又如何能透過表象的視覺化斷定鴉片身體的偏常就是病態與邪惡，如同德·昆西所說，體弱疾病和悲慘不幸並不意味著是一種罪惡。<sup>258</sup>病態不是一種罪惡，從德·昆西的例子來看，他算是旁人眼中病態的鴉片癮君子，然而他文學創作的靈感卻不少來自嗜食鴉片後的沉醉狀態。就這個觀點，鴉片即便看做是病態，也可能具有一種美感或崇高的力量，表現在某些方面，如文學藝術創造，就像西方沉醉文學所展現獨特出奇的詭魅經驗和想像；另一方面就中國而言，中國文人吸食鴉片者雖多，卻不像西方將之化為文學藝術創作的力量，至少從資料來看，幾乎難以找到兩者關聯的自述或說法。但徐珂曾指出，吸鴉片可做為文人創作靈感來源，這比徵逐嫖賭要好些，「馬平王定甫通政拯負時名，惟以吸食鴉片為一生之玷，此外尚有……諸人，亦皆博學而有此嗜好。或云學者終日伏案，疲勞以甚，假此小憩，可臥而搆腹稿也，較之嫖賭徵逐，固勝一籌」。<sup>259</sup>

中國文人的吸食鴉片可能具有某些無以言諭難的性格，例如內捲，自我壓抑的性格，這種內捲、沉鬱的特質也反襯出文明崩解，帝國崩塌，進退無路，無所遁逃的困頓；也可能一種是面對傳統斷裂的自我沉溺，秩序瓦解的自我疏離，或在痛苦失落和異化感中經驗自我的不再，或是面對壓抑的反諷；它也可能是一種解脫，遁走現實世界，在鴉片中隱逸，在沉醉中反出禁制，是困頓無解時局的新解，是面對斷裂劇變、驚奇駭異，在轉瞬即逝經驗中的永恆著迷。史景遷亦指出鴉片提供吸食者類似功能，如讓文人官僚從仕途挫折，從家庭壓力中解放出來；身處異族備感屈辱的漢人則藉此暫躲避等遁世、解脫功能。<sup>260</sup>石約翰(John E.Schrecker)，也認為中國嗜食鴉片，可能在於求得解脫，「我們還無法確切地知道為什麼鴉片如此暢銷……它的最新的風行似乎不僅是因為能夠得到並吸食上癮的事實，可能也由於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鴉片提供了一種解脫的方法」。<sup>261</sup>馬克夢(Keith McMahon)則提出鴉片具顛覆力量的另解，他認為中國人

---

<sup>257</sup> 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sup>258</sup> 見Sadie Plant, *Writing on Drugs*(1999: 32).

<sup>259</sup> 徐珂，〈文人吸鴉片構腹稿〉，《清稗類鈔》（第四冊）（1984: 1609）。

<sup>260</sup> Jonathan Spence,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 Carolyn Grant(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5: 145).

<sup>261</sup> 石約翰(John E.Schrecker)，《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11: 101)。

透過吸食鴉片對抗基督教企圖對中國的改變，並且在西化過程中仍維持做為一個中國人，在改變程中同時維持自身的認同。中國人藉著吸食成癮拒對西方開放，不願接受西方所給的東西。再者，吸食成癮是對紀律的挑戰，讓癮君子更遠離紀律，這種去紀律化就像叛亂、罷工或另類性行為者一樣具挑戰性和去穩定性。<sup>262</sup>顯然馬克夢的解釋，說明了鴉片身體具顛覆和抗拒性的一面。

就這此而言，雖然視覺構作出醜態/病態的鴉片身體，但我們同樣可以思考這是鴉片身體逆對前者的醜/病態演作(performance)，展演出一個醜/病態的視覺景觀，以身體的偏常和主體的出神拒絕於體制，以自身死亡的意象宣告拒絕進入社會，以虛構的自我或多重自我的生產擺脫自我的界線化和僵硬化，藉此擺脫國族/社會/個人命定的宰制。法國作家馬侯(Andre Malraux)在《人的命運》(Man's Fate)一書中點出了這種透過沉醉擺脫命運的方法，「人總是有沉醉的需求，中國有鴉片，回教國家有印度大麻，西方世界則有女人.....也許愛才是超越一切，讓西方人擺脫命運的方法」。<sup>263</sup>因此鴉片的力量也許在於這種賦予自我力量對抗社會，擺脫既定宿命的面向上。以病態、醜怪的身體演作抗衡病態的身體構作，以出神抗拒現實。雖然鴉片吸食在病態演作層次上是一種抗拒社會或反社會的行動，但它本身不可否認的也具社會性，一種社交和社會關係的聯結。若從時尚觀點來看，鴉片消費群更是一種追求時尚尋求某種社會納入的共同體。而法國作家 Robert Desnos則更細緻提到鴉片吸食這種心靈合一，出神社會聯結的特徵，「鴉片使橫臥在同一盞燈旁的鴉片煙客心靈合而為一。沐浴在濃烈氣氛中，重聚於鋪滿厚重墊褥的床上，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抵抗的真正連結」。<sup>264</sup>

當然，鴉片在中國是否具這些作用，並非不能，只是不多見，我們仍可以從一些詩詞稍稍看到這些面向。張昌甲〈煙話〉一文的題辭，有這麼一首陳笙華的詩〈調寄沁園春〉，「一榻橫陳。大好煙霞，色香味聲。看看星星微火，剔開餘燄，喁喁細語，暢敘幽情.....嘆百年幻景，浮生若夢，九州高臥，酣睡難醒。解脫何須，沉迷亦得.....得此中三昧，行樂人生」。詩意清曉，寓意至明，作者將自身寄託芙蓉煙霞（鴉片），在迷霧中細語幽情，在沉醉中忘卻浮生亂世，百年江山，九州功業，在煙榻橫陳中忘懷。何須談解脫，沉迷不醒就可，這才是行樂人生。吸食鴉片在此起了藉著一榻橫陳，逃逸繁俗的功能。〈煙話〉的另一首題詩，孫凡民〈調寄滿庭芳〉，「別有乾坤，了無掛礙，晨昏一榻橫陳，睡鄉滋味，讓盡箇

---

<sup>262</sup> Keith McMahon, *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Opium 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2: 175~185).

<sup>263</sup> 轉引自霍奇森(Barbara Hodgson),《鴉片：黑色迷霧中的極樂天堂》(Opium: A Portrait of the Heavenly Demon)(2005: 82)。

<sup>264</sup> 轉引自霍奇森(Barbara Hodgson),《鴉片：黑色迷霧中的極樂天堂》(Opium: A Portrait of the Heavenly Demon)(2005: 85)

中人。多少蓬萊舊侶，偶失足都覓煙雲」。<sup>265</sup>在這裡，煙雲世界成了讓人了無掛心，在蒙昧沉醉中，拋去俗世繁憂的新天地。多少宏勳偉業，霸業王圖；多少滄桑遺恨，積憤沉哀，盡付一槍煙霞。這些詩作無疑透露出作者沉重濃郁的國家感和時代感，以及希冀藉鴉片脫離真實，以進入出神國度的心意。透過床榻橫陳的病態身姿，展演了不願介入社會、時局的寓意。或許，我們可以看做是鴉片身體逃逸、遁世的演作。這種演作多少帶點反叛、抗拒意圖，時而透出幾許壯美崇高精神，相對於鴉片身體的病態視覺構作，成爲另一種不可管治的身體可能，或是不可管治的另類身體。

然而，是否還有這類意圖性出神的表述或演作，不管是遁世或抗拒，就現有資料還難以印證。例如吸食鴉片最著名的文士代表王韜、嚴復，他們都是開明改革派，推動西化的舵手，特別是嚴復還撰文抨擊鴉片有害民力，有礙變法，「故中國禮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而孰知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窳，胥於此焉階之厲耶？是鴉片、纏足二事，不早爲之所，則言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sup>266</sup>兩人的私密日記、書信都沒有更進一步的交待染此惡習的心理需求，我們也不知道他們一方面疾呼禁吸鴉片，一方面又沉溺在鴉片的矛盾情結如何？王韜在日記中，記載不少他跟朋友吸鴉片的事實，但是並未交待他爲什麼有此習性，以及對他有什麼影響。我們看到的是吸鴉片在當時是一件相當尋常之事，特別是成爲交游的社交物品。「飯罷，往樂茗軒小啜……在茶寮中候邱伯深不至。三牌樓有片介（鴉片）小室，甚爲精雅，閩齋與余往吸三管，骨節通靈矣」（1858年10月24日），「上燈時，閩齋來，同往吳氏小室吸片介二管，欹枕對談，其趣殊永」（1858年10月25日），「梁閩齋來舍，同往萬福樓小飲……又往勾欄訪豔，鴉母芷芳特設片介」（1858年11月8日），「酒罷，往訪愛卿校書，吸片介三管，覺肺腑通暢」（1858年11月27日），「飯罷，同往訪豔……鴉母供片介，坐良久而別」（1860年3月5日）。<sup>267</sup>

從上面幾則日記，可窺知王韜抽鴉片的場合大都跟朋友餐聚、小飲後的消閒，地點包括茶館、酒樓、妓院、朋友居處，這類餘暇逸樂已成爲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場景。王韜煙癮重不重，看不出，但抽煙次數頻繁可從日記中得知。王韜不知道抽鴉片的不良後果，顯然清楚，我們看他一則日記，「酒後，同閩齋詣吳氏小室調吸鴉片介，兩管之後，骨即通靈。此物多嗜，則耗精血，結爲症瘡，偶一爲之，亦可驅睡魔，消宿食，利氣解悶，未始不益人也」（1858年9月28日）。王韜知道嗜吸成癮必耗精血，鑄成大害，但偶一爲之有許多好處，提神、順氣、助消化、筋骨靈活，所以自我提醒一番，繼續他跟朋友同吸同樂日子。另一則「鴉

---

<sup>265</sup> 兩首詩俱見張昌甲，〈煙話·題辭〉，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 1218）。

<sup>266</sup> 嚴復，〈原強〉，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30~31）。

<sup>267</sup> 王韜，《王韜日記》，（1987: 22；23；34；46；141）。

片之害，近日愈烈，勢不能禁。一徵其稅，則其價必昂，小民之吸食或寡耳」。由於鴉片為害愈烈，所以王韜也贊成徵稅提高煙價，讓人民少抽些。不止於此，抽煙稅還可以籌軍餉，對財政不無幫助，「今日徵取此稅，亦可以稍贖軍餉」(1858年10月20日)。<sup>268</sup>從上面，我們約莫可以推知王韜和他這般文士抽鴉片的態度。小抽既無傷大雅，也無大害，而且抽鴉片不只閒適自娛，更是社會交往的潤滑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他們批判、反對的大概是那些重吸成癮，不可自拔的吸食者。所以他們邊吸，也可以邊反對。王韜這種矛盾的行徑，究竟如何形成，知名王韜研究者柯文(Paul A. Cohen)認為，王韜的酗酒，嫖妓及最終鴉片成癮，跟他個人心理壓力有關。這些壓力包括仕途不順，才華不受重視，家遭鉅變，孤身一人所致。<sup>269</sup>然而真是如嗎？王韜沒留下什麼線索，我們只能就他的遭遇進行臆測。

至於嚴復，則在他的家書提到他吸鴉片習慣，治病療痛是他吸食原因。嚴復吸鴉片時間約在1880年代末到1920年間。在他寫給妻子的書信中，經常提到有吃藥膏(鴉片)療病，若有不足，即請他妻子寄來。以下幾則1907~1909年間的記錄，「吾因感寒，夜間患咳，吸煙更甚，有似去年」，「藥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間多筋跳，睡不著」，「藥膏吃已過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減少.....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劑.....」，「藥膏本日已盡，而新熬者尚未寄來，不知需受苦幾日」，「一半由肺氣不舒，晨間喉中作響如前，須吐痰食膏藥後始差」，「早起大解三五遍不等，藥膏只須兩頓，臨睡因腿跳，常不得已而用嗎啡針」。<sup>270</sup>顯然，嚴復鴉片吃的很重，隨時需要，不可或缺，甚至還要打嗎啡。一直到死前一年，1919年才因病入院，在醫師協助下戒掉鴉片。嚴復對自己吸鴉片行為曾經懊悔，並勸人不可接觸。1919年1月4日給他朋友的信提到，「但以年老之人，鴉片不復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睡藥尚不能睡。嗟夫！可謂苦矣！恨早不知此物危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語一切世間男女少壯人，鴉片切不可近」。<sup>271</sup>

嚴復以年老之軀，要戒掉鴉片也很痛苦，身體難以承受，因此懊悔當年不知鴉片之害而深陷其中。這是嚴復吸食鴉片近三十年的感言，但我們還是難以窺知他吸食的心理歷程和矛盾轉折為何。探究嚴復一生思想的史華茲(Benjamin

---

<sup>268</sup> 王韜，《王韜日記》，(1987: 12；22)。

<sup>269</sup> 見柯文(Paul A. Cohen)，《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2006: 55)。這裡要注意的是，柯文提到的才華不受重視、家遭鉅變的時間點在1880後，但從上引吸鴉片日記時間1858年，其時王韜當時的困境是科考不順，第一任妻子剛逝，蟄居上海在墨海書館工作，對西方已有接觸和初步認識，但尚未推動西化工作。王韜早年即吸鴉片，是心理壓力造成，還是一時風尚，染此嗜好，仍不得知。

<sup>270</sup> 見王棊編，《嚴復集》(1986: 739~747)，轉引自王汎森，〈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收錄於黃克武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2002: 112~113)。

<sup>271</sup> 見王棊編，《嚴復集》(1986: 704)，轉引自王汎森，〈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收錄於黃克武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2002: 115)。

Schwartz) ,對他爲什麼染上他眼中這種亡種惡習,也留下一個大問號,「這種沉溺究竟是基於國家的困境和個人事業坎坷的鬱悶情緒的反映,抑或是他私生活的其它方面或個性的反映,我們將永不得知」,也就是嚴復有可能跟王韜一樣,因爲科考亦不順,又懷才不遇,在李鴻章麾下不受重用,徒有富強改革想法,卻只能一旁興嘆,爲紓解鬱悶心緒,故而染上煙癮嗎?還是有其它更隱晦的原因?<sup>272</sup> 這個疑問,不得解,不過史華茲認爲嚴復吸鴉片行爲雖隱晦而難以捕捉,但卻保有國家富強的企圖,「在某種意義上說,吸鴉片反映了嚴復思想觀念中最隱秘和最難以捉摸的情調,但在這種情調中,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始終保持著希冀國家富強的積極面」。<sup>273</sup> 史華茲這句話有點曖昧,我們不知道他指的是嚴復的抽鴉片反而讓他投入富強的改革事業嗎?也就是抽鴉片跟富強有關,王汎森對這點提出他的解釋,他認爲嚴復的主要作品都是在鴉片提供身心舒適的情況下寫出來的。而吸鴉片的經驗才讓他深刻的感受到要挽救「中國者,固病夫也」的困難,<sup>274</sup>進而爲文疾呼鴉片害國害種。

儘管柯文、史華茲、王汎森試圖解釋王韜、嚴復這兩位中國思想改革史上指標人物爲什麼吸食鴉片,局勢困頓、心理挫敗、病魔纏身,或許都是致因之一。正如前面討論,爲了逃避、解脫、遁走現實世界,在鴉片中沉醉、隱逸,可能是無所出路困局中,最好的出路。這些因素雖不無可能,但在他們私密的日記書信中都未曾直言,我們無從確知。至於吸鴉片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成爲推動現代化和自強改革的動力,成爲另一種相較於鴉片負面力量的正面力量,則更隱晦、神秘而不可知。這是中國鴉片史上不可解的一部份,現代化知識份子、改變中國思想的思想家、致力推動反毒禁煙活動的舵手,<sup>275</sup>他們的染上煙癮,與他們的救國理想和倡議的言論相乖違,但因爲他們的隱諱不言,或隱晦帶過,仿佛成爲神秘公案,這跟西方鴉片使用者的公開表述,<sup>276</sup>是截然不同的風格。<sup>277</sup>我

---

<sup>272</sup> 王汎森認爲嚴復在 1880 年代末期染上煙癮或許是因爲懷才不遇、考試失敗,加上與妻子鶯娘不睦所致。他的吸食習慣不僅出於心理挫折,也與身體病痛有關,因爲咳嗽、腹瀉、筋跳以及失眠等病症長期困擾著他,讓他不得不依賴鴉片。見王汎森,〈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收錄於黃克武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2002: 115)。

<sup>273</sup> 見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2005: 21)。

<sup>274</sup> 見王汎森,〈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收錄於黃克武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2002: 116)。

<sup>275</sup> 這些人如曾國藩(他的日記曾記載,早年一度吸食鴉片,不過很快就戒除)、張之洞、唐紹儀(曾任國際禁煙會議代表,早年癮重,後來戒除),其他皇室中人如慈禧、慶親王奕劻、戴振等。參見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書信集》(1986: 496~498);徐珂,《清稗類鈔》(第一冊)(1986: 383~384)。

<sup>276</sup> 德·昆西不說,英國詩人柯律治、法國詩人波特萊爾(《人造天堂》)、考克多(《鴉片日記》(Opium: The Diary of a Cure))、英國作家格林(Graham Greene)(《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反映作者的鴉片經驗)等。

<sup>277</sup> 個人認爲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類似德·昆西這類告白式著作,藉著沉醉鴉片自況抒懷,原因可能在於中國雖然有私己性的書信文類傳統,但並沒有類似西方基督教式的告白懺悔傳統,也就

們可以理解他們沉迷鴉片的原因，一時好奇、時尚所趨、治療病痛、紓解心理困境都是，但為什麼沉默不言？有可能鴉片一開始雖然是一種風尚流行，但它也是國家禁制罪責的對象，吸鴉片逐漸從社會時尚轉為一種社會恥辱，它不再體面、光彩，特別在清末還聯結著國恥和亡國滅種意識，更不可能彰揚鴉片妙趣。不管那些早已戒掉或改不掉的，投身禁煙運動、思想改革者或不是，都不太可能拿來稱頌說嘴，只能靜靜無言的做個沉默的鴉片吸食者。鴉片的污名化、恥辱化、罪責化，讓有可能源於鴉片靈思的文學藝術或思想創作，儘管誕生，我們也難以得知。同時這些成癮者吸食鴉片的生命經驗如何，也留給我們一片空白。這是中西鴉片使用經驗的差異，鴉片做為毒品效應之外的可能性和精彩面，在中國付之闕如。事實上不說西方，就在中國，服用五石散跟吸食鴉片的遭遇就截然不同，正如前面討論。

五石散和鴉片因不同的對待和處理有不同的性格開展和歷史際遇，鴉片是否能開啓其它可能面向，釋放積極力量，這根本不是當時國勢凌夷的中國會關注的問題，其中關鍵在於鴉片使用跟國族命脈、種族延續相關，它威脅到社會、政治、經濟、道德秩序的維續和正常運作，甚至成為國族集體的恥辱。在這樣情境下，鴉片長期遭到入罪和禁制，也造就出歷史或大論述下沉默、禁聲、抑鬱的鴉片性格，即便鴉片吸食可能帶來解脫、抗拒、崇高美的力量，由於它的難以識別，或在自我和社會壓抑下，不便言說，我們亦難知是否存在這種力量。顯然，五石散沒有在常態判準的點名下遭到這樣的對待，它既沒有威脅到正常秩序運轉，也沒有複雜糾葛的國家民族意識型態召喚，也沒有鴉片的曖昧矛盾性格，所以有不同於鴉片的待遇。

然而，弔詭的是鴉片吸食根據可能是五感之外的感官經驗，這種感官品味/辨識卻透過一種身體的可見性進行社會性的評判和裁決，吸食鴉片乃成爲一種觀看政體構作下的問題習性和問題品味，亦即透過似人像鬼的病態、醜陋身體意象來界定吸食鴉片是不良的品味和惡習。而開啓鴉片吸食的另一種可能力量，不可能落在視覺感官領域裡，它有可能是其它感官經驗或五感之外的出神經驗，但這些在中國都成爲沉默，難以言說的身體經驗，因爲視覺感官的優位性早已排除、邊緣化其它經驗的出現或現聲，使得我們難以捕捉、接近。這也使得鴉片吸食是否可能演作一個病態、醜態、逃逸的身體，在社會定義的不正常身體下拒絕做爲身體，對正常身體排拒，抗拒主體定位，並以複雜的極限經驗出神於社會內外，自成社群脫逸於國家/社會的框作，形成帝國衰敗，文民崩解無所出路的出路，這樣的演作變得模糊黯淡而不可解。也就是鴉片身體的病/醜態演作，有可能指

---

是沒有具特色的告白文類，因此在文類上中國就不太可能有類似德·昆西、波特萊爾、考克多的告白之作。再者鴉片自來列入禁令，到了後來更是亡國滅種的禍害和恥辱，有可能形成書寫禁忌，自我警醒、設限，可吸而不可寫。另一原因可能是，鴉片吸食已結構化爲日常生活行動，它太平常，平凡無奇到何必要當一樁事寫。這些理由，純然個人推測，目前尚無相關資料支撐這些論調。



涉著鴉片身體作為某種社會抗拒，主體脫位，自我解離的可能。龐大中國鴉片吸食者，有此心緒者想必多有，只是在觀看政體排除下，禁煙論述罪責和污名下，這些說辭和可能性難以出現，要不就選擇靜默不語。至於，出神的極限經驗可能成就文學藝術的表現，在中國鴉片吸食歷史中雖難找到這類經驗的表現，然而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可能的。

### 三、人人皆視覺警察：鴉片身體的視覺管治與裁決

再說回來，鴉片吸食這種夾雜著特定時空脈絡的沉醉、解逸經驗或許帶著病態美感，或許是另一種崇高，但卻只能述說書寫，卻很難透過身體再現，亦即前面曾提到的非視覺所能捕捉，它會造成兩種不同感官品味的扞格，以視覺的優位貶抑藥癮的感受性。沉醉出神，遁走現實世界，代表的另一意含則是不真實、不清醒、不理性，基本上違反了視覺再現的真實原則，乃成為可受指責的詭態。在這個層次上，鴉片身體的萎弱閒怠造成社會機體/社會身體的運作無能，在視覺裁決下，使得鴉片成為一個需被常態管治和排除的問題。這種裁決力量則是透過常態的判準生產和分類操作，以召喚、製造出非於常態的一切物事，俾能將身體、生命、生活納入治理的範圍，同時也展示進而強化統治的力量。回顧歷史每個階段和社會都會塑造出這類做為治理技術操練對象的群類，瘋子、癲瘋病患、陰陽人、歇斯底里症女人、精神病患、殘疾者，甚至無生產力者、社會偏差者都可能納入不正常範圍，鴉片也在特殊的歷史社會脈絡下成為禁制的對象，特別是在鴉片成為國族集體恥辱，病態中國的象徵，在中國救亡運動的大論述下，成為亡國滅種的根源，以及禁煙反毒運動罪責和討伐對象。而這些既不能看，也必須淡出視覺景框的病態意象，卻又經常出現，反向構作或支撐出一套讓它們得以被看、被凝視剖析的視覺/身體政體，透過「可見性」(visibility)突顯這些病態意象和問題，俾於操作和控制。這也就是前面提到在視覺中心主義和觀看政體下身體，如何不斷的遭遇視覺的監看、窺視、掃描、評判。

鴉片身體正是在雪恥建國、振興民族的情境下不斷被突顯出來，外在的凝視和內部的視線，建構出的恥感意識，洗雪身體以至國體的恥辱，成為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必要工作。這意味著對鴉片的管治，除了透過消費政治，還要透過視覺政治，亦即建立一套恥感的視覺認知和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做為視覺裁決的標準，管治身體型態。讓視線所及都是健康、正常，符合國家需要的標準意象。接著，我們會看到在鴉片禁制時期，如何透過視覺裁決鴉片身體。

視覺對身體的管治，我們可以從西方十九世紀末攝影的年代，技術化的視覺如何在特定的社會型構和論述下對各式人群進行分類探索和紀錄中得到見證。亦即，透過攝影建構一套符合既定價值秩序的布爾喬亞身體、打造適合資本主義生

產邏輯的勞動身體以及規訓和管理社會的不正常身體(deviant body)。<sup>278</sup>特別是後者，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指出在維多利亞時代罪犯、妓女、貧民、流浪漢以及精神異常者的面孔和身體經常是拍攝的對象(《清末明信片中國》一書中有不少這類照片)，原因在於找出他們社會病癥的視覺社會標誌，俾於管理。<sup>279</sup>至於，鴉片不管做為醫療品、生活用品或炫耀式消費品，它的身體表現或生理反應特徵，在視覺秩序下有可能就是該被排除或已被排除的對象，構成視覺的入罪化。在反毒禁煙運動如火如荼時期，要識別吸食與否，需借助驗尿等檢驗技術，但當時的警察有些是透過觀察是否有盜汗、萎弱、走路歪斜、面黃肌瘦的特徵，做為逮捕的理由，錯逮人並不奇怪。<sup>280</sup>這正是透過對身體的觀看，進行視覺的裁決，逮捕不正常的身體。視覺可能是當時禁毒運動或論述中最重要的裁判和排除工具，這可能未言明，但也說明了視覺的主導性早已自然化成為我們習性的一部分。這使得觀看不再只是一種感知行為，也是一種鑑賞評斷的行為，構成一套視覺習性，在理想社會、健全心靈、完美身體的標準位置上，對身體進行社會、道德、美學上的區辨、分類和排除。病態/醜態的鴉片身體則與我們日常生活的視覺習性發生扞格。視覺則在特定的生存條件和結構下形成一套特定的視覺習性，教導我們如何區判好/壞、美/醜、病態/常態，正常/不正常、好品味/壞品味的身體。這種視覺習性也涉及到感覺的分配，Ranciere提到社群與個人存在的樣態會形成影像的規範，這屬於共同的社會習慣，亦即，感覺體系之配置牽連了共享與排除的邏輯。感覺政體(regime of the sensible)決定了事物的可見或不可見，可說或不可說，可以聽到或無法被聽到。因此感覺分配的美學政體，牽連了這些感覺的配置以及區分疆界的體系。<sup>281</sup>這種感覺分配的共享/排除，足以說明我們對病態觀看態度以及如何得以構作出病態的鴉片身體，其背後指涉的正是當時共同的社會習慣和視覺習性，及其型構的一套觀看政體。

也就是在反鴉片消費成為官方品味以及羞恥意識的心理機制下，形成一套以管治鴉片身體為主的觀看政體。吸鴉片對身體就像是一個烙印，會留下明顯的生理現象。前面討論過的鴉片鬼的身體意象不管是透過視覺科技或視覺化敘述筆調的再現，都相當醒目突出。正因如此，吸食者很容易被辨識，進行視覺歸類、判別，「染毒癮者，一望而知面色灰黃，形容枯瘦，未老先衰，頭髮易白，瞳恐縮小，齒牙動搖，皮膚乾燥，聲音震顫，故謔之者往往呼為煙鬼，確酷肖焉」。<sup>282</sup>

---

<sup>278</sup> 參見Suren Lalvani, *Photography, Vi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Bodies*(1996).

<sup>279</sup> 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何謂寫實主義中的真實？〉，收錄於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I：帝國—亞洲—主體性》(2006: 30)。

<sup>280</sup> 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sup>281</sup> 見劉紀蕙，〈可見性問題與視覺政體〉，收錄於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I：帝國—亞洲—主體性》(2006: 4)。

<sup>282</sup> 羅運炎，《毒品問題》(1936: 19)。

鴉片鬼的生理印記令人印象難忘，「一望而知」誰是煙鬼，因此在茫茫人群中很容易識別指認。即便煙癮不重，也會在唇、齒、皮膚留下痕跡，「這吃鴉片人，人家一看就看出的，因為臉上掛著招牌，任你是精壯力健的人，唇紅齒白，只要吃上了煙，那皮色總是透青，唇也不紅，齒也不白，都被這鴉片燒黑了」。<sup>283</sup>由於吸食鴉片生理反應明顯，在反毒禁煙時期就像黥面的犯人，很容易成為逮捕對象。1838年（道光十八年）一道上諭，即要求各地政府官員仔細觀察所屬官兵臉色，看是否違反官兵不得吸食鴉片的禁令，「留心訪察，所屬各員內如有吸食鴉片者，不難於察言觀色之間，立為指出究辦」。<sup>284</sup>

察言觀色間立為指出究辦，言簡意賅的說出視覺如何進行罪責和審判。這是判斷和逮捕鴉片吸食者最快、最有效律的方法。林則徐也提到由於吸食者眾多，告發也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承審鴉片煙犯有所困難，因此他建議要改進審斷之法，而最快方式就是將待驗之人置於室內，一次觀察好幾人，見其是否有煙癮發作跡象，他說「要知吸煙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也就是讓他們熬出煙癮，「只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sup>285</sup>這種簡易有效的方式，在當時經常使用，甚至設立機構執行，因為儘管朝廷三令五申，要求官兵吸食鴉片惡習未在一定期限內戒除者，一律革除官位職務，但不少官員在禁令下，依然吸食成風，促使朝廷在有些地方設立調驗機構專責檢察。

美國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1911年出版的書中，寫下了他的見聞，「政府在北京和某些省會建立了檢驗官吏們是否已戒除鴉片的機構。被懷疑對象必須到這些地方接受嚴格的測試.....被關進一座舒適的公寓。這裡生活用品一應俱全，惟一缺乏的就是鴉片。一般說來，一個人是否吸食鴉片只需三天的隔離便可得知，假如被懷疑者能夠順利通過這三天的考驗，他就得到身體健康的證明。而那些沒有戒掉吸食習慣的官吏則無法平心靜氣度過這三天。此時，鴉片吸食者因沒有鴉片所遭受的無法抑制的痛苦，自會揭穿他們的謊言.....他們淚流滿面，雙膝跪地，哀求侍者讓他吸一口鴉片以解除痛苦」。<sup>286</sup>鴉片癮發的生理反應既成為調驗的事證，也像是一種行刑或懲罰。用煙癮發作的痛苦不適，揭發自身的犯行。羅斯記載的這種查驗方式，並非誇談，1908年上奏的《禁煙查禁章程摺》，就將這種目測方式列入法令裡，「惟有將調驗之員令其到所住宿，供其飲食，由臣所揀派妥員監其食宿，少者三五日，多則六七日，其曾否戒淨，或仍服藥，及服藥之多少，均能確得實情，無可遁飾其實」。<sup>287</sup>當然，在當時科學

<sup>283</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第十九回)(1984: 92)。

<sup>284</sup> 〈著內閣通諭嚴禁官員吸食鴉片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104)。

<sup>285</sup> 道光十八年，林則徐，〈湖廣總督林則徐奏復黃爵滋塞漏培本之摺並酌議禁煙章程六條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69)。

<sup>286</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2006: 99)。

<sup>287</sup> 〈禁煙大臣奏擬禁煙查驗章程摺〉，《東方雜誌》，5卷，7期(1908)，收錄於馬模貞編，《中

檢測還不完備時期，視覺的查驗無疑是簡便而通行的方式

視覺管治鴉片的標準，很容易建立起來，皮膚焦黑、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身體顫抖、病奄奄、死氣沉沉的模樣就成為吸煙犯罪視覺性的「區別標記」(distinguishing mark)。<sup>288</sup>符合這身體模型標準的都是潛在的犯罪者。這就像十九世紀末法國著名的警官和刑事偵查學家伯德隆(Alphonse Bertillon)建立起的一套刑事攝影(penal photography)和人體測量結合的犯罪偵查制度。伯德隆利用統計學家Quetelet的均值人(average man)的理論，結合攝影、人體測量、臉部描述以及檔案系統，建立一套罪犯人體測量法，對所有犯罪者的人體外貌特徵進行十一種測量指標的拍攝記錄，同時將這些照片資料建檔，形成「人體測量特徵」系統(anthropometrical signalment)，並以平均值進行分類，來判定嫌犯是否犯罪。透過這套刑事犯罪統計系統，可以有效的利用人體特徵分類，並對照罪犯特徵平均值，將潛在犯罪者指認出來。<sup>289</sup>伯德隆的貢獻在於讓「個別的犯罪身體成為可清楚界定和指認的文本」。<sup>290</sup>透過視覺/攝影對身體的掃瞄，對身體進行測量、分類、標記、建檔和識別。身體特徵就像是文本一樣，會說出自己的一切。著名攝影家Sekula就說，「權力使得犯罪身體的記號成為一種文本的實踐」。<sup>291</sup>這是一種視覺和身體規訓結合的權力技術，刑事攝影技術讓身體表面進入一新的視覺領域，分類、歸納出的身體特徵用來監禁那些反社會的身體、犯罪的身體。這種身體成為權力凝視和監視對象，俾於有效管理和控制。<sup>292</sup>這種技術也被廣為應用，特別是針對社會偏差身體的管治。例如運用攝影記錄瘋子的臉部和身體特徵，透過蒐集、分類、歸納辨別誰有可能是瘋子以便監管。這是將瘋狂視覺化，可透過視線識別。

鴉片身體做為一種社會偏差的身體，雖然伯德隆那一套攝影與犯罪身體結合的技術並未用於此，但鴉片身體特徵明顯，根據病理反應，就可歸納出一套「人體測量特徵」，一套「可清楚界定和指認的文本」，鴉片身體特徵成為文本實踐。其身體的病態現象成為一種「區別標記」，述說、揭露自己就是國家罪責化的身體。因此，將鴉片身體視覺化，就可輕易的用視線識別、指認，這是一種視覺的管治，國家或社會透過視覺力量，讓偏差和病態具有可見性，唯其可見，就可辨識、捕捉。鴉片身體的識別標記清楚，這使得人人都可成為視覺警察，隨時舉發，在禁煙雷厲風行的時代，舉發或構陷入罪事件，隨處可見。警察也易於逮人，民國時代，煙毒氾濫依舊，透過視覺標記判斷逮人，反較抓販運、販賣鴉片者容易。

---

國禁毒史資料》(1998: 440)。

<sup>288</sup> Suren Lalvani, *Photography, Vi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Bodies*(1996: 116).

<sup>289</sup> Suren Lalvani, *Photography, Vi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Bodies*(1996: 108~113).

<sup>290</sup> Suren Lalvani, *Photography, Vi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Bodies*(1996: 109).

<sup>291</sup> Allan Sekula, "The Body and the Archive", *October*, No.36~39(1986: 33).

<sup>292</sup> Suren Lalvani, *Photography, Vi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Bodies*(1996: 116).

因爲，「因染有煙毒嗜好者，起居容貌，必稍異於常人，若警察、保甲長，對於本段居民，果能隨時注意偵查，則此癮民，必難掩其孱惰垢穢之形態」。<sup>293</sup>「孱惰垢穢」，還有前段所引，染毒癮者「一望而知面色灰黃，形容枯瘦，未老先衰，頭髮易白，瞳恐縮小，齒牙動搖，皮膚乾燥，聲音震顫」，以及「涕淚交橫，手足委頓，不能舉……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sup>294</sup>「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sup>295</sup>

這些都成爲鴉片身體的視覺標記。1909年，禁煙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有人建議加強查驗工作，透過脈象檢查，甚至透過嗅覺方式，查緝吸食之人，並定爲查驗之秘法，「據西醫云，嗜煙之人之脈象，與常人不同，即此可定其有癮與否。又聞老癮之人云，嗜煙者具一種特別之煙臭，縱令善於設法，如常洗浴，勤洗衣服，終不能使之絕味，且口中呼之氣，亦有特別之煙臭，無論吸煙吞膏，均有此臭，最易察出虛實，此皆深於經驗之言……允宜定爲查驗之秘法」。<sup>296</sup>一直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便科學的檢驗方式早已出現，但要普及化禁煙運動，視覺的識別仍是最便捷有效的「查驗秘法」，於是「但看無論在城鎮或鄉村中凡是看見鳩形鵠面骨瘦如柴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的人，毫無疑義的必定是沾染了煙毒的人」，<sup>297</sup>就是這種做法的明證。

這種視覺辨識方式，進入民國時代，在科學檢驗已經施行的條件下，仍列在法規命令裡，〈肅清煙毒調驗規則〉做爲查驗鴉片吸食者的規範。其方法，一是透過科學方式，亦即化驗便溺。二是檢查頭部及手指。檢查面部有無煙容，是否黑色無光彩；檢查齒牙，是否呈黃黑色；檢查口唇，是否帶紫紅色；詳察口部是否成歪斜狀；詳察食指是否有煙蹟黃癍。三是注意生理之變態。所謂生理變態包括：欠伸、流淚、流鼻涕、盜汗、抽筋、身體疲倦、夜間睡眠不安、心悸、食慾減退、神經易受刺激、作嘔吐酸、腹瀉、瞳孔放大等十三項指標。科學驗尿有時未必準確，尿中嗎啡量少時，往往不易驗出，最好搭配臨床的生理反應診察。上述幾項吸食鴉片的視覺標記，明白易察，檢驗成爲人人可爲之事。再者，抗戰以來各地化驗設備缺乏，須借重經驗之測定，各地方如無化驗設備，准用簡單調驗

---

<sup>293</sup> 內政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禁煙行政》，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95)。

<sup>294</sup> 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6)。

<sup>295</sup> 俞正燮，〈鴉片煙事述〉，《癸己類稿》，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一)(2000: 289)。

<sup>296</sup> 〈論我國禁煙之弊及其補救之法〉，《申報》，1909年8月24日、26日、27日、28日、29日，收錄於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1996: 49)。

<sup>297</sup> 民國二十八年六三禁煙紀念訓詞，〈以抗戰殺敵精神來根絕煙毒〉，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18)，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86)。

方法，專注重頭部及手指之檢查，並注意其生理之變態，即不驗便溺亦可。<sup>298</sup>馮客指出，透過驗尿方式只能在醫院由合格醫師執行，國民政府的南京十年，警察羈押鴉片吸食嫌犯，通常透過觀察嫌犯是否有犯癮的跡象來判斷。這些跡象如打呵欠、流鼻涕、心神不寧、神經兮兮、沒有胃口、嘔吐、腹瀉、抽搐等症狀，至於醫療和司法單位也會檢查嫌犯一般生理現象，如臉色，皮膚、牙齒和嘴唇狀況等。<sup>299</sup>

這種視覺檢查方式很容將身體的不適當做犯癮症狀，造成誤判、誤逮。這種雖然簡便有效律，但卻粗糙，容易造成誤解的檢查方式卻列為法令，依照這規定，一般人只要觀看頭和手指都可成為視覺警察，並進一步形成日常生活的監視。這是視覺政治和身體政治的匯合，讓一切變得清晰可見，也便於管理。雖然這種全民視覺治安的禁煙方式，一來普遍化禁煙反毒的意識型態，二來深化社會監視力量，透過鄰里街坊的視線，形成輿論壓力。但也容易造成上述所說的誤逮、錯誤舉發現象，將身體狀況不佳，有類似吸食鴉片生理症狀者，都視為同類而逮捕，形成恐怖的鴉片管治。或許執政者有意藉管治鴉片，管治政敵、管治人民，進而鞏固統治基礎。如同當過蔣介石禁政要員的蕭覺天指出，蔣介石的禁煙政治目的，「他打出禁煙禁毒的招牌，誰要觸犯了這法令，便以軍法從事。對各省軍政人員，不服從和陽奉陰違的人們，便藉機給以顏色，抓住對方的弱點，使之不得不俯首貼耳，效忠於他。因此這個禁煙禁毒的招牌，也就成為他使用威脅利誘手段的工具」。<sup>300</sup>

鴉片身體是視覺化的產物，也是恥辱的身體。它與現代化國家的存在是矛盾的，禁絕鴉片更是「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的第一步」。<sup>301</sup>在這樣的國家原則下，對鴉片身體的入罪和排除內化為視覺習性，形成國族化的視覺秩序，針對鴉片身體的區別標記，進行視覺裁決。這種視覺管治和裁決也作用在另一種恥辱身體—小腳上。為了不讓小腳出乖露醜的遭人觀看或更令人難堪的遭外國人好奇凝視，丟了中國人的顏面。於是出現各式各樣禁止纏足婦女拋頭露臉的措施，並限制外人拍攝。1933 年底，曾有外國人在張家口一帶鄉間拍攝小腳照片，為當地駐軍知悉，認為此事「有關國體，有辱國格」，遂層層上報，驚動層峰，最後蔣介石下令，外國人未經當地政府同意，一律不准拍攝小腳婦女，並通令各級政府一體

---

<sup>298</sup> 內政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禁煙行政》，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96~98)。

<sup>299</sup> 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04: 137).

<sup>300</sup> 蕭覺天，〈蔣介石禁煙的內幕〉，收錄於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1997: 254)。

<sup>301</sup> 1936 年 2 月 1 日，蔣介石於禁煙總會第一次常會開幕訓話。《禁煙半月刊》，創刊號(1936: 53)。

查辦」。<sup>302</sup>如一位觀察者在 1930 年記述，「數年前西安嚴禁纏足婦女出入公共場所，煙台則限制纏足婦女在街市行走，開封有警察當街剝卸足纏之舉，其最慘者則為漳州之鞭足……凡小腳婦女上街，即以鞭鞭其腳」。<sup>303</sup>

透過視覺裁決、管治小腳最有名的是 1919 年閻錫山在山西設立的查腳員制度，賦予各縣市雇用女性查腳員執行反纏足命令，這些女性查腳員在巡警陪同下，逐戶入門檢查婦女雙足，有無違反禁令。女性雙足/身體在國家權力規範下公開暴露人前，有些檢查更在室外執行，形同任何人都可執行視覺檢查任務，而受檢者宛如在公共場合接受公眾的視覺羞辱。即便檢查員是女性，避掉性別問題，但這種查腳的視覺暴力，不僅侵犯身體，侵犯隱私空間，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權力可以介入日常生活，無所不在進行監視。<sup>304</sup>從腳的檢查，到辮子的檢查，以至鴉片身體的檢查，全遭到國家視覺暴力的侵犯，甚至將這種視覺檢查權力，普及化到社會大眾，形成社會視線的監控，人人皆可根據自身視覺判斷檢舉、指責、評論。這種人人皆是視覺裁決者的現象，到了 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反纏足運動，更透過在公共場所舉辦放足大會，<sup>305</sup>將視覺檢查公開化和示眾化，利用社會目光進行視覺裁判，讓纏足成爲一種公開示眾下的恥辱。利用恥感意識，戒絕纏足惡俗。這種公開展示策略最視覺化、最吸引人的方式就是利用現代性視覺科技 X 光掃描纏足，將畸型病態的骨骼樣態，聚焦化的暴露於眾人眼前，透過這種恐怖的身體奇觀，宣導纏足對身體之害，以收嚇阻之效。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就曾指出他的所見，「改革者採取所有吸引人的方式：用 X 射線描繪出裹腳與不裹腳的區別，指出繃帶帶來的痛苦和對自然健康的危害，反駁不裹腳會使婦女縮短實際壽命的謬論，並將裹腳與原始部落的肢體殘缺者對比」。<sup>306</sup>

基本上，反纏足運動就跟禁煙運動一樣，都建立在國族主義的論調上，以反國恥爲切入點，閻錫山雷厲風行的視覺警察行動，原因在於纏足已成爲貽笑世界的國恥，「天下國家數十與中國同，皆無纏足之風，以致中國貽世界之譏諷，爲莫大之恥」。<sup>307</sup>高彥頤也認爲，這是因爲「救亡圖存的國族迫切性，以及男性改革者因感受到國際目光的譏笑而產生的個人羞恥感，迫使他們巡求立竿見影的

---

<sup>302</sup> 《新新新聞》，1933 年，12 月 18 日，轉引自苗延威，〈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2007: 3)。

<sup>303</sup> 鄒英，〈葑菲閒談〉，收錄於姚靈犀編，《采菲錄續編》(1936: 273)。

<sup>304</sup> 參見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2007: 112~122)。

<sup>305</sup> 參見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2007: 128~129)。

<sup>306</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1911)(2006: 113)。

<sup>307</sup> 《閻錫山治晉政務全書初編》(1960: 721)，轉引自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2007: 114)。

成效」，<sup>308</sup>因此採取這種視覺展示策略。在這裡，國恥、救亡與視覺管治互為關係，共作出視覺化的中國改革進程。

從上面討論，我們不難發現清末民初的中國，不只被視覺化，本身也在視覺化中國。鴉片、小腳、辮子的視覺化裁決，放足大會、商品展、國貨展，以及新生活運動期間的衛生展，以視覺為主體的活動層出不窮，以視覺為可見性的展示策略仿佛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手段之一。中國既被西方視覺野蠻化、污名化，中國也透過改變身體、物件、空間等視覺意象，予以回應。這是一場中國的視覺革命，包括現代性視覺認知和景觀的建立，讓病態、落後的身體轉型為現代化身體，讓骯髒、污穢的街道轉而為乾淨、衛生的街道，讓強國保種的目標有了現代化的做法，這些改革讓中國逐步變身為現代性中國。而支撐這種視覺改革，讓視覺得以現代化的正是西方生物學、遺傳學、醫學、公共衛生等生命政治得以運作的科學知識。中國也引進這些知識，做為救亡圖存的改革技術，以改變中國意象和景觀，從身體、物質到空間，中國進入生命政治的現代性歷程。

---

<sup>308</sup> 高彥頤(Dorothy Ko)，《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2007: 129)。



## 第四章 救亡現代性：強國保種下的生命政治

去鴉片化過程，一方面反鴉片消費、推行禁煙運動，另一方面是救弊，去除鴉片帶來的身體、生命、種族、政治經濟層面的危害。中國救亡工程之所以進入現代性議程，某種程度而言正在於身體、生命、種族、政治經濟的改革，得以納入現代性生命政治的範疇。而其根源則在於鴉片造成亡國滅種的隱憂，因此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的提出，不只是回應亡國滅種憂懼，更成為清末以降國族生存救亡的目標。而其救亡的手段則是西方現代性的相關知識和技術，葉嘉熾(Ka-Che Yip)指出，從嚴復天演論所形成的強國強種論述，使得「健康」和「醫療保健」成為清末以迄民國時期，政府重建國家和強大國家的重要方式。<sup>1</sup>健康和醫療確實是近代中國救亡的手段之一。而強國保種的概念也是在西方現代醫學、生物學、遺傳學、種族主義、健康觀念、衛生體制、優生育種、人口管理等支撐生命政治運作的知識、技術導進中國的脈絡下所建立起來，進而造就了救亡工程的現代轉型。這一部分將處理為了解決鴉片造成個人、國家、民族不健康、不正常狀態，中國的革新救亡作為進入現代性生命政治範疇。嚴格的說，不是中國移植生命政治技術，而是中國針對身體、生命、種族的改革，恰好契合傅柯分析十九世紀西方在遺傳、生物、統計、政治經濟學等知識興起的時候，國家權力利用這些知識以保護個人生命、人口生命為由，將生命納入政治統治範疇，國家承擔人民的生命責任，人民生命則被政治化、國家化；不只是個人之死受到國家宰制，個人之生也受到國家控制的情境。

現代權力重點在於國家要調節各項因素，避免風險、控制死亡，讓人民好好活下去，成為有效的國家力量和資源，以因應外部的種族威脅。就此而言，中國顯然也面臨相當類似的情境，鴉片危害不得不讓國家以捍衛人民生命為責任，只有保衛人民生命，才能應付外部的種族威脅，免於國族淪亡。人民身體、整體人口命成為國家戰力資源，特別是中國還面臨諸多內戰和外敵侵略，戰爭更讓中國需要健康的身體和人口，以及正常良善的社會環境。正是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國族存亡續絕遭受威脅的情境下，促使中國進行健康、醫療、公共衛生、優生育種等改革，也進入到傅柯所謂的生命政治範疇。健康之必要，以保衛身體、保衛母體、保衛國族成為當時中國救亡的重點之一，也在這個環結上，西方現代性導進中國救亡工程。針對上面脈絡，本章處理重點：

---

<sup>1</sup> Yip, Ka-Che,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1995: 26~43).

一、何以亡國滅種是生命政治根源。分析鴉片帶來兵弱銀荒、種族滅絕威脅、並成爲革命建國障礙，這些因素構成了亡國滅種的隱憂，也成爲中國救亡的歷史因素，爲了解決這些問題，達到強國保種目標，導致現代性生命政治的開展。

二、從生命鴉片化到生命政治化。從個人到國家，中國歷經兩百餘年鴉片化過程，最後進入去鴉片化的救亡過程，透過健康、醫療、人口品質管理、公共衛生體制建立等現代性生命政治技術，進行強國保種的中國救亡工程。然而，在救亡框架下，個人身體、整體人口生命也納入國家管理，也就是生命的政治化和國家化。這裡提出傅柯生命政治概念做爲解釋。

三、去鴉片化社會：尋找不正常人。探討鴉片與不正常人口關係。鴉片生理危害擴及下一代人口數量和品質，引起滅種之憂，優生保種、控制生育觀念作法乃隨之而起，納入了生命政治治理範疇；同時也提出人口－政治經濟構想，以救中國長年之弊。歷代知識份子針對積弱中國，提出他們對人口管理、地利開發、政治經濟治理的藍圖，以解決中國問題；此外，爲了讓身體、生命、國族恢復正常狀態，以利種戰競爭，尋找非我族類，排除種族優生下的不正常人，成爲當時一股救亡思潮。因此借助西方演化論、優生學、遺傳學說，以實踐中國保種強種目標。而極端的種族衛生思想也在此時出現，雖然終未付諸實踐，但可見當時對不正常的憂慮和恐懼；去鴉片化，就是去除不正常狀態的生命政治，也是中國救亡，國族強盛的根本之法。

四、健康的必要：保衛身體，保衛國族。探討健康政治，任何人都必須爲自己健康對國家負責任。個人健康，以至民族健康都成爲必須保衛對象，這也是讓煙民、廢民成爲健康公民的過程；至於健康的開始，則在尙武體育，以改造病夫，洗雪病夫恥辱，這是一段試圖從鴉片化病態身體轉型爲去鴉片化健康正常身體的過程，也是身體軍事化、國家化的轉型。包括小孩婦女都必須接受身體鍛鍊，因爲她們攸關種族生命延續；同時也進行健康啓蒙教育，建立保衛健康，保衛國家觀念，以及健康救亡中國的觀念；而公共衛生的推廣和體制建立，無疑構成救種、救國、救亡的現代性工程。公共衛生的社會化和國家化，也讓國家得以透過醫療體制進行個別身體、集體生命的干預，這些作爲體現在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構成了日常生活的衛生政治；最後則是保衛母體。從強國保種的觀點，當時視婦女爲「國民之母」，婦女生育角色，已從爲家族傳宗接代轉型爲國家生產下一代優良國民。母體及下一代乃爲國家根基，這是婦女育種的國族化。爲培育健康優質下一代，提供良善養育環境，強調育種救國的健康技術，成爲救亡框架下必然之舉，其作法諸如產婦孕育、生產、育嬰的醫療衛生和家庭照養環境等。這是鴉片危害下一代，影響種族繁衍，到對母體保護，強化育種和優生善種技術，爲國家孕育健康優良國民的過程。

## 第一節 亡國滅種：生命政治的根源

國家富強壯大，種族命脈存續，國人身體健康，成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鴉片中國從君臣到知識份子的集體焦慮。這種焦慮不再只是外夷侵凌下對儒家政體，文化秩序，價值信仰漸次摧折斷斷的憂心，更具體化為對個別身體和集體生命之安全遭到威脅的強烈關懷。我們不難從嘉慶十五年一道諭旨看到鴉片吸食引發的生理效應以及對身體、生命和社會道德危害的警告，「鴉片煙性最酷烈，食者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害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道光年間一名縣官周石藩更焦慮的在禁令中陳述鴉片危害的具體後果，他指出鴉片是病民之害，多數人都知道，但一開始受到引誘而吸食，到有心戒除時卻都不能，最後導致「父母不以為子，鄉黨不以為人，本富者蕩盡家資，本貧者流為匪類。精枯骨立，無復人形，即或殘喘苟延，亦必俾晝作夜。外則不能謀生，內並不能育子，是其毒並不止於殺身，而且至於絕嗣」，而做為「父母之官」的他「斷不忍坐視爾等甘蹈刑章，自入死路」，對於鴉片「若不嚴拏懲辦，不足以掃除根源，而保全民命」，同時要讓士庶軍民人等知悉「戒煙得生，吸食則死，禍福只在轉移之間」。<sup>2</sup>

這段話除了交待鴉片對身體、財富、家庭關係、社會秩序、社會生產力、生活坐息的破壞更提到對人口延續的戕害，構成了從個人身家財產健康到整體國家存亡續絕的威脅，而周石藩「不忍坐視」，要大家不要「自入死路」的口吻，以及「保全民命」的緝毒作為，也隱微透露國家自居父母照料角色的關懷之情。這種國家或者皇帝必須保衛民眾生命，承擔人民生命責任的情懷，正是生命政治的基本出發，過去國家有權力任意剝奪人民生命，現代國家有權利保衛人民性命，因為人民是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資源。在 1839 年（道光十九年）道光帝的上諭裡流露無遺，「朕因鴉片煙流毒傳染日深，已成錮習，若不及早為民除害，伊於胡底」，「此朕愛民之心，先德後威，中外所共睹也。惟官民人等皆朕赤子，既欲衛其生而除害，不能不視其死而垂憐」。<sup>3</sup>因為鴉片危害社會臣民，猶如危害天子子民，皇帝自當有責任「衛其生而除害」，保衛人民生命，剷除鴉片之害。1921 年鴉片持續戕害國家子民，孫中山以非常大總統名義發佈命令，重申禁種、禁吸、禁運鴉片，更說明自己要「廓清毒卉，保育人民之至意」。<sup>4</sup>保育人民免受鴉片之

<sup>2</sup> 收錄於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565~566）。

<sup>3</sup> 〈著將嚴禁鴉片章程通諭軍民人等并著各直省認真查辦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157，158）。

<sup>4</sup> 〈嚴禁鴉片令〉，《孫中山全集》（第五卷）（1985：605）。

害，如同衛其生而除害，都是站在國家必須保衛人民生命立場發言。由此看出，鴉片扭轉了國家對待人民方式，從過往掌握生殺大權，棄人民生命如敝屣，可隨時奪命，到苦口婆心勸導人民遠離鴉片，避免其害，這種關注人民性命，並誓言保衛其生命，成為帝制到共和，國家領袖所必須做的一件事。這種國家對人民生命的關照，視為責任和義務，正是鴉片讓中國進入生命政治情境的一環，也就是國家權力必須負擔生命的責任，有讓人活著的權利，並積極管理、照護和調節人口生命。

確實，吸食鴉片構成「生死」的問題，從個人生死，以至國族生死，禍福只在吸食與否的轉移之間，鴉片這種「精神刺激性物質」(psychoactive substance)反客為主的操控著百餘年中國命運的生死和發展走向。也因此，「保全民命」以至保全國命，從個別身體的關照以至集體生命的保衛，成為當時社會國家的主要關切議題和操慮所在。連篇累牘的奏摺上諭以至憂心國運，致力改革的文仕議論和民間公共輿論基本上都在這種基調下發言。鴉片至關個人、國族興滅存亡，自鴉片戰爭以來，在帝國強權環伺下，更埋下亡國滅種的意識和隱憂。這種意識和隱憂也在中國是「東亞病夫」、「睡獅」的意象中深根和發酵。而亡國滅種危機感形成的憂患意識和集體焦慮，也促成中國從自我完整、自我封閉的認知觀中自覺醒悟，朝富國強兵和強國保種的國族生存發展目標努力，進而納入世界體系，步入現代化的進程。

這些現代化作為諸如：強健身體、注重優生、提昇人口素質、西化醫療制度、改善衛生環境、開展經濟建設、變革政治制度，俾以應付國與國、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競爭。如何在「種戰」<sup>5</sup>的競爭中存續？消滅流毒已久的鴉片以及發展相應或伴生的各項因應措施成為至要關鍵。這種因列強侵略和鴉片毒害，所形成對國家種族瀕於崩解滅亡的深沉憂懼和疑慮，使得個別生命和整體人口生命成為國家必須積極保衛維護的對象，進而謀求現代性的強國保種作為，這或許是鴉片促使中國進入救亡現代性生命政治的開始。

無疑，「亡國滅種」幾乎成為清中葉以降以至民國肇建、北伐、抗戰時期救亡圖存論述中隨處可見的修辭，反覆迴旋的論調。它伴隨鴉片蔓延成為帝制中國到民國最根深蒂固的憂患意識和迫切危機。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敗後，割地賠款，列強瓜分勢力範圍、強佔港灣、租界地更甚於前。對中國而言，敗給蕞爾小

---

<sup>5</sup> 晚清知識份子認為當時中國所面臨最迫切的是攸關國家種族續絕的生存鬥爭，也就是黃白人種之間的種族競爭，因而提出保種、種戰之說。種戰的思考如梁啟超在 1898 年《清議報》創刊時即指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同年在〈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一文中更進一步說明，「種族戰爭乃生存競爭之公例，自古已然，於今尤烈，且其種愈大者，其戰愈大，其勝敗所關係者愈為重大」，1900 年〈戰爭者文明之母也〉一文也指出：「二十世紀之東亞，則為黃白合戰之域，其爭競之劇，戰禍之烈，必數倍於昔日」，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收錄於盧建榮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2001: 327~328)。

國日本，不只是未有之恥辱，更是迫在眉睫的亡國滅種之禍。當時的知識份子普遍瀰漫這股危機意識和亡國焦慮。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上書清帝痛陳這一舉國痛心之恥，「夫以中國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為小夷慢侮，侵削若割羊縛豕，坐受剝削，恥既甚矣」，但更有甚於小夷慢侮的則是侵削瓜分之禍，「日人內犯，致割地賠餉，此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發憤痛心者也。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sup>6</sup>在同年的〈公車上書〉康有為同樣憂慮，「棄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sup>7</sup>同一年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世變之亟〉一文，分析中日戰爭帶來的禍害，「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sup>8</sup>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梁啟超〈南學會敘〉也提出深切警告，「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之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sup>9</sup>

辛亥革命前，陳天華在《警世鐘》以瓜分之禍倡言保國救種的革命排滿言論，「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sup>10</sup>鄒容也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發表的〈革命軍〉中慨陳，「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烈強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乎」。<sup>11</sup>這類論調在往後一段時間仍隨處可見，特別直指鴉片帶來的亡國滅種禍害，例如1935年出版的一本書《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適足以看出中國百餘年來的隱憂和危機並未稍減，它仍吞噬著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機，書中開宗明義就指出，「中國目前最大的禍害是什麼？封建勢力嗎？不，帝國主義嗎？不，共產黨嗎？不，土匪嗎？不，天災嗎？疾病嗎？也不……我認為以上各種禍害，都可以解除的；假如不能解除，只可以亡我們的國，不能滅我們的種……目前最嚴重的禍害，沒有過於鴉片煙了，既可以亡國，又可以滅種，國亡而種滅，這是永久被天然淘汰的民族，永久沒有復國重生的希望了」。<sup>12</sup>

在這裡，作者點出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知識份子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即如何保種的問題。國可滅而種不可滅，過去帝制時代，亡國、滅國只是改朝換代，對人民無損，對中國人種無害，中國人口仍可繼續增長膨脹，<sup>13</sup>而鴉片則可

<sup>6</sup> 見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2006：166~167）。

<sup>7</sup> 見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公車上書），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2006：132）。

<sup>8</sup> 收錄於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7）。

<sup>9</sup> 收錄於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1997：139）。

<sup>10</sup> 陳天華，《警世鐘》，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185）。

<sup>11</sup> 鄒容，〈革命軍〉，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125）。

<sup>12</sup> 梅任公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1）。

<sup>13</sup> 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提到何謂亡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裡的亡天下，比較

讓一個種族滅絕，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法則下遭到無情的淘汰。如嚴復所說，「世法之變，將有滅種之禍，不僅亡國而已」。<sup>14</sup>於是，在鴉片煙禍以及帝國主義瓜分的種族威脅下，「自強保種」、「合群保種」、「進化保種」、「強國保種」、「強種救國」等字眼，成爲當時愛國救亡論述的必備修辭。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乃成爲一種主流論述，充斥於晚清民國知識份子著作中，<sup>15</sup>甚至氾濫成爲一種時論寫作的腔調，也構成這一個「中國數千年未有變局」<sup>16</sup>的時代基調。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梁啓超即寫道，「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sup>17</sup>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則倡議，「教忠……以保國也，明綱……以保教也，知類……以保種也」。<sup>18</sup>

「保國」、「保種」、「保教」這一基調既覆述了國家民族困境之所在，也主導了未來的改革方向。康有爲、梁啓超繼之推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試圖從洋務運動的失敗中走出來，體認革新救國不應只流於「師夷長技」的皮相，更應從器物面提昇到制度面和觀念面的改革。<sup>19</sup>嚴復則在救亡意識下，展開寓著於譯的啓蒙翻譯事業，透過達爾文主義、斯賓塞社會進化論的引介，以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說爲立論，倡言「自強保種」<sup>20</sup>、「合群保種」，<sup>21</sup>追求國家富強，在「群與群爭」、「種與種爭」<sup>22</sup>的生存鬥爭時代，因應種族存亡的危機。嚴復這份用心，他的好友吳汝綸在給他的信中說的很清楚，「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

---

是民族文化衰亡的意思，也就是要「保教」，羅志田則延伸解釋，認爲「亡國亡種」的種，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取向定義的「天下」，見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1998: 213）。此一滅種有甚於國亡的論點，亦可見諸陳天華，〈警世鐘〉；鄒容，〈革命軍〉，分別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 185, 157）。

<sup>14</sup> 見嚴復，〈有如三保〉，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137）。

<sup>15</sup> 舉一例，如嚴復〈論世變之亟〉、〈原強〉、〈有如三保〉、〈保種餘義〉、〈原富〉、〈群學肄言〉等文，皆可看到亡國滅種字眼，見皮后鋒，《嚴復評傳》（2006: 376），以及後文討論的引文。

<sup>16</sup> 康有爲，〈上清帝第四書〉，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2006: 175）。

<sup>17</sup> 梁啓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收錄於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1997: 32）。

<sup>18</sup> 張之洞，〈勸學篇〉，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二）（2006: 220）。

<sup>19</sup> 相關討論可見何志虎，〈戊戌維新與「近代救亡中國觀」的中級形態〉。該文認爲洋務派在「求強禦侮」的口號下，效法西方的制器、練兵、設廠、開礦、裕商，以達富國強兵，這是物質面改革的「近代救亡的中國觀」的初級形態；康、梁的維新變法在「救亡」口號下，提倡政治制度變革，宣揚進化論、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和自由平等觀念，這是制度、觀念面改革的「近代救亡的中國觀」的中級形態；至於高級形態，則是孫中山以革命手段對中國物質、制度、觀念所進行的全面改造（2008: 36~43）。另外，張德勝也持類似看法，他指出，中國現代化可分三個改革浪潮，第一是 1861~1895 年同治維新時期主要是器物層次改革；第二是 1895~1911 年，改革內容以制度爲主；第三是 1911~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屬新文化運動時期，是思想觀念的改革。見張德勝，《思入風雲：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與社會變遷》（1997: 42）。

<sup>20</sup> 嚴復，〈天演論序〉，「赫胥黎式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見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自序》（2007: 3）。

<sup>21</sup> 嚴復，「天演之事，將使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見《天演論》（2007: 32）。合群才能適應天演競爭，才是保種進化之道，因此倡言合群保種以救亡圖存。

<sup>22</sup> 嚴復，〈原強〉，「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爲強肉，愚者常爲智役」（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14~15）。

土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譎諫之資而已」。<sup>23</sup>在以資譎諫的寓意下，近化論儼然成爲中國救亡運動的原動力，「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天演公例，成爲憂國之士傳誦一時的流行語、口頭禪，<sup>24</sup>它讓人們深切理解這是一個強權主導，國際競爭的世界，實力與富強攸關興滅存亡，國家如果要立足於世界，不想成爲遭強食的弱肉，就須擁有強大的生存力量。<sup>25</sup>於是，在進化論引導下，強化國家力量尋求自保成爲這個時代的基本共識。「保種」、「保國」，以至「保教」乃成爲當時救亡的主要號召和行動目標。<sup>26</sup>張之洞、嚴復、康有爲、梁啓超、章太炎、劉師培等都在這個主軸上開展他們的救亡論述和行動。

同時，在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以及社會進化論的刺激下，伴隨而來的是激起了族群的想像建構和現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二十世紀初年的一份刊物，刊載一篇文章〈民族主義論〉，其中提到生存競爭是民族主義之源，「自物競自存之說興，於是種類盛衰之故明。進化論者，實民族主義之源也」，<sup>27</sup>民族國家乃成了物競天擇的結果，面對生存競爭的社會進化挑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不得不開始重構其民族記憶和血緣系譜，強化身份認同意識，對內凝聚族群力量，對外因應劇烈迭起的種戰，以謀自振，以爭自存。中國自此捲進了全球民族主義的風潮，構成了西方/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sup>28</sup>之所以如此，誠如張灝指出，民族主義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它的形成正來自於帝國主義壓迫下「救亡保種」的迫切感，「帝國主義的壓力也經由經濟的剝削伸展爲領土的掠奪以及多種形式的政治軍事的侵略。正是這種急性帝國主義的刺激下，才有 1895 年以後『合群救亡』、『保國保種』的迫切感。這種迫切感的出現是民族主義形成的一個先決條件」<sup>29</sup>。黃綉媛也指出，「近代中國具有西方概念的民族主義，是在外國帝國

<sup>23</sup> 見王栻編，《嚴復集》(1986: 1560)。

<sup>24</sup> 胡適即指出，「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般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見《胡適作品集 1：四十自述》(1986: 54)。

<sup>25</sup> 可參見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國認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強權」與「公理」的兩極性思維爲中心〉，收錄於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2011: 101)。

<sup>26</sup> 相關研究可見，黃綉媛，〈近代中國民族五義救亡運動的四重奏：保國、保種、保教與國粹保存運動的齊鳴(1842~1912)〉(2002: 317~378)；陸勇，〈「亡國滅種」的想像與近代民族國家話語霸權的形成〉(2010: 110~113)；楊鵬、李慶峰，〈維新派的種族觀：「救亡意識」下的「保種」思想〉(2007: 101~103)；郭衛華，〈天下一家、救亡圖存、民主富強：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之範式沿革〉(2009: 52~55)；許義雄，〈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以自強保種思想爲中心的探討〉(1988: 7~17)。

<sup>27</sup> 刊於《浙江潮》，轉引自姜義華，〈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收錄於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1994: 148)。

<sup>28</sup> 羅志田指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端，固來源於傳統的族類思想，但其成爲一種『主義』，卻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學理之後。而彼時日本的民族主義學理，基本上也是舶來品。所以中國士人真正收拾的，不過就是西方民族主義學理」，見其《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1998: 5)。

<sup>29</sup> 見張灝，《幽黯意識與民主傳統》(2010: 166)。朱維錚也指出，中國傳統文獻雖有「種」、「族」等字，但並無「民族」一詞，「民族主義」被廣泛使用的時期，當晚於 1898 年，特別是在 1900

主義勢力侵略下爲了救亡圖存而產生的」，中日甲午戰敗，特別是 1900 年庚子事變後，「在中國興起了具有現代性格的民族主義思潮」。<sup>30</sup>同樣的說法如姜義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興盛，主要導源於救亡的急切需要」。<sup>31</sup>簡言之，從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救亡圖存的迫切感，到結合西方天擇物競之說，開啓了中國爲強種而重建現代性民族以禦外侮的行動，爲求富強而走西方「重力不重理」、「尚爭不尚讓」以實力競爭的路徑。擺脫中國謙遜、不爭、講公理的傳統作風，進入「重力尊西尚爭」<sup>32</sup>的西化/現代化模式，卻是在這憂患意識促動下的結果。

由是觀之，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或可說是促成中國走向現代化，進入西方現代性氛圍的內在動力之一。憂患意識，何以成爲這一劇變、轉型或過渡時期的精神動力，我們可以進一步論述，不管是張灝據以分析「幽黯意識」與儒家聖王之道或西方民主傳統的關係，<sup>33</sup>或夏志清指出「感時憂國」精神成爲五四新文學傳統，<sup>34</sup>其背後都隱含著知識份子對道德人性和現實世界充滿陰暗、險惡、困頓、危機的憂患意識以及自覺、反省、批判、改造、勇於承擔責任的救亡作爲。而憂患意識，根據徐復觀的深入探究，自周初人文精神躍動開始時即已出現，它奠定了中國精神文化之基型，也影響未來文化發展甚深。憂患心理的形成主要來自於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慮，當事者一方面知覺到吉凶成敗與己密切相關，同時自己也需在行爲上盡一份責任。憂患正是來自於這種責任感，以及要以自己的力量突破困難，卻尙未能突破的心理狀態。憂患意識正代表承擔問題的責任，它也蘊藏一種堅強意志和奮發精神，以及一份自覺警惕，敬謹從事的心態和行爲。這種源於憂患意識所形成周代「敬」的觀念，正是中國最早的人文精神形式。<sup>35</sup>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危疑險峻的時代和困頓世局中逼迫出的憂患意識，正是自我警醒和啓蒙以及改造革新和救亡圖存的動力來源。<sup>36</sup>它既型塑出一個危局時

---

「庚子事變」之後。戊戌政變的流亡者和留學生群集日本則起了傳播中介的作用。見朱維錚，〈晚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收錄於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1994: 275~276)。

<sup>30</sup> 黃綉媛，〈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救亡運動的四重奏：保國、保種、保教與國粹保存運動的齊鳴(1842~1912)〉，《白沙人文社會學報》，創刊號(2002: 319)。

<sup>31</sup> 見姜義華，〈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收錄於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1994: 150)。

<sup>32</sup> 見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國思想》(1998: 104)；亦可參見王中江的討論，〈清末民初中國認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強權」與「公理」的兩極性思維爲中心〉，收錄於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2011)。

<sup>33</sup> 張灝指出，「所謂幽黯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陰暗面和人類社會中根深抵固的黑暗勢力的正視和警惕……憂患意識只是幽黯意識的前驅，因爲它只是代表當時的人已經意識到時代的艱難和環境的險惡。而幽黯意識則是指：在憂患之感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認識到他們所體驗的艱難和險惡不是偶發和尙來的現象，而是植基於人性，結根於人群，只要人還是人，憂患便不可能絕跡」。見所著《幽黯意識與民主傳統》(2010: 57~58)。

<sup>34</sup> 見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收錄於《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 533~552)。

<sup>35</sup> 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1994: 20~32)。

<sup>36</sup> 如皮后鋒指出(2006: 376)，「近代仁人志士秉承了中國傳統的憂患意識，自覺的將其轉化爲救



代的精神氛圍，也反映現實世界中不斷逼臨的各種生存難題。如何面對和轉化這種國族以至個人遭遇的生存危機，成爲這一時代啓蒙與救亡的主題。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正出自這百多年來中國體制、信仰、價值、日常生活邏輯瀕於崩解邊緣的危機感，而其問題根源正是鴉片氾濫帶來社會、政治、經濟的貧弱不振和失序不靈以及帝國主義日益迫切的瓜分行動，所彰顯的則是國家幾近失能、失控的治理危機，不管是帝制或共和時期。也正因鴉片禁制之困難及其相關的失序效應，導致國家治理機能更顯脆弱不堪，並予列強鯨吞蠶食之機，致有亡國滅種之虞，但也進而促使國家社會爲解決這一問題，邁入現代化的改革進程。《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書作者之一的Marius Jansen在比較中、日現代化過程時即指出，現代化是爲了民族生存，如果不現代化就要滅種，「在中國和日本，現代化是在西方經濟和軍事力量的陰影下展開的……中日兩國的現代化動機基本上是防衛性的。現代化是在槍口之下來到東亞的。這一外在的挑戰表明，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在於民族的生存。這並不是一個自由的選擇，因爲如果不現代化，那麼就是滅種」。<sup>37</sup>確實，不現代化就滅種，滅種的憂慮逼著那一代知識份子進入現代化議程，正如同徐復觀指出，周朝的憂患意識形成「敬」的觀念和修爲，這一時期的憂患意識則促成「強國保種」的決心和「富國強兵」的作爲，爲避免步入亡國滅種運途而推動一系列強國保種的現代性措施。

我們接著追蹤鴉片和亡國滅種意識的關係史，不同時期各有不同的現實問題，以及相應的危機意識和訴求重點。當鴉片的進口和吸食在道光時期達到一個高峰時，中國也面臨迫切的危機，包括社會秩序、財政體系、朝貢制度、勞動生產、國防兵力、人口素質、管理效能的危機。從 1842 年鴉片戰爭拉開天朝崩潰序幕，到 1895 年甲午戰爭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中國歷經五次對外戰爭，皆以措敗告終，喪權條約的簽定讓中國付出鉅額賠款，主要沿海和內河港口對外開放，領土割讓、租界地劃分，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等權利的讓渡，使得中國喪失國家主權和經濟利權的完整性和支配性，西方商品、器物、傳教士得以打破門禁，長驅直入，深入內地，發揮新事物、新觀念散播、移植的功能，步入西學東漸時代。中國的朝貢制度也自此瓦解，進入條約體系時代，國際外交、經貿關係、世界觀漸次丕變，同時也走進一個自我衰敗、恥辱蒙身、被迫反省、自我轉型的時代。在這段喪權辱國，列強凌夷的歷史背景下，我們要回過頭來探問鴉片如何造成亡國滅種的可能。

如上段歷史敘述，鴉片確實是讓中國節節敗退，逐步崩解的肇因，反過來說鴉片無疑也是暴露帝國本身治理危機，反映其內部腐敗的媒介。陳天華在〈警世鐘〉指出，因鴉片貿易引來的戰爭讓「一切利權都任洋人奪去，亡國滅種的禍根，

---

亡圖存的強烈使命感。在民族存亡之秋，他們苦苦尋覓救世良策，掀起了救亡運動的高潮」。

<sup>37</sup> 見Marius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1975: 3), 轉引自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1998: 122)。

早已埋伏在這個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裡了」。<sup>38</sup>確實，亡國滅種的根源來自鴉片戰爭，或者更精確的說來自鴉片氾濫成災，舉國嗜之，就已埋下毒化中國，侵蝕王朝生機的隱憂。到了 1924 年中華國民拒毒會回顧鴉片煙禍史，也提出鴉片亡國和中國救亡關係，「自鴉片流毒中國，而主權喪失，人種衰弱，久有鴉片亡國之懼。勝清之季，國人漸有救亡之覺悟」，<sup>39</sup>亦即鴉片不只讓國家主權喪失，利權外溢，更有亡國滅種之憂，從而促動清季保種救亡的風潮。我們分析這段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究其不同時期的危機和關懷焦點，或可分下列幾個階段，一、鴉片造成兵弱銀荒的危機；二、鴉片造成種族滅種的威脅；三、鴉片是革命建國的障礙。

### 一、鴉片造成兵弱銀荒的危機

道光朝是中國鴉片吸食的第一個高峰期，也是第一次展現決心，徹底禁煙，成效顯著的時期。道光帝何以如此積極的推動禁煙政策，頒布法令，雷厲風行，或許與他早年曾吸食鴉片，深知鴉片之害病民病國，曾說「此物不禁絕，使流行於內地，不但亡家，實可亡國」，<sup>40</sup>確實鴉片走私氾濫，不分階層，吸食成風，不僅傷身敗家，也嚴重動搖了王朝根基和國力，特別是財政和國防。雖然當時的上諭奏摺不時提到鴉片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或造成身體、生計的傷害，也關注社會秩序和道德風俗敗壞問題，卻都不如漏銀、漏卮，亦即白銀外流的財政問題嚴重。<sup>41</sup>這問題的根源及影響性，山東巡撫經額布在 1838 年（道光十八年）的奏陳一語中的點明，「自鴉片煙之風日熾，銀價亦因之日昂，國計民生，動形支絀。紋銀出洋之多寡，臣雖未能確知，惟漏卮之在鴉片，……是欲絕漏銀之路，必善籌禁煙之方」。<sup>42</sup>財政危機以及危機根源的鴉片勢必成為道光帝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曾在中國海關任職三十多年，總稅務司赫德的主要助手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也精準的指出道光帝何以要急切的解決財政問題，「清帝政府之所以要禁止鴉片貿易，除高尚的道德立場外，還根據一個事實，即為了償付鴉片以致紋銀流出國外，在 1830~1839 年的十年中，每年達到一千萬兩。而這一事實，即紋銀因此外流的事實，是在歷史中為一般人所普遍承認的」，<sup>43</sup>白銀外溢嚴重，貨幣貶值，造成民生凋敝，動亂紛起，使得鴉片成為他在位期間不得不嚴肅面對，

<sup>38</sup> 見陳天華，〈警世鐘〉，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 176)。

<sup>39</sup> 民國十三年八月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致各省區軍民長官電文，引自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161)。

<sup>40</sup> 見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292)。

<sup>41</sup> 姚薇元也指出，道光之所以極力禁煙，解決財政弊病是其主因，「銀貴錢賤，稅課疲累，是當時財政上的一個嚴重問題」，「可見這一財政問題是激起禁煙的動力，所以鴉片戰爭實為堵塞紋銀漏卮，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見其〈鴉片戰爭史實考〉(2007: 4)。

<sup>42</sup> 〈山東巡撫經額布奏為塞漏培本必先嚴懲興販及賄縱人犯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63)。

<sup>43</sup> 見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朝制度考》(339~340)，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63)。

全力解決的問題，「在他必須應付的一切問題當中，沒有一個問題比鴉片問題更重要，對於這個問題他是毫不猶豫的」。<sup>44</sup>

鴉片戰爭中的英國海軍上尉艾略特·賓漢(Eliot Bingham)，更在其《遠征中國紀實》(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1843)一書中寫下中國打這場戰爭，不為鴉片，只為了漏銀嚴重，「這場戰爭被人民普遍、錯誤地認為是鴉片戰爭。中國人根據自己的立場觀點，宣稱禁止鴉片走私是為剷除民俗人心之害。因此很多人懷疑我們遠征國的合理性。但是，戰爭的真正根源，既不是為了拯救民俗人心，也不是為保護民眾財產，而是因為大量的內地洋兩流出外洋」。<sup>45</sup>確實，道光自己也知道鴉片問題嚴重尤在漏銀之上，「鴉片流毒內地，較紋銀出口為甚」，<sup>46</sup>因此在不斷飭下的聖諭中，一再要求官員「認真查辦」、「實力查禁」，用心至極。雖然禁煙行動終告失敗，但從道光一系列禁煙作為可以看到他對鴉片問題的認識以及禁制的決心，「查禁紋銀出洋，嚴禁鴉片進口」，<sup>47</sup>如何塞漏卮，防漏銀，杜絕鴉片蔓延蠹蝕國家根基，成為他和他臣子問政主軸，也是這一時期無數奏摺上諭，君臣來往討論的焦點。

確實，漏銀導致嘉道年間「銀貴錢賤」這一歷史上的獨特現象。道光時期大力禁煙，防犯鴉片走私，一大部份因素就在防止白銀外流，<sup>48</sup>以免國家財經支柱崩塌，特別是在 1870 年之前大部份國家採銀本位貨幣制度時代，白銀藏量多寡成為國家富強的指標。白銀外流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鴉片的大量進口，中國用白銀購買鴉片，造成大量偷漏，相對也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平衡了英國向中國購買茶葉、生絲所外流的白銀；另一是外國銀元（洋錢）易銀兩，雖然法令規定與夷商買賣只能以貨易貨，不得易銀兩，但法令不行，而當時一般認為外國銀元成色不足，流入內地後，換回中國成色十足的銀兩回去，在民間普遍好用洋錢情況下，<sup>49</sup>導致銀兩在兌換中消耗甚多，造成銀兩日少，

---

<sup>44</sup>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卷(2006: 237)。

<sup>45</sup> 賓漢(Eliot Bingham)，《遠征中國紀實》(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1843)，收錄於周寧，《鴉片帝國》(2004: 284~285)。

<sup>46</sup> 1830 年(道光十年)，〈著兩廣總督李鴻賓等認真查辦紋銀出洋鴉片入口情弊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7)。

<sup>47</sup> 1822 年(道光二年)，〈著兩廣總督阮元等實力查禁紋銀出洋及鴉片進口不得徒托空言事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2)。

<sup>48</sup> 為了解決銀荒的貨幣危機，道光朝曾採取幾項措施，如禁銀出口，禁止民間錢票流通，查禁鴉片，重錢輕銀等政策(參見，陳新余，〈道光年間的銀荒與貨幣危機〉，《常州理工學報》，17 卷，3 期(2004: 11~13))。但各種措施都遠不如查禁鴉片入口來得直接有效。

<sup>49</sup> 1822 年(道光二年)的一則上諭，〈著廣東併各省督撫查禁銀兩出口及鴉片進口事上諭〉提到，「定例廣東洋商與夷人交易，只用貨物收買轉賣，不准用銀，立法甚為周備。近因民間喜用洋錢，洋商用銀向其收買，與江浙等省茶客交易，作價甚高。幷或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不可不嚴行查禁」，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0)。

銀價日漲，銅錢價格也相對低落的現象，亦即「銀貴」導致「錢賤」。<sup>50</sup>銅錢跟銀的兌換貶值，在當時市場交易主要以銅錢為主，士兵軍餉以銅錢給付，但完糧納稅卻以白銀為準的情況下，不斷貶值的銅錢，造成人民生活負擔加重，影響國計民生甚鉅。這些因素形成嘉道銀荒，景氣蕭條現象。

漏銀現象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構成一個攸關政權存亡問題而被注意到？1799年(嘉慶四年)，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已注意到鴉片除了讓人廢時失業外，以鴉片換取中國銀兩，是件不值得之事，因此主張嚴禁嚴懲販賣。根據他的後任鄧廷楨奏說，「迨嘉慶四年，前督臣覺羅吉慶議，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禍銀，殊為可惜。且恐內地人民，輾轉傳食，廢時失業，奏請不許販賣，犯者擬罪，遞加至徒流縲少首」。<sup>51</sup>真正注意到白銀外流嚴重性，並嚴令禁銀偷漏大約在1809年(嘉慶十四年)左右，御史黃中模的奏議追溯了這事，「嘉慶十四年間，因有銀兩偷漏出洋之弊，奉旨飭查……乃近者各省市肆銀價越愈昂，錢價愈賤，小民完糧納課，均須以錢易銀，其虧者咸以為苦。臣細加採訪，實因廣東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內地銀兩漸少，其價日增」。<sup>52</sup>

黃中模這份奏摺，透露幾項訊息，一是雖然1796年(嘉慶元年)嘉慶帝見鴉片氾濫，已下令停止以藥材徵稅，<sup>53</sup>嚴禁鴉片入口，但到十四年廣東走私依然嚴重，屢禁不止，顯見禁煙無效，何以無效？就是「邇來洋商與外夷溝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煙流傳甚廣，耗財傷生，莫此為甚」。<sup>54</sup>亦即，海關索賄包稅，勾串私縱，查察疏懈，這一積弊，歷久難除，成為禁煙最大障礙，也是王朝內政腐敗根源；二是造成白銀外流，導致前述銀少而銀貴錢賤現象；三是因為銀貴錢賤，銅錢貶值，使得人民在交易、完稅中虧損甚鉅。嘉慶十九年，在蘇楞額的奏摺中，我們看到偷運出洋的白銀有一百多萬兩，同時夷商則帶進成色低的洋錢，騙取成色十足的白銀現象，「近年以來，夷商會

<sup>50</sup> 另一種說法是，「錢多錢劣」造成「錢賤」現象。由於官僚體系衰敗導致銅錢私鑄盛行，大量劣質銅錢又由日本、安南輸入，錢莊大量發行錢票，這些因素一方面導致銅錢供給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造成銅錢品質低劣，這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加速了銅錢相對白銀貶值。見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收錄於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1993: 363)。根據林滿紅這篇文章的論點，她認為除了白銀外流引發銀貴錢賤的問題外，銀貴也導致銅錢供給量的下跌，而銅錢供給量的下跌，也是造成銅錢品質低劣，亦即錢賤的原因之一，這正與「錢多錢劣」的論點相反(1993: 406)。

<sup>51</sup> 見1836(道光十六年)鄧廷楨，〈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奏復應准許乃濟所奏弛鴉片之禁並擬章程九條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05~206)。

<sup>52</sup> 見1822年(道光二年)黃中模，〈貴州道監察御史黃中模奏請嚴禁紋銀偷漏出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39)。

<sup>53</sup> 關於鴉片課稅，李圭《鴉片事略》有此記載，「前明萬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是為中國徵稅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鴉片列入藥材，每斤徵稅銀三分……乾隆二十年，稅則仍載鴉片一斤估價五錢，似徵稅如故也」，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六)(2000: 140)。

<sup>54</sup> 見1822年(道光二年)黃中模，〈貴州道監察御史黃中模奏請嚴禁紋銀偷漏出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39)。

通洋行，每年將銀兩偷運出洋，至百數十萬之多。該夷商將低潮洋錢運進，任意欺蒙，以致內地銀兩漸行短絀」。<sup>55</sup>到了 1820 年（嘉慶二十五年），吸食鴉片和漏銀現象未嘗稍減，反越禁越盛，更形嚴重。包世臣指出，鴉片從閩粵遍及各地，單蘇州一地就有十數萬人吸食，每年耗銀三、四百萬兩，全國一年算下來也有萬萬兩以上流於外夷，漏卮嚴重，無怪銀價日高，錢價越少，「近年愈禁轉盛，其始惟盛於閩粵，近則無處不有，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吃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鴉片之價較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即費銀萬餘兩，每歲即費銀三四百萬兩，統各省名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何以近來銀價日高，市價日少，究厥漏卮，實由於此」。<sup>56</sup>

包世臣提到合計全國各省漏銀數字不下萬萬兩，數目相當驚人，再看其他的統計，1829 年（道光九年），監察御史章沅提到，單是鴉片煙一物「每歲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此豈尋常偷漏可比」。這裡意指鴉片漏銀要較尋常的洋錢漏銀嚴重的多。因他同時指出夷商在交易中如何機巧的以成色只有白銀十分之七的洋錢換得，「賣物則必索官銀制錢，買物則概用番銀夷錢，銀低錢薄，僅當內地銀錢之什七。或仍以番銀給還，則斷不收納」，最後則是「番銀之行日廣，官銀之耗日多」，但這些都不及鴉片嚴重。章沅也進一步提到蠹國害民的鴉片流毒滋甚的現象，鴉片吸食者已不分身份階層，吸食地區從沿海擴及內地，「其始食此，僅系幫友長隨，今則官民士紳皆所不免。其始僅在海濱近地，今則漸染十數省之廣」。<sup>57</sup>到了 1835 年（道光十五年），黃爵滋指出的漏銀數字更駭人，已達二、三千萬兩之多，「臣查粵海關之稅，所入者不過百萬，而鴉片煙之銀，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萬，以無用有害之物，毒中國之人，而又竭中國之財，夷計之狡，莫甚於此，而屢禁不絕者，則皆漢奸爲之也……」。<sup>58</sup>從這裡可看到，當時中國對外貿易已嚴重失衡，逆差數字極其龐大，鴉片輸入是最主要原因。而這些都歸英夷，或之後稱之帝國主義的野心，欲透過鴉片輸入滅我民族，在這框架下當時協助夷商販運者都視之爲漢奸。鴉片做爲帝國主義亡國滅種工具的論調，一直持續到抗戰建國仍不休。<sup>59</sup>

偷漏和銀貴錢賤現象越趨嚴重，幣值波動貶值，影響經濟生活甚鉅。1836 年（道光十六年），許乃濟指出，「然向來紋銀每兩易制千錢文上下，比歲每兩易

<sup>55</sup> 見李揚華，〈公餘手存·海防〉，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209）。

<sup>56</sup> 包世臣，〈庚辰雜著二〉，《安吳四種》，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515~516）。

<sup>57</sup> 章沅，〈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奏爲請禁外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54，55）。

<sup>58</sup> 黃爵滋，〈敬陳六事疏〉，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462）。

<sup>59</sup> 1928 年馬寅初〈談禁煙〉一文即提到，「這鴉片政策，又是帝國主義者亡人國家滅人種族的工具之一」，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肅清私土法令、肅清煙毒、禁煙行政、蔣主席禁煙言論集、禁煙運動宣傳綱要、拒毒運動叢刊》（2009: 53）。

錢至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sup>60</sup>到了 1838 年（道光十八年），黃爵滋則說「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sup>61</sup>短短幾年，銅錢貶值了六百文，貶了一半以上，道光二十五年則更嚴重，貶了百分之百以上，「京中紋銀，每兩易制錢幾及二千文，外省則每兩易制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sup>62</sup>另一方面由於銀價日昂，致使官方鑄錢成本提高，爲了降低成本，只有減少鑄錢成色重量，<sup>63</sup>鑄錢重量減輕，兌換銀兩折損必多，如馬士指出，「從乾隆年間的足重銅錢起到嘉慶年間，錢的分量已逐漸降低，而道光年間鑄錢分量減低更甚，銅錢本身價值的損失足以使其交換價值喪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sup>64</sup>這種劣質銅錢造成兌換的虧損，道光時期貴州巡撫賀長齡則說，「今試持錢易銀，雍正以前者得銀必多，乾隆以後者得銀必少」，可見錢劣錢賤現象，道光時期甚爲嚴重。監察御史馮贊勛也提到錢劣貶值，較之過去，其值減損一半，「所有道光制錢，較之乾隆、嘉慶錢文，價值減至一半」。<sup>65</sup>這些因素造成銅錢越來越賤，人民虧損愈來愈多，生活益形支絀竭蹶，經濟也越形蕭條慘淡。1843 年來自陝西的一份奏摺，點出了兵丁換錢折耗，窮困難度的情形，「從前道光十一年并二十一年，每銀一兩不過換錢一千三四百文及一千四百八十餘文……今則每兩換錢一千六百數十文，是兵丁領錢較銀每兩少錢六百餘文。且省城旗標各營兵力，夙多貧苦，近復物價昂貴，即使減成搭放亦覺虧累難支」。<sup>66</sup>

至於，流出的白銀量，黃爵滋的統計，「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自道光三到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兩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十八年），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sup>67</sup>。漏銀嚴重，十餘年的時間，從百萬之譜增到三千萬兩，而這些數據還只侷限在某些地區，數目龐大令人爲之驚心。包世臣所說的「萬萬兩」，以全國來算，不無可能。林則徐即推估全國漏銀不止於萬萬兩。他的推算：吸食者每人每日至少費銀一錢，每年至少三十六兩，計算全國四萬萬

<sup>60</sup> 許乃濟，〈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爲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01）。

<sup>61</sup> 黃爵滋，〈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54）。

<sup>62</sup> 見〈奏議銀錢出納章程〉，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四）（2000: 301）。

<sup>63</sup> 參見，陳新余，〈道光年間的銀荒與貨幣危機〉，《常州理工學報》，17 卷，3 期（2004: 9）。

<sup>64</sup>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卷(2006: 228)。

<sup>65</sup> 轉引自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收錄於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1993: 369)。

<sup>66</sup> 轉引自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收錄於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1993: 374)。

<sup>67</sup> 黃爵滋，〈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55）。

人口，若有百分之一人吸食，則一年漏銀就不止萬萬兩，但他認為吸食鴉片者何止全國百分之一人口。<sup>68</sup>亦即，至少超過四百萬人吸食，林則徐指出了當時全國鴉片吸食人口數，數量相當可觀。包世臣和林則徐都估每日吸食鴉片須一錢銀，全國全年要萬萬兩，但我們知道 1838（道光十八年）的鴉片進口量遠多於 1820 年（嘉慶二十五年），兩者雖都約略算萬萬兩，但可想林則徐時代的耗銀數定然多於包世臣當時數字。

上面漏銀和鴉片吸食人數的龐大，不難理解道光年間的銀荒，構成了王朝的財政危機，雖不至破產，卻也造成「近年各省漕賦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sup>69</sup>陷入了人民生計、政府經費，公私交困的窘境。1850 年（道光三十年），江西學政張芾即提到，由於鴉片盛行，銀價日高，當州縣政府向人民徵錢再上繳稅銀時，即發生虧損短缺現象，地方政府得賠錢墊出，造成經辦經費支絀不足，「鴉片煙之流毒，更甚於昔日，民貧財匱，公私交困，職此之由，蓋經費之所以支絀者，由於錢糧之虧短，錢糧之所以虧短者，由於銀價日昂。州縣徵錢納銀，多所賠墊，不能不捏報災緩，銀價之所以日昂者，由於出洋之愈多」。<sup>70</sup>因此，嘉道銀荒，經濟蕭條，這一問題的急迫性可能有甚於鴉片在其它方面的傷害。黃爵滋的〈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這篇名文的重點，就在陳述漏銀有損國本的嚴重性，他憂心的說，這是「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sup>71</sup>道光十八年，林則徐更說出了日後不斷被引用的話，「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sup>72</sup>「無可御敵之兵，無可充餉之銀」，這病國之憂，正拉開了鴉片亡國滅種的序幕。我們會看到這憂慮，隨著鴉片問題惡化，王朝政權的衰敗，逐步從病國之憂，移向亡種之懼。

鴉片戰爭後十年間，中國白銀外溢問題更形嚴重。根據彭澤益的研究指出，<sup>73</sup>主要是戰爭期間英國在沿海幾個城市的直接掠奪中國商民和官庫的紋銀，據不完整的記載約 7302844 銀元。另外還有戰後鉅額的賠款至少在 2830 萬銀元以上。

---

<sup>68</sup> 原文如下，「吸食鴉片者，每日……至少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即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即不止於萬萬兩，此可覈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見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端片〉，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二）（2000: 141）。

<sup>69</sup>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1982: 1131）。

<sup>70</sup> 見〈江西學政張芾奏請嚴禁鴉片等情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41）。

<sup>71</sup> 黃爵滋，〈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55）。

<sup>72</sup> 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端片〉，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二）（2000: 142）。

<sup>73</sup> 彭澤益，〈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收錄於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2010: 17~52）。

這些都是直接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的原因。至於開放五口通商後，更讓鴉片大量輸入中國造成嚴重的對外貿易逆差，「蓋通商五口，出入各貨略相抵，獨鴉片價皆以現銀出洋，計每年漏銀二三千萬兩，故銀驟貴」。<sup>74</sup>而銀貴錢賤現象更引發內部危機，如造成農工業產品價格下降，引發商業和信用危機，而銀貴則使中國對貿易處於不利地位，同時也加劇了清政府的稅收財政危機。除了財政問題，銀貴錢賤也促成中國社會內部矛盾，如社會分化和土地集中急劇發展、城鄉失業人口增加以及抗租抗糧鬥爭的高漲。這些都是源於白銀外流引發的財政危機和社會危機，對王朝體制維繫無疑起了撼動作用。

財政和國防攸關王朝政權穩固的兩大支柱，也是建立富國強兵國家的基礎。道光時期「無可充餉之銀」的財政困厄問題已如上述，另一個迫在眉睫的危機則是「無可用之兵」的軍力問題。這一時期，吸食鴉片已成爲全國風尚，不分階層，不分地域，無所不在，無處不吸。1828年（道光九年）章沅看到這一現象，「其始食此，僅系幫友長隨，今則官民士紳皆所不免。其始僅在海濱近地，今則漸染十數省之廣」。<sup>75</sup>鴉片不再只是廣州等沿海城市或特定族群吸食的問題，它幾已擴及到內陸十八省，形成全國性、所有人的問題。1838年（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也看到吸食鴉片幾乎成爲全民運動的景象，「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爲浮靡，尙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爲市日中。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sup>76</sup>由上而下，由近及遠，不分職業，不分男女，不分年齡，鴉片滲透遍佈日常生活每一地方，打造出名符其實的「鴉片帝國」。在營官兵吸食鴉片成風，<sup>77</sup>自不例外，「凡各署胥吏，各營弁兵，沉溺其中十有九八」。<sup>78</sup>1832年（道光十二年）監察御史馮贊勛看到自將領以致弁兵，吸食成風，兵力疲軟，軍備廢弛的景況，而連州剿擒匪失利，更是嗜染鴉片兵丁，無力作戰的著名事例，因此力主嚴查，禁兵丁吸食，否則必將面臨兵不可用，也無兵可用的後患，其言「若食之在兵，則筋力疲軟，必至營伍廢弛，操防巡哨有名無實，所關於武備者更大。臣竊見近日粵、閩各省兵丁吸食鴉片煙者甚多……將不能禁弁，弁不能禁兵，遠近成風，恬不爲

<sup>74</sup> 馮桂芬，〈用錢不廢銀議〉，收錄於《顯志堂稿》，轉引自彭澤益，〈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收錄於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2010: 18）。

<sup>75</sup> 章沅，〈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奏爲請禁外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55）。

<sup>76</sup> 黃爵滋，〈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54）。

<sup>77</sup> 官兵什麼時候開始吸食鴉片？明末清初人士曾羽王，在其《曾羽王日記》中記載，「余年三十六而遭鼎革，始於青村王繼維把總衙內見有人吸此……官兵無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以來，吸之者十分中幾居六七」，顯然明末清初官兵吸食鴉片相當普遍，而且吸食風尚由官府下及士民，吸食者眾多，習染亦快。見雷瑨，〈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312）。

<sup>78</sup> 見1838年（道光十八年）陶士霖，〈吏科給事中臣陶士霖奏陳查禁鴉片非議以重刑不能挽此積習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1987: 253）。



怪，無事則偷安懈怠，有事則孱弱不堪。現在連州進兵疲軟誤事，此其彰明較著者。若不嚴行查禁，將來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竊恐一省并無一兵之用，其為貽患不可勝言」。<sup>79</sup>

連州一役，正是官兵嗜染鴉片，以致體弱多衰，戰鬥力斲喪，無以為戰的明證。1832年兩廣總督李鴻賓率兵鎮壓連州盜匪，卻因吸煙官兵眾多，羸弱無力作戰，以致五路大軍陣前潰散，敗於賊匪。<sup>80</sup>李鴻賓因此遭貴州巡撫賀長齡等人奏請重治，最後發配烏魯木齊效力，廣提督劉榮慶發配伊犁充當苦役，上諭理由「平日廢弛營務，致兵丁吸食鴉片煙，臨事不能得力，平素毫無整頓。其五路進兵，猝遇賊匪傷亡兵弁」。<sup>81</sup>連州這場戰爭，只是清廷兵弱國衰的縮影，之後的一、二次鴉片戰爭，洪楊之亂等等對內、對外大小戰爭，因吸煙成癮，不能得力，無不現出潰不成軍的敗象。夏燮更提到道光時期武備廢弛，除了閩粵鄉勇尚有戰技，水師根本無法打戰，只有一群坐以待斃的官兵，「今以禁煙之時事言之。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武備廢弛，而尤莫甚於水師武備之廢弛，今十七省之大，惟閩粵二省有習火攻水戰之技者，而皆在鄉勇，不在水師」，更不堪的是「中國有坐以待斃之官兵，無咄嗟可辦之水勇」，為什麼水師不能作戰？因為水師收受鴉片作為私縱規費，變賣圖利，成為他們最大收入來源，「水師非但不可用而已，凡外洋煙土之入口者，必先給巡船水師土規，而後聽其私售。故水師生計，得自月餉者十之一，得自土規者十之九」，夏燮最後重話點明，這些水師不只不能作戰，更是阻礙禁煙的漢奸，「關吏水師無非漢奸，皆不利於煙土之禁」。<sup>82</sup>

咸同年間，官兵吸食鴉片仍未稍減，氣衰體弱，遇敵不戰而潰，整個王朝國防武力，不堪聞問，「洪楊亂後，各省綠營兵士，幾有大半吸煙成癮者，精力衰耗，神志萎靡，恃此輩以陷陣衝鋒，宜乎其不戰而先潰，中國武備遂不可問也」。<sup>83</sup>到了光緒年間鴉片風氣愈益猖獗，1882年（光緒八年），張之洞提到山西省吸煙人口過半，一片怠惰貧弱奄奄景象，「晉省吸煙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婦人女子，雖皆沾染，大率鄉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疴羸，家家晏起怠惰積靡，毫無朝氣……貧者益貧，弱者益弱，數十年後晉其危乎」。<sup>84</sup>鴉片之害如是，有詩記之，「盜賊猖狂不怕死，我兵孱弱只要錢。但說將軍不好

<sup>79</sup> 馮贊勛，〈湖廣道監察御史馮贊勛奏請嚴行查禁弁兵吸食鴉片摺〉，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45）。

<sup>80</sup> 雷瑯，〈蓉城閒話〉，記載「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盜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等語，是軍營吸煙習氣，彼時已然」，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303）。

<sup>81</sup> 1832年（道光十二年），〈因兵丁吸食鴉片致使連州進兵不能得力著重處李鴻賓等上諭〉，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47）。

<sup>82</sup> 見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夏燮，《中西紀事》，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40~241）。

<sup>83</sup> 雷瑯，〈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 303）。

<sup>84</sup> 張之洞，〈禁種罌粟片〉，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15）。

武，那知戰士多不前」。<sup>85</sup>將軍不武，戰士不前，民貧兵弱，不只山西危殆，整個王朝亦復如此，內外敗戰連連，除了武器軍備不如人，即便最根本的氣血體力都遠遠不及。身體作為經濟生產、國家軍備的基本單位，在這段時期已跟國家富強目標脫節。鴉片導致國貧兵弱，埋下日後人稱「病夫」的鴉片身體，不惟作戰無力，有亡國之禍，更有滅種之憂。鴉片帶來銀荒危機，鴉片身體成為兵弱根源，這一時期銀荒兵弱，民貧國窮的困局，成為百餘年亡國滅種憂患意識的肇始，但也進一步激起了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的追尋動力。

## 二、鴉片造成種族滅絕的威脅

鴉片影響清政府的財政和軍力，一直到光緒末年仍未稍減，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仍有報紙文章呼籲，鴉片造成財政軍政的貧弱，導致內政敗壞，外交困頓，要救亡就要禁鴉片，「夫是以財政之貧，貧於鴉片，軍政之弱，弱於鴉片，且財政貧而內治因之腐敗，軍政弱而外交因之困難。識時之彥，莫不曰救亡，救亡，救亡之道何在，莫不曰禁煙，禁煙」。<sup>86</sup>作者一連用了三個救亡，救亡確是清末民初經常出現的主題字，相關字眼就是保國、保種，特別是「種」這一字，伴隨而生出弱種、謬種、賊種、種性、傳種、種戰等等語彙，嵌入各種攸關時局的救亡改革論述中，種族知識成為「中國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從1898年百日維新流產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這段時間，以種族來劃分人群，逐漸成為一種科學形式而為晚清知識份子所接受」，也促使「晚清知識份子能夠追求政治近代化」。<sup>87</sup>它反映的是，中國已來到種的世紀，一個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崛起的世紀，一個種與種爭的國際競爭時代，同時也透過人種分類及其優劣排序，理解世界概貌和強種之必要。

而從「軍政弱而外交因之困難」這句話，可以知道國際架構下的對外往來，已是當時思考關注重點，不再是過去朝貢制度下互市的經貿關係，更是國際關係下領土保衛的國防關係，清末兵弱無外交，適足以說明國際軍事力量（或帝國主義力量）對中國的壓迫，中國卻無戰力以保衛國家、保衛種族，這時期亡國滅種的焦慮，正來自於這種國際性的生存競爭格局。過去國亡，易姓易朝而已，文化血緣不會斷，現在國亡，可能一個種族為另一個種族滅絕盡淨，因此強調滅種危機，強化種族論述，才成為這一時期主要修辭。在這種脈絡下，晚清帝國透過種族競爭論述，特別是在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支撐下，捲進了當時興起的種族論述和國際現代性。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即指出，中國「透過社會達爾文主

---

<sup>85</sup> 1891年（光緒十七年），陳鼎雯，〈鴉片煙新樂府，惡軍士不用命也〉，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256）。

<sup>86</sup> 〈論禁煙機會不可失〉，《申報》，1906年6月11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87）。

<sup>87</sup> 沙培德，〈梁啟超與晚清中國「種族」之概念化〉，《清史譯叢》（第八輯）（2010: 68）。

義的挪用，進入全球性的種族話語中」。<sup>88</sup>當時中國的改革思想，某種程度是即時與國際接軌，挪用西方新興思想、現代性知識、技術進行中國救亡工程。現代性在國族救亡改革的目標下，輕易的移植進中國，為開明改革派知識份子所接受和實踐。中國同時也打破天朝觀，開啓了世界版圖的視野，重新在世界版圖中定位自己的座標。民族主義的追溯和建構，就是試圖自我定位，以凝聚內部力量，識別敵我，應對種戰的生存鬥爭。

在國際競爭下，救亡的層次如上所述已不只是國家，而更在種族面向。國家亡，可再建，種族滅，不復存。正如劉師培所說，「中國當蠻族入主之時，夷族劣而漢族優，故有亡國而無亡種，當西人東漸之後，亞種劣，而歐種優，故憂亡國更憂亡種」。<sup>89</sup>在種戰的世紀，兵弱銀荒不只攸關國家政權維繫，更關涉種姓淪亡，血脈文化續絕，滅種乃有甚於亡國。而鴉片不絕，致令中國更劣於歐種，甚至其它人種，亡國，更滅種。這是甲午戰敗後，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一代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救亡圖存，強國保種成為帝國黃昏到民國肇造這一時期的主題，個人生命、種族生命自此納入國家富強計劃，成為國家資源一部份，以應付外來種族威脅。這些努力結果，不管是新學引進，觀念啟發，或投身於改革行動，為現代性中國鋪下前進的道路。

1895年，受到甲午戰敗刺激，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四篇震撼人心，啓人省思，影響後世深遠的重要文章<sup>90</sup>，其中〈原強〉一文，指出中國貧弱，國勢危殆的病根所在，鴉片、纏足惡習，正是其一，既害民力，也礙變法，「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而孰知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窳，胥於此焉階之厲耶？是鴉片、纏足二事，不早為之所，則言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sup>91</sup>從天擇角度，也就是從種族生存競爭角度來看，嚴復很清楚的知道中國兵萎、國貧、種弱的根源在哪裡，貽害民力甚深的就是鴉片和纏足，它們有礙身體健康，攸關民種品質。從官兵士子到天下之民，無不深染煙癮，一息奄奄，如何成事，造就下一代；婦女纏足，更有傷母體，有害傳種，中國下一代也不會更優秀、進步，因為「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sup>92</sup>這些危害作用於身體，直接造成個人體力和下一代體質的衰頹孱弱，有違「血氣體力之強」的「生民之要」。<sup>93</sup>這樣身體也不符合社會進化的要求，無法應付生存競爭，註定成為被淘汰的弱種、謬種，終將

---

<sup>88</sup>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 on Modern China)(2003: 130)。

<sup>89</sup> 劉師培，〈中國民族志〉，《劉申叔遺書》(1997: 629)。

<sup>90</sup> 這四篇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

<sup>91</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30~31)。

<sup>92</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30)。

<sup>93</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18)。

「無以自存，無以遺種」。<sup>94</sup>要變法革新，要富強，就當深刻體認，民力的重要，「一國富強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為之基」。<sup>95</sup>強健體力和良好的國民體質，是富強的根本，是「斷民種之高下」<sup>96</sup>的判準。這兩項危害個人和種族健康，有傷國本的陋習，務必滌除才能保存民力、延續國脈。貧富強弱之異的肇分，全在鴉片、纏足之存廢。

早於嚴復一年，鄭觀應即提到廢鴉片、廢纏足與自強的關係，「早除煙障，與廢八股，戒纏足者同功。是為自強基礎，可免萬人欺侮」。<sup>97</sup>梁啟超也提到，鴉片之毒遍佈，舉國嗜之、依之，纏足殘體至深，卻引為美姿，習以為常。一般人民對這些戕身陋習安之若素，毫無所覺，這是不知羞恥所致，而民之無恥於斯，將必導致身廢、家破、國亡。他在 1897 年〈知恥學會敘〉文中慨陳，「民惟無恥……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視為虺命為鳩，乃遍國種之，遍國嗜之，男婦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纏足陋習，倡優之容，天刑之慘，習之若性。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sup>98</sup>

確實，嚴復的富國強兵之道，亦即生民之要有三，「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sup>99</sup>，就當時狀況，鼓民力的最大障礙無疑是危害國族生機的鴉片和危害母體健康的纏足。在這股強種、保種風潮下，全國各地陸續成立不少戒纏足會，戒煙會，特別是總會設於上海的「不纏足會」，全國會員達三十萬眾。這些團體的紛起，多少都受到社會進化論的影響。<sup>100</sup>我們可以從以下例子看出：發起戒煙會的維新派人士徐勤，在〈戒鴉片煙會序〉中警告，鴉片有「傷於身」、「害於家」、「損於國」、「弱於教」的賊種之害，吸食者不是誤時誤事，就是無力生產，致百業不興，亦招來親友的不齒唾棄，「若夫官吏則誤公，農圃則失時，工商則廢業，行陳則弛勇，族里所不齒，戚友所擯棄……嗚呼中洲靈淑之氣，億兆神明之胄，豈天留此鳩毒之物，以賊其種類者哉」。<sup>101</sup>至於跟鴉片同屬國恥的纏足，也攸關進化傳種大事，同為種族生存大礙。1896 年張之洞在〈不纏足會敘〉中說出他的擔憂和恐懼，纏足害家病國，下一代也必脆弱多病，終至舉國體衰氣萎，命不久壽，種族漸泯滅。他認為纏足之害更甚吸食鴉片，「婦女無不纏足者……言其害於家病於國者……尤酷者，人子之生，得父母氣各半，其母既殘其筋骸，瘁其血脈，行立操作，無不勉強，日損無已，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噫！吾華

<sup>94</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24)。

<sup>95</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29~30)。

<sup>96</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18)。

<sup>97</sup> 1894 年(光緒二十年)，鄭觀應，〈致上海戒煙會鄭君蘇龕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1988: 1178)。

<sup>98</sup> 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1997: 140)。

<sup>99</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29)。

<sup>100</sup> 參見皮后鋒，《嚴復評傳》(2006: 91)。

<sup>101</sup> 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四)(2000: 462)。

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夭……殆有甚於吸洋藥者矣……吾甚懼中華四萬萬之種族，從此患瑣疲爾以至於漸滅也」。<sup>102</sup>

康有為則在 1898 年的〈請禁婦女裹足折〉提到鴉片和纏足在種族競爭世界的危機。鴉片和纏足成爲外人拍攝傳笑的題材，被譏野蠻，自取其辱，「……加復鴉片熏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爲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特別是纏足一事，豈招恥蒙羞而已，既不衛生，又有傷身體，且貽害後代，易傳弱種，在「與萬國競」的年代，如何強兵作戰？跟體直氣壯不纏足的歐美婦女比起來，其危害令人堪憂，「……而衛生實有所傷……上傳身體，或流傳孫子，奕世體弱，是皆國民也，羸弱流傳，何以爲兵乎？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爲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迴觀吾國之民，尪弱纖儻，爲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今當舉國徵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sup>103</sup>

康有為的學生梁啓超跟嚴復一樣，亦將纏足問題放在種族良窳的民族救亡框架討論，都認爲纏足不只傷害個別身體，更影響到下一代品質，梁啓超特別著眼於根本的解決之道，即從興女教開幼學著手，透過教育啓蒙婦女，端正母教，以厚植下一代，去除中國積弱不振之弊。這在他 1896 年的〈戒纏足會敘〉文中可見用心，「且中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sup>104</sup>1897 年《時務報》上一篇文章更直指，「纏足之爲害，有繫乎強種之義」。<sup>105</sup>1898 年另有人指出纏足害種，救種救國，先戒纏足，「今者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其害種者而已。夫害種之事，孰有如纏足乎！孰有如纏足乎」。<sup>106</sup>這些反纏足言論，與其說他們對女子關懷，毋寧說他們更關懷母體爲中國孕育出什麼樣的下一代。1902 年一位華族女校學監下田歌子，在論興中國女學時提到中國婦女好纏足不只成爲家累廢物，也導致弱種相傳，在種族競爭世界，有淘汰之虞，因此必興女教，教育婦女，以強母種，這種說法正是母體/母種做爲國族基礎這一立場的反映。其文寫道，「不獨女子一身，孱弱病苦，已成廢物，爲男子之大累，即其所生子女，亦決不能強健，弱種相傳，愈傳愈弱，今日之世界，乃種族競爭之世界，優者勝而劣者敗，強者存而弱者亡……纏足之不禁，吾其爲支那人種前途慮矣！大凡一國女學優者其男學必優，何也？母教使然也。一國女體強者其男體必強，何也？母種使然

<sup>102</sup> 張之洞，〈戒不纏足會敘〉，收錄於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附錄一）》（2008: 332~333）。

<sup>103</sup>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1981: 335, 336）。

<sup>104</sup> 張品興編，《梁啓超全集》（1997: 80）。

<sup>105</sup> 1897 年 12 月 11 日，沈逝水，〈不纏足會廣議〉，《時務報》，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73）。

<sup>106</sup> 1898 年 7 月 25 日，曾繼輝，〈不纏足會駁議〉，《湘報》，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73）。

也」。<sup>107</sup>

1903年金一的《女界鐘》，亦將鴉片纏足惡習與民族存亡聯繫起來，特別提到自絕死路，斷絕宗嗣，無以傳種，惟有戒除才能強種興國，他說「從古滅種之國，皆由於自造而非人所能為，今吾中國吸煙纏足，男女分途，皆日驅於禽門鬼道，自速其喪魂亡魂而斬絕宗嗣也。我同胞其念之矣……天全神完則種強，種強則興」。<sup>108</sup>母體健康至關國族生存大計，此一重要性如上所述在這時確已成爲有識之士的共識，爲文提醒重視的言論不少，如纏足「百骸俱病，母氣不足，生子亦不能壯，則尤弱種之原點也」。<sup>109</sup>1904年另一篇從衛生健康角度發言的文章，纏足傷己又害下一代，「纏足之弊，大抵謂血脈不和則易生疾病，此害於衛生也。氣血不旺，則生子不強，則害於種族也」。<sup>110</sup>1904年一篇討論〈放足與人種之關係〉的文章，更直接點出放足乃女子獨立的起點，獨立則攸關種族優劣，「欲脫男子之壓力，則女子不可不獨立。欲獨立必自放足始，蓋放足者，獨立之起點，強種之根源」。<sup>111</sup>更進一步說，這篇文章強調尊重女性，提倡女權，女權成爲強種之源。亦可見女權在這段時期已是關注討論的議題。至於，孫中山也在1906年制訂革命方略時提出，「如奴婢之蓄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sup>112</sup>視這些「風俗之害」與「政治之害」一樣，都是革命應除的積弊。從上文引述可知，纏足問題，不在女子之足，而在母體之種，如果無亡國滅種之憂，無近代化論的開通觀念，恐怕不構成朝野討論的問題。鴉片、纏足問題嚴重性，已從傷身提高到害種，成爲清末民初國家改革，民族重振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上面論述，吸食鴉片原本出於個人習癖、品味或感官經驗，纏足關涉婦女私密、封閉、禁忌的身體，如今都攤開來，成爲公共討論的議題，納入國族救亡敘事的框架。而鴉片身體、纏足身體，以其病態之姿，做爲中國病態化象徵，也進入文明改造議程，中國是否洗淨國恥，是否躋身現代文明，端賴身體正常與否，是否符合強國強種所需文明、正常的身體標準。

### 三、鴉片是革命建國大業障礙

---

<sup>107</sup> 〈華族女學校學監下田歌子論興中國女學事〉，東京《湖南游學譯編》（第一冊），收錄於張玉法、李又寧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95: 567）。

<sup>108</sup> 金一，李又寧編，《女界鐘》（2003: 57）。

<sup>109</sup> 李增，〈遷安、遵化天足會序〉，《采菲錄》，頁40，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73）。

<sup>110</sup> 1904年11月20日，〈禁止婦女纏足說〉，《申報》，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95）。

<sup>111</sup> 大雄，〈放足與人種關係〉，轉引自楊鵬、李慶峰，〈維新派的種族觀：「救亡意識」下的「保種」思想〉（2007: 103）。

<sup>112</sup> 見〈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孫中山全集》（第一卷）（1981: 297）。

從帝制跨到共和這段期間，就禁煙運動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政府在 1906（光緒三十二年）年發佈禁煙上諭，限定十年內將洋、土藥革除淨盡，並與英國在 1907 年簽訂〈中英禁煙協定〉，以十年為限，戒絕鴉片在中國的販、運、吸、種，英國評估中國禁煙成效，逐年遞減十分之一印度鴉片輸入中國，十年後完全禁絕，不再輸入。這十年是中國禁毒史的黃金期，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透過知識份子傳播媒體的呼籲倡言，發揮輿論監督和教育力量，舉國上下努力執行禁煙政策，成效卓著，「其時全國種販均將絕跡，吸食亦見日稀」，<sup>113</sup>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即通令全國，鴉片有「種姓淪亡」、「亡國滅種」之害，現今民國成立，應洗除舊習，良法美制才能遂行，如有沉迷鴉片者，則應剝除選舉與被選舉權的資格，不配作共和之民，如此才能成爲民國之新民，一雪東亞病夫恥辱，「方今民國成立，炫耀宇內，發憤爲雄，斯正其時。若於舊染錮疾，不克撥滌盡淨，雖有良法美制，豈能恃以圖存？爲此申告天下……其有飲鴆自安，沉湎忘返，不可爲共和之民。當諮行參議院，於立法時剝奪其選舉，被選一切公權，示不與齊民齒……屏絕惡習，共作新民，永雪東亞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sup>114</sup> 1917 年底英國調查中國禁煙確實，履約不再輸入印度鴉片，禁煙運動取得勝利。

然而，共和成立，民國肇建，中國並未統一，仍處軍閥割據分裂狀態，這讓被壓制的鴉片獲得一線生機，死灰復燃。1913 年的一份《政府公報》，指出清末因恐滅種，強力禁煙，成效可觀，共和成立以來，統治不及全國，戰爭仍起，各地禁煙有所懈弛，因此要求持續嚴禁，「前清末葉，全國始憬然以滅種爲憂，斷腕決瘡……光復以來，治具未張，兵戈迭擾，各省地方能厲行禁令者，雖尚有之，而牽於現勢，漸就懈弛之區亦復在所難免。本部以此事爲民族強弱存亡所繫，累經咨行各省庚續辦理」。<sup>115</sup>雖然如此，1917 年前，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仍堅持禁煙政策，他曾諭知全國，鴉片「外招譏議，內長貧弱，此害不去，國由何振」的亡國滅種之禍，<sup>116</sup>同時也制頒一套禁煙法規和條例，最後達成中英禁煙協議。

1916 年袁世凱過世，軍閥擁兵自重，割據愈烈，連年戰爭所需龐大軍費，只有透過勒種、包運、販賣鴉片以裕餉糈、購置武器、擴充勢力。復以英國不再對華輸入鴉片，各地方政府查禁鬆弛，私開煙禁，使得這段時期吸食和種植鴉片較之前更爲嚴重，中國從鴉片輸入國一反而爲輸出國，其最關鍵因素不外鴉片已成爲各方勢力的財稅來源，不管是軍閥，或之後的南京國民政府和共產黨，都透

---

<sup>113</sup> 1916 年 12 月 9~13 日，〈眾議院議員鄒魯提出禁煙建議案〉，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673）。

<sup>114</sup> 1912 年 3 月 2 日，〈大總統令禁煙文〉，《臨時政府公報》第 27 號，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567）。

<sup>115</sup> 1913 年 10 月 18 日，第 523 號《政府公報》，〈爲禁煙事內務部致各省都督民政等電〉，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621）。

<sup>116</sup> 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 336）。

過各種巧立名目的煙稅、畝捐、煙畝罰金，<sup>117</sup>和寓禁於徵的國家專賣制度，從鴉片取得政權維繫和擴展的資金。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在輿論壓力下，收回實施不久的鴉片專賣政策，並在〈全國禁煙會議宣言〉中，承認禁煙大業誤於軍閥割據和徵稅政策，導致民生經濟、民族健康、道德風氣在鼓勵鴉片吸食的專賣政策下，更加破敗衰竭，國不成國。1918年以來的「禁煙事業一誤於軍閥割據之局面，再誤於寓禁於徵之政策，以致煙禍日深，民生益困，民族益弱，民德益衰，長此因循，國將不國」。<sup>118</sup>是以在這段軍閥分立，北伐統一，抗戰建國時期，鴉片亡國滅種的憂慮和言論並未稍減，只是結合了實踐三民主義、捍衛民族生存、抵抗帝國主義以及完成革命建國大業的國族任務。在國家建設目標以及國際禁煙輿論壓力下，特別是幾次在國際禁煙會議遭到煙禁廢弛，私縱鴉片的抨擊，既有礙國際視聽，也有損國際地位情勢下，特別在1935年到1940年推動「二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配合新生活運動，將禁煙轉化為一種全民社會運動，既是政治的管治運動，也是道德的重整運動，成為禁毒史上的第三次高峰期。

在列強意圖強佔中國野心下，激發愛國情緒和民族主義無疑仍是這一時期宣揚重點，國民黨一份宣傳文件指出，禁煙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主義的基本工作，不禁煙民族無以強，無以存，「非禁煙不足以挽救民族之危亡，非禁煙不足以實現民族主義，禁煙乃挽救我民族轉弱為強之最要關鍵，禁煙運動為實現民族主義之基本工作」。<sup>119</sup>再者，鴉片不除，有違總理遺教，無法實行三民主義，1928年馬寅初演講，「我們天天讀總理遺囑，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可是鴉片不禁止，人人將成為鴉片鬼，還講什麼民族主義。金錢盡為鴉片而消耗，還講什麼民生主義」。<sup>120</sup>鴉片鬼跟三民主義新中國、共和公民身份有所抵牾。1928年中華國民拒毒會的一份宣言也提出，「鴉片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為軍閥官僚生存之命脈，實三民主義之勁敵，亡國滅種之禍根」。<sup>121</sup>因此，革命要成功必先肅清鴉片，如此才能打倒軍閥、帝國主義，實現三民主義，以絕禍根，「本會認為革命運動之成功，與鴉片之肅清有莫大關係，國民黨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鴉片之罪惡不但為破壞民生，蹂躪民權，消滅民族

---

<sup>117</sup> 煙稅五花八門，極盡巧立名目之能事，如種植方面有：煙畝罰款、煙畝罰金、煙苗稅、牌照稅、煙窩捐等；不種的要徵：懶稅、懶捐、空土稅；買賣的有：落地稅、出售稅、統費、特稅、秤捐；運送方面有：印花稅、起運稅、過境稅、內銷稅、外銷稅、出口稅、護商費；吸食方面有：營業牌照稅、紅燈捐、煙槍捐、吸煙執照費、癮民捐、戒煙費等。見王宏斌，《禁毒史鑒》（1997：373）。

<sup>118</sup> 1928年11月，〈全國禁煙會議宣言〉，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拒毒運動叢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276）。

<sup>119</sup>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禁煙運動宣傳綱要》，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236）。

<sup>120</sup> 《馬寅初演講集》（第四集）（1932：274）。

<sup>121</sup> 〈中華國民拒毒會反對鴉片公賣宣言〉，中華國民拒毒會編著，《反對鴉片公賣言論集》（1931），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892）。



之禍根，亦抑帝國主義侵略之政策，軍閥生存之命脈」。<sup>122</sup>

歷經軍閥扶植鴉片以為利源，北伐戰亂查禁鬆弛，鴉片更形猖獗，危害益深。1928年陝西省政府的一份勸誡佈告可知現況，鴉片傷身敗家，弱種亡國，在革命建國時期，必無強健體魄可效力國家，「推其禍害，大則足以弱種亡國，小則足以蕩產傾家。一經沾染，即成廢人，不能服務社會，遑云效力國家。況當此革命時期，全賴強健體格，活潑精神，共同奮鬥」。<sup>123</sup>1929年第六屆拒毒運動周，亦仍以亡國滅種為憂，諄諄告誡鴉片影響內政、外交，攸關民生、實業和國體健康，「鴉片與一切麻醉毒品之禍害，為我國外交失敗，內政不修，土匪充斥，奸佞橫行之主因，結果使國體貧弱，社會混亂，實業凋零，民生窮困。長此不圖補救，必至亡國滅種」。<sup>124</sup>

因此，鴉片成為革命建國大業的障礙，不除至恥，革命難成，「鴉片……實是革命最大的對象……假如對於亡國滅種的煙禍不能禁絕，就是本黨最大的恥辱，同時革命也難望澈底成功」，因此煙禍，「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在最短期間內設法革除，為未來的國家民族保持健康，延續命脈，發展生存」。<sup>125</sup>鴉片乃成為革命的對象，要用革命手段剷除鴉片，以利國家擘建計劃，「現在我們北伐成功，中國統一，所有一切建設的事業，已積極進行，這弱國病民的鴉片，我們自然也應當用革命的手段來把它一律剷除」。<sup>126</sup>北伐統一要革鴉片之命，訓政建設時期鴉片也是革命對象，整個新中國建設，新國家建立似乎全賴鴉片之淨除。1932年報紙一篇社評即指出，「中國如不能除毒禍，即永不能談建國。消極除害，尚且不能，更何論積極建設」。<sup>127</sup>1936年禁煙總會首次會議訓詞，也特別提到禁煙是政治建設，復興國家的首務，「禁煙如果不能收效，其它一切政治建設的工作，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不收效，所以我們大家要看鴉片之危險，勝於外侮，要認定禁絕鴉片，為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的第一要務」。<sup>128</sup>對日抗戰時期，兵力的數量和體質成為決戰要件，這是相當實在的問題，鴉片身體顯然無法抗戰殺敵，1939年六三禁煙紀念訓詞，特別點出這一事實，「要貫徹抗戰必勝的目的，非全民一

---

<sup>122</sup> 1928年，〈中華國民拒毒會發表禁煙主張〉，中華國民拒毒會編著，《反對鴉片公賣言論集》（1931），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898）。

<sup>123</sup> 1928年1月10日，〈陝西省政府佈告〉，《陝西省政府公報》，民17年1月12日，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848）。

<sup>124</sup> 1929年10月10日，〈第六屆拒毒運動周〉，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932）。

<sup>125</sup> 見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188）。

<sup>126</sup> 褚民誼，〈以革命手段來剷除鴉片〉（十七年十一月在全國禁煙會議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之理論與實施》（1935：20），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38）。

<sup>127</sup> 1932年5月11日《大公報》，〈拒毒為救亡大計之一〉，轉引自馬模貞，《毒品在中國》（1994：74）。

<sup>128</sup> 1936年2月1日，〈禁絕鴉片為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第一要務〉，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3），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171）。

致力行精神總動員不可，澈底肅清煙毒……須知我們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自非需要大量的兵員補充不可，如不把鴉片煙毒剷除盡淨，怎樣能有大量的壯丁補充前線」，<sup>129</sup>因此呼籲用抗戰殺敵精神來根絕煙毒，戒煙戒毒就像戰場殺敵，「以戒煙戒毒視為在戰場上與敵作戰一樣的重要」。<sup>130</sup>

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對煙毒的抗戰仍未竟全功，「二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配合新生活運動，其意雖不無鞏固權力，全力抗戰，卻也能雷厲風行，貫徹禁政，有所成效，惜因戰亂阻礙和淪陷區敵人毒化政策，讓「政府雖決心禁毒，而權力有所不及，莫可如何」，致不能根除淨盡。勝利後，建國大業正要開始，這時期政府的要求，「國民體格之加強與民族健康之增進」，因此再次呼籲全民「戒絕不良之習染，以符強國國民之實」，<sup>131</sup>而當憲政開始之後，禁政與憲政齊頭並進，不容偏廢，目標既是煙毒也是「破壞禁政」的共匪，最後宣示，「如有一人或一地之違禁，斯即吾人今日之職未盡，亦即我全民族之恥辱未雪」。<sup>132</sup>國民體格與民族健康，到了這時期還成爲國家強調呼籲重點，還連結國家恥辱，大可推知百餘年鴉片亡國幽靈仍纏繞著分裂凋敝的中國，鴉片問題仍不可解。

鴉片終究關涉身體體魄、種族健康和民族恥辱，這是問題核心，它影響革命建國，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大業，是舊時代跨入新時代，舊王朝邁入新國家的關鍵，這也正是這段時期亡國滅種憂患意識之所由。就此，國民的身體、生命，不再屬於個人，它是國家的資源財產，納入國家建國統一計劃，受國家保育、調度，指向國家目標。民力即戰力，即國力，人民受命於國家強化民力，只爲更高的國家興盛目標，至此，人民生命與國家結合，生命納入政治範疇，弱種的鴉片身體成爲生命政治的匯流點。

亡國滅種的鴉片歷經百餘年，從兵弱銀荒的國防財經危機，到種族消滅的滅種威脅，以至攸關新國家建設大業的開展，它跟民力、國富、種強的追求息息相關，簡言之，就是要保衛身體、保衛國家、保衛種族，這三保<sup>133</sup>是清季到民國整個國家的生存主題，也是救亡基調，溝口雄三即指出，洋務運動是一種自我防

---

<sup>129</sup> 1939年六三禁煙紀念訓詞，〈以抗戰殺敵精神來根絕煙毒〉，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16），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84）。

<sup>130</sup> 1941年2月28日，新生活運動六週年紀念廣播演辭，〈除毒務盡〉，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23），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91）。

<sup>131</sup> 1946年六三禁煙紀念訓詞，〈滌除舊染共作新民〉，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36），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204）。

<sup>132</sup> 1947年六三禁煙紀念訓詞，〈共匪與煙毒結爲一體禁政與憲政不容偏廢〉，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39），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207）。

<sup>133</sup> 清末的三保是，保國、保種、保教。

衛的過程，爲了保護自己的世界和文明體系，只有接受、吸收優秀的異質文明，在器物、軍事工業等制度進行自我變革，以維護自我文明的運行，而這是在遭受一連串侵略和失敗中所採取的自我防衛過程。<sup>134</sup>無論是自強運動、百日維新、革命建國；從器物、體制到思想變革；從君主立憲到共和體制提倡；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都是在一連串失敗後，因應內部危機，外在威脅的防衛行動，一種以西方爲方法，將西方現代性作爲中國革新要素，達到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目標所必須進行的保衛行動。

---

<sup>134</sup> 見溝口雄三，〈作爲方法的中國〉（2011：72~73）。

## 第二節 從生命鴉片化到生命政治化

### 一、生命鴉片化

在鴉片亡國亡種以及國際種族競爭威脅下，國家跟民間社會力量，無不較過往重視人民生命維護，種族命脈延續。或許，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很少有那一段時期，像此刻這樣讓國家如此重視人民生命安全，法不勝立、令多如毛的規範、保護人民遠離毒物，不受傷害，儘管這過程法令或多有不符，成效不佳，或出於財稅考量，煙禍更熾，但其用心，無庸置疑。也就是在這裡，我們看到生命，從個體到種族，成為國家保護、扶植、強調的對象，這是生命的政治化，因為個體和集體如同前面所述，攸關國防財經、革命事業、新國家建立以及種脈續存，它也因此納入政治經濟範疇，亦即富國強兵的框架，成為國家算計、控制、籌劃的對象，特別是在戰禍連連的時代，鴉片對身體、人口、遺傳品質、國家生產力的傷害和影響更是至關整體國家戰力以及存亡續絕之要事。抗戰時期的禁煙宣傳口號，「有煙毒即無國家」、「煙毒不除，無以為現代強國」，<sup>135</sup>鴉片亡國滅種的修辭既出於這種政治經濟考量，也配合國家富強保種目標，成為既反映現勢危機，也馴化人民思想的意識型態。這意識型態最終指向現代化國家建設，透過身體政治、經濟到人口/種族的生命政治，進入現代性範疇。也因此我們看到一系列現代性改革措施，如國家針對個別身體、集體人口的健康品質，展開的一系列改善和強化措施，同時重視體育教育、武化身體鍛鍊、遺傳善種、公共衛生、健康醫療等現代化作為。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鴉片身體是生命與政治的結合點，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是生命政治的根源，強國強種的國族目標讓生命政治誕生。這裡的生命政治概念，則以傅柯的論述做為分析的參考。

### 二、生命鴉片化

接著再轉入傅柯生命政治概念。傅柯研究權力的發展型態，認為十九世紀政治權利出現新的變革，也就是一種與古老君主主權相反的新的權利形式誕生：「使人活和讓人死的權利」(the right to make live and to let die)。亦即，權力開始負擔起生命的責任，也就是讓人活著的權利，而不是主權至上時代「使人死或讓人活的權利」(the right to take life or let live)，剝奪其生命。權力必須積極的管理、照護、調節生命，這是某種生命的國家化，也就是生命政治。<sup>136</sup>傅柯認為主權權

<sup>135</sup> 見《禁煙手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500)。

<sup>136</sup> 傅柯，《必須保衛社會》(1999: 27~228)。

力經常表現對土地財富的佔取和生命的壓制剝奪，而不是生命的給予和生產。生命政治的發展則跟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需要有關，強調效用、紀律、健康的勞動身體和馴服、常態化的社會身體，並提昇人口生命品質做為國家有用資源。這些都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籌劃對象，以配合資本主義生產節奏、管理方式、技術程序和國家戰爭的需求。因此生命的給予和保衛才是權力的目標，這使得權力運作逐漸偏離傳統的主權形式，亦即偏離主權讓人趨向死亡的過程。因為從歷史的發展「權力的過程是不停的偏離死亡」，最後「權力的最高功能不再是殺戮，而是從頭到尾的控制生命」。<sup>137</sup>

權力從構作死亡到偏離死亡的轉變，一方面來自歷史發展的事實，亦即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經濟與政治越來越與出生率、死亡率、發病率、人口繁殖、壽命延長的控制過程有關；而流行病災害也不再被視為是一種突然被奪去生命的死亡，這些罹患疾病的人口已被看做是一種削弱工作力量，減少工作時間，降低產能，付出經濟代價的國家力量衰敗的問題。因此公共衛生、社會醫療、都市和自然環境成為必須控制調節的重點，透過醫學，人口統計等專業擔負起維護健康身體和提高生命價值的責任。然而，權力遂逐漸遠離死亡進而保護生命的同時，也造成知識干預進入權力領域，生命政治基本上跟這種知識技術的干預和控制有關。<sup>138</sup>也因此造成十八、十九世紀發展出來各種監控、公衛、醫療、統計、生物學、優生學等專業知識和技術成為更具說服性和滲透性的支配力量，無須主權的直接操作，這些知識/技術本身就構成一種權力，普遍存在於日常生活各領域。因為生命政治中涉及到出生/死亡率調控，意外事故的降低，流行病的控制，人口壽命的延長，種族危險的避免，國民健康的強化，生活品質的提升，社會安全、社會保險機制的建立，這些無一不需國家的干預和調節，國家必需負起照管生命的責任。而在種族主義的脈絡下，傅柯進而提到過去「我們必須保衛自己對付社會」，也就是對抗來自國家機關、法律和權力結構的奴役和迫害，至於現在「我們要保衛社會」，來對付生物學上的威脅。<sup>139</sup>面對種族的威脅，國家權力不該視為壓迫人民的工具，而是與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對抗種族敵人。生命政治的目的正在於：保衛社會、保衛生命對抗外來威脅。通過對人口、生命和活人的管理控制。

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儘管關注國家權力如何更緊密、更無所不入的抓住人民，從身體規訓以至整體人口調控，特別是在自由主義時代，以更仁慈、更關照人民的立場，從生到死全面介入、干預，讓人們得以活在政府周全完好保護下，避免來自內部、外在的生存威脅，但也更順服、更依賴國家照管，最後無所遁逃於國家掌控。雖然從滿清到民國，中國長期處於腐敗、分裂，治理失能的狀態，

---

<sup>137</sup> 傅柯，《性經驗史》(2002: 103~104)。

<sup>138</sup> 傅柯，《必須保衛社會》(1999: 229~235)。

<sup>139</sup> 傅柯，《必須保衛社會》(1999: 54)。

談權力控制之嚴密有效似乎空話，但就生命政治的一些概念、基本設想，或可用以觀察鴉片中國面臨生死存亡處境以及亡國滅種之憂所開展出來，關乎生命政治化的現代性保衛作為。我們看到中國的鴉片化以至生命鴉片化，民力、民智、民德、國力、國魂、國脈，幾近斃喪，無力應付內外危機壓迫——來自經濟、政治、文化，甚至種族的威脅。簡言之，鴉片亡國滅種之害，使得中國必須強化國力和種力，以富國強兵，強國保種為國族救亡圖存大目標。一切改革作為環繞著這總體目標，而國家生產力、經濟力、國防力和人才競爭力的根基就是個別身體和總體人口的品質和競爭力。要達成這目標，首先要將中國從鴉片迷霧中解救出來，要讓中國人的生活、生命免於鴉片毒化，一方面持續國家對鴉片生產消費的管制；另一方面透過一系列攸關身體、生命，亦即強化身體、保護生命的國家措施，達到強身、強國、強種目標，國家才有能力應付列強瓜分殖民的外來種族威脅。

在這脈絡下，我們或可說這段漫長時期的歷史主題就是保衛國家、保衛種族，共同對抗來自內部敵人——鴉片和外部種族威脅——帝國主義。國家試著保衛人民不受鴉片之害，才能保國、保種。也因在這種背景下，提供國家為了捍衛種族生命，必須透過鴉片禁制進行身體和生命國家化的理由，形成一種國家透過法制禁令控制鴉片消費，達到強國保種生存目的的生命政治現象，亦即，為了矯正病態的鴉片社會，在去鴉片化過程，進入生命政治的範疇，一方面個人和整體族群生命成為國家關注對象，另一方面則改善鴉片遺留的病態影響，推動國富民強的政治經濟建設，進行人口品質提昇、公共衛生和健康環境改善等措施，而這些作為適足以說明西方生命政治的相關知識和技術，進化論、遺傳學、優生學、人口論、公共衛生、種族主義也同時興起於中國，構成一種救亡革新的知識體系，據以投身國家、種族的改造工程。透過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我們試圖追蹤中國在鴉片煙毒帶來亡國滅種的生存威脅下，如何進行強國保種的生命政治計劃，找出其生命政治的可能條件和型態，其間涉及人口思想、種族主義、醫療和公共衛生的現代性作為。

### 第三節 去鴉片化社會：尋找不正常人

#### 一、鴉片與不正常的人口

《黑籍冤魂》，1909年彭養鷗出版的一部反毒教誨小說，其中一回敘述鴉片吃上癮對生育和後代的危害。以下是書中人物仲勛和厚卿兩人在煙館裡的對話：

厚卿道，「若未發身的人，吃上了煙，永遠不會發身，一個人像是乾姜癩棗，不能娶親生子，這叫做煙癆。在女子亦然，年輕婦人，吃煙吃的太多，她那月經就不會行了，不瞞仲兄說，賤內也喜歡吸煙，所以到今不能生育，這鴉片壞處多好處少」……厚卿道：「但我聞得父母吃煙，生下來的小兒，在月內必須噴煙，不然癮發，是不能成人長大的」……厚卿道：「不吃煙的人，吃幾筒煙，可以助興，吃上了煙，連那房事都不高興，簡直想不到去幹那事了」。<sup>140</sup>

這段話交待了吃鴉片，男人性致缺缺，也無法生育，女子則月事停擺，即便生下孩子，也遺傳煙癮。故事的後續，證實了這說法。仲勛得子，小兒一直哭鬧不休，他提起，

「我倒聽得人家說過，父母吃煙，生下的小兒也會有癮，教做胎裡癮，莫不是他煙癮發了，要吃煙麼」。他妻子覺得好笑，不信，噴口煙試試，煙到小嘴，哭聲竟停了。在場眾人大笑不已，他妻子道，「生出來就要吃鴉片，將來成個鴉片煙精」，乳母更說，「這吃煙的根是出世就有……這小娃子的皮肉骨血裏面，都含有鴉片煙的質料，這小娃子竟是鴉片煙做成的」。<sup>141</sup>

後面這段現在讀來可笑，究竟這是作者的戲謔諷刺之筆，還是當時的常識，真信煙癮會遺傳，不得而知。但在反鴉片教誨的書寫裡，像這樣的說法或笑話，經常可見。鴉片對性慾、對下一代的影響，在當時確有醫學報告的提出，也是反毒論述，鴉片危害的標準說法。不過煙癮遺傳儘管過於誇張，卻也看到當時人對鴉片造就病種、謬種，影響人口品質的擔憂。像這樣的說法，「其所生子女，亦因其父母身體中之白血球多受麻醉損傷，不能抵抗病害，一遇傳染病流行，即易受病而死。是故吸鴉片子女中，死亡率最高，而倖存者，十之八九，不是體力遜，便是智能低劣，於國力消長，自有重大關係」。<sup>142</sup>不是煙癮遺傳，而是影響下一代體質，造成抵抗力弱，易染疾病，死亡率高，或智能不足，最後則會影響國家力量。英國傳教士德貞(John Dudgeon)，是較早從醫學角度驗證鴉片有害身體健

<sup>140</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第十七回)(1984: 80)。

<sup>141</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第十八回)(1984: 85~86)。

<sup>142</sup> 見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 32)。

康的先驅，他為反駁西方社會認為鴉片無害身體的說法，在 1890 年上海基督教全國大會發表其研究結果，指出最初吸食鴉片會使人性慾旺盛，精神興奮，持續一段時間以後，這種情緒便會下降，然後就會上癮，當吸食過量持續更長時間，就會出現器官、肌肉衰竭和神經紊亂等疾病，<sup>143</sup>他總結鴉片之害，有傷健康；縮短生命；突然停止吸煙會有生命危險；吸食會造成不孕。<sup>144</sup>德貞早在 1875 年就指出，「人民精神衰弱，子嗣艱難，一年減於一年，國累民貧，吸煙之故」。<sup>145</sup>

這些說法都提醒我們，對鴉片傷害的重視和認知，已從個別身體，提昇到總體人口，要擔心的是，因為鴉片導致的不孕、先天疾病或死亡率高，讓國家人口數降低，人口品質不良。這種上一代對下一代的影響，除了遺傳問題，更要緊的是源頭的感染問題，一人嗜之足以讓整個家庭由上而下沾染吸煙風尚，形成代代吸食，代代傳劣種的惡況，「往往一人吸煙，全家仿倣。始者長者嗜之，繼則幼者亦嗜，初則男者吸之，漸則婦女亦嗜……何況患煙癖者，生子多有胎毒，醫謂遺傳之癮，較之驟染，尤屬難戒，遺傳之害，不可救藥。是知因循自誤，不獨遺恨終身，亦且禍及後代」。<sup>146</sup>如照上面所說，鴉片吸食風尚在家庭的感染如此之深，那麼也不難瞭解全國吸食之盛且廣，遺害也更無所不及，就算生下的不是病種，受家人影響，也必染惡習，終成弱種。《黑籍冤魂》的一段話同樣說出了這嚴重性，「凡父母吸煙，子孫亦必吃煙，是有夙根，所謂遺傳性。世間即此兩種人，流傳廣布，勢必胥天下之人，皆變成吃煙而止」。<sup>147</sup>

人口問題確是當時憂心之士關懷焦點，1902 年（光緒二十八年），一位民間人士即道出了他對抽鴉片導致人口減少的擔憂，「吸煙之人，生齒不蕃，人丁日減，日久必盡，實為可慮」，<sup>148</sup>這種對人口減少的擔憂，在帝國主義利用鴉片弱我體魄，謀分日亟，且人口又不斷增長情況下，更為嚴重，「方今列強人口俱現迅速之增加，而我國人口則日見減少，人口之壓迫，已不堪任；而帝國主義者又藉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厲行其鴉片政策，務使我日見減少之民族，精神體格，復日趨於衰弱而滅亡，其凶殘狡毒，較諸經濟侵略及暴力壓迫為尤甚」。<sup>149</sup>在這裡中國同時面臨了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雙重壓迫。確實，鴉片吸食既久，不僅降

---

<sup>143</sup> Dudgeon, *The Evils of the Use of Opium*,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1890), 轉引自高晞,《德貞傳》(2009: 426)。

<sup>144</sup> Dudgeon, *The Evils of the Use of Opium*,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1890), 轉引自高晞,《德貞傳》(2009: 423)。

<sup>145</sup> 德貞,〈禁煙略說〉,《萬國公報》,1875 年 3 月 27 日,轉引自高晞,《德貞傳》(2009: 417)。

<sup>146</sup> 見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1929: 37 ~38)。

<sup>147</sup> 彭養鷗,《黑籍冤魂》(1984: 122)。

<sup>148</sup> 〈周富業酌擬禁絕洋煙以御外侮之稟文〉,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370)。

<sup>149</sup>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禁煙運動宣傳綱要》,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 社會、社會問題》(2009: 227)。



低身體素質，甚至影響人口出生率，縮短人口壽命，這是反鴉片人士的基本看法和擔憂。山西太谷縣志即描述境內上自富家大族，及至中下之家，以至鄉僻小戶，無不視鴉片為布帛菽粟，須臾不可或離而倚之如命，最後家破身亡者不可數計，而這就是「戶口凋落」的一大原因。另有外人統計指出鴉片輸入後中國人口增長率從 3% 下降到 1%。<sup>150</sup>鴉片吸食是否跟人口下降有直接相關？我們先看清代人口情況。據曹樹基的統計，清代人口自康熙到咸豐元年一直處於穩定的成長狀態，1679 年（康熙十八年）人口約 1.6 億，1776 年（乾隆四十一年）3.1 億，1820 年（嘉慶二十五年）3.8 億以至 1851 年（咸豐元年）的最高峰 4.3 億，到了 1880 年（光緒六年）的統計則降到 3.6 億左右，直到 1910 年（宣統二年）才又恢復成長到 4.3 億。咸豐、同治、光緒初年人口的衰退，鴉片吸食的斲喪身體生命雖不無關聯，但根據曹樹基的說法，更大的原因則在於這段期間歷經中國近代史上歷時最久，死亡人口最多的太平天國戰爭以及西南、西北地區的回亂和瘟疫饑荒的肆虐導致人口的大量死亡，戰爭和自然災害成為這段時期某些戰亂和受災地區人口呈現負成長的主要影響要素。雖然這些地區人口大量死亡，但其它地區人口增長也會抵消死亡數字。曹樹基認為中國人口增長模式是低增長—大死亡—低增長，清代人口數在某時期即便有所下降，長期平均仍維持低增長模式發展。<sup>151</sup>

顯然清代人口下降鴉片吸食並非要因，或許也缺乏數據證明兩者關係，戰亂、饑荒可能才是更直接的致命因素。另一位人口學者葛劍雄也指出，雖然酒精、藥物中毒等因素會影響人口成長，但他特別說明鴉片在一些地區和階層中的影響雖大，但其造成後果的原因十分複雜，往往缺乏統計資料佐證。<sup>152</sup>不過一份鴉片跟死亡相關的調查報告在 1899 年出爐，當時一位醫師 William H. Park 對在華的 106 位醫師發出一份關於鴉片在中國使用影響效果的問卷調查，回收後統計整理成《百餘位醫師對鴉片在中國使用意見》的報告，其中提到鴉片跟死亡的關係有：鴉片做為自殺的工具，長期吸食或為了治療煙癮使用鴉片都容易導致死亡。根據 Park 的估計，蘇州城一年大約 1000 人試圖自殺，其中 15% 會成功，以此推估中

<sup>150</sup> 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1998: 44)。

<sup>151</sup> 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2001: 12~14, 831~840)。曹樹基的研究，主要反駁了許多學者認為清代前期中國出現人口爆炸的現象以及高增長—大死亡—高增長的人口成長模式。其它相關人口統計資料較早可見 1837 年初版，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上冊)，他的資料指出，1711(康熙五十年)人口約 2 千 8 百餘萬，到了 1753 年(乾隆十八年)人口 1 億 3 百餘萬人，42 年間每年人口成長約 6%；1753 年到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的 3 億 7 百餘萬人，36 年間年增長率約 2.5%；1792 年到 1812 年(嘉慶十七年)的 3 億 6 千 2 百餘萬人，20 年間年增長率不及 1%；到了 1868 年(同治八年)人口已達 4 億 4 百餘萬人；1881 年(光緒七年)人口反降為 3 億 8 千餘萬人(2005: 187~193)。何炳隸，《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的人口資料簡要的說從，1779 年 2 億 7 千 5 百多萬到 1850 年增加為 4 億 3 千萬人(2000: 42~86)。不管數字如何增減，中國人口數在咸同年間已有 4 億多，就全世界而言，人數已頗為可觀。根據梁啟超記載，1800 年英美法德義俄六國總人數約 1 億 7 千 2 百餘萬人，到了 1880 年六國總人數增為 3 億 1 千 2 百餘萬人，中國人口數勝出許多(見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全集》(2009: 157))。此外，一本較近且完備的中國人口研究著作可見，張研，《17~19 世紀中國的人口與生存環境》(2009)。

<sup>152</sup>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1991: 317)。

國每年約有 80 萬人企圖自殺，有 12 萬人會成功。這些死亡人數還要加上每年死於鴉片吸食的有 7~8 萬人。<sup>153</sup>鴉片的確是當時最通俗常用的自殺藥物，1908 年（光緒三十三年）朝廷一份上諭提到吞鴉片自殺的氾濫現象，「即各直省吞煙自盡之案，歲計不知凡幾」。<sup>154</sup>德貞也注意到這現象，他發現全國都有吞鴉片自殺的病例紀錄，醫院提供的報告指出，吞鴉片導致自殺率的增高，這讓他感到震驚，並在文章中提出警告。<sup>155</sup>美國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 1911 年出版的《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書中也記載鴉片跟自殺的關係，鴉片價格高漲反造成自殺率下降，「鴉片價格的不斷升高，所帶來的好處是通過服用鴉片自殺的人數明顯下降。人們發現服用十丸鴉片才能致死，而目前鴉片昂貴的價格使很多有意自殺的人無法達到目的」。<sup>156</sup>當然，因鴉片而死的人數，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人口成長率，並無更直接數據證明，不過吞鴉片自殺確是當時流行的社會現象，這種速死，相較於吸鴉片的慢死，更令人感到問題的嚴重，一方面顯示鴉片像傳統毒物砒霜那樣廉價的隨手可得，鴉片氾濫成爲日常生活物品，可見一般；另一方面從保護生命立場，防止自殺成爲管制這日常可見毒物的另一重要理由，它構成另一個社會問題。這也是德貞爲什麼特別提醒鴉片在這方面的傷害。

至於人口與鴉片關係的醫學研究，德貞在 1877 年《愛丁堡醫學雜誌》(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刊登〈與鴉片相關的人口〉論文(Opium in Relation to Population)，經過對千餘名吸煙者身體狀況、生育狀況和家庭生活持續的詢問調查，他的結論：長期吸食鴉片會導致男性陽萎，女性不孕，開始危害中國人口增長，「有些人從生理學角度考察，相信他們正在目睹鴉片這個藥物，在減小或毀滅中國人種。人口下降不是鴉片的專利，但一定會降低人口。假如我們的推測是正確的話，在二三千萬的吸煙者中，大多數人的習慣顯然已影響到第一代的健康，並有限的危害到了第二代，它得結果必定表現在第三代身上」。<sup>157</sup>德貞根據他的臨床醫學研究，指出鴉片確實對人口成長有所影響，雖然這不是唯一因素。不過更值得憂心的是鴉片正危害中國的第三代人口。事實上，早在 1847 年英國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就曾說道鴉片影響生育，「廈門人抽鴉片成癮的規模大的驚人，這種惡習毀壞人們的生殖能力和資然資源」。<sup>158</sup>1869 年英國傳教士顧維廉(W.H Collins)即在《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發表〈鴉片之害〉，他以在

---

<sup>153</sup> Kathleen L.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 (1996: 43-46).

<sup>154</sup> 于恩德編著，《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1973: 128)。

<sup>155</sup> Dudgeon, *The Evils of Use of Opium,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1890)，轉引自高晞，《德貞傳》(2009: 427)。

<sup>156</sup>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2006: 90)。

<sup>157</sup> Dudgeon, *Opium in Relation to Population*(September,1877)，轉引自高晞，《德貞傳》(2009: 422)。

<sup>158</sup> 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游記》(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2007: 388)。

華二十五年的經驗，見證鴉片之害，並指出鴉片不僅使人食慾不振，令人上癮，甚至會帶來滅種的災難。<sup>159</sup>顧維廉和德貞的說法，都呼應了清末民初知識份子對鴉片滅種之禍的憂心。中國恐難有正常後代，成為名符其實病態的鴉片國度。二十世紀初年，英國知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中國札記》一書也提醒，鴉片吸食者可能不會有後代，爲了有後，中國人在吸煙前要慎重考慮，「鴉片癮君子的後代幾乎不會受到牽連，因爲鴉片成癮的人幾乎不太有可能生育後代了。這樣的嚴重後果使得國人在大量吸食鴉片前思量再三，因爲在中國，孩子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禮物，他總會希望自己多子多福」。<sup>160</sup>

鴉片對近代中國人口成長是否有顯著影響，雖無法直接論證，但對身體傷害已有醫學的證據，由此產生對人口下降的擔憂，既可想而知，也有其必要。不過對人口數量的擔心，不如對人口品質低劣的憂慮。人口健全是國家富強基礎，已成為這時期知識份子的認知，如何治理人口，比較人種優劣，提昇人口質量，避免「繆種流傳，代復一代」<sup>161</sup>的優生保種計慮，以因應「種戰」的國際競爭，成為思考重點。也因此而有限制婚配，晚婚，少育，節育的提議；推動普及教育提高知識道德能力，合理分佈人口，充分開發地力、人力，消弭鴉片、纏足兩大危害人口素質的社會惡習等種種做法。其間交錯著人口、政治和經濟問題，浮現出生命政治治理人口的輪廓。這種現代性生命政治的出現與當時生物遺傳學，優生學或種族衛生學的導進息息相關，<sup>162</sup>使得強種裕國以其人口爲管理對象，人口數量過剩、過密化與生產條件的關係，人口過低是否易於遭同化或滅種；人口質量良窳與種族命脈的關係，如何優生保種，控制生育，規範性行爲，改善衛生條件，防杜不正常低劣人口滋生，成爲鴉片戰爭後至維新變法以迄民國建立不同時期知識份子的種族革命思維和人口政策構想，並提出相應措施。這些改革份子如龔自珍、包世臣、魏源、汪士鐸、嚴復、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分別在鴉片侵蝕個別身體、社會生計、國家生命、種族命脈的威脅下，同時借鏡十九世紀剛浮現的人口論、遺傳學、優生學、進化論等知識，提出人口、種族、政治經濟政策，以遂強國保種目的，這與傅柯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在某種程度和條件上頗有契合之處。

---

<sup>159</sup> 見Chinese Recorder(October, 1869), p137，轉引自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2004: 48~49)。

<sup>160</sup>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札記》，收錄於《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2011: 305)。

<sup>161</sup> 嚴復，〈保種餘義〉，王栻編，《嚴復集》(第一冊)(1986: 87)。

<sup>162</sup> 關於優生學、遺傳學和種族衛生學在晚清、民國時期的發展和影響，可見馮客(Frank Dikotter)《近代中國之種族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第六章〈作爲種子的種族〉，以及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1998)一書的詳細討論。另見Chung, Yuehsen Julitte(鐘月岑),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 1896~1945(2002)；鐘月岑，〈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絡：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古今論衡》，第22期(2011)。

## 二、人口－政治經濟的治理構思

1909年（宣統元年），清廷重申禁煙辦法時提到，「禁煙一事，乃今日自強實政，教養大端，於衛生、足民、興地利、塞漏卮各節，皆有極大關係」。<sup>163</sup>顯然，清末政府已深刻體認禁煙攸關自強改革事業，其間涉及保衛生命、富裕人民、開發土地、防止白銀外流等政治經濟事項。禁煙事業成爲富國強民救亡事業的基礎。上述政經改革事項，憂國憂民的清季知識份子，早已提出他們的人口、政治經濟構想，這些計劃雖只停留於構思籌劃階段，卻可視爲中國早期生命政治的發端，同時也爲後續作爲鋪路。

人口的管理和調控，有效的控制出生率、死亡率，培植優良人口，以爲國家後勤資源，是生命政治重點，也是讓生命納入國家治理的機制。清末民初的中國，還談不上有效的出生率、死亡率控制，一來戰亂連連估計困難，二來可能還沒有精確的統計方法和技術，這點有別於傅柯分析歐洲國家生命政治崛起跟統計技術發展有關。雖然有此出入，但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生命服膺於國家，接受國家安排，確是當時有識之士的看法。就人口而言，人口的過多或過少，都涉及到政治經濟問題，影響國家種族的生存競爭。人口過剩，土地無以養，造成民窮，社會動亂頻仍，如龔自珍、魏源、汪士鐸、薛福成；人口降低，擔心人力資源不足，有傷國力，敵不過帝國列強的侵吞，或者不是人口不夠，而是土地、產業開發不足，應有妥善的開發計劃，如包世臣、梁啓超、孫中山。因此，如何調控人口和經濟發展，俾能富國強兵，乃構成政治經濟學的籌劃重點。

我們接著看攸關種族續絕的人口思想的開展。首先，龔自珍(1792~1841)擔心當時的「中國生齒日益繁」，<sup>164</sup>人口過剩，導致貧富不相齊，「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sup>165</sup>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致使游惰流民過多，造成社會騷亂不安，現出生機日蹙的衰世氣象。解決人口過剩和貧富不均之道是，以「閒民使爲佃」<sup>166</sup>的方法，將內地流民送到西北地區開墾荒地，發展生產。並提議以「私力治公田……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戶，戍邊變爲土著」，<sup>167</sup>流民開墾土地後劃爲私有，雖然國家現在的付出耗繁，但二十年後必收成效。<sup>168</sup>龔自珍透過國家對特定人口的強制遷移手段，一方面解決人口過密的生存危機，一方面有效運用勞動力，開發地利，厚植生產。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包世臣(1775~1855)則反對當時「生齒日衆而地不加多，是以

<sup>163</sup> 〈清廷申論禁煙辦法〉，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470)。

<sup>164</sup>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1996: 106)。

<sup>165</sup> 龔自珍，〈平均篇〉，《龔自珍全集》(1996: 78)。

<sup>166</sup>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1996)。

<sup>167</sup>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1996: 110)。

<sup>168</sup> 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1998: 238~239)。

民必窮困」的看法，他認為「人多則生者愈眾，庶為富基，豈有反以致貧者哉」，<sup>169</sup>亦即人口眾多可增加生產力，是社會財富的來源，造成人民窮困原因不是人口過多，而是國家不重視農業生產，士人「鄙棄農事，不加研究」，多數人則「棄農，業工商，業工商則人習淫巧，習淫巧則多浮費」。<sup>170</sup>因此要使「民歸農」，合理分配士農工商的勞動人口比率，同時要改善「天下曠土雖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的無效率現象，亦即善其法有效提高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力，如此方能國富民強。<sup>171</sup>

梁啟超的看法與包世臣殊無兩異，他也認為中國並沒有人滿為患，其原因在於，中國當時的人口密度較之諸國要低，「然以地方之積，計其每里所有人數……比諸國相比，其繁盛未若彼也」，還有許多荒地未開墾，「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烏在其為人滿也」以及已耕的土地未能充分利用，「擇種不良，地中應有之利，仍十不得五，又烏在其人滿也」。<sup>172</sup>改善的方法在於學習西方技術，以西國農學之法經營，亦即「置機器代替勞力」以發展農業，俾能盡地力；同時也發展工、礦業，「盡地力者，農、礦、工之事也」，如此才能達到較高的生產效益，讓「一人耕能養百人」，「一日所作，能結百日食」。<sup>173</sup>梁啟超著眼的是如何透過機器有效提高生產力，開辦具經濟利益的實業，如此根本不需擔心人多致貧問題。梁啟超也批評瑪爾梭士（馬爾薩斯）《人口論》人滿為患之說，造成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政策的不當。這一理論認為，人口增加與食物增加往往不能相當。人口以幾何級數成長，食物以算術級數成長，結果必造成人滿為患，食糧不足，最後導致戰爭、疾疫、自殺之風日盛。此說一出立即引起各國人滿為患之憂，從過去多子富國觀念下的獎勵產子，到近日的紛紛降低生育率。而最嚴重的莫過於為了解決國內人多物資不足問題，或以其為藉口，引發國際間諸多戰端，乃至發展殖民策略，對外擴張領土，以謀生存出路。人口論適足以成為民族帝國主義的溫床。<sup>174</sup>

包世臣和梁啟超都不認為人口過多是民窮國困的主因，那麼導致民窮不能禦災的原因除了上述所指還有什麼？包世臣另指出三種肇因的物品，「一日煙，耗穀於暗，二日酒，耗穀於明，三日鴉片，耗銀於外夷」。<sup>175</sup>亦即，農民種煙葉排擠了土地作物生產；士庶好飲，大量釀酒耗掉不少做為原料的穀物；吸食鴉片，則導致白銀外流，銀價日高，引發國家財政危機。除了已知鴉片之害外，也另見

<sup>169</sup> 見包世臣〈庚辰雜著二〉，《安吳四種》，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513~514）。

<sup>170</sup> 見包世臣〈庚辰雜著二〉，《安吳四種》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514）。

<sup>171</sup> 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1998：240~241）。

<sup>172</sup> 見梁啟超，〈農會報序〉，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1997：88）。

<sup>173</sup> 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1998：250~252）。

<sup>174</sup> 見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全集》（2009：156~157）。

<sup>175</sup> 見包世臣〈庚辰雜著二〉，收錄於《安吳四種》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2000：514）。

香煙和酒這兩項消遣娛樂品在當時的普及，乃至妨礙正常農稼，有害國計民生。

魏源(1774~1857)解決人口過多的方式一如龔自珍，提出移民屯墾的方法將當時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sup>176</sup>以及閒居無事的八旗子弟遷移到邊疆地區屯墾安居，以增加農糧生產。<sup>177</sup>龔自珍、包世臣和魏源基本上都在鴉片氾濫，銀漏地荒，煙民遍在的時空脈絡下提出人口和生產力的關係，以及如何創造有利的社會生產條件，隱然的對馬克思所指「在這個國家，緩慢地但不斷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爲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sup>178</sup>的問題做出回應，如何合理分佈人力，有效運用勞動力，開發地利，以謀劃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相乘相應的解決方案，成爲晚清士人籌劃國家富強藍圖的重點。

至於薛福成(1838~1894)，跟龔自珍一樣認爲當時中國人口過多，且不斷成長，「戶口蕃衍，實中國數千年所未有」，造成「生計之艱，物力之竭」。<sup>179</sup>亦即，人口繁多，但地利已盡，「均已墾辟無餘」，使得「人工之廉減於泰西諸國十倍，竭一人終歲勤動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畜」，<sup>180</sup>人民謀生不易，貧困難以立。爲解決這一人多致貧問題，他認爲第一要「導民生財」，<sup>181</sup>要學西方能浚生財之源，而財源就是發展工業，開發礦業，建設鐵路運輸，以增加勞動力，提高生產，製造貧民工作機會，解決人滿之患。他說，「觀西洋用機器之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sup>182</sup>單單採礦業「夫開一礦，仰食者不下數萬或數千人」，<sup>183</sup>在當時人多田少情況下，廣開礦場無異「爲天下多擴良田」，<sup>184</sup>爲無事可做之人，提供衣食之源。第二個方法是，移民海外。他認爲西方國家不怕人滿爲患在於，「善尋新地，天涯海角，無阻不通，無荒不墾.....雖人滿，何嘗不富也，而況其能使不滿也」。<sup>185</sup>他建議可移民幅員遼闊、氣候合宜的巴西、墨西哥，以解決國內人多無業的問題。薛福成進一步提出他對人口素質的看法，他認爲人口質量受自然條件和人種不同所影響。什麼樣的自然環境就會長出什麼樣的人，「地球溫帶爲人物精華所萃，寒帶之極北，則人物不能生，熱帶之下，人物雖繁，而人才不生」；<sup>186</sup>什麼樣的人種，如高貴人種，中國和歐洲人，人口質量就高；卑賤

<sup>176</sup> 見魏源，〈軍儲篇四〉，收錄於《魏源集》(1978: 485)。

<sup>177</sup> 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1998: 241~242)。

<sup>178</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7，頁264。

<sup>179</sup> 薛福成，〈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188)。

<sup>180</sup> 薛福成，〈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188)。

<sup>181</sup> 薛福成，〈西洋諸國導民生財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326)。

<sup>182</sup> 薛福成，〈用機器殖財養民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331)。

<sup>183</sup> 薛福成，〈書周官礦人後〉，《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195)。

<sup>184</sup> 薛福成，〈書周官礦人後〉，《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196)。

<sup>185</sup> 薛福成，〈西洋諸國導民生財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326)。

<sup>186</sup> 薛福成，〈赤道下無人才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323)。

的，人口質量就低。<sup>187</sup>素質高低不只表現在才智上，還表現在體形上。如文秀、魁健者，素質高；黝黑、短小者，素質低。薛福成這說法顯然貼近先天遺傳決定說，這也是民國二、三十年代盛行的種族衛生學看法。

另一位對中國人口問題多所討論的士人汪士鐸(1802~1889)則對此問題有相當極端的思考，<sup>188</sup>他深信人口過剩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一是引發社會動亂，造成社會貧困，「世亂之由，人多；人多則窮……久治思亂」，<sup>189</sup>他認為粵西太平軍作亂全在人口太多，人多而窮，必生亂，「遍地皆盜……蓋承平久，孳息繁衍……地不能增而人加眾，至二、三十倍，故相率為盜以謀食」。<sup>190</sup>確實，太平軍起義的1851年（咸豐元年）全國人口數高達4億多，是清代人口數的最高點，它可形成人口增長速度高於自然資源、生活資料增長的問題，亦即，「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人多則窮[地不足養]」，<sup>191</sup>造成人多地不足養的人口/土地矛盾現象，導致農民起義。這可能是較早人多—地不足養—世亂模式的思考。<sup>192</sup>二是人多造成人口質量下降，無法造就好人才，「人多而氣分，賦稟而遂薄，又濡染於風氣，故人才益難」。<sup>193</sup>由於清季人口急劇增長，一般人擔心人口過剩或過密化引起「人多致貧」現象，汪士鐸則特別關注人才，亦即人口素質的問題，這是在當時一些討論人口和經濟問題的思想家所忽略。

汪士鐸的這份對人口素質的操心，以及為根絕人滿為患的弊端，卻引發他極端主義式的人口控制手段。亦即，透過多殺、溺嬰的減民方式，以及限定生女、限制婚配、避孕、少育等生育控制方式，降低人口數量、消滅不良素質人口。其作法：(一)、減民的方式：以「威斷多殺為主」，<sup>194</sup>用誅殺、溺殺等方式達到「減其民十之七八，則家給民足，驅之為亂，亦顧戀而不願矣」的效果，<sup>195</sup>這是汪

---

<sup>187</sup> 薛福成，〈檀香山土人日耗說〉，《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2002: 189)。

<sup>188</sup> 人口史研究者姜濤認為，汪士鐸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當時人們情理所能接受的人口減少措施。他認為這種論調可能跟汪士鐸歷經五朝，親逢太平天國之亂有關，汪士鐸的論點就是人多造成世亂，之所以發生太平天國革命，就是當時人口過多造成。但其言論雖有合理之處，卻更多情緒宣泄之語，情感宣泄反而讓他的言論可信度打折扣。姜濤最後結語，「雖然如此，透過他那喪心病狂的帶有世界末日般情感的語言，後世的人們還是強烈感受到那個人口過剩時代的若干信息」（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1998:401~403)）。王汎森則說，汪士鐸《乙丙日記》，記錄了一些可能是古往今來最激憤、最偏矯、最極端的議論，也顯露出他心中藏著這麼多不合時宜的議論或危險的思想。他的主張和語言都比別人偏宕激烈，以致他只敢在日記中聊以遣懷（見王汎森，〈汪梅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2003: 72)）。

<sup>189</sup> 汪士鐸，《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52)。

<sup>190</sup> 汪士鐸，《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71)。

<sup>191</sup> 汪士鐸，《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52)。

<sup>192</sup> 姜濤認為汪士鐸大概是最早把人多—地不足養—世亂這一線索聯起來思考者，爾後的研究者如羅爾綱，何炳棣都持這一看法（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1998: 401~403)）。

<sup>193</sup> 汪士鐸，《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20)。

<sup>194</sup> 汪士鐸，《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84)。

<sup>195</sup> 汪士鐸，《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90)。

士鐸人口思想的主要論點，就是以殺減民，降低人口，才能家給民足，社會穩定，盜亂不作。因此，他提出對特定人群的減民措施，如對違反社會秩序、善良風俗以及迷信怪力亂神等人口的斬殺，「禁賭博、洋煙、性理、鬼神、巫祝、星卜、盜賊、私鬪、光棍、遊蕩、硝磺、邪教十二事，犯者皆斬立決」。<sup>196</sup>不只透過人為的減民，他也期待天然災害達到這一目的，如藉各種疫疾降低人口，他乃說，「多疫為瑞」。<sup>197</sup>（二）、控制生育的方式，包括：(1)、溺嬰、少育。認定「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禍亂」，<sup>198</sup>女愚於男子，又會生下過多人口，造成更多社會禍亂。他主張窮人不得生女孩，富人只許生一女，故推廣溺嬰，特別獎賞溺女嬰，認為是富民的方法，「欲民富，當首行溺女之賞，貧戶不准生女，及富戶或生二女則罰」，<sup>199</sup>而出生的男女嬰孩有眉目不清，體態不端者都應溺死，男嬰即便端正，也只能留兩人，「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過二子，三子即溺之」；<sup>200</sup>(2)、限制婚配。有暴力記錄和不成才之人，不准婚配，並嚴格控制鰥夫寡婦的再婚，「男子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犯者皆斬立決」，<sup>201</sup>以防他們再婚後又生子女，徒增人口；(3)、推行晚婚、避孕。「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犯者皆斬立決」<sup>202</sup>，並「施送斷胎冷藥」提倡避孕節育。<sup>203</sup>

汪士鐸這種「威斷多殺」的極端想法，可能受太平軍影響，他認為太平軍是「以多殺為貴」，<sup>204</sup>清廷如果要得勝，一定要學太平軍之好殺。<sup>205</sup>多殺的想法和作法不只快速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更在有效處理人口不良問題，也就是處理不正常的人口質/量。這種區分人種優劣，以人為手段消滅先天、後天的身體/心理缺陷者和社會偏差行為者的解決方案，讓我們不難連結到數十年之後，納粹德國在遺傳生物學和種族衛生學說指導下的「安樂死計劃」。為保護種族健康，淨化退化和劣等人種，以培育下一代優秀血種，乃透過一系列種族/血緣/身份等相關法律的制定以及毫無法源依據的「安樂死計劃」<sup>206</sup>（謊稱人道主義，由元首授權，

---

<sup>196</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91）。

<sup>197</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17）。

<sup>198</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57）。

<sup>199</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90）。

<sup>200</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56）。

<sup>201</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91）。

<sup>202</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91）。

<sup>203</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153）。

<sup>204</sup> 汪士鐸，《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1967: 79）。

<sup>205</sup> 參見王汎森，〈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2003: 80）。

<sup>206</sup> 可參考弗萊德蘭德(Henry Friedlander)，《從安樂死到最終解決》(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2000)。「安樂死計劃」是在德國種族衛生學的脈絡下發展，這方面的討論另可見伍碧雯，〈德意志民族的優生學：德國種族衛生的起步與初期發展〉，《國立



醫生主動實施，既有刑法所禁止)的實施，有系統、有步驟的消滅一切「不值得活的生命」，<sup>207</sup>展開對殘疾兒童/成年人、畸形人、心智不健全、反社會傾向以及特定人種如吉普賽人、猶太人的排除和「慈悲死亡」的執行，最後擴大為「最終解決計劃」的種族淨化運動，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義大利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稱這些「不值得活的人」的生命情境是，既不受法律保護的任人宰割，且不構成犧牲獻祭條件的受譴咒人(homo sacer)的裸命(bare life)狀態，這是生命政治的主要典範。<sup>208</sup>

汪士鐸多殺不良人口的目的雖然不為種族淨化，卻也是在社會生產條件、國計民生和人種良窳的框架思考。照他的方法實行，顯然國家要承擔遺傳、繁殖、育種的控管責任，以進行人口調節和治理，好強化國家的政治經濟，生命自此納入政治範疇計量。這種人為的生物性調節的構想要較納粹德國早了許多，德國最後將之付行，汪士鐸只留筆墨雲煙一樁，因為這種人口控制方法，絕對需要國家的介入干預，汪士鐸站在國富立場提出的極端人口作法，無疑強化了國家介入人口生命的角色，同時也構成生命政治的籌劃。此一作法雖未行於當時，但汪士鐸對待身體、社會和道德上不正常人的極端解決方案到了民國二、三十年代建議實施之聲仍不斷出現，而其晚婚少育，節育避孕的論點後來也成為優生保育，人口調節的可行重點，使得生育進入現代化議程。<sup>209</sup>他的想法，有些雖然獨樹一幟，「有的與時代新思潮合拍」，<sup>210</sup>證之日後，卻是如此。至於晚清改革人士嚴復、梁啟超等知識份子，在煙毒滅種，外強亡國的生存威脅下，透過西方遺傳學，達爾文進化論等知識的引介，<sup>211</sup>在「進步」、「進化」的概念主導下，如何優生保種，以臻國富民強俾利生存鬥爭，應付種族威脅，更是生命政治化、國家化的作為，也是這些份子改革運動的重心。亦即，國家富強乃基於國民的體質，因此人口控制成為國家強弱的關鍵，婚齡、生育率、性行為等都成為國家人口政策需求下必需控制的對象。同時透過種族革命，打造新的民族主義以在這民族想像社群下建立新的國民和國家。

---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8 期(2007: 371~406)及〈從隔離到融合？：德意志帝國時期(1871~1918)猶太人的生存與發展〉，《成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2010: 179~212)。

<sup>207</sup> 這方面的經典討論可見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另可參考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成大西洋史集刊》，第 10 期(2002: 287~310)。

<sup>208</sup> 見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

<sup>209</sup> 關於汪士鐸人口思想討論可見，陳文聯，〈近代中國「生育節制」思潮的歷史考察〉，《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 卷，2 期(2007: 174~180)；孟智、宋興昌，〈從五蠹篇管窺韓非子人口論〉，《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8 卷，4 期(2008: 11~13)。

<sup>210</sup> 見王汎森，〈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2003: 72)。

<sup>211</sup> 關於達爾文主義對中國晚清改革運動的影響可見蒲嘉珉(James Reeve Pusey)《中國與達爾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一書深入完整的論述。蒲嘉珉提到「進步、進化和生存鬥爭，全都要為變革發言」(2008: 8)。另兩本詳盡的討論則見，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一個新的全能式世界觀》(2010)，以及吳丕，《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1895~1924》(2005)。

嚴復從進化論中看到優勝劣敗人種進化的律則，「夫聚不教劣種之民於競爭之世，其不能為優勝明矣」，<sup>212</sup>由此而憂心中國人口雖眾，卻素質低落，不可依恃的問題，「然吾竊慮支那之民雖眾，未可恃也」。<sup>213</sup>因此，提倡「擇種留良」的優生說，以提高人口素質，「歐人近創擇種留良之說，其入手之次，有於限制婚姻，其說也，白人尚欲自行之，況於支那乎」。<sup>214</sup>為什麼限制婚姻是優生的入手，嚴復在〈保種餘義〉一文進一步指陳，由於人之「嗜欲重」而早婚多子，又「慮患輕」未思預籌養家費用，導致物質困窘，生活條件惡劣，無法提供良好環境照養子女，「設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須仰食於不足自給之一男子，則所生之子女，飲食粗弊，居住穢惡，教養失宜」，最後養出身弱智昏的後代，「生長於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而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子女，必然也是「嗜欲而無遠慮」的亟亟於婚嫁，於是遺傳劣種，拖垮正常人口，形成劣幣逐良幣現象，長此以往，兩相滅亡，「雖有善者，必為不善者所累，而自促其生……因而劣者反傳，而優者反滅。然若優者盡死，則劣者亦必不能自存，滅種是矣」，<sup>215</sup>這正掉入「謬種流傳，代復一代」的惡性循環裡。

除了人口素質的顧慮，嚴復也提出控制人口增長的方法，亦即透過「奢民」和「教育妨生」控制人口。他認為生育率跟生活水平息息相關，大凡生活水平低的人群，只要能夠度日，就會不斷生育，直到窮到活不去，才會停止。生活水平高的人群，由於習慣富足生活，他們不會多生，讓日子過不下去。嚴復說，「生之量以資生之量為界軫，然此界群有不同，傻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最下之食為界，必至饑饉，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習於豐給，則其界略高，不待饑饉，生機已狹」。<sup>216</sup>生活水平低的人多生，生活水平高的人少生，那麼就該採用「奢民」，亦即使民富裕的方法，提高生活水平來降低人口的增長。再者，嚴復也指出，提高教育水準有助於降低人口成長，因為受教育者用腦多，其生育能力自然下降，「腦進者成丁遲」，下一代雖少但素質卻較優，成材者多，「智下者生多而成丁少，智上者其成彌倍，其生彌珍」；<sup>217</sup>另外，教育程度高者，觀念較新，容易擺脫「求庶為第一要義」的想法，不受傳統「多子多孫為莫大之幸福，而無子為天罰」<sup>218</sup>的習見影響。同時，教育程度高者為能專心致力一事，因此不願生育過多，以免妨礙事業的投入和子女的教養。他以歐洲為例指出，「歐洲有教之民，方其為學不娶，方其執兵不娶……所生不願逾二子女……蓋恐所生或多，則其

---

<sup>212</sup> 見《法意》一書按語。

<sup>213</sup> 見嚴復，〈保種餘義〉，王栻編，《嚴復集》（第一冊）（1986: 87）。

<sup>214</sup> 見嚴復，〈保種餘義〉，王栻編，《嚴復集》（第一冊）（1986: 87）。

<sup>215</sup> 見嚴復，〈保種餘義〉，王栻編，《嚴復集》（第一冊）（1986: 87）。

<sup>216</sup> 見王栻編，《嚴復集》（第四冊）（1986: 858）。

<sup>217</sup> 見王栻編，《嚴復集》（第四冊）（1986: 866）。

<sup>218</sup> 見王栻編，《嚴復集》（第四冊）（1986: 1009）。

力不足辦教育也」，<sup>219</sup>這就是「教育妨生說」的主張。<sup>220</sup>上述作法，不難看出嚴復強調的仍是人口素質，提升素質以降低人口數量，採質精量少策略，如此方能應付優勝劣敗的進化挑戰。

另一位受優生學影響康有為更指出「種族改良」是理想社會的先決條件，並在《大同書》中提出具體作法，如懷孕婦女送到胎教機關人本院，其飲食和行動全程接受醫生規定和監控；女子只許與被選定的人性交，有護士專責接生；人口調查官登記每一個出生嬰兒；醫生必須處理掉低能兒；有殘疾和精神疾病的人則需接受絕育。<sup>221</sup>這些限制婚姻、計劃生育/絕育、克制欲望、排除不健康人種、改善生存條件和自然環境，以培育優質人口的優生思想和作法，深化為日後更細密、更具排他性的種族改良和種族衛生思潮，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優生學高漲的二、三十年代。

另一位受嚴復思想影響的梁啟超也主張晚婚以提高人口素質，在〈禁早婚議〉中提出早婚五害，「害於養生」、「害於傳種」、「害於養蒙」、「害於修學」、「害於國計」。早婚如「自殺之刃」造成體弱、種弱，因為「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斷喪其元氣，害莫大焉」，最後「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沉雄強毅之魄力……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sup>222</sup>「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因此想要淘汰弱種，獨傳強種，想要「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sup>223</sup>早婚事干害己、害種、廢國，這一說法使得婚姻私領域行為進入受監管的公領域範圍，讓國家在衛民保國的信念下得以對個人家庭進行生物性調節。

上述的人口政策基本上在生齒日眾，人滿為患，資源相對匱缺的條件下採重質不重量政策，其人口威脅來自種性不佳，無生存競爭力。然而孫中山反對當時盛行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並不認為當時中國已人滿為患，相反的卻擔憂西方人口不斷增加，中國人口反而停滯不前，中國將遭到列強人口壓迫，有亡國滅種之禍，<sup>224</sup>這種壓迫跟政治力、經濟力壓迫同樣嚴重，「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

---

<sup>219</sup> 見王栻編，《嚴復集》(第四冊)(1986: 1009)。

<sup>220</sup> 參見陳文聯，〈近代中國「生育節制」思潮的歷史考察〉，《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卷，2期(2007: 175)。

<sup>221</sup> 參見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1999: 153)，及〈個人身體與群體命運：近代中國之人種繁衍和社會紀律〉(2000: 206~207)。

<sup>222</sup> 見梁啟超，〈禁早婚議〉，收錄於《飲冰室全集》(2009: 121)。

<sup>223</sup> 見梁啟超，〈禁早婚議〉，收錄於《飲冰室全集》(2009: 123)。

<sup>224</sup>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講稿中即認為中國人口處於停滯狀態。這一看法是根據美國駐華公使樂克里耳(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對1911年中國人口總數約3.25億的統計而來，孫認為中國人口從乾隆到20世紀一直在減少，處於停滯狀態，如此下去將有亡國滅種之禍，列強將利用人口這種天然力消滅我們。見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229)。

果再沒有辦法……一定要滅國滅種的」，<sup>225</sup>如果我們人口不增加，列強人口增加很多，「他們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吞併中國。到那個時候，中國不但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sup>226</sup>爲了配合人口增長政策，必須改善社會生存條件，也就是發展農業讓大家有飯吃，並合理分配人口，開發工礦業，施行實業計劃，有效開發地力和人力。同時在人口品質上則強調教育重要性，以提高人的道德、知識和能力，並鏟除各種社會惡習，特別是危害人口身體素質的鴉片和纏足兩大社會問題，「當此除舊佈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割除，以培國本」，俾能「屏絕惡習，共作新民，永雪東亞病夫之恥」。<sup>227</sup>孫中山的人口政策與晚清知識份子一樣，同樣擔心來自這種種族之間的生物性威脅，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裡，隨處可見到以人口爲主軸分析當時國際現勢，強調列強如何在人口質量上對中國構成生存壓迫，直到這個演講的民國十三年，人口依然是民族存亡，國家興廢之關鍵。爲強化人口質量，同時也配合推動經濟發展，智能培育，風俗改造，新公民身份界定等措施，人口乃換身爲種族實力和國家資源，其現象或如同傅柯的人口治理(government of population)觀念，在人口深度和廣度上進行管理，形成治理—人口—政治經濟這三個自十八世紀以來即強固相關的系列，<sup>228</sup>這也構成生命政治的關鍵因素。這些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人口治理計劃基本上已進入一個現代化國家建造進程的想定。

孫中山擔心中國人口不足，然而在二、三十年代，不少社會學家、人口學家卻擔心中國生育過多，人滿爲患，<sup>229</sup>特別是當時引進生育控制思潮，成爲解決人口過多造成社會問題以及人種改良的可行方法。<sup>230</sup>例如人口學家陳長蘅、王士達等人都認爲當時中國人口處於過剩階段，造成各種社會問題，因此主張透過節制生育和晚婚解決人口過剩問題。陳長蘅認爲，「中國今日民貧之一最大原因厥爲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無限」，亦即產生人口和地，人口和物質資源之間的矛盾，以致「生育過多之結果，恆足以減少人類之幸福，增加人類之苦惱，阻礙社會人群之近化」，<sup>231</sup>除了晚婚與節育外，他還建議移民東三省、蒙古、

---

<sup>225</sup> 見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一講），《三民主義》（1986: 33）。

<sup>226</sup> 見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二講），《三民主義》（1986: 16）。

<sup>227</sup> 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1998: 255~261）。

<sup>228</sup>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2000: 219).

<sup>229</sup> 根據侯楊方綜合各家統計的研究指出，中國總人口數 1911 年 4.1 億，1936 年 5.3 億，1946 年 5.2 億，1949 年 5.4 億。而 1911~1936 年間全國人口平均年增長率 10.27%，1936~1946 年間爲 -1.33%，1946~1949 年爲 8.00%，1911~1949 年爲 7.06%。除了 1936~1946 年間因戰爭因素人口呈負成長外，中國平均人口處於不斷增長中，從 1911 年到 1949 年人口增加 1.3 億。雖然當時人口學家尙未能掌握精確的人口統計數字，但他們認爲中國人口處於膨脹期確屬事實，甚至遠超出他們的預期。見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575）。

<sup>230</sup> 如人口學家陳長蘅、王士達、許仕廉、陳達、潘光旦，經濟學家喬啓明、馬寅初等人。

<sup>231</sup> 見陳長蘅，《中國人口論》（1928: 99, 120）。

新疆、青海、西藏以厚全國人民之生計。<sup>232</sup>另一位人口學者許仕廉則一方面擔心中國人口增長慢於歐美，一方面又有口過剩的憂慮，中國人口分佈不平均，人均擁有的土地面積過小，性別比又不平衡，出生率和死亡率太高，人口素質低下，因此他提倡晚婚、優生、節制生育和移民等方法解決人口壓力。<sup>233</sup>經濟學家喬啓明則指出中國是生育率高、死亡率亦高的國家，這種多生多死的人口增加率其實與少生少死是不相上下，因此主張節育少生，「與其多生多死，糟蹋無量生命，消耗寶貴財產，更從而斷傷產母健康，促短產母壽命，孰若厲行節育，少生少死，增進人口品質」。節育少生重點正在於保障婦嬰健康，改善人口素質，同時也可以降低孕產時的高死亡率，「節育意在降低生育率，不獨以改良人口品質，減少人口壓力，減輕父母經濟責任，更足以降低死亡率，而增長人壽」。<sup>234</sup>從母體健康和降低死亡率設想，基本上也反映婦嬰衛生安全已納入國家發展的思考，它是國力的根基，不管主張增加人口或減少人口，母體孕產和幼嬰撫育過程成爲國家必須保衛的對象，人口生命也成爲國家控制對象。

雖然節育以降低人口壓力的主張甚多，然而孫中山《三民主義》既成爲國民黨政府立黨以及建國的中心思想，孫中山擔心中國人口太少，有亡國滅種之虞的人口思想，也成爲國民黨政府繼承的人口政策，<sup>235</sup>這導致國民黨政府不贊成、不鼓勵二、三十年代興起的生育控制思潮，因爲節育有違總理遺教。鼓勵生育，增加人口，成爲政府政策，特別是在戰時，人力無疑就是國力，多育才有充足人力應戰。一直到 1945 年第六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才決議承認節制生育的合法性。<sup>236</sup>

### 三、非我族類：種族衛生下的不正常人

嚴復、康有爲、梁啓超在人口問題上，都已注意到人口體質的重要，在亡國滅種憂懼下，在進化論導引和強健歐美人種對照下，如何善種、擇種留良，扶育優秀、健康的下一代，成爲迫切又根本的問題，也因此下一代或更準確的說種族，成爲競爭的戰場。這使得他們關注婚姻、生育、母體健康、嬰孩照料等問題。這種對種族的強調和重視從清末延續到抗戰建國，強種是建國、富國基礎已成爲基本認知。因此，有礙種族生存發展的族群或不正常的個體成爲劃異、排除對象。晚清革命排滿的「種族民族主義」，民國二、三十年的種族/民族衛生學，都立基

---

<sup>232</sup> 見陳長蘅，〈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收錄於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蘅，《人口問題》(1933: 88)。

<sup>233</sup> 見許仕廉，《中國人口問題》(1930: 118~124)，轉引自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614)。

<sup>234</sup> 見喬啓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1945: 126)，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615~616)。

<sup>235</sup> 關於孫中山人口政策之討論可見陳長蘅，《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1930)。

<sup>236</sup> 見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613)。

在扞衛國家建立、種族健康的位置，尋找和排斥血緣上的異族，遺傳上的病態等人種。這無非就是要建立一個正常、健康、強盛的國族，也延續從鴉片中國衰敗頹唐意象中走出來的意圖。這一說明回答了一些問題，為什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跟著捲進種族的世紀；排外種族主義為什麼崛起，甚至以此革命成功；特別是後來極端種族衛生思想的倡議，對納粹種族淨化政策的推崇與效法，對種族（或特定族群）歧視與排拒的不加掩飾。這一切都只為讓國家從病態走向正常，成就一個健全的民族，因為中國生病已久，需要這劑種族改良藥方。

歷經百日維新失敗，面對列強侵占殖民的種族威脅，革命派人士決心徹底告別國去的帝制，與掌天下的滿人劃清界線，重新建立漢族新國家。為此，他們重新塑造一種新的民族主義，一種以血緣紐帶為根基，高度凝聚集體力量，具強烈排外意識形態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sup>237</sup>而其特色，如革命黨人陳天華所說，「這種族的感情，是從胎裡帶來的，對於自己種族的人，一定是相親相愛，對於以外種族的人，一定是相殘相殺」，「凡不同漢種，不是黃帝的子孫的，統統都是外姓，斷不可幫他的」。<sup>238</sup>這一說，充分反映了革命排滿論調，革命人士基本上認為內部敵人就是非我族類的滿人，如果不排滿，掃除異族，以振漢族，漢族可能為滿族所滅，也根本無法對抗歐洲人的侵凌。劉師培說的透徹，「然則漢族自振當何如，曰亦唯有保同種，排異族而已，不能脫滿清之羈絆，即不能免歐族之侵陵。居今日而籌保種之方，必先自漢族獨立始。左傳之言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sup>239</sup>

這種內外有別，敵我意識分明的狹隘排外思想，如上述有其排滿革命論的歷史背景。革命派透過種族民族主義論述將滿族劃為異族，進行種族區隔。鄒容也在《革命軍》指出，「革命必剖清人種」，既區辨種族之不同，漢族才能「驅逐居住中國中之滿州人，或殺以報仇」。<sup>240</sup>這種帶著「相殘相殺」或「殺以報仇」的

---

<sup>237</sup> 馮客(Frank Dikotter)，《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1999:106)。

<sup>238</sup> 陳天華，〈警世鐘〉，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1981: 192)。

<sup>239</sup> 劉師培，〈中國民族志〉，《劉申叔遺書》(1997: 629)。

<sup>240</sup> 石川禎浩指出有些學者負面認為辛亥革命份子帶有濃厚狹隘的種族觀念，事實上這類指責忽略了排滿革命論與當時西方人類學說的傳入中國背景有關，如近代人類學對人種來源、人種分類、人種優劣次序的探討以及社會進化論的觀念，這些都對辛亥革命期間排滿種族主義的形成有所影響。再者，這些革命派人士如章太炎、鄒容、宋教仁、劉師培、蔣智由，除了是排滿宣傳家外，也是西方近代人類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見石川禎浩，〈辛亥革命時期的種族主義與中國人類學的興起〉，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下）(2002: 1009)）。此外，汪榮祖也為章太炎被傅樂詩(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視為是狹隘種族主義者，具強烈種族偏見，幾近部落主義的論調辯護，汪認為章太炎並非一開始就排滿，章早期對清廷仍寄希望，曾指光緒雖為滿人，是異族，仍可做皇帝。一直到庚子事變後章才對清廷完全失望，走向革命排滿之路。汪榮祖的看法是，章太炎最後失望的原因並不是種族因素，而是清廷的無能抵禦外侮，若不推翻清廷，中國無以自救，才走向革命排滿之路（見汪榮祖，《章太炎研究》(1991: 57-61)）。

仇恨排外種族主義，或「排拒性的民族主義」(exclusive nationalism)<sup>241</sup>，一方面是滅種威脅狀態下的保種意識作祟，因此確立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主義，並藉以型塑集體情感，強化我族認同，以肅清他族確保血統純淨；另一方面則是很實際的為推翻舊政體，建立新國家找到鬥爭的思想武器和合法的基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即指出，種族主義要不是一種歷史遺教，就是一種驅逐滿族統治的權宜之計，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sup>242</sup>在此，立基於黃種人意識的「黃白種戰」延到立基於漢人意識的黃種內部的滿漢之戰。<sup>243</sup>這種由於滅種危機意識，引起保種自衛以對抗種族敵人的思想氛圍，由外部以至內部的對抗，從維新派到革命派，<sup>244</sup>普遍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知識份子的意識裡瀰漫，只是維新派的種族敵人是白種人，革命派則是先滿人，後才是白人。更甚的是，在遺傳學、種族衛生學影響下還造成階級間的種族歧視和社會異常行為的偏差對待，構成一種社會劃異和排除。也就是在種族威脅下尋找並驅逐那些被我類界定為有害的「非我族類」或非於我輩、非於常人的不正常、不健康、不良之人。我們不難發現從革命排滿的種族民族主義到受遺傳、進化影響的種族衛生學，都在找出這種危害種族生存發展的內部敵人，既是生物學也社會上的異常，遺傳基因上的不正常，醫學衛生上的不健康，社會秩序下的不良。從先天病態到後天偏差，都成為調控、矯治，驅逐、消滅的對象。特別是在病態的鴉片國度，找出不正常人，無疑是建立正常化、現代化國家的必要之舉。國家承擔人民生命，人民生命必須對國家負責。不正常做為國家之敵，消滅它既是國家目標，也是全民責任。汪士鐸、康有為、章太炎、劉雄、周建人、陳長蘅、張君俊、潘光旦等人，不管其解決手段如何，都在這一命題下發言。

章太炎，作為革命排滿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學說來解釋民族興亡盛衰，因此強調人種優劣，對於不好、不正常的遺傳因子要汰除，以免傳下病種，敗壞民族。結婚時要選優秀品種為婚配對象，如此才能得良種，這是他的人種改良方案，「夫自然之淘汰與人為之淘汰，優者必勝，而劣者

---

<sup>241</sup> James Kellas在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一書中(p.51)指出，將不是出自同一血緣傳承，不具共同族群特質的人排斥於國族社群之外，這種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排拒性的民族主義」。因此，晚清知識份子以黃帝為血緣傳承所建構的種族民族主義，其實也是一種以漢族為主體，刻意排除其它族群於中國之外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一種排拒性的民族主義(見沈松僑，〈我我我血薦軒轅〉，收錄於盧建榮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2001: 307))。

<sup>242</sup> 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2003: 131)。

<sup>243</sup> 這方面的探討另可見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6期(2006: 89)。

<sup>244</sup> 維新派與革命派的差別在於，前者以文化，後者以種族來劃分族群；前者主張滿漢不分，後者倡排滿興漢；前者尊孔子，以孔聖之出生日為日歷開端，後者以黃帝為祖先，以黃帝之出生日為起始，因此前者強調保教，後者強調保種；前者是梁啟超所謂的一族多種的「大民族」，後者是單一種族的「小民族」；前者的對手是白種，後者則是先排滿才能對抗白種。相關討論可參考，松本真澄，《中國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論為中心》(2003: 32~73)；沈松僑，〈我我我血薦軒轅〉，收錄於盧建榮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2001: 281~364)。

必敗」，要避免被淘汰厄運，就必須改良人種，「遺傳之優劣，蠢智繫焉；血液之衺襍，強弱繫焉」，基於此他提出兩條人種改良方案，一者主張汰弱留良，汰除惡性遺傳以絕後患，「若夫童昏、聾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屏之裔土者，懼其傳疾以敗吾華夏之種，故蹙蹙焉淘汰之也」，這些有缺陷的人不能任其傳下病種，應摒除之；二是提倡優種婚，「言人種改良者，謂劣種婚優種，其子得優劣之血液各半；又婚優種，其子則得優種血液八分之六；至七世，則劣種血液僅存百二十八分之一，幾全為優種矣」。<sup>245</sup>透過跟優種結婚，改善下一代。其它人種改良方案，還有「通種」或「合種」說，亦即透過與白種人通婚的優生方法改善品質，達到強種、優種目的。<sup>246</sup>與白種人通婚合種成為黃種人進化的途徑，「則知黃白合種之必大聰強無疑也」。<sup>247</sup>這是從黃白種戰到黃白合種的進一步發展，顯然為了改良遺傳品質，已不在乎血統的純淨性。

上述提到汪士鐸種族優生論的極端人口政策進入二十世紀民國肇造後，在專業知識和技術的下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也蔚為一股風潮。<sup>248</sup>面對列強環伺，國力衰頹，人口病弱的現象，種族改良的迫切感逼近眼前，人為的生物性調節成為保衛國家集體生命的手段。這些作法帶著強烈社會排除和血統淨化的種族衛生思想，暗合於納粹德國正如火如荼推行的種族淨化運動「安樂死計劃」。這一消滅社會一切「不值得活的人」運動，也確實吸引當時一些知識份子（如衛聚賢）和某些政治派系（法西斯色彩濃厚的藍衣色）遂行政治行動時的師法對象。當時倡議種族優生的想法作為如，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夏宇眾倡導在各省建立優生學實驗室，並建立一個特殊村落，在那裡繁育擁有完美大腦和理想身體的人，以產生未來模範的種族。<sup>249</sup>類似建議還有衛聚賢受納粹實驗啟發，強調有缺陷人種強制毀滅的優生學說。他同樣倡議設立優生實驗室，並由醫生挑選優秀人選婚配，懷孕婦女受醫生控制直到分娩，期間不適的胎兒將被淘汰，出色的嬰兒叫做「模範人」，不適者叫「淘汰人」。<sup>250</sup>優生學也得到國民黨的支持，新生活運動目標「改革社會，保國保種」，某種程度也受納粹德國種族衛生學的影響。

---

<sup>245</sup> 章炳麟，〈族制〉，《疇書》(1998: 42~43)。

<sup>246</sup> 通種說最具代表的是唐才常，他認為人分五大類黃、白、黑、棕、紅人，白種和黃種人與較黑的後三種人對立，後者因遺傳缺陷注定要種族滅絕，「黃白智，紅黑愚；黃白主，紅黑奴；黃白粹，紅黑散」，故而為使優者愈優，他主張以通種為強種、保種的要義，其目的就是「能速通黃白之種，則黃人之強也可立待也」，反之，則「黃種之存亡未可知」。見其〈通種說〉，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1980: 102)。康有為則提出「合種」之說，其意如通種說。

<sup>247</sup> 唐才常〈通種說〉，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1980: 101)。

<sup>248</sup> 優生學思想在清末已隨著進化論引進，它的原理在中國獲得大量介紹，則在 1912 年倫敦舉行的「第一次國際人種改良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之後。1916 年《新青年》編輯李亦民介紹這次大會，並推崇美國某些州通過閹割法，認為這是防止惡質子孫的良方（見孫隆基，〈南與北〉，《歷史學家的經緯線》(2004: 85)）。

<sup>249</sup> 夏宇眾，〈淑種學與教育〉，《新教育》，2 卷，4 號(1919 年 12 月)(1919: 395)，引自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1999: 154)。

<sup>250</sup> 見衛聚賢〈中國民族前途之史的考察〉，《前途》，1 卷，10 期(1933 年 10 月)(1933: 17~18)，引自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1999: 167)。



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出這一關聯，蔣介石將統一國家的困難歸於「種族情況之糟」，而藍衣社刊物《前途》刊登衛聚賢文章，指出為保護漢族，中國有必要多學習納粹優生學，因為只有保存和完善漢族才能抗擊其它國家的文化、軍事和經濟侵略。<sup>251</sup>1935年《前途》一篇文章更號召中國直接仿倣納粹種族排外政策，「我們必須認識到種族崇高和優越地位，恢復其古老的榮耀，排斥破壞種族的畸形變種.....像在德國那樣，打擊猶太人和非日爾曼人」。<sup>252</sup>

1920~1930年間，種族改良和種族衛生成為當時時髦用語，遺傳學也用來做為改造種族體質和善種的理論工具。1925年一篇談論〈婚姻制度和優生問題〉文章即指出，優生學要改善民族品質，就要汰劣存優，「優生學即善種學.....他的目的簡單說，是在謀民族的質改良，他想不要使優秀份子減少下去.....一方面卻希望不良份子漸漸減少」。<sup>253</sup>十年後的1935年，以優生改善國民體質的論調仍未稍減，「國以民立」，因此要「改進國民的體質」，「厲行優生」。<sup>254</sup>因為，厲行優生可以「不良種子次第淘汰，優秀份子得以增長」，與「人種之優良，民族之復興」關聯密切。<sup>255</sup>由於攸關國族存亡甚鉅，這時開始有人呼籲立法推行優生政策，1936年第四次全國醫師聯合會就在「強國必先強種起」的考量下，「呈請政府，厲行優生節育，以強民族」，並提倡婚前健康檢查。<sup>256</sup>

當時的一些人口學家、遺傳學家劉雄、張君俊、周建人、陳長蘅、潘光旦等人，都從中國病態體質出發，各發揮其種族改造作法，試圖在國家依然貧弱，人民依然體弱的時代，打造健康正常的種族。他們對遺傳的看法，一是魏斯曼(August Weismann)－高爾頓(Francis Galton)派的強調先天遺傳決定一切，認為智力愚劣、犯罪傾向、社會偏差行為皆可遺傳；另一是拉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派主張後天環境可以改變遺傳。前者容易流於激進的種族主義或種族衛生學，如張君俊的極端主張，潘光旦雖持遺傳決定論，但與張君俊不同，不主張極端的優生措施；至於後者如陳長蘅、周建人。劉雄則是另一位優生學思想代表，他主張人種改良，特別從婚配著手，要選擇體質優良無惡疾者結婚，避免遺傳病種，「具有優良體質者，不可與體質惡劣者結婚，有病的傾向者，不可與同一病的傾向之人結婚」，「結婚當選比較健康者為配偶，不然則其優良種質每被惡化，在於家族

<sup>251</sup> 參見柯偉林(William Kirby)，《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2006: 192)。

<sup>252</sup> 陳昔〈民族復興與中國政治〉，《前途》，3卷，6期(1935年6月)(1935: 62)，引自柯偉林(William Kirby)，《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2006: 192)。

<sup>253</sup> 1925年3月，開時，〈婚姻制度和優生問題〉，《婦女雜誌》，11卷，3期(1925: 2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59)。

<sup>254</sup> 1935年6月1日，宗華，〈如何改進國民體質〉，《醫事公論》，2卷，16期(1935: 17)，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4)。

<sup>255</sup> 1936年8月16日，〈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醫事公論》，3卷，11期(1936: 24)，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4)。

<sup>256</sup> 1936年3月1日，李紫衡，〈從民族優生來挽救國難〉，《醫事公論》，3卷，10期(1936: 7)，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4)。

社會方面均為罪惡，吾人對於惡種之蔓延不可不盡力防之」。<sup>257</sup>再者，劉雄跟德國種族衛生學不一樣，他並不堅持血種的純粹性，他認為人類混種已是趨勢，不可阻止，「人種混雜大勢，已成一大潮流.....由此觀之，人種混雜除孤立地方外，無時無地不行之，此種趨勢蓋非人力所能反抗者，亦無反抗理由」。<sup>258</sup>他更進一步說，雜種並非劣種，優劣如何，端賴其父母而定，「一般人多信雜種較純種為劣，事實不然，雜種雖有較父母劣者，然亦有較優者.....與優良種族混雜有良結果，與劣等種族混雜，則劣等種雖得改良，而優良種稍墮落是也」。<sup>259</sup>他更提醒一般對遺傳缺陷者實施絕育手術時要特別注意，只能「專施於先天的缺陷者，不得施於後天的缺陷者.....故非確實證明其為先天的缺陷者，不能輕易施手術也」。<sup>260</sup>亦即後天缺陷和行為不良者，不得施此極端手法。不過矛盾的是，他又說對不良份子的剷除，根據孟特爾(Gregor Mendel)法則是可行的，「至於剷除不良份子，保存優秀份子或由不良份子中選擇其優良性，使之遺傳一節，由孟特爾氏法則證明其可能，而所以應用之於人類一般者，則為優生學之任務」。<sup>261</sup>這一說法，又將遺傳上的缺陷病態，擴及到社會的偏差行為，除智力愚劣外、犯罪傾向、品格德性都可遺傳，而這也正是極端種族主義消除「不值得生存人」的藉口。

從上述劉雄觀點，難以斷定他是否主張極端優生論，不過他對優良人種，種族健康的重視是可見的，他認為個人自由也不得妨礙種族繁榮，「個人自由當以不妨他人，不害種族發達為限度，吾人當以保存種族之優良特質為任務，不能專顧個人自由安逸也」。也就是每個人都要體認人類進化大業，為種族優良盡責任，「故個人最大本分為保全貴重遺傳質，勿使之污損，傳之次代也」。<sup>262</sup>顯然，育種、傳種攸關國族大事，去除不正常人，以成就種族健康繁衍，成為這一時代不可迴避的課題和使命。每個人要為下一代的良窳負責，個人健康是種族健康基礎。

另一位則是激烈優生論主張的張君俊，在他眼中國是一個衰老、病態、退化的民族。<sup>263</sup>他以日本說明，中國人口、土地大日本數倍，卻遭日本挾制，中國除奴顏婢膝，俯首聽命外，無法可解。<sup>264</sup>1936年柏林奧運大會，中國派出的139名選手，竟然全軍覆沒，更讓他感到華族素質的行動遲緩、未老先衰、行屍走肉。<sup>265</sup>根據他的研究，他認為中國民族病態有：體力孱弱、身矮體輕、生率高、死

---

<sup>257</sup> 見劉雄，《遺傳與優生》(1929: 62)。

<sup>258</sup> 見劉雄，《遺傳與優生》(1929: 65)。

<sup>259</sup> 見劉雄，《遺傳與優生》(1929: 65)。

<sup>260</sup> 見劉雄，《遺傳與優生》(1929: 68)。

<sup>261</sup> 見劉雄，《遺傳與優生》(1929: 66)。

<sup>262</sup> 見劉雄，《遺傳與優生》(1929: 73)。

<sup>263</sup> 在他的《華族素質之檢討》一書，即從民族體力、民族神經、遺傳病根等面向，跟其它國家民族比較，從分析資料來看，中國無疑都是衰老、虛脫的民族。

<sup>264</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181)。

<sup>265</sup> 張君俊，《華族素質之檢討》(1944: 21)。

率亦高、疾病侵襲、無團結力、多談少做、貪小利好速成、缺乏獨立精神。造成的近因是體魄不充實，遠因則是早婚、鴉片、玩妓、納妾、纏足、純血系的婚姻等。<sup>266</sup>救國救種之道就是，改造國民體質，剷除民族病根，如此才能讓國家現代化，也才能強化建軍，讓國防機械化，<sup>267</sup>以便能對日作戰。1935年的《中國民族之改造》一書他提出，成立民族改造院計劃及優生法的制定。他認為應該採取強制的態度，獎勵身心健康者婚配，阻止不健康者結婚，因為戀愛雖屬個人情感問題，但婚姻絕對是事關救種的國家問題，在此婚姻生育納入國家機器，成為國家生產的一環。他如下說明：「我們的目標既是一個救種運動，我們對於繁衍子嗣的種族問題，自然應取統制的態度，戀愛是個人問題，但結婚是國家問題，國家對於婚姻要厲行優生律，凡身體孱弱及患各種遺傳疾病的男女，不論老少、貧富、賢愚皆應一律禁止」。<sup>268</sup>

張君俊接著推崇納粹德國正在施行的優生律，<sup>269</sup>「以德國民族之優秀與健康，尚繼續不斷的努力來改良人種，那中國民族是這樣的衰老萎靡，在在不能自拔的樣子，還不加倍努力來作救種強種運動，那真是世界天字第一號的賤種了」。<sup>270</sup>與納粹德國一樣，他定義不健康指的是低能、神經病、染有傳染病、患肺結核、身體虛弱、有犯罪傾向者。對這些不正常人應採取遲婚待驗、隔離、放逐和閹割輸精管等手段以阻止其生育。<sup>271</sup>至於對鴉片吸食者，張君俊亦主張採取激烈手段，對這些人應殺無赦，血洗之，如此才能改善民族體質。因為民族體質受到鴉片摧殘，如無法控制，民族就會像鴉片一樣煙消雲散。「中國如有救種的觀念，且期盼民族有升騰發展為世界優秀民族之一者，則對這些銷售吸食鴉片、紅丸、嗎啡等人，只有殺無赦的方法，你對於他們寬容，便是對於民族殘忍……與其寬容這些銷售吸食的人，使民族變為賤種，毋寧血洗這些銷售吸食的人，使民族之體質變為優秀」。<sup>272</sup>張君俊激越憤懣的語調幾近於汪士鐸。雖然道光十八年黃爵滋即已提出重治吸食，死罪論處的奏議，但也未出言如此，是否死刑論罪，還引起各省督撫正、反意見討論，<sup>273</sup>可見其審慎將事。總結張君俊提出人種改

---

<sup>266</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280)。

<sup>267</sup> 張君俊，《華族素質之檢討》(1944: 9)。

<sup>268</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232~233)。

<sup>269</sup> 柯偉林指出，納粹所關心的是種族的健康與活力，這對提倡國家復興是有利的，從中國人種的未來來說，他們也贊成納粹的國家改革綱領，因此中國人沒有幾個反對德國的種族主義政策，許多人甚至公開號召仿效這種政策（見柯偉林(William Kirby)，《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2006: 191)）。衛聚賢、陳昔、張君俊的言論，正是最好的證明。

<sup>270</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233)。

<sup>271</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243)。

<sup>272</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237)。

<sup>273</sup> 反對死罪的理由在於，食煙之人，絕煙即等於絕食，煙癮難除，又吸食者眾，則將誅不勝誅。而且憑增胥役榨財索賄之機，同時也容易造成誣陷互告之風。這場正反之爭，滿人多主張反對死罪，漢人多贊成。道光十九年頒布的〈欽定查禁鴉片章程〉，則訂「吸煙人犯均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知悔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亦即，判處死刑，暫不執行，留待來年再審奪。

良方案，獎勵民族北徙；實施優生法律，取締一切不適宜的婚姻；獎勵優秀生育；提倡南北聯姻；鼓勵異族選婚；政府對一切食料，應有科學的統治；設法預防病菌寄生蟲；嚴刑峻法懲治吸食鴉片。<sup>274</sup>

周建人也承認對遺傳不良的人應該加以限制，但他主張用和平的方法進行，「善種學的用意，無非要想從根本上救濟人種的墮落，用和平的方法維持好種，禁止劣種」。<sup>275</sup> 陳長衡則認為要謀國家長期進化則須靠人種之進化，中國要避免種族毀滅或中衰不繼，就要靠善種學，「由於善種之學不講，善種之法不施，任人民自生自養，致種族日形退化……故國破家亡，民奴種滅」。<sup>276</sup> 優生成為救國救種的工具。基於此，陳長衡也同意對危險遺傳疾病者應限制其結婚，特別是男女要慎於擇配，才能孕育強健聰穎之子女，而這正是「善男子善女子最高之天職」。<sup>277</sup> 為國生下優秀下一代成為這一代中國人不可迴避的責任。而為了提昇人口品質，陳長衡提倡遲婚節育以提高國民程度，因為中國人口密度太高，人民程度甚低，如果不透過節育減生的方式，勢必造成社會資產耗費太大，國富增加減緩，人民生活必劣陋低賤，「為國家社會之長治久安與個人之福利康樂，相當的遲婚減育萬不可少」，<sup>278</sup> 因為「今日欲謀救國救種，首在提高國民程度。欲提高國民程度，應大家努力於……民力之節省與民財之富厚，而少從事於人口之增多。故相當的遲婚節育實為提高國民程度之一最要法門」。<sup>279</sup>

再就遺傳品質而言，早婚多育必然易於造就不健康的下一代，導致種族的退化，「早婚多育之國家，人民結婚不知慎重選擇，且養育過多，子女先天後天皆不健全，種族只有退化而無進化」，同時也容易造嬰兒死亡率增高，「早婚多育之國家嬰兒死亡率必高，遲婚節育之國家嬰兒死亡率恆低」，<sup>280</sup> 因此從國家經濟、人口素質、降低死亡率、生活水平等方面考量，都應制定婚律，規定最低婚姻年齡（如男子未滿二十一歲，女子未滿二十歲不得結婚），合乎規定國家方給結婚證書；同時醫生與護士亦應盡教導民眾節育之方法，學校要多培育公共衛生與生命統計、人口統計之人才，俾供未來此項政務推動之所需，同時累積人口生命統計資料，做為日後進一步研究及人口調控之用。<sup>281</sup>

---

<sup>274</sup> 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1935: 239)。

<sup>275</sup> 見陳長衡、周建人，《進化論與善種學》(1923: 61)。

<sup>276</sup> 見陳長衡、周建人，《進化論與善種學》(1923: 10)。

<sup>277</sup> 見陳長衡、周建人，《進化論與善種學》(1923: 18)。

<sup>278</sup> 見陳長衡，〈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收錄於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衡，《人口問題》(1933: 96)。

<sup>279</sup> 見陳長衡，〈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收錄於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衡，《人口問題》(1933: 100~101)。

<sup>280</sup> 見陳長衡，〈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收錄於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衡，《人口問題》(1933: 104~105)。

<sup>281</sup> 見陳長衡，〈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收錄於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衡，《人口問題》(1933: 106)。

被視為中國優生學先驅的潘光旦則讓優生學一詞不再侷限於知識份子群中，而成爲家喻戶曉的說法。他推動成立第一個優生學組織，中國優生學會，創辦優生期刊，《優生》、《華年》，並提出制定優生法的建議。他同時號召公民參與優生運動，因爲優生不只是科學家的責任，種族改良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關，公民須得參與其中。<sup>282</sup>這使得種族改造成爲全民運動，與當時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浪潮匯流。潘光旦不是極端的種族衛生主義者，他曾批判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種族清洗政策，也爲文澄清部份人對優生學的誤解，<sup>283</sup>他指出優生學「……非國家強制的婚姻，並不主張屠戮頑弱，並不欲繁殖超人，並不欲生產天才以供社會不時之需……並不主張用繁育禽獸之法育人……」。<sup>284</sup>他澄清了優生學並非當時德國或日本對弱智者或社會不良分子所強制執行的禁婚絕育政策或淨化不正常人的極端種族衛生政策。不過他確是道地的遺傳決定論者，他認爲優生就是促進民族健康，民族健康的基礎就是遺傳，目的就是「要教民族中的優秀分子相對的加多，不優秀分子相對的減少」。<sup>285</sup>雖然我們可以透過後天努力強化個人健康，「但遺傳而弱，則縱有多量的調攝訓練，結果也是徒然」。<sup>286</sup>

他舉例，一個天份不高的青年，不必一定要他們進高中、大學；一個肌肉組織不很健全的青年，也不一定要他們練習百米競爭，可以將他們留下的機會與設備給其它天份高、肌肉組織健全的青年，這樣就可免去不必要的金錢、時間上浪費，他進一步說，「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義，而一意孤行的做些個人健康的設施，結果不但是徒勞無功，並且還可以減低民族健康的程度」。<sup>287</sup>潘光旦意思很清楚，與其強化後天健康，不如打好先天健康基礎，遺傳決定一切，亦即「把他們的血統從根培植起來」，<sup>288</sup>做法就從婚配的慎選開始，「多多的使健康分子能和健康分子婚配，因而多產生一些遺傳上就有健康的基礎的兒女」，<sup>289</sup>「民族健康真正有效的促進，應當求諸遺傳良好分子的選擇，使他們的數量可以相對的增加，與遺傳不良分子的淘汰，使他們的數量可以相對的減少」。<sup>290</sup>遺傳既成爲民族健康的基礎，也成爲救國救種的出路，因爲中國長期處在「不健全的狀態是常

---

<sup>282</sup> 見潘光旦，《優生學》(1933: 44)。

<sup>283</sup> 如社會學家孫本文在其《文化與社會》一書，即認爲優生學有四個錯誤，誤以人與動植物同等看待；誤以文化影響爲生物特性；誤以智力測驗法爲足以辨別先天優劣；誤以財富與勢力爲判斷能力優劣的標準。潘光旦則以〈優生與文化：與孫本文先生商榷的一篇文章〉一文澄清這些問題。收錄於《潘光旦文集》(第二卷)(1994: 382~394)。

<sup>284</sup> 見潘光旦，《優生概論》，收錄於《潘光旦文集》(第一卷)(1993: 265)。

<sup>285</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315)。

<sup>286</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35)。

<sup>287</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36~37)。

<sup>288</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39)。

<sup>289</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36)。

<sup>290</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39)。

例，而健全的狀態是例外」<sup>291</sup>的處境裡，遺傳優生正是追求正常、健全的基本要素，讓遺傳不良分子減少，是更根本的做法。就像清末民初，憂國之士提出的「體育救國」、「醫學救國」一樣。這是「優生救國」，從婚姻、生育、人種品質救起，如同優生學家所說，「未來之戰爭，非決於疆場，乃決於父母之懷妊」。<sup>292</sup>這些論說對二、三十年代的生育控制思潮、對母體育種、婦嬰衛生的重視和保護作為，產生一定影響。

胡漢民雖然不人口學家或遺傳學家，但他提出一套提高人種品質，解決人口不足的壓迫問題的做法，他認為應該禁止吸食鴉片男女結婚，因為吸鴉片傷身弱種，如果已婚，也可以因配偶吸煙而訴請離婚。為了強種，這是對鴉片吸食者的社會制裁。他說，「我們為解除人口的壓迫，正欲鍛鍊我們的體魄，使我們困窮的人種優良，生殖繁茂，而鴉片卻天天在那斲喪國民的身體，使種族愈益羸弱」。<sup>293</sup>為了解決鴉片問題，應該採取「所謂社會的制裁，種類很多，……還有男女間互相制裁的一種，吸煙的男女如果是未婚的，就不能結婚，已婚的可認對方的吸煙為離婚的唯一理由，而認彼此的不吸煙為保持婚姻的唯一條件」，「而且我們禁煙的目的，既重在強種，已吸上的人，如何還能容他有配偶，有生育，這種弱種流傳下來，繼承不已，遺患何窮，所以這一層原是社會的制裁」。<sup>294</sup>這種鴉片吸食者不得通婚的想法，也反映在政府禁煙宣傳標語上：「不和煙民子女通婚」。<sup>295</sup>

雖然有上述各種優生主張和建議，但當時中國仍處戰爭狀態，傷亡人口不少，極需人力，因此中國始終未立法推行優生理論，降低不良人口，甚且當時國民政府為充實戰爭兵源，乃主張增加人口，因此在 1942 年八中全會決定，「獎勵人口增殖，及提倡優生」雙管齊下的政策。<sup>296</sup>而在早一年的 1941 年，國民政府主管人口政策的社會部，為因應人口學者的人口主張和呼籲，特別組織了一個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邀集各方專家針對人口問題和發展進行研議。<sup>297</sup>經過幾次會議討論，形成幾點共識，在人口數量上，政府不應該鼓勵無條件的增加人口，只有父母身心都健全，且家庭能給予兒童適當教養，才有條件生育。生育多寡要視家庭收入及社會財富一般狀況而定，以社會利益為依歸。因此人口的增加須視

---

<sup>291</sup> 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1937: 43)。

<sup>292</sup> 見陳長衡、周建人，《進化論與善種學》(1923: 13~14)。

<sup>293</sup> 胡漢民，〈禁煙與社會制裁〉，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拒毒運動叢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282)。

<sup>294</sup> 胡漢民，〈禁煙與社會制裁〉，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拒毒運動叢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292)。

<sup>295</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編，《禁煙手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9：社會、社會問題》(2009: 506)。

<sup>296</sup> 1942 年 6 月，潘素，〈為獎勵人口進一言〉，《婦女月刊》，2 卷，1 期(1942: 16)，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5)。

<sup>297</sup> 計有人口、社會學者陳長衡、陳達、孫本文、潘光旦，重慶衛生署醫師許世瑾，社會部研究室主任張鴻鈞等人。

個人、階級及社區間各種不同利益而有差別。再就人口品質而言，在消級優生方面，應採隔離措施，有身心遺傳缺陷者，應與正常人隔離，必要時令其絕育。在積極優生方面，鼓勵身體健康及有才智者結婚，在結婚之前盡可能取得衛生機構證明。<sup>298</sup>這一具有官方性質的人口政策，最後雖未能真正落實，但卻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鼓勵多生的政策，特別是國民政府一貫的三民主義人口增長政策，同時也納入優生學的生育控制，透過婚配、節育以及隔離、絕育等措施調控人口數量、改善人種品質，俾能淘汰不正常人，讓正常下一代在合理的生活條件下生存，以符合國家生存、種族延續之需要。

中國救亡運動，到了這個階段，已完全進入科學救國時代，遺傳、優生、醫療、衛生構成全新的救亡論述和作為，救種不再只是泛稱，更是具體的從血液、從基因、從人種救起。中國進入救亡現代性階段，現代性的科學理性和專業知識既成爲救國救種工具，也在救國救種過程讓中國進入西方現代性議程，一個傅柯所說生命調控的生命政治時代。

#### 四、去鴉片化：去不正常的生命政治

雖然，就歷史的事實來看，除了婚姻、生育、育嬰等想法落實爲政策施行，上述極端的種族淨化和消滅不值得生存人的構想，多半止於建言議論，並未真正實施，但它卻透露出整個國家對不正常、病態的極端焦慮症候，這或可說是百餘年來鴉片傷身害種，有亡國滅種之憂的延伸。就長期歷史脈絡來看，中國面臨國勢的衰落破敗，人民身體的孱弱頹靡，國家統治的分崩離析，民族屈辱的不斷加身，國家自信心的蕩然等內外交迫困局，不健康或不正常已成爲國家民族的象徵，西方或現代文明眼中的典型中國意像，特別是病態的鴉片身體以至鴉片中國的病態意像和事實，使得不正常更根植爲日常生活的深層意識，特別是轉化爲恥辱感，形成不自覺或刻意的自我貶抑或自我負面化的意識。

因此，如何找出並化解這種內在的自我不正常感，以及矯正危害整個價值體系，政權秩序的外部不正常因素，成爲啓蒙進步的主要事業。啓蒙意義至此對中國而言不再只是脫離不成熟的狀態，更是超脫不正常狀態，不管是在西方現代性標準界定下或由此界定折射而成自我意識的不正常。也因此西方進化論、遺傳學、優生學，甚至納粹種族衛生學的進入中國，一下就契合奄奄中國，奮起救弊的需要，成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最佳利器。如果說五四啓蒙思想是自由、民主，那麼晚清嚴復、康有爲、梁啓超啓迪民智的思想就是進化背後的進步，目的之一就是救種，透過宣揚進化強種以至擇嗣善種，達到種族的強盛繁衍，能與世界各國競爭，這就是進步。

---

<sup>298</sup> 見陳達，《現代中國人口》(1981: 114~117)。

因此，上述的種族優生思想，我們不難發現這可形成一場尋找不正常人的運動，在去鴉片化社會焦慮下的掃除病態、不健康它者（病夫、弱種以至其它各種頹敗意像），恢復常態秩序的全民運動。同時在種族民族主義的驅使下，既是歧視政治也是排除政治的展現，這種歧視與排除概念，至少使得鴉片吸食者個人品味、習癖、感官經驗都遭污名化和入罪化，一切個人的口味經驗、愉悅享受都是政治的，不再是個人私密獨享，也不可能讚頌宣揚，鴉片吸食成爲壞品味遭歧視，成爲國族罪人被排斥，這是前所討論的消費的國族化，沒有鴉片消費的主體，只有以國族利益爲依歸被管治的客體。

是以，透過界定和找出優生學定義下的不正常人以及社會秩序規範下的行爲偏差者；透過判定誰是鴉片吸食者，將之入罪勒戒，如此才能降低種族和社會面臨的威脅。而種族戰爭則成爲正常人與不正常人的戰爭，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戰爭，它將種族間的外部戰爭延伸到種族內的內部戰爭，不只消滅來自外部的威脅，也消弭來自內部的風險，這正是生命政治之關懷，也是當時中國在亡種亡國意識下的必然反應。確實，生命政治化社會必然有一現象，即避免生命意外或有害風險的出現，控制一切病態、不正常現象的威脅機會，讓社會回歸穩定的常態秩序。如何找出不正常，亦即找出誰是敵人、誰是風險和威脅，誰才是影響種族國家生存的不正常人，並進行調控規範，以降低風險，成爲常態社會的常態之舉。

上述討論，不管是清代對人口—政治經濟的治理構想或民國時代種族優生的提倡，無非都是在衰敗、病態時代要讓中國正常，要找出威脅常態秩序的要素，也就是去鴉片化。去鴉片化不只是去除鴉片養壞的病態習癖、品味、風尚；去除鴉片糟蹋的病態身體、社會、人種；還包括去除鴉片間接帶來的不正常現象。去鴉片化成爲一種象徵，意指去除威脅社會的不正常因子。唯有找出並消除不正常，例如，不健康身體、不健康人口、不健康環境，才能建設新國家，才能做爲新公民，<sup>299</sup>這是新中國現代化過程最主要的命題。在這種情境下，尋找不正常乃成爲晚清到民國二、三十年代的一股潛流，我們可以說百餘年中國歷史就是在鴉片化和去鴉片化之間對峙、拉鋸的抗鬥史。在抗鬥過程，個人身體以至集體生命，全納入國族改造計劃，接受國家管治、調控，不管是鴉片消費的禁制或鴉片生產的強迫，不管是禁食或逼種，都是國家利益的一環，這利益可以是爲國家財稅考量而弛禁鴉片，也可以是爲國家革新建設需要而嚴禁鴉片，在禁與不禁間人民都是國家的節制對象，在走出亡國滅種大義下，國家以節制鴉片介入人民生活、身體、生命領域，即便它法令不張、吏治不嚴，也多少對人民產生警示、干預作用。於是人民既受鴉片控制也受國家節制，雙重束縛，構成「不正常」鴉片吸食者獨特的生命政治生涯。

---

<sup>299</sup> 如孫中山所宣示，「其有飲鴆自安，沉湎忘返主，不可爲共和之民」，見《臨時政府公報》第27號，收錄於馬模貞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998: 567）。



如果我們看到生命政治在中國萌生或一些現代性作為的開展，驅除不正常或超克不正常必然是首要之務。這種驅除不正常運動也聚焦於「唯科學主義」<sup>300</sup>時代的進化論、生物學、種族優生思想，在這些構成生命政治的知識體系以及科學意識型態的保障下，將意象化敘述語言中的不正常鴉片煙鬼，擴延到科學化分析語言中的不正常缺陷者。鴉片鬼和缺陷者都是打造國族事業，進入常態狀態必須找出和驅離的大敵。中國正朝建設現代國家方向進行，雖然極端的種族政策未曾付諸實踐，但強化身體健康，關注母體和下一代，塑造良好衛生環境，讓中國擁有現代化身體和文明環境，則是努力的目標。透過去除鴉片化、矯治病態、不正常，中國進入健康現代性、衛生現代性的範疇，這也是生命政治做為中國救亡現代性的體現。

---

<sup>300</sup> 見郭穎頤(D.W.Kwok)，《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2005)。

## 第四節 健康的必要：保衛身體，保衛國族

### 一、健康政治：從煙民、廢民到健康公民

1936年柏林舉辦奧運大會，中國派出的139名選手，在競賽中全軍覆沒，成績不忍卒睹。當中國代表團回國途經新加坡時，當地報刊登載一幅外國漫畫諷刺中國這次的敗北，內容：在奧運五環旗下，一群蓄著長辮，長袍馬褂，形容枯槁的中國人，用擔架扛著一個大鴨蛋，題為「東亞病夫」。<sup>301</sup>這幅諷刺畫發人深思的是，在1936年這個時代，雖還有中國人穿著長袍馬褂，卻已沒人再蓄長辮。馬褂、長辮這個帝制時期外國人眼中經典的中國意象，<sup>302</sup>落後、怪異的中國形態象徵，何以進入共和時期，還成為外國人觀看中國的視框？或許，最有可能的是，馬褂、長辮又跟形容枯槁、奄奄一息中國人的病態意象結合在一起。透過「病夫」的意象，將馬褂、辮子、甚至小腳、鴉片鬼，這些中國人落後、不文明、氣衰體弱的符號連結起來，再次強化、穩固這些意象的意義，並構成認知中國的永恆視框。因此，辮子在這時候還入畫，只因為中國人這時候還撐一付病懨懨的身體，不堪一擊。張君俊在他的著作討論了這事件，也比較了西方和中國人的體態差異，體質強弱，他的結論如前文所提到的，華族之身體素質，行動遲緩、未老先衰、如同行屍走肉，中國民族必須進行改造。<sup>303</sup>從這裡看，顯然共和時代身體跟帝制時代身體，似乎沒什麼不同，身體強健與否還繼續成為國族的問題意識，東亞病夫的恥辱仍牢牢貼著，既是別人嘲笑，也是自我嘲笑的因由。

當時中國人遭鴉片侵蝕的身體，「形羸骨削，面異人色，舉動孱弱，有如土木」，<sup>304</sup>美國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1865年的書中描繪鴉片鬼的樣貌，「臉色灰白無生氣，像個死人。雙肩聳起，耷拉著腦袋，目光呆滯無神」。<sup>305</sup>這般似人像鬼，了無生氣的形態正是清末民初身體改造運動的肇端。梁啟超則指出中國

---

<sup>301</sup> 見楊紅林，《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2011: 203)。

<sup>302</sup> 西方人對留辮的嘲笑不時出現，如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就在1895年的書中，寫下了一段嘲諷中國人留辮的醜陋形象，「中國人的頭不是被剃得一毛不剩，溜圓光亮，正如一顆彈子球，便是這裡那裡留下圓圓的一圈，正像一塊又一塊的補丁。那點頭髮便像雜草一樣在那裡自由生長，然後每片頭髮被紮成一根一根的小辮。這樣看上去，就好像血液在頭部的供應特別充足。由於過剩後便生根發芽，長出了那五六根羊角辮子」。見何天爵，《真正的中國佬》(The Real Chinaman) (2006:128~129)。

<sup>303</sup> 張君俊，《華族素質之檢討》(1944: 21)。

<sup>304</sup> 徐勤，〈戒鴉片煙會序〉，收錄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四) (2000: 462)。

<sup>305</sup> 見盧公明，《中國人的社會與生活》(2009: 414)。

人由於不重衛生、早婚、不運動、日常生活需人服侍造成身體萎弱不健，未老先衰，他說「中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閒置一室，絕無運動……未黃耆而駝背……衣食舉動，一切需人……」，特別是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躑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sup>306</sup>四萬萬人中找不到健全體格之人，或許言之太過，但情況也不樂觀，蔡鐸即指出當時中國人幾乎舉國皆病的身體狀況，健全者不過寥寥十分之一，「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龍鐘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還有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又居十分之一二，所謂宅全無缺之人，不過十分之一而已」。<sup>307</sup>

這個數字如果無誤，不免令人心驚，也坐實了病夫病國之譏。中國人長期體魄不佳，身骨不健，是否全然是吸食鴉片造成，不可追究，有可能是飲食、衛生、運動習慣造成。但吸食鴉片導致身體羸弱，氣血衰竭，卻是中國之所以為病夫的刻板印象，鴉片鬼奄奄無用的身體，成為中國身體的象徵。或許我們可以說，鴉片讓中國的健康構成問題，鴉片是中國處於不正常狀態的導因。健康成為中國改革、進步、生存，邁向文明、現代化之路，必須解決的問題。健康不只攸關身體，更攸關國族發展，因為「健康之國家，寄于健康之國民，保護健康，衛生尚矣」，<sup>308</sup>構成國家必須介入管理的健康政治。

確實，吸食鴉片對身體的傷害至深，反鴉片論述經常出現這類對身體傷害的描述，而醫療傳教士對鴉片煙癮的醫治以及對鴉片生理傷害的研究，讓「鴉片毒害」、「鴉片流毒」，不只是象徵用語或形容辭，而是醫學上的生理損害。這方面的闡述如德貞在 1876 年利物浦社會科學協會先後發表的兩篇演講，〈鴉片在生理上對健康的影響〉、〈從醫學角度看鴉片與健康的關係〉，<sup>309</sup>或可說明。一般認為鴉片造成的傷害，「智力耗損，缺乏創造性，增加依賴性，意志薄弱，思想模糊，注意力毀損，記憶力衰頹，神經過敏，性情乖張，一面異常怯懦，一面猜疑別人……」，<sup>310</sup>特別是影響到受孕機會、嬰兒死亡率以及遺傳品質，「慣用麻醉品者，不易得孕，即幸而得之，亦易流產或死產，縱使呱呱墮地，能得幸存，不是先天成癮，便與常兒有異，此真麻醉品能禍及子孫之謂也」，<sup>311</sup>因為毒癮傷害生殖功能，造成男子性痿弱，女子月經失調，有絕嗣之危害，而且可能禍延三代，亡國

<sup>306</sup> 〈新民說·論尚武〉，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1997: 713)。

<sup>307</sup> 見《蔡鐸集》(1983: 26)。

<sup>308</sup> 見〈中國國民衛生會敘文〉，《南方報》，1907 年 6 月 7 日，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86)。

<sup>309</sup> 見自高晞，《德貞傳》(2009: 423)。

<sup>310</sup> 見羅運炎，《毒品問題》(上)(1936: 19)。

<sup>311</sup> 見羅運炎，《毒品問題》(上)(1936: 21)。

滅種並非虛言，「毒癮礙及生殖，嗜毒家庭，大都三代而絕，考其所以，則因嗜毒者之生殖機能中毒受傷，性的功用摧毀，女子嗜毒，月經不調，乳房停止作用，男子嗜毒陷於性的衰痿，喪失性的衝動，如果男女雙方嗜毒，則期絕嗣不待龜著，從知毒品之能亡人之國，滅人之種，信非虛言」。<sup>312</sup>吸食鴉片影響三代人口，前述醫療傳教士德貞的研究已指出這事實，並提醒注意。鴉片對育種之危害，獲得醫學之證實。有位醫師據他親身經歷指出，他曾醫治一名鴉片煙癮 31 年之婦人，生過 18 個孩子，但沒有一人活著。有 3 名孩子活超過三天，其餘皆三日內死亡，超過三天是因為婦人剛吸食，煙癮不深，三日內亡故，其時婦人煙癮已深，後經醫師研究證實鴉片所害。<sup>313</sup>鴉片妨礙健康，顯然更令人焦慮的是對人口繁衍的傷害，對遺傳品質的擔憂，也正如前文討論引發二、三十年代優生學的風潮。除了優生學的強調，也反映在這一時期對母體孕產安全、婦嬰健康的重視。

在上述鴉片病態意象突顯下，健康、強壯無疑成為這一時期國族訴求的重點，特別是在進化論種族競爭，優勝劣敗的影響下，尚武精神的提出，軍國主義的倡導，以至推展體育運動乃成為達到強國強民，強民強體目標的方法。<sup>314</sup>也在這個主軸下，個別身體健康和整體人口衛生全以國家民族發展大計為依歸，尋求健康和衛生不只是為自己，更是為國家民族。結婚、生育也不能隨意為之，更要時時警醒能為國族留下什麼樣的下一代。女子的重要性在國族論述下，轉換成育種的母體，因為「女子乃國民之母」，母體承擔國族存亡大任。從尋找、消除不正常到恢復正常；從身體健康到國族健康；從個人衛生到種族衛生，健康、衛生成為中國醫療現代化時期，國家讓人民嵌入整體建國計劃的工具和生命技術，成為救亡圖存的國族意識型態。而這時期的人民在「健康之必要」的國族大義下，必須自我警醒、自我關注、自我照護自身的身體和婚姻狀況，因為身體、生育都要向國家負責。從清末民初開始，這股身體、育種向國族負責的運動，在西醫科學知識保障下，成為醫學維新、醫學救國的命題。知識份子的倡議、國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民間商品廣告的推波助瀾，健康與衛生就跟進化天演、救種保種一樣成為這個時代關鍵字眼。但另一方面也對照出國家民族是如此病的不輕，如此的不正常。

確實，鴉片仍侵蝕人民和國家軀體，東亞病夫封號仍未撤去，在戰亂頻仍，

---

<sup>312</sup> 見羅運炎，《毒品問題》（上）（1936: 22）。

<sup>313</sup> 見羅運炎，《毒品問題》（上）（1936: 21）。

<sup>314</sup> 相關研究可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2000）；蔡寶忠，〈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 年，5 期；申海青，〈晚清軍國主義思潮的形成與影響〉，《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31 卷，2 期（2010: 101~104）；許義雄，〈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以自強保種思想為中心的探討〉，《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十輯（1988）；徐元民，〈嚴復的體育思想〉，《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十八輯（1994）；蒙祖兵，〈康有為體育思想略論〉，《成都大學學報》，2009 年，4 期；Susan Browell，*Training the Body: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1995）；Andrew D.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2004）。

烽煙迷漫下，一場內部戰爭於焉拉開，這是一場健康與不健康，常態與病態之間的內部戰爭，也是一場從煙民、廢民到健康公民的鏖戰，正是這拉鋸過程，具體化了生命納入政治範疇，落實了身體、生命的國族化，以應付外部戰爭，列強的種族威脅。國家也因此得以透過健康、衛生、醫療等科學技術逐步干預人民身體、生命，以至日常生活各領域，政權藉此得以擴張穩定。健康成爲中國現代化和富強的必要，也是每個國民的目標，正如同傅柯所說，「健康的必要性」(imperative of health)，是任何一個人/機構的責任，也是所有人/機構的目標。<sup>315</sup>在長期處於病態的中國，追求健康不只是每個國民應享的權利，更是對國家應盡的責任，因爲健康的身體、安全的生命，不只屬於你，更屬於國家，它是國家富強的能量和後勤。要保衛健康，才能保衛身體、國家和種族。

健康透過現代化醫學知識成爲救國救種的生命技術，對健康的強調和說辭也成爲國族救亡論述之一。從生到死，從身體到生命，從個體到人口，全在健康的籌劃和計量下。於是我們看到這時期追求健康的運動，透過教科書、健康衛生書籍的啓蒙身體和醫療視野；透過尚武精神和體育運動推廣，鍛鍊體魄，改造病夫身體；推動醫療現代化，以健康做爲國族救亡的技術，特別是提高婦女懷胎、生產到育嬰過程的安全性，以保衛母體，確保國家下一代。

曾經有衛生專家指出：「我國人由於體格之衰弱，疾病之繁多，一般死亡率特高。平均人壽，約爲三十歲，僅及英美等國之半數」。<sup>316</sup>這種因身體孱弱，體質不佳，衛生不良導致的高傳染病，高死亡率和低壽命，在醫療衛生條件改善下已有所轉變。根據人口學研究，從總體人口治理來看，由於醫療技術的提昇和公共衛生的推行，降低疾病和傳染病的危害，使得人口平均壽命延長，死亡率下降，造成人口的增長，到三十年代已突破五億，不再是一直以來掛在嘴邊的四萬萬人，也擺脫了中國長期以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發展模式。雖然戰爭時期消耗人口，但也因這段時期死亡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減緩人口增長速度，不致產生人口膨脹壓力。<sup>317</sup>中國更不會如孫中山所擔心的因人口不足而遭到列強消滅。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追求健康，對國族生存發展至關重要，如胡定安所言，「由體育觀念到預防醫學中之衛生觀念，從一切的改革心理與趨勢觀察起來，我們就可明白民族力量的增進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個國民健康，然後可以顧到中華民族復興」。<sup>318</sup>國民健康是民族復興基礎，成爲中國救亡基調和必要

---

<sup>315</sup> Foucault, "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2000: 94).

<sup>316</sup> 1943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宣言〉，轉引自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223)。

<sup>317</sup> 如果沒有戰亂與災荒造成至少2000萬人的直接死亡以及更多的間接死亡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速度將更增高。見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17~19)。

<sup>318</sup> 見胡安定，《胡安定醫事言論集》(1936: 65)，轉引自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2006: 104)。

之舉，也構成國家介入、籌謀的健康政治，既是保種救國作法的延續和深化，也體現了生命政治的意含。

## 二、尚武/體育：改造病夫，健康身體的開始

嚴復最早提出「病夫」一辭，1895年〈原強〉一文，直指「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sup>319</sup>要改變病夫命運，則必須鼓盪民力，強化血氣體力，亦即操練形體，鍛鍊體能。相較歐美各國為強化人種素質，無不重視體力之操練，甚至連婦女也不例外，這正是國家貧弱之分野。嚴復還注意到除體力鍛鍊外，也須留心於身體健康有益的飲食養生，他說，「今者論一國富強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為之基……歷考中西史傳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國之間，貧富強弱之異，莫不於焉肇分……至於今世，則歐羅化國，日蹙蹙然以人種日下為憂，操練形骸，不遺餘力，飲食養生之事，醫學所詳，日以精審。此其事不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婦女亦莫不然」。<sup>320</sup>同一年，康有為則在〈公車上書〉提出惟有體魄強健才能強國的看法，因此要練兵以強天下之勢。他說道當時國家兵備萎弱不堪情況，「聲色銷鍊，精氣衰竭，暮氣已深，萬不能戰」，而泰西諸國則是「皆以民為兵……選兵先以醫生視其強弱」。<sup>321</sup>在他創辦萬木草堂時即已提倡尚武精神，特別是在列強環伺的危境下，更要鍛鍊強民之體魄，「若夫當列強之世，尤重尚武」，<sup>322</sup>「惟其以尚武之精神也。故專務操練軀體，使之強壯」。因此，他在萬木草堂講學時特別注重少年兒童體育，認為這時候的兒童，體魄訓練應重於智力教育，課業不必多，遊戲不可少，動筋骨甚於動腦筋，「大概是時專以養體為主，而開智次之，令功課稍少，而遊戲較多，以動蕩其血氣，發揚其身體」。<sup>323</sup>

梁啟超亦持此說，在〈新民說·論尚武〉一文闡釋意旨，指出尚武是國家之所立，文明之所賴的基石，也是種族競爭的憑藉，特別是西方各國和日本已專事於體育之訓練，以備軍人之技能和精神，中國國民若不尚武，雖有淵深之文明、知識，廣大之土地，也無法競逐於世。他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激烈之舞台」，「歐洲諸國靡不汲汲從事於體育……日本近日汲汲於體育之事，務使其國民皆具有軍人之本領，皆蓄軍人之精神」，<sup>324</sup>他更指出，「中國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以至「人種不強，國將何賴」，正因有病夫始

<sup>319</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28)。

<sup>320</sup> 周振甫選輯，《嚴復選集》(2004: 30)。

<sup>321</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收錄於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2008: 26, 25)。

<sup>322</sup> 轉引自蔡寶忠，〈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5期(2009: 17)。

<sup>323</sup> 轉引自蒙祖兵，〈康有為體育思想略論〉，《成都大學學報》，2009年，4期(2009: 103)。

<sup>324</sup> 〈新民說·論尚武〉，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1997: 709)。

有病國，惟其鍛鍊筋骨，振武奮勇，才能適應生存競爭，「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能不為病國也。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國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武，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正因為國家「盛衰之數，無不恃尚武之精神」。<sup>325</sup>在梁啟超的觀念裡，中國人素來文弱柔懦，不尚勞動，體質不佳，尚武正是重新打造國民，翻新國家，擺脫病夫病國的基本要件，其重要性有甚於文明。在這裡，身體強健與否成為解決國族問題的關鍵，也興起一股「體育救國」的風潮。

梁啟超提倡興女學，<sup>326</sup>更注意到女子體育的重要，無非就是體育救國的反映，「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sup>327</sup>女子攸關保種，健康強壯的女子才能保種救國，下一代的良窳則繫於母教之善否，「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sup>328</sup>我們不難發現梁啟超倡議興女學、善母教，其最終目的在於「急保種之遠謀」，確保婦女能善種強國，而非著眼於婦女的獨立自主，從奴役的處境中解放出來。<sup>329</sup>亦即，興女學只是出於強國保種的需要，並做為一種手段，並非出於女性自身發展的需要，或以解放女性為出發點。<sup>330</sup>

這種論述一直延續到二、三十年代對婦女孕產安全的重視和婦醫技術的提昇，推動新式助產術以保障婦嬰安全，降低死亡率，而其背後也指向母體育種對國家的重要性。也因此，正如游鑑明研究指出，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推動，基本上是在政府規劃、管理下，要求新式教育下的女子從事體育活動，俾能改造她們的身體，走出病夫、病婦陰影，同時以健康身體，生育強健下一代，以健康身體救國。<sup>331</sup>1930年4月，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選手演說詞中即明白指出，女子要注重體育正是因為女子乃國民之母，身負國家重任，「要知道女子為將來國民之母，責任很重大的，應當時時刻刻保重身體，注重體育」。<sup>332</sup>1937年的一篇文章，主題〈提倡女子體育與中華民族復興〉，更強調女子體育有利民族復興，而復興

<sup>325</sup> 〈新民說·論尚武〉，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1997: 713)。

<sup>326</sup> 關於清末女學推展概況，可參見楊劍利，〈清末民初女學實踐狀況考察〉，《中州學刊》，2006年卷，3期(總第153期)(2006: 179~182)。

<sup>327</sup> 〈變法通議·論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1997: 32)。

<sup>328</sup> 〈變法通議·論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1997: 31)。

<sup>329</sup> 這類論點如劉海鷗，「梁啟超的興女學絕非只是改變傳統社會中廣大女性處於受歧視、受奴役的社會地位……他對纏足陋習的批判和改造，也遠非只聚焦於婦女個人肉體苦痛的紓解上，而是把它視為對強種救亡的一種障礙性行為的排除」。見劉海鷗，〈梁啟超興女學的倫理意蘊〉，《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1期(2005: 47~48)。

<sup>330</sup> 見楊劍利，〈清末民初女學實踐狀況考察〉，《中州學刊》，2006年卷，3期(總第153期)(2006:182)。

<sup>331</sup> 游鑑明，〈媒體與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收錄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2007: 342)。

<sup>332</sup> 1930年4月，〈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選手演說詞〉，轉引自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151)

再者，由於西方體育運動的帶進，使得中國女性進入身體轉型階段，從過去纏小腳，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追求體態纖細嬌柔、弱不禁風的病態美，轉而建立一套新的女性身體美感標準，亦即開始以健康、自然做為女性審美的標準。健美或健康美在當時整個國族追求健康、恢復常態的意識型態下，成為新的觀看女性身體的方式和衡量女性身體美感的準繩。每個時代都各有其符應時代需求和氛圍的美感標準，健康美成為審美判標，與其說是一種新的美感典範誕生、美學風格的兌變，毋寧說它反映的是這個時代中國正亟欲擺脫長期病態狀態，從不正常中解放出來。特別是纏小腳婦女，以及不少橫陳煙榻，身體銷蝕於鴉片的女性煙鬼，這些病婦身體，成為強國保種政策下的國族大敵，透過健康美的確立，區劃並排除出病體以及病態美。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健康美的呼籲和論述相當多，儘管也有婦女從中獲得身體解放，自我愉悅和滿足，<sup>334</sup>但仍不脫國族救亡框架。1935年的一篇文章〈婦女美的問題〉，即呼籲婦女應放棄病態美，因為追求病態美，除了於自己身體健康有礙，更嚴重的是造就懦弱無用的亡國奴，「小之害了自己的健康，失了自己的美貌，殺了自己的威儀和生氣；大之喪了民族底生氣，造成懦弱無用的國民，苟且地生，苟且地死，等候著做沒落的亡國奴」，<sup>335</sup>這篇文章進一步指出只有健康美才能強民強種，才能擺脫積弱，建造強盛國家，「只有健康美才能打破中國底積弱，使種類優生化，只有姿態美才能掃蕩苟且墮落的醜態，收到民族傑出的效果。如此才能達到國家強盛的途徑」。<sup>336</sup>確實，我們觀察這時期興女學、廢纏足、提倡女子體育的說辭，在婦女解放背後，其實真正關切的是國族興亡大計，亦即強女子以強種，保衛母體以育種救國，只有在這框架，女子身體才有其效用和意義。

梁啟超之後，蔡鍔在1902年《新民叢報》創刊號以奮翮生之名發表〈軍國民篇〉，更進一步的倡議全民皆兵，使全國國民皆受軍事訓練，惟軍國主義才能救亡圖存，「軍者，國民之負責也。軍人之知識，軍人之精神，軍人之本領，不獨限之於戎者，凡全國國民皆宜具有之」，「居今日而不以軍國主義普及四萬

---

<sup>333</sup> 蕭忠國，〈提倡女子體育與中華民族之復興〉，《體育季刊》，3卷，2期(1937: 145~147)，見游鑑明，〈媒體與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收錄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2007: 347)。

<sup>334</sup> 相關討論參見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收錄於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醫療》(2008: 241~275)。

<sup>335</sup> 錢一葦，〈婦女美的問題〉，《婦女與兒童》，19.20(1935: 2)，轉引自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收錄於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醫療》(2008: 247)。

<sup>336</sup> 錢一葦，〈婦女美的問題〉，《婦女與兒童》，19.20(1935: 235)，轉引自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收錄於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醫療》(2008: 264)。



萬，則中國其真亡矣」。<sup>337</sup>蔣百里亦在〈軍國民教育〉一文，提出學校教育軍事化、社會組織軍隊化、社會風俗勤苦化的建議。蔡元培大力推動軍國主義教育，惟有憑藉堅實之武力才能奪回國權，因為「我國則強鄰交迫，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武力，勢難恢復……非行舉國皆兵之制……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者也」。<sup>338</sup>一位署名嵐僧者則在《杭州白話報》發表〈國民體育學〉一文，呼籲全民學體操，養成健全國民體魄，方能禦侮抗敵，洗雪恥辱，「現在最要緊的是體操……叫大家都去學習，養成尚武風氣」，讓國人「都有完全的國民體魄」，從而達到「免却外人凌虐、外人壓制、外人侵奪」目的。<sup>339</sup>1904年一篇時論〈論尚武主義〉，則直指尚武攸關人種優劣和國家存亡，「民質能尚武，則國強，強則存；民質不尚武，則其國弱，國弱則亡」。<sup>340</sup>

1905年振武宗社，則提出要競存於天下，就要國民是軍國民，要打造軍國民，就要先強種，而強種的根基就在禁鴉片，「強種性……立於兵力爭存之天下，固非通國民為軍國民不可，而為軍國民非先強種不可，欲強種不首禁鴉片更不可」。<sup>341</sup>1919年孫中山於上海精武體育會創辦《精武本紀》會刊時，應邀作序，並親筆書寫「尚武精神」匾額，在序中解釋其義，指出體育武術攸關強種保國，國弱必然招致侵略之戰端，要自衛自保，就得靠體育強身、強國、強種，「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則不適於生存。且吾觀近代戰爭之起，恆以弱國為問題」，是以要「以振起體育之技擊術為務，於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係」。<sup>342</sup>

尚武、體育，培養軍國民俾以強種的觀念，也落實為國家政策。1902年（光緒28年），清政府頒布〈欽定中學堂章程〉，規定後二年體操課程兼兵操；〈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定均設兵式體操課程。1903年（光緒29年）則將兵式體操課程向下延伸到高等小學之課程。<sup>343</sup>以體操為主的身體教育列入正式課程，取得合法地位，也宣告身體改造運動自此成為國家改革，民族重建的主要課題。在這股風潮下，各地的體育會、體操會、尚武會等體育武術學校紛紛設立，據統計從1902年到1911年，廣東、江蘇、浙江等地就出現23個之數，<sup>344</sup>成為清末民初振衰起弊的具體行動。而其成立宗旨，也都環繞在健身強種，洗雪病夫之恥，

<sup>337</sup> 轉引自蔡寶忠，〈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5期(2009: 18)。

<sup>338</sup> 轉引自蔡寶忠，〈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5期(2009: 18)。

<sup>339</sup> 轉引自蔡寶忠，〈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5期(2009: 18)。

<sup>340</sup> 1904年，〈論尚武主義〉，《東方雜誌》，2卷，5期，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54)。

<sup>341</sup> 〈自禁鴉片振武宗社簡章〉，1905年10月28日，《申報》。

<sup>342</sup> 見陳鐵生，《精武本紀》，10期(1919: 1~2)，轉引自蔡寶忠，〈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5期(2009: 20)。

<sup>343</sup> 見徐元民，〈嚴復的體育思想〉，《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十八輯(1994: 18)。

<sup>344</sup> 見許義雄，〈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以自強保種思想為中心的探討〉，《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十輯(1988: 8~10)。

國家民族的振興上，有的則為訓練革命武裝力量。如「研習兵學，造就軍國民人才」（上海滬商團體體育會），「鑒於祖國積弱，外侮頻仍國民體質衰弱，有東亞病夫之譏，乃興辦教育」（廣東南武公學），「鍛鍊體魄，復興國家，訓練革命幹部」（紹興體育會），「鑒於國民軀體羸弱，致蒙東亞病夫之詬，而欲圖強國，必先強種」（滬學會體育部），「借商餘之暇練習體操，以健身、衛生、尚武、強種為要」（上海北區華商體操會），「培養訓練革命武裝力量」（廣東松口體育會），「研究國術，提倡體育」（上海精武體操會）。<sup>345</sup>

國民政府時期，更為救國救種，強大國家，積極推動全民體育。1930 年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訓詞清楚點出，「我們中國人對於體育久不注重，所以身體都不好……中央認為救國救種的唯一要圖，就是提倡體育，而提倡體育的重要意義，就是要使中華民國在世界上成為最強大國家」。<sup>346</sup>1935 年，蔣委員長更通令黨政軍學各機關人員為救國救種，應當全員投入體育運動，鍛鍊體魄，「查運動為鍛鍊國民體魄，以達成強種救國重要工作之一，實應極力提倡，普遍發展」。<sup>347</sup>這段時期政府頒布各項體育法規，以推動全民體育，如 1928 年「各縣公共體育場頒行規程」，1929 年「國民體育法」，其中都規定各縣市須設置公共體育場，以謀民眾練習之用，1933 年「國民體育實施方案」規定定期舉各級運動大會，以帶動體育風潮，<sup>348</sup>在政府主導規劃以及宣傳下，體育成為全民的救國運動。

從尚武精神到軍國民主義提出，以至落實到全民體育推動，目標都是針對長期在鴉片侵蝕下，萎靡不振的病夫身體，以及洗刷病夫的民族恥辱，重建國家信心。如同前面所引，振武宗社指出的唯有禁鴉片才能強種，才能培養出軍國民。然而到了三十年代，鴉片尚未盡除，病夫狀態依舊，強健身體仍為民族興衰之所繫，國家之所強調。1933 年〈第五屆全國運動大會訓詞〉即指出，「中國病夫貽譏，積弱極矣，個人體力之盛衰，實關民族整個之榮瘁」。<sup>349</sup>1936 年的一篇文章繼續提到，中國人口雖多，但「國民的健康程度太差」，猶如「一個呻吟床第的病夫」，<sup>350</sup>幾個月後另一篇談節育跟國民健康的文章也論及中國的病夫現象，「國內衰弱殘病之驅成群，久貽東亞病夫之譏評」。<sup>351</sup>病夫依然是這個時期國家必須

---

<sup>345</sup> 見許義雄，〈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以自強保種思想為中心的探討〉，《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十輯(1988: 8~10)。

<sup>346</sup> 1930 年 4 月，〈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訓詞〉(二)，轉引自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150)。

<sup>347</sup> 1935 年 3 月 2 日，〈蔣委員長提倡黨政軍學各機關人員體育通電〉，轉引自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 169)

<sup>348</sup> 見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 126~165)。

<sup>349</sup> 1933 年 10 月 10 日，〈第五屆全國運動大會訓詞〉，轉引自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 152)。

<sup>350</sup> 1936 年 4 月 16 日，張一飛，〈國民健康與新生活運動〉，《醫事公論》，3 卷，13 期(1936: 30)，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44)。

<sup>351</sup> 1936 年 6 月 1 日，葛克全，〈節制生育與國民健康〉，《醫事公論》，3 卷，19 期(1936: 1)，轉

解決的問題，他既關涉政權穩固，也關涉戰爭勝敗。蔣介石乃推動新生活運動，以清潔、衛生為運動核心，身體健康，以至心靈健康（道德）更是重點所在。全民體育的推動，各種衛生運動和健康競賽，構成重振民族活力的一環，同時也應付抗戰之需。例如江西新生活運動工作項目之一，就是在南昌市舉辦健康比賽，其中依然強調身體強弱攸關民族盛衰，因此要強化國人健康，「國民身體之強弱，與民族盛衰之關係甚深，我國人民因受不良習慣及嗜好之影響，體質日漸衰弱，該會為鼓勵健康…… 組織健康比賽委員會……」。<sup>352</sup>

抗戰期間新生活運動，積極提倡國民體育，以體育為正當娛樂，因為，「觀六年來之抗戰……愈戰愈強，可見我並不弱，惟所弱者，在於國人體格，故提倡體育，實為針對當前病態」，<sup>353</sup>健康的身體成為國家的戰鬥力。1941年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紀念訓詞特別指出，中國之弊、之恥在「病」和「弱」，唯有推動國民體育，全民注重衛生和健康，才能增進民族健康，洗雪「東亞病夫」之恥。他說，「可惜今日一般國民，有不勞動而多病的，有尚在少壯而老衰的，各個國民的『病』和『弱』，實在是我們民族最可遺憾的大恥。推究他的原因，多由於不知衛生，不重體育，新生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本來都以衛生為重要原則，對於國民體育的普及，歷年來都作為重要工作之一……更應該使每一同胞，都知道他要有一種適當的健身運動，來改善個人的體格，增進民族的健康，必須這樣才能洗刷『東方病夫』、『老大中國』各種稱號的恥辱」。<sup>354</sup>這裡也反映出從清末民初的強調健康，推動體育運動，到這時健康仍然是國族問題之一，恢復常態、找回健康確是一條漫長、艱辛道路。

確實，恢復健康成為國家民族最重要的議題，也是國家建立、戰亂迭起時期最貼切的寫照。從驅除不正常到恢復健康，所有的身體和生命幾乎都投入這場找回健康的運動，透過優生、人種改良、體育運動走向這一國族目標，同時除了身體的鍛鍊外，在西醫介入下，健康和公共衛生的概念，更成為民國時期身體改造的重點，展開了一段醫療現代化下，追求健康身體，重振「民族活力」(marrow of the nation)<sup>355</sup>的漫長歷程，也是個人身體為自己健康負責，也為國家民族健康負責的時代，個人身體既是社會身體，也是國家身體；病態身體，造就病態國家；身體的恥辱也正是國族的恥辱。為了恢復正常，洗雪恥辱，身體乃納入國族建設大計，健康之必要乃成為國家建立，民族再造之必要。對健康的呼籲和強調，使得健康成為這時期的意識形態，它反映在學校教科書、公共輿論、商品廣告上。

---

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44)。

<sup>352</sup> 見蕭繼宗主編，《新生活運動史料》(1975：395)。

<sup>353</sup> 見蕭繼宗主編，《新生活運動史料》(1975：345)。

<sup>354</sup> 1941年2月19日，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七週年紀念訓詞〉，見蕭繼宗編，《新生活運動史料》(1975：82)。

<sup>355</sup> 參見Andrew D.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2004)。

而身體改造，也從身體鍛鍊到飲食養生、環境清潔衛生、疫疾防治的重視，強化身體健康，維持良好公共衛生，成為民國時期國族努力的主軸。健康和衛生也進入西方醫學意義下的現代性進程，也構成了不同於已往身體、生命的對待方式。私人領域裡的身體、生命進入公共領域，成為社會關注討論的課題，也進入國家領域，成為國家照管治理的對象。身體、生命出借給國家民族，不再能任意糟蹋，要保衛自己健康，才能保衛國家，健康是自身責任，更是救國救種的出路。

### 三、保衛健康，保衛國家：健康的救亡與啓蒙

對於健康的重視和強調與西方醫療傳教士不遺餘力的宣導、教育和施治關係密切。當時的教會小學即要求，「使學生得有健全與發育完備之身體，傳其身常健適，並有清潔、合理、活潑、敏慧，與端正之生活」。<sup>356</sup>1890年出版的翻譯書《幼學操身》則是已知最早的學校體育教材，早於嚴復、梁啟超等人之相關立論，或許受傳教士編譯西醫和衛生書籍影響。1896年梁啟超推舉這本書，藉以說明中國文弱又不尚體操，比不上西方舉國皆可為兵的強健壯大，「有志繕生之學者，不可不留意。西人學堂，皆立體操，定課每日一兩小時為之，此西人所以多強壯，而舉國皆可為兵也。中國讀書種子夕率文弱柔脆，皆不講體操所致也」。<sup>357</sup>事實上，對健康、衛生和醫學的關注，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就出現大量的相關譯著，在合信(Hobson)、嘉約翰(Glasgow)、德貞、傅蘭雅(Fryer)等醫療傳教士的譯介下，其對中國醫療現代化和衛生健康知識的提昇和普及貢獻甚深。到了20世紀初期翻譯及自編的衛生及體操教科書更是大量出現，建構出一套中國過去未有的健康衛生論述。<sup>358</sup>

在醫學維新倡議下，1902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規定蒙學堂宗旨，「在培養兒童使有淺近之知識，並調護其身體」，小學堂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識及一切有益身體之事」；1904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初等小學堂，「以啓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並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為宗旨」，高等小學堂，「以培養國民之善性，擴充國民之知識，強壯國民之氣體為宗

---

<sup>356</sup> 轉引自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2)。

<sup>357</sup> 見梁啟超，〈讀西學書法〉。

<sup>358</sup> 較早翻譯醫學書籍為英人合信(Hobson)，於1850年出版《全體新論》，其它還包括《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博物新編》、《婦嬰新說》等書，合稱「合信五書」；1859~1899嘉約翰(Glasgow)編譯了《西醫略說》、《割症全書》、《衛生要旨》等二十餘種醫書；上海江南製造局則在1881~1896年間出版傅蘭雅(Fryer)和趙元益合譯的《化學衛生論》(1881年出版，是最早用衛生之名的書)、《居宅衛生論》、《孩童衛生編》、《幼童衛生編》、《初學衛生編》、《延年益壽論》、《治心免病法》等書；德貞編譯了《全體通考》、《西醫學隅》等書；丁福保赴日考察醫學，帶回數百本日本新醫學書籍，據此編譯《丁氏醫學叢書》，其中衛生學方面的書籍有28種，醫學書68種。粗估從19世紀5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大約有100餘種外國醫學譯著在中國流傳。見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2006: 61~62)。

旨」。<sup>359</sup>正式將體育列為體制內教育課程，相當程度看到政府對體育強國，以及培養愛國心的用心。而學堂宗旨也反映出身體已成為國家培育訓練的對象，宣告了身體納入國家體制，從帝制延伸到共和，進入身體國家化的階段。這時期的教科書，如1902翻譯的《國民體育學》；1906翻譯《中學生理衛生教科書》；1907《最新女子修身教科書（女子初等小學堂用）》等，在尚武救國和健康救國的意識型態下，進行國家身體的啓蒙和調訓。女子身體也不例外，成為國家必須訓練的對象。<sup>360</sup>特別是女子身體更是孕育國家下一代的母體。

這些健康衛生教科書和醫療書籍，呈現微生物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現代科學專業知識，除了展現一套不同於中國傳統維護生命、保持健康的衛生知識和身體視野外，更重要的是因應當時頹危的國勢，體現強國保種的救亡精神，試圖透過個別身體健康重振國家民族健康。因此出現這樣的論調，「不論男女，要講究衛生的功夫，衛生乃是強種之本」。<sup>361</sup>為了落實強國強種作法，在各級學校都設有體育、體操課程，編寫相關教科書，一方面強化身體鍛鍊，一方面也提昇文明素養，試圖培訓尚武的身體和文明的身體。例如，張之洞編撰的《張相國唱歌教科書》，一方面強調體育強民的重要，「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強壯」，另一方面也指出，「體操學，關衰旺，人人勝兵其國昌」，因此習體操，「以兵式體操為主」。<sup>362</sup>在一本《高等小學衛生教科書》，則直指人民有保種責任，青年學生都要學習這些知識，「凡有保種之責，而知亡國之憂者，蓋令青年子弟日肄習之」。<sup>363</sup>

1909年丁福保，更直接點出從個人衛生到公共衛生都攸關強種保國，「吾謂衛生學之關係強種保國，超出於各科學之上……小之則為個人之衛生，大之則為公眾之衛生」。<sup>364</sup>鴉片吸食的危害這時也列入健康教科書，成為警告的課題，1904年《最新理科教科書（高等小學堂）第一冊》，〈戒吸鴉片〉一課，即指出，「人之所以立身者，有三寶焉，曰時、曰力、曰財。若吸鴉片，則費時消力耗財。三寶失而身莫由立，人人如是，則國亦不國矣。鴉片含有毒質，服之成癮，使人身體羸弱，精神困頓，晝寐夜興……」。而更早傅蘭雅編的《化學衛生論》，既已介

---

<sup>359</sup> 見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4)。

<sup>360</sup> 見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2)。

<sup>361</sup> 見頤瑣，〈黃綉球〉，轉引自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3)。

<sup>362</sup> 見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2)。

<sup>363</sup> 《中外日報》，1903年7月19日，轉引自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3)。

<sup>364</sup> 丁福保，《實驗衛生學講本：序》，轉引自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4)。

紹如鴉片等成癮毒品及其毒性作用。此外，衛生不但打造健康身體、建立良好清潔環境，家國興衰之所繫，更成爲區分文明、野蠻標準。如，「衛生者，人間萬機之要素，一國之休戚，一家之盛衰所由繫也。觀衛生之程度，則興替之兆，文野之判，奚待筮卜哉」。<sup>365</sup>

清末民初這些衛生、健康教科書和醫療書籍，也扮演啓蒙和救亡的角色，一方面是醫療現代化的啓蒙，同時體認健康之必要；另一方面健康成爲國族救亡的手段之一。從種族衛生學在中國發展的概況可知，種族民族主義進入二十世紀，保種、強種仍是新時代的國家威脅和愛國主義的改革基調。<sup>366</sup>也因此如上所述，健康成爲強國強種的基礎和救亡的憑藉。而隨著國家的步入現代化進程，西方醫學、優生學、公共衛生等科學知識必然成爲介入人種改良，身體康健，國家再造，民族生存的有力工具。1903年一篇文章提到醫學應被看做是中國種族復興的工具，<sup>367</sup>1905年另一篇文章亦提到，醫學是唯一能夠在種族戰爭時代裡改善人口之生物質量的科學。<sup>368</sup>這些觀點充分說明新式醫學在中國救亡運動的重要性，同時也促動中國醫學的現代化。中國醫學的西醫化和現代化，基本上跟救國救種運動相互結合，西醫在中國救亡過程深植其力量，中國則得到強國強種工具。

醫學救國論如，1897年劉楨麟在《知新報》發表〈富強始於衛生論〉，即指出強體是強民、治國基礎，而強體的方法就要靠西醫之道，「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講於道矣」。<sup>369</sup>當嚴復鼓吹民力、民智、民德以求富強之道時，已有人具體而直接的將富強之道放在健康衛生上，這是最能實踐強國強種的方法，不再只流於思想論述層次。西醫也得到維新派人士的支持，醫學維新成爲國家富強的要件。1897年的梁啓超也已視醫學之改良爲社會改良起點，醫學既是保民身軀，也是保種保國之道。他說，「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身軀」。因此，「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強身必須強醫」。<sup>370</sup>西醫力量成爲改革力量之一，既醫病夫之軀，也醫病夫之國。這種強醫以強身、強國的醫學救國論，遂成爲憂懼亡國滅種之士的倡議重點，

---

<sup>365</sup> 〈中國國民衛生會序文〉，《南方報》，1907年6月7日，轉引自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卷，4期（2011: 3）。

<sup>366</sup> 例如，一直到1952年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政治話語出現，「做好衛生工作是強國強種的重要措施」（見高鑑如，〈怎樣做好愛國衛生的宣傳工作〉，《新中醫藥》，3卷，8期，轉引自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2006: 305））。

<sup>367</sup> 〈興醫學通〉，《湖北學生界》，1903年，2月。參見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1999: 102）。

<sup>368</sup> 海蟻，〈醫學與社會之關係〉，《東方雜誌》，2卷4號，1905年，4月。參見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1999: 153）。\*

<sup>369</sup> 見劉楨麟，〈富強始於衛生論〉，《知新報》第39冊，1897年11月15日。

<sup>370</sup> 梁啓超，〈醫學善會序〉，張品興編，《梁啓超全集》（1997: 141）。

改革派人士如薛福成、鄭觀應、康廣仁等也都極力推動西醫。<sup>371</sup>這股風潮引起了社會研究西醫的興趣，許多地方出現「醫學研究會」、「函授新醫講習班」、「自新醫學堂」等組織。1898年8月光緒帝接受維新派主張，創立京師大學堂，並下諭，「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梁啟超認為增設醫學堂，「實為維新之一政也」。1902年8月，清廷頒布〈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其中規定大學分科仿照日本共七科，醫科是第七科。<sup>372</sup>帝國垂暮之年，醫學取得國家認可，幾年之後的1905年清政府正式在巡警部警保司下設衛生科，這是公共衛生首次的建制化，醫學衛生成為下一個世紀，新國家改造國族的重要機制和技術。如同倡導醫學革命的范守瀾所說，「要求國家的生存，要謀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軍備上求自衛，還要謀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種文物的建設，科學新醫便是這種科學文物的建設中之最要者」。<sup>373</sup>科學新醫成為挽救國家民族最主要的建設。西醫在中國被接受，以至取得合法地位，除了它顯著的醫人療效外，更重要的是它也是醫國的工具，西醫是在救亡的意識型態下合理的被知識份子和國家所接受。

而在西醫介入下，與宇宙論關聯的傳統中醫學，逐漸被置入現代化和科學領域之外，西醫取得合法地位，也普遍為國人所接受，特別是在預防疫疾傳染的作為上，西醫展現令人信服的科學力量和效能。例如，1910~1911年東北爆發大鼠疫，清廷派伍連德醫生主導鼠疫撲滅，在其它西醫團體的協助下成功控制疫情，並於1911年4月在中國召開國際鼠疫大會，11國衛生醫療專家與會，伍連德主持了這場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國際衛生會議。<sup>374</sup>他在會中發表演講表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其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通過這次會議，你們將不僅對國家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未來科學醫學的進步，起到推動作用」。<sup>375</sup>確實，這一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被許多學者視為是中國全面接受西方醫學的里程碑，也是中國醫學現代化的開始。<sup>376</sup>事件之後，政府和民眾對西醫的信任和重

---

<sup>371</sup> 薛福成 1890 年出使西歐時即留心西醫發展，同時考察歐洲醫院狀況，並派隨員趙靜涵赴德國學習治療癆症之法；鄭觀應則在其《盛世危言》中撰〈醫道〉篇，比較中西醫優劣，並建議清廷學習西醫之法，鄭觀應另於 1890 年撰《中外衛生要旨》一書；康廣仁曾隨嘉約翰習醫三年，後在澳門辦《知新報》，開闢專欄介紹西醫知識，並宣揚醫學維新。見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2010: 202)；郝先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2005 年，5 期(2005b: 75)。

<sup>372</sup> 參見郝先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2005 年，5 期(2005b: 75~76)。事實上，早於 1888 年李鴻章就在天津創辦北洋醫學堂，成為中國第一所官辦西醫學校，見李傳斌，〈李鴻章與近代西醫〉，《安徽史學》，2001 年，3 期(2001: 22)。

<sup>373</sup> 黃子方，《中國衛生當議·弁言》(1927: 1~4)，轉引自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2006: 96)。

<sup>374</sup> 這場會議完整紀錄見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1911)》(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2010) (初版 1911)。

<sup>375</sup> 轉引自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2006: 83~84)。

<sup>376</sup> 參見何小蓮，〈傳教士與中國近代公共衛生〉，《大連大學學報》，27 卷，5 期(2006: 30)；高晰，《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2009: 35)；郝先中，〈西醫東漸與中國近代

視普遍增加，「中國政府，素來重中輕西。自斯疫之發生及撲滅，中醫束手，西醫奏功，使政府諸公深感西醫遠過中醫」。<sup>377</sup>1937年醫學史家陳邦賢也指出西醫的科學療效取代了中醫，受到西方和日本醫學引進影響，傳統中國醫學的「哲學醫學」已為西醫的「科學醫學」所取代，西醫改變國人思想，迅速的蓬勃發展。<sup>378</sup>西醫做為一種科學醫學取代傳統中醫，促成中國醫療現代化的意義在於，健康在現代科學知識保障下，成為救亡不可迴避的要件。

#### 四、不潔恥辱：日常生活的衛生政治

曾任北平衛生局局長黃子方，清楚的指出健康、衛生和醫療之於國家關係，「殘廢衰弱，社會之病也，國家應如何鼓勵個人衛生，使人民之健康增進；疾病傷痛，貧國之道也，國家應如何謀防病之方及治療之術，使人民之厄苦減輕。孩童為他日之新國民，其衛生習慣應如何養成，其體格畸缺者應如何設法矯正；孕婦為國民之母，在懷孕期內及生產時間，應如何設法保護……此皆公共衛生之責」。<sup>379</sup>顯然國家必須承擔公共衛生建制的責任，負起人民健康、婦嬰健康的照顧和疫疾防治、疾病治療的任務。公共衛生成為國家對身體、生命、人口最直接的干預，但這也是現代性的中國救亡工程。因為公共衛生跟強國強種，跟民族富強相關。

這一觀念我們可以從1929年5月武漢特別市長在該市第二次衛生運動大會的致詞內容看出。致詞提到衛生運動就是救死運動，也是救種運動和救國運動，不講衛生恐遭滅種之禍，「講求衛生，就可以減少死亡，所以衛生運動，可說是救死運動」，歐美人口在增加，我國人口未見增加，不講衛生恐怕有「滅種的慘痛」。所以「衛生運動，又可說是救種運動」。再者，「衛生運動，又可說是救國運動」。<sup>380</sup>1931年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公共衛生可以減少人民死亡和患病率，有助提高國家生產力，「公共衛生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強種強國的問題」，因為公共衛生能「減少人民的死亡與患病率」，「減少人民的疾苦」，「增進國家生產力」，「中國目下最大的問題在於窮，愈窮愈需要衛生建設」。<sup>381</sup>1934年一篇論及

---

醫療衛生事業的肇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卷，1期(2005a: 32)。

<sup>377</sup> 〈撲滅中國北方之瘟疫〉，《東方雜誌》，8卷，8期(1911)，轉引自何小蓮，〈傳教士與中國近代公共衛生〉，《大連大學學報》，27卷，5期(2006: 30)。

<sup>378</sup> 陳邦賢說，「中國數千年來的哲學醫學一變為科學的醫學，在最近三十年中，新醫學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勢，推原其故，中國自從西洋及日本醫學輸入以後，國人之思想為之一變」。見其《中國醫學史》(1992: 257)。

<sup>379</sup> 黃子芳，《中國衛生當議·弁言》，轉引自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間政治，1832~1985》(2006: 97)。

<sup>380</sup> 〈衛生局業務報告〉，《武漢特別市市政月刊》，2卷，2期(1929)，轉引自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2008: 292)。

<sup>381</sup> 李延安，〈什麼是公共衛生〉，《中國衛生雜誌》，1931年，30期，轉引自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2008: 262~263)。



〈公共衛生與民族復興〉文章則指出，「公共衛生的進步和發達，一定是民族復興的徵象，而欲民族復興，公共衛生之不可忽視，可想而知」。<sup>382</sup>這些說法說明了中國民族復興，富國強種的救亡工程，已轉向公共衛生的落實，試圖透過公共衛生的推廣、體制建立保護個人和民族健康。

上述這種對公共衛生的重視和強調，可以看出再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這時的中國，在鴉片煙毒侵蝕下如此關注集體生命，如此關注健康和衛生對國家民族的影響，乃至成爲全國性關注的議題。西方衛生的概念，最早在傅蘭雅(John Fryer)翻譯的一系列書中即已提出。其中一本衛生書《幼童衛生編》(1895)，還討論到衛生與鴉片的關係。他指出鴉片與酒精是東西方文明的兩大危機，西方有80%~90%的健康與社會問題來自酒精，中國則有80%~90%的民族悲哀源自鴉片。<sup>383</sup>傅蘭雅透過反對酒精指出危害中國人健康最大的就是鴉片。<sup>384</sup>我們可以看到鴉片在此時已進入衛生討論的領域，成爲現代醫療的問題。而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意識形態下，與衛生相關的物品如肥皂、藥物等也越來越商品化、消費化和日常生活化，仿佛消費這些衛生用品，個人和國家就提昇到文明的層次。當時一些滋養藥物都在「強種必先衛生，衛生必先卻病」或「強種第一良方」等這類藥品廣告修辭下成爲市場商品，顯示衛生強種已成爲一種社會意識型態，在這種意識型態下衛生商品有其市場，也說明大眾消費行動具民族化傾向。

爲了配合禁煙政策市場也打出「蓋言強種者，必以戒煙爲先圖」、「有此兩種藥出，而我中國之黃種向受煙害日漸衰弱者，而今而後可頓脫煙害，日臻強盛矣」的廣告推銷各式戒煙藥。這種禁煙行動的商品化和廣告化，正好說明反鴉片消費已成爲社會普遍意識。至於補養身體的藥品名稱如「種族養生液」、「強種之寶自強丸」、「強種育子藥」。<sup>385</sup>與上述廣告修辭一樣，在在反映對國家衰敗，種族孱弱的自卑情節與急欲自救的焦慮，進而建構出強種衛生論述。這些愛國主義式的

---

<sup>382</sup> 張維，〈公共衛生與民族復興〉，《中華醫學雜誌》，1934年，7期，轉引自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爲中心》(2008: 262)。

<sup>383</sup> 見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2007: 130)。

<sup>384</sup> 傅蘭雅視鴉片癮爲十九世紀晚期中國所面臨最惡劣的健康問題，他在翻譯蘇格蘭農業化學真司騰(James Finlay Weir Johnston)的《化學衛生論》(1880)一書時，暗駁了真司騰的看法。真司騰運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麻醉性藥品酒精和鴉片，得出結論是：中國人已發展出適應鴉片使用的體質和文化，所以可以避免掉更爲敏感的歐洲使用者所受的痛苦，對中國人而言鴉片的效應並不比英國人飲用麥酒所產生的危害大，因此他宣稱中國人的體質適合鴉片，就如英國人體質特別適應麥酒一樣。傅蘭雅和他的翻譯伙伴直接駁斥真司騰這一鴉片對中國人無傷的結論，他們寫道「無疑鴉片對用之有害，用與不用之人，無人不知此理。昔之有無知之西人，頻發無據之鴉片論」。翻譯者反對的是西方人試圖利用與酒精相較，把鴉片的危害最小化，以酒精造成的公共暴力、家庭暴力和罪惡較鴉片多，所以酒精比鴉片危害更大的理由來合理化鴉片販賣的正當性(見羅芙芸，2007: 123~125)。確實，酒精之害大於鴉片是西方支持鴉片貿易論者常見的合理化論調，比如有此一說，鴉片鬼不像醉鬼那樣吵鬧，也不會回家踢老婆。但有反對者駁斥，鴉片鬼是不會踢他老婆，但會把他老婆給賣了。見 Kathleen L.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1996: 54)。

<sup>385</sup> 上述引文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276~281)。

廣告似乎也說明衛生已構成一種日常生活政治，在日常生活的物品消費、市場行銷中普遍化強種意識形態，並強化民族主義愛國情緒。這也正好印證之前所討論的民族主義消費類型，在此則是衛生消費化，消費民族化，衛生構成民族復興和救亡運動的一環。

再者，衛生消費化，消費民族化現象，除了展現在衛生用（藥）品外，也反映在二十世紀初衛生書籍的大量消費化和廣告化，成爲一項市場商品。<sup>386</sup>特別是這些衛生書籍透過建構其與身體、國家、種族的關係，販賣衛生健康，並以強種強國論述做爲廣告訴求，藉以消費身體、國家和種族意識，促銷書籍。這一現象就如張仲民所說的，「這些書籍大都將自己的出現同種族、國家聯繫起來，宣稱自己的終極關懷在於改良傳種、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的身體素質，使中國人文弱的身體得到強壯，以在與西方人、日本人的競爭中勝出」。<sup>387</sup>再者，衛生書籍和衛生商品廣告，在這裡也扮演衛生啓蒙者的角色，讓民眾認識衛生和健康的意義、實踐方式以及跟國族存亡關係。亦即，將健康、衛生、救亡構連起來，讓中國步入衛生救亡的現代性歷程。由此亦可見衛生強種論述如何普遍化爲時人的日常生活意識和行動基調。

這些論調如 1904 年《東方雜誌》轉載《漢口日報》一篇文章，「廣布衛生書籍以強種」，認爲這些書籍「於強種保國之道，庶不無微補」。<sup>388</sup>說明了衛生書籍如何成爲強種保國之道的啓蒙工具，例如宣揚「富強始於衛生論」、<sup>389</sup>「強國必先強種，則國民衛生尤爲教育之原」、<sup>390</sup>「一個人不論男女，要講究衛生的功夫，衛生乃是強種之本」。<sup>391</sup>透過廣告、商品、書刊的宣導讓衛生成爲國家富強、種族強盛的意識型態。再者衛生不僅關係到個人身體健康和強種，還影響到個人與國家的文明形象，「衛生之事，爲人類之至要。今文明各國，衛生之事日益發達」。<sup>392</sup>更進一步說，衛生乃與文明、進步劃上等號，衛生彷彿一把現代性的標尺，量度中國是否夠格跨進西方界定下的衛生現代性門檻，如同禁煙以躋文明之列一樣。這正是羅芙芸（Ruth Rogaski）所指出的，「到了二十世紀，衛生成了體現中國積弱的一種話語：一把打量中國人同外國人定義下的現代性之間差距的標

---

<sup>386</sup> 這項研究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sup>387</sup>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86）。

<sup>388</sup> 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78）。

<sup>389</sup> 見劉楨麟，〈富強始於衛生論〉，《知新報》第 39 冊，1897 年 11 月 15 日，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80）。

<sup>390</sup> 見〈衛生論〉，《東方雜誌》第 2 年 8 期，1905 年 9 月 23 日，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87）。

<sup>391</sup> 見頤瑣，《黃繡球》，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94）。

<sup>392</sup> 見觀云，〈養心用心論續〉，《新民叢報》第 70 號，1905 年 12 月 11 日，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94）。

尺」。<sup>393</sup>

衛生跟國勢強弱，國家興衰的關係，也充分表現在當時一篇報導中，「觀其人穢淨之程度，即可得其興亡盛衰之概。白種人極潔淨，其國力亦最盛，黃黑紅之人均不潔淨，其國力均最衰」。<sup>394</sup>潔淨等同國勢強弱，也構連了人種與國勢的關係，這種人種—潔淨—國勢三角關係的說法，充分反映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眼中的世界強權圖譜，以及在這圖譜中自我認知的地位，是以潔淨構成了中國進入文明強國之列的自我衡量指標。這種由西方衛生現代性建構下的弱國不潔論述，<sup>395</sup>成爲當時中國人的自我意像，並以Dirlik所謂的「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方式表述。<sup>396</sup>可見潔淨至關國勢，即便「迷信與不潔」，「同爲亡國滅種之大端，而就其二者之中，較其輕重，則似乎迷信尚可，而不潔必不可」。<sup>397</sup>迷信雖然誤人誤國，卻還不至像不潔那樣的令人身喪國亡。蘇儀貞也提出只有高素質，受過教育的「健康公民」才是國家強盛所在。<sup>398</sup>健康公民一方面隱指過去的病態、不正常，一方面則指向未來國家健康化的富強進程。由上可知衛生成爲國家種族的根本，還攸關國家文明形象，不衛生，不乾淨仿佛烙印著退化、落後、失序的負面印記，個人健康的目的最終在民族健康。如何推廣衛生教育，打造健康公民成爲要務，健康成爲公民的條件之一。正如禁煙成爲共和公民權之要件，沉溺鴉片者不可爲共和之民一樣，新國家的公民就是不染鴉片惡習具衛生習慣的健康國民。因爲健康正是民族重建的基石。<sup>399</sup>從個人改造—成爲新民到民族改造—成爲新國，都以衛生爲改造的場域。

---

<sup>393</sup> 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7: 5)。

<sup>394</sup> 見〈論中國人之不潔〉,《中外日報》,1904年10月31日。

<sup>395</sup> 李尚仁一篇研究指出,十九世紀西方在華的醫生和傳教士大都從歐洲中心的公共衛生理論觀點出發,以優越感和輕蔑的眼光看待中國環境衛生和習俗,認爲中國人衛生習慣不良,衛生措施嚴重不足,政府亦未負起維護公共衛生責任和制定相關法規。其對中國個人到公共衛生以及居住環境和風俗習尚的「污穢」敘事如,馬路是「各種穢物的容器」;「北京街道就是公廁,每天都堆積大量動物的糞便」;「中國居民是骯髒的種族。他們一生從搖籃到墳墓實際上都沒洗過身體」;房子住太多人導致過度擁擠且通風不良,房子是「疾病的共同因素」;將家裡垃圾和死掉動物棄置街頭聽任「腐敗之氣污染空氣」;對於遺體放置家中過久的處理方式,「死者無法得到莊重埋葬……任由自然腐爛的過程緩慢近行,而滋生更多的疾病和死亡」。見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三份(2005: 467~509);另可參見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爲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期(2007: 1~33)。

<sup>396</sup>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35, No.4(1996: 114).

<sup>397</sup> 〈論中國人之不潔〉,《中外日報》,1904年10月31日,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 95)。

<sup>398</sup> 蘇儀貞,《婦女生育論》(1922: 62),轉引自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北京的生育婚姻和喪葬:十九世紀至當代的民間文化和上層文化》(2001: 94)。

<sup>399</sup> 見 Yip Ka-Che(葉嘉熾),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1903年，西方「民族福祉在於其人民健康」的說法，<sup>400</sup>正好點出了人民健康與民族健康的新關係。事實上，民族健康受到關注是十八世紀法國、英國、普魯士發展公共衛生以來的的新轉變。一些有識之官員、知識份子、革命家開始認為真正的健康就是民族的健康，政府必須透過衛生監督、發展國家醫療機構來防止民族有機體的疾病。<sup>401</sup>而在中國，「衛生」一詞自古即有，普遍的使用於描述各式各樣的強身健體，抵禦疾病，延年益壽的飲食和運動行爲。<sup>402</sup>基本上屬於自我養生保健的個人衛生層次，無涉國家醫療權力的干預。但現代的用法主要採用日本醫生長與專齋 1875年「衛生」(hygiene)這詞的翻譯。<sup>403</sup>長與專齋的「衛生」一詞雖來自中國，但其指涉意含仍有些許差異。在此指的是一種衛生國家化的體現，國家力量透過疾病、健康、疫情的預防、控制、治療貫穿身體與生命，形成一種生命權力(bio-power)。長與專齋考察歐美衛生的作法認為，「衛生並不簡單的意味著個人自己的健康……它們指的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管理體系，負責保護國家全體公民的健康」。亦即，衛生就是把中央政府、科學家、醫生、警察、軍隊和人民聯結成一個整體，共同努力保護民族身體。政府需對其人民的健康提供廣泛的供給和監控。因此，政府有必要成立一個行政部門，其功能在於排除生命危險、人類生存威脅以及保障民族福利。在長與專齋的觀念中，「保衛生命」成爲一種貼切的說法，衛生機構有義務保衛公民和國家的生命。衛生不再只是個人的安康，而更是爲了社會整體健康必需規訓身體。<sup>404</sup>

很清楚的這裡的衛生或羅芙芸所謂的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基本上已進入傅科生命政治的討論範圍，羅芙芸進一步說明，長與專齋用衛生這詞的

---

<sup>400</sup>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爲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期(2007: 33)。

<sup>401</sup> 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7: 6~7)。

<sup>402</sup> 丁福保在 1902 年出版的《衛生學答問》一書中即提出，「講求保養身體之法稱衛生學」。中國的衛生概念大都跟個人的養生保健有關，基本上類屬個人衛生，與長與專齋的衛生或公共衛生概念有段落差。關於中國式衛生的討論可見雷祥麟，〈衛生爲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五十四期(2004: 17~59)。

<sup>403</sup> 長與專齋 1872 年奉派前往美國歐洲，他看到國家對衛生的關注已成爲統治的基本要旨，國家致力建立一個將工業化、教育、警力和實驗室與個人健康相聯的網絡，形成國家的健康。因此他亟思找一適當的字眼來表達這些內涵。最後在 1875 年他從《莊子·庚桑楚篇》找到「衛生」一詞，認爲能貼切表達其意含，雖然原文的意思與西方概念有差別，但其中的字眼看起來高雅而意蘊無窮，能用來表達政府管理的衛生保護之義。至於爲什麼衛生這字眼能表達政府的衛生管理？William Johnston 則做出解釋，他認爲「衛」這個字有「管轄和巡視一個地區」之意，與長與專齋所欣賞德國的醫學警察(負責監控瘟疫、執行防疫和公共及家庭衛生條例的實施)有其關聯性，同時也可據以設想出一個管轄生命的機關；另一個則是保衛、保護之意，長與專齋希望能用他設想中的衛生機構來保衛新政權和國家。見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7: 145; 155)；另一篇相關討論見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台灣史研究》，第八卷，一期(2001: 41~88)。

<sup>404</sup> 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7: 145~163)。

翻譯顯示明治時代的醫學精英已意識到醫療、監督和管制的技術已成為歐洲現代性藍圖的關鍵所在。在某種意義上已包含了傅柯所謂的生命權力，即一系列由國家管理生命的技術和政府極權所構成，個人必須內化於政權的規訓，使個人行為與國家目標一致。<sup>405</sup>

確實，傅柯指出，<sup>406</sup>為了控制流行病，死亡人口，發病率等問題，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即建立起一種新的醫學，就是公共衛生，其責任在預防和控制這些現象，其功能包括協調醫療、集中資訊、規範知識的機構，還有開展全民衛生學習和普及醫療事業。這些活動都需要國家動用資源介入，以預防管制疾病的散播或降低意外事故的風險。因此國家面對種族威脅、環境威脅、疾病威脅必需保護全體公民的健康和民族的健康，使其免於生命和生存的威脅，在保衛生命的信條下，透過知識和技術力量對個別生命和社會集體生存進行保護、管轄、監控的作為。亦即，全程介入身體到生命，以進行生物性調節。這構成了傅柯所謂的「使人活，讓人死」的調節權力，亦即調節集體生命或人口群體的生命權力。也由於國家目前責任在於「使人活」，透過調節生命的技術，國家也越來越有權力干預生活方式。<sup>407</sup>基本上，傅柯把政府的健康政策同掌管整體居的社會控制的管治(police)系統聯繫起來，並將之視為現代國家理性統治和管理個人最重要的政治技術。再者，法國及整個歐洲國家在十八世紀出現的「疾病政治」(noso-politics)，說明了當時的政府不僅把社會群體和居民的健康和疾病，當成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來看，而且確保國家能夠發揮它對醫學系統的控制。在這意義上，疾病政治並非只關係到醫學技術和救助問題，而是超越醫學，構成政治統治問題。在新建構的醫療系統中，整個社會群體和個人，都無例外的被納入社會控制領域中。<sup>408</sup>我們從以下民國初年到二、三十年代時期攸關生命安全，人口品質的醫療、健康和公共衛生的一些政策和作為來看不難發現這些現象。<sup>409</sup>

公共衛生做為一種社會化、國家化體制的概念，1931年已有學者提出公共衛生建設就是實現醫學社會化的概念。鐘惠瀾在1931年為文指出，「公共衛生關係生死存亡，非限於一人一家」，它應是「社會化之醫學」。<sup>410</sup>黃子芳也在1936年提到，公共衛生就是「保衛公眾生命」，其目標在實現「醫學國家化」，使「國

---

<sup>405</sup> 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7: 18)。

<sup>406</sup> 傅柯(福柯)(Michel Foucault),《必須保衛社會》(1999: 230)。

<sup>407</sup> 傅柯(福柯)(Michel Foucault),《必須保衛社會》(1999: 233)。

<sup>408</sup>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2000: 93~95)。

<sup>409</sup> 相關研究可見朱建平,曹麗娟,〈清末政府應對疾病的新舉措〉(2009);福士由紀,〈戰時上海的霍亂預防運動〉(2009);胡勇,〈民國時期醫生之甄訓與評核〉(2009);杜麗紅,〈清末北京衛生行政的創立〉(2009);朱慧穎,〈民國時期的衛生運動初探:以天津為例〉(2009)。以上收錄於余新忠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2009)。

<sup>410</sup> 鐘惠瀾,〈論中國急宜發展公共衛生〉,《中國衛生雜誌》,1931年,22期,轉引自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2008: 265)。

內之防疫員，醫生及看護士咸歸政府管理」。<sup>411</sup>這種醫學社會化、醫學國家化的作法，<sup>412</sup>可以從公醫制度的設立得到說明。公醫制度的推動基本上是國家建立公共衛生體制，保護人民身體健康的作為。但也正是這種制度，讓國家得以透過醫療體制進行個人身體、人口生命的調控。楊念群的研究指出，民國初年有鑒於醫療活動關涉整個民族身體健康，對其監控的嚴密程度亦不亞於警察對人民生命財產的保護，因此有「公醫制度」的推動，亦即把醫事制度納入國家秩序控制之內，由政府擘劃全國衛生事業。一國人民的生命安全，由政府全盤負責。「公醫制度」的推動正說明了醫療國家化的到來，而「醫學國家化是現代公共衛生學理上最完善之衛生行政」。<sup>413</sup>

日本學者飯島涉也指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引進「國家醫療」、「國家衛生」制度的時期，其目的是通過醫療衛生做為介入民間社會的途徑。走的是強國路線，而這種衛生行政的開展也反映了二十世紀初以來民族主義的高漲。<sup>414</sup>公共衛生徹底表現於醫療國家化上，也說明了生命政治力量的形成。國家透過醫療、健康、衛生領域承擔國民的生命責任，使得生命國家化，同時也讓國家獲得另一種控制權，亦即在讓生命延續不受傷害的過程裡，構成了另一種國家力量滲透遍在的生命權力和治理方式，「把疾病傷痛之不治，個人衛生之不倡和貧國之道相聯繫，就在制度上體現了對生老病死生命進程的全面而嚴密的治理技術」。<sup>415</sup>

這種治理技術或權力技術表現在流行病的控制和防治上更是顯著，「國家對生命控制的範圍和領地已逐步從公共空間滲透進家庭私人空間。特別是防疫場合下分區式的強迫接種與隔離，幾乎使私人空間蕩然無存。個人的身體這時必需接受國家在民族生存復興話語下的支配和干預」。<sup>416</sup>防疫或傳染病的控制的确是國家對身體、生命最直接而有效的干預，羅芙芸在研究天津的衛生發展時即指出，1902年霍亂流行時政府採取的措施成為國家權力干預人民生活的契機。<sup>417</sup>

確實，當衛生成為民族復興和現代化國家建造的意識型態一環，衛生成為改革的主流話語，清潔，乾淨乃成為國家主導的全民運動，特別是1927年國民黨

---

<sup>411</sup> 黃子芳，〈中國衛生當議〉，《公共衛生月刊》，1卷，12期(1936)，轉引自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2008: 265)。

<sup>412</sup> 關於公眾醫療、國家醫療討論可參見 Kerrie L. MacPherson 對上海公共衛生的研究，*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2002: 123~142, 213~258)。

<sup>413</sup>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2006: 97~98)。

<sup>414</sup> 飯島涉，〈傳染病與辛亥革命〉，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2002: 1488)。

<sup>415</sup>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2006: 97)。

<sup>416</sup>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2006: 104)。

<sup>417</sup> 引自飯島涉，〈傳染病與辛亥革命〉，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2002: 1483)。

掌權後，振興國家成了政府首要任務，公共衛生和大規模的清潔運動被看做與國家興亡密切相關。<sup>418</sup>個別身體更是國家/衛生/醫療不斷干預的對象，1934年的新生活運動到了巔峰。這個運動一般都認為是蔣介石為維護其統治，樹立權威的方法。透過運動組織全民以培養對國家的共識，同時確立蔣介石在全民的領導地位，成為國家統一的象徵。也就是動員人民，認同國民黨政府統治，重新建立政權合法性基礎。<sup>419</sup>鞏固政權的做法卻是從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之事做起，透過「國民之生活革命」，<sup>420</sup>達到禮義廉恥之目的和生活軍事化之要求。其所推行的第一要事就是「清潔與規矩」運動，從個人家庭和公共場所之清潔做起，「以除去今日社會人人之污穢，減少疾病，養成國民健康身體與良善習俗」，所規定事項從注重個人衣服、食物整潔，勤洗身體、衣服，勤理頭髮、指甲，不隨地吐痰，到居家空間的打掃整理，以至公共場所、工廠環境衛生、街道市容維護，甚至管制個人娛樂，禁止煙賭、取締娼妓。並依據行業、場所、時機、性別、習性、風俗等類項制定各種不同規範，<sup>421</sup>詳列國民應遵循之行爲，將食衣住行一網打盡，清潔爲一切檢查之重點。政府派檢查隊挨戶檢查，並公佈市民清潔狀況，警察也參與衛生工作，具有「醫療警察」(medical police) (清末稱爲「衛生巡捕」) 角色 (特別是防疫時)，進行清潔檢查和取締。

爲了配合新生活運動同時還推動大規模的六年禁煙計劃(1935~1940)，<sup>422</sup>並在〈新生活運動綱要〉明訂摒絕鴉片。蔣介石在多次場合闡述新生活運動與禁煙的關係。1935年的一次演說提到，「我們要實行新生活，一定要首先禁絕鴉片」。<sup>423</sup>接著又在1936年禁煙總會第一次常會開幕的訓詞中提到衛生、鴉片與復興國

---

<sup>418</sup> 關於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後，設立衛生行政機構，推動公共衛生政策的具體作法可見 Yip Ka-Che(葉嘉熾),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 1928~1937*(1995); 以及三本以上海爲討論對象的著作，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2002). 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2007); 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代化》(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第八章(2004)。

<sup>419</sup> 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2006: 51)。關於新生活運動研究，另可見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期，(1998: 163~203); 魏斐德,〈給娛樂發執照——中國國民黨對上海的管制〉,收錄於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2001: 251~290)。

<sup>420</sup> 見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收錄於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一書附錄(2006)。

<sup>421</sup> 例如根據各種不同行業、場所制定23種勵行新生活辦法(旅棧公寓、茶館酒樓、娛樂場所、澡堂、理髮店、車站、菜市場、公廁、商店、街道牆壁、攤販等),其它一些規定如〈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市民守時辦法〉、〈行路須知〉、〈公民須知〉等。見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2006: 115~122)。

<sup>422</sup> 相關做法及成效見賴淑卿,《國民政府六年禁煙計畫及其成效——民國二十四年到民國二十九年》(1986)。

<sup>423</sup> 蔣介石,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對雲南省會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訓話,〈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2),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70)。

家的關係。他指出過去因為社會衛生環境不良，工作狀況惡劣，導致民眾容易感染疾病，患病後又常以鴉片為治療藥劑，使得鴉片禁制成效有限，如果禁煙無效，則一切建設亦不可能收效，因此禁絕鴉片為修明內政，復興國家的第一步。<sup>424</sup>1937年的禁煙紀念訓詞，強調吸食鴉片與新生活運動的要求全然相反，新生活運動的提倡就是要解救吸鴉片的人，「這禁煙禁毒，就是實行新生活的最要基礎。新生活所注重的是整齊、清潔、迅速、勤勞和黑籍中人底懶散、骯髒、恰是相反……務將這些黑籍中人從死坑裡拯救出來，才盡了力行新生活的責任」。<sup>425</sup>可見吸煙吸毒者通常都是衛生不潔者。伍連德在其〈毒品問題與公共衛生〉一文，即認為應視毒品問題為公共衛生的重點，因為吸毒者往往衛生習慣和環境極差，容易感染疾病，甚至影響下一代健康。他說，「凡嗜好毒品之人，恆不自覺其卑污……又染嗜好者之起居，恆多不潔淨，不衛生，因一人之墮落，其全家之生活亦因之而低落，所生子女亦必孱弱……每見貧民窟中，疾病浸淫，景象黑暗，大抵由染嗜好而墮落也……吾以為毒品問題，居公共衛生事業之中心，其重要不減於黃熱症與溫熱症」。<sup>426</sup>

而要養成痛惡吸煙風氣的方法之一，就是「增進公共衛生，改良醫藥設備，以及提倡正當娛樂，使人人可以鍛鍊身心，尋求正當消遣，則這種足以戕害生命的不良嗜好，就不容易沾染」。<sup>427</sup>這段話涉及公共衛生、身體衛生和心理衛生，改善這三種衛生環境和條件就可杜絕鴉片不良嗜好。新生活運動和六年禁煙計劃的結合無非就是要達到這一目標。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劉瑞恆，也進一步指出唯有禁煙和新生活運動，才能掃除不健康生活，挽救個人和民族健康，如此才是救亡圖存之道，「新生活運動，是我們救亡圖存，復興民族之基本運動，它的中心準則，是要把衣食住行，由整潔簡樸迅確，做到一切合於禮義廉恥，現在肅清煙毒運動，是要振作我們萎靡的精神，掃除不健康的生活，充足我們民族的能力，可以說就是新生活運動的一種」。<sup>428</sup>

上述言論基本上代表國家政策和意識型態。透過新生活運動矯正不良鴉片習慣，進而達到國族救亡目的。1935年起展開大規模的鴉片管治(policing opium)行動，透過登記註冊、發給許可證和鴉片公賣、官方壟斷的方式試圖在六年內消滅鴉片。這是一個透過反鴉片消費進行社會控制，合法化國家統治權力的階段，

---

<sup>424</sup> 《禁煙半月刊》創刊號，1936年6~7月，轉引自王金香，《中國禁毒史》(2005: 184)。

<sup>425</sup> 民國二十六年六三禁煙紀念訓詞，〈效法先賢厲行禁政〉，內政部禁煙委員會編，《蔣主席禁煙言論集》(1948: 14)，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182)。

<sup>426</sup> 伍連德，〈毒品問題與公共衛生〉，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拒毒運動叢刊》，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392~393)。

<sup>427</sup> 行政院行閱局編，《肅清煙毒》(不詳: 24)，收錄於張研、孫燕京編，《民國史料叢刊 718：社會、社會問題》(2009: 52)。

<sup>428</sup> 劉瑞恆〈肅清煙毒與新生活運動〉(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中央廣播無線電台演講)，收錄於梅公任編述，《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1935: 229)。



也是鴉片管治最顯著的時期。它還伴隨衛生管治和更深遠周遍的日常生活管治。鴉片入罪、勒戒這時期也達到高峰。1937 年全國有 1000 餘家戒煙醫院和戒煙所，400 多萬名吸食者登記在冊，煙癮勒戒如火如荼進行，禁毒成爲治安問題，透過現代化警察力量直接介入調驗搜查工作。1936 年軍事委員會批准一項計劃：由公安局領導毒品肅查工作，警察發起告發運動，大規模的宣傳、調查、緝捕行動同時進行（如利用海報、傳單、廣播、電影、報紙、演講隊和民眾教育館等媒介方式進行宣傳；並展開戶籍調查、煙館查訪、要求煙客登記、去信查問鴉片購買者；最後則挨家挨戶搜查，吸食者需提供登記證明。<sup>429</sup>禁煙不僅成爲習性改造的新生活運動，一種國家主義的愛國運動，更是穩固政權的社會控制工具，國家力量直接干預人民生活和監督市民娛樂活動，全面管制煙賭娼等社會罪惡，建立新的市民文化。攸關道德、社會的問題乃成爲政治控制的一部分。<sup>430</sup>

鴉片對身體、生命、國家、種族之禍害直接或間接的導致現代化中國對衛生健康的要求，如何清潔、洗淨、滌化煙毒、惡習、恥辱，既成爲一種國家象徵，更是一套救國救民的實際做爲。包安廉(Alan Baumler)貼切的說出這段時期禁煙的特色是「淨化人民，保衛國家」(purifying the people and defending the state)。<sup>431</sup>新生活運動基本上延續身體健康做爲民族國家寓言的理路，乃構作出一套「淨化人民，保衛國家」的日常生活衛生政治，既然清潔衛生成爲通往富國強種必經之路，從國家監視、檢查到自我約束、警醒；從身體、心理、娛樂、到習慣全然依照國家需求安排，即便擾民，也都成爲理所當然之事，因爲國家正在執行保護人民健康和民族健康的任務。

而如此龐大的改革工程，卻又落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飯」如此瑣碎之事中，「我們現在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中，就是要從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作起」。<sup>432</sup>身體政治，生命政治的治理之道莫不藏身於這種家常便飯的例常性中。新生活運動不管實際成效如何，卻示範了一種權力的操作方式，如何在食、衣、住、行日常生活實踐和習慣中體現國家意志，落實國家目標的方式。禁煙、新生活運動在衛生健康的框架下結合起來，成爲一種國家監視和自我控制的日常生活的衛生政治，它既是身體政治、生命政治的體現，更是中國救亡手段之一，在這過程我們看到了衛生健康概念、公醫制度、公共衛生體制如何與個別身體、集體生命越來越靠近，而衛生現代性也在這救亡過程中緩步的進入中國。

---

<sup>429</sup> 魏斐德，《上海警察 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2004: 290)。

<sup>430</sup> 相關討論另可見魏斐德，〈給娛樂發執照—中國國民黨對上海的管制〉，收錄於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2001)。

<sup>431</sup> Alan Baumler, *The Chinese and Opium Under the Republic: Worse Than Floods and Wild Beasts* (2007: 177)。

<sup>432</sup> 見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收錄於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一書附錄(2006)。

## 五、保衛母體：育種救國的健康技術

確實，西醫促成中國醫學現代化，使得衛生、健康概念有了不同與以往護身、養生的意義和作法，除了西方細菌學、生物學、解剖學、生理學的引進，讓當時中國人對身體的概貌、對疾病的構成、對醫治的療法、對預防的作為有了新的認知和處置方式，更重要的是衛生健康不再只是個體之事，而成爲國家體制一環，接受國家的調節、安排、照料，配合國家計劃自我關注，國家力量介入生與死的過程，構成健康政治和衛生政治。例如，攸關種族生存至鉅的生育，已從過去的醫生不願接手的產婆接生的助產階段，到成爲專業婦科醫學處理的範疇，不僅重新在醫學的科學專業領域裡取得新的定義和合法性，同時也成爲國家權力構作下醫療政體的一環，以配合國家現代化建設發展目標，這是中國醫學現代化一個明顯的例證。而生育也和社會改革、民族興衰建立起醫療和國家的關聯。羅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在其研究中即指出，人口已攸關國家民族利益，生育不再只是家庭和醫學的問題，它還攸關國家和社會命脈，是國家戰力和社會資源的問題，醫師和科學家要爲造福民族和促進社會進步而挽救婦女、兒童的生命與健康。因此，降低分娩死亡率，控制生育，推廣避孕，對於體弱，身染惡疾母親，賣淫婦女，罹患遺傳疾病者的限制生育成爲倡議重點，如何爲社會和國家利益生養新一代健康國民，成爲婦女的社會責任，婦女成爲國家生產機器的一環。<sup>433</sup>在量和質的控制上，爲國家製造所需要的人力資源。

20~30 年代這種論調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如蘇儀貞 1922 年出版的《婦女生育論》一書，即提出上述優生保育，控制生育的論點，清楚的將生育納入民族框架，生育問題上升爲保種以及事關民族發展進步之事，成爲家庭、社會、國家乃至世界之事而不只是婦女個人問題，「婦女於人類之維持及繁殖，並其進化，負有重大之責任。故婦女生育一事，不特於個人幸福上有莫大之關係，延及於家族及社會，推而至於國家及世界，無不間接蒙其禍福」。<sup>434</sup>同年出版的另一本書《女性養生鑑》，則提到，「病母產弱子，人種積衰，而國亦遂以陵夷」，「母強則子強，母弱則子弱，擴言之，欲強國必強種，欲強種必強母，是婦女衛生更不可不講矣」。<sup>435</sup>從這些論調看出，生育非個人之事，婦女講究衛生，是爲國家而強健，爲國家育善種。婦女化約爲母體，是國家生產機器，替國家孕育有用的人口。正如當時有人呼籲，「請優秀家係努力生產，是國家社會之福也」。<sup>436</sup>1947 年，被譽爲

<sup>433</sup> 參見羅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喪葬：十九世紀至當代的民間文化和上層文化》(2001: 90)。

<sup>434</sup> 蘇儀貞《婦女生育論》(1922: 1)，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208)。

<sup>435</sup> 郭人驥、鄺人麟，《女性養生鑑》(1922: 1~2)，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99)。

<sup>436</sup> 丁福保，《結婚與優生學·序言》，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5)。

中國婦幼衛生開拓者的楊崇瑞更一語中的指出婦嬰健康和種族強弱、民族復興之關係，並提出兒童死率為國家衛生狀況之指標，保衛婦嬰健康成為國家復興之基礎，她說「故種族強弱，當決於婦嬰之健康，因此民族之復興，端賴婦嬰之保健……。故兒童之死亡率，誠為國家衛生狀況測度之衡尺，民族健康情況之表徵……今後國家之復興，公共衛生確為基礎，而公共衛生之推行，婦嬰衛生實為其基礎」。<sup>437</sup>楊崇瑞歷經了抗戰時期大量人口流失，人力亟待補充的階段，深刻體悟婦嬰健康對人口數量、人力素質的重要性。因此，保衛母體及育種過程的安全健康成為公共衛生的基礎工作，也是救國的根基。

健康為國，育種為國。無疑，這已進入了一個醫療國家化，生育和健康國家化，或者說生命國家化的階段。健康之必要，成為國家保衛集體生命的信條，也是國民需對自己和國家健康負責的新道德責任。例如有人呼籲婦女要「認清生育是婦女對國家社會應有的責任與義務」；<sup>438</sup>另有人提及教養子女不僅是「婦女無從擺脫的義務」同時也「負起了復興民族的大使命」。<sup>439</sup>上述種種說法，充分體現了生命政治的力量。出生、死亡、婚配、生育、人口品質的控制，指向國家民族生存目標，因應外部種族威脅。每個國民要善盡自己健康的義務，讓健康的身體、母體、下一代，造就健康國家。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健康，也最強調健康的年代。必須保衛健康，來保衛國家；保衛母體，以育種救國。從整個論述看來，健康似乎成為公民資格的要件，如果有病夫始有病國，那麼有健康公民始有健康國家。追求健康、保衛健康成為去鴉片化社會，去不正常社會的必要之舉，其目的正在於強國保種，富國強兵，振興民族。

健康國家化從生育開始，生育從女子開始，要提昇女子品質，除了健康，還要受教育，1897年梁啟超提倡興女學，因為女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sup>440</sup>興女學目的之一就是善種，為國善種和保種，「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是以「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sup>441</sup>1902年有人提出呼籲，興女學以振母教，以強母種，其重要性有甚於男學，「大凡一國女學優者其男學必優，何也？母教使然也。一國女體強者其男體必強，何也？母種使然也」。<sup>442</sup>《女界鐘》作者金一更為女人的國家化定調，「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

---

<sup>437</sup> 楊崇瑞，〈婦嬰衛生之過去與現在〉，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371~372)。

<sup>438</sup> 白，〈由義大利獎勵生育而想到中國的生育問題〉，《婦女月報》，1卷，6期(1935: 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107)。

<sup>439</sup> 〈母親會的意義〉，《婦女月報》，1卷，9期(1935: 6~7)，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107)。

<sup>440</sup> 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啓〉，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1997: 144)。

<sup>441</sup>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1997: 32)。

<sup>442</sup> 〈華族女學校學監下田歌子論興中國女學事〉，東京《湖南游學譯編》(第一冊)，收錄於張玉法、李又寧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95: 567)。

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sup>443</sup>興女學才能新女子，也才能強中國，因為女子不單是孩子的母親，更是國家之民的母親。女子攸關國家之強盛和文明，其關鍵在於為國家孕育善種。金一提倡女子解放，要救女子，卻聯結到救國家，女子從家庭、社會中解放出來，卻又掉進國家束縛裡。顯然，個人自由屈從於國族大義，這一時期的愛國救亡論述，大抵將國族生存擺第一位，個人身體、生命、生育服務於國族計劃。也因此，提倡女學目的就在「母教強國」、「正母教以救危亡」。光緒二十九年，清廷頒布〈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其中〈蒙養家教合一〉一篇內容提及，「使全國女子無學，則母教必不能善，幼兒身體斷不強，氣質習染斷不能美。蒙養通乎聖功，實為國民教育之第一基址」。<sup>444</sup>國民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女學，透過興女學確保下一代品質的優良。

因此，將女子提昇為國民之母，再化約為育種的母體。女子乃成為國家生產工具，其目標在於產出什麼樣的好國民，因為「女子之體魄一弱，關乎全國人種之問題也」。<sup>445</sup>在這目標下，有人強調要「鑄造國民母」，有好的國民母才有好的國民，國家才得以立，「國無國民母，則國民安生，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始」。<sup>446</sup>這種育種救國的論述持續不斷，1914年丁福保強調婦孺衛生，因為婦孺決定國家盛衰大計，「有健康之母，始有健康之子女，……女子為國民之母，小兒為將來之國民，其身體之強弱，實與國家之盛衰有莫大之關係」。<sup>447</sup>由於健康之必要，女子必須自我關注身體良窳，以免影響下一代，「為母者須自愛其身體……良以兒女身體之健全，全胥視乎母之身體健全與否……故為母者對於一己，亦萬萬不可輕忽」。<sup>448</sup>這種提醒，強化了婦女肩負健康責任，國家盛衰運途轉到婦女身上，因為「國家富強，基於婦女之健康……母強則國亦強矣」，<sup>449</sup>成為國民之母必有的認知。

這種母體國家化、育種國家化落實在生育面向，對出生率、死亡率的關注，對優生的控制，也都指向國族發展大計。如馮客指出的，「『為國家健康而樹立生育責任感』。不健全的人不應擁有生育權……個人生育的權利必須附屬於抽象的集

---

<sup>443</sup> 金一，《女界鐘》(2003)。

<sup>444</sup> 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103~104)。

<sup>445</sup> 張肩任，〈女學文叢：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女子世界》，2卷，6期(1915: 2)，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98)。

<sup>446</sup> 亞特，〈論鑄造國民母〉，《女子世界》，7期(1906)，收錄於張玉法、李又寧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95: 460)。

<sup>447</sup> 丁福保，〈婦孺衛生一夕話〉，《女子世界》，1期(1914: 1)，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98)。

<sup>448</sup> 瘦鵝，〈初為人母之指南針〉，《女子世界》，2期(1915: 1)，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98)。

<sup>449</sup> 王友梅，〈婦女健康法〉，《婦女醫學雜誌》，2期，(1928: 1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100)。

體利益下」。<sup>450</sup>母體要為國家確保自己健康，以保護下一代，不健康母體，喪失繁衍權利。這一基調，正好符合晚清以至二十、三十年代以來，強調優生以改良人種的潮流。特別是在婚配和生育控制上，在婚配上，早婚的弊害素為焦點，他不僅影響年輕人的求學、家計、品性、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有「人種之害」，因為，「人必體魄強壯，然後乃能誕育佳兒。而當青年時代，在自身且屬辱質嬌姿，以是育子，則皆孱弱之種而已」。<sup>451</sup>至於在生育控制上，在強國保種的時代圍和社會需求下，也成為改革社會的作法。

1922 年在美國提倡生育控制博有大名，且著有《婦人與新種族》一書闡釋理念和作法的珊格爾夫人(Margaret Sanger) 在上海演講時，有鑒於中國人對生育只求其量，不加控制，因此建議中國應儘快「採用科學的產兒限制法，以養成優良的人種，產生良好的兒童」。<sup>452</sup>當時社會言論則響應這種說法，認為珊格爾夫人的產兒限制說有助於中國的人種和社會改良，「革新孱弱頹廢的種族，改造腐敗紛亂的社會」，「所以我們為母性的自由計，為種族的發展計，為國家的安寧計，都有歡迎珊格爾夫人的必要」。<sup>453</sup>生育控制目的無非就在保障人種健康以及國家健康，「我們如果能夠依據人種改良學的學理，實行產兒限制，一方面更能講求衛生，改良醫藥，那麼民族的質地，一定可以改良許多」。<sup>454</sup>在當時不少人認為中國有人滿為患的生存壓力，生育控制有助國家經濟發展，降低死亡率和改善人口素質，經濟學家喬啓明即主張節育少生，他表示「我國今日如欲改進口口品質，建設國民經濟，惟有遲婚、節育，以降低生育率，同時降低死亡率，使人口獲得相當的自然增加率」，「故今後當急之務，厥為節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質，解除經濟痛楚」。<sup>455</sup>

珊格爾夫人的生育控制論，顯然為當時亟於追求國族健康，力圖擺脫病態狀態的中國，提供一套解決良方，配合當時崛起的優生學或民族衛生學的立說，構成一套在科學知識保障下，服膺國族發展計劃，進行人口調節的「生殖政治」(politics of reproduction)，<sup>456</sup>一套救種的生命政治策略。節育構成人口問題，攸

---

<sup>450</sup> 馮客，〈個人身體與群體命運：近代中國之人種繁衍和社會紀事〉，收錄於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2000: 204)。

<sup>451</sup> 履夷，〈婚姻改良論〉，《留日女學會雜誌》，1 期(1911)，收錄於丁守和主編，《中國近代啓蒙思潮》(上卷)(1999: 502)。

<sup>452</sup> 〈珊格爾夫人在上海家庭日新會的講演〉，《婦女雜誌》，8 卷，6 期(1922: 13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2)。

<sup>453</sup> 〈迎接珊格爾夫人〉，《婦女雜誌》(產兒限制號專題討論)，8 卷，6 期(1922:2~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2)。

<sup>454</sup> 瑟盧，〈產兒限制與中國〉，《婦女雜誌》，8 卷，6 期 (1922: 1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62)。

<sup>455</sup> 見喬啓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1945: 127)，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2001: 616)。

<sup>456</sup> 關於珊格爾來華訪問的影響可參見 Yuethsen Julitte Chung(鍾月岑)，Struggle for National

關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當時有認為節育降低人口，會造成國家滅亡，這派認為中國人口成長停滯，應多生育，免遭帝國主義消滅。提倡節育者則認為，中國人口過剩，節制生育，減少人口數，以質取代量，才不會導致亡國滅種。然而不管所討論的節制生育是因為人口過剩或不足，而導致亡國滅種，基本上都已遠離珊格爾夫人提倡節育以實踐女性生育自主權和身體解放，「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sup>457</sup>的信念，生育已跟人口問題、國家存亡結合，不再屬個人自主的問題，而是國家政策籌謀的對象。

節育要打破婦女向來「只擔當一種孵卵的任務」，<sup>458</sup>然而婦女可以不為自己孵卵，卻不得不為國家孵卵；婦女不做生育機器要做生育主人，然而真正主控生育方向的卻是國家。事實上，根據研究中國人口數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突破 5 億人，中國確實存在人口過剩，導致生活水平降低問題，因此節育主張的提出，一直到 1945 年終於得到以人口增長為政策的國民政府認同，承認其合法性。民間團體也呼籲節制生育，對母體健康和國家生存都有助益。1930 年成立的北平婦嬰保護會，即提出「藉節制生育培進母體健康」的說法，1935 年中華醫學會在廣州召開年會，認定節育為公共衛生主要工作，節育乃正式納入醫學專業系統。<sup>459</sup>節育、婦嬰健康、公共衛生在強種保種意識下，構成打造國家健康的重要環節，育種私事乃轉為國家公事，建國就要先樹人。

「為產母保生命，為嬰兒策安全，人口增加，國基永固」，這是 1928 年北平衛生局產婆講習所開學典禮時，全體學員呼的口號。<sup>460</sup>這口號反映了在生殖政治或救種的生命政治考量下，為了國家健康，要保衛母體健康，母體受孕生產過程的健康與安全成為關注焦點。特別是當時偏高的婦嬰人口死亡率，使得政府和社會不得不注意這攸關中國人口存亡的問題，因為要「奠定建國樹人的基礎，必需減低孕產婦嬰兒死亡」。<sup>461</sup>1934 年也有醫生提出，「強國強種，須從改良產科

---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2002: 107~140)。環繞在珊格爾夫人帶來節育討論的相關文章另可見，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 195~233)；余蓮實，〈民國時期城市知識女性與生育節制〉，收錄於盧建榮編，《批判歷史學：體制不公與微弱的反抗聲音》(2010: 201~230)。

<sup>457</sup> 建人譯，〈珊格爾夫人自敘傳〉，《婦女雜誌》，8 卷，6 期(1922: 9)，轉引自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 197)。

<sup>458</sup> 〈迎珊格爾夫人〉，《婦女雜誌》，8 卷，6 期(1922: 2)，轉引自余蓮實，〈民國時期城市知識女性與生育節制〉，收錄於盧建榮編，《批判歷史學：體制不公與微弱的反抗聲音》(2010: 203)。

<sup>459</sup> 見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 200)。

<sup>460</sup> 〈北平市衛生局產婆講習所開學紀事〉，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11)。

<sup>461</sup> 見鄧鐵濤、程之范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2000: 418)。

入手」。<sup>462</sup>顯然降低婦嬰死亡率的產科技術改良成爲建國樹人、強國強種的健康技術。而產科改良更與第一線接生的助產士直接相關，因此 1935 年就有人爲文提醒，「助產士與產婦關係之密切，所收衛生教育效果之重大」，爲婦嬰保健之關鍵，應提昇助產士品質，以求「達實現民族衛生的大道」。<sup>463</sup>

助產事業與民族衛生的關係，在對日抗戰時期更是重要。戰爭需要大量人口補給，助產士是國家人力供給的推手，「際此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大時代裡，復興民族，補充人口，建設中國之責任，必須強健國民，始克擔負。而此種神聖偉大強健嬰兒體格之責任，則唯助產教育是賴」。<sup>464</sup>故有人喊出助產事業乃「改造民族體格的第一步」，是「我們抗戰的先鋒，也是我們抗戰的後盾」。<sup>465</sup>而在戰爭前一年的 1936 年，就有文章呼籲婦女懷孕期間應注意安全衛生，並將之放在國族框架下，要求得到充分醫療照顧，以期母壯兒健，洗雪病夫恥辱，「須知婦人的懷孕安全與否，關係於母子雙方未來的健康，和整個民族的強盛，以及國家命脈……予以充分的醫藥衛生看顧，以期達到母壯兒健，永無弱種的目的……東亞病夫的徽號，一方面係後天造成的，一方面係我們的母親們在我們先天的時期，沒有加以充分的照料和保護，因此生下了我們軟弱無能的種子」。爲了不產下無能的種子，國家醫療照料，以及個人注重孕期衛生成爲必要，如此「不但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可以驟形低減，未來民族，也必日益強盛」。<sup>466</sup>所以婦女應知，要做一個賢能的主婦必須注意產前產後之衛生，如此方可「造就強健之胎兒，爲將來強健民族之基礎」。<sup>467</sup>上述這些認知和說法，都指向在國家民族健康發展大前提下，如何提昇生殖醫療技術、強化人員訓練素質，甚至落實爲國家醫藥衛生政策，以保障婦嬰孕產安全，成爲這時期國族健康的重點。

特別是戰爭時期，人口的大量耗損，人口增加以及保種強種更是當務之急，我們可從 1943 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宣言〉這份文件略窺一二，「總裁有言曰，『我們要救國救民，救要先保種』。今據以上各種統計觀之，我國現在人口，不獨在資質上未加改良，且在數量上，日形銳減，長此以往，殊有影響抗戰復興之前途，可不懼哉」，其改善作法是推動體育以強化國民體格，挽救中國

---

<sup>462</sup> 瞿紹衡，〈接生者對於初生兒臍出血及產婦急死之責任問題〉，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70)。

<sup>463</sup> 劉有鐘，〈助產士與衛生教育〉，《醫事公論》(1935: 18)，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70)。

<sup>464</sup> 徐月麗，〈助產教育與民族自強〉(1939: 4)，《第一助產學校十週年紀念冊》，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71)。

<sup>465</sup> 《第一助產學校十週年紀念冊》(1939: 4)，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71)。

<sup>466</sup> 民，〈孕期衛生之重要〉，《醫事公論》，3 卷，14 期(1936: 19~22)，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210~211)。

<sup>467</sup> 錢一葦，〈怎樣做一個賢能的主婦〉，《婦女月報》，2 卷，9 期(1936: 13)，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211)。

積弱。<sup>468</sup>放在建國樹人，育種救國脈絡，婦嬰健康乃成爲抗戰基礎，透過體育運動或其它醫療衛生方式，強化母體健康，保障生育過程安全，以提高出生率和降低嬰兒死亡率則成爲必要任務。這時也更迫切要求健康之必要，並轉而爲所有人的救國責任。楊崇瑞在抗戰後期提醒，「母嬰健康爲整個民族健康之基礎」，但「我國昔無科學的助產及育嬰方法，故產母、嬰兒之死亡率特別顯著這在民族國家前途，潛伏著莫大危機」。<sup>469</sup>因此，婦女要有自我保健概念，不再只是爲家族傳宗，更要有爲國族續種的責任感。而保衛婦女安全延嗣續種的健康技術就益顯其重要，特別是第一線的助產接生技術，更是生死控制的關鍵技術。

根據調查 1920~1930 年代舊式接生的穩婆有 20 萬名，受過醫學訓練的新式助產士不過 500 人，其結果是造成婦嬰的高死亡率。<sup>470</sup>在楊崇瑞 1927 年對北京附近婦嬰健康狀況的調查中顯示，由於當時大部分都靠穩婆的傳統接生法接生，導致產婦死亡率高達 15%，較歐美高出四、五倍；嬰兒死亡率更高達 200%，亦較歐美高三或四倍。楊崇瑞以當時中國總人口數估算，每日死亡產婦約 600 名，其中 400 名是不應死而死。張大慶依據楊的資料估計，如果嬰兒出生率 35%，人口總數 4.5 億，每年夭折的嬰兒數高達 320 萬人之多，產婦死亡人數則有 24 萬人。如果與死亡率最低的國家比較，中國每年要多死 200 萬嬰兒和近 20 萬名產婦。爲什麼死亡率如此高？楊崇瑞歸結原因，認爲傳統接生的穩婆專業知識不足，無法進行急救；更重要的是沒有消毒滅菌的概念，導致產婦因得產褥熱、嬰兒因感染破傷風而死者不少。最後是，不明飲食衛生之法，導致產婦調養失宜，嬰兒乳養失當，如斯枉死者亦復不少。<sup>471</sup>

這種因舊式產婆接生導致婦嬰的高死亡率，1932~1934 年上海衛生局的一份調查報告也指出，在所調查的 862 戶居民裡，嬰兒 2795 名，一歲內死亡 199.4%，舊式接生死亡率 210.8%，助產士或醫師接生死亡率 40.3%。家庭嬰兒越多，死亡率越高。抗戰期期間嬰兒死亡率依舊偏高，1941~1943 間四川璧山縣的調查顯示，在這段期間嬰兒活產 901 例，生後一年死亡率 170.9%，出生兩週內新生兒死亡率 73%，新生兒因破傷風死亡 52 例，占新生兒死亡 78.8%，這些均爲舊式接生所致。如同 1930 年北平協和醫院一位醫師所說，「過去二十多年，分娩造成大量死亡是世人觸目驚心的事……中國孕產婦死亡與孕期保健的效果有直接關係」，也因此更顯示助產士培訓的重要。<sup>472</sup>

---

<sup>468</sup> 〈中央國術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宣言〉，轉引自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1981: 223）。

<sup>469</sup> 楊崇瑞，〈中國婦嬰工作之過去與現在〉，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71）。

<sup>470</sup> 見鄧鐵濤、程之范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2000: 417）。

<sup>471</sup> 參見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2006: 165~166）；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03~304）。

<sup>472</sup> 見鄧鐵濤、程之范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2000: 417）。



正如楊崇瑞所說，「兒童之死亡率，誠為國家衛生狀況測度之衡尺，民族健康情況之表徵」。上述情形，正好說明中國當時衛生安全狀況以及民族健康情形，處於惡劣不堪境地。因此，積極推動新式助產教育，加強穩婆的訓練、監督、管理，建立證照制度，強化婦嬰衛生安全，成為確保婦嬰健康的技術作為，也是厚植國力的一環。由於婦嬰生命乃國家生命之所繫，政府於焉展開一連串措施進行改革，1928年頒布〈接生婆管理規則〉，國家正式接管生育領域，進行人口生命的控制，規定接生婆的資格、需接受的醫療訓練、執業證照取得，以提昇素質，確保婦嬰安全，同時也開辦產婆訓練所，施以新式接生訓練。1929年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在北平設立，不久南京成立第二助產學校，專業醫療訓練讓中國助產事業進入現代化階段。1929年頒布〈助產士條例〉，除資格限制，證照取得規定，其中第十條，「助產士應每月十日前，將前月份助產人數列表報告該管地方官署，經民政廳或特別市政府彙報衛生部報備」，<sup>473</sup>這一規定說明生命統計已成為國家衛生行政例行業務，對人口生死進行數字管理以及流行病的掌控，<sup>474</sup>助產士成為第一線的生命統計員。

1930年北平成立保嬰事物所，負責產婆、助產士之監督，嬰兒生死統計，母職訓練等業務。<sup>475</sup>而為了降低婦嬰死亡率，有效繁殖人口，提昇國力，1937年國民黨第五屆八中全會通過《實施公醫制度以保證全民健康案》，視公醫制度為國家衛生行政目標之一，目的在降低人口死亡率，抑制傳染病流行，降低產婦及嬰兒死亡率，增進國民健康等。<sup>476</sup>國民政府也開始推廣公醫制度，選派助產人士到各地實施婦嬰衛生宣導及免費接生服務，並補充婦嬰設施。<sup>477</sup>

這一時期對母體的保護、對育嬰的重視，一來源來亡國滅種的憂患遺緒，二來在遺傳學的知識系統下，對中國長期處於不正常/病態的疑懼，以至對健康/正常的極力追求。在這脈絡下西醫對身體治療和傳染病防疫的顯著成效，成為中國追求個體健康到民族健康，回到常態的有力救亡工具。從前述以遺傳學為工具，去除不正常人的立說到保衛健康、保衛母體的作為，自上而下都自我內化的試圖配合國家民族的發展計劃，構成健康政治和生殖政治，進行身體、婚配、生育、人口生命的調節、控制，特別是在外族侵略、戰爭威脅下，人力資源更是國家戰力的憑藉。人種品質、人口生死牽動國家成敗，透過健康政治、生殖政治強化國族生存競爭能力，也充份體現生命政治無所不在的控制性和自我內化作用。

---

<sup>473</sup>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92: 307)

<sup>474</sup> 1933年衛生實驗處下設生命統計系業務，「掌理生命統計實施方法之系統的建設，生死疾病統計材料之收集及其分析，各項流行病學之研究，其它關於生命統計事項」。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92: 272)。

<sup>475</sup> 見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2006: 147)。

<sup>476</sup> 黃慶林，〈國民政府時期的公醫制度〉，《南都學壇》，25卷，1期(2005: 30~31)，轉引自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74)。

<sup>477</sup> 見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2010: 390)。



## 第五章 結 論

鴉片如果是一起對內引發中國價值信仰、意義秩序、典章制度、風俗習慣幡然大變，對外打破朝貢體制的外交關係和廣州體制的經貿關係的物質事件，那麼最終它又是促動中國全面轉型和現代性開展的一起現代性事件。也就是鴉片事件促動中國現代性事件的發生，至少也是埋下現代性萌芽的種子。或許會進一步問，既然是事件，中國現代性事件發生於何時？很少研究直接將鴉片與中國現代性扣連在一起，最多的論述是鴉片戰爭引發中國對外關係改變，進而對內進行體制結構的逐步調整適應，最後朝西方現代性轉型。這當然可視為是鴉片/西方挑戰，中國回應的模式。歷史也是這樣一路發展下來。本論文則更想深入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關係之核心，兩者聯繫在於近代中國的救亡運動。救亡即在解決鴉片問題，這是一個去鴉片化的過程。去鴉片化指涉去病態、去不正常，救亡正是恢復正常化，讓消費、身體、視覺、生命、人口品質、國家機體恢復到常態秩序。中國的救亡其實是一個恢復秩序的過程，而這個恢復秩序的過程，讓中國不得不借助西方醫療、健康、公共衛生、遺傳優生等現代性生命政治技術，矯正中國因鴉片造成的不健康、不衛生、人口品質不佳等身體、生命的危機問題。就此而言，鴉片帶來這些問題，但也因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讓中國被迫提早進入現代性議程。從事後的結果來看，我們或許要重新看待鴉片的歷史地位和存在價值。並不是幫鴉片翻案，而是思考鴉片的另一種可能價值。

舉一例，王德威指出晚清小說遭到五四現代文學的壓抑，五四作家接受西方現代性模式，做為唯一典範，將晚清小說各種文類如狎邪、俠義公案、醜怪譴責、科幻奇譚小說，視為瑣碎、頹廢、浮誇排除在正典文學之外，也將晚清小說中萌芽的各種現代性形式驅除在正統之外。晚清小說的敘述技巧、形式、對社會真實的敏感、對西方現代性問題的回應，都可能是五四文學的源頭，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然而在啓蒙、理性、革命、進步的敘事下成爲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repressed modernity)，因此要問有那些是被我們所認定的「現代」中國文學話語壓抑、壓制。<sup>1</sup>王德威對晚清小說做為被壓抑現代性的廓清和再定義，一方面促使被壓抑、被排除成爲問題意識和觀看的主體；另一方面，透過被排除質問排除，翻轉排除/壓制秩序的界定，被排除的不就是排除之所由生，被壓抑的也正是壓抑之所在，被現代性壓抑的，本身就是現代性的一部分。這一重點正是我們對具有類似處境的鴉片的思考。

---

<sup>1</sup>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2003: 35~44)。

如同所說，要問有那些東西是被所謂的「現代」所排除和壓抑的？被現代性壓抑的本身是否就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本論文思考鴉片跟現代性關係，王德威的論點無疑提供一些思考上的助力。鴉片確實是遭禁制和排除的物品，不管是法令的禁制或社會意識的排除，鴉片都是負面存在物，儘管在它的物質生命史上曾有一段風光時日。從已往的觀點來看，鴉片跟進步、開明、現代化扯不上關係，對人類文明創造也不會有太多貢獻，至少就中國而言如此。然而鴉片促成中國現代性開展卻是可能，歷史事實的發展也說明了一切。負面存在的鴉片，以曖昧詭譎的姿態既毒醉中國，也藥醒中國。本論文雖不曾指陳鴉片就是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但這篇論文卻是在這一個詭譎的問題上展開思考，鴉片可視做被壓抑的現代性嗎？或者怎麼界定鴉片在中國現代性的位置，雖然這篇論文從這一旨趣出發，分章設節，立定議題，但最終仍難給它定位，依舊只能說鴉片是中國現代性的促動因子。鴉片製造一樁摧毀性事件，也開啓一樁現代性事件。這說明了鴉片的雙重矛盾性，就像現代性。

雖然，最後無法解決鴉片究竟是什麼樣的現代性這一疑義，或許也不須給它一個名份或位置。本論文在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關係之核心的問題下，追蹤鴉片如何在消費政治、視覺身體政治、生命政治脈絡下，促動中國救亡現代性的開展。本論文最後總結這段過程如下：

(一)、鴉片消費政治。鴉片做爲一種物質在中國脈絡下，被高度政治化和國族化。在國族框架下，鴉片消費進入消費民族主義的範疇，在中國救亡基調下，成爲高度爭議的政治性物品。因此，國家乃透過法令和反鴉片消費論述形成官方的消費品味，進行品味教導，改變了鴉片消費做爲時尚潮流的社會觀點。再者，反鴉片消費論述的建構，最後形成國族救亡導向的反鴉片品味政體，並將鴉片界定爲國族公敵，建國大礙。而這些論述又構成身體與生命政治開展的基礎，促成中國進入現代性議程。此外，吸食鴉片在西方視覺建構下，既是國家恥辱，更是國族生存最大障礙，也正是羞恥政治的核心，國家得以操作罪責化和詬病化策略，進而達到肅清煙禍的目的。也就是改變鴉片吸食是值得欽羨，有所尊榮的心態。簡言之，這套策略運用鴉片的詬病化、罪責化，塑造出外部社會審查和內在自我警醒功能的「恥感導向的文化」，不僅於此，更透過恥感所伴隨的自我歸咎、自我批評、自我貶抑或自我負面化的表現作用，激發民族的集體受辱意識，形成集體責任感，進而帶動改革的熱情或做爲正當化改革的論述策略。

而中國歷經漫長的鴉片化過程，從一開始即埋下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從國家官僚到地方精英，無不困在這意識裡。到了十九世紀末，甲午戰敗，這種憂患之情逐漸成爲普遍意識，強國保種成爲國族發展終極目標。而恥感意識也隨著鴉片戕害國族命脈，以及國家不斷挫敗下，逐漸內化爲自省或自我屈辱的意識。在

亡國滅種危機以及救亡圖存框架下，恥感意識即結構化爲日常生活意識，馴化出人民恥感的認知，對自身恥辱、對國家恥辱要有敏感的認知和反應，這成爲對國家的責任。恥感意識社會化，使得晚清反鴉片消費的羞恥政治成爲可行，透過詬病化，召喚出罪感和恥感，一方面在外部監看下形成自我約束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恥辱刑的懲罰方式，剝奪其聲名地位，公諸於世，達到禁制效果。如此作法可以成爲一種消費控制的策略和方式，而嗜癮者也似乎必須配合國家改革需要，不斷面對恥感的召喚以及遭遇自我克制、自我改造的戒癮道德生涯的要求，同時透過自我負面化的表現策略，凝聚成集體責任感，激發民族情緒，並成爲新文明建立，新國民身份打造和國家改革的動力機制。至此，消費主體性、享樂愉悅的自主性，成爲國家在國族消費主義框架下壓抑監管的對象，同時透過羞恥政治塑造出罪感和恥感的主體。因此，鴉片化過程，乃促成恥感意識社會化過程，也是恥感主體建構過程，正是透過這種轉變和自省，進入到去鴉片化，去恥辱，也就是雪恥建國的階段。

本論文認爲中國的鴉片禁制行動，在羞恥策略運用下，改變以鴉片爲時尚品味，從而斷絕鴉片吸食之風的作法是成功的。這當然也源於整個社會已瀰漫國恥意識，羞恥意識已深化爲日常生活意識，鴉片成功的被界定爲國族公敵，透過社會監視力量形成自我克制，造就良好的禁煙成效。這也是本論文之所以列爲探討的議題。至於，歷史上的禁煙行動大抵是失敗的，道光年間林則徐查禁鴉片，成功一半；清末十年禁煙運動，最後廢止印度鴉片輸入中國，算是最成功的一次；1936年起的六年禁煙計劃，查禁規模更是龐大，也有其一定成效，然而這次運動背後有其政治企圖，其影響效應可能還在禁煙之外。

爲什麼二百餘年的禁煙行動並未成功，反而越禁越多，原因大抵有幾個，一是吏治敗壞，官吏受賄嚴重，再加上這些官吏本身就是鴉片吸食者，更不能認真查禁鴉片，反而藉機勒索；二是經濟與道德的衝突，最後經濟計利理性勝過一切。政府以寓禁於徵爲由開徵鴉片稅，龐大鴉片稅無疑爲困窘的國庫注入希望，這成爲任何時期政府必訂的政策，晚清的鴉片貿易合法化、軍閥時期藉鴉片稅擴充勢力、國民政府，包括共產黨都靠鴉片稅收支撐國家政權和地方勢力，所以鴉片永遠禁不了，它成爲迷人的毒品經濟；三是勒戒鴉片煙患的方式不對，由於中國醫療資源不足，無法在各地設立現代化的勒戒所，以現代醫療方式進行煙癮患的治療，造成患者勒戒效果不良。台灣鴉片禁制成功，杜聰明以現代醫療方式勒戒診治，功不可沒；四是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從清末以降，國家戰亂頻仍，地方勢力分立，國家的治理範圍有其限制，要施行全面性、徹底的禁煙行動顯有困難，這也是鴉片禁禁停停，有的禁，有的不禁原因之一。由於歷史上的禁煙行動不算成功，失敗原因如上分析，因此本論文在討論鴉片管治時，掠過這部份不討論，而著重於反鴉片消費論述建構出的官方品味，以及羞恥政治的討論。這是管治行動中較具效力的作爲。

(二)、視覺身體政治。以恥感建構為議題核心，探討視覺化的鴉片/身體與救亡關係。從魯迅的視覺遭遇談起，魯迅的視覺經驗既是現代性經驗的啓蒙，也是羞恥意識的萌生。魯迅看到中國愚昧落後的景觀，透過影像媒介召喚出他對時代、國族以及自我的感受性，視覺和觀看無疑具有譯介殖民現代性的作用。被視為中國文明和國族敗亡表徵的鴉片及病態鴉片身體必然構成視覺秩序的問題。視覺秩序與社會定義/社會秩序基本上具有穩定關係，因此鴉片身體在社會危機、視覺危機下成為身體危機，成為一種病態/不正常框架下的危險身體，它既造成社會機體失能，更招來國體的恥感。身體和國體的恥感意識，伴隨著亡國滅種意識，成為舊帝國到新中國共同的問題意識，一代代精英都在解決這問題，洗刷恥辱，富國強種，投入中國救亡圖存的改革工程。在這框架下，鴉片做為亡國滅種致因、恥感的來源，成為一種須被排除、壓制和入罪的邪惡它者，然而在國族/帝國殖民/醫療/維新革命/現代化進步等各種論述排除之先，就可能已先進行了視覺的排除。在視覺中心主義主導下，鴉片身體的病態性，以及中國衰敗意象，更形突顯，成為關注討論的焦點。就某個層次而言，中國問題轉化為視覺問題，從全球視覺的觀照到自我觀照，鴉片身體以及其它恥辱之物，讓視覺秩序構成問題，視覺秩序一方面內屬於常態秩序，另一方面隱含民族主義視覺認知以及恥感視覺認知，違逆這一秩序和認知原則者，成為被排除、管治對象，視覺政治與身體政治共構出以國族救亡和恥感意識為主導的觀看體制。中國經歷這段視覺化歷程，東西方視覺遭遇的相互歧視，到西方以及自我視覺的恥感建構，到國內商品、國貨展洗雪恥辱的視覺實踐，最後在反毒禁煙時期對鴉片身體的視覺管治和裁決，以恢復到常態秩序，進入健康、正常狀態。視覺構成問題，也透過視覺解決問題。

因此，中國去鴉片化的救亡運動，除了透過消費政治做為管治鴉片的手段，視覺政治的管治也是手段之一。特別是在視覺中心主宰下，中國試圖以剪辮、放足、禁煙的新身體形象進入全球體系，以替代既有舊帝國的刻板印象。這意味著中國努力走出活死人國度，重新塑造健康、正常的新國家形象。同時形成了商戰、種戰之外，還有視線之戰，爭奪形象的勝出。清末民初一系列身體改造運動和衛生健康的強化，正出於強國保種的國族救亡大計。而在強國保種的諸多改革作為中，視覺革命已往總是被忽略，到了清末以降，我們看到對身體型態革命的強調，也就是身體意象的強調；而視覺的微觀政治作用，也不斷在運作，如為了維護視覺秩序，不得不進行視覺裁判，以捍衛背後的社會秩序、道德準繩或國族大計；或者透過視覺意象的自我觀照，形成視覺的啓蒙，透過他人的觀看中國、再現中國，進而觀看自己、撼醒自己，進入中國覺醒階段。這是因為視覺啓蒙過程伴隨西方視覺現代性技術的崛起，讓中國置於全球的多重觀看下，透過不同視框的矛盾和緊張關係，看到不一樣自己，從而促成視覺的現代轉型，以現代性的眼光看

待和要求事物的改革和型變。這種視覺意象的現代性，包括身體、都市、空間、器物等意象的現代轉型，現代性成為這時期審美的標準，而西方器物也以新鮮、驚奇的面目出現在中國人眼前，加速中國的現代性想像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

視覺開啓現代性經驗，也形成恥感意識。萬國博覽會參展以及國貨展的舉辦，讓這雙重意識交會一起。同時也透過展覽進行視線之戰，成功的透過國貨展，完成象徵性的救亡。亦即，展場是一個視覺民族化的空間，也是現代性視覺空間。參觀者被訓練出民族主義視線的同時，也具有現代性的視線；同時具有民族想像以及世界想像。當進入商品展示世界裡，不管是區辨國貨、洋貨，或觀覽世界各地商品，都存在民族的以及現代性的雙重視線，這也正是中國在西方博覽會以及現代性視覺技術崛起世紀，所歷經的民族主義和視覺現代性救亡的歷程。透過視覺建構恥感，視覺啓蒙，進而訓練民族主義視覺認知，投入視覺化民族行動，成為中國救亡圖存的另一種方式。這是本論文認為中國視覺革命成功之處，中國開始重視視覺作用，也知道如何利用視覺進行鬥爭。在受到外人視覺羞辱同時，也自我觀照，形成啓蒙和恥感意識，這正是中國進步和救亡的動力之一。

（三）強國保種下的生命政治。鴉片終究跟身體體魄、種族健康和民族恥辱有關，它影響革命建國，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大業，是舊時代跨入新時代，舊王朝邁入新國家的關鍵，這也正是這段時期亡國滅種憂患意識之所由。為了解決亡國滅種隱憂，在國族救亡框架下，國民的身體、生命，不再屬於個人，它是國家的資源財產，納入國家建國統一計劃，受國家保育、調度，指向國家目標；民力即戰力，即國力，人民受命於國家強化民力，只為更高的國家興盛目標，至此，人民生命與國家結合，生命納入政治範疇，弱種的鴉片身體成為生命政治的匯流點。

從鴉片禍國的脈絡來看，我們或可說近代中國救亡的主題就是保衛國家、保衛種族，共同對抗來自內部敵人—鴉片和外部種族威脅—帝國主義。國家試著保衛人民不受鴉片之害，才能保國、保種。也因在這種背景下，提供國家為了捍衛種族生命，必須透過鴉片禁制進行身體和生命國家化的理由，形成一種國家透過法制禁令控制鴉片消費，達到強國保種生存目的的生命政治現象。亦即，為了矯正病態的鴉片社會，在去鴉片化過程，進入生命政治的範疇，一方面個人和整體族群生命成為國家關注對象，另一方面則改善鴉片遺留的病態影響，推動國富民強的政治經濟建設，進行人口品質提昇、公共衛生和健康環境改善等措施，而這些作為適足以說明西方生命政治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也同時興起於中國，構成一種救亡革新的知識體系，據以投身國家、種族的改造工程。透過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我們看到中國在鴉片煙毒帶來亡國滅種的生存威脅下，如何進行強國保種的生命政治計劃，找出生命政治的可能條件和型態，以及其間涉及人口思想、種族主義、醫療和公共衛生的現代性作為。

而在長期的鴉片病態意象下，健康、強壯無疑成爲這一時期國族救亡的重點，特別是在進化論種族競爭，優勝劣敗的影響下，提出尚武精神，倡導軍國主義，以至推展體育運動，這些都成爲實踐強國強民，強民強體的方法。也在這個主軸下，個別身體健康和整體人口衛生，全以國家民族發展爲依歸。不只爲自己，更是爲國家民族尋求健康和衛生；結婚、生育也不能隨意爲之，更要時時警醒能爲國族留下什麼樣的下一代；女子的重要性在國族論述下，轉換成育種的母體，因爲「女子乃國民之母」，母體承擔國族存亡大任。從尋找、消除不正常到恢復正常；從身體健康到國族健康；從個人衛生到種族衛生，健康、衛生成爲中國醫療現代化時期，國家讓人民嵌入整體建國計劃的工具和生命技術，成爲救亡圖存的國族意識型態。而這時期的人民在「健康之必要」的國族大義下，必須自我警醒、自我關注、自我照護自身的身體和婚姻狀況，因爲身體、生育都要向國家負責。從清末民初開始，這股身體、育種向國族負責的運動，在西醫科學知識保障下，成爲醫學維新、醫學救國的命題。知識份子的倡議、國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民間商品廣告的推波助瀾，健康與衛生就跟進化天演、救種保種一樣成爲這個時代關鍵字眼。

健康之必要，使得健康透過現代化醫學知識成爲救國救種的生命技術，對健康的強調和說辭也成爲國族救亡論述之一。從生到死，從身體到生命，從個體到人口，全在健康的籌劃和計量下。於是我們看到這時期追求健康的運動，透過教科書、健康衛生書籍的啓蒙身體和醫療視野；透過尚武精神和體育運動推廣，鍛鍊體魄，改造病夫身體；推動醫療現代化，以健康做爲國族救亡的技術，特別是提高婦女懷胎、生產到育嬰過程的安全性，以保衛母體，確保國家下一代。就生命政治推展而言，中國在救亡的企圖下已略具規模，雖然現代性工程就中國而言，只是開始，尙未完成，路途仍遙。但畢竟中國在多事之秋的關鍵年代，以現代性爲標準，進行一系列改革，爲中國轉型立下基礎。儘管這些改革作爲，擴大了生命政治的治理力量，但也讓中國更貼近現代性。

反省生命政治在中國的發展。傅科的生命政治做爲一種新的權力型態和技術，讓生命成爲權力的對象，主要環繞著生命科學、公共衛生、人口調節等知識以及種族主義的爭戰而建立，沿著這個概念我們追蹤了晚清到民國時期人口思想、種族主義、衛生、醫療等發展脈絡，呈現國家如何在面臨各種威脅下形成保衛國民生命的信念及作爲，同時也試著觀察生命政治在中國開展的可能型態。然而有一點我們不得不小心，傅柯生命政治概念發展的背景和條件與中國有所不同，傅柯的生命政治講的是十九世紀的歐洲經驗，生命政治的被引入歷史基本上跟資本主義的興起相一致，並導入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其時工業資本主義起飛、國家主權界線分明、種族戰爭頻仍、政治理性崛起，各類專業知識技術越趨分化和成熟，也就是處於現代性發展成熟的階段。至於中國其時仍不脫小農經濟型



態、主權不完整、國家分裂、西方科學知識的引進與傳統價值時有齟齬、基本的統計技術和數據資料的蒐集不足。再者從清末到民國，國家長期處於內外戰爭、統治分裂，吏治不清，效能不彰，執行力萎縮，財政困窘狀態，顯示中央權力受限，國家統治能力不足，生命政治做爲一種無所不在的權力控制技術，即便在中國發展雖有其調控節制力量，恐也未能完全發揮治理效能。

易言之，生命政治在中國可能只具雛形而已，它依隨著中國現代性的逐步開展而建立起來，現代性的條件如何，決定生命政治的可能程度，或許我們該換個角度問：生命政治在中國如何可能，或可能開出什麼樣的生命政治型態。雖然如此，傅柯的一個重要命題，關心個人生命，成爲這個時代現代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們藉著透過鴉片煙毒的肆虐，既看到兩百餘年中國人某種特殊的生活經驗和感官經驗，更重要的是看到國家對這種品味經驗帶來災難的惶恐失措以及急欲捍衛國家種族，確保人民生命所付出的心力。如何擺脫鴉片煙害，發動社會保護機制，讓人民健康的活著，才能再造現代中國，既是生命政治的基調，也進而促動接踵而至的各項變革和現代性的開展，同時也由之讓身體、生命、總體人口進入常態化和國家化階段，不再是君主王權時代的可以要你死，而是現代性生命權力下的讓你活。生命政治取代死亡政治，關心取代漠視，現代政治技術的特點就是以關心個人爲手段，進行控制個人的目的，生命成爲新的權力爭鬥場域。

最後，本論文預期價值，試圖在既有的鴉片研究之外，開闢過往未曾嘗試的新路徑，從消費政治、身體政治、生命政治切入兩百年餘年鴉片中國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變化，並提出鴉片促動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可能以及古老中國如何進入全球性視野和國際舞臺的因素。同時也檢證上述理論運用於相異於西方經驗的中國社會環境的可能。這是值得深入嘗試的進路，特別是以生命政治連結中國救亡現代性的討論，更是一全新的嘗試和挑戰，希望不致流於西方概念移植而已。本論文初心希望從當代觀點切入歷史，重新理解過去，賦予歷史新的觀看角度，尋繹新的意義。這也正是研究背後的動機，希望透過消費、身體和生命政治等當代問題意識或現代性意識切入鴉片做爲一種物質政治，包括消費、身體、生命政治以及如何促動中國現代性開展。同時也希望開啓後續鴉片與現代性以及生命政治在中國相關研究。

雖然本論文切入研究視角有其獨特性，但仍有侷限待突破。由於本論文試圖連結鴉片與中國現代性關係，因缺少直接相關研究，特別是生命政治的帶入中國情境討論，使得論文缺少可資對話、質疑的基礎，而這方面史料亦有所匱乏，僅能從薄弱、間接資料討論，致使論文的討論面向、引證、推論有所疏漏或斷然，不免帶有移植西方理論之疑慮，這是可預期的侷限之處，也是未來可以再多方廣蒐旁證，深究的方向。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一、清代部份

- 丁韞良 (W.A.P Martin), 2004, (初版 1896), 《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A Cycle of Cathay),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韜, 1959, 《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
- , 1969, 《瀛壖雜誌》，台北：廣文書局。
- , 1987, 《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
- , 1891, 《格致書院課藝》，上海：格致書院。
- 朱仕玠, 1984, (初版 1766), 《小琉球漫誌》，台北：大通書局。
- 朱景英, 1996, (初版 1773), 《海東札記》，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朱壽朋編, 1958, 《光緒朝華錄》(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
- 邗上蒙人, 1997, (初版 1883), 《風月夢》，收錄於《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18》，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 吳趼人, 1987, (初版 1906), 《九命奇冤》，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全集》。台北：博遠。
- , 1987, (初版 1906), 《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全集》。台北：博遠。
- , 1987, 《恨海》，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全集》，台北：博遠。
- 吳亮, 1907, 《衛生新論》，上海：中國圖書公司。
- 汪士鐸, 1967, 《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
- 李伯元, 1988, (初版 1906), 《文明小史》，台北：三民書局。
- , 1999, 《官場現形記》，台北：三民書局。
- 李宣龔編, 1914,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要覽，上海：商務印書館。
- 李筱圃, 1983, 《日本紀游》，收錄於羅森等,《早期日本游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花之安 (Ernest Faber), 2002, (初版 1884), 《自西徂東》(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2006, (初版 1895), 《真正的中國佬》(The Real Chinaman), 北京：中華書局。
- 金一(金天翮), 李又寧編, 2003, (初版 1903), 《女界鐘》，紐約：天外出版社。
- 武原, 1910, 〈中國出洋賽會預備辦法議〉,《東方雜誌》，7卷9期。
- 東方雜誌, 1904, 〈聖路易會場之國恥〉,《東方雜誌》，1卷7期。

- 施美夫(George Smith), 2007, (初版 1847), 《五口通商城市游記》(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秋瑾, 1960, 《秋瑾集》,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夏燮, 1962, 《中西紀事》, 台北: 文海出版社。
- 徐珂編撰, 1986, 《清稗類鈔》(第十三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陳恭敏輯, 1997, (光緒年間出版), 《戒煙全法》, 北京: 中國書店。
- 陳森, 1987, (初版 1849), 《品花寶鑑》, 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全集》。台北: 博遠。
- 陳琪、陳輝德, 1905, 《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游記》。
- 俞達, 1980, (初版 1878), 《青樓夢》, 台北: 河洛圖書公司。
- 屠坤華, 1916, 《萬國博覽會游記》,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郭嵩燾, 1982, 《郭嵩燾日記》,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1983, 《郭嵩燾奏稿》, 長沙: 岳麓書社。
- 康有為, 湯志鈞編, 1981, 《康有為政論集》(上、下), 北京: 中華書局。
- 康有為, 孔祥吉編著, 2008, 《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 2009, 《大同書》, 上海: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 彭養鷗, 1984, (初版 1909), 《黑藉冤魂》, 台北: 廣雅出版社。
- 張恨水, 2004, 《春明外史》(上、下),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 黃世仲, 1980, 《二十載繁華夢》, 台北: 河洛圖書公司。
- 黃叔瓚, 1984, (初版 1736), 《臺海使槎錄》, 台北: 大通書局。
- 葛元煦/黃式權/池志徵, 1989, 《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鄒容, 1981, (初版 1903), 〈革命軍〉, 收錄於張玉法編, 《晚清革命文學》, 頁 106~140, 台北: 經世書局。
- 漱六山房(清), 1992, (作於 1848, 初刊 1906), 《風月樓》, 青島: 青島出版社。
- 劉鶚, 1980, 《老殘遊記》, 台南: 大夏。
- 鄭觀應, 夏東元編, 1982, 《鄭觀應集》(上、下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2002, 《盛世危言》, 北京: 華夏出版社。
-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2011, (初版 1911), 《中國的文明》, 收錄於翟理斯, 《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 北京: 金城出版社。
-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2009, (初版 1865), 《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otting About Chinese),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薛福成, 丁鳳麟、王欣之編, 1987, 《薛福成選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2002, 《庸庵文編、續編、外編、海外文編》, 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檀園主人, 1994, (初刊 1821), 《雅觀樓》, 收錄於《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 2》, 瀋陽: 春風文藝出版社。

- 魏秀仁，1984，(初版 1908)，《花月痕》，台北：博遠。
- 魏源，1978，《魏源集》，台北：滄文書局。
- ，2009，《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
- 韓邦慶，1998，(初版 1895)，《海上花列傳》，台北：三民書局。
- 譚嗣同，1998，《仁學》，台北：學生書局。
- 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2006，(初版 1911)，《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Changing Chinese)，北京：中華書局。
- 蘧園，1997，(初刊 1903)，《負曝閒談》，收錄於《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17》，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 嚴復，周振甫選輯，2004，《嚴復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王棊編，1986，《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
- 嚴復譯，赫胥黎著，2007，《天演論》，台灣：商務印書館。
- 龔自珍，1996，《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二、現代部份

- 丁守和主編，1999，《中國近代啓蒙思潮》(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上海市文史館編，1988，《舊上海的烟賭娼》，上海：百家出版社。
- 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編，1996，《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上海市檔案館編，2003，〈近代上海參加世界博覽會史料選〉，《檔案與史學》，2003年，2期。
- 上海圖書館編，2002，《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于恩德編著，1973，(初版 1934)，《中國禁烟法令變遷史》，收錄於沈雲龍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 878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
- 川床邦夫，2011，《中國煙草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丸尾常喜，2009，《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1983，《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史學會編，1957，《辛亥革命》(第五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國史學會編，2002，《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2，《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七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87，〈晚清赴美參加聖路易斯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1987年，4期，頁 22~33。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5，〈晚清中國參加日本大阪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2005 卷，4 期，頁 17~29。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6，〈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上），《歷史檔案》，2006 卷，1 期，頁 37~4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6，〈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中），《歷史檔案》，2006 卷，2 期，頁 17~2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6，〈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下），《歷史檔案》，2006 卷，4 期，頁 11~18。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1975，《新生活運動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毛姆(Somerest Maugham)，2006，《在中國屏風上》(On a Chinese Screen)，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 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正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2009，《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合肥：黃山書社。
- 王一川，2001，《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中江，2010，《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一個新的全能式世界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11，〈清末民初中國認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強權」與「公理」的兩極性思維為中心〉，收錄於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頁 80~127，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正華，2003，〈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錄於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頁 421~47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汎森，2002，〈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收錄於黃克武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頁 97~13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3，〈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61~94，台北：聯經出版社。
- 王宏斌，1997，《禁毒史鑒》，長沙：岳麓書社。
- ，2000，《禁煙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王金香，2005，《中國禁毒史》，北京：學習出版社。
- 王海鵬，2008，〈近代早期來華傳教士與鴉片陋俗的糾葛與分離〉，《天府新論》，2008 年，4 期，頁 125~129。
- 王海鵬、劉天路，2009，〈來華傳教士與晚清反鴉片運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 卷，5 期，頁 138~142。
- 王德威，2003，《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 ，2011，《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
- 王樹槐，1980，〈鴉片毒害——光緒二十三年問卷調查分析〉，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曉秋，1987，《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

- 尹德翔，2009，《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文史精華編輯部編，1997，《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上、下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石川禎浩，2002，〈辛亥革命時期的種族主義與中國人類學的興起〉，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下），頁 998~102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2011，《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石磊，2003，〈工部局鴉片管理政策轉變及其背景分析〉，收錄於馬長林編，《租界裡的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田海林、張志勇，2002，〈禁煙新政與清王朝的覆亡〉，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頁 1289~130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申海青，2010，〈晚清軍國民主義思潮的形成與影響〉，《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31 卷，2 期，頁 101~104。
- 付海晏，2008，〈跑調的國貨展覽會：1935 年無錫國貨流動展覽會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頁 125~138。
- 目黑克己，1993，〈光緒初年山西省禁種罌粟問題〉，《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22 期，頁 67~8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布思(Martin Booth)，1999，《鴉片史》(Opium: A History)，海南：海南出版社。
- 布魯克(Timothy Brook)，2008，〈明清時期中國的吸煙現象〉，收錄於吉爾曼(Sander L. Gilman)、周迅(Zhou Xun)等，《吸煙史：對吸煙的文化解讀》(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頁 54~61，北京：九州出版社。
- 布魯克斯(Peter Brooks)，2005，《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慾望對象》(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北京：新星出版社。
- 史書美，2007，《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2005，《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Chinese Roundabout)，上海：遠東出版社。
- 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2005，《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皮后鋒，2006，《嚴復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老尼克，2004，《一個番鬼在大清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 仲偉明，2010，《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 吉見俊哉，2010，《博覽會的政治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 吉爾曼(Sander L. Gilman)、周迅(Zhou Xun)等，2008，《吸煙史：對吸煙的文化解讀》(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北京：九州出版社。

- 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 2004, 《1927~1937 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代化》(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安德森(Eugen N Anderson), 2003, 《中國食物》(The Food of China),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弗萊德蘭德(Henry Friedlander), 2000, 《從安樂死到最終解決》(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北京：北京出版社。
- 亨特(William C·Hunter), 2009, (初版 1882、1885), 《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 2001, 《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西敏司(Sidney W. Mintz), 2010, 《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北京：商務印書館。
- 行龍, 1998, 《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台北：南天書局。
- 伍美華(Roberta Wue), 2012, 〈本質上中國：十九世紀攝影的中國肖像照主體〉, 收錄於劉瑞琪編, 《近代肖像意義的論辯》，頁 348~379, 台北：遠流出版社。
- 伍碧雯, 2002, 〈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 《成大西洋史集刊》，10 期, 頁 287~310。
- , 2007, 〈德意志民族的優生學：德國種族衛生的起步與初期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8 期, 頁 371~406。
- , 2010, 〈從隔離到融合？：德意志帝國時期(1871~1918)猶太人的生存與發展〉, 《成大歷史學報》，38 期, 頁 179~212。
- 朱維錚, 1994, 〈晚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 收錄於劉青峰編,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頁 275~288,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朱慶葆、蔣秋明和張士杰, 1995, 《鴉片與近代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朱慶葆、劉霆, 2012, 《黑色的瘟疫：插圖本中國毒品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 牟安世, 1990,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 收錄於阮芳紀、沈永興編, 《屈辱與抗爭：鴉片戰爭 150 週年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余蓮實, 2010, 〈民國時期城市知識女性與生育節制〉, 收錄於盧建榮編, 《批判歷史學：體制不公與微弱的反抗聲音》，頁 201~230, 台北：新高地出版社。
- 吳小鷗, 2011, 〈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啓蒙〉,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4 卷, 4 期, 頁 1~5。
- 吳文忠, 1981, 《中國體育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
- 吳丕, 2005, 《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 1895~192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吳春梅，〈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清末的禁煙運動〉，頁 136~140。
- 吳義雄，2009，《條約口岸體制的蘊釀：19 世紀 30 年代中英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吳瓊、杜予編，2005，《上帝的眼睛：攝影的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沙培德，2010，〈梁啟超與晚清中國「種族」之概念化〉，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頁 68~102，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李文治編，1957，《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二)，北京：三聯書店。
- 李允俊編，2000，《晚清經濟史事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長莉，2010，《晚清上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李尚仁，2005，〈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三份，頁 467~509。
- ，2008，〈腐物與骯髒感：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收錄於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頁 45~82，台北：清華大學出版社。
- 李尚仁編，2008，《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社。
- 李傳斌，2001，〈李鴻章與近代西醫〉，《安徽史學》，2001 年，3 期。
- 2010，〈醫學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禁煙〉，《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0 年卷，2 期，頁 60~68。
- 李歐梵，1995，《鐵屋中的吶喊》，台北：風雲時代。
- ，2001，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瀟，2006，〈清末民初的中國近代史演義初探〉，《宿州學院學報》，21 卷，1 期，頁 50~52。
- 呂文翠，2009，〈玻璃、燈與視覺現代性：情色敘事、傳統之「海派」變異〉，收錄於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94~1908》，頁 511~560，台北：麥田出版社。
- 呂芳上，2004，〈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頁 195~233。
- 呂紹理，2005，《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
- 余新忠主編，2009(a)，《清末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三聯書店。
- ，2009(b)，〈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收錄於黃興濤編，《新史學》，第三卷，頁 57~99，北京：中華書局。
-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2003，《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 2003,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汪榮祖, 1991, 《章太炎研究》, 台北：李敖出版社。
- 巫仁恕, 2007, 《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台北：聯經出版社。
- 沈松僑, 2001, 〈我以我血薦軒轅〉, 收錄於盧建榮編, 《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 頁 281~364, 台北：麥田出版社。
- 沈原, 2006, 〈中西文化的交融與碰撞：記晚清政府派員參加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 《歷史檔案》, 2006 年, 第 4 期。
- 何小蓮, 2006, 〈傳教士與中國近代公共衛生〉, 《大連大學學報》, 27 卷, 5 期, 頁 29~33。
- , 2006, 《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 2007, 〈衝突與合作：1927~1930 年上海公共衛生〉, 《史林》, 2007 年卷, 3 期, 頁 122~128。
- 何志虎, 2008, 〈戊戌維新與「近代救亡的中國觀」的中級形態〉, 《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8 卷, 2 期, 頁 37~43。
- 何炳隸, 2000,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北京：三聯書店。
- 何漢威, 2001, 〈清季國產鴉片的統捐與統稅〉, 收錄於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 頁 545~592, 台北：稻香出版社。
- 吳承明, 2001, 〈十八與十九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 收錄於吳承明, 《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 頁 238~288, 北京：三聯書店。
- 村上衛, 2008, 〈閩粵沿海民的活動與清朝：以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貿易為中心〉, 收錄於湯熙勇編,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十輯, 頁 361~418, 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貝格(Jos Ten Berge), 〈鴉片的鼎盛時期〉, 收錄於吉爾曼(Sander L. Gilman)、周迅(Zhou Xun)等, 《吸煙史：對吸煙的文化解讀》(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頁 71~81, 北京：九州出版社。
- 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 2006, 〈何謂寫實主義中的真實?〉, 收錄於劉紀蕙編, 《文化的視覺系統 I: 帝國—亞洲—主體性》, 頁 21~37, 台北：麥田。
- 阿英編, 1982, 《鴉片戰爭文學集》(上、中、下), 台北：廣雅出版社。
- 孟智、宋興昌, 2008, 〈從五蠹篇管窺韓非子人口論〉, 《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8 卷, 4 期, 頁 11~13。
- 林永匡、袁立澤, 2001, 《中國風俗通史：清代卷》,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林芳, 2009, 《近代中國博覽會之第一人：陳琪傳》,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林治平, 1993, 〈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禁煙運動〉, 收錄於林治平, 《基督教與中國論集》, 頁 367~387, 台北：宇宙光傳播中心出版社。

- 林滿紅，1970，〈清末本國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1856-1906）——近代中國「進人替代」個案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期，頁385-432。
- ，1979，〈晚清的鴉片稅，1858-1906〉，《思與言》，16卷5期，頁427-476。
- ，1985，《清末社會流行吸食鴉片之研究：供給面之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1991，〈中國的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產(1814~1850)〉，收錄於吳劍雄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頁41~44，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3，〈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收錄於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頁357~426，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9，〈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10，〈晚清的土產鴉片觀念〉，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頁44~6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11，《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林麗月，1999，〈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10卷，3期，頁111~157。
- 林鵬俠，2002，《西北行》，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 尚季芳，2010，《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苗延威，2007，〈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頁1~45。
- 周迅，2008，〈近代中國的吸煙狀況〉，收錄於吉爾曼(Sander L. Gilman)、周迅(Zhou Xun)等，《吸煙史：對吸煙的文化解讀》(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頁113~124，北京：九州出版社。
- 周春燕，2010，《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 周寧，2004，《鴉片帝國》，北京：學苑出版社。
- 周蕾，2001，《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台北：遠流出版社。
- 邱德亮，2008，〈從局限經濟到普遍經濟：鴉片消費的東方語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六十九期，頁1~55。
- ，2009，〈亦毒亦藥與鴉片政權〉，《新史學》，20卷，3期，頁127~155。

- 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 2007, 《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台北: 左岸出版社。
- 波特(Roy Porter)、泰希(Mikulas Teich)編, 2004, 《歷史上的藥物與毒品》(Drugs and Narcotics in History),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松本真澄, 2003, 《中國民族政策之研究: 以清末到 1945 年的民族論為中心》,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南京圖書館編, 2003, 《中國早期博覽會資料匯編》(一~七冊), 北京: 中央黨校出版社。
- 胡成, 2007, 〈「不衛生」的華人形象: 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6 期, 頁 1~33。
- 胡祥翰, 1989, (初版 1930), 《上海小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胡適, 1986, 《胡適作品集 1: 四十自述》, 台北: 遠流出版社。
- 胡鴻基, 1971, (初版 1933), 《公共衛生概論》, 台灣: 商務印書館。
- 洗波, 2005, 《煙毒的歷史》,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 姜義華, 1994, 〈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 收錄於劉青峰編,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頁 143~157,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姜濤, 1998, 《中國近代人口史》, 台北: 南天書局。
- 柯文(Paul A. Cohen), 2006,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 王韜與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江蘇: 江蘇人民出版社。
- 柯拉瑞(Jonathan Crary), 2007, 《觀察者的技術: 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台北: 行人出版社。
- 柯特萊特(David Courtwright), 2002, 《上癮五百年》(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台北: 立緒出版社。
- 柯偉林(W.C Kirby), 2006, 《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 侯杰、胡偉, 2005, 〈剃髮、蓄髮、剪髮: 清代辮髮的身體政治史研究〉, 《學術月刊》, 2005 年, 10 月, 頁 79~88。
- 侯楊方, 2001, 《中國人口史: 第六卷—1910~1953》,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姚賢鎬, 1962,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 北京: 中華書局。
- 姚薇元, 2007, 《鴉片戰爭史實考/中國史學史概要》,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2007, 《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 1894 年穿越西南, 1910 年穿越西北》(A Australian in China),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 1961, 《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烏伯格(Eugene Umberger), 2008, 〈贊美尼古丁女郎: 逝去的煙草文學時代〉, 收錄於吉爾曼(Sander L. Gilman)、周迅(Zhou Xun)等, 《吸煙史: 對吸煙的文

- 化解讀》(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頁 175~187, 北京:九州出版社。
-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2002,《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出版社。
- 埃利亞斯(Nobert Elias), 1998,《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二卷),北京:三聯書店。
- 袁庭棟, 2007,《中國吸煙史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 徐元民, 1994,〈嚴復的體育思想〉,《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十八輯,頁 13~24。
- 徐雪筠等譯編, 1985,《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徐復觀, 1994,《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唐才常, 1980,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
- 孫中山,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 1981、1982、1985,《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
- , 1986,《三民主義》,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孫隆基, 2004,《歷史學家的經緯:歷史心理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夏志清, 1979,《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社。
- 秦和平, 1998,《雲南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 1840-1940》,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 2001,《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2006, (初版 1918),《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三卷)(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 馬克思、恩格思, 1997,《馬克思恩格思論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局。
- 馬長林編, 2003,《租界裡的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馬寅初, 1932,《馬寅初演講集》(第四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 馬敏, 1988,〈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近代史研究》,第一期。
- , 2006,〈張騫與近代博覽事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頁 17~31,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 2006,〈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頁 32~62,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 2006,〈中國與世界博覽會〉,收錄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頁 63~66,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馬森(Mary Gertrude Mason), 2006, (初版 1938),《西方的中國及中國人觀念 1840~1876》(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北京:中華書局。
- 馬模貞, 1994,《毒品在中國》,台北:克寧出版社。

- 馬模貞主編，1998，《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馬維綱編，1993，《禁娼禁毒：建國初期的歷史回顧》，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 郝先中，2005(a)，〈西醫東漸與中國近代醫療衛生事業的肇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卷，1期，頁27~33。
- ，2005(b)，〈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2005年卷，5期，頁73~79。
- 郝延平，1991，《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高彥頤(Dorothy Ko)，2007，《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台北：左岸出版社。
-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2001，《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北京：商務印出館。
- 高晞，2009，《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梅公任編述，1935，《亡國滅種的鴉片煙禍》，北平：民友書局出版。
- 葉文心(Wen-Hsin Yeh)，2010，《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台北：時報出版社。
- 陶亢德編，1937，《鴉片之今昔》，上海：宇宙風出版社。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2004，《百年煙痕：鴉片煙具遺珍》，台北：歷史博物館。
- 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2010，(初版1911)，《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1911)》(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托馬斯.D.萊因斯，1994，〈改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1900~1908年中國的禁煙運動與英美的影響〉，《國外近代史研究》，25期，頁1~4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章士釗，1961，〈疏皇帝魂〉，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
- 章炳麟，1998，《尙書》，香港：三聯書店。
- 章開沅等編，1991，《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文聯，2007，〈近代中國「生育節制」思潮的歷史考察〉，《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卷，2期，頁174~180。
- 陳天華，1981，(初版1904)，〈警世鐘〉，收錄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頁173~212，台北：經世書局。
- 陳生璽，1995，〈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上），《渤海學刊》，1995年，3期，頁20~26。

- ，1995，〈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下），《渤海學刊》，1995年，4期，頁64~72。
- 陳占彪，2010，〈論清末民初中國對萬國博覽會的三種認知〉，《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卷，5期，頁152~157。
- ，2010，《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旭麓，1992，《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邦賢，1992，（初版1937），《中國醫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陳長蘅，1928，《中國人口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0，《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3，〈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收錄於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蘅，《人口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玲，2008，〈戊戌維新時期不纏足運動中的種族話語〉，《安徽文學》，2008年卷，9期，頁240。
- 陳玲、王迦南、蔡小麗編著，2005，《明信片清末中國》，台北：究竟。
- 陳無我，1997，《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上海：上海書店。
- 陳達，1981，《現代中國人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陳新余，2004，〈道光年間的銀荒與貨幣危機〉，《常州工學院學報》，17卷，3期，頁9~14。
- 陳熾，趙樹貴、曹麗雅編，1997，《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
- 郭慧，2006，〈清末米蘭博覽會給中國商民的啓示〉，《歷史檔案》，2006卷，2期，頁126~127。
- 張文鈞，2000，〈舊社會吸毒、販毒瑣記〉，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2卷，九十五輯，頁181~188，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張玉法、李又寧編，1995，《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龍文出版社。
- 張仲民，2009，《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張君俊，1935，《中國民族之改造》，上海：中華書局。
- ，1944，《華族素質之檢討》，江西：，商務印書館。
- 張昌甲，1982，〈煙話〉，收錄於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台北：廣雅出版社。
- 張研，2009，《17~19世紀中國的人口與生存環境》，合肥：黃山書社
- 張研、孫燕京編，2009，《民國史料叢刊718：社會、社會問題：肅清私土法令、肅清煙毒、禁煙行政、蔣主席禁煙言論集、禁煙運動宣傳綱要、拒毒運動叢刊》，北京：大象出版社。
- ，2009，《民國史料叢刊719：社會、社會問題：禁煙之理論與實施、禁煙手冊》，北京：大象出版社。
- 張枬、王忍之編，1960，《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上、下冊），北京：三聯書店。

- 張泰山，2008，《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瑞德，2001，〈想像中國：倫敦所見古董明信片圖像分析〉，收錄於張啓雄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下冊），頁 807~83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德勝，1997，《思入風雲：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與社會變遷》，台北：巨流出版社。
- 張慧瑜，2008，〈「被看」的「看」與三種主體位置：魯迅「幻燈片事件」的後（半）殖民解讀〉，《文化研究》，第七期，頁 105~148。
- 張歷君，2003，〈時間的政治：論魯迅雜文中的技術化觀視及其教導姿態〉，收錄於羅崗、顧錚編，《視覺文化讀本》，頁 279~314，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馨保(Chang Hsin-Pao)，1989，《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張繼業，1905，〈記散魯伊斯博覽會中國入賽情形〉，《東方雜誌》，2 卷，9 期。
- 張灝，2010，《幽黯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
- 梁啓超，張品興主編，1997，《梁啓超全集》（1~1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 梁啓超，2009，《飲冰室全集》，台南：大孚書局。
- 許宏彬，2002，《台灣的阿片想像：從舊慣的阿片君子到更生院的矯正樣本》，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科技史組碩士論文。
- 許紀霖、宋宏編，2011，《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 許義雄，1988，〈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以自強保種思想為中心的探討〉，《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十輯，頁 7~17。
- 郭衛東，1998，〈不平等條約與鴉片輸華合法化〉，《歷史檔案》，2 期，頁 91~97。
- 郭衛華，2009，〈天下一家、救亡圖存、民主富強：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之範式沿革〉，《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62 期，頁 52~55。
- 曹然，2010，〈「清潔」與「衛生」：中國近現代健康觀念轉變〉，《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 年卷，4 期，總號 41 期，頁 53~57。
- 曹樹基，2001，《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陸勇，2010，〈「亡國滅種」的想像與近代民族國家話語霸權的形成〉，《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9 卷，1 期，頁 110~113。
- 陶孟和、陳方之、陳長蘅，1933，《人口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
- 程大學、許錫專，1978，《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黃克武，2002，〈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收錄於《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頁 97~13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黃宇和，2005，〈讀史札記—論馮客的鴉片讚歌及其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七期，頁 225~232。



- 黃金麟，1998，〈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期，頁 163~203。
- ，2000，《歷史、身體、國家》，台北：聯經出版社。
- ，2005，《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
- 黃智奇，2004，《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香港：宣道出版社。
- 黃福銘，2010，〈從鴉片戰爭前後中西關係看朝貢體制到條約體制的轉變〉，《黑龍江史志》，2010 年卷，21 期，總號 238 期，頁 28~30。
- 黃綉媛，200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救亡運動的四重奏：保國、保種、保教與國粹保存運動的齊鳴(1842~1912)〉，《白沙人文社會學報》，創刊號，頁 317~378。
- 黃賢強(Sin-Kiong Wong)，2010，《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曾佩琳(Paola Zamperini)，2005，〈完美圖像：晚清小說中的攝影、慾望與都市現代性〉，收錄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頁 451~475，台北：聯經出版社。
- 曾傳輝，2010，〈從歷史文化解讀「鴉片」隱喻的多重含義〉，《世界宗教文化》，2010 年卷，1 期，頁 14~20。
- 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2007，《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出版社。
- ，2008，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 年代）〉，收錄於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醫療》，頁 241~275，台北：聯經出版社。
- 馮客(Frank Dikotter)，1999，《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2000，〈個人身體與群體命運：近代中國之人種繁衍和社會紀律〉，收錄於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頁 203~2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5，〈民國時期的摩登完意、文化拼湊與日常生活〉，收錄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頁 477~495，台北：聯經出版社。
- 傅柯（福柯）(Michel Foucault)，1999，《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
- ，2003，《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
- ，2010，《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傅益光，2000，〈何鍵主湘時期的特稅概況〉，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1 卷，三十四輯，頁 177~189，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彭善民，2007，《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托皮克(Steven Topik)，2007，《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 1400 年到現在》(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台北：如果出版社。
- 彭澤益，2010，〈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收錄於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頁 17~52，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
- 蒙祖兵，2009，〈康有為體育思想略論〉，《成都大學學報》，2009 年，4 期，頁 103~104。
- 飯島涉，2001，〈鼠疫與近代中國〉，收錄於國立國父紀念館編，《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9~197，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
- ，2002，〈傳染病與辛亥革命〉，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頁 1472~149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喬兆紅，2009，《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演變》，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
-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2004，《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Awakening China)，北京：三聯書店。
- 達素彬(Sabine Dabringhaus)，2006，〈從鴉片貿易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問題的國際性及其應對之道的國際化〉，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五輯，頁 61~83，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葛紅兵、郭玉紅，2007，〈病重的中國：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體隱喻〉，《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4 卷，2 期，頁 11~16。
- 葛凱(Karl Gerth)，2007，《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葛劍雄，1991，《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葛濤、石冬旭，2011，《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溫波，2006，《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北京：學苑出版社。
- 雷祥麟，2004，〈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五十四期，頁 17~59。
- 雷瑑，1954，〈蓉城閒話〉，收錄於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一)，頁 291~3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蒲嘉珉(James Reeve Pusey)，2008，《中國與達爾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楊念群，2006，《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楊紅林，2011，《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楊祥銀，2008，〈衛生（健康）與近代中國現代性：以近代上海醫療衛生廣告為中心的分析(1927~1937)〉，《史學集刊》，5期，頁52~64。
- 楊瑞松，2005，〈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3期，頁1~44。
- ，2006，〈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6期，頁65~108。
- ，2010，〈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節」：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二十一卷，二期，頁107~161。
- 楊劍利，2006，〈清末民初女學實踐狀況考察〉，《中州學刊》，2006年卷，3期(總第153期)，頁179~182。
- 楊璿熙編，1966，《楊永泰先生言論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 楊鵬、李慶峰，2007，〈維新派的種族觀：「救亡意識」下的「保種」思想〉，《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3卷，4期，頁101~103。
- 楊鵬、羅福惠，2011，〈晚清「黃白」種族異視下被貶損、利用甚或改造的身體〉，《世界民族》，2011年卷，1期，頁48~54。
- 溝口雄三，2011，《作為方法的國》，北京：三聯書店。
- 劉士永，2001，〈「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台灣史研究》，第八卷，一期，頁41~88。
- 劉禾(Lydia, H.Liu)，2002，《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Translingual Practice)，北京：三聯書店。
- ，2009，《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北京：三聯書店。
- 劉志琴，2010，〈從藥品、食品到毒品：鴉片的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卷，19期，頁4~13。
- 劉青峰編，1994，《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劉明修(伊藤潔)，2008，《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台北：前衛出版社。
- 劉紀蕙，2006，〈可見性問題與視覺政體〉，收錄於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 I: 帝國—亞洲—主體性》，頁3~13，台北：麥田。
- 劉師培，1997，《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
- 劉海鷗，2005，〈梁啟超興女學的倫理意蘊〉，《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1期，頁47~48。
- 劉紹華，2010，〈從珍品到毒品：鴉片類物質的道德經濟學〉，《中國飲食文化》，6卷，1期，頁27~61。
- 劉雄，1929，《遺傳與優生》，上海：商務印書館。
- 劉增合，2005，《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北京：三聯書店。
- 劉豐祥，2009，《身體的現代轉型：以近代中國城市休閒為中心(1840~1937)》，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鄭永年，1998，《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

- 蔣中正，1934，《蔣委員長新生活運動講演集》，不詳：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
- 蔣智明、朱慶葆，1996，《中國禁毒歷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 樓嘉軍，2008，《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上海：文匯出版社。
- 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等編，2000，《鴉片戰爭》(一~六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1983，《鴉片戰爭史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
- 趙祐志，1997，〈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期，頁287~344。
- 魯迅，1989，(初版1927)，〈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錄於《而已集》，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 翦伯贊等編，2000，《戊戌變法》(一~四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潘光旦，1933，《優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7，《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北京：商務印書館。
- ，1993，(初版1946)，《優生概論》，收錄於《潘光旦文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94，《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95，《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潘君祥編，1996，《中國近代國貨運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盧在軾，2007，〈內地會傳教士與反鴉片運動：以《中國億兆》一文為中心〉，《宗教學研究》，2007年，2期，頁121~127。
- 盧漢超(Hanchao Lu)，2004，《霓紅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上海：古籍出版社。
- 駱惠敏編，1986，《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書信集》，上海：上海知識出版社。
- 閻錫山，1960，《閻錫山治晉政務全書初編》，台北：閻伯川先生遺稿整理委員會。
- 鄧鐵濤、程之范編，2000，《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 蔡鎮，1935，《戒煙全書》，濟南：自印。
- 蔡寶忠，2009，〈解讀近代中國尚武思潮〉，《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5期，頁16~49。
- 蔡鏗，1983，《蔡鏗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蕭致治，1990，〈鴉片戰爭與中華民族的覺醒〉，收錄於阮芳紀、沈永興編，《屈辱與抗爭：鴉片戰爭150週年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96，《鴉片戰爭史》(上、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蕭繼宗主編，1975，《新生活運動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鮑曼(Zygmunt Bauman)，2002，《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南京：譯林出版社。

- ，2003，《現代性與矛盾性》(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北京：商務印書館。
- 霍奇森(Barbara Hodgson)，2005，《鴉片：黑色迷霧中的極樂天堂》(Opium: A Portrait of the Heavenly Demon)，台北：三言色。
- 霍塞(Ernest O. Hauser)，2000，《出賣上海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2005，(初版 1837)，《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dom) (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錢自強、王玥，1998，〈抗戰時期禁煙禁毒史料選〉，《近代史資料》，95 期，頁 105~17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賴淑卿，1986，《國民政府六年禁煙計畫及其成效—民國二十四年到民國二十九年》，台北：國史館。
- 鍾叔河，2010，《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
- 謝輝、林芳，2009，《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戴健，2008，《清初至中葉揚州娛樂文化與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戴麗娟，2008，〈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收錄於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頁 191~221，台北：聯經出版社。
- 濱下武志，2009，〈中國的外貿金融：白銀、鴉片及世界市場整合，19 世紀 20~50 年代〉，收錄於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頁 138~18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蘇智良，1997，《中國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一九〇九年上海萬國禁煙會研究〉，《歷史研究》，2009 年，1 期，頁 85~95。
- 蘇智良、劉效紅，2009，《全球禁毒的開端：1909 年上海萬國禁煙會》，上海：三聯書店。
- 蘇智良、彭善民、胡海英、張虹，2009，《上海禁毒史》，上海：三聯書店。
- 蘇儀貞，1922，《婦女生育論》，上海：中華書局。
- 譚樹林，2010，《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1834~1857)》，北京：群言出版社。
- 韋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1985，〈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收錄於費正清和劉廣京編(John K. Fairbank and Liu Kwang-Ching)，《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上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頁 155~20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2001，〈給娛樂發執照：中國國民黨對上海的管制〉，收錄於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頁 251~290，台北：躍昇文化。
- ，2004，《上海警察 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羅志田，1998，《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

- 羅伯茨編著，2006，《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羅芙芸(Ruth Rogaski)，2007，《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羅茲曼(Gilbert Rozman)編，2003，《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2001，《北京的生育婚姻和喪葬：十九世紀至當代的民間文化和上層文化》，北京：中華書局。
- 羅運炎，1929，《中國鴉片問題》，上海：協和書局。
- ，1934，《中國禁煙問題》，上海：大明圖書公司。
- ，1936，《毒品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
- 顧炳權編，2001，《上海歷代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
- 顧衛民，2010，《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大學出版社。
- 龔纓晏，1999，《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北京，東方出版社。

## 英文書目

- Agamben, Giorgio , 1998 ,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hmad, Diana L. , 2007 , The Opium Debate and China Exclusion Law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est,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Appadurai, Arjun , 1986 ,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slander, Leora , 2001 , " National Taste? Citizenship Law, State Form, and Everyday Aesthetics in Modern France and Germany, 1920~1940 " , in Daunton, Martin and Matthew Hilton(eds),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Material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America, pp.109~128, Oxford: Berg.
- Baumler, Alan , 2001 , Modern China and Opium: A Rea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 2004 , "Opium and History in and out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y in Multi-Perspectives, Quihau University, August, 21-24.  
(<http://166.111.4.131/xi-suo/lxx/meeting/Complete/alanbaumler.pdf>)
- , 2007 , The Chinese and Opium Under the Republic: Worse Than Floods and Wild Beas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ello, David Anthony , 2005 ,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ridge, Virginia , 1999 , Opium and the People: Opiate Use and Drug Control Polic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Bourdieu, Pierre , 1984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die, Janet Farrell and Marc Redfield(eds) , 2002 , High Anxieties: Cultural Studies in Addi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ook, Timothy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eds) , 2000 ,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rook, Timothy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 , 2000 , "Opium's History in China", in Tiomthy Brook & Bob Tadashi Wakabayash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owell, Susan , 1995 , *Training the Body: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ung, Yuehtsen Julitte , 2002 ,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 1896~1945*, New York: Routledge.
- Clej, Alina , 1995 , *A Genealogy of the Modern Self : Thomas De Quincey and the Intoxication of Writ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Paul , 2002 ,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27, No.2, pp. 1~39.
- Daunton, Martin and Matthew Hilton(eds) , 2001 ,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Material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America*, Oxford: Berg.
- Daunton, Martin and Matthew Hilton , 2001 , "Materi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Daunton, Martin and Matthew Hilton(eds), pp.1~32, Oxford: Berg.
- Des Forges, Alexander , 2000 , "Opium/Leisure/Shanghai: Urban Economies of Consumption", in Thomthy Brook & Bob Tadashi Wakabayash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pp.167-85,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kotter, Frank , 1992 ,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 "A Cultural History of Syringe in Modern China" ,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28, No.1, pp. 37~56.
- Dikotter, Frank ,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 2004 ,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Dirlik, Arif , 1996 ,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35, No.4.
- Douglas, Mary and Baron Isherwood , 1996 ,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 Fairbank, John King , 1953 ,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24~1854*,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ay, Peter. Ward. , 1975 , *The Opium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 Foucault, Michel , 2000 ,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 2008 ,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Palgrave Macmillan.
- Foxcroft, Louise , 2007 , *The Making of Addic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Opiu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Hampshire: Ashgate.



- Gilman Sander L. , 2003 , “Black Bodies, White Bodies: Toward an Icono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rt,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in Amelia Jones(ed),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er*, pp.136~150, London: Routledge.
- Godley, Michael R. , 1978 , “China’s World’s fair of 1910: Lessons from a Forgotten Events” ,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12, No.3, pp. 503~522.
- Goodman, Jordan, Paul. Lovejoy, Andrew Sherratt , 1995 , *Consuming Habits: Drug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London: Rotuledge.
- Hao, Yen-P’ing , 1986 ,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yter, Alethea , 1988 , *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Wellingborough : Crucible.
- Hodgson, Barbara , 2001 , *In the Arms of Morpheus: The Tragic History of Laudanum, Morphine, and Patent Medicines*, New York, Firefly books.
- Janin, Hunt , 1999 , *The India-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C.: McFarland.
- Jay, Martin , 1988 , "Sc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 pp.3~29 , in *Vision and Visuality* , edited by Hal Foster. Seattle: Bay Press.
- Kane, Harry Hubbell , 2008(1854) , *Opium-Smoking in America and China*,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 Laamann, Lars P. , 2002 , "Pain and Pleasure: Opium as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28, No.1, pp. 1~20.
- Lalvani, Suren , 1996 , *Photography, Vi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Bod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Lee, Peter , 2006 , *Opium Culture: The Art &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Rochester, Vermont: Park Street Press..
- Levin, David Michael(ed) , 1993 ,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Xiaoxiong , 2009 , *Poppies and Politics in China: Sichuan Province, 1840s to 1940s*, Newark :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 Lodwick, Kathleen L. , 1996 ,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Lupton, Deborah , 1995 , *The Imperative of Health: Public Health and the Regulated Body*, London: Sage.
- MacPherson, Kerrie L. , 2002 ,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Madancy, Joyce A. , 2000 , "Poppies, Patriot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Nationalism and State Leadership in the Anti-Opium Crusade in Fujian, 1906~1916", in Thomthy Brook & Bob Tadashi Wakabayash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pp. 228-247,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3 , *The Troublesome Legacy of Commissioner Lin: The Opium Trade and Opium Suppression in Fujian Province, 1820s to 1920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d) , 2004 , *The Royal Ccommission on Opium: 1893-1895: Reports, Minutes of Evidences and Appendices*, Ganesha Press.
- Margolis, Stacey , 2002 , "Addiction and the Ends of Desire" in Janet Farrell Brodie and Marc Redfield(eds), *High Anxieties: Cultural Studies in Addiction*, pp.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 Steven , 2007 , *The Art of Opium Antiques*,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 Mclancon, Glenn , 2003 ,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 McMahon, Keith , 2002 , *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Opium 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m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Mimtz, Sidney , 1985 ,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Penguin Books.
- Milligan, Barry , 1995 , *Pleasure and Pains: Opium and the Ori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Morris, Andrew D. , 2004 ,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Owen, David Edward , 1968(1934) ,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Hamden: Archon Books.
- Plant, Sadie , 1999 , *Writing on Drug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Polachek, James M. , 1992 , *The Inner Opium War*,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Roy, ans Mikula Teich , 1996 , *Drugs and Narcotics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nciere, Jacques , 2004 ,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New York: Continuum.
- Ronell, Avital , 2004 , *Crack Wars: Literature Addiction Man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ydell, Robert W. , 1984 ,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kula, Allan , 1986 , "The Body and the Archive", October, No.36~39.
- Simmel, Georg , 1997 ,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eds), *Simmel on Culture*, pp.187~205, London: Sage.
- Slack, Edward, R.Jr. , 2001 , *Opium, State, and Society: China's Narco-Economy Guomindang, 1924-1937*,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pence, Jonathan , 1975 ,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 Carolyn Grant(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an, Chung , 1978 ,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 Thiriez, Regine , 1998 , *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 Amsterdam: Gordon & Breach.
- Trocki, Carl , 1999 ,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 Opium Trade 1750-1950*, London: Routledge.
- Tsu, Jing , 2005 ,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keman, Frederic Jr. & Carolyn Grant(eds) , 1975 ,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ng, R.Bin , 2000 , "Opium and Modern Chinese State-Making", in Tiomthy Brook & Bob Tadashi Wakabayash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pp. 190-211,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eh, Wen-Hsin , 1997 , "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 *China Quarterly* 150, pp. 375~394.
- Yip, Ka-Che , 1995 ,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Yue, Dong Madeleine and Joshua L.Goldstein , 2006 ,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Zheng, Yangwen , 2005 ,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Xun , 2002 , "A History of Narcotic Consumption in Moder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28, No.1, pp. 21~36.
- Zhou, Yongming , 1999 ,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